最后的遗言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最后的遗言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上海市政协编译组　译
章嘉琳　寿进文　校

KHRUSCHEV REMEMBERS

The Last Testament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Boston, 1974

根据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 1974 年版译出

最后的遗言

ZUIHOU DE YIYAN

——赫鲁晓夫回忆录续集

译者/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
上海市政协编译组

校者/章嘉琳　寿进文

封面设计/尹凤阁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新华印刷厂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25.5　字数/447,000

版次/1988 年 5 月第 1 版　1988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40,000

东方出版社出版发行(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ISBN 7-5060-0042-3/D・42　　工本费 7.50 元

(内 部 发 行)

出版说明

1974年，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和英国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分别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2卷:《赫鲁晓夫回忆录——最后的遗言》。据这本书的英译本编者称，赫鲁晓夫生前曾在莫斯科郊外的别墅里用了4年的时间录下了长达180小时的谈话录音。1971年9月赫鲁晓夫死后，他的家属和朋友通过秘密途径把这部分录音带和录音记录稿送到了西方。据西方报刊和通讯社报道，这些录音带在美国经过音图鉴定，证实是赫鲁晓夫本人的声音。本书就是根据这部分录音带和录音记录稿编译出版的。自该书于1974年在西方出版以来，苏联官方至今对此都未发表正式评论。

这部回忆录的内容包括1954年至1964年赫鲁晓夫执政年代的苏联政治、经济、外交等情况，特别涉及国内外政策的演变。这个时期是苏联发生重大变化的重要历史时期，赫鲁晓夫的回忆，在这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个别地方同《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有一些雷同或重复。但整个说来，仍可作为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继续和补充。故中译本题名为《最后的遗言——赫鲁晓

夫回忆录续集》。

1975年曾由三联书店根据美国利特尔—布朗出版公司1974年英文本翻译出版了删节本。现在，我们补译了内容对我国内外政策有许多污蔑和攻击的“中国”一章，出版全译本，它与《赫鲁晓夫回忆录》一书成为一份完整的历史资料，供理论学术界和有关领导研究参考之用，仍内部发行。

1988年1月

目　　录

第一部　同胞们和盟友

第二部　对外政策和国外旅行

前　　言

爱德华·克兰克肖

在我为《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写的绪言中，我叙述了我怎样很快地消除了最初对这些文件的真实性所产生的怀疑，尽管我只是凭一份俄文打字原稿来肯定它的真实性，并无其他依据。很清楚，这份打字原稿一定是从赫鲁晓夫退休后在不同时期和不同的心境中所作的一系列讲话录音中抄录下来的。后来，这个假定被证实了；并且，我曾确信在不久的将来，西方学者们一定会得到这些录音带。

现在，这个时刻已经来到，比我预料的还要早。这一堆原本的录音带增添了许多新材料，足够编一本第二卷了。更重要的是，所有录音带象指纹鉴定一样，都经过了所谓音图的精密鉴定，并且得到了证实（谢克特先生在为本卷写的序言中叙述了这种方法）。诚然，能有科学方法加以证实是很好的，不过我自己对回忆录的真实性确信无疑，毋需以科学方法加以证明。语气正是赫鲁晓夫的语气，内容完全符合他的性格。

第一卷出版时有过许多争论，但认为它是伪造而全部加以否定的则比我预料的少。之后的数周和数月中，我很感兴趣和高兴地发现，不管赫鲁晓夫本人的正式否认(在这种情形下，这是不可避免的)，材料的真实性立刻为外交家和政治家们所确认——不仅在西欧和美国，而且也在东欧——他们曾经直接同赫鲁晓夫打过交道，因而深知其人。在苏联问题专家中有少数几个持严重怀疑态度的人，然而其中有一些人后来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大多数异议来自那些抱有很深成见的人，他们似乎根本否认回忆录的真实性。除了一个著名的记者热烈而又详细地争辩说整个故事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内一个专门造谣的部门编造的以外，持异议者的一般看法认为，回忆录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内所谓制造假情报的一个部门为了混淆视听而捏造的。作为一个二十五年来曾经被苏联各种欺骗性的假情报所包围并且的确上过当的人，我是不愿低估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本领的。问题是回忆录除了以下两个明显的目的之外，没有其他别的用意。一个是要引起人们对斯大林的罪行(或某一些罪行)的注意，而这时新的领导正在掩盖这些罪行；更重要的，回忆录看来是为赫鲁晓夫本人辩护。

这就是说，回忆录是一个从很高的职位上被拉下马、受到废黜、软禁并且同外界失去联系和被遗忘的人的自我辩护。此人曾经统治苏联十年，引起过世界的注意。

但是苏俄的做法多么奇怪，多么与我们的不同，赫鲁晓夫1964年一下台，就被他以前的同事们(其中有些人是他一手提拔的)弄成一个被遗弃的人，好象他这个人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

赫鲁晓夫回忆录出版后不久，他死了。对他的死，没有大事声张，没有举行国葬，没有一个政府成员护送他的遗体到新圣母公墓内他那块荒僻的墓地。他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因此，他要设法挽救自己的历史地位，录下他对自己已被遗忘的事业的叙述，竭力使自己不致被湮没无闻；这又何足为奇呢？

坚持认为回忆录系伪造的人，提出了回忆录中许多谬误和自相矛盾之处。的确，如果没有这些谬误和矛盾百出的话，我反而倒要怀疑这部回忆录的真实性了。赫鲁晓夫是一个按官方意图讲话和唠唠叨叨的人。在他显赫一时的日子里，他的讲话充满了回避、歪曲、故意的省略、自相矛盾以及赤裸裸的谎言。怎么能指望他年迈时就改变呢？第二卷里也充满了同样的东西，即使最漫不经心的读者也会一看便知。不过，认真的读者现在会懂得，指望赫鲁晓夫以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事物，那是荒谬可笑的。回忆录的主要价值（以我看来，它有着十分巨大的历史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事实，而是在于它常常无意地暴露的思想状况以及不仅是赫鲁晓夫本人而且也是所有苏联领导人对世界的态度。

在这方面，我发现这一卷甚至比第一卷更引人入胜，虽然形式有所不同。例如，斯大林的罪过被认为是不成问题的事，只是一笔带过；而对赫鲁晓夫早年的情景却特别加以描述。对于人们迫切需要知道的内幕消息，书中却有重要的遗漏。例如，粉碎反党集团的经过；曾许诺要调查谋害基洛夫案件的调查结果；导致赫鲁晓夫自己下台的事件。在第一卷里提供的思路——举一个例子，如很晚才半心半意地承认集体化的有害性——没有更多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使人们对苏联生活和苏联政府的政策增加了新的见识。学者们将发现，许多问题会引起他们的兴趣和增加他们的了解。他们也将发现许多可以引起争论的问题。我特别想到当赫鲁晓夫对罗马尼亚的苏联化和俄国占领波兰所作的极不老实的叙述时，他所表现的明显的歪曲和回避。他故意隐瞒事实真相到了何等程度？他自己欺骗自己又是到了何等程度？

然而，这一卷使我特别感兴趣（可能是因为在这一卷里较少叙述容易分散人们注意力的罪行和暴力）的是，它比第一卷更深刻、更透彻地显示了苏联政府的粗俗的本质。而这个政府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掌握着绝对的权力，并统治着另外六个欧洲国家。在我看来这是极为重要的。因为西方最严重的错误之一，就是过高地估计——往往高到荒谬的地步——苏联所领导的这一部分世界的

知识和理解事物的能力，更不用说高估了那些控制着苏联生活一切方面的党的干部的智力水平和知识水平了。对于任何没有在苏联长期居住过的人来说，这种错误可能是最难克服的。错误之所以严重，因为我们一再根据苏联政府的表现来确定我们周密而严整的政策考虑；其实这些表现常常是在无知或混乱中产生的。

人们已经忘记或者从未能理解的是，俄国社会中非常薄弱的上层先是被列宁，然后被斯大林彻底摧毁。列宁不仅把整个统治阶级，而且也把大部分敢于对布尔什维克政策提出疑问的激进的革命知识分子消灭或者赶出俄国。列宁在1924年去世后，斯大林着手消灭最优秀的布尔什维克和已经决定拥护他们的那些理想主义者。如果我们记得1917年时俄国人口的五分之四是欧洲最落后的农民，而著名的无产阶级不过是城市化的农民，他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曾经是农奴——即奴隶；那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了1928年，苏联的政府是一个农民政府，它统治着由于内战和革命暴力而变得残忍的农民国家。斯大林挑选来代替老布尔什维克知识分子的人，本身就是从内战的艰苦锻炼中被提到领导岗位上的农民或工厂工人。他们缺乏对他们进行指导的人。他们是没有受过教育而又轻视文化的人。他们中有些人象赫鲁晓夫自己那样，憧憬一个未来的世界，其原因是对俄国的过去以及苏联现在以外的世界的无知。另一些人则纯粹被权力迷了心

穷。他们的唯一指导原则是一种幼儿园式的马克思主义。除了在书本里，在纪念碑上，在大楼中，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档案里以外，整个俄国没有留下一点古老文化的痕迹以供新一代的人学习和增进他们自己的知识。俄国要成为俄国，必须重头做起。它的领导人对外面的世界一无所知，只能用最粗陋的方式恢复旧的规章和旧的政策，并换上新的名称。斯大林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曾接受过神学教育，他具有暴徒的天才，而且是一个伟大的演员。李维诺夫靠边后，他把资产阶级出身的莫洛托夫和具有亚美尼亚商人习性的米高扬派到国外去。他学着如何同西方政治家谈判。不过，他一手控制着外交事务。斯大林去世后，当赫鲁晓夫第一次出国时，他进入了一个他过去一无所知的世界。他必须学习，而且学习得很快。

在第一卷里，赫鲁晓夫时常无意地向我们提供了得以深入洞察某些事实真相的机会。在这一卷里，他给了我们更多的机会。要对俄国农民生活的落后和肮脏得出一个概念，请看他在第六章中讲到那些由农民们变成的革命者的卫生习惯。这种事情，如果由一个外国人报道出来则不会如此逼真，也会被认为是不体面的。但是，读了赫鲁晓夫回忆录后，则请相信我讲的下列事实：直到最近，一些大城市之外的地区实际上还有这种情况，而且据我所知，许多地方也同样如此。再说，当我们在探讨赫鲁晓夫作为一个艺术的保护人的缺点时，值得注意的是他

自己在早年暴露过的对待文化的态度。例如，他对芭蕾舞的看法："当我们看到印有芭蕾舞演员照片的明信片时，我们还以为这不过是穿着猥亵服装的妇女照片。"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人居然能够超出过去他所达到的界限。如在书中显示的那样，他的逐渐进步成了一部动人的故事。每一件事他都得学习，每一件事他都要试一试。是什么东西使得他比他的所有同事——更不用说比他的继承人——高出一筹呢？这就是他的决心，抱负，尤其是他的想象力。这个曾经作为斯大林恐怖活动的积极和残暴代理人而爬到最高领导地位的非常粗野、愚昧的农村孩子，正是依靠这些东西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世界政治家。他的失败，他的无知和他的盲目性表现得如此充分，以致无需再详细论述了。但是，他所取得的积极的成就，虽不很明显，却应尽力加以强调。他一方面教育自己，也在试图教育农民的俄国。同时，大量涌现的具有天赋才能的人——尤其是在科学和艺术领域——正在不断超过他，把他搞得手忙脚乱。

就是书中这种断断续续地、痛苦地揭示出来的自我教育过程，可以向我们提供许多在他的政策背后的事实真相。这是被教条迷住的那个人的政策；他相信苏联的道路掌握着世界未来的钥匙，而且最终必将征服世界；但是，他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正如他非常清楚地表明的那样，许多有关他的地位的奇怪可笑的事情

之一，就是他认为自己最大的成就和最大的愉快是被美国总统以同等的礼遇接待——而美国总统却是这个顽强的共产党头子所立誓要推翻的制度的象征性领袖。

序　　言

杰罗尔德·谢克特

尼基塔·赫鲁晓夫在 1964 年 10 月突然被剥夺权力之后，居住在离莫斯科西面二十英里彼得罗沃一达利涅耶村的有围墙的国家别墅内，过着强制退休的生活。虽然政府注意着他，但是安全措施和监视只是最低限度的。他的警卫不住在赫鲁晓夫和他的妻子尼娜·彼得洛夫娜的家庭住宅内，而驻守在这个用篱笆围着的同一个院子里的一间小屋内。

赫鲁晓夫可以单独在围墙内的花园和院子里自由活动。有时他偷偷穿过围墙出口，沿着周围树林中的小路或者附近莫斯科河岸边散步。在散步时，他可以同领养老金的伙伴、当地村民和呆在这个地区工人休养所的假日游客碰头。他常常停下来同他们一起拍照。他很少几次到莫斯科去，并且总是在严密监视之下去的；例如他到过去常去的克里姆林宫附近投票的时候，他可以使用政府的轿车，不过要有自己的警卫人员陪着。有时他也可以在比较不很严密的监视下访问在莫斯科地区的亲友。

他的家属和知友可以自由出入别墅。

对于一个曾经统治苏联近十年的人，扮演沉默寡言的“特殊的养老金领取者”角色是相当辛酸的。给他的补偿之一是他对掌权年代进行回忆的自由。当有人问到他对过去和目前事件的看法时，他讲起来罗罗苏苏和津津有味。他的家属和朋友不但倾听这些生动的、兴致勃勃的叙述，而且还用提问来启发他；到 1967 年，又催促他开始用磁带录下他的讲话。

直到 1971 年 9 月死去之前，赫鲁晓夫用了四年时间录下了他的回忆录。开头他用一架原始的俄国磁带录音机工作，操纵起来很费事。有时他把麦克风放在录音机上面，几乎使录音听不清楚；他往往没法控制这部机器。后来，当他使用一架高级的西德录音机时，质量就很好。当他在别墅内录音时，在录音带中偶尔可以听到从厨房和别的房间传来的声音。他常常独自在花园里口述，以免被人打断。这时从录音带中又可听到狗吠声，鸟鸣声，孩子玩笑声，或者飞机从莫斯科机场飞进飞出的声音。当他单独工作时，他有时先翻阅笔记再口述他的回忆（从录音带上有时能听到翻阅纸头的沙沙声）。有时，他只是在思考一个题目，试图回忆一切他可能回忆的事情。

赫鲁晓夫在四年时间内所作的录音几乎全部用速记抄录下来。有些录音带在录音时带速不均匀或者声音很嘈杂，象青蛙叫似的；有些录音带的声音则很清晰；当他学

着他所叙述的人物的样子和模仿他们的音调时，就象讲故事似的风趣迷人；他的声音里充满了活跃气息和笑声。

他的工作方法很难得是严谨的或有条不紊的。他常常东拉西扯地漫谈一通，把年代、人物和思想都搅得很乱。象胡志明或宇宙航行员尤里·加加林之死等新闻，或者象红军节等纪念日，会引起他开始谈论一连串包括许多问题和年代的回忆。但在有关他参与的一些事件的细节方面，他的评论往往生动而尖锐。他在自序里解释说，“我的工作方法是首先把自己的记忆变成某个事件，然后一直等到这个事件的照相底片在我的脑子里显出影像来。即使某些事实要比另一些事实印象更模糊一些，我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证我的叙述基本上是真实的。如果发生一些错误，那也不是在重大的问题上。”

赫鲁晓夫和他的家属想在苏联用俄文出版他的回忆录。但他们承认，在当前的政治条件下在苏联出版是不可能的。他和他的助手担心，如果在他死之前不能把回忆录送到西方付印，那也许就永远不能出版了。在他死后回忆录会从他家里被拿走并没收，这是苏联的标准做法。他口述的东西将烂在党的档案里，永远不会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赫鲁晓夫很精明很自负，他不会接受这种命运。他感到只要他还活着，他就仍然拥有一种特殊的权力。他仍然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和苏联公民，可是他也希望

为历史也为他的继承人留下自己的口述回忆录。他知道他在克里姆林宫的继承人为照顾一位前领导人而援用苏联法律条文的限度。虽然公开说来他是无权的，但他正确地估计到对他个人尊重的程度，即他在政治局内仍能发号施令。他相信他能完成他一生中最后的这件工作而不同他的政治继承人发生公开对抗。他接受了这一场挑战——他要又一次显示他在执政时那种令人生畏的勇气、活力和才能了。

他口述回忆录的行动已成为他争取生存的动因，也是用来抵抗年迈和体衰侵袭的主要手段。他相信，未来几代的公民和党员会比把他搞下台的他的过去的同志待他要好一些。但是，怎样才能使他的回忆录得到出版呢？

1967 年当他开始进行这项工作后不久，就有一些关于赫鲁晓夫录音的照片连同他的家属拍摄的有关他的别墅生活的影片传到了美国。这些影片被编成一部电视纪录片放映。

1970年，即录音开始后三年，帮助赫鲁晓夫搞回忆录的人决定：是行动的时候了。经过小心谨慎的和必要的秘密谈判，利特尔一布朗公司和《生活》杂志(两家都属于《时代》杂志公司)获得了向全世界出版发行回忆录第一部分的权利。它包括录音带样品和八百二十页不留空行的俄文打字复印稿(约四十万字)，还有许多家庭照相簿上的照片。因为回忆录是一个下了台的领导人的未经批准

的讲话，因此，复印稿也受到象通过秘密方式传到西方的小说、诗歌和其他“地下”苏联读物一样的对待。利特尔一布朗公司和《生活》杂志保证对这些材料复制或转交的方式、经手人和时间等任何细节不予泄露。这些保证至今仍然有效。整个过程的细节在出版前一直是保密的。

利特尔一布朗公司和《生活》杂志用音图鉴定方法证实了录音带样品的真实性。并且他们对原稿进行了翻译和编辑。可以明显看出，赫鲁晓夫没有机会把他口述的回忆录再通读一遍，以便改正某些错误或对文字加以润色。将复印稿和录音带加以对照后可以发现，某些容易引起争论的材料在录音带送到西方之前已被擦掉了。赫鲁晓夫和他的家属以及朋友们煞费苦心地尽量不泄露苏联的国家机密或不违反政治局的保密规定，并且不得罪任何活着的苏联领导人。

此外，赫鲁晓夫的朋友和家属认为，这个老头子有些颠三倒四的讲话离题太远。他常常讲些粗话，唠唠叨叨，信口开河。当他在国外旅行发表讲演时，有时他的译员不得不故意降低他的调子，甚至完全不译出来。他在苏联国内的即席发言，在党报发表之前须加以整理，将其中粗俗下流和自相矛盾的话删去。帮助他搞回忆录的伙伴考虑到，如果他的回忆录在他活着时一字不漏的照原样出版，苏联当局可能会对赫鲁晓夫和他的助手采取行动。为了减少这种危险，他们扣下了一些部分。例如，复印稿

内有他对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叙述，但却没有提到同一年中克里姆林宫同波兰领导人的冲突。里面记述了他对日内瓦和伦敦的正式访问，但却没有提到他政治生涯中的高峰之一——他的美国之行。另外还有许多事情被省略了。然而，这份原稿显然具有重大的历史价值。

《生活》杂志在1970年11月27日、12月4日、11日和18日连续四个星期刊登了这份原稿中的四篇文章。12月末，利特尔一布朗公司出版了《赫鲁晓夫回忆录》。

赫鲁晓夫本人从来没有直接同利特尔一布朗公司或《生活》杂志发生联系，也没有卷入他的回忆录从苏联弄出去的一连串事件中去。因此，当利特尔一布朗公司宣布出版他的回忆录时，赫鲁晓夫能够忠实和正确地告诉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佩尔谢，他决没有把他的回忆录"移交"给任何人。然而，他并不否认他自己的确有这本回忆录。在佩尔谢的压力下，1970年11月16日，苏联的官方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他所作的如下声明：

"从美国和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报纸的报道中看到，所谓有赫鲁晓夫的回忆录正在筹备出版。这纯属虚构，我为此感到愤慨。我从来没有把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时代或其他出版公司。我也没有把类似这样的材料交给苏联的出版社。因此，我声明，这是虚构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报纸曾多次制造这类谎言而被揭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赫鲁晓夫下台以来他的名

字第一次出现在苏联的公开报纸上。挪威研究苏联问题的专家、当时驻莫斯科的记者普·爱其尔·黑格在那时报道说，赫鲁晓夫的声明“可以说是世界上一个既证实而又否认的最罕见的文件，因为从声明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确有回忆录性质的材料存在。赫鲁晓夫只是否认他个人没有把这样的材料交给别人。其实也没有人这样说过。”黑格报道说，佩尔谢把赫鲁晓夫召到克里姆林宫，递给他一张事先准备好的声明要他签字，这次会晤争论激烈，没有结果。

据一篇关于这次会晤的私下而未发表的报道说，赫鲁晓夫否认已经把回忆录送出国去，并坚持认为他有继续搞回忆录的权利。赫鲁晓夫挥动拳头警告佩尔谢说，任何想要使他就范的努力都会使他处于象沙皇亚历山大一世那样的地位。根据传说，亚历山大一世从他的棺材里爬起来，打扮成一个农民，手里拿着棍棒，走遍全俄国把他要说的话告诉人民。

后来，同一个月里，赫鲁晓夫的心脏情况恶化，他进了医院。几乎过了四个月，他才能继续搞他的回忆录。有人告诉利特尔一布朗公司和《生活》杂志，当他得到一本《赫鲁晓夫回忆录》的样书时，他对书的开本和给他把英译本再译成俄文表示满意。他对录音带材料汇编得如此有条不紊以及把他的个人生活和事业编成小说体裁表示很高兴。尽管他身体衰弱和回忆录的出版引起了麻

烦，他还是决定继续录下去。不仅他的家属和朋友，而且他在克里姆林宫医院里的病友都鼓励他这样做。他从医院回家以后所录下的声音，显然是更加衰弱疲乏的人的那种声音。从他的叙述里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在他最后几个月期间，口述回忆录支撑了他的求生意志。他在1971年9月，即《赫鲁晓夫回忆录》出版后不到一年死去。

在他死后几个月里，更多的材料送到《时代》杂志公司。有增补的录音记录稿，其中包括原始抄本，还有更多的家庭照片，以及全新的一套五吋和七吋一盘的盒装录音带。这些新的录音带在美国抄录并翻译出来，成为现在这本第二卷的基础。

录音带放送时间长达一百八十小时，《赫鲁晓夫回忆录》和本卷所依据的所有录音带均经音图加以鉴定。每一个人的声音同他的指纹一样，各不相同。一个未知的声音经过摄谱仪的分析，可以译制成一种看得见的图象或谱图；然后，受过训练的分析家可以将它同一个已知的音样进行对照。如果将已知和未知的音图加以"对比"后至少有十个不同的音调或音符一致，这就足以证明已知和未知的音样是同一个人的讲话。在二十三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法院使用音图作为定案的根据。这种方法用于刑事案件中，最普遍是用于查明被控犯有匿名电话恐吓罪的被告人。

一个公认为在音图鉴定方面具有专长的独立企

业——新泽西州索默维尔声音辨别服务社对赫鲁晓夫的录音带进行了全面的摄谱仪分析。每当录音带上出现空白和中断时，就会记下一个谱图，正象把录音机关掉和再打开一样。声音辨别服务社总计做了将近六千个不同的谱图。把这些谱图进行比较，看看十个辨认音符是否前后一致，以便断定整个一百八十小时的录音带是否是同一个人的讲话。把这个人的声音的某些特征同一个已知的声音进行对比，即同尼基塔·赫鲁晓夫 1959 年 9 月 18 日在联合国大会上讲话的录音对比。声音辨别服务社发现，一百八十小时录音带是同一个人的声音，并且它同 1959 年联合国大会上赫鲁晓夫的讲话录音完全一样。专家们在结论性的报告里写道：

“我们分析的目的是要确定，这些材料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辨认出是尼基塔·谢·赫鲁晓夫的声音。辨别结论必须是绝对的，不能有半点含糊。

“我们认真地鉴定了一百八十小时录音带中的一百七十五小时半或者说百分之九十七点五。我们可以声明，一百七十五小时半的录音带是尼基塔·谢·赫鲁晓夫录下的。再进一步说，整个一百八十小时的录音带没有一处可以证明它是别人的讲话，而不是赫鲁晓夫的讲话。至于我们不能作出鉴定的那一部分录音并不是因为它是另一个人的讲话，而是因为录音带的频率响应不规则或是严重的失真以致无法进行音图鉴定。”

声音辨别服务社的结论性报告收到之后，对那由于录音技术质量太差而未能辨认的四小时半的录音带进行了复查。这些有疑问的部分的内容主要是讲第二次世界大战，1956年访问英国和农业政策。虽然这些章节由于录音质量太差不能加以确定，但经过电子检测后证明，这里没有可以代替赫鲁晓夫的其他人的声音；从这些章节的内容上看，也没有值得奇怪或容易引起争论的地方以致足以怀疑它不是赫鲁晓夫而是别人的讲话。

《赫鲁晓夫回忆录》英译本所依据的手抄本全部抄自录音带，除了赫鲁晓夫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著名的谴责斯大林的报告这一章外。这一章是从一次同赫鲁晓夫谈话的笔记中抄来的。在目前这一卷里，所有材料都来自《时代》杂志公司所抄录的录音带。

《时代》杂志公司给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收藏所一套录音带和这些录音带的俄文手抄原稿，还有音图专家的全部报告。这些材料将供学者查阅和研究之用。

人们对于赫鲁晓夫在这两卷书中对各种事件的叙述没有提出异议；不过，对他的一些明显错误，——如搞错了年份或遗忘了某一个名字（如印度尼西亚的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或者把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搞成艾伦·杜勒斯，把安德烈·马尔罗搞成莫里哀——都作了纠正。从录音带上抄录下来的材料按专题加以分类，并按年代顺序排列，但赫鲁晓夫的原话或着重点没有一处变动。

斯特罗勃·塔尔伯特和我加了脚注，以便帮助广大读者了解一些基本事实。至于赫鲁晓夫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回忆录中的某些细节，则留待学者和苏联问题专家们去争论和考察吧。

在第二卷里仍有省略处，有时是录音带上的空白，有时是赫鲁晓夫自己不愿详细讨论的某个问题。这后一种情况的典型例子，是他对解除朱可夫元帅国防部长职务的那次政治局会议的记述。赫鲁晓夫说："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叙述"，"根据会议的纪要和速记稿可以得知讨论的情况。"朱可夫还活着，克里姆林宫也有一条禁止泄露政治局会议详情的规定。现在录音带的空白是那些同赫鲁晓夫一道搞回忆录的人造成的，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可能连累他们自己或赫鲁晓夫本人。下述一些问题被精心略去了：关于第一颗苏联原子弹的细节；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费用的数字；苏联防御系统主要工作人员的名字；共产党内的机密；以及那些会影响到当前还活着的当权者的敏感性的政策决定。发表这样的材料会使赫鲁晓夫及其继承人受到不忠诚和破坏保守国家机密法律的指责。那些同赫鲁晓夫交往密切的人同赫鲁晓夫本人一样，是忠于苏联的。因此，他们把这部分录音带藏匿起来以保护这位前领导人，也保护他们自己。

最值得注意的省略是赫鲁晓夫自己丧失权力的情节。他根本就没有叙述这个问题，虽然他提供了不少引起

这次事件的内在因素：他同军方的斗争，他的农业政策，他处理外交事务的方式，U-2 飞机事件，古巴导弹危机。但他丧失权力这件事本身仅仅提到一下而从未加以细述。

尽管赫鲁晓夫想竭力从斯大林的影子中脱身，但他无法避开他自己过去正是一个斯大林主义者这一事实。正如他在两卷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的作风和风格，战略和战术，都是从斯大林那里承袭下来的。这种作风现在依然存在：他的继承者是赫鲁晓夫的褪了色的拷贝，但他们仍套在斯大林主义的模子里。因此，从赫鲁晓夫回忆录不仅可以洞察他所当权的年代，也可洞察他的继承者所实行的统治。

不过，回忆录告诉我们，跟斯大林时代相比有一个重大的变化：倒台的领导人不再从肉体上被消灭。自1953年贝利亚和他的集团被判处死刑以来，解除职务并不意味着审判或处死。1957 年 7 月，赫鲁晓夫驱逐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时树立了新的作风（他们两人被解职以来，安闲地住在莫斯科）。这种新的作风也允许他继续活下去并搞自己的回忆录。

回忆录是对一个人的全面评价。象赫鲁晓夫的生活一样，他的回忆录充满了矛盾、回避和夸张，但也充满了激情，充满了他对俄国和共产主义生活的最后希望。如果他对自己一生的记述常常言过其实，那么这也正是反映了他本人的个性。

英译和编辑者的话

斯特罗勃·塔尔伯特

本书同三年半前出版的第一卷一样，是以一个老人的叙事诗式的口述为依据的；他想用独白这种干净利落的形式重述和表白自己一生。俄文原稿有时很零乱、片断不全，更多的是缺乏联贯性和重复。这需要进行细致的编纂工作。因此，对录音带手抄稿重新作了整理，并加以浓缩和译成英文。编译者的意图是使赫鲁晓夫回忆录既忠于原文，又便于英语阅读。

俄国人称尼基塔·谢尔盖维奇是一个空话连篇的人，一个饶舌者。在他掌权时，当他那种喋喋不休、不负责任的谈话使得他的同事、部下、报告起草人和译员们需要付出极大耐性时，他却比他那些守口如瓶的同志们使国外人士更加感到兴趣。赫鲁晓夫退休后仍然是一个话匣子。当他坐在自己别墅的花园里对下一代口述他的往事和遗嘱时，他用一种令人神往却又杂乱无章的方式滔滔不绝地叙述了自己的回忆和说教。在一段对毛泽东的有害的和荒谬的大跃进所作的充满火药味的评论中，

赫鲁晓夫会突然唱出一首赞扬保加利亚农业奇迹的怀旧赞美诗。或者他会在讲述 1960 年访问法国情况时中途停止录音，答应下一天继续讲；但下一天他要讲的却是其他事情，而在数星期后才结束他在法国的游记。

为了使赫鲁晓夫的叙述有条理，我在不连贯的地方使之条理化。当他的讲话冗长、噜苏或者混乱时，就把它压缩一些。这两卷俄文原稿大约有八十万字，只有两个部分需要大大压缩。第一部分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里叙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十五万字，以“伟大的卫国战争”为题压缩为八节。第二部分是在本卷中论及建设和农业的新材料七万五千字，以“让人民得到住房”和“让人民得到食物”为题压缩为两章。在压缩上述两部分时，尽量把那些会使一般读者感到兴趣的材料汇集起来。无疑，那些没有翻译出来的材料将供专家们使用，他们将可以在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历史收藏所的赫鲁晓夫档案中研究俄文原稿的全文。

细读原稿的人将会发现，赫鲁晓夫尽管有时记忆力欠佳，但在整个耗费精力和要求很高、大声说话而又常常脱口而出的自传创作工作中，他的脑子仍然是十分机敏的。翻译和编辑他的回忆录的指导原则是，让他自己谈出他的看法。只有在假定赫鲁晓夫会亲自通读一遍他的口述手抄稿以及核对他所回忆的事实与历史真实情况是否相符时可能会加以更正的地方（他当然不会有机会这

样做了)，才对某一段落或某一句话进行修正。当他忘了一个名字或记得不准确时，只要有可能，就用方括号或注释把这个名字补上去。有时，如果他的某一个错误能够说明他的考虑问题的方法时，这个错误就不仅在文中加以纠正，而且还在注释中加以解释。总之，增补的文句是最低限度的。这部回忆录不但包括赫鲁晓夫在序言中承认的“不精确”之处——包括离题，吹牛，夸大，自相矛盾，自欺欺人和故意说谎——而且也同样包括了他的洞察力，揭露的隐私以及他偶尔但痛切地表露出来的悔恨或恻隐之心。为了便于读者阅读，虽然对他的回忆录重新作了编排，但我竭力保存了赫鲁晓夫所称的“我的观点的实质”——不仅表达他所讲的话的字句，而且也表达他的讲话中的精神。

这样，读者将能看到在本卷的附录中有三十六页复制的俄文录音记录原稿。第一卷的附录包含赫鲁晓夫生平年表，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结构的解释和说明，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同事们的简历，以及他在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上所作的秘密报告全文。因为有许多同样的名词和人物在新的材料中重新出现，读者可以参阅这些附录。

我非常感谢许多朋友和同事们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我要感谢时代—生活新闻社记者部主任默里·J·加特，他使我有可能担当这项工作。他曾以多种方式给我多次帮助。

赫鲁晓夫自序

我是一个闲散的哥萨克人。我无事可做。一个领养老金的人的命运只不过是日复一日地活下去——等待着生命的尽头。闲散的晚年对谁都不是好过的。对于象我这样一个度过了动乱生涯的人，这更是不好过的。现在，一生经历了无数场暴风雨冲击之后，我搁浅了。

但是我并不发牢骚。每个人，不管他多么显要，变得年老体弱的时刻总会到来；他的能力开始衰退。我承认我比许多同我年纪相仿的人，特别是比某些人要幸运一些。我不曾看见过他们，可是我听见他们围坐在那里不断地张开和闭拢他们的嘴巴，象离开水的鱼儿似的；他们的眼睛模糊不清；他们完全丧失了记忆；他们语无伦次地嘀嘀咕咕。我不想特别指出哪一个人，但我知道我所说的是谁。

我自己的记忆仍然完整无缺，这是可喜的事。我感到高兴，我有机会回顾一下而且老老实实讲出来，公开表达我的观点，指出我们的缺陷，并且提出我们怎样能够以一种更协调的方式来组织我们的社会。我为我能够有机会发表一些意见而感到高兴；这些意见也许会使年轻人能够比我这一代人过得更幸福些。

现在我又来口述我的回忆录了。我应当说明，有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不能继续搞回忆录的工作①。我患了冠心病。我在医院里住了近半年。在那段时间里，我有机会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他们当中许多人问我，是否我真的在写回忆录。当我回答说“不是”时，他们就会用惊讶和失望的神情看着我并且说：“那太可惜了，因为你要是把你的回忆录留给后代，那是很有意义的。这些回忆录会很有意思。”我同意他们的看法②。

患病躺在医院里太久了，我感到疲倦，疲倦得几乎不能继续搞回忆录了。然而我决定把我的回忆录留给将来

① 1970年10月，赫鲁晓夫受心脏病折磨，一个月后进莫斯科的一家医院治疗；直至1971年春初，他一直躺在病床上。在作口述回忆录音时，他常常详细地记下了日期，简单地讲到气候和他当时的感觉，介绍他想要谈到的问题。例如，在恢复口述的那天，他一开头说：“我要继续搞回忆录了。自从我上次进行口述以来，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病了，在医院里几乎住了半年……。今天是1971年3月15日，我总算觉得好些了。我觉得我可以继续口述了，虽然我不知道我的精力能不能坚持，我将尽力而为。”

② 1970年11月，《生活》月刊开始连载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苏联的通讯社即塔斯社发布了一个赫鲁晓夫否认已登载的回忆录的声明：“我从来没有把回忆录性质的材料交给时代或其他出版公司……。我声明，这个〔已出版的回忆录〕是虚构的。唯利是图的资产阶级报纸曾多次因制造这类谎言而被揭穿。”

的历史学家，这样他们就可以了解我的观点，我的判断，以及我作出这些判断的理由。

在这些日子里，有些人写了许多粗制滥造的作品，这是我决定把我的回忆录留下来的原因之一。例如，不久前我到那家我经常去检查身体的门诊所去，我偶然碰到伊凡·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巴格拉米扬。我见到他真高兴。自从我们最后一次交谈以来，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许多年了①。

巴格拉米扬告诉我，莫斯卡连科元帅写了一本丑恶不堪、十足可鄙的书。我甚至没有问他，莫斯卡连科的回忆录糟到何种程度。我知道而且相信他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②。

---

① I·K·巴格拉米扬是一个多次获得勋章的陆军将领和赫鲁晓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亲密同事（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75—180、184—186页）。巴格拉米扬元帅本人的回忆录出版于1971年，书名是：《战争就是这样开始的》。尽管官方的政策是在出版物中对赫鲁晓夫不予褒扬，巴格拉米扬仍把赫鲁晓夫尊为战时的杰出领袖。

②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K·S·莫斯卡连科在斯大林格勒、沃罗涅日和乌克兰前线服役，经常同赫鲁晓夫接触。1953年在推翻斯大林的警察首脑L·P·贝利亚时（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36—338页），他曾充当了工具。莫斯卡连科元帅所著关于战争的书——《向西南进军：一个司令员的回忆》1969年于莫斯科出版。

此外还有华西列夫斯基，他也在写回忆录①。朱可夫也在写。巴格拉米扬同志讲到了朱可夫的书里所发现的背离真相的地方。但我相信朱可夫回忆录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尽管用了他的名字，我并不认为这部回忆录包含许多他的思想。谁是真正的作者，只有上帝才晓得。不过，历史将告诉我们是谁真正撰写了朱可夫回忆录的那一天总会到来，虽然那时我将不在人间，无法知晓是谁写的，因为我太老了。②

坦率地说，我几乎没有读过目前出版的这些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的任何一本。我对这些东西感到实在厌恶。我上了年纪，要设法活下去。而我的神经系统简直忍受不了所有那些为了自私目的而作的歪曲和彻头彻尾的谎言。也许这只不过是我的主观的看法。当然，主观主义丝毫也不奇怪：两个人对同样的事物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所不能忍受的是这种情况，即所有这些前总参谋部的军官都试图重新撰写和编纂历史，以便使他们出场时显得光彩一些。有时他们甚至试图把自己的错误推到无辜者——包括我本人的头上。

---

① A·M·华西列夫斯基在损失惨重的哈尔科夫进攻战役中任苏联总参谋长。这次战役可说是战时赫鲁晓夫最危险的时刻。（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82—189页）

② G·K·朱可夫是1969年在俄国和西方同时出版的回忆录的作者；在下一章里将讲到他的浮沉。

但总的说来使我愤怒的是，这些在撰写回忆录的人本来应当把罪责归咎于斯大林，可是他们更担心的倒是替自己辩解。他们都想当唯唯诺诺的人，按照某人所希望的方式而不是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来叙述事件。

我坚信真相终将大白。某一天我们将会有另一个列夫·托尔斯泰为我们自己的时代写出一部《战争与和平》。那是在小说领域。也将会有这样的历史学家，他们敢于写出我积极领导我们国家的那个时期的真相。我现在特别在考虑战争时期，但也同样在考虑和平时期的事。

我想尽我的一份责任向历史提供见闻与印象。我再也不能影响事件的进程了，但是我愿意记下我所亲自耳闻目睹的事情。我在很长的时期里是活跃的；我接触过我们国家历史的重要人物，也接触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资产阶级领导人。

如果有人怀疑我的记述的真实性，那我愿意象信仰宗教的人所惯常做的那样，手按着圣经发誓。

当然，一定数量的不正确或不精确之处是不可避免的。有时，我可能忘掉一个名字，或者把一个名字搞错。这就好象一个在暗室里工作的摄影师，试图使用自己手边所有的一切化学药剂和设备使映象在胶卷上显现出来。我发现随着岁月的消逝，这渐渐变得困难起来。我感觉到自己的记忆在偷偷地溜走。然而不幸的是，这一

切都是自然的规律。尽管偶尔我有遗漏之处，我相信我的记忆还是相当不错的。

阅读我的回忆录的人应当记住，我完全是靠记忆来口述的。在我从事政治活动期间，我没有记日记，因为既无时间也无必要。当我在国外进行正式访问旅行时，我由新闻记者陪同。他们记下了所有发生的事情，而我的译员则把我同别国领导人的谈话速记下来。

然而，在口述我的回忆录过程中，我不可能参考外交档案或新闻档案。我也不可能检查一下我已经口述了的材料。我不得不只能依靠自己的记忆。在某些场合，安得烈·安得烈耶维奇·葛罗米柯可能是使我重新回忆起我同外国领导人在何时何地会谈的细节的一个较可靠的来源；他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况且记住人们所讲的话和在什么情况下讲这些话是他的本分。①

可是对于象我这样年纪的人来说，我的记忆力并不算太差。我试图对我担任党和政府首脑的那个时期作出客观的叙述。由于我不是凭借笔记或书面摘要材料来口述的，因此，我的工作方法是首先把自己的记忆变成某个事件，然后一直等到这个事件的照相底片在我脑子里显出影像来。即使某些事实要比另一些事实印象更模糊一些，我用这种方法就能保证我的叙述基本上是真实的。

① A·A·葛罗米柯，1957年开始任外交部长，1973年以来是政治局委员。

如果发生一些错误，那也不是在重大的问题上。

当谈到各种技术问题，特别是关于战后我们国防的发展时，我要说明两点。第一，不管我们的报纸有没有回避某些问题，我在回忆录中讨论这些问题时绝没有泄露任何军事秘密。所谈到的武器并不是昨天制造的——而是多年前制造的。我个人参与了我们导弹系统的发展工作，我要坦率地谈论这个问题而不是旁敲侧击。第二，当讨论到高度技术性问题时，我的看法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错误。我并不声言自己是完美无缺的，也不认为自己的思想完全合乎时宜。毕竟我是作为一个六年多没有参加工作的人来提出我的看法的。这几年来正是多事之秋。我与世隔绝了；我的思想有些过时，尤其是在工艺和技术领域。但由于我并不认为机器会代替人，因此我相信我在技术问题上的想法具有坚固和正确的基础。

至于用文献来证实我对某些事件的意见，我应当把这项工作留给那些将对我的讲话进行研究的人们去做。我是为历史学家们口述这些回忆录的。我希望我的这部记录将会落入客观的学者们之手，他们将从其他来源发掘材料并从中找出佐证来。

我相信他们会发现我的回忆录是有价值的，因为我是和斯大林同时代的人，也是他的亲密同事。我知道不少关于他的事。我是斯大林的背叛政策和强盗政策的见证人。我亲耳听见贝利亚说，斯大林在战争开始时告诉

他，“一切都完了，我不管了。列宁留给我们一个无产阶级国家，而现在我们没有料到会被人弄到这样危险的境地，使得一切都完蛋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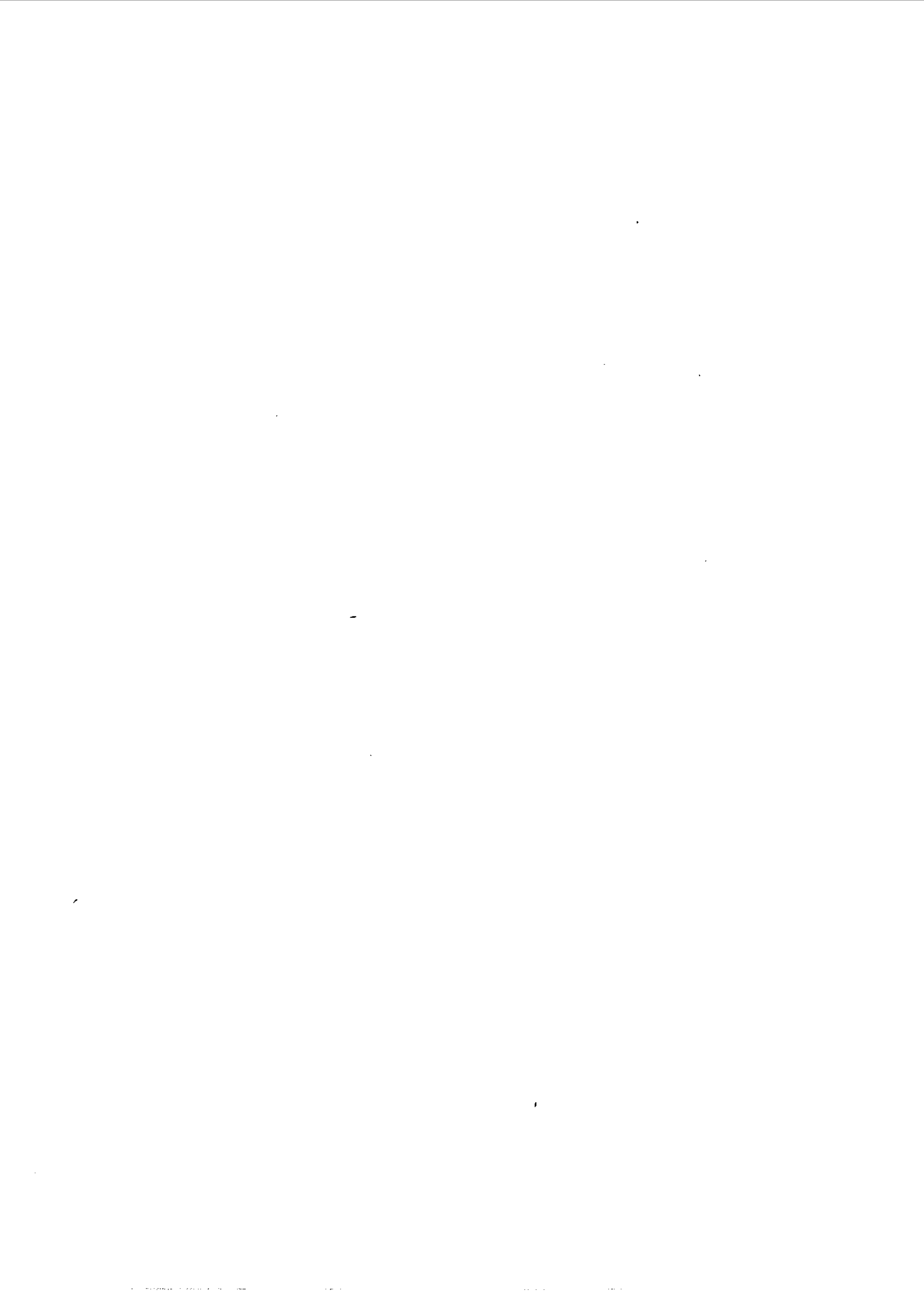
我们的民主制度只能向我们的人民提供有关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极有限的消息。更糟的是，许多人此刻正在掩盖我们党的真正历史；他们用文过饰非的手法使读者对斯大林的作用产生误解，并在纪念斯大林时扮演拍马的角色。我知道我的回忆录对这类学者毫无用处。我的论据是同目前我们的历史学家所标榜的路线背道而驰的。我并不在乎。我是为那些将能从我所说的东西中得出正确结论的理论家、政治家和经济专家而口述我的回忆录的。得出正确的结论并不难，因为这些结论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要做到这点需要有勇气。

也许我为之留下我的回忆录的人们甚至还没有出生，也许他们已经出生。也许他们是将要接替我自己的一代人——也许他们正是此刻处于盛年的一代。我希望如此。我确信，如果这部关于我漫长一生和相当丰富的政治经验记录落入客观的、有勇气的学者们之手，他们将会发现我所应讲的话许多都是真实的。



第 一 部

同胞们和盟友



第一章　朱可夫元帅和反党集团

关于我们在战后特别在斯大林死后在军事政策上所采取的措施，我愿意把我的回忆口述下来。最重要的是，我们有责任要保证我们的国防固若金汤。这不是容易的事，而斯大林把事情搞得使我们更加难办了。在他的晚年，他用自己的名义去做每一件事。他拒绝同我们讨论军事问题，也不使我们得到领导军队的锻炼。他独自掌管国防问题，并对此严加防范。如果有人对某种新式武器稍微表示一点兴趣或好奇，就会立刻引起斯大林的警惕和怀疑。

我国人民已被战争弄得筋疲力尽了，渴望获得食物，迫切需要衣服，可是斯大林知道，我们面临着再打另一场战争的可能性——这场战争将用现代武器来打，是一场智力和科学的战争。他知道，下一次战争的结果将取决于哪一方能够更快和更好地造出最新式的武器来。他也知道，我们在这方面是落后于西方的。

一句话，斯大林怕得要命。他命令全国处于军事戒备状态。莫斯科周围都架设了 100 毫米高射炮。这是我

们从捷克斯洛伐克的斯科达兵工厂买来，并经过我们自己工厂改装的。我们还购买了 85 毫米火炮，由我们的工程师改制成 100 毫米火炮，装在巨型坦克上，既可用作野战炮，又可用作防空武器。这些火炮都架设在莫斯科周围，装上了炮弹，日夜有炮兵守卫着，准备一声令下就开火。

我们始终处于经常的戒备状态，直到斯大林去世。他死后也仍是这样。其实我们经不起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军事问题上。我们还有一大堆别的问题。我们必须增加我们的经济实力。首先，我们得设法为我国人民提供更多的面包、更多的牛油和其它农产品。更重要的是我们懂得，如果我们的工业不能恢复和不能现代化，我们就仍然是一个经济上和军事上落后的国家。最后，我们得巩固国内的政治局势，虽然一般说来政治局势并不坏，大部分苏联人民是拥护党和政府的。

因此，我们肩负着很大责任。那时的国防部长是布尔加宁。坦率地讲，布尔加宁领导我国国防的能力不能使人产生很大的信心。他不是军人出身，而且对军事问题并不特别敏锐——对其它问题也是如此。我丝毫不能解释斯大林对布尔加宁所抱的态度。斯大林不顾布尔加宁缺乏训练和缺乏实战经验，对他提升再提升，一直升到元帅的军阶。他一生从来没有指挥过任何军队。他确实对军事政策一窍不通，看来也不象能够学会的样子。斯

大林死后，布尔加宁成为部长会议主席。①

他提议，既然我对军事有相当多的经验，我作为党中央委员会的第一书记，也可以担任武装部队最高统帅的职务。领导层的其他同志并无异议，同意任命我为最高统帅。这是一项严格限于内部的决议。我们决定不公布这个决议，也不在报上提及。如果我们遇到战争，我们当然要向苏联人民宣布对我的军事任命。至于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将领，他们当然不必去看报上的宣布，也可以知道谁是他们的最高统帅。

最初，我下面的国防部长是朱可夫。我已经讲过，我在战时同朱可夫的关系搞得很好。朱可夫曾任基辅军区的司令，我是那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我同朱可夫过从甚密，象我同铁木辛哥那样。我对他是很尊重的。我知道朱可夫在战时犯过几次错误，其中有些错误给我们造成很大损失，但是在一场旷日持久和战斗到底的战争中，这类错误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我总是把朱可夫在各条战

---

① 自三十年代初以来，布尔加宁一直是赫鲁晓夫的亲密同事。那时他是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主席，即市长，同时赫鲁晓夫则是党的市委书记。（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6—70页）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尔加宁是斯大林的战时内阁成员，后来又继斯大林任武装部队部部长。他于1948年参加政治局，在斯大林死后立即成为国防部长。1955年，他升任总理（即部长会议主席），取代了赫鲁晓夫的政敌马林科夫。

线有良好表现的报告送给斯大林，我是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派驻在这些战线的。①

我尊重朱可夫是因为他有才能，有理智。我们化了许多时间谈论工作，还一道猎野鸭。朱可夫不象你看到的许许多多穿着军服的笨蛋那样，他懂得减少我们军费的必要性。我们限制了司令员的人数，削减了某些军官的薪金。我退休之后，听到一些不满的声音，责备我推行了这一政策。其实，削减是朱可夫创议的，而我无条件地支持他。因为我知道，在军事方面，我们有许多陋习和做过头的事情。我们在领导层达成协议，把我国的常备军队减少一半，这也是根据朱可夫的创议。

我特别喜欢朱可夫的一个建议，即我们应当对我们军队的领导人规定年龄的限度。当然，老年是一个范围很广的名词，很难下一个定义。那时我们没有强制退休的年龄，现在也仍然没有。可是，朱可夫提出，我们军区新的司令的年龄，不要超过五十岁或五十五岁。他考虑到战时对一个司令的要求。即使一个人在体力上仍是适合的，他的精神却可能衰老了。而在战时，我们需要最得

① 朱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公认的苏联最伟大的指挥员。他的最大“错误”——至少是后来使他招致最大麻烦的错误——是声望日隆，从而触怒了有猜忌心和偏执狂的斯大林，在战后把他贬谪到一系列次要的指挥岗位上。

力的干部〔人员〕，在身心两方面都能胜任。我强烈支持朱可夫的建议，并尽我所能来促其实现。

而且，朱可夫不象某些人那样，他对于同美国建立某种相互监督武器的问题，表现了现实主义的态度。简而言之，朱可夫格外具有军人的理解力和灵活性。①

多亏他，军队才对反对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和其他人的反党集团采取积极的立场。这批人发动了一个运动，要撤掉我的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职务。领导层内部的这个反党集团，在主席团里面拥有多数；他们以为已经达到了把我撤职的目的。但中央委员会却不是那样决定的。它纠正了主席团的决定，反而把反党集团撤了职。②

从那以后，朱可夫作为主席团的候补委员参加了党的领导，并多少活跃一时。但是，他正是在这个时候僭取

---

① 赫鲁晓夫前些时候在第一卷回忆录中，把赞成削减部队人数和军官工资以及同西方谈判互相监督武器等这类有争论的军事政策，都归功于朱可夫（《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515 页）。

② 反党集团是松散的，尤其是老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联盟——主要是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1957 年他们试图把赫鲁晓夫从党的第一书记位置上撵走而未成。这个集团使主席团转向反对赫鲁晓夫。但由于朱可夫所组织的空运的帮助，赫鲁晓夫得以集中足够的中央委员的支持，推翻了主席团的决议，并击败了反对他的人。

了很大权力，开始使领导成员感到担心。主席团的其他委员一个个来找我，表示他们的关注。他们问我，我是否象他们那样能够看出，朱可夫正在努力夺权——我们正面临一次军事政变。我得到情报，朱可夫在同军区司令的谈话中，确实流露出波拿巴式的意图来。我们不能让朱可夫在我们国家里演出南美洲式的军事接管。

"是的"，我告诉其他同志说，"我知道朱可夫在搞什么。我同意你们的意见，我知道我们应当做什么。他的不正当活动使我们别无选择，只有解除他的职务。"这是我们唯一有责任做的事。但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极为痛苦的决定。在我的理智和感情之间有过斗争。在感情上，我对朱可夫有着全面的好感；但在理智上，我知道我们必须同他分道扬镳。

我们把这个问题提到领导成员的一次会议上。我不想在这里详细叙述。根据会议的纪要和速记稿可以得知讨论的情况。在这里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我们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的决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①

① 1957年，朱可夫成为主席团的正式委员（从上一年以来，他是候补委员，即没有表决权的委员），以作为对他支持赫鲁晓夫反对反党集团的报答。四个月后，他被派往贝尔格莱德进行正式访问，回国时发现他已被免去国防部长，他在党内领导层的职位也被剥夺，并蒙受"在武装部队工作中违背列宁主义原则"的污名。

我们提升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马利诺夫斯基来取代朱可夫。[①]是我提名并支持他担任这一职务的。这也是一项痛苦的决定。我深信，马利诺夫斯基在组织和管理武装部队的能力方面，是比得上朱可夫的。我甚至可以说，他在这方面胜过朱可夫。但是他的权威和声望都比朱可夫低，而朱可夫是更为精力充沛，更有自信心。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到，马利诺夫斯基比朱可夫更镇静和更善于思考——我认为这些都使马利诺夫斯基生色。

我对朱可夫元帅在导致他下台的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遗憾，但我对莫斯卡连科元帅的行为是厌恶透顶的。

我从实际生活中知道，莫斯卡连科既会成为最好的人，也会成为最坏的人。在战时，因为莫斯卡连科专心致志于保卫我们的国家，并且是一个挺好的军人，我曾向斯大林大力推举过他。他坚定不移，精力充沛，很有魄力。这些都是他的优点。

缺点方面，他脾气暴燥。他不仅是粗暴的问题——他的心理状态是不正常的。他以辱骂部下著称。他最爱

---

① 马利诺夫斯基是军队里赫鲁晓夫的宠信之一（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00—205页）。1956年他被从远东召回莫斯科，担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一年后，他取代了从斯大林格勒战役以来就是他的老上司的朱可夫元帅，担任国防部长。

讲的话是："你这个叛徒，恶棍，人民的敌人！应当把你送交军事法庭！应当把你枪毙！"他的无法控制的脾气，使他变得喜怒无常，并且很容易被别人所利用。只要他感到某一件事招惹了他，他就会把任何人臭骂一顿。

当我们在领导成员的核心圈子内讨论如何处理朱可夫正在组织的叛乱时，我对莫斯卡连科的缺乏原则性特别感到震惊。莫斯卡连科突然声色俱厉地攻击朱可夫，对他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指责。

〔叙述到这里中断了，但从下文来看，好象朱可夫听了莫斯卡连科对他的指责后，揭露莫斯卡连科本人在同他私下谈话时曾批评过文职领导人——也许莫斯卡连科曾闪现过参加那次叛乱的念头。①〕

我相信朱可夫告诉我们的关于莫斯卡连科的事是真的。为什么朱可夫要撒谎呢？再者，朱可夫对莫斯卡连科进行了严厉的谴责，然而莫斯卡连科毫不申辩，没有讲一句为自己辩护的话。

当我把这些事情告诉马利诺夫斯基时，他极力主张我们就在当时当地解除莫斯卡连科的职务。

"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我说，"我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

〔这里又中断了。看来好象赫鲁晓夫制止了马利诺

① 关于回忆录所根据的录音带中出现空白，在序言中作了解释。

夫斯基，并极力主张对莫斯卡连科的行为秘而不宣。①〕

我是在战时认识马利诺夫斯基的，当时他是指挥官之一，后来是方面军司令，我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曾驻在他那个地区。在战争末期，他率领我们的军队在中国东北和日本人作战，后来就留下来担任总部设在哈巴罗夫斯克的远东军区的司令。我在从北京回莫斯科途中见过他，当时我们视察了哈巴罗夫斯克地区的国防设施，检阅了演习。我那时深信——我现在仍然深信——任命他为朱可夫的继任人是符合国家的最大利益的。我并不后悔。

就他的军事素质和人品来说，我喜欢马利诺夫斯基，而不喜欢朱可夫提议来接替他的职位的科涅夫②。当就此问题正在作出决定时，朱可夫当了科涅夫的面直截了当地问我，谁将接替他担任国防部长。我不想得罪科涅夫，因为他在某些方面和马利诺夫斯基一样是有功绩的。我也不想同朱可夫争论这个问题。但是当朱可夫问我"你提名谁来接替我"时，我只好告诉他，我们已经决定马

① 赫鲁晓夫不久前刚把很有声望和很有势力的朱可夫免职；所以，他很可能想避免又出现一次同军队有关的丑闻。莫斯卡连科继续担任他的莫斯科军区司令的职务直到1960年，以后他负责莫斯科的卫戍部队，并被提升为苏联导弹部队司令。

② I·S·科涅夫那时是华沙条约部队的总司令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

利诺夫斯基。

“太不恰当了”，朱可夫急忙说，“我认为你应当改提科涅夫。”他象下命令那样咆哮起来。朱可夫只有在他高兴的时候才是遵守纪律的。

我回答说：“这个决定已经作出了。”

坦白地讲，科涅夫使我们很不放心。我们唯恐他对政府和党的领导的态度同朱可夫相似，我刚才叙述的对话内容坚定了我的想法，即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后来，我们不得不让科涅夫退休，因为他是一个病人，他早在战时就生病了。为了同样的原因，我们必须解除索科洛夫斯基总参谋长的职务。索科洛夫斯基象朱可夫那样，是个具有卓越智力和健全思维的军人。他是杰出的理论家和行政领导人。我器重他甚于任何其他军官。他和我在很多问题上都有共同语言，也能相互谅解。但他生病了，不得不退休。①

在索科洛夫斯基从总参谋长职位退休后，我们只好任命扎哈罗夫来接替他。②毫无疑问，扎哈罗夫具有他的

---

① 科涅夫和V·D·索科洛夫斯基元帅都是从朱可夫任内留用下来的人。在1960年军队指挥机构改组时，据说他们两人因为拒绝支持赫鲁晓夫关于进一步裁减武装部队的决定而被降职。科涅夫的华沙条约总司令一职，由现在是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的A·A·格列奇科接替。

② M·V·扎哈罗夫于1960年从东德占领军总司令升为总参谋长，接替索科洛夫斯基。

新职所要求的经验、人品和忠诚。但是在我看来，他属于朱可夫经常称为“与时代步伐不一致”的那一类人。在部长会议开会时，扎哈罗夫常常打瞌睡。马利诺夫斯基和我作出决定，我们不能任命一位在举行重要会议时要睡觉的总参谋长。我们必须寻找一个具有扎哈罗夫那样的经验和资历但头脑较清新的人。这样，我们提升了比留佐夫来接替扎哈罗夫。当比留佐夫在一次事故中丧命时，我们只好又让扎哈罗夫回任。①

我除担任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外，又是部长会议主席。我常常批评斯大林一人身兼两职，一个是政府的职务，一个是党的职务。所以，我接受了〔总理职务〕就意味着在我这方面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削弱——象是臭虫正在吮吸我的血液和损坏我的抵抗力。我将让历史来对这个问题作出最后判断。②

---

① S·S·比留佐夫于1963年接替扎哈罗夫，但在赫鲁晓夫于1964年被撵走后不久，就死于一次飞机失事。

② 布尔加宁后来被加进“反党阴谋者”的名单。在1958年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承认有罪，并退出了现职。他得到了一笔足够开支的养老金，在自己的别墅里过退休生活。于是，赫鲁晓夫除了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外，又僭取了总理即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

第二章　海　军

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的下台

我看过以前的军事领导人写的几本回忆录，他们拜倒在斯大林的脚下，把他吹捧为战略家和理论家。可是，关于斯大林在建立我们武装部队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我却有我自己的看法。在我看来，他的最大错误之一是他决定集中我们的力量发展海军，特别是发展我们的水面舰队，而不去发展我们的空军。

斯大林决定把资金用于我们的海军，可能是根据他的下列感觉，即：既然英国和美国——下次战争中我们最可能的对手——都是海上强国，我们也应该成为海上强国。不用说，我们的高级海军将领曾鼓励他朝这个方向走。

当然，英国是个岛国，没有海军就不能存在。美国没有海军也不能存在，它依靠海军在太平洋上打败了日本，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运送兵员和弹药去欧洲。英国人和美国人根据租借法案的部分条款，曾借给我们一些极为需要的运输舰，但是后来他们收回去了，并且当着我们的

面，即当着在击败希特勒敌人时遭受过惨重损失的他们盟国的面，把这些舰只凿沉了。我们对此极为生气，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这些运输舰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想怎么办就怎么办。①

斯大林没有认识到航空母舰和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尤其是他不承认在任何未来战争中水面海军已不再是决定性的了。英国统治海洋从而统治世界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是统治天空的国家就能赢得战争。当然，美国的海军优势是无可否认的。但是，如果斯大林能够承认这个事实，他就应当看到我们必须集中力量发展我们的防御性武器，发展我们把敌人的水面舰只击沉的手段，而不要去建立我们进攻性的水面舰队。

我从来没有真正弄懂，为什么斯大林决定采取他那种做法。正如我已经说过的，他是固执己见的人。如果他同我们谈过一些问题，那只是为了向我们中间的某一个人打听他所需要的情况。经过这样的探听——或所谓“商量”——之后，他就宣布我们将促进巡洋舰、驱逐舰和其他辅助舰只的生产。这些舰只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也已经过时，更不必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了。

斯大林下令干部训练立即开始。学生和毕业生被送

① 1945年5月杜鲁门总统中止了租借法案，当时莫斯科认为这是施加压力的策略，也是歧视苏联的行动。

往专设的海军学院，去接受为给巡洋舰和驱逐舰配备兵员所必需的一切训练。

为什么斯大林在航空母舰方面没有做任何事呢？没有航空母舰的海军完全不成其为海军。我想斯大林一定认为我们花不起建造航空母舰的巨额费用。但是，他下令建造巡洋舰和驱逐舰的突击计划，本身就是费用极为浩大的。它还牵涉到挪用发展其他更为必要和更为可靠的作战武器所需要的巨额款项，更不去提挪用压倒一切的非军事需要的资金了。

斯大林被一种愚蠢的想法所缠住，即海军就是我们问题的答案。他所欣赏的电影之一是关于乌沙科夫海军上将的故事，或者也许是叙述沙皇彼得一世事迹的。①不管怎样，影片中的一位角色说，“陆军是一只手里的一把剑，海军是另一只手里的一把剑。”这就是在这个陆军和海军同样都可以被核武器一扫而光的时代里斯大林的哲学。

我作为直接参加反希特勒战争的一员，同陆军部队及其司令们有相当多的接触，但是我认识的海军军官很少。斯大林死后担任领导工作的我的许多同志，也有着类似的情况。斯大林从来不给我们机会去熟悉军人，除非我们有特殊任务要同他们联系。我们只能从报纸上看

---

① 乌沙科夫海军上将是十八世纪后期十九世纪初期的海军英雄。沙皇彼得一世常被称为俄国海军的缔造者。

到某个海军方面的人物，在检阅时看到这个人，或在招待会上见到他——虽然在斯大林的晚年实际上没有举行过什么招待会，因为外宾极少来访。

我们同海军缺乏接触在斯大林死后证明是不利的，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对负责舰队的人并不十分了解。其中之一就是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早在三十年代，他是许多被提升补缺的军官之一，这些空缺是斯大林对部队司令们的虐杀所造成的。战后我对他稍稍有些认识。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军官，而且，就我们所能讲的而言，他在海军指挥员中是很受尊敬的——虽然如我所说的，我们对海军人员并不十分了解。简单地说。库兹涅佐夫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他向斯大林作简要军事报告时所表现的勇气和现实主义，使我对他怀有敬意。从斯大林的脾胃来说，他显然是太心直口快和太倔强了。我们知道斯大林的为人——他会不公正地和随心所欲地惩罚任何人——所以当他把库兹涅佐夫降职时，我们都不感到意外。后来我坚持我们应当重新审议斯大林对库兹涅佐夫所作的决定。我们把他的军阶恢复到海军上将，并使他回到现役，担任布尔加宁手下负责海军的副部长。①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N·G·库兹涅佐夫曾任海军人民委员（即部长）兼苏联海军总司令。战后，他任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兼海军总司令，到1947年，斯大林把他降为太平洋舰队司令。1951年，斯大林恢复了他的海军部长原职，并不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把他复职的。

有一次我从中国返国途中在哈巴罗夫斯克停留，视察在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统帅下我们的远东部队。我记得那是在1954年。就在这一次旅行中，库兹涅佐夫海军上将建议，我们可以在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观看一些海战演习，那里是我们〔太平洋〕舰队的基地。①

我们乘一艘巡洋舰出海去观看海战演习。之后我们第一次看到了我们的沿海防御行动。这毋宁说是令人沮丧的。“敌人”开始进攻了。当鱼雷快艇从很近的距离向目标发射鱼雷时，顿时烟雾滚滚，轰鸣声震耳欲聋，但是没有一发击中目标——连一发也没有中！如果是一场真的战争，鱼雷快艇将遭受很大损失，因为在编队航行中巡洋舰是由驱逐舰加以护卫的，这些驱逐舰将把鱼雷快艇击沉得一艘也不剩。

我们沿海岸下驶到一个地点，那里有一艘报废的舰只。我们的海军向它开炮，好几次都击中了。库兹涅佐夫和他的指挥官们对这些演习看得得意忘形了，但是我却并不十分感动。

我们的军人想表演一下射击技术，于是库兹涅佐夫在旅顺口②安排了一些海军的大炮演习。当我们的海岸

① 赫鲁晓夫于1954年首次访问北京后回国途中，曾在苏联远东地区停留。

② 中国辽东半岛上的海军基地旅顺口，根据1950年由斯大林和毛泽东签订的中苏友好条约的条款，由苏联占用到1955年。

炮台向特制的模拟目标开火时，我用望远镜观察。信号军官把每次射击和对目标造成的损害指给我看。对于我们的海军掌握这类武器的能力，我是毫不怀疑的，但是整个景象有点过时的味道。为什么？因为我已经看过空对地导弹能够对舰只干点什么。我想到甚至在斯大林去世以前，我们已看过一部电影，展示一架飞机在黑海上空用导弹向一艘军舰进攻。导弹令人难以置信地准确：第一发导弹就把那艘军舰击沉了。我相信这部影片还能在我们的军事档案室里找到。

当我在旅顺口外观察海岸炮台向目标打靶射击时，我不禁想到在这个空对地导弹的时代，这种过时的沿海防御武器所处的不利地位。

我们继续视察金角湾和旅顺口的港口设备。日俄战争期间，就在旅顺口这个地方，日本驱逐舰乘俄国海军的不备，一举击沉了整个舰队。①这个海湾具有完善的天然屏障；对停泊在那里的船只来说是一个天然的避风港，并且它的入口处极易防守从海上进逼的敌军潜艇和战列舰。但是，我要马利诺夫斯基、布尔加宁和库兹涅佐夫同志注意——特别是库兹涅佐夫，因为他是负责海军的——虽然在以往还没有飞机的日子里，这个海湾可能是理想的海港，现在我们的太平洋舰队驻防在这个地方

① 发生在1904年2月。金角湾在符拉迪沃斯托克。

却是完全不适合的，即使在和平时期也是这样。如果战争突然爆发，我们的舰只在对付空袭方面是毫无防御能力的，并且会束手就擒。看看美国舰队在珍珠港的遭遇就明白了。

因此，我下令把我们的舰只撤离这个海港，停泊在我们远东海岸外一些岛屿的隐蔽处。这样，一旦发生突然袭击，它们就可以迅即避入大海。①

我记得我们向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航行，它位于阿穆尔河（黑龙江）口。尽管没有铁路可通，斯大林却决心要在那里建设一座造船厂，已经有一大批建筑材料运到现场。把造船厂设在那么孤零零的和难于防御的地方，我们对这种做法是否明智颇抱怀疑。我们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说，这将化费大量钱财，而且在远离国内居民地区建设一座造船厂，对我们的安全也毫无帮助。

我们从尼古拉耶夫斯克出发，乘了一艘驱逐舰去南萨哈林岛。海浪把船打得东摇西晃。人们告诉我一个水兵被冲下了海。我是不易晕船的，所以大风大浪的航程对我没有影响。当我们到达萨哈林斯克城时，我发现我非常喜欢四周的乡村，它使我想起了乌克兰及其肥沃的土地、野生的植物、炎热的夏天的太阳。生活条件并不比格鲁吉亚和我们亚洲的一些共和国差。要使这个岛适于

① 这里提到的岛屿就是南萨哈林岛和千岛群岛。尼古拉耶夫斯克是大陆的港口，在萨哈林岛对面。

居住，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组织工作。

但是要建设好萨哈林斯克还有漫长的路程要走。到船坞去的公路糟糕得简直不能在上面行驶汽车。当地的捕鱼工业设备非常差。没有渔业加工船，因此捕获的鱼必须运到岸上，在城里一所十分原始的工厂里加工。结果，很多捕获的鱼上岸时已经腐烂，不得不扔回海里，或者喂给猪吃。听说这一带的猪只吃鱼，因此猪肉有鱼腥气味。简言之，萨哈林斯克城极端贫困，组织工作也做得很差。这种情况怪不着谁。这一地区向来属于日本。①现在时隔九年之后，轮到我们来医治战争创伤了。可是，就在那个时候，我们仍然是既无力量又无物质手段来改善萨哈林斯克的条件。

我们在南萨哈林视察了部队，和司令特罗凡诺夫将军盘桓了一会儿。自从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日子相处以来，我就认识和尊敬这位将军。当我们包围保卢斯时，他曾指挥第五十一集团军，并带头突破了德国的防线。②我很高兴在萨哈林又见到特罗凡诺夫。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他的部队所进行的一些演习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

① 这些岛屿是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刻钟进入太平洋战场后从日本并吞的。

② 在反击弗里德里希·冯·保卢斯部下德军的斯大林格勒战役中，N·I·特罗凡诺夫是第五十一集团军的司令。

我们从萨哈林斯克来到一个农业实验站，我们的人正在那里试办农场，以便向迁居到这个岛上来的居民提供食物。在那个时候，即使象土豆和蔬菜之类的基本食品也要从大陆运到岛上来。

根据米高扬自己的建议，我们把他留下来研究改善岛上居民食物供应的问题，同时我们坐飞机回到符拉迪沃斯托克。①他说他将随后赶上我们。

我们在这一地区旅行所得的印象是，我们远东防务总的水平是相当低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周围的沿海防务尤其使我们感到不快。这个港口简直是无法防守的。因此，即使我们知道迁移远东基地得花很多的钱，我们还是命令库兹涅佐夫去找一个更好、更安全的地点。库兹涅佐夫已经开始给我们产生了不好的印象，我们对他的信任也在逐渐降低。过去我们重视他，表扬他；但现在我们感到他在军事能力方面，对情况的了解还不及我们这些文职人员清楚。我们向他提出了一些批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也是这样。

如果斯大林还活着并出去视察一下远东地区的海军设施，他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库兹涅佐夫是个间谍

① A·I·米高扬是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中政治生命最长的一位同事，当时任贸易部长和主席团委员。现在他已经退休，在写他自己的回忆录，一部分已在苏联文艺月刊《新世界》上发表。

或卖国贼。自然，我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确实开始把库兹涅佐夫看作是对安全缺乏锐利的眼光、对我们的海军状况缺乏正确估价能力的人。他似乎还在用过去的眼光看现在。

大约一年左右以后，我们甚至更有理由对库兹涅佐夫保持警惕了。我记得事情发生在夏天。他交给我们一份备忘录，提出一系列建设我们海军的建议。我们把备忘录交中央委员会委员传阅，并决定〔在主席团中〕开会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邀请了各方面的军事领导人来参加，包括库兹涅佐夫和布尔加宁在内，布尔加宁那时是我们的国防部长。

备忘录中的建议主要是建造巡洋舰和驱逐舰——换句话说，还是水面海军。计划所需的费用确实令人震惊。库兹涅佐夫在阐述这些建议时显然是煞费苦心的。

我们对这个问题作了简短的讨论。然后我提议，"我们今天不要对这个问题作出决定吧，最好推迟到下次会议再作决定。"（我们每星期都举行〔主席团〕会议）我提议把这个问题推迟，是为了使主席团的其他成员有机会对这些建议进行较仔细的研究。我的提议被采纳了，会议就此结束。

会后，我匆匆离开我的克里姆林宫办公室到别的地方去。库兹涅佐夫在走廊里等我。他开始和我一起走。我看得出他非常激动。突然，他十分粗暴地、带有敌意地

转过身来对着我。

“对我的海军采取这样的态度，难道我还能长久忍耐下去吗？”他叫喊着。

“什么态度？你在说些什么？我认为我们对待海军的态度是很好的。”

“那么，为什么今天你对我的建议不作出决定？”库兹涅佐夫自以为他是他这一行的专家，要他来告诉我们怎样做，要我们不加考虑地批准他的建议。可是，那就不是由政府作出决定——而是由海军发号施令了。

我说：“我们需要多一点时间来仔细地审查你的建议。”

他又说了一些刺耳的话，我答复他说：“库兹涅佐夫同志，注意，我们没有拒绝你的备忘录——我们仅仅推迟一个星期作出决定。为什么你就不能耐心点呢？下次会议上我们将要详细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作出决定。”

我们走出克里姆林宫时，谈话就结束了。各人走进了自己的汽车，我们向不同的方向驶去。

我对库兹涅佐夫的那种恼怒、甚至可以说是唯我独尊的态度感到心烦意乱。他没有权利要求党的领导闭着眼睛在他的建议上签字，他当然也没有权利在和党的首脑谈话时采用威胁的语调。我不喜欢武装部队的高级代表认为他们可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中央委员会主席

团。

过了一个星期我们又见面了。这时我已认定库兹涅佐夫的建议是不合理的。我决定根据实质性的理由来反对他的备忘录——而不是因为他得罪了我们。在会上，我向他提出了以下这个问题：

"库兹涅佐夫同志，请你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有了你建议我们建造的全部舰只，这对我们同敌人对抗的地位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我们能够顶得住英美海军对我们发动的海上全力进攻吗？"

他答复说："不能，比起英国人和美国人，我们还差得很远。"

"如果我们有了你所要求的全部舰只呢？"

"还是这样。"他说。（至少他还是老实的。）

"那么，投入这样的巨款有什么意思呢？即使我们批准了你的建议，我们还需要花十年时间才能把你所要求的全部舰只造起来，到那时，美国可能更加远远地跑在我们前面了，因为美国人有更大的物质能力。我看不出你要求我们花的钱会对我国的安全有所助益。"

会上每个人都发表了意见，得出的结论是相同的。我接着说：

"让我们把建设海军的问题无限期地推迟，而集中力量来发展我们的空军和导弹吧。任何未来的战争都将在空中决胜，而不是在海上；我们潜在的敌手具有从空中来

进攻我们的武器。因此我们首先应当考虑改进我们的反空降和反击的手段。”

国防部长布尔加宁同意我的意见。没有人反对，我的建议通过了。

可是，我可以看出库兹涅佐夫是怒火中烧。从那天以后，他开始公开表现出不但反对我们作出的这个决定，而且反对我们的领导。可耻的是，他开始大谈反对斯大林以后的领导，并且蓄意为斯大林错误的海军政策洗刷，而这些政策我们现在已经摒弃了。库兹涅佐夫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同样的固执和狂妄，这种态度曾使他和斯大林之间发生了龃龉。库兹涅佐夫显然觉得既然斯大林已不在人世，那就用不着害怕，也没有什么他需要尊敬的人了。

我们都感到很气愤。我们在领导成员中讨论了他的行为，决定只有解除他的职务，别无其他选择；并且把他从海军的最高军阶又一次降到较低的一级，也就是他早先失宠于斯大林后所保持的军阶。①

马利诺夫斯基后来告诉我，其他军事人员对库兹涅佐夫的降级都感到不快——不是因为我们解除了他的职务，而是因为我们剥夺了他的军阶，他这个军阶是在反对

① 1956年，库兹涅佐夫被解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和海军总司令职务，并从海军元帅降为海军中将，在国防部中央机关工作。

德国和日本的战争中擢升的。剥夺一个士兵或海军军官的军阶，一直是种创伤性的惩罚——不但伤害了他本人，也伤害了其他军人。但是这已经是既成事实。说老实话，我个人并不反对库兹涅佐夫；相反，我对他是很重视的。可是，现在我回顾这一事件，我确信我们把他解除职务和降低军阶是做得对的。我们必须断然制止军队中任何波拿巴主义的表现。

在我说“我们”的时候，我是指我自己和主席团的其他成员——当然，我作为主席有着这样的地位，即只要我得到别人的支持，我的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是决定性的。

我听说库兹涅佐夫写了几本关于对德国和日本作战的很好的回忆录。① 有人把他写的书送了我一本，我把它搁在什么地方了。我是不看这类作品的。军人在他们回忆录里所表达的许多观点，我是显然不能同意的。但这也很自然，因为在斯大林死后，我和许多军队人士的看法不同；现在，我已被贬到领取养老金者的地位，再去读他们要说的话就更觉得心烦了。

---

① 库兹涅佐夫已出版了两本书：《参加西班牙内战回忆录》(1966年)，他在这本书里记录了他担任驻西班牙的苏联海军武官和1936年至1937年期间任共和国舰队首席海军顾问的工作；另一本《前夜》(1969年)，就是赫鲁晓夫这里提到的那本书。

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的提升

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任命谁去接替库兹涅佐夫担任海军总司令？我们征求马利诺夫斯基的意见，他推荐了戈尔什科夫。我同戈尔什科夫只是略有所识，我遇见他是在大战结束时，那时他负责江防。马利诺夫斯基的推荐很合我意。

在任命戈尔什科夫同志的时候，他只有海军中将衔；后来我们把他提升为海军元帅。①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正好有几个主席团委员在克里木休假。我们有意识地在一起度假，使我们可以开会讨论我们应当建造哪一种军舰和海军武器。我们的海军大部分是配备过时火炮的水面舰只，我们对此越来越感到担忧。最近发生的一个事件，生动地说明了我们的海军防务组织得很差。我们有一艘巡洋舰是大战期间从意大利人那里俘获的战利品，当它在海港抛锚停泊时，突然爆

---

①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S·G·戈尔什科夫指挥过黑海的鱼雷艇和巡洋舰以及江河里的小舰队。在他于1956年接替库兹涅佐夫升任国防部副部长和苏联海军总司令之前，他是第一副总司令。他还写过一系列有关苏联海军史和海军政策的文章，发表在官方刊物《海军文集》上。他的著作预定于1974年末用英文出版。

炸沉没。最初我们怀疑是外国特务的破坏。后来经过调查，专家们汇报说，军舰的锚显然触到了战时遗留下来的一只漂流的水雷。这次事件使我们深信，采取认真的步骤来使我们海军现代化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正在克里木度假的主席团委员在塞瓦斯托波尔会合。我们的军方人员安排我们去熟悉一下海军干部，并且视察黑海舰队。

我在一艘巡洋舰上参加了几次参谋业务演习。一位指挥员做了一个关于"我们"的舰队如何在地图作业上和"敌人"遭遇并把它击溃的报告。他开始喋喋不休地讲述"我们"的舰队怎样把左右两边"敌人"的舰只击沉。他说："我们已经迫近达达尼尔海峡。现在我们正在进入地中海，准备在非洲西北海岸突击登陆。"

他如此这般地说个不停。他是非常骄傲自大的。听他的话使我感到可悲。最后，我无法忍受了。我打断他说："住口！等一等！你说得那么肯定，似乎你多么迅速地消灭了敌人，现在你又对我说，除了把敌人很快消灭之外已无事可做了。你真正对形势作过正确的估计吗？如果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而不是在地图上作业，你的舰只早已全都沉到海底去了。"

他非常惊奇地望着我。

我接着说，"你没有把导弹考虑在内，敌人肯定会从他们的海岸防御工事或从发射导弹的飞机用导弹向你进

攻的。我们自己有这个武器系统，所以对方肯定也有。过低估计你的敌人的能力，这是极端危险的。”

这位指挥员显然被弄糊涂了。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发射导弹的飞机。你告诉了我一个完全新奇的东西。”

“那么，这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我对他说。“所有这种消息都是保密的。”我转向主席团的其他委员，并建议说：“同志们，让我们暂时停止会议，把海军军官带上岸去，这样他们就可以熟悉一下我们的导弹系统。让我们的指挥员知己知彼是很重要的。否则一旦发生战争，他们会作出鲁莽的错误估计，造成极大的麻烦。”

在少数海军高级将领了解了我们的一些导弹设施后，我们继续开会。在当时和当地以及后来我们回到莫斯科时，我们决定不再对军队指挥员们样样事情都保密。

会议期间在我们请来向我们作报告的专家中，有一位很年轻的潜艇战专家。他作了一个引人入胜和有说服力的报告，谈到了潜艇比起水面舰只所具有的优越性。他告诉我们，巡洋舰和战列舰不过是重炮兵部队中化钱很多的浮动炮台而已。我们最好的海军大炮最大射程是四十公里，而美国北极星导弹的射程却在二千公里以上。我相信后来美国人又发展了可以从潜艇上发射的更远程的导弹。所以，在潜艇发射核导弹的时代里，除了为准备突击登陆时猛烈轰击岸上防御工事外，海军火炮的炮弹

已成为废物。不仅如此，水面舰只那层厚厚的钢板，对穿甲炮弹也无可奈何，不要说核武器了。装甲越厚，舰身越重，沉没也越快。尤其以航空母舰为基地的飞机最容易发现和击沉水面舰只，因为这些舰只通常都编成庞大的队伍航行。另一方面，潜艇却可以单独作战或小编队作战，而且不容易被发觉。

重巡洋舰和战列舰作为海军骨干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当水兵们在巡洋舰甲板上利落地排队立正，欢迎一位海军上将或是去友好国家的港口访问时，依然构成一幅美丽的图景。但是这种仪式现在不过是一种优雅的享受罢了。

要领悟到这一点是艰难的，尤其对我们的一些高级海军将领说来是这样。他们仍然非常赞同保持一支强大的水面舰队。他们还把潜艇看作是辅助舰只，而不看作是现代海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不知道巡洋舰是笨重的浮动炮台，而潜艇却是灵活机动的水下导弹发射台，比陆上固定的发射井更易于瞒过敌人。

我们作出决定，要把我们的海军改成以潜艇为主。我们集中全力发展核动力潜艇，实际上很快就开始成批生产了。

这样，我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海军的战略和结构。我负起了全部责任。我不想讳言，我全力支持海军中较年轻的干部，帮助他们抵制老一辈军官的反抗。这批人不

但不承认潜艇造价低廉操作方便，而且还是一种威力更大和更有效的武器。

我现在回忆，我们考虑戈尔什科夫担任海军总司令时，曾注意到他过去担任过潜艇艇长这一很有利的条件。他重视德国潜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击沉那么多英美船只的作用，也重视一旦我们和英美开战时潜艇可以为我们发挥的作用。

当然，航空母舰在现代海军中是第二种最有效的武器。美国人有一支强大的航空母舰舰队——没有人能否认这一点。我承认我有一种经常盘旋在脑子中的奢望，很想使我们的海军也有那么几艘，但我们造不起。这简直不是我们的财力所能及的。此外，有了强大的潜艇部队，如果发生战争，我们是能够击沉美国航空母舰的。换句话说，潜艇既是一支有效的防御力量，又是发射导弹进行反击的可靠手段。

有些人可能要问，"关于登陆作战和护航用的兵员运输舰又怎样呢？"我的答复是这样：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根据列宁的和平共处原则，我们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我们不想占领别的国家。因此，象美国这种国家用于侵略和帝国主义目的的舰只，我们就不需要。我们能够用洲际导弹去制止世界上的敌对力量，就心满意足了。所以，我们决定不建造运送军队的舰只。除此之外，这还因为长距离运输兵员的任务后来已由空军代替了。

所以，我们把水面舰队降格为只执行辅助性的任务，主要用于沿海防御。我们建造了鱼雷快艇、海防快艇和配备深水炸弹的潜艇。

第二个问题是我们如何处理已有的驱逐舰和巡洋舰。其中有些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造的。它们都已衰老，行动迟钝，跟一串破鞋差不多。有几千名水兵的这样一艘军舰，要继续浮在海上就得花费大量金钱。只有在象列宁格勒、塞瓦斯托波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那样的海港城市举行庆祝典礼时，我们才用得到它们。

我们正在建造的至少还有两三艘巡洋舰，如果我们把它们装备起来并使其服役，就要继续化一大笔钱。对这些军舰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不是从我们的情报机关就是从报纸上得知，英国和美国宁愿把他们过时的军舰〔用防蠹丸〕保管起来，而不愿把它们报废。但即使这样，花费也很大。因为必须对这些军舰采取特殊的处理方法，然后把它们检修得随时可以开动，以便一旦需要时可以再用。

在领导层中，我们对于应该采取什么行动进行了冗长而艰苦的讨论。作为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愿由我担当全部责任。我不想用行政手段去压制军事专家的意见。仍然担任总参谋长的索科洛夫斯基元帅告诉我，他的同事们一致赞成把这些军舰报废，包括那些尚未造好的军舰在内。

哦，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为了建造这些船我们已经化了几百万，现在却要把它们报废。我请教了我想到的每一个人，是否有什么办法挽救这些军舰。我和马利诺夫斯基谈过，我和海运部长和渔业部长谈过——希望找到或许能够利用这些舰只的人。① 我建议可以把它们改成客轮，但人们告诉我化费太大。我问起可否改成渔轮时，得到了同样的回答。我甚至建议把它们改成水上旅馆，听说也是不上算。最后，我只得作罢，承认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把这些我们现在所称为的"匣子"毁掉。

国防部起草了一份正式建议，后来由政府加以批准。为了提取一种贵重的合金用来建造别种船只，我们把巡洋舰熔化了。

我们海军里有些人对于全部取消巡洋舰是不肯死心的，所以我们作了一些让步。一定数量的水面舰只拆除了常规炮塔，装上了导弹发射器。但这些舰只证明效率是不高的。后来我们开始把驱逐舰、海防快艇和其他水面舰只廉价出售了。我们卖了一艘给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作为一个岛国，需要一支精良的水面海军。

作为另一种让步，我建议也许应当留下几艘高级的现代化巡洋舰，作为访问外国港口之用。马利诺夫斯基

① V·G·巴卡耶夫是海运部长；A·A·伊什科夫是国家计划委员会渔业生产局长兼渔业部长。

同志、戈尔什科夫同志和我飞往北方，去视察这些新巡洋舰中的第一艘在白海试航。我记得那天气候宜人，我们站在甲板上心情也很好——我甚至可以说是兴高采烈。军舰航行得很迅速，又灵活，配备着最新的武器。我们的海军专家一致决定，因为装甲妨碍航行的速度和灵活性——并且因为它防止不了现代化炮弹的轰击——我们的新巡洋舰就不需要什么钢板了。

我问戈尔什科夫同志，"你对我们海军得到的这艘新巡洋舰以为如何？"

他说："妙极了！"

"如果我们的敌人也有这样一艘，而我们的海军同它遭遇，那会发生什么情况？你能够用你已经拥有的武器去对付这样一艘巡洋舰吗？"

他回答说："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立刻把它击沉，不是用我们的空对地导弹，就是用我们的潜艇。如果它在海上经过我们的防御工事，我们就用我们的海岸设施或鱼雷快艇把它击沉。"

我说："好，如果我们非常需要这种巡洋舰，我们要多少就造多少。但这需要时间。我们不能象荞麦那样，只要从口袋里掏出来就是了。"

据我的回忆，我们决定建造四艘巡洋舰——一艘给波罗的海，一艘给黑海，一艘给远东，第四艘给什么地方我忘记了。如果它们单单作为样品那是很好的，但这是

代价昂贵的样品。第一艘建成后——第二艘也即将建成——我们又有了另一种想法，即是否要把另外两艘都造起来。我们在领导成员中交换了意见，决定继续建造，作为对军方的让步，因为他们赞成建造这些舰只。我们的海军司令们认为这些军舰式样美观，总爱把它们向外国人夸耀。一个军官总是喜欢听到所有年轻水兵大声欢呼向他致敬的。这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一艘潜水艇就不能造成这样深刻的印象了。艇上人不多，舰艇本身看来象一支浮动着的金属雪茄。但潜艇仍然是现在最重要的海军武器。我拨正了海军建设的方向，使我们的海军把潜艇推广成为我们海上强国的基础。我为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

现在我是领取退休金的人了，我仍密切注意报上有关军事演习的报道。当我读到我们装备原子武器的核潜艇作了周游世界的海底航行消息时，真使我感到高兴。

我知道，现在有很少几个吵吵嚷嚷的人，他们迷惑周围的人，把水搅混，企图从政府那里勒索金钱，建造航空母舰。他们说："看看美国有那么多航空母舰！看看英国有那么多！还有法国！我们是个大国，难道不是吗？所以我们也应当有航空母舰。"

好，我的回答是：这是胡闹。这种竞赛是毫无意义的，而且是浪费的。同美国去竞赛会花掉我们几十亿的钱。

有一个时期，美国用它的第六舰队或第七舰队向埃及或越南表示它的侵略野心。在领导成员之间交换意见后，我向马利诺夫斯基建议，把我们的舰队派到那些地区去，抵制帝国主义者对不发达世界的威胁，这样美国人就知道他们的舰队会遭到苏联的抵抗。总参谋部考虑了我的建议，但结果马利诺夫斯基出来反对，认为这样做是无效的，而且花费太大。我现在相信，马利诺夫斯基和总参谋部根据那种理由来反对我是绝对正确的。

我深信，我们军事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是，我们不要在我们对手超过我们的每个地区去和他们竞争。只要我们保持我们的核威慑力量，我们就能有效地防卫我们的国家，很好地为我们的人民服务。

第三章　轰炸机与导弹

图波列夫与空军力量

战后我们面临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就是我们敌人的空军力量在质和量方面所占的优势。我们被美国空军基地所包围。我们国家简直成了那些从挪威、德国、意大利、南朝鲜和日本机场起飞的美国轰炸机的巨大靶场。战后许多年来，在我们敌人的武器库中，轰炸机是主要的威胁。我们需要时间和大量的工作才能发展我们自己的轰炸机部队。我们还必须加强我们的空中防御力量、高射炮部队和截击机。我可以自豪地说，我知道有许多飞机设计师会使我们的技术得到飞快进展。

我们最著名的两位设计师是阿尔捷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和古列维奇。①他们在一起工作，因此他们所

---

① 阿尔捷姆·I·米高扬是赫鲁晓夫多年的同事阿纳斯塔斯·伊万诺维奇·米高扬的兄弟。他与M·I·古列维奇开始合作，在1939年设计了一系列米格—1型战斗机。米高扬取得了少将军衔，并成为苏联科学院的通讯院士。

设计的飞机被称为米格机。他们所发展的米格—15型当时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好的喷气式战斗机，胜过美国所拥有的任何战斗机。

然而我们的优势为时很短暂。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着手制造了比米格—15型更好的喷气式战斗机，不久美国人便控制了朝鲜的天空①。

伊柳辛因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计了战斗轰炸机而出名②。这是世界上最好的飞机，当然胜过德国的同类型飞机。伊柳辛使我们得以在空中制敌人于死命。可是他的飞机因装甲过重，战后很快就被淘汰了。

伊柳辛随后发展了伊尔—28双引擎轻型喷气式轰炸机，也许是这一类型中速度最快的飞机，每小时差不多可达八百公里。但这是一种战术轰炸机，而不是战略性的，因此还不能作为对付美国威胁具有决定意义的手段。

伊柳辛同志继续设计了一整套优良的客机。最近设计的是伊尔—62喷气式飞机。当它试飞时我还在职。诚然，在客运中推广这种飞机被拖延了好多年，我命中注定不能看到它的最后型式。但是，我从报上知道伊柳辛同

---

① 所说的美国喷气式战斗机是F—86佩刀式。

② S·V·伊柳辛起初是飞机库的一个工人，后来成为陆军的机械士。他在三十年代设计了许多用于教练的滑翔机和远程飞机。他设计的第一架重要的军用飞机是1939年试制的伊尔—12俯冲轰炸机。

志终于实现了他的目标。现在的伊尔—62无论在航程、速度和承载能力方面都是世界上最好的客机之一。

我们另一种最大的客机是安东诺夫同志所设计的安—22型。他还建造了一些用于农业飞行方面的优良飞机。①

我们最好的直升飞机设计师是已故的米尔。他发展了一整套有效负载量很大的直升飞机。多亏米尔和他的同事所建造的运输军队用的直升飞机，我们才能提高我们军队的机动性。②当我和米尔同志讨论时，我始终坚持新的设计不但应适用于运送军事人员，也应适于民用。我告诉他，要集中力量制造用于和平目的的直升飞机。在和平时期，一架直升飞机可用来搬运管道和铺设油管，也可当作能飞行的联合收割机，或当作能飞行的电车。我们在克里木和高加索开辟了从辛菲罗波尔到雅尔塔以及其它城市的直升飞机客运航线。

当我访问美国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从华盛顿乘一架美国直升飞机去戴维营，这架飞机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要求总统帮助我为我国政府购买两架这种直升

---

① O·K·安东诺夫因他的安—22型用涡轮推进的运输机而驰名。所谓“农业飞行”是指农作物撒种。

② M·L·米尔和他的同事A·S·雅科夫列夫，专长设计著名的米—6型载重军用直升飞机，这在五十年代后期是世界上最大和最有威力的军用直升飞机。

飞机。我知道要是没有艾森豪维尔的干预，美国人是不会把飞机卖给我们的。艾森豪维尔施加了一些压力，经过很多困难，美国人终于同意了，我们设法买到了两架。我要求我们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来看看，是否能从美国的设计中得到什么启发。①

那时我们的直升飞机有问题，不很可靠，并且发生过好几次事故。我有时乘坐苏联制造的直升飞机飞行，但别人劝我不要乘。

我想，现在我们的直升飞机与美国的相比，在技术上已达到出色的水平了。当印度举办一个全世界直升飞机专门展览会时，美国的直升飞机也参加展出。我们的直升飞机即使算不上第一名，也一定属于最优良的飞机之列，因为印度人买了一些。②

我不想得罪别人，但我直率地认为，我们最伟大的飞机设计师是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多少年来，我和他有着很多次的接触。现在，当我看到报纸上提到他或看见漆上他名字的飞机飞过时，不禁使我想起当我初次认识他时的遥远往事。

我是在1931年见到他的，这一年我担任了莫斯科鲍

---

① 赫鲁晓夫于1959年9月到美国访问时（下文将详述），对总统的西科尔斯基型直升飞机极为倾倒。

② 据赫鲁晓夫在下文所述中印战争的情况（第十二章），印度人还买了苏联的米格—21型喷气式战斗机。

曼区党委书记。那时我并不认得很多同我国飞机工业有关的人士，因为他们的工作是绝密的。但是图波列夫这个名字却早已为苏联公众所熟知了。他是中央气体流体动力学研究所设计室的主任，这个所是研究航空问题的唯一机构。①就在那个时候，图波列夫已经享有不会坠毁的飞机的设计师的美誉——即使有坠毁的话，至少不是由于他的过错。

后来，当我担任莫斯科市委书记时，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试制了以我们伟大作家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命名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飞机。它的载客量在五十人以上，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民用飞机。当然，它可以很容易地改装为轰炸机或军用运输机，虽然那时军用运输机还没有听到过。实际上“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还是处于试制阶段的飞机，报刊上却已对它大肆宣传了。

随后发生了一场可怕的灾难——这是完全意料不到的，但决非图波列夫同志的过错。“马克西姆·高尔基”号起飞作表演飞行。它由一架漆着红色的战斗机护航，以便地上注视的观众可以比较两架飞机的大小。战斗机

①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是试制全金属飞机的第一个苏联飞机设计师。他负责设计了一百多种不同类型的飞机。革命后他协助建立了中央气体流体动力学研究所，并且许多年来都担任设计室的主任。

的驾驶员是一位有名的空中英雄。我忘记了他的姓名。他开始表演各种俯冲、翻筋斗和花式飞行来显示他的技能。在这些大胆的特技飞行中，他计算错误，撞上了"马克西姆·高尔基"号。两架飞机都坠毁了，机中人全部丧命。①

那天的情景我记忆犹新。我是在我的别墅里听到"马克西姆·高尔基"号坠毁消息的，正象现在我在我的别墅里录下我对这次事件的回忆那样。那是一个美丽和晴朗的夏天——星期日——就象今天一样。

就是多年前那个暖和而欢乐的星期日，竟以"马克西姆·高尔基"号机上人员的悲剧而告终。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机上的乘客是得过奖的工人。我所以想得起来，因为我当时是那些死于意外事故的知名人士的治丧委员会的委员。

斯大林为坠机事故而震怒，他把愤怒指向我们这些莫斯科市的领导工作人员。他把担任市委书记的我和市苏维埃主席的布尔加宁拿来出气。斯大林决定惩罚布尔加宁和我，要我们把坠机牺牲者的骨灰瓮从火葬场扛到圆柱大厅。我毫不介意。我认为参加这次葬礼和向这些

---

① 这次坠毁发生在1935年，有四十九个人丧命。这架有八个发动机的巨型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号重四十吨，装有无线电台、印刷机、摄影实验室、电影放映机、扩音器和照明信号。本来打算使它成为空中的宣传站。应对此次坠毁负责的特技飞行驾驶员是N·布拉金。

惨死的勇敢的人致我最后的敬意，是一种特殊的荣誉。我记得送葬行列从火葬场一直延续到圆柱大厅。

在斯大林的专横统治时期，他下令逮捕图波列夫，把他送进监狱。我不知为了什么原因，但是我确知斯大林在监狱里设了一个专门设计室，以便图波列夫能为苏联的更大利益继续工作。但斯大林从不告诉我们图波列夫在干些什么，而我们也被认为不应过问其事。①

斯大林想造一架能飞到美国再返回苏联的战略轰炸机。这是我国设计师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斯大林命令图波列夫造一架能轰炸美国领土的飞机。图波列夫拒绝了，说明由于当时技术的限制，这项任务简直不可能完成。这一事件多少表明了图波列夫的性格。那时他已在狱中服徒刑，因为斯大林逮捕了他，但是他理解他的责任，也理解他的专业。他知道这种飞机是不可能实现的，他这样告诉了斯大林。

此后，斯大林开始信赖米阿西什切夫，而不信赖图波列夫了。②我记得米阿西什切夫是图波列夫的学生之一。

---

① 1936年图波列夫访问了德国和美国，研究这两个国家的飞机工业。1938年他由于被控“泄露航空机密”而遭逮捕和监禁。他在狱中设计了一种双发动机的俯冲轰炸机，于1939年投入生产。1943年他被释出狱。

②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给予V·M·米阿西什切夫设计的米阿—4型飞机的代号是“野牛”。

他也许是一位好人，但是他并非另一个图波列夫，无论在他的品格或能力方面都是如此。他同意承担制造远程轰炸机的工作。直到斯大林逝世，他并没有完成他的设计。他所设计的飞机称为米阿—4型。这种飞机并不能满足我们的要求。它能飞到美国，但不能飞回来。米阿西什切夫说，米阿—4型可以轰炸美国，然后在墨西哥着陆。

我们用开玩笑的话来回答这种想法说："你以为墨西哥是我们的岳母吗？你以为我们随便什么时候想去就可以去拜访她吗？墨西哥人是决不会让我们的飞机飞回来的。"

米阿—4型飞机还有其它问题。我们并不确信它能飞越密集的防空火网。在试飞时它也表现得不很好。一些试飞的驾驶员都为此丧命。结果，我们的飞行员对它并无多大信心。最后我们决定放弃整个设计，因为它使我们花钱太多，而对我们的安全却毫无帮助。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终于出狱，并孜孜不倦地继续他的工作。当我担任党和政府的领导时，在一次会议后他来找我并对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想请你帮个忙。人们仍然认为我曾经是一个罪犯。这对于我的一生是个污点，对我的孩子们的生活也是个污点。你有没有考虑过，你将能正确地评价我的作用，并把我的名字从被捕人员档案中一笔勾销？"

我回答说："很好，图波列夫同志。我们将讨论这个

问题。我认为我们可以下令把有关你的文件销毁，因此你可以不必再在调查表上填明你曾被捕并在狱中服刑。”

他向我致谢，我们就分手了。①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几十年来，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设计了许多军用飞机，后来又设计了民用飞机，其中有几种类型较为成功。不大成功的一种是图—4型活塞推动的重轰炸机，它是直接模仿所谓的“空中堡垒”，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好的美国B—29轰炸机。当然，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是不能抱怨美国最新式轰炸机设计人的。图—4是一种很好的飞机，但是当我们投产时它已经过时，所以简直不能与美国所造的最新型飞机相比。

后来图波列夫制造了图—95型涡轮螺旋桨推进的轰炸机。它的航速每小时不超过八百至八百五十公里，高度也不超过一万四千公尺或一万八千公尺，而这些即使在那时也是不能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一般认为，图—95的航程大约可达一万二千公里，这是它的优越之处。但是它的航行速度和高度如此差劲，以致在远未飞近它的目标之前就会被击落，所以不能把它用来作为战略轰炸机。

我所喜爱的图波列夫的品质之一，是他对技术问题

---

① 1953年斯大林刚死后不久，图波列夫被提升为科学院的正式院士，这是为他“恢复名誉”的信号。

所抱的求实态度。当图—95不作军用后，他来看我说："我了解图—95不能适合空军所要求的规格，但是我认为它仍能为我们的国家服务。我想我们应当把它改装为客机。"

我赞同这种想法，并把这个问题提交领导成员。经过一番讨论，图波列夫同志的建议被接受了，他奉命按他的计划进行。结果，由图—95 改型的著名的图—114 飞机，成了第一架在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不着陆飞行的客机——这是苏维埃国家的辉煌成就。

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克里木度假，图波列夫同志就在附近的奥列安德拉，只有五分钟步行的路程。他常常来看我。我们坐在靠近海滨的地方谈话。他总带着一个文件夹，和我谈谈他最近的想法。

有一次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想告诉你关于建造一架核动力轰炸机的想法。"

我非常兴奋，津津有味地听他说。能有一架无限航程的飞机，是我们的梦想之一。甚至能有一架航程二万公里而无需加油的飞机，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问他："航程、高度和速度怎样呢？"

他说："航程实际上是无限制的。速度和高度大致和图-95 相同。它是超音速的，能高飞到一万六千公尺左右。"

"那么，怎样避开敌人的防空炮火呢？"

他说："这一点你说对了，它无法通过防空炮火。我担心现代科学限制了我们所能做的事。我们为了航程和有效负载不得不牺牲速度和高度。"

"好了，如果在能运送有效负载之前就被击落，那么，根据什么理由来建造这种飞机呢？"

"赫鲁晓夫同志，那要由你来决定。我的任务是提出意见供你参考。我所能做的事是告诉你核动力轰炸机是可行的。"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你要知道——作为这次同你谈话的伙伴，作为所担任的职位能决定或反对这种意见的人——我应当告诉你，我并不认为核动力飞机能适合我们的需要，至少它不能作为轰炸机。造一架客运用的飞机怎么样呢？"

"不，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辐射中毒的危险很大。我们可以使驾驶员的座舱不受污染，但不能使乘客的座舱不受污染。此外，为核动力飞机建造专用机场也太费钱了。"

"我想，如果不能用作客机，我们完全不需要它。但让我们再考虑一下，以后再谈。"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并不热衷于承担这项计划。他不过探探我的口气。说得粗鲁些，可以说他象商人对待善良的顾客那样。他是在说："这是我的产品。如果你需要，并且买得起，我可以为你制造。"

图波列夫同志从未打算逼我接受他的意见，显然这一独特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还没有成熟。他不象大部分设计师或专家那样：如果你不接受他们的建议，他们会生气，并在一段时间内继续生气。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是外交家，又是伟大的科学家和学者。

后来，我把图波列夫同志造一架核动力轰炸机的建议告诉了其他领导成员。他们和我的意见相同，都认为没有理由仅仅为了必要的试验工作而花费大量的钱。但是我们核准图波列夫在这一领域继续进行基本研究。因为你无法预料明天科学将会出现什么突破。①

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的另一个确实已被我们接受的意见，是他要设计一架超音速客机。当我在黑海海边度假的时候，他给我看了蓝图，我们同意他去进行。我们深信图波列夫会完成他的任务，并珍惜他作为一个能正确估量未来各种可能性的科学家的声誉。

他的工作成果是图—144。我从报上看到，它正在进行最后的试验。②我想法国和英国合制的“协和”式也不太坏，但我注意到美国人却还没有超音速运输机。我们

---

① 1959年初苏联人公开预告，他们将于该年稍后的时候开始试验核动力飞机的发动机，但到六十年代初，这项计划显然已被放弃。

② 图—144超音速运输机于1973年在巴黎航空展览时坠毁。

的飞机不久即可供使用。图—144对提高我国在航空领域方面的威望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我说这个领域里的领袖是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同志时，我相信不会有人同我争辩。如果算不上苏联航空之父（这一称号看来应属于茹科夫斯基）①的话，那么他的确是对我国民用和军用航空的诞生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少数人物之一。虽然还有其他有才能的设计师，但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却远远超过其他大多数人之上。

科罗廖夫与火箭技术

有了核弹还不足以保证我们的安全。我们还需要有效的运载系统。

多年来我们依赖象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图波列夫同志那样出色的设计师所发展的轰炸机。但是由于技术上和军事上的原因，甚至最好飞机的寿命也必然是短促的。一架轰炸机不管如何优良，不久另一架更优秀的飞机就接踵而来了。不断更新我们轰炸机队的费用是巨大的。

而且，有人驾驶的飞机在速度方面是有限制的，因此易于受到高射炮火的攻击。更重要的是，我们军事计划

① N·Ye·茹科夫斯基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俄国的科学家。他是近代气体动力学和流体动力学的创始人。

人员对战略轰炸机所提出的航程要求还不是我们的技术能力所能达到的。然而美国却很容易从它在欧洲的基地来轰炸我们，我们却无法把我们的飞机停在美国边界附近。

我已经讲过，我很尊敬的米阿西什切夫同志没有能搞出一架能飞到美国的轰炸机。在航程问题看来无法解决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放弃了他的计划。

我们认识到，如果要制止敌人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需要拥有比轰炸机更可靠的、能把炸弹投到敌人目标上的手段。简单地说，我们需要发展导弹。

斯大林在世时在这一领域的研究就已开始了。我说过，有一次斯大林曾给我们看过一部关于飞机用空对地火箭击沉一艘黑海的船只的影片。

用于防卫我们海岸的第一枚陆对海导弹是由阿尔捷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试制的。实际上这并非一枚真正的导弹，而是一架改装的〔遥控的〕米格—15型喷气式战斗机，还是很原始和不完善的。后来，我们赞同切洛迈提出的发展海岸防御导弹系统和发射导弹的飞机的计划。①

在斯大林领导时期，作出了发展地对空导弹的决定。我不记得负责这一计划的设计师的名字了，但他是一位

---

① V·N·切洛迈是苏联科学院的正式院士，航空动力装置的专家。

很有才能的人。贝利亚派他的儿子谢尔盖继续进行这项计划。①我们花了很多钱先在莫斯科后来又在列宁格勒周围部署导弹。我们错误地以为这些导弹可以阻止敌人偷越我们的防空网。

后来我们才知道，固定的地对空导弹发射场有两大缺点。第一，这种发射场要经过长时间准备才能发射。第二，它很容易被敌人的情报机构发现。尽管我们把发射场伪装起来，但当你在莫斯科机场着陆时，你仍能从客机上看出它在什么地方。我本人就时常看到。斯大林死后，我们用机动防空导弹发射装置来替换这些固定发射装置。

有一天，一位我已忘记他姓名的设计师要我约定一个时间，给我看他所试制的一种新导弹的模型。他解释说，这是象德国V—1型飞弹般的一种战术导弹，但它有几个特征：弹翼可以折叠起来，装进长长的炮筒。发射时弹翼张开，象飞机一样。我想这位同志得出了一个颇为独创和有用处的想法——一种可以由大炮发射的火箭，既能用于地对空，又能用于陆对海的防御。

在谈到这点时，我很容易揣想有些无所不知的人会埋怨说："看这个赫鲁晓夫，在泄露军事秘密了。"即使一

---

① S·L·贝利亚是斯大林的最后一个警察头子L·P·贝利亚的儿子。他曾担任一个保密的研究所所长。在他的父亲被撵走和处决后一段时间内，他继续担任这项职务。

个笨蛋也知道，我所说的这位设计师的发明已不再是秘密了。他的发明是第一代导弹，现在我们已有第三代或第四代导弹了。

这位设计师给我的印象很深刻。我告诉他，他给我看的东西应当受到重视，我们将在领导层讨论这个问题。我问他是否还认识其他领导人。他说，是的，他见到过当时的国防部长布尔加宁。

后来我把我的谈话告诉了布尔加宁，并询问他有关这位设计师的情况。布尔加宁恶狠狠地说："我认得他。"然后他讲了一句表示厌恶的话。"把他赶走"——这是布尔加宁对他所不喜欢的人常讲的话。"他有一次给斯大林看他的计划，斯大林把他从他工作的研究所轰走了。"

"听我说，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斯大林把他轰走这件事说明不了什么。斯大林并不一定了解技术问题。为什么我们不给这位同志一个机会呢？我建议把这个问题提交下次主席团会议。我们要请他来，并且要他给我们作个报告。你对他的态度可能是以斯大林的想法为转移，我却暂时不作判断，等我们听他讲了再说。"

布尔加宁不再反对。其余领导人承认我是有关军备问题方面的权威。最后我们都同意了这个建议。

这位设计师说："你们知道，当斯大林把我从我工作的设计室轰走时，他拿走了我的研究资料，并转交给了阿尔捷姆·伊万诺维奇·米高扬。"

我指示把资料还给他。我们还为他配备了实验室、生产器材、技术人员、工程师，以及试制导弹所需要的任何东西。我们并没有失望。他的计算证明是正确的，他的理论是可行的。他的导弹对于我们的沿海和对空防御，甚至对我们的地对地的防御能力，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虽然我很喜欢和尊重这个人，但他却不能和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相比。科罗廖夫也许是我们最杰出和最出色的导弹设计师了。①尽管在斯大林去世以前我还不认识他，但当他与拉沃奇金②合作设计所谓“暴风”式导弹时，我就和他很熟了。拉沃奇金是我们最有才能的飞机设计师之一。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就已出名，所有我们的军用飞机飞行员都知道和无限信任他的战斗机。“暴风”式导弹的操作原理比较复杂：在发射和飞行之前，必须由一架飞机把它载到一定的高度。但这是我们当时所拥有的一切。它成为我们能打到美国的唯一希望。

---

① 谢尔盖·帕夫洛维奇·科罗廖夫三十年代初以来是制造各种火箭发动机计划的负责人。他监督弹道导弹(包括“谢苗尔卡”，即T-7弹道导弹)、地球物理火箭、“东方”和“日出”等型号载人宇宙飞船的试制。

② S·A·拉沃奇金是一位空军少将和设计师。他建造了一系列装有空气冷却发动机的高速战斗机。这种飞机在同德国空军作战时证明是很有效的。

斯大林死后，科罗廖夫开始建造更为精密和更有前途的火箭。我始终以斯大林的去世作为划分时间的基准点，因为当斯大林在世时，他完全垄断了我们国防方面的所有决定，包括——我甚至要说*特别*——有关核武器和运载系统的决定。当讨论这些问题时，我们有时也参加，但是却不允许我们提出问题。所以，当斯大林去世时，我们对于挑起落在我们肩上的重担实际上并没有准备。我们同科罗廖夫在一起的经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斯大林死后不太久，科罗廖夫在政治局一次会议上汇报了他的工作。我不想言过其实，但我要说当他给我们看时，我们就象一群绵羊第一次看见一扇新门一样。当他给我们看他的一支火箭时，我们觉得它简直象一根巨型的雪茄烟状的管子，我们不相信它会飞。科罗廖夫带我们去参观发射台，并且打算给我们解释火箭如何操作。我们就象市场里的农民一样。我们绕着火箭转来转去，用手去摸摸它，拍拍它，看看它是否够结实——除了舐舐它以便知道是什么滋味外，我们样样都做了。

有些人会说我们都是技术方面的门外汉。不错，我们都是门外汉，但不光是我们这些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对导弹技术的最基本常识就一窍不通。

我们绝对信任科罗廖夫同志。当他告诉我们他的火箭不但会飞，而且可以飞行七千公里时，我们都相信他的话。当他详细说明或为他的见解辩护时，你可以看到他

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辉。他的报告也总是明晰透彻的模范。他有无限的精力和决心，并且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组织者。

最后，科罗廖夫设计的“谢苗尔卡”〔意即“第7号”〕火箭准备试射了。据我回忆，第一枚爆炸了。实际上我想到我们还发生了几件不愉快的事故。导弹或者在发射台上爆炸，或者在起飞时爆炸。幸而没有人死亡，但这些事故浪费了许多钱。可是，在技术的发展还有问题的时候，这类错误和牺牲是不可避免的。

过了一会儿，“谢苗尔卡”成功地发射了。除科罗廖夫同志外，很多功劳应当归于那些设计火箭助推器的工程师们。我记得有一次遇到一位驾驶员，他说他可以坐在棺材里飞行，如果装有良好的发动机的话。这话有些道理。“谢苗尔卡”当然有一个良好的发动机。助推器的主要设计人是科罗廖夫的朋友和合作者，他的姓名我已经忘却了。世界上最好的有助推器的火箭，飞行起来是不会短命的。所以当科罗廖夫设计火箭时，他的同事就设计发动机。他们组成了一个杰出的班子。不幸，他们后来分手了。我为此事非常烦恼，曾尽我所能来恢复他们之间的友谊，但是所有我的努力都落空了。

亏得科罗廖夫和他的同事，我们现在才拥有能携带核弹头的火箭。他的发明还有许多和平的用途。他的“谢苗尔卡”为我们飞往外层空间开辟了道路。最后，我

们开始发射我们的人造卫星，这使我们的潜在敌人畏缩，但使其他许多人兴高采烈。①

我只惋惜科罗廖夫在世的时候我们没有能把人送上月球。过早的去世把他从我们的队伍中夺走了。我听说他到医院去动手术。医生们把这看成纯粹是普通的例行手术。后来人家告诉我，当科罗廖夫突然发生休克，随即逝世的时候，②外科医生做完了手术正在洗手，他们还以为手术进行得很顺利呢。

这个悲剧发生在他的创造性工作正处在全盛的时期。这是我们国家也是整个人类的巨大损失。但他给我们留下了遗产，因为他的卓越设计仍被用来作为最新式的导弹和火箭的基础。

建立导弹部队

已故的科罗廖夫同志的“谢苗尔卡”火箭，是我国科学和军事方面的重大突破，虽然他本人也了解它有一些局限性。发射人造卫星到空间去并没有解决如何保卫我们国家的问题。首先我们必须发展电子制导系统。在公开演说中常听到一些悦耳之辞，说我们可以用我们的导弹在任何距离里击中一只苍蝇。尽管我们的核弹头可以

① 1957年10月，第一个人造卫星被送上轨道。

② 科罗廖夫于1966年他六十岁时去世。

造成广泛的杀伤范围，但精确度更为重要——而这是较难做到的。

我记得我们最初的“谢苗尔卡”计划，虽然导弹本身的射程已有七千公里，我们却要每隔五百公里沿路设置制导系统，才能引导导弹飞向目标。因此，既不能依靠“谢苗尔卡”作为防御武器，也不能依靠它作为进攻武器。不管它的射程怎样，它不过是对抗美国威胁的一种象征而已。只有法国、西德以及其它欧洲国家在我们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

我和科罗廖夫的谈话也使我们担心，就是在我们把“谢苗尔卡”射入天空之前，敌人就可能把它击毁。火箭是由一个看上去象大桌面那样的发射台发射出去的，很容易被侦察机或围绕地球轨道飞行的人造卫星所发现。我看到过的高空摄影精确到这种程度，以致你甚至可以准确地辨认出停在跑道终点的飞机的类型。我也看过美国所拍摄的我们国土的照片，它们的质量比我们的要高。

因此，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我们能做些什么呢？我们怎样才能保证使一部分导弹武器在敌人进攻时仍能保存下来，并且使我们有能力进行反击呢？

当我们开始设法掩蔽我们的导弹发射场不致被敌人侦知时，使我想起我年轻时在顿巴斯当煤矿工人和后来建造莫斯科地下铁道担任负责人时的经验来。我想到导

弹既然是圆柱形，我们就可以把它们放在沉在地下的、掩蔽好的竖井中。我认为这个主意有许多优点。只要指出两点就够了：把火箭隐藏在井里可以使它不受风吹雨打；其次，敌人为了破坏发射场，不但一定要找到它，而且还要直接击中它。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几位工程师，并问他们是否认为可行，因为他们对于火箭的运行性能比我更了解。被派去筹建我们火箭和导弹发射场的专家之一是巴定工程师，现在他是苏联科学院的院士。①

这些专家支支吾吾，最后告诉我他们认为这个意见行不通。甚至那位多年来卓有成效地从事防御工程的巴定，也拒绝附和我的建议。这使我大吃一惊。我忘记了当时他们顾虑的是什么，但由于我始终注意我的政治地位，我知道我无权强迫他们接受我的意见。我料想这些人是懂得他们自己专业的，所以我把这个问题搁下来了。

一年或一年多过去了。担任工程师职务的我的儿子正在进行一些同导弹有关的工作，②他使我经常了解试制计划的进展情况。他也密切注视美国的刊物。有一天他告诉我他看到一本美国杂志报道说，美国已开始用地下发射井来代替发射台了，这使我感到惊奇和高兴。

---

① I·P·巴定院士是一位冶金学家，1957—1958年他担任苏联方面的国际地球物理年委员会主席。

② S·N·赫鲁晓夫是一位电子专家。

他说："爸爸，你看，美国人已经采用了你一年前左右所想到但被人们拒绝的那个计划了。"

我的想法和美国人所想的一致，使我非常高兴，但也使我对我们自己的工程师感到烦恼和失望。如果在我第一次向他们提出我的想法时他们能采纳我的意见，我们就不会浪费整个这段时间了。我很谨慎小心，并没有威胁他们。我建议这个计划，不过作为自由交换意见的一部分。现在我感到有理由下命令了。

我召集有关负责人，并对他们说："你们看，发生了什么事！美国人已经开始挖掘我早就建议的弹道导弹发射井了。让我们立刻进行这个计划吧。"

我要求我们的采矿工程师设计一架专用钻机来挖掘导弹发射井。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改进我们平时为挖掘升降井所用的设备。煤矿的竖井只是在直径和深度方面与导弹发射井有所不同而已。我按时收到扎夏迪科工程师关于在穆什克托夫地区的工程进度报告。他是个有才能的人。不幸他有一个缺点：他是个酒鬼。在他生命垂危时，他丧失了所有意志，终因酒醉而死。①

---

① A·F·扎夏迪科是顿巴斯的一个矿工。后来他被提升为煤炭工业部部长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官员。1963年他在莫斯科去世。

穆什克托夫地区在苏联中亚细亚吉尔吉斯共和国内。

我没有想到直到我退休后，我们才完全把我们的导弹系统从发射台改变为隐蔽的地下发射井。但我却为我在首先提出这种主意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后来看到改建工作已经开始而感到自豪。

但是，避免被敌人的侦察发现并不是我们导弹计划所面临的唯一问题。还有发射火箭所需要的准备时间问题。我记得有一次我问过科罗廖夫这一问题："告诉我，谢尔盖·帕夫洛维奇，是否有办法把你的火箭置于经常准备状态，以便在危机时刻一声令下就可以发射？"

他说："不能。"

那时科罗廖夫的设计室主要是发展探索空间的火箭技术。我们还有由扬格尔同志主持的另一个设计室。发展军用导弹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他的健康不佳，但他仍然是我们最出色的设计师之一。①

扬格尔解决了火箭可以立即发射的问题。他搞出了一种发动机，解决了我们的问题，这使我们大为高兴。

我记得在我度假期时，有一天我和扬格尔同志在黑海海滨相遇。我们讨论了他的新发现的意义。我们一致认为这将使我们和美国处于同等的地位。我把关于从埋在地下的金属圆柱体中发射导弹的想法告诉了他。我在

---

① M·K·扬格尔院士继科罗廖夫之后成为苏联火箭计划的负责人。1971年10月，他在赫鲁晓夫死后不久去世。

年轻时读过物理学，知道齐奥科夫斯基的见解。①

我了解在火箭外壁与地下发射井内壁之间应再留一些空隙，以便发射时的排气得以逸出。我向扬格尔同志建议，当火箭向空中发射时，地下发射井内所产生的压力，甚至可能增加火箭的推力。这时我们正坐在桌旁喝咖啡。我把我所讲的表演给他看。

"拿两只不同直径的玻璃杯，把一只放在另一只里面。你懂吗？在火箭能从地下发射井发出之前，里面玻璃杯边缘四周留下的空隙，将会阻碍挤压火箭时所产生的排气。"

他注意地倾听我讲。他是一个很好的设计师，并且了解我的想法。他答应仔细考虑这个意见。

扬格尔除了试制用于快速发射火箭的发动机之外，还担任射程为二千至四千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以及可以把核弹头运载至地球上任何地方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制工作。

在一次火箭试验发生灾难性事故时，总设计师扬格尔仅以身免。后来送给我的关于这次事故的报告说，燃

---

① K·E·齐奥科夫斯基是一位富于幻想的科学家，并且也是苏联火箭技术的首创人之一。1929年，他建议一种他自称为火箭列车的多级宇宙飞船。首次提出火箭的操纵面应同排气流成相反方向而不是同空气流成相反方向理论的，也要归功于他。

料不知什么缘故着了火，发动机过早起动了。火箭先竖直升起，然后坠落，酸性物质和火焰四处喷射。在事故发生前，扬格尔恰巧走进一间专门隔离的吸烟室去抽烟，因此他奇迹般地幸免于难。

好几十名士兵、专家和技术人员却没有那么幸运。当导弹发生故障时，我们的导弹部队总司令涅杰林元帅正坐在附近注视试验，因此丧命。克雷洛夫接替了他。①

在把我们的军队改建成以导弹为主的现代化防御体系过程中，涅杰林和后来的克雷洛夫都是有贡献的。我们为火箭的生产建立了全自动化的装配线。我们开始在飞机制造厂中象制造香肠那样生产火箭。过了一些时候，制造导弹比制造喷气式轰炸机和截击机更居于优先地位。后来越南和中东的经验表明，也许我们过高估计了地对空导弹的作用和过低估计了低空战斗轰炸机的作用。但我确信，将来“萨姆”导弹一定能够击落现在雷达所不能及的高空下飞行的飞机。总的说来，我认为我们把军事生产从飞机转向导弹是正确的决定。

我们的工业已经着手解决运输火箭的工具的任务，这可以使我们的战术导弹部队具有必要的机动性。我们

---

① M·I·涅杰林曾是炮兵司令；1960年10月他去世之前，是国防部副部长和苏联火箭部队司令。据官方的说法，他死于“飞机坠毁”。他的职位先是由莫斯卡连科和比留佐夫继任，后来才由N·I·克雷洛夫继任。

的设计人员研究了这种运输工具究竟应该采用履带还是采用车轮的问题，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二者结合的方法。①

如果我们要在我们的部队中推广战术火箭，就必须克服一些老一辈炮兵军官的阻力。我特别想到瓦连佐夫元帅，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沃罗涅日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时认识他的。②就是这位瓦连佐夫元帅想出了这样一句话："大炮的射击是交响乐，火箭的发射是刺耳声。"我们必须清除这种过时的思想。

瓦连佐夫元帅和他的几位同事争辩说，一尊常规的野战炮可以伪装起来使敌人无法发现，可是一枚导弹在发射时却尘土飞扬。这是很可笑的说法。举例来说，敌人可以根据声响找出野战炮的所在。此外，如果导弹瞄准的目标是在几百公里甚至几千公里之外，谁会注意它扬起尘土有多少呢？

在军事政策方面新旧思想不能共存。我们必须加快步伐，以新思想取代旧思想。

在我们的炮兵指挥员中，伊古林元帅最了解我们的

---

① 即半履带式。

② S·S·瓦连佐夫是炮兵主帅，1961至1963年担任火箭部队司令。他同奥列格·潘科夫斯基间谍案件有牵连，因而被降级和被逐出中央委员会。这一案件还牵涉到送情报给西方国家的某一高级军事情报官员。

武装部队有必要采用导弹。当他参观火箭试验时，你不会发现他有不高兴的面孔。

当格列奇科元帅坚持主张发展一种步兵可用来防御敌军进攻的装有小型核弹头的战术导弹时，也发生过一些事情。①我同意格列奇科的意见，如果我们能在排、团甚至师一级用战术核武器来武装我们的部队，这将是好事。但是我不得不向他说明，核弹头装的炸药愈少，所需的原料〔裂变物质〕也愈多——我们实在没有足够的原料来供应。所以，我们不得不首先集中力量发展洲际导弹，亦即发展战略导弹而不是发展战术导弹。

多年来，我发现军人都喜欢模仿。例如，我想还在斯大林去世之前，我们的炮兵专家就知道美国搞出了一种能发射原子炮弹的大炮。这种情报并不难获得，因为美国人在报纸上宣布了他们正在做的事。我们的军人能够从政府获得经费来发展我们自己的核大炮。我们在红场阅兵时常把这种大炮拉出来。它有粗大的炮筒，常常使人产生深刻的印象。但是我们对此并不十分热心。这个

---

① 现任国防部长和政治局委员的A·A·格列奇科，在1957—1960年时是苏联地面部队的总司令。后来他负责华沙条约部队，并担任国防部副部长。1968年，他以这个身分策划和执行了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赫鲁晓夫是在战时认识他的（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15页）。

家伙非常重，难于搬运，也很难伪装，射程又很短。它在靶场上表现得很差，并且需要巨款和大量原料才能制成一个小小的弹头。简单地说，这种大炮毫无价值。

最后，我们的炮兵人员自己也叹了一口气并且承认，没有必要继续生产原子大炮，特别是现在我们正在为师一级的部队配备战术核武器的时候。

斯大林曾经惧怕帝国主义敌人随时会袭击我们，现在我们距离这个时代已经很远了。我们不再为斯大林的恐惧所感染，我们也不再按他的眼光来观察世界了。现在是敌人自己害怕得发抖。由于我们有了导弹，我们可以把核弹运载到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目标。美国工业的心脏地带再也避免不了我们的反击了。

当然，是我们首先把火箭射入空间的，我们打算从这一事实中取得最大限度的政治上的好处。我们想对美国军国主义者施加压力——并且也想影响那些较有理智的政治家的思想——以使美国对待我们会更好一些。

我们现在虽然有了核弹和运载核弹的工具，我们却无意发动战争。我们坚决站在列宁的和平共处立场上。我们只是想制止美国人的威胁，制止他们的侵略以及他们恐吓我们的企图。

探索宇宙空间

作为一个以前的政治领导人，和我熟悉的人有时总是问起我，是否有可能和美国在探索空间方面进行某种形式的合作。当我担任领导时，我们从未直接谈过这个问题。但是在记者招待会上，记者们常常提出这个问题。我相信，甚至美国官方出版物刊载的报告，也会提到美国政府对于登月的合作计划感到兴趣。但是我不认为已经提出了任何具体建议——无论是他们提出的还是我们提出的。

有一个时期美国落后于我们。我们正在用我们的人造卫星来探索空间。全世界人民都承认我们的成就。大多数人赞美我们；美国人却心怀妒忌。

我相信那时美国可能愿意同我们合作，但我们却不愿同他们合作。为什么？因为虽然我们可能在空间探索方面比美国领先，我们在核武器方面却仍落后于美国。美国的弹头、空军基地和轰炸机比我们多。那时飞机是把核武器运载到目标的主要工具，而苏联所有的经济和行政中心都处于驻在我国周围的美国轰炸机的航程之内。我们的导弹在性能方面仍有缺点，在数量上也微不足道。就我们导弹本身而言，并不足以对美国构成多大威胁。根本的问题是，当时我们只有一种优良的导弹，就

是已故的科罗廖夫所设计的“谢苗尔卡”。如果我们决定和美国在空间探索方面合作，我们将不得不向他们透露“谢苗尔卡”助推器的设计图样。

我已经说过，有两个主要因素有助于我们的空间探索获得成功：一个是科罗廖夫的火箭，另一个是他和他的朋友和同事所设计的助推器。美国人对我们的“谢苗尔卡”助推器非常惊奇。他们对于空间合作所以感到兴趣，显然不过以此作为借口来发现我们的秘密。我们知道，如果让他们看到我们的火箭，他们很容易就能如法炮制。那时由于他们强大的工业和超等技术，他们将能造出我们助推器的复制品，而且不久会比我们生产的还多。这对我们的安全将是一种威胁。除了他们能仿制我们的火箭外，他们还会知道我们火箭的局限性。从军事观点看来，它确实有严重的局限性。简言之，如果给美国人看了我们的“谢苗尔卡”，我们就会既泄露我们的实力，又暴露了我们的弱点。

我们觉得需要时间来进行试验，使之完善，投入生产并且装上自己的助推器。一旦我们站稳脚跟，并且为我们国防作好准备，然后我们才能开始同美国进行空间合作。这种合作才能对双方有利。毕竟每个人都还有足够的外层空间啊。

一个国家不可能永久保持它在空间探索方面的领先地位。我回忆起当我们遥遥领先时，资产阶级记者常

常告诉我，美国正在尽最大努力迎头赶上。我冷静地回答说，包括美国在内的每一个经济上先进的国家，都有可能象我们那样制造火箭并飞入空间。

记者们常常向我提出各种各样愚蠢的问题，问我们是否会首先征服月球。我认为所有这类关于"征服"月球的谈论都是一大堆废话。月球就是月球。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产，没有一个国家有权声称是它私有的领土。

当然，一旦美国如愿以偿地把第一艘宇宙飞船送上月球，随后又是一艘，美、苏之间的整个合作问题便会变得更困难起来。美国显然想证明它有到达月球的能力，而苏联却没有这种能力，以便使我国人民和其他国家人民产生美国胜过我们的印象。虽然如此，根据我所看到的和我所完成的工作，如果我能朝这个方向影响政策，我会明确地赞同和美国达成协议，并为空间探索的某种形式的国际合作奠定基础。我不知道达成这种协议的时刻是否已经错过。可能决不会再有这样的时刻了。当然，在飞往月球仍处于计划阶段的时候，在我国和美国的技术手段还大体处于同等地位的时候，在过去达成这样的协议是合适的。但这种情况决不会发生。当美国派它的U—2侦察机飞越我国领土时，看看美国所制造的所有这些吵闹、冲突和政治上的叫嚣吧。我们不得不拒绝和美国人会晤，并要它道歉，因为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好了，

现在我们的主权再也不会被侵犯，虽然美国的人造卫星经常围绕着地球飞行，拍摄我们的设施并把情报发回本国。①

我退休之后，我尽可能从报上留心空间发展的消息。我说不上我们的空间计划是否已经失去了势头，但有一件事很清楚：美国人已经完成了肯尼迪发起的使人登上月球的计划。

当然，我们已能使一些仪器登上月球，并且我也完全赞成苏联全部自动化的空间飞行。我认为将来总有一天机器将会比人把工作做得更好——就象我们的人造卫星已能自动测量辐射、拍摄照片以及把照片发回地球那样。但遇到要探索另一天体时，机械装置还不能代替人。所以我认为，为了科学和为了我国的威望，苏联应当把人送上月球。

把人送上月球，再返回地球，是科学发展的一个顶点。我痛苦地承认，我不能否认现在美国人在空间航行方面已比我们领先。他们的成就使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

---

① 1962年12月，美国和苏联驻联合国大使艾德莱·史蒂文森和P·D·莫罗佐夫宣布，他们双方的政府已同意在空间探索方面合作，其高潮是苏联科学院院长M·V·凯尔迪什和美国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局长詹姆士·韦布举行的谈判。但是，主要由于其间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这些计划终成泡影。

民获有鲜明的印象。

熟识的人常常问我，怎么会让美国人先登上月球，而我们却不能在他们之前到那里去。我通常要他们去阅读凯尔迪什同志在记者招待会上谈话的记录稿。①但是，事实上记者招待会很少使我国人民感到满意。他们希望我国首先登上月球，而我不能责备他们。我也喜欢我们俄国的伊凡在美国的约翰之前登上月球，但是事情恰恰不是那样。

在我退休后闲居的几年中，发生了一些非常悲惨的事件。我特别想到我们第一个进入空间的尤里·加加林之死。②我记得当我从无线电广播中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是多么悲痛啊！

后来，就在不久以前，我们几位宇宙航行员在返回大气层的最后阶段，制动火箭着火了，它们与地面制导系统的联系中断了，宇宙飞船便进行软着陆。当舱口打开时，

---

① 1969年10月，即美国的阿波罗-11完成飞往月球使命后的三个月，凯尔迪什在斯德哥尔摩告诉记者说，苏联"不再有任何飞往月球的计划。"几星期后，他在莫斯科的记者招待会上说，苏联的空间计划仍包括沿轨道飞行的空间站计划在内，但是他一再申明不会发射载人飞往月球的宇宙飞船。

② 尤里·A·加加林上校当他于1961年4月乘"东方"号宇宙飞船围绕地球飞行时，成了第一个进入空间的人。他于1968年3月死于飞机失事。

发现乘员都已死去。①我是从广播中听到全部情况的。

人们问我的意见。他们希望我告诉他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能告诉他们什么呢？我和世界的其他部分隔绝了。我没有得到任何消息。我所能做的一切只有猜测。也许飞船上的设备有些失灵，以致造成密封舱漏气而使氧气逃逸。也可能这次不幸和生物学上的因素有关。也可能乘员的机体从失重转变为恢复重量时反应很强烈。

我实在不知道。起初我认为无人知道，但是现在我相信这个悲剧一定经过调查，而失事原因也一定有些人知道了。然而在报上仍无任何公布。我认为有两个理由必须将失事原因公布：第一，那些对这次事故原因毫不知情的人可以放心了；第二，科学家们可以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以免再发生同样事故。尤其重要的，我认为应通知美国为何会有此失误。毕竟美国人也在从事空间探索啊！

---

① 当三位宇宙航行员创下了在空间持续二十四天的纪录之后，他们所乘的"联盟"号宇宙飞船于1971年6月在哈萨克软着陆时，发现他们都已死去。一个月之后，据一个专门委员会报告说，死亡是飞船内的气压突然下降所致。直到1973年10月，苏联当局才又煞费苦心地向来访的美国空间官员解释说，当"联盟"号和沿轨道飞行的座舱脱离时，一只排气阀由于炸药栓的着火而出乎意外地打开了。

我并非对于应对这次不幸飞行负责的人含有批评之意。这是一种实验，在这种情况下安全是无法保证的。没有实验，科学就不能进步。而且科学无可避免地需要牺牲。为了避免牺牲而阻碍科学进步，那是不能宽恕的。我承认这是现实。但是使我非常悲痛的是，为了取得进步，人类竟不得不付出最宝贵的代价——即人的生命。

第四章　从事科学工作的知识分子

库尔恰托夫院士、凯尔迪什院士、拉夫连季也夫院士

战后我们碰到的最迫切的军事问题，就是必须制造核武器。我们得赶上美国人；美国人第一个制造了原子弹，而且也是第一个在战争中使用了原子弹，把它投在广岛和长崎。我们知道，世界上以美国为首的反动势力，决心把所有的赌注都押在核武器上。我们也知道，西方帝国主义者为了实现推翻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目的，在选择手段上是无所顾忌的。

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战后并不弱——他们的士气很高。可是如果没有好的装备和最新的武器作后盾，士气就会很快地低落下去。我们对形势应有一个冷静的估计。

斯大林作出了正确的结论：他看出西方的反动势力正在对我们发动攻势；他们已经储存了几百枚原子弹；我

们同美国卷入一场武装冲突的前景完全有可能，而且对我们这一方说来一点不令人鼓舞。

斯大林吓得像个胆小鬼。他下令把我们所有的技术力量都用来发展我们自己的原子武器。我记得这个计划由贝利亚全权负责。①美国人在1945年有了原子弹，我们到 1950 年才有，那已是我离开乌克兰来到莫斯科之后。这中间相差五年时间。如果以我们掌握原子武器制造的时间来计算，不能算长，但却使美国在原子弹储存方面大大抢先。首先我们应当记住，我们只在地面爆炸一颗炸弹，还没有在空中爆炸。后来在空中真的爆炸了之后，那也只是一个模型；而美国则早已把原子弹用来轰炸日本的城市了。

我愿意叙述一下我同各种类型的科学家的交往。由于他们的努力使我们能赶上美国人和保卫我们国家。我们的主要核物理学家是库尔恰托夫同志。②他是我们核能发展的主要动力。多亏他和象他那样的原子科学家，我们才能实现我们的美梦之一，这就是为我们的潜艇舰队装上核动力发动机。我甚至没有必要谈论库尔恰托夫作

---

① 美国轰炸广岛之后，斯大林就派他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苏联式的“曼哈顿计划”。俄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于 1949年 7 月在里海和咸海之间的乌斯特—乌尔特沙漠爆炸。

② 库尔恰托夫，发展苏联原子弹的杰出的核物理学家。

为一个科学家的功绩，因为他是全世界都承认的。可是我却想把他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讲几句话。

这些年来，我有很多机会和他碰头。他为人诚实可靠。他使我了解科学上最新的发展。当艾登邀请我们领导代表团访问英国时，我建议把库尔恰托夫同志也放在代表团内。在斯大林时代，把这样一个对我们的核武库和导弹工业无所不知的人派到国外去，将是无法想象的。

当然，让我们的第一流核科学家到国外去，还是有危险的。并不是说我们的科学家个人方面有什么地方靠不住，而是我们不放心资产阶级世界。曾经发生过我国人民在国外时被外国情报机关看中的事。所以为了小心起见，我们往往设法劝阻我们的科学家不要出国旅行。碰到国际会议，我们常常派第二、三流的专家去，而不派处于关键地位的那些人。这样一来，那些对于我们绝密的计划掌握了具体和第一手材料的少数科学家，就不会落到绑架者的手里了。

可是我相信带着库尔恰托夫和我们一同到英国去，将会达到足以抵销危险的三个目的：第一，他会提高我们代表团的威望；第二，他会使我们和西方科学界取得有益的接触；第三，把他一同带来表明我们对自己的知识分子的信任，这将是受欢迎的。我们信任库尔恰托夫，所以让他一个人在英国到处跑，看望物理学家，参观实验室，等

等。①

库尔恰托夫当然没有辜负我们对他的信任。我甚至连"信任"这个字眼都不愿意用。把这个字眼用在库尔恰托夫院士身上，简直有点刺耳。不用说，这样一个杰出的人物，这样伟大的科学家，这样忠诚的一个爱国人士，是应当得到我们十足的信任和尊敬的。

库尔恰托夫思路非常开阔，非常注重实际。多数的专家——我这话并不是责备他们——只关心他们自己的研究计划或者他们自己的那门科学。库尔恰托夫则不然，他懂得政府的拨款必须按照轻重缓急的次序来使用。固然，我们要提高我们的文化、技术和经济的水平，但是首先应当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国防和安全。库尔恰托夫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想别的科学家也知道我很喜欢和信任库尔恰托夫，所以他们往往把库尔恰托夫看作是他们的发言人。

有一次开会结束时，他走到我面前来说："我有个想法，希望你考虑考虑。我觉得，如果你任命我做你所担任的部长会议主席的科学顾问，会有很大的好处。"

我喜欢这个想法。我们需要一个受到我们绝对信任

---

① 1956年，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带了库尔恰托夫一同到英国去进行国事访问（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02—403页）。早些时候，他还被允许到国外参加日内瓦的和平利用原子能会议。

的人。他可以把科学界的情况和建议转达给政府。我告诉库尔恰托夫同志，我在原则上很欣赏他这样自告奋勇，但是这个建议要由领导成员来考虑。我告诉他下一次我们见面时，我会让他知道是怎样决定的。

可是我们是注定不会再见面了。这次谈话之后不久，我就获悉伟大的科学家和杰出的人物库尔恰托夫同志逝世了。①

我和我们从事科学工作的其他知识分子也有个人接触。例如，拿凯尔迪什院士来说，他经常向我们汇报。和库尔恰托夫一样，凯尔迪什在发展核导弹问题上需要做些什么事，总是坚决拥护我们的主张，因此我们对他特别尊重。当他成为科学院院长时，谁也不感到诧异。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时的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院士被邀参加一次部长会议。会上对他提出了一些批评；我要说批评是很有分寸的。可是涅斯米扬诺夫是一个很冷静而且很机警的人，他说："好，你们不妨考虑，把凯尔迪什同志提升为科学院院长吧。"我们说这倒是可以考虑和讨论的。会后，我们研究了几天，得出的结论是：对，凯尔迪什当院长更好些。涅斯米扬诺夫退休了，凯尔迪什接替了

---

① 库尔恰托夫于1960年2月逝世，葬在克里姆林宫墙外。

他。①

我听到一些流言蜚语，说什么并不是所有的科学院院士都喜欢凯尔迪什。在我看来，一定程度的不满是避免不了的。当科学院这样一个组织的头头，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满意。他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太多了，这些人各有各的需要，各有各的个性。院长不能对每个人都同等对待。我的想法是，如果某些人一时对他感到不快，这可能说明凯尔迪什同志把科学院管得很严。我相信他天生是院长之才，我仍旧相信他适合担任这项工作；当初决定任命他是对的。

我和副院长拉夫连季也夫同志的关系一直搞得很好。在他当初还是乌克兰科学院院长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我喜欢他的爽快，他的干劲和他的才气。作为一个数学家，他为我们国家的安全作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国防工业碰到的许多问题，都曾经向他请教过。②

拉夫连季也夫有一次请我去参观一个试验场，他正在这里研究连续爆炸的现象。他表演怎样将爆炸性冲击

---

① 涅斯米扬诺夫是有机化学家，从 1951 年到 1961 年任科学院院长。凯尔迪什是数学家兼机械工程师。

② 拉夫连季也夫院士是数学家，他从 1957 年起就担任苏联科学院副院长。他是应用流体动力学和炸药专家。他发展了连续装药的理论，这对穿甲弹的设计具有军事上的实用价值。

集中于一个方向，以炸穿一层金属板。在这项试验的基础上，他发明了穿孔炸药射弹。这种射弹证明是一种高效率的穿甲弹，因而对我们的国防事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拉夫连季也夫同志也是提出在西伯利亚设立科学院分院这个大胆建议的人。当时莫斯科还是我们这个幅员广大国家里唯一主要的科学中心。西伯利亚看来实在不象是一个应当建立新的科学院的地点。在许多人的心目中，西伯利亚仍是一个令人望而却步的地方，因为过去有几百万人都囚禁在那里（虽然在斯大林死后，都放他们回来了）。所以一开头我对拉夫连季也夫同志的建议非常怀疑，尽管现在我已感到当时我对这问题表现了无知并且处理很不得当。

"你难道真的认为能够把我们的科学家送到西伯利亚去吗？"我问他。

"不错，"他说："我知道有些人会愿意去的。"他随即开了一张年轻的科学家名单，人数很不少。

我们批准了他的方案，并拨了一点钱在新西伯利亚成立一个分院。我去过那边好几次，看看工作进行得怎样。

当我知道拉夫连季也夫全家都搬到新西伯利亚去了时，我感到又高兴，又诧异。他们住在一所朴素的房子里，一幢典型的农村住宅。他自愿放弃首都的一切生活上的

舒适和方便，以使他能在俄罗斯母亲的心脏、西伯利亚原始森林的深处建立一个新的科学中心。他是一个穿着粗陋皮靴走路的伟大科学家。我并不是说我们所有的科学家都应当穿着粗陋皮靴跑路，我对任何为人民谋利益的科学家都无比钦佩，即使他戴一顶可折叠的高帽也没有关系，虽然在我们社会里可折叠的高帽肯定不是最受推崇的帽子。我要说的只是，我对拉夫连季也夫那样出于自愿地过着朴素生活特别感到欣喜。

后来他又建议在远东再建立一个研究中心。我只好告诉他，我们简直没有这么多的物力，要等我们国家富足一点时才能考虑再设立一个中心。①

卡皮查院士：我的供状

我们曾经给卡皮查一个机会去研究一些问题。②我记不得它是军事性质还是民用性质，所以没法细说。后

① 西伯利亚的科学院分院于1957年成立，地点在新西伯利亚郊外科学镇。那边科学家研究的专业是数学、核物理学、流体动力学和地球物理学。

② P·L·卡皮查是一个享有最高国际声誉的物理学家，于1894年生于俄国，十月革命后去英国，在剑桥大学主持了低温物理学的研究工作。1934年他被人诱回苏联，他以为这只是短期的访问，并得到允许他重返英国的保证；可是一到了苏联，就不让他离开了。

来有人告诉我，说是卡皮查非常焦急不安，但是他决定不回〔英国〕了；他同意在苏联呆下来。

斯大林答应给卡皮查在莫斯科的最好地点造一所专用的研究所；就在当时的沃罗比约夫山，即现在的列宁山。①那个地方本来已经被指定为新的美国大使馆地址。最初美国大使布利特先生在政治上很得到我们的信任；可是获知布利特是怎样一个人之后，斯大林非常生气，他说："让我们把卡皮查的研究所造在沃罗比约夫山那个漂亮地方，不给美国大使馆。"②

研究所就这样造起来了。在往后的年代里，我每次到莫斯科来，总要上列宁山去散散步，看一下那个研究所。我常会一个人欣慰地想，"不知道这些在卡皮查领导下的奇迹制造者们正在揭示什么秘密？不知道这些人为了祖国的利益正在从事什么神奇的新创造？"

我从来不公开问这些问题。在斯大林领导下有一条严格规定：如果不告诉你，那就是不让你知道，你也就最

---

① 沃罗比约夫山是沿莫斯科河的首都郊区；战后莫斯科大学在该地建成新校园后，改名为列宁山。

② 威廉·布利特，1933—1936年美国驻苏联大使。1919年巴黎和会时，布利特曾在莫斯科和列宁打过交道；十五年后，他发现斯大林更难打交道。根据乔治·凯南的说法，"布利特不久对苏联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作法非常愤慨。在1934和1935这两年间，他愈来愈主张对莫斯科执行强硬路线。"（《回忆录》）

好别问。可是，日子久了，斯大林对卡皮查开始表示不满——我甚至要说是愤怒。他说卡皮查没有做我们要他做的事；他的工作不负我们的期望。我弄不清这些抱怨的话是否有根据，但是当时我仍相信斯大林；他讲什么话，我都认为是正确的。

在我们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资产阶级报纸就象一群疯狗似的狂喊乱叫起来，说俄国人一定是从卡皮查那里弄到原子弹的，因为他是俄国唯一能够制造原子弹的物理学家。斯大林的肺都气炸了。他说卡皮查和原子弹绝对没有关系，我相信这是事实。

斯大林死后，我们对待卡皮查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方面，我们承认他是个世界闻名的科学家；另方面，在美国人造成他们的原子弹之前，他一点没有帮助我们发展原子弹。总之，我要说我们对待卡皮查过于克制了。

卡皮查经常告诉我，他研究成功一项震撼世界的发现——一种制造氧气的新方法。他说，而且别人也证实，这项发明在发展我国经济上将具有重大意义。①可是，我们对他的期望不仅仅这一点发明。我们要卡皮查真正去做资产阶级报纸说他曾做过的事：我们要他为我们的核

① 1939年，卡皮查造成一件仪器，可以大量制造液体氧。在美国发明原子弹之后，他拒绝参加苏联制造原子弹的计划。他被加上"对国防工作故意怠工"的罪名，并被撤掉物理问题研究所的领导职务。斯大林死后，他恢复原职。

弹计划工作。我不是科学家，我说不出卡皮查能够做到什么，或什么是他所不能做到的。问题在于，他拒绝接触任何军事科研工作。他甚至想要说服我，说他出于某种道德信念，不能从事军事科研工作。

我记得他有一次求见我，我接见了他，并且注意听他有什么话要说。他告诉我他要研究一个科学问题，向我要求经费。我向包括库尔恰托夫在内的一些科学家询问过卡皮查提出的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这个问题对苏联说来并不紧要。当时我们只是根据军事安全的需要来衡量迫切性。我记得，我们拒绝了卡皮查的要求。

过了一些时候，卡皮查又来见我。那次谈话时，我问他，“卡皮查同志，为什么你不肯搞一点有军事意义的研究？我们迫切需要你为我们的国防计划工作。”

他跟我噜噜苏苏讲了一大堆他对军事科研项目的看法。根据我现在所能想得起的，他的论点是这样：“我是个科学家。而科学家跟艺术家一样。他们希望别人谈论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摄制有关他们工作的电影，在报纸上撰写有关他们工作的文章。军事科研项目的麻烦在于它们全是秘密的。如果一个科学家研究国防上的问题，他就得埋头在一个研究所里工作，从此音信杳然。他的名字会在报章杂志上消失。我不愿意发生这种情况。我要出名。我要别人在文章里和口头上谈论我的事业。”

我承认这一套理由给了我一个很古怪的印象——这

对卡皮查院士很不利。

“卡皮查同志”我说，“我们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是被迫把力量集中在军事项目上。只要敌对的阶级和敌对的国家拥有军队，我们就非得发展国防科研不可。不然的话，我们就会被扼杀，被粉碎，被践踏在地上。”

“我仍然拒绝跟任何军事项目打交道。”

一个苏联公民怎么能讲这样的话呢？这个人曾经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看见过我们人民在希特勒手中吃过多大的苦头。如果他向斯大林讲这样的话，我敢说斯大林的结论会和我的结论很不相同，虽然我承认当时我也很烦恼。

接着卡皮查表示他想出国。我可以有把握说，他想使报纸就他的出国旅行问题掀起一阵喧闹。

后来我决定找拉夫连季也夫谈谈。“你对卡皮查怎样看法？”我问。

“我很尊重他。他是个伟大的科学家。”

“这我知道。他想出国。你怎么看？”

“让他出去。”

“你认为他可靠吗？”

“我绝对相信他为人诚实可靠。”

之后我又问他，“你认为卡皮查对待军事科研项目的态度怎样？”

“我懂得你的意思。在这方面，他的想法很特别。可

是你应当记着：他的儿子是我们最优秀的地理学家之一，而且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①所以我觉得卡皮查也是一个诚实和忠诚的苏联公民。”

“我很高兴听到你这样说，”我说。拉夫连季也夫这时已经使我平静下来，并且向我保证卡皮查是可以信得过的。我开始盘算，也许我们应当让卡皮查出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也许，他不愿意接触军事科研项目，派他出去走一趟更为适合。当我心里这样想时，我就向拉夫连季也夫提出另一个问题：“卡皮查知道我们别的科学家进行的军事科研工作吗？”

“当然知道，他什么都知道。归根到底，院士们总是在一起相互商量的。他当然知道他的同事在做什么。”

这使我又提防起来。“那么，你认为他出国会不会有话讲得太多的危险？”

“这个我可没法子替他说，”拉夫连季也夫说，“不过我跟你说过，我认为他是个爱国者。我不相信他会叛国。”

“也许不会，”我回答说，“但当叛徒是一回事，话讲得太多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在领导内部仔细考虑了这个问题，决定暂缓派卡皮查出国。我们还没有积累足够的原子武器，因此必

---

① A·P·卡皮查是一位杰出的地理学家和地貌学家。他参加过好几次苏联的南极探险队，包括1955年的第一个南极考察团。

须对我们的敌人保守秘密，不让他们获悉我们拥有的原子武器竟如此之少。

我们知道卡皮查在西方有许多朋友和同事，我们担心放他出去走一趟，他说不定会东漏出几句话，西漏出几句话。根据他的自供，他就象一个喜欢人家捧场的演员，所以，为了提高自己的名气，说不定他会忍不住讲出些东西来。这是人类一个极普遍的弱点，我并不责备他。但是我作为部长会议的主席，有责任特别谨慎小心。

最后，我们拒绝了他出国旅行的请求。

过了几年，在我退休之后，我在报上看到卡皮查院士终于出国走了一趟。报纸上对他大事宣扬。他得到了自己应得的称赞，并被好几个国家授予科学院名誉院士的称号。①

我很高兴卡皮查最后能够到国外去。我惋惜的只是他没有在我当领导时出国。当然，在卡皮查出国旅行时，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其他许多人都已经承认我们是一个核大国了。因此，卡皮查泄漏我们在核能力上落后美国

① 卡皮查在苏联住了三十一年之后，终于在1965年5月被允许离开苏联土地，去丹麦接受国王斐德烈九世颁给的波尔奖章。一年后他回到英国；这是1934年后的第一次。他在伦敦皇家学会和他的母校剑桥大学作客；剑桥大学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并恢复他的旧日教职。他于1969年去美国。在一次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他支持苏联和美国的制度总有一天会汇合的理论。

有多远的危险已经不复存在了。

可是我得承认，我拒绝允许卡皮查出国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斯大林还在我的头脑里作祟。要记着，我在斯大林下面工作了好多年，没有那么容易摆脱这种〔斯大林主义的〕习惯。要觉察到这些短处并摆脱它们，是需要时间的。

但我仍然要说，当时我拒绝卡皮查的要求，我想到的主要理由和斯大林的影响毫无关系。不，这里的问题首先是保护人民，保护我们国家和我们民族的安全。

再者，我并不是独自决定的。如我刚才说的，我和拉夫连季也夫同志商量过，他曾警告我说，卡皮查知道我们在核武器研究方面的一切。我还和领导层商量过。当时不这样做，就是违反党和国家的制度，更不用说违反我们党的道德准则了。

所以你们可以看出，我对待卡皮查院士以及怎样和他打交道，心情是很复杂的。我尽了最大的力量。我从来没有怀疑他会叛国，尽管我认为他低估了制造新武器的重要性，而且不懂得没有新武器就无法吓走那些妄想染指苏联国土的人。

这就是我的供状。现在把事情的经过讲了出来，我觉得我已经赎罪了。有些人说不定要批评我，说："赫鲁晓夫对待卡皮查院士很冷酷，这个人对苏联的科学贡献非常之大。"不错，我也是人啊，我要求人民原谅我犯的错

误。卡皮查也是人，他拒绝进行军事问题的研究是错误的。我的错误是不让他出国。这样，就象我童年时人们经常说的，我们两下扯平了。对于我一向尊重的这位伟大科学家卡皮查院士，我现在请求他原谅我。

萨哈罗夫院士和氢弹

我愿意把卡皮查和我们另一个最有才华的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对比一下。他对军事科研也有疑虑。我和萨哈罗夫时常碰头，而且认为他是个极有才能和给人深刻印象的人。他很年轻就参加这样重要和困难的工作，确实是令人惊异的。他建议我们发展氢弹。那时，不论美国或者英国，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这样一种炸弹。我对这个想法大为欣赏。为了保证尽快实现萨哈罗夫的计划，我们把力所能及的事情都做了。由于工程师、技术人员和工人的协作，我们的工业能够在异常短的时间内发展了氢弹。氢弹是萨哈罗夫同志对苏联人民的一项重大贡献，也是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①

① 萨哈罗夫院士是苏联物理学的奇才，又是当前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领袖。1950 年他和I·Ye·塔姆发明了一种可控制的热核反应的方法，并在发展俄国氢弹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苏联的氢弹于 1953 年 8 月第一次爆炸，那时他只有三十二岁。他的小册子《进步、共处与知识分子的自由》于 1968 年在西方国家出版。

我们后来和美国及其盟国谈判停止军备竞赛。根据这些谈判的精神，我们这方面停止了一切核爆炸。我们的科学家当然继续在进行武器的设计工作。他们大大降低了制造成本，并增加了每次爆炸的当量。但这只是纸上谈兵。由于我们自动地而且单方面地停止核试验，我们的科学家和军事专家就没法看出新改进的设计是否切实可行。

与此同时，就在我们停止一切试验的那几个月里，美国人照样试验、改进和储存他们的炸弹。我们希望国际舆论会支持我们并对美国施加压力，要他们停止污染大气，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得呼吸空气。但美国人对任何抗议都不理睬。因此我们弄得左右为难，是坚持原来的主张甘愿冒落在人家后面的风险呢，还是恢复试验。当然，我们的军事人员对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了。

最后我们决定宣布，如果别的国家拒绝支持禁止核试验，我们除了恢复自己核试验外，别无选择。我们决定了下一次核爆炸的日期。①实际上，在我们恢复试验计划的前一两天，我接到萨哈罗夫打来的一个电话。他称我

① 1958年3月，正当美国和英国计划进行一系列核爆炸之前，苏联人宣布停止核试验。同年10月，美国和英国反过来宣布他们愿意停止试验，这正是苏联人准备在第一次柏林危机期间进行新的核试验时；这次爆炸是在11月。苏联后来在1961年第二次柏林危机期间，进行了一个庞大的试验计划。

为部长会议主席，说他有一项请求要提出来。这项请求呼吁我们政府取消原订的核爆炸计划，不要从事任何核试验，至少不要试验氢弹："作为一个科学家和氢弹的设计者，我知道这些爆炸能够给人类带来巨大的危害。"

萨哈罗夫继续以这样的口吻讲下去，恳求我不要让我们的军事人员再进行什么试验。他显然是出于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我理解他，而且深受感动。谁都会感动的。人们说，他是我们科学家之中的圣人。我敢说他是出于最好的动机。他深信科学会给世界带来和平昌盛，帮助维持和改善人类生活的条件。一想到科学有可能被用来摧毁生命，污染空气，用放射性中毒来慢慢杀死人类，他就非常愤恨。可是他以为由于自己发展了氢弹，就有权利决定将来怎样使用氢弹，这却是过份了。

"萨哈罗夫同志，"我说，"你应该懂得我的处境。我现在的地位和我所负的责任不容许我取消这些试验。我们党和政府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再没有比永远停止核试验使我们更高兴的了。我们领导上已经单方面地停止核试验，并且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照我们这样做。但是我们没有得到答覆。美国人对我们的建议不理睬。作为一个科学家，你肯定知道他们一直在进行试验。如果我们不试验我们自己的炸弹，我们怎样会知道这些炸弹灵不灵呢？"

他听了并不满意，仍坚持我们不要恢复核试验。

我想和他完全摊开来谈："萨哈罗夫同志，请相信我，我非常同情你的观点。但是作为对我们国家的安全负有责任的人，我可没有权利照你请求的那样做。要我取消试验，将是对我们国家犯罪。你肯定知道我们的人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的那种痛苦。我们不能拿人民的生命再去冒险，听任敌人发展新的杀人武器而一点不管。难道你不懂得这点吗？同意你的建议，就将招致亡国。请你明白，我简直不能答应你的请求；我们非继续进行试验不可。"

我的论据没有能改变他的想法，他的论据也没有能改变我的想法；但这都是意料中事。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萨哈罗夫的态度是错误的。他的思想显然是矛盾的。一方面，他想帮助祖国防御帝国主义的侵略。另一方面，一旦他使我们能够发展氢弹，他对我们使用氢弹又害怕起来。我想他是害怕自己的名字会同今后可能使用的氢弹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科学家，他懂得自己爱国有责，并且把这个责任履行得很好；但是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又感到踌躇。我对和平主义者一点不反对——至少在我们为消灭战争创造了条件之后，我是不反对他们的。但是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一个如果不保持高度警惕就会被帝国主义吃掉的世界上，和平主义就是一种危险的感情。

萨哈罗夫和我的这次冲突在我们两人的心里都留下

了很深的痕迹。我觉得，上述的事件说明他并不完全懂得什么是国家的最大利益，因此，从那时起我对他就变得警惕起来。我希望有一天萨哈罗夫同志能懂得我的立场是对的——如果现在不能，那就俟诸异日吧。①

我们在领导成员中讨论了萨哈罗夫的请求，决定继续进行试验。我们进行了一次威力很大的爆炸。世界上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爆炸。我们的科学家事先计算好炸弹的威力相当于五千万吨的TNT炸药。这是在理论上。事实上这次爆炸相当于五千七百万吨的TNT炸药。真是大极了，简直叫人不能相信！我们的专家后来向我解释说，如果把冲击波和空气中的放射性污染计算在内，那么炸弹造成的破坏就等于一亿吨TNT。

我问我们的科学家，如果打起仗来，我们可以在哪些地方使用这种炸弹。我想对这样大规模的破坏会造成什么后果有一个具体的概念。他们告诉我，我们对西德就不能使用五千七百万吨的炸弹，因为强大的西风会把散落的微粒吹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对平民和我们自己驻扎在那边的部队造成损害。可是，如果我们把炸弹扔在

---

① 萨哈罗夫在《纽约时报》1973年9月12日意见和评论版发表的声明里写道，“我从1958年起，就在书面上或私人谈话中呼吁禁止大气层的试验。”1974年在西方出版的一部以《萨哈罗夫在说话》为题的文集中，他叙述了自己和赫鲁晓夫打交道的细节。

英国、西班牙、法国或者美国，那就不会危及我们自己或者我们的盟国。

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武器。它使我们有可能对那些执行反苏侵略政策的人施加道义压力。我们发展和试验氢弹并不是准备进攻人家，而是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和抗击那些可能进攻我们的人。

第五章　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

我想谈一谈斯大林时代和后来我担任政府首脑期间我们领导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当然，“知识分子”这个名词包括苏联社会的许多行业。在党为巩固和教育我们的社会，引导我国人民实现列宁在十月革命期间所提出的目标的事业中，我们的知识分子作出了多方面的贡献。

在从事科技的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的这一部分人，其知识能力是用来创造机器设备和其他实物的——这方面，我们不存在多大问题。就其活动的性质来说，他们没有卷进社会生活中比较复杂的一个领域，即意识形态领域。

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却提出了较为困难和不易捉摸的问题。当然，搞科技工作的知识分子的确每个人都在从事有益的劳动，为社会的利益而创造实物；但是当我们说“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时，我们是指作家、美术家、音乐家、雕塑家——他们并不直接增加社会的物质财富，但他们的工作提供精神食粮，没有它人们就不能生活。可是，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却比社会上从事其他职业

的人受苦得多。在物质上，他们比从事其他职业的人生活得更好，但在精神上，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是很烦恼的。

创作活动，特别是作家的创作活动，是同政治领域难解难分的，因为分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掌权的那些人和普通工人之间的关系，是艺术创作过程的一部分。作家总是在钻研哲学和意识形态问题——而这类问题任何执政的政党包括共产党在内都想加以独占。如果你不去培养人们的思想感情并把它引导到正确的方向，你就不能取得很多成就。这是党的任务，而且也是文学的任务。

音乐也起着重要作用，因为它能振奋人们的精神。音乐不是用人们讲话的语言来表达的，这就使得区别一支乐曲的好坏发生困难。有时你打开收音机听节目，自言自语地说："这种蹩脚货是谁写的?"然后你发现这是柴可夫斯基或别的著名作曲家的作品。后来，你有时打开收音机又听到同样的乐曲，这次你却认为是美妙的——这都是因为你的心情不同。甚至看书也会遇到这种情况。例如，我特别不喜欢索尔仁尼琴的第二本书《马特廖纳的家》。①你可以说这是由于各人口味不同，但我却认为这

① 获得诺贝尔奖金的小说家A·I·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马特廖纳的家》于1963年出版。前一年，赫鲁晓夫亲自批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出版，这是一部描写斯大林主义者的劳动营的小说，刊登在苏联著名的文学杂志《新世界》上。

是心情问题。

但是，一般说来，我认为一个聪明人——即使在这个问题上是一个蠢人——理解一部文学作品要比理解一支乐曲、一幅绘画或一件雕塑更容易些。作家象泥水匠或车工那样，他生产的成品可以拎起来从各个角度进行观察，并且作出判断。一个作家要塑造他的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就不能不进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从党的生活以至于人民的生活。

斯大林对艺术家的态度有其好的方面。他是政治家，是有高度智慧的人。但是许多知识分子在他统治时期遭受苦难。有些人他是不喜欢的；当局没有给这些艺术家以他们生存所必需的应有的待遇、谅解和宽容。如果由一个人或一批人来判定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这对知识分子会造成严重的苦恼，特别是在那些可以随心所欲地判断其质量的某些艺术领域，如音乐。但是，作曲家、画家和作家遭到的更大苦难是把他们束缚起来，不许动弹。任何形式的限制都好象给创作活动加上了枷锁。

斯大林象所有暴君一样，只有在作家的作品吹捧他本人和他的统治时，他才对待他们优礼有加。在这方面，斯大林就象那个迫害普希金的以“尼古拉鞭子”著称的尼古拉一世一样。普希金是个伟大的作家，这难道还有什么问题吗？当然没有。他写了不少表达他自己的和人民

的心灵的美丽诗篇。我还记得他写的关于自己的那些不朽诗句：

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在人们走向那儿的路径上，青草不再生长。①

然而，普希金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在流放中度过的——先是在南方的摩尔达维亚、基什尼奥夫和敖德萨，后来在普斯科夫附近他自己的庄园里。想想看，在所有的时间里他一直在进行创作。②当然，尼古拉一世要普希金创作，但是还要他颂扬君主和支持君主政体。

我不是说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斯大林时代都受到压迫。例如，伏罗希洛夫曾狂热地表扬画家格拉西莫夫。③我不打算评论格拉西莫夫作品的艺术质量，但我知道伏罗希洛夫特别喜欢他，是因为格拉西莫夫在他的画中颂扬过伏罗希洛夫。伏罗希洛夫还有一个宠爱的作曲家，他经常为伏罗希洛夫唱赞歌。这就是波克拉斯，他现

① 引自A·S·普希金（1799年—1834年）《纪念碑》一诗。

② 普希金实际上是在流放中写了大量作品。

③ K·Ye·伏罗希洛夫元帅在不同时期担任过国防人民委员，是斯大林身边的“替罪羊”（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80—281页）、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挂名的国家元首，1953年—1960年），并供认是反党集团的同谋者。

A·M·格拉西莫夫也许因为他在1938年创作了斯大林和伏罗希洛夫从克里姆林宫墙俯瞰莫斯科的油画而颇负盛名。

在仍很受尊重。①看来是由于他谱写了关于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的骑兵部队功勋的歌曲。②有一个专门名词可用来刻划诸如格拉西莫夫和波克拉斯这样的艺术家：他们都是宫廷画家和宫廷音乐家。有权势的人总是把这样一批艺术家供奉在自己周围，赐给他们以官府的恩宠——更不必说物质的酬劳了。

有些得到斯大林恩惠的知识分子却落得个悲惨的结局。以法捷耶夫为例，他是个有卓越才能的作家。他的《青年近卫军》是不朽的作品。我高度评价他所写的关于国内战争时期西伯利亚情况的书。③可是，法捷耶夫经常在作家协会颂扬斯大林，自认为是斯大林的代言人，甚至为被控犯罪的人捏造伪证。

那时法捷耶夫常常喝得酩酊大醉，不省人事。我记得斯大林召集我们参加斯大林奖金评选委员会进行评议的情况。听起来象是蠢事，但这样的会真的召开了。斯大林先听取提名，然后决定谁应该获得斯大林奖金。的确，获得斯大林奖金并不是高不可攀的。法捷耶夫先是

---

① 这里指的是波克拉斯两兄弟，即丹尼尔·亚和德米特里·亚，他们谱写了歌颂俄国国内战争时期红军功勋的流行的进行曲。

② S·M·布琼尼元帅是位漂亮的骑兵军官。赫鲁晓夫在国内战争时期隶属于布琼尼的第一骑兵师。

③ 《毁灭》，写一支共产党游击队在俄国国内战争时期同干涉者和白卫军战斗的故事。

汇报可以得奖的各种各样的候选人，然后斯大林会说："瞧！他醉得简直站不住了！"——这是真的。有时斯大林会把所有的民警和契卡人员从床上叫醒，派他们到某一个肮脏的经常聚众饮酒的地方去寻找法捷耶夫。所有这类地方都登记在簿子上了，因而警察只要按图索骥，一家一家去找，直到找到他为止。这就是法捷耶夫酗酒的状况。

后来，斯大林死了几年以后，成千上万的人包括许多作家和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在内被杀害的事实揭露了出来，这些人根本不是歹徒或人民的敌人。法捷耶夫对此不能理解。我相信他会认识到，我们揭露斯大林的罪恶是做得对的。但是法捷耶夫不能回避下面的事实：他过去经常吹捧斯大林，并且更糟糕的是他扮演了斯大林的走狗和迫害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的主要人物的角色。他知道他已走到了尽头，于是自杀了。①当然，我们应该记住，那时法捷耶夫已经被酒精折磨得只剩下一具躯壳了。

在斯大林时代很有成就的另一位作家是特瓦尔多夫斯基。在我们同希特勒匪徒作战的年代里，他的名字在千百万人民中有口皆碑。正如内战时期每一个红军战士用杰米扬·别德内依的著作把自己在政治上和精神上武

① A·A·法捷耶夫于1956年5月自杀，就在苏共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的三个月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候补委员。

装起来一样，①因此，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品——特别是他的关于瓦西里·焦尔金的叙事诗——是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力量的源泉。斯大林把一幅描写瓦西里·焦尔金的油画挂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大厅门口的正前面，你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会议厅走出来时正好对着这幅油画。我还记得斯大林凝视着这幅油画时面部表情颇为激动。我们也同样为之感动。

这样，特瓦尔多夫斯基给了我们一些伟大的艺术品，但是他终其生没有得到确认，也没有得到荣誉。我认为不承认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办不到的。有些人可以在一个人活着的时候不承认他，但是人民已经承认他了；明天新的一代将以另一种方式来评价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作用。②

---

① 杰米扬·别德内依是官方所承认的诗人，赫鲁晓夫在三十年代清洗时期同他有一面之缘（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79—80页）。

② A·T·特瓦尔多夫斯基是诗人，长期担任《新世界》文学杂志编辑。他在1946年出版的一首长诗中，塑造了瓦西里·焦尔金这个主人公的形象。这是受人喜爱的、既是英雄人物又是喜剧式人物的苏联士兵形象。1963年这个主人公又重新出现在《焦尔金游地府》一诗中，这是登载在《消息报》上讽刺斯大林主义官僚政治的一首长诗，由赫鲁晓夫的女婿A·I·阿朱别依所推荐。直到赫鲁晓夫下台一年后为止，阿朱别依是这家政府报纸的主编。

现在回到我担任党的首脑时我们对作家和艺术家的态度。关于帕斯捷尔纳克我要讲一句话。我不打算评价他在文学上的功过，但我相信别的诗人的意见，他们非常重视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和他的外国文学的翻译工作。斯大林死后，他写了《日瓦戈医生》，打算把它出版。关于这部小说以及如何处理它，引起了一场可怕的混乱。我知道这个情况，并且有机会对该书是否出版施加影响——归根结底，问题在于是否接受向我们报告此事的人的劝告——但是我没有采取行动。我有充足的理由这样讲，如果我〔露出口风赞成出版〕对决定施加影响的话，我会得到支持的。但是我没有这样做，现在我很后悔。同搞创作的人打交道，行政措施总是最有害和最落后的。

帕斯捷尔纳克为《日瓦戈医生》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手稿流到了国外，它在国外出版并引起了哄动。虽然我说不上这部小说应该得到怎样的评价，但它得到了承认，

特瓦尔多夫斯基是索尔仁尼琴早期的坚定的保护人。在赫鲁晓夫的赞许下，他出版了索尔仁尼琴写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后来——在赫鲁晓夫垮台和索尔仁尼琴失宠之后——他坚持要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索尔仁尼琴的作品。特瓦尔多夫斯基于1970年突然被撤去《新世界》杂志编辑的职务，主要是由于他对索尔仁尼琴的庇护。他死于1971年。索尔仁尼琴参加了葬礼。

并被授予诺贝尔奖金。不管怎样，帕斯捷尔纳克得到了诺贝尔奖金的荣誉，而这里〔在苏联〕却只有行政措施。他的书被打入冷宫并列为禁书。使用警察手段的决定给这一事件蒙上了完全不同的色彩，并且在以后的一段长时间内留下了不愉快的回味。人民掀起了抗议苏联不让帕斯捷尔纳克出国接受奖金的浪潮。

我说："让我们向前走一步，出版这本书吧。这样，帕斯捷尔纳克就可以出国领取他的奖金。我们可以给他护照，给他一些外汇，以便使他能够成行。"

后来，完全出乎意料，帕斯捷尔纳克通过报纸发表了公开声明说，他无意出国，甚至不想再提这个问题。

直到今天，我还没有读过他的书，所以也不能作出评价。对我谈到这本书的人说，他们对这部作品的艺术方面并不特别钦佩，但这是题外的话了。评价一个作家和评价他的作品是不同的两回事。如果这本书的艺术质量的确不高，那么应该留待读者去评定。如果一部作品不能引起读者共鸣——如果作品的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方法不能感动读者——那么，作者就应该从中得出必要的结论。当然，他会在精神上受到挫折，但是，他的作品未能体现和传播某些值得读者注意的思想，这只有怪他自己，怪不了别人。主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读者有机会作出他们自己的评价，而不应采取行政措施和警察手段。不应当对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作出判决，好象他们在受

审判似的。

关于《日瓦戈医生》这本书，有人也许会说，我对这本书未能出版表示后悔已经为时太晚了。不错，可能太晚了。但晚一些总比不表示好。①

多年来我不止一次遇见过爱伦堡。他是大作家，具有卓越才华的人。但不晓得怎么搞的，他乖乖地顺从于斯大林主义的手段。也许我对他太苛求了，因为在斯大林时代的条件就是如此，人们没有很多的选择余地。除此以外，讲句公道话，我要说有时爱伦堡顽强地抵制过斯大林。

例如，我记得有一次斯大林想在报上发表一项声明，表明在苏联没有反犹主义。他命令卡冈诺维奇和爱伦堡参加起草声明。②即使他并不缺少签名的人，他却特别要

---

① B·L·帕斯捷尔纳克的小说《日瓦戈医生》，不顾苏联官方的反对，于1958年先在意大利后在美国出版。同年10月，帕斯捷尔纳克被授予诺贝尔奖金。最初他表示愿意接受。后来在报纸和当局的威吓性攻击下，他被开除出作家协会，并致电斯德哥尔摩表示“自愿谢绝”奖金。

② L·M·卡冈诺维奇一度是赫鲁晓夫的政治顾问，后来成为他的主要敌手之一。战后，卡冈诺维奇接替赫鲁晓夫任乌克兰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副主席。赫鲁晓夫曾谴责卡冈诺维奇这个犹太人具有反犹主义情绪（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43页）。

他们两人在上面签字。卡冈诺维奇很狼狈，当然最终还是签了名，因为斯大林要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但是，就我记忆所及——我不认为在这里会记错——爱伦堡断然拒绝在声明上签字。

爱伦堡把他的一部小说命名为《解冻》，从而创造了一个用来描绘斯大林死后时期的流行名词。可是，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经容许在一定程度的放松，人民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在报上和文学作品中已开始有更多的言论自由。①

但仍然有一些人反对新的放宽措施。我记得其中的一位有一次当着我的面指责一件抽象派美术品说："如果斯大林还活着的话，他决不会容许这种东西的。"我记得，讲这句话的人是一位知名的艺术家，后来我听说他花巨

---

① I·G·爱伦堡是俄国的犹太人作家，他因为受到斯大林的宽容并幸免于1952年反犹太人的清洗，因此有含糊不清的名声。有些苏联的自由主义者认为他是属于他们当中的一员，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个投机分子。由于他在回忆录和其他作品中对斯大林时代有坦率的论述，斯大林主义评论家就抨击他。《解冻》于1954年问世。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了他的看法，即这本书"对有关〔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事实和现象，作了不确切的、或者更明白地说至少作了错误和片面的描绘"（1963年3月）。

款买了涅伊兹维斯特内的一件雕塑品。①涅伊兹维斯特内本人常说，有些批评他很厉害的人却在出巨资购买他的雕塑品，虽然他没有在雕塑品上署名。

我们领导成员包括我自己在内是赞同解冻的，但我们觉得必须批判爱伦堡的立场，不过没有点他的名。我们有点慌张——确实有点慌张。我们害怕解冻可能引起洪水泛滥，这将使我们无法控制它并把我们淹死。怎么能把我们淹死呢？洪水会溢出苏联河床的堤岸，并形成一股会冲破我们社会的所有堤坝的浪潮。从领导上的观点来看，这将是一种不利的发展。我们要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

当然，我们也要对艺术家放松控制，但在这一点上，我们可能有些胆怯。我国人民对我们所处的状况有一个很恰当的比喻："你想抓痒处，但你的妈妈不让你抓。"

我们在中央委员会同一批知识分子谈过几次话，并坚持邀请爱伦堡参加。②我记不清楚西蒙诺夫同志是否

① 赫鲁晓夫和他的党内同事、负责意识形态和文化方面的L·F·伊利切夫斥责雕塑家E·I·涅伊兹维斯特内的作品为"抽象派"。赫鲁晓夫和涅伊兹维斯特内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艺术展览会上曾公开争吵过。

② 赫鲁晓夫在中央委员会总部同知识分子举行过两次会议：一次在1962年12月17日，还有一次在1963年3月7日。第一次在列宁山的少先队宫邀请了四百名知识分子；第二次在克里姆林宫斯维尔德洛夫厅邀集了六百名知识分子。

出席，但我确实记得特瓦尔多夫斯基、叶甫图申科、涅伊兹维斯特内、加琳娜·谢列勃里亚科娃和其他人都出席了。①谢列勃里亚科娃在发言中激烈反对爱伦堡，使他忐忑不安如坐针毡。她是一位有才能的作家，虽然现在不大听到她了。她讲了很多话把爱伦堡痛骂了一顿，骂他是专门谄媚斯大林的马屁精。她说，当斯大林砍作家的头和把作家送去流放时，爱伦堡却到处发表讲话，拥护斯大林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做法。爱伦堡对此大为光火，严词驳斥了她的发言。我不记得她的谴责和爱伦堡的反驳的具体内容了，但我很能理解她当时的心情。象我所说的，我认为她是很有才能的。她写了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三部曲。我读过，很喜欢它。她为这部书付出了辛勤劳动，搜集了许多有趣的材料，很有技巧地把它编在一起。可是

---

① K·M·西蒙诺夫是诗人、散文作家和剧作家，他在特瓦尔多夫斯基之前担任过《新世界》杂志的编辑。他以在卫国战争时期撰写爱国作品而闻名。

Ye·A·叶甫图申科最近发表了《斯大林的继承者》，是警告斯大林主义可能复活的一首诗。

加琳娜·谢列勃里亚科娃是描写马克思生活的三部曲的作者，她是斯大林主义恐怖的受害者。她的两个丈夫都死于清洗中，她在西伯利亚度过了差不多二十个年头。1962年12月她在党的领导人会见知识分子的会议上激烈攻击爱伦堡是一个伪装的斯大林主义分子，说他曾在战后的反犹太人运动中出卖犹太同胞。

现在她从地平线上消失了。你在报上可以看到许多作家，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她的名字。我不知道她发生了什么事。我甚至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我想如果她死了，应该会作出宣布。我猜想她今天一定处在这样的境地：她既得不到任何承认，她的作品也不能够出版。

我对那几次会见中所讲的许多话引为遗憾，包括我自己所讲的一些话在内。举例说，我记得我粗暴地批评了涅伊兹维斯特内，说他决心取这个名字是为了使他的作品始终莫名其妙。①我的意思并不是说他的名字引起了人家的疑心。但不管怎样，我这样讲是粗暴的，我表示遗憾。象我这样身居国家高位的人，说了一些可以被人家用来错误地反对某一个人的话，那是不能原谅的。如果我现在遇见涅伊兹维斯特内的话，我要为我在中央委员会讨论中所说的话向他道歉。

事实上，会上没有进行很多讨论，这是一次批评会。叶甫图申科激动地为涅伊兹维斯特内的艺术流派辩护。叶甫图申科十分正确地指出，一些知识分子攻击抽象派不是第一次了。我认为，未来派都是抽象派。在1917—1918年，马雅可夫斯基经常穿着一件黄制服在涅夫斯基大道上漫步。在当时，他和未来派都被认为是抽象派并

① 涅伊兹维斯特内在俄语中的意思是“无人知道的”。

被当作抽象派来批评，可是他们留下来的作品即使在现在也是被看作是为共产党争取美好未来的斗争服务的。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不易懂，但是当我听到人们朗诵他的诗篇时，我总觉得它很有力，并且在思想上具有鼓舞作用。①

至于叶甫图申科的诗，我没有都读过，但是我喜欢我读过的他的许多诗篇。他写了一首关于俄国人民对待战争态度的引人注目的诗。这首诗被谱上音乐，变成一首标题为《俄罗斯人要战争吗?》的歌曲。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歌曲现在不再演奏了。有些人批评他写的关于战争的歌词，说他否定战争，瓦解我们士兵的士气。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一首出色的诗。它说我们俄罗斯人不要战争，但同时警告说，如果被迫战斗，我们将毫不迟疑地给敌人以致命的回击。

总的说来，我认为叶甫图申科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是个好人。当然，在性格上他有放荡的、难以驾驭的、乃至狂暴的气息，但只有从政府的角度来看才能说他是难以驾驭的。换句话说，他总是不符合检查官所定的框框——说得干脆些，那些人所定的框框是要他把作品的

---

① V·V·马雅可夫斯基是十月革命时期的桂冠诗人，又是未来派的领袖。未来派是十月革命前夕一批在美学上主张经验主义和在政治上属于左翼的作家和艺术家。马雅可夫斯基的有名的"黄制服"是不妥协的标记。

锋芒磨平一点。

如果每个人写的东西都完全一样，如果每个人都发表同样的议论，那是多么可厌啊。这样就没有创新的余地，作家也不可能有发挥自己才能和突出自己风格的余地。这就象两个人用一只话筒讲话，一个在话筒的这一头讲，另一个人在话筒的另一头重复讲同样的话。如果文学作品都是千篇一律，将使读者为之作呕。

一般说来，我认为我们应当对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更加宽容，并且给他们更广泛的机会。虽然我个人反对绘画、雕塑和音乐方面的新流派，但这并不意味着我认为有必要使用行政的和警察的手段。我记得叶甫图申科同志为涅伊兹维斯特内辩护并反驳我们的批评时指出，古巴的抽象派艺术家同现实主义艺术家彼此都是同志，一旦号召公民们武装起来保卫他们的革命成果时，他们总是肩并肩地进行战斗。这是个强有力的论点。

后来，涅伊兹维斯特内不是通过文化部长福尔采娃就是通过苏联共青团的帕夫洛夫写信给我，表示愿意放弃抽象派艺术，着手进行现实主义的创作。①我当然很高兴。我从报上看到他创作了一些出色的作品，我想也许

① Ye·A·福尔采娃是纺织女工出身，自1960年以来一直担任文化部部长；从1930年起她一直在党和国家的官僚机构内工作。

S·P·帕夫洛夫是全联盟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第一书记。

我们的批评对促使他走上正路有点关系，虽然我仍对我们的批评方式引以为憾。①

谈到艺术，我记得当我们访问艾登在英格兰的别墅时我和他的一次谈话。②艾登问我："赫鲁晓夫先生，你认为这种新艺术如何？"

"首相先生，坦率讲，我不懂。在艺术创作上我是赞成现实主义的。"

"我也不懂。但是你们的毕加索怎么样？"③

"噢，他吗？他当然是第一流的艺术家，在需要的时候，他能够把他的创造性转到画和平鸽，这是争取世界和平斗争的象征。"我知道，要我来扮演毕加索的批评者或辩护者的角色，我是不能胜任的，而且他也不需要我来为他辩护。我不过是和艾登有同样的观点，即象毕加索这样的伟大艺术家一点也不抽象。

从绘画转到音乐，我想谈一些关于肖斯塔科维奇同志的事情，我对他一直是非常尊重的。他在斯大林时代受到批评，但他接受了那些批评，我并不认为他在背后曾

① 赫鲁晓夫的家属曾委托涅伊兹维斯特内为莫斯科新圣母公墓里的赫鲁晓夫墓雕刻墓碑。可是，当局没有同意家属把这个半身像放在墓前。

② 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405 页。

③ 赫鲁晓夫援引艾登谈到的"你们的"毕加索，是因为这位画家早期信奉过共产主义。

受到压力。①他创作了很多乐曲，尤其在战争年代。他在列宁格勒写了一部最杰出的作品。多年来他在我们从事创作的知识分子中有着显赫的地位，特别是在作曲家协会。现在他是第一流的——我甚至要说是我国最伟大的——作曲家。可是，在某些特定问题上，我们跟他的看法不完全相同。例如，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大声疾呼地赞成和支持爵士音乐。

被攻击为创作了爵士音乐的作曲家之一，就是卓越的作曲家和音乐家乌焦索夫。②《真理报》点了乌焦索夫的名，把他批评得体无完肤。但是，即使乌焦索夫受到《真理报》大肆攻击的时候，印刷工人在为那些批评文章排版时嘴里还不停地哼着他的歌曲《小面包圈》。我所以知道这件事，是因为我的一位来自敖德萨的共产党员老朋友告诉我的，他有几位朋友在《真理报》的印刷所工作。我是个老年人，我还是喜欢老的音乐。我总是喜欢民歌、民间舞蹈和古典音乐。我不喜欢爵士音乐——这听起来不象音乐，而象某种令人生厌的、不和谐的音调。每当播送爵士音乐节目时，我总是把收音机关掉。但是我得承认，我

① D·D·肖斯塔科维奇在三十年代失宠，当时他的大多数作品被斥为“形式主义”。《真理报》攻击他的歌剧《姆岑县的麦克贝思夫人》和芭蕾舞剧《闪亮的溪流》为“拙劣的自然主义”。

② L·O·乌焦索夫是在敖德萨出生的作曲家和民歌演奏家。

还保留几张乌焦索夫的唱片，有时拿出来放放。我非常喜欢他的乐曲。我认为应当让人民有机会来表示他们对某种音乐是喜爱还是不喜爱，领导上不应用行政手段来反对爵士音乐或任何其他音乐。

有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除有时遭到不恰当的对待外，还很难获准离开苏联到国外去旅行。我想根据我的看法举几个例子，看看是否值得封闭我们的边界。众所周知，在斯大林死后，我们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我们必须承认，会有一些持不同意见的分子和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他们有些人心怀叵测，在我们派一批演员出国后，有些人可能会拒不回国。每当发生这种事情时，总是搞得很糟。但有时也不乏这种例子，就是有些人后来眼泪汪汪地回来了，简直是乞求我们让他们回国。当然，有些艺术家比别人更敢冒险些。

我们第一流的芭蕾舞演员玛雅·普利谢茨卡娅的事件是这样的。有一天，当一个芭蕾舞剧团准备出国时，我收到她一封措词坦率的长信，说是因为不准她参加大剧院的出国演出，她感到刺痛和受到了侮辱。我建议应准许她出国演出。如果我们继续采取“不准出国”的政策，那会造成什么结果呢？那就会使世界各地认为，我们并没有以我们最著名的芭蕾舞演员而感到自豪。①

① 这段摘自赫鲁晓夫对普利谢茨卡娅事件处理经过的叙述，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22—524页。

我记得在国内战争时期，当我在第九库班集团军政治部工作时，我被安置在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的房子里。一位出言不逊的妇女大胆地粗声粗气对我说："现在你们共产党人掌权了，你们会把我们的文化践踏成粪土一样。你们根本不会欣赏象芭蕾舞这样纤巧的艺术。"她是对的——我们根本就不懂芭蕾舞。当我们看到印有芭蕾舞女演员照片的明信片时，我们还以为这不过是穿着猥亵服装的妇女照片。有时我们对卢那察尔斯基讲了些难听的话，因为他花在剧院的时间太多了。①我们觉得他如此热心于艺术是他的一个弱点，说明他背离了共产党的准则。当然，我们那时还不够成熟。我们都直接来自工厂、矿山和田野，象芭蕾舞这种艺术对我们全然是陌生的。

从那时以来，我们经历了一段很长的路程。苏联的演员，尤其象普利谢茨卡娅这样的芭蕾舞女演员，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我是一个老人了，我经常看电视。当我看到我们的音乐家演出时，我感到骄傲。我们没有把普利谢茨卡娅关在国内，这也使我感到高兴。如果不同意她出国演出，那会使我们自己受到损害。

我还想起在我担任领导期间所发生的涉及钢琴家的两件事。这些事件表明我们能够摆脱不光彩的关闭边界传统的束缚，这种传统就象系在苏维埃国家良知上的一

① A·V·卢那察尔斯基是苏联第一个——并且是至今最开明的——教育人民委员(即文化部长)。

条锁链那样。

我们的一位钢琴演奏家里赫特同志要求获准出国参加文化交流活动。①他想代表苏联并作为伟大的音乐家之一出国。我周围的人立刻摇摇头并对我说，里赫特同志出生于德国，派他出国是有危险的。他的母亲住在西德，人们警告我说，他也许想同他的母亲团聚。

我必须作出决定。我知道里赫特同志同他母亲的关系是冷淡的。我告诉我们的集体领导，我赞成让他出国。他们提醒我说，这样他就有机会不回来了。我回答说："那又怎么样呢。我们得担些风险。当然，失去这样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会丢我们的脸，但是我们不能毫无根据地不信任每一个人，并且怀疑每个人会成为叛徒。他一定会安然回来的，这对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制度将是很好的宣传材料。我们将向全世界显示，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我们信任我们的人民。"

后来我听说里赫特同志去西德旅行了一次，甚至见到了他的母亲。但他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多次到其他国家去旅行，每次回来时，他都为苏维埃音乐艺术带来了更大的光荣。我们用类似的方法处理了阿什克纳兹的问题。②

① 斯维亚托斯拉夫·T·里赫特于1960年去美国，1962年去西欧进行访问演出。

② 赫鲁晓夫还叙述了他让钢琴家符拉基米尔·阿什克纳兹居住在国外的决定（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20—521页）。

第六章　让人民得到住房

在我担任工作期间，我是关心为我们的公民提供住房问题的。所以，我乐于把我在苏联建筑工业中的活动的回忆记录下来。

当我长大成人时，金属工人对建筑工人有些儿瞧不起，因为建筑业还处于相当原始的水平。事实上，人们甚至不把那些造房子的人看作是专业的技术工人。他们通常不过是只懂得如何把砖头涂上灰浆的农民而已。他们的阶级觉悟水平之低，使他们常常成为金属工人嘲弄的对象。我记得我幼年时听到的一个关于建筑工人罢工的笑话。

工人们决定罢工，因此他们告诉老板他们打算做的事。

“为什么要罢工？”老板问道。“我真的希望你们留下来工作。”

“不，我们拒绝工作。”

“那么你们想要什么呢？”

“我们要求你要么增加我们的工作日，要么减低我们的工资。”

“不，伙计们，我很抱歉。我不可能增加你们的工作日，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星期只有七天。但是，如果你们愿意的话，我将乐于减低你们的工资。”

“哦，谢谢，老板！”农民们说。

这个故事把革命前建筑工业的情况概括得很好，它也部分说明了为什么大多数青年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宁愿做金属工人而不愿做造房子的人。

我在 1914 年结了婚，那时我是二十岁。因为我做的是高度技术性的工作，我立刻得到一套房间。① 这套房间有会客室、厨房、卧室和餐室。革命后好多年，回想起我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有比现在生活在苏维埃政权下我的工人同胞更好的居住条件，使我感到痛心。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甚至不能满足工人们包括那些曾在红军中服役过的人最基本的需要。青年男女在他们结婚之前会到我们这里来，要求给他们一套房间。我们不仅不能给他们一套单独的房间——我们甚至常常不能为他们在宿舍里找到一个地方。这不糟糕吗？

我们已经推翻了君主政体和资产阶级，我们已经赢

---

① 赫鲁晓夫的第一个妻子死于 1921 年的毁灭性饥荒，留下一个儿子列昂尼德（死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一个女儿尤莉娅。赫鲁晓夫在 1924 年再次结婚。他的第二个妻子尼娜·彼得罗夫娜为他生了三个子女：儿子谢尔盖和两个女儿拉达、叶莲娜。

得了自由，但是人民的居住条件比从前更差了。毋怪乎有人问道："这是什么自由？你们答应我们会有天堂，大概我们要死后才会登上天堂，但是我们想在人世至少尝一尝它的滋味。我们并没有提出什么过分的要求。只要给我们一个角落居住就行了。"这种情况在革命后持续了三十年之久。这是丢脸的！我们怎么能让为了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而贡献了一切的苏联人住在蜂房里呢？

当然，在打了一场世界大战、经历了一次革命和内战之后不久，我们还没有能力满足人民的需要，这是可以理解的。巩固我们的国防和建立我们的工业，当然要优先于住房的建筑。可是，在国内战争刚结束时可以原谅的事情，在几十年之后就不能再原谅了。

我们的住房建设进展缓慢的一个原因，是我国人民中的许多人尤其是农民，是从很原始的环境中来的。许多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热的自来水，也不知室内厕所为何物。换句话说，什么时候他们觉得内急，他们就不得不跑到外面去。我认得的有些人甚至不知道可以在室内解决这种内急。他们觉得这样做有失体面。他们习惯于跑到谷仓后面去。

我记得 1920 年当我们的第九库班集团军打败了邓尼金进入了诺沃罗西斯克时，我们的第七十四团向阿纳帕推进，攻下了塔曼。那年五月间，我的朋友彼得·卡比

涅特和我被派往克拉斯诺达尔，参加由我军政治部主办的学习班。①我们被安顿在一所过去是贵族女儿学校的房子里。我们都是充满了战斗精神的士兵，而不是在旧的意义上的绅士。

我们在这个宿舍还没有住上两天，浴室就连走都走不进去了。为什么？因为我们队伍里的人不知道如何恰当地使用它。他们不是坐在马桶上，以便使后来的人仍然可以使用它，而是象老鹰一样蹬在上面，把这个地方弄得一塌糊涂。在我们把浴室弄得不能使用后，我们就在公园附近拉起来。一两个星期后，这个公园已经令人作呕得任何人都无法去散步了。

国内战争后在我工作的矿场里②有一个厕所，但是矿工们把它弄得如此糟糕，如果你不想在下班之后把污秽带回自己房间里去的话，就必须踏着高跷才能走进去。我记得有一次我被派往某地去安装一些矿山设备，看到矿工们住在有双层床铺的营房里。在上层床铺的人从床边朝下小便是常有的事。

---

① A·I·邓尼金将军是白军的司令，在1918年国内战争中攻占了诺沃罗西斯克城。赫鲁晓夫所属的红军在北高加索打败了邓尼金，把他赶到克里木。红军于1920年3月解放了诺沃罗西斯克。那年邓尼金辞职，流亡到法国。

② 担任尤索夫卡的鲁钦科夫矿场的副经理。

有人可能要问："为什么赫鲁晓夫要对我们讲这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这些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是由于人民的文化水平低所造成的。"嗯，我的回答是：这种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人们从他们的原始习惯前进，化了好几十年啊。

当我到莫斯科的工业学院读书时，我对住房和建筑业务变得多少熟悉些了。学院的院长是已故的卡明斯基同志。我很喜欢他。如我在另一处提到的，卡明斯基在斯大林三十年代的屠杀期间被逮捕和处决了，他的妻子作为人民敌人的妻子，也被关了两年。①恰恰就在前几天，卡明斯基的寡妻打电话给我，祝贺我的生日。她的电话使我想起我在工业学院度过的岁月。

我读的专业是冶金学。在我进学院后的第二年，加了建筑工程的课程，因此在我会见学生和教授时，我接触到这个题目。我记得当中央委员会第一次下达招收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时，很难找到愿意转到这个专业的人。我承认我自已对这件事也是不热心的。最初招生是在自愿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应召者寥寥无几，以致不得不强制

① 赫鲁晓夫曾叙述过他转到莫斯科斯大林工业学院的情况（《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4—35页）和G·M·卡明斯基的命运。卡明斯基有一个时期担任俄罗斯联邦的卫生人民委员，在1939年党的全体会议上谴责贝利亚后遭到清洗（《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00页）。

一些人到建筑部门去报名。

1932年当我离开学院成为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后，我同建筑工业发生了直接和密切的关系。我已经叙述过我负责挖掘莫斯科地下铁道的事，为此我在1935年被授予列宁勋章。这种勋章是在1930年设立的。我记得我是得到这个荣誉的第一百一十人。①在五年中一共只有一百一十人被授予列宁勋章。这说明它是如何珍贵。我认为应该如此：奖品的荣誉和价值越高，其效果就越好。后来，列宁勋章授予的范围放宽了，这使它的意义也降低了。

除负责地下铁道的建设外，我还参加了莫斯科市新的面包厂的建设。建筑面包厂是一项历史性的任务。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没有多少厂，老厂都是狭小和肮脏的。它们大半在大楼的地下室，那里充满了污物、蟑螂和其它这类可爱的东西。面是用手揉的。整个过程很不卫生，因此，如果人们看到他们所吃的面包在这种条件下烘烤的话，他们会丧失食欲——或者至少要丧失很多食欲。高尔基很好地描写过这些情况。他一度当过面包师。在有关高尔基生平的电影中出现过我所描述的这些情景。

我记得当我们着手建立大型的工业化面包厂时，我们从英国买了很多现代化设备。后来，忽然有一个专门建筑面包厂的工程师来到我担任党委书记的〔莫斯科〕

---

① 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64—70页。

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工作。①我们按照他的计划造了第五面包厂。后来这个厂用我的名字命名——直到在我的提议下作出决定，禁止用活着的党和国务活动家的名字给企业命名。我提出了这个规定，并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好的规定。

我记得当阿列克赛·马克西莫维奇·高尔基在1932年从意大利回到苏联时，他想看看莫斯科的建设进行得怎样。②正如我刚才说过的，他自己曾当过面包师，因此他对我们所造的面包厂特别感到兴趣。卡冈诺维奇和我带他巡视高度机械化的第五面包工厂，这是按照马尔萨科夫工程师的设计建成的。高尔基看到面包师不再用手工操作；他们只要监督把一个个面包吐出来的巨大机器的工作就行了。高尔基感动得眼睛里闪出了喜悦的泪花。

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对建筑工业的术语和基本原理也越来越熟悉了。不久，建筑专家开始觉得我对他们的专业不那么外行了。我常常提出建议，有时他们加以采纳。当我们着手在莫斯科河上架起一些新的桥梁时，我的工程知识特别有用。现在，每当我经过这些桥时，我自

① 1931年，赫鲁晓夫还没有念完工业学院就被提升为莫斯科红色普列斯尼亚区的第一书记。

② 高尔基于1932年4月从意大利回到莫斯科，当时赫鲁晓夫在卡冈诺维奇之下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

豪地回忆起我对我们首都的建设所作出的贡献。

三十年代，我们在莫斯科解决了三个迫切的问题。我们建造了地下铁道，为城市提供了饮水，并使河道适于航行。在河道工程开始以前，这条河是个道地的污水坑；全莫斯科的粪便都倾倒在河里。我记得布尔加宁和我有一次乘了一艘警艇视察过这条河。① 恶臭是这样厉害，我们后来不得不把我们衣服扔掉。大家都知道，人的粪便是不下沉的，它浮在水面上。所以，净化莫斯科河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我们从靠近依斯特拉镇的一个蓄水池取得饮水。在那时候，我们的方法仍然是很原始的。我们的劳动力大部分是白俄罗斯农民，他们带了他们自己的马、二轮马车、锄头和铁锹来挖蓄水池。

我们建造莫斯科—伏尔加运河时大部分用的是劳改犯。②那个时候，犯人是真正的罪犯，并且按罪犯对待。实际上，我要说，总的看来，我们的犯人得到相当人道的待遇。他们被看作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因此，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应该对他们进行再教育，而不是惩罚他们。（我实在有点嫌恶用“再教育”这个字眼，因为中国人

---

① 布尔加宁当时是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主席，即市长。

② 八十英里长的莫斯科运河是在1932年和1937年间建成的。它在市区北面的伊凡科沃使首都和伏尔加河相连接。

把它歪曲了。在他们谈到“再教育”时，他们的意思是镇压那些抗议毛泽东暴政的人们。）

我作为莫斯科党组织的一个工作人员，认识了许多建筑师。他们使我们在这个地区取得了不少成就，首先是改进了市政设施，后又为莫斯科人提供了住房。当然，我们造的房屋不是皇宫，但革命前莫斯科的住房也不是皇宫呀。

这时的首席建筑师是切尔尼舍夫同志。他是一个仁慈而温和的人——可能有点太仁慈和温和了；别人要他怎样他就怎样。但他很有才智，我对他是极为尊重的。①

在我认识的所有建筑师中，我最中意的是阿列克赛•维克托罗维奇·舒谢夫。②他的才干堪与热尔托夫斯基相比。③舒谢夫和热尔托夫斯基都是苏联建筑学的巨匠。有的人比较喜欢前者，有的人则比较喜欢后者。就我个人来说，我喜欢和尊敬舒谢夫同志。

我记得当我们讨论莫斯科地下铁道第一条线路的站台内部设计时，舒谢夫对列宁格勒著名建筑师弗明设计

---

① S·Ye·切尔尼舍夫从1934年到1941年是莫斯科的首席建筑师，曾参与国立莫斯科大学的整体设计，赫鲁晓夫在下文对这个设计有所批评。

② 舒谢夫是红场列宁墓和附近的莫斯科旅馆的设计人。

③ I·V·热尔托夫斯基设计了莫斯科的旧美国大使馆，它在红场对过的莫霍瓦亚街，旁边是民族饭店。

的红门车站的装饰说了些很有见地的话。① 讨论时弗明也在场。

"我能对这个车站说些什么呢?"舒谢夫说道。"这个方案是由大师弗明院士设计和执行的。但是我不能不说,一眼看去,内部装饰的色调活象一块生肉。"

弗明看起来好象有人浇了他一桶滚水似的。凡是到过莫斯科地下铁道红门车站的人都知道，舒谢夫同志是完全正确的。红门象所有的地下铁道车站一样，是装饰得很华丽的历史纪念物，为此我们从有限的资金中化费了巨额款项。但是，正如舒谢夫同志所说，站台内部涂上了很不悦目的红色，把它形容为生肉的颜色最恰当不过了。

热尔托夫斯基说话也是有点尖刻的。我记得有一次莫洛托夫召集我们最杰出的建筑师来开会讨论兰格曼为国家计划委员会新的办公大楼所设计的蓝图。我出席了这次会议。兰格曼曾为国家安全部工作。可以说，他是雅格达宠爱的建筑师。②

莫洛托夫征求热尔托夫斯基对新大楼设计的意见。

---

① I·A·弗明设计了两个莫斯科地下铁道车站：莱蒙托夫站(以前称为红门)和斯维尔德洛夫广场站。

② A·Ya·兰格曼同弗明合作搞了许多设计。警察头子G·G·雅格达是三十年代清洗的最早主管人和最后的受害者。莫洛托夫当时是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总理)。

热尔托夫斯基总是有点愁眉苦脸的表情，他的脸上皱纹很多。我们常背后称他为教皇。

“我对这个设计能说些什么呢？”他说。“我想我只能说，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很不出色”。他拿起贴着设计图的指示板并把它倒过来。“我们或许也可以把计划委员会的办公楼倒过来造。你们以为如何？我觉得没有谁会看出有什么不同。”

嘿，你可以想象兰格曼怎样感觉。他非常恼火，并进行了辩护。会议结束后，莫洛托夫同我留在后面。

莫洛托夫问我：“你认为我们应当怎样办？”

“我认为我们应当干下去，不去理会热尔托夫斯基的批评，接受兰格曼的设计。当然，热尔托夫斯基对大楼设计的意见是对的；但是，只要造出来适用，外表如何我认为关系不大。如果我们把设计退回去重绘，设计师可能做些象在大楼顶上或正面装上一个妇女雕像这类事情，但是基本设计大概会照旧。”

当这座大楼建筑完工时，从美学观点上看我不认为它有什么令人讨厌的地方。它是一座完全可以使人接受的建筑物。

当我回顾我在莫斯科的最初几年时，我记得这是一个使人激动但是困难的时期。就物质条件来说，人们仍然没有得到很好的供应。我不打算从我作为革命前顿巴斯的一个工人和革命后十余年作为莫斯科一个党的工作

人员在生活方面的对比中作出结论，虽然我不否认我在对比的时候常常闷闷不乐。

革命前当金属装配工时的工资是每月四十到四十五个卢布；黑面包每磅两个戈比，白面包每磅五个戈比。猪油每磅二十二个戈比，鸡蛋每个一戈比。我现在穿的这类优质皮鞋那时只要六到七个卢布。只要指出这点就够了：革命后工资太低，而物价太高。

我们并没有被物质生活上的艰苦弄得灰心丧气。我们常常谈到，我们是怎样“狂热地工作”的，这种狂热甚至意味着放弃我们的业余时间和个人生活——一切都为了社会主义，为了革命，为了工人阶级，为了将来。如果有些人还生活在半饥饿状态中，我们仍然可以展望未来。我们对未来的想象是无限的。我们的梦是好梦，是创造性的和令人鼓舞的梦。它激励我们接受简朴的生活和作出自我牺牲，它激励我们拚命工作，来改进我们公民生活的物质条件。首要的是建筑住宅——建筑、建筑、建筑！

但是，住宅大楼的建筑在三十年代没有得到优先地位，到战后和我担任党和政府的首脑期间它才得到这种优先地位。

在斯大林派我去乌克兰的头几年，我没有机会来关心建筑。斯大林明确地命令我集中力量搞农业，而我也不至于去违背斯大林的命令。但是战后，我别无其他选

择，唯有把我的很大一部分精力和注意力放在被德国占领者破坏得很厉害的基辅的重建工作上。希特勒分子攻占这个城市后不久，就炸毁了基辅的克列夏季克大街。这是德国秘密警察的一个诡计，目的在于使当地人民认为这次爆炸是乌克兰游击队干的破坏行动，从而使基辅市民转而同德国人合作。正当我们解放这个城市时，我亲眼看到基辅的谢甫琴科大学被烧毁。大学的图书馆也被付之一炬。简言之，有很多的重建工作要做。

我请了许多莫斯科的建筑师到基辅来，讨论怎样重建克列夏季克和城里的一些著名建筑物。来的人当中有阿列克赛·维克特罗维奇·舒谢夫和维克托·彼特罗维奇·莫尔德维诺夫。后者是个了不起的建筑师和在国内战争期间就入党的老共产党员。①

我自己也投入了重建基辅的工作。我想使我们的工作成为乌克兰其他城市的榜样。我们召来了志愿人员，后来还召来了德国战俘，来清除瓦砾。这时不仅急需恢复市政设施，而且迫切需要建筑住宅。

我们非常缺少建筑材料，尤其是砖头、灰泥和油漆；但是我们没有因此而停顿下来。在辛勤工作、富有想象力的机械工程师杰拉尔德和阿勃拉莫维奇等同志的帮助

① 莫尔德维诺夫在三十年代莫斯科的重建工作中，特别是在创造住宅区的快速建造法方面，表现得很活跃。战后他是建筑学会的会长。

下，我们在短时期内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负责规划的主要建筑师是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弗拉索夫。

我知道有人批评我们所做的工作，说我们装饰克列夏季克大街所用的是低质材料，但我不以为然。当我们完工时，我认为克列夏季克大街是漂亮的，很多人都同意这点。我一直热爱基辅，我为这条主要街道的重建贡献了我的微薄力量感到自豪。

我在基辅的经验，对于莫斯科正在等着我去从事的工作是有帮助的。

我想我已叙述过我被召回莫斯科的情况。①这正是在我们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作斗争的中期。喀尔巴阡山脉对我们来说简直象个禁区，因为在每片灌木丛后面，在每棵树后面，在每个转弯路口，政府官员都有遭到恐怖分子袭击的危险。

作家加兰被暗杀后，我曾到乡下的一个学生集会去发表演讲。②当我在大会上演讲时，我接到一张字条，说斯大林打电话来找我。我急忙回到在利沃夫为我安排的临时宿舍，同莫斯科通话。

---

① 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46页叙述了他被召回莫斯科的情况。

② Ye·A·加兰是一个积极支持将西乌克兰并入苏联的乌克兰作家，于1949年10月在利沃夫被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暗杀。

斯大林叫我搁下所有的事情，第二天回到首都去。我们的通话是简短的，我开始担心我要倒霉了。我已经讲过，我是怎样在1946年一次歉收之后失宠于斯大林。① 一旦我回到莫斯科时，等待着我的是什么呢？对此我不禁感到焦急。

我想马林科夫和贝利亚知道，我一定会对这种不加说明地突然召回感到紧张。② 即使是贝利亚，有时也会有同情心的——虽然我不想说这是出于人道的同情，因为他的动机完全是自私的。他常常企图讨好一个受到斯大林折磨的同志，以便引诱这位同志支持他的阴谋。贝利亚那时已经在策划接管，想〔在斯大林之后〕当党和政府的首脑了。

马林科夫稍为好一些。他在我动身去莫斯科之前打电话对我说，"不要急，我现在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把你召来，但是我向你保证，你丝毫用不着担心。"

我当真被马林科夫的电话感动了。

当我到达莫斯科，才知道要我接替波波夫担任莫斯科党组织的负责人。

当时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住房建筑。在波波夫和

---

① 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36—243页。

② 马林科夫是斯大林在部长会议的副手；贝利亚负责保安部队。

普罗梅斯洛夫的领导下，首都建筑工业的技术水平低得可怜。①工具都是原始的，很多工作要用手来做。在乌克兰我们可以使用水泥或瓦，可是这里只能用木材。因此，虽然在莫斯科的住房建筑上花了巨大的人力，结果还是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大多数造起的房屋是一层或二层的木板房。

我决定把萨多夫斯基同志调到莫斯科来。他是我们乌克兰最优秀的建筑专家之一。他不大象一个行政领导人员，但却是第一流的工程师，他同科学界有很好的联系。我很喜欢他。就是现在他也有时打电话给我。听到他的声音和一起回忆我们在基辅和莫斯科共事的日子，总是使我感到很高兴。

萨多夫斯基和我同国家建筑管理局的关系很密切。这个局的局长是一位名叫索科洛夫的很受人尊敬的建筑工程师。我和他在三十年代地下铁道工作时就认识了。他和我一样，现在退休了。我和他的儿子见过几次。有一次这个青年人同他的妻子到靠近莫斯科河的别墅里去看他的父亲时，他们坐了一只划艇来看我。索科洛夫的儿子是学建筑的，但他现在是个画家。他和我们的宇宙

---

① G·M·波波夫战后在赫鲁晓夫之前担任莫斯科党的首脑。V·F·普罗梅斯洛夫是土木工程师，是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所属建筑部门的负责官员。1963年他成为执行委员会的主席。

飞行员列昂诺夫合画过几张关于外层空间的画。①他们甚至举办了一次展览会，会上年轻的索科洛夫亲切地送给我一本他的画册。

我到莫斯科后不久，索科洛夫同志和我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的可能性，这个方案是我的老朋友米哈伊洛夫教授一直极力主张的。②我赞成在我们的建筑大会战中使用它，但出乎我意料的是索科洛夫同志不赞成这个意见。我记得，他甚至把他的不满告诉了当时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建筑工作的贝利亚。当然，贝利亚是反对我的意见的；他对政治局其他委员所提出的每一个新事物总是持反对态度。他不止一次地极力取消每一个新的意见，然后改头换面把它作为自己的意见向斯大林提出。

索科洛夫根据什么理由来反对我提出的使用预制钢筋混凝土呢？他的论据是他最近去过美国，并没有看到那里使用过什么钢筋混凝土。他说，如果美国人没有使用，就一定不是先进的建筑技术。

---

① A·A·列昂诺夫和P·I·别利亚耶夫在1965年3月乘“日出”二号飞船进入轨道，列昂诺夫作了第一次空间行走。

② M·I·米哈伊洛夫是交通工程教授和莫斯科普列汉诺夫经济学院的技术科学教研室主任。赫鲁晓夫在这些回忆录的俄文原文中说，从三十年代以来，他就是米哈伊洛夫的崇拜者。战后他曾把米哈伊洛夫召到基辅来，同他商量重建乌克兰首都的问题。

我把我的建议提交凯尔迪什院士——不是〔科学院的〕院长，而是他的父亲——他是我国混凝土方面的最高权威。①他也不同意我的意见。事实上，只有萨多夫斯基支持我。

我决心不让步，并决定把我的建议直接交给斯大林。我应该做好充分准备，因为贝利亚会反对我，他会争取索科洛夫的支持。因此我指示萨尔多夫斯基准备一份详细的、有说服力的报告。我自己也起草了一份说明情况的备忘录，其中提到国家建筑管理局以预制钢筋混凝土没有在国外使用为由而反对加以采用。随后我把萨多夫斯基的报告和我的备忘录一并送给斯大林。

我后来见到斯大林时，问起他关于混凝土争论的事情，并提醒他我所送呈的备忘录。

他的眼睛一直看着我，说道："我已经看过你的备忘录。"

"萨多夫斯基的报告你也看了吗？"

"是的，我全看了。"

"你以为怎样呢？"

"我以为你的结论是正确的，我支持你的建议。"

我很高兴。我们立刻开始把我的建议付诸实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造了两个混凝土的实验工厂。但是能

---

① V·M·凯尔迪什是建筑师和钢筋混凝土结构专家，他是科学院院长M·V·凯尔迪什的父亲。

够从事这项工作的合格的建筑工程师很少，以致我们不得不向莫斯科红色无产者机床厂借来一批专家。

在我们竭尽全力建设这些混凝土工厂期间，我发现我们的水泥工业搞得多么糟糕。我认为卡冈诺维奇应对这种状况负主要责任。当然，卡冈诺维奇不是一个坏的行政领导人，但是他对待人的拿手做法是威吓和高压。他是建筑材料部长，他喜欢向斯大林谎报他的成就。他采用了各种各样的水泥，以便他向斯大林汇报时可以吹嘘一通"新的、改进过的品种"。老实说，我觉得我们从先辈继承下来的优良的老式灰泥，在砌砖上比卡冈诺维奇的新奇混合品种要高明得多。

正当我们在解决建筑材料问题时，建筑形式的问题又冒了出来。建筑师既是美术家，又是技工。他们主张要有最大的灵活性，并且要每幢建筑物都有与众不同的外貌。我也完全赞同灵活性和有特色——但是不能超过一定的限度。一幢建筑物的外表是重要的，但我不认为建筑式样应当使人看了吓一跳，或者看来有过多的外国情调。

在建筑工业中采用预制钢筋混凝土，并没有受到我国建筑师的热烈欢迎，因为我们新建筑的部件开始大批生产了。这意味着建筑师在发挥他们的个人才能方面受到了更多的限制。某些冲突不时出现是无可避免的。

可是，我不想使人造成这样的印象，即我不重视同我打过交道的建筑师。我希望，他们之中如果有人能看到我

的回忆录，就会知道我是非常尊重他们的。我的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曾对你们苛求的话，请原谅我吧。我曾想从你们那里学到尽可能多的东西，我希望你们理解我所处的地位。我们迫切需要为我们的居民建造住房，为了满足需要，有时我们别无选择，只有牺牲建筑艺术上的创造性。

斯大林在晚年时，对决定莫斯科建筑的特色起了他自己的作用。他心血来潮地主张我们应在市区四周造一些摩天大楼。他有一次在我面前说："我们赢得了战争，全世界都承认我们是光荣的胜利者。外国的访问者会蜂拥而至，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如果他们走遍莫斯科找不到摩天大楼，那将会怎样呢？他们会同资本主义城市相比，作出不利于我们的结论。"

在斯大林的命令下，摩天大楼造起来了。在完工时，我们的工程师和建筑师报告说，为了支付建筑物的维修费，房租将不得不定得很高。房租这样高，以致没有一个莫斯科居民能够住得起。因此，斯大林决定把房租减少一点，使房间可以分配给工资高的著名演员、科学家和作家。如果你问我的看法，我要说这整个事情是多么愚蠢啊。你决找不到任何资本家会建造我们这种摩天大楼的。

至于大楼的建筑式样，我对它没有一点好评。就拿国立莫斯科大学来说吧，有些不知道的人从远处走过来，会以为这是一座教堂呢。他看到地平线上出现巨大的尖塔和小圆屋顶，高耸入云。在很远的地方，当中的尖塔看

起来恰象一个十字架。当你再走近一些，整个建筑物群看起来丑陋不堪、形体不明。我并不反对所有的摩天大楼——我只是认为建筑物的设计应当和它的功用相适应。例如，我曾参加制定建造经互会办公大楼的方案，并为此感到自豪。莫斯科大学的麻烦在于它并不能起斯大林为它所规定的作用。他想使人们对这所大学的宏伟产生深刻印象。但这座建筑物恰恰就缺少宏伟。

多么浪费钱啊！用建筑莫斯科大学的钱，我们可以建造容纳比它多三倍学生的普通建筑。

不幸，金钱的浪费在继续。我认为在我国人口中有这么多人迫切需要住房的时候，那些对滥用我们有限资源负有责任的人应该受到惩处。我知道，他们在基辅建成了一座象莫斯科的会议大厦那样精致的建筑。我听说基辅的新建筑甚至比会议大厦装饰得更考究。它花费了几百万卢布呢！我一想到这里就打哆嗦。

我知道有些人认为我在某些建筑上用钱太吝啬了。有一次我碰到一个从基辅来的人，他告诉我说："谢列斯特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说，'赫鲁晓夫不愿让我们在基辅造一个漂亮的地下饭店。'"①我并不怀疑我们的建筑师能

① P·Ye·谢列斯特1963年后是乌克兰党的第一书记，1966年后是政治局委员，1972年他突然被降职。他是"强硬路线者"中最强硬的人物之一，据报道是政治局中主张1968年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主要人物。

够建造一座十分优雅的地下饭店，但是我们在地面上还有很多空地，因此，为什么不用地下饭店造价的五分之一去造一座堂堂正正的饭店呢？

我记起一个故事，我想告诉那些自作聪明的人。一个大主教去巡视他的教区。根据礼节，每个村庄教堂都要敲钟来欢迎他。他最后来到一个市镇，没有听到钟声。大主教责备前来迎接他的神父说："告诉我，神父，你为什么没有为我准备好相应的礼仪呢？"神父回答说，他有十一条有力的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没有举行鸣钟的礼仪。他列举了头十条理由，然后又说："此外，主教阁下，我们教堂里根本就没有钟。"我想提醒那些不通情理的政治家们，在我们进行任何豪华的庆祝仪式之前，最好先弄清楚我们教堂的钟楼上是否有钟。换句话说，在造地下饭店之前，最好先弄清楚我们的人民是否有了足够的住房。

革命之后好几十年，我们仍然处于这样窘迫的境地，这是不能原谅的。

直到斯大林死后，领导核心才真正敢于承认并着手解决极为严重的房荒问题。斯大林一死，新领导成员的地位进行了重新排列，人民开始以更加公开的方式表达他们的需要。在贝利亚被捕和受审后，我们的人民开始感到比较自由了。他们第一次得到机会来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权利，以表达他们的愿望和他们的不满。极为重要的是，人民在苏联应当象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享有他

们不可剥夺的权利。正是为了这些权利，我们成千上万的、甚至上百万、上千万或更多的公民，在斯大林的监狱和集中营里付出了他们的生命。

斯大林死后，贝利亚以释放许多罪犯来表现他的“宽大”。他想卖弄他的“自由主义”。可是，实际上他的这种行动是违背人民利益的，因为这些从监狱里出来的罪犯又重操他们的旧业——盗窃和谋杀。人民开始表示他们的不满，尤其是对住房条件。我记得在新领导开始站稳脚跟后不久，有一次莫洛托夫在主席团会议上作了有关住房问题的发言。当他说到“在莫斯科对住房情况有很大的不满”时，他的声音有点惊慌。

你会觉得他好象是昨天才生出来的。至于人民住在拥挤不堪、寄生虫蔓延等不可容忍的条件中以及常常两家合住一间房，他好象刚刚才知道似的。在一次主席团会议上，我建议对建筑工作进行集中管理。莫洛托夫简直是暴跳如雷地说：“你怎么能够建议这种事情？我们的房荒问题如此尖锐，而你却要砍掉市里所有的建筑部门，把它们置于一个主管当局之下。你怎么会认为单一的机构会比这些众多的机构工作得更好呢？”

很明显，这里有人不了解在建筑方面首先要做的事是什么，也不懂得劳动分工的最新理论和其他先进的管理方法。这是一次大吵大闹的会议。其他同志也表示了他们的看法。最后他们都支持我。当莫洛托夫看到他被击

败时，他撤回了他的反对意见，我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

在为改善住房条件的斗争中，我们取得了虽然缓慢但却是肯定无疑的进展。我们开始认真分析问题的所有方面。例如，拿一套房间应有多大的容积来说。我们建造的房间从地板到天花板有三米多高，但是我们从其他国家的经验中得知，二米半的高度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在芬兰问过一个房主，他恰巧也是一个房屋建筑者，我问他为什么在国外天花板造的较低。他解释说，因为材料很有限，与其加高天花板，不如尽量扩大地面的面积，以便一个家庭可以住得宽裕一些。当然，二米半高的天花板谈不到有什么奢华之处，而从卫生的角度来看，天花板高一些有助于空气的流通，因此贵族们常常建造有着宽大客厅和很高天花板的宫殿。但是如果去问问任何一个家庭主妇，她会告诉你她宁愿有低一点的天花板和大一点的室内面积。所以，我们把我们的建筑标准从三米二改为二米五或二米七。

后来，又产生建造多少套公寓住房、面积多大、以及人们要等多久才能分配到的问题。我不是聋子，我听到了不满的意见。没有一个人为了得到一套房间愿意等十年或十五年，而且人人都愿住有电梯的楼房，正如人人都愿住有浴缸而不只是淋浴设备的房间一样。因此，必须在下面二者之间作出选择：造一千套中等的房间，还是造七百套高级的房间？一个公民愿意立即得到一套中等的

住房，还是愿意再等上十年或十五年以便得到一套高级住房呢？领导层必须从利用现有的物质资源来尽可能满足人民需要这个原则出发。

我认为我们的成绩不错。在八百年中，革命前的莫斯科一共有一千一百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1949年底当我从基辅调来时，已经又新建了四十万平方米。在1950年，我们开始加快建筑的步伐。尽管由于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影子杜勒斯所施加的威胁，在冷战时期我们的资金大部分转用到国防上，但当我在集体领导中工作期间，我们仍能建筑了三百八十万平方米的居住面积。

在我任职期间我们在满足人民需要方面取得了这样的进展，我感到高兴和自豪。当然，有很多困难和弊病——官僚主义、草率和分配制度中的不正当行为。例如，我们有一次发现有些人不是根据需要分配到新住房，而是根据其他考虑。①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不久前我在电视中观看一个叫“我们的邻居”的节目，描写一些人搬进新的住房，而房屋经管人却向他们索取贿赂。我认为敲诈勒索的人比那些被迫付了钱的人更应受到谴责。我们惩罚了所能抓到的任何纵容这类事情的人，我们要求工会和工人们自己负责新住房的分配工作，因为政府工作人员所能做的事很有限。尽管规章制度很齐

---

① 赫鲁晓夫所说的“其他考虑”，大概指利用权力和贿赂。

全，我们并未能清除所有的坏事。但是，正如我所说，我们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如果对我们的公民在维护他们的权利——他们在苏维埃国家所行使的这些权利一直是列宁所向往的——方面提出更高的要求，我们就会取得更多的进步。我国公民必须懂得法律，并且不准官僚主义者在改善人民生活条件的道路上设置障碍。

如果我们的建筑工业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我们也会取得更多的进步。我经常视察准备交付莫斯科居民使用的房屋，而我必须说，工程质量之低劣常常使我感到气愤。墙壁是肮脏的，糊墙纸上有污点。有的时候我们甚至发现一些工人留下来的手掌印，这样我们的刑事侦查人员倒能够追查到谁应该对此负责了。

但是你能做些什么呢？精益求精不是一个晚上可以达到的。只靠跑来跑去发表演讲和发布命令，是不能把事情做好的。很多事取决于工人们自己的经验和所受的训练。我记得米高扬和我有一次去视察一座公寓的内部装修情况。我们碰到一个正在浴室内砌瓷砖的亚美尼亚人。他曾在法国学手艺，是一个道地的美术家。不幸的是，象他这样的工人我们是太缺少了。

我记得当我在莫斯科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有些建筑师从事的工作，他们计划在住宅大楼内的每个房间墙壁上装上一种新的泥灰板，以使墙壁具有隔音

的作用。在为我们公民建造住房的运动中，这是一件大事。我知道人们会说："赫鲁晓夫简直给住房建筑的每一个细微末节迷住了。"可是，我所讲的这些事情并不是细微末节。对于为我国人民建造住宅来说，这些都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情。只有实地从事这一行业的工人才能想象，为了以手工劳动——而且还是不熟练的手工劳动——做好这项涂灰泥的工作，我们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精力啊。涂灰泥工作是留给刚到建筑工地来的、大半是从农村来的同志们去做的。因此，他们把工作搞得乱七八糟是不足为奇的。犹如当圣像画家售出了画得很蹩脚的圣像时常讲的那样。

我一直喜欢那个关于农民买圣母玛利亚像的故事。他到处寻找，但所有的圣像都画得很难看。最后他找到了一张还可以看得过去的像，但是当画圣像的人要价时，这个农民说，"你怎么能为一张长着斗鸡眼的圣母玛利亚像要这样的价钱？你难道没有看见她的眼睛画歪了吗？"画圣像的人回答说，"这不是我的过错。一天晚上有几个青年人在我的店里把画像弄脏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样：正是从农村来的没有经验的建筑工人在涂灰泥时弄龌龊了。而人家还以为他们在为人民造住房、使人民能够住进去呢！

当我作为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的生涯接近结束时，我们政府作出了一个决定，要建造有更多现代化设备的

更好的住房。我同莫斯科的首席建筑师波索欣讨论了这个计划。他就是设计会议大厦的人，我很喜欢这座建筑物。我不理解为什么列宁奖金委员会没有给予它应有的评价。我记得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以支持波索欣。①

我建议他设计一些十六层左右的高层公寓大楼。他提醒我说，我的计划超过了既定的标准。我回答说，仅仅满足于四、五层楼公寓的时刻已经过去了。现在，我们不仅已有可能在公寓大楼里装设电梯，而且可以装设无声电梯——不是那种在砰然一声关门时会震动整幢大楼的那种电梯。芬兰人能够造这样的电梯。我们已经在会议大厦安装了一些这种电梯。

这样，当我是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的首脑时，我们作出了决定，把住房建筑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我以参与了这个决策感到自豪。现在我退休了，我看到莫斯科到处都是这些高层公寓大楼。

在最近一次莫斯科市苏维埃选举期间，我打开了电视机，观看预选大会的实况转播。普罗梅斯洛夫在这次会上发表了演说。他现在是莫斯科市苏维埃的主席。"同志们"，他说，"不久我们将全部建造高层的公寓大楼。直

---

① M·V·波索欣是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的建筑规划设计院院长，1963 年他成为国家土木工程和建筑委员会的主席。他在1961年设计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厦，1962年获得了列宁奖金。

到现在，我们根据上级的指示，只能建造五层楼的住房。”

听到这种胡言乱语使我感到痛心——尤其因为我过去曾经常提拔他和尊重他。我希望有一个机会提醒普罗梅斯洛夫：早在我插手这项工作之前，即1949年当他主持莫斯科的建筑工作时，他就应对臭虫横行、地狱般的住房条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普罗梅斯洛夫所谓的“上级指示”是什么意思？如果他是指赫鲁晓夫，那么我欣然愿意承担我在主持莫斯科住房建筑时所执行的政策的责任。用约翰·里德的话来说，我们为我国人民建造住房的宏伟计划“震撼了世界”。①开始时，资本家对我们的困难加以嘲笑。但是，当我们表现出我们有能力精简五花八门的房屋建筑机关，为房屋建筑的集中管理打下基础，从而着手为我国全体人民盖上房屋并给他们提供舒适的居住条件，这样我们就使资本家们笑不出来了。

① 约翰·里德是美国的左翼记者和俄国革命目睹记《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的作者。他葬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

第七章　让人民得到食物

生　荒　地

现在我退休了，人们常常问我做些什么。我回答说，在春天和夏天，我种菜种花，以填补暴风雨般的政治生涯结束之后在我生活中出现的空虚。两年前，我还去采过蘑菇。在我成为养老金领取者之前，我是从来不会干这种事情的。但有时我感到很无聊，简直要象狼一样嚎叫。纯粹由于无聊，所以我才去采蘑菇。我这样做是为了使自己不致变成狼。我在我的花园里干点活，也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近来我遇到朋友们时，常常谈起农业。偶而碰到几个熟人，在谈话中也常常谈到这个问题。人们知道我对农业有浓厚的兴趣，也知道我在发展苏联农业方面的贡献。自从我在六年前停止直接参与国家事务之后，要及时了解事态发展的最新消息，在我来说是不容易的。虽然如此，即使已经退休，我还是渴望从报纸和广播中了解有关这方面的报道。

今天的天气温暖晴朗。日期是6月14日。按旧历，

这是夏季的开始，虽然根据新历，夏季已经过去了十三天了。①就个人来说，我总觉得春天比夏天好，我从来不同意许多人认为秋天是最好的季节。秋天也许是美妙的，因为人们收获大自然给予的丰盛报酬，也就是人们自己的劳动果实，但是我仍然认为春天是最愉快的季节。

根据气象预报，莫斯科人今天可以有个好天气。昨天下雨了，甚至还有冰雹。我的花园有一部分遭到冰雹袭击，另外一部分则没有受损。有的花被雹粒损坏得很厉害，而离开不到一米远的别的花却没有挨到。冰雹从来不会造成大规模的损害。它对庄稼的危害要比干旱小得多。干旱会使整个国家遭受饥荒，正如战后我们在乌克兰遭受的那样。

这就是自然界的情况，它是无法预料的。因此，农业是经济中最反复无常的领域。每年的收获可以有很剧烈的波动。农业又是经济中最复杂的部门，因为它要同有生命的有机体打交道，而不是光同机器打交道。

我现在想谈谈我们农业的发展状况。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在我作为我国的领导成员之一以及后来成为首脑期间，这个问题同我有着经常密切的关系。

在我的大部分经历中，我对农业一直是积极的。1935年，当我担任党的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时（接替被任命

① “旧历”即尤立安历，俄国革命前一直使用。革命后改用“新历”，即格里高里历。新历比尤立安历早十天。

为运输人民委员的卡冈诺维奇)，我负责莫斯科州的农业。在这以前——我先是党的莫斯科鲍曼区委书记，后来是红色普列斯尼亚区委书记，并于1932年担任莫斯科市委第二书记——我主要是管工业和市政公用事业的。

当我说我从1935年开始负责莫斯科州的农业时，我应该说清楚，我主要关心的是供应莫斯科食品，而不是实际上去管理农业。相对地说，莫斯科州的耕地面积是较少的。这些农场所生产的卷心菜、甜菜、胡萝卜，大都数量太少，不足以满足首都的需要。我们要从白俄罗斯、乌克兰和俄罗斯联邦的其他部分运进大部分食品。

我们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是斯大林在农业集体化运动中战胜他的反对者的直接后果。斯大林用警察手段强迫我们的农民实行集体化。他的政策完全歪曲了列宁逝世时留给我们的遗训。当列宁说只有通过合作化才能发展我们的农业时，他的想法同集体化运动中所采用的斯大林主义手段有很大不同。列宁知道，在把农民组织起来之前，首先必须具备物质的和组织上的基础；必须要有足够的机器和足够的受过训练的干部。只有做到了这些以后才能进行集体化。

但是斯大林完全忘记了列宁所讲的话。即使他自称是列宁主义者，却歪曲了列宁的原则，在没有适当准备的情况下就强制实行集体化。(斯大林很喜欢议论列宁。在他的晚年，当他按捺不住自己的时候，他就放肆地说列宁

坏话。当然，这只是在领导内部很小范围里说的。）

由于斯大林式的集体化结果，使我们在莫斯科经受了严重的供应短缺。国内其他地方则遭受了可怕的饥荒。甚至象土豆和卷心菜这些革命前最便宜的食品，在斯大林的不合理的农业政策下也变得稀少起来。国营商店的货架是空的。由于私人贸易是非法的，农民不能拿任何东西到农民市场上去卖。

我们恢复了配给制——正象国内战争之后和新经济政策①制定之前这一段时期一样。我们恢复了征收粮食制度，不过现在称作税收而已。后来又有所谓“超额完成定额”。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要由一位党委书记跑到集体农庄去，决定集体农民自己需要多少粮食，交给国家多少粮食。常常是连当地的党委也不能决定征收额，而要由国家来为整个地区规定定额。其结果，农民经常要交出他们所生产的一切——简直是一切东西！他们的劳动既然得不到任何补偿，当然也就对集体农庄丧失兴趣。农民转而集中精力经营自留地以养活自己的家庭。

如果我们认真执行列宁的农业发展计划，我们的情况就会好得多。不幸的是，列宁的理想由一个野蛮人斯

---

① 1921年，列宁制定了新经济政策，鼓励私营企业，以作为恢复士气和生产率的一种办法，特别是在农业生产方面。新经济政策继续到1926年，即列宁逝世后两年。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0—21页。

大林来付诸实施。其必然的结果是使我们的国家受到很大损失。许多无辜的人死去了；这些人根据党的路线到集体农庄去工作，并且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几十万人丧失了生命——甚至可能有几百万人。我说不出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没有人统计过。我们只知道死者的数字非常大。①

我国的某些理论家甚至文艺界人士，在对待集体化问题上采取了斯大林主义的立场；他们用斯大林的眼光来看集体化。这些人现在说，集体化代表了一个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过渡时期，在这期间农村从资本主义生产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他们说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会有牺牲——并且认为只要社会主义在前进，死人就是正当的。

真是胡说八道！这是为屠杀所作的愚蠢的粉饰，也是对列宁主义政策的歪曲。不幸的是，在我们的作品中，不论是历史作品和小说作品，都可找到这种粉饰。我所提到的一些作者现在还健在，并且仍在用同样的观点写东西。

虽然如此，我想历史学家总有一天会对集体化问题作出正确分析。我确信，当这一天到来时，历史学家将会

---

① 由于斯大林用大规模的警察恐怖手段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他把钟摆从新经济政策的比较宽容和自由化的一端推到另一个极端。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71—75页。

找到充分的材料来作出客观的评价。除了我们苏联的经验外，他们将能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其他国家的集体化事例中找到佐证。总的说来，这些国家的集体化是以列宁主义原则为基础的，因此取得了伟大成就。当然，也有叛乱和破坏——我特别想到罗马尼亚。①但是，几乎没有任何国家象我国有那么多的受害者。甚至别的国家在集体化中所遇到的最大麻烦，也远远比不上苏联在斯大林统治下所发生的那些事件。

1938年，当我调到乌克兰时，集体化已经完成，农业已经恢复起来。我们正在大量生产农业机械——虽然还不够满足乌克兰的全部需要。

我到达时，威廉斯院士的草田轮作理论已经采用。根据威廉斯的理论，庄稼应同三叶草或其他草轮作，这些草根所积蓄起来的氮将使土壤肥沃，从而可以充作天然的肥料。

反对威廉斯的理论的主要人物是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他主张使用无机肥料。普里亚尼什尼科夫不否认三叶草和其他草能够改良土壤，但他认为我们的农民首先应当依靠无机肥料。他坚持认为我们应当制造专门的

---

① 罗马尼亚的集体化是个渐进的过程，是分阶段进行的。它虽然引起了局部的骚动和反抗，但没有发生重大的或普遍的暴乱。

机器来处理土壤。因此，普里亚尼什尼科夫主张浅耕。

威廉斯毫不犹豫地反对浅耕。他说，主张这样做的人是“社会主义农业的破坏者”。有一位科学家、乌克兰的农艺师设计了一种专门浅耕的犁。我记得他是在萨拉托夫的研究所工作的。嘿，他被戴上人民的敌人和破坏者的帽子。后来他被逮捕、判罪和枪毙了。

简言之，威廉斯完全战胜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和其他反对者。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本人未遭迫害。至少他活过了恐怖的斯大林主义年代，于战后年老死去。不过，他在耕作问题上的理论始终未被承认和接受。①

为什么威廉斯能压倒普里亚尼什尼科夫呢？为什么大多数人包括斯大林在内，赞成威廉斯呢？原因丝毫不

---

① V·R·威廉斯虽然有个英国人的姓，但他是出生于莫斯科的一名党员。这个农艺师和土壤专家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和农业部的官员。1962年，赫鲁晓夫发布一项命令，否定威廉斯在乌克兰推行的草田轮作制。

D·N·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是农业化学和植物生理学的专家，于1948年去世。

本节所提到的那个未指名的农艺师大概是N·I·瓦维洛夫院士，他曾因农业政策问题同T·D·李森科争执，并以英国间谍的罪名被捕。他被关在萨拉托夫附近的一个劳动营里，后死于莫斯科的监狱。

注：本节补充了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41—242页中关于浅耕问题论战的简略记述。

是对两种理论的优缺点作了客观分析。相反，对争论结果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所需投资的多少。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的无机肥料理论需要巨额投资来建设化肥厂和制造新机器。当时我们缺少资金，因而威廉斯的理论较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威廉斯的草田轮作理论取得胜利的缘故。关于这个问题，政府那时甚至还专门发布了法令。

就个人来说，我曾对威廉斯表示过最大的敬意。有谁知道我曾说过多少赞扬他的话呢？我对他亲自进行过了解。他是我们首批入党的院士之一。他不仅在意识形态方面被视作一位战友，而且还以一位科学家而颇受尊重。他是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他的理论的，因此，我不能为了他的草田轮作理论而责怪他。

但是，威廉斯的方案事实上行不通。即使在整个乌克兰始终如一地实行他的方案之后，我们的农业生产仍无起色。我们的产量同过去一样。正如农民们所常说的那样，事事都得靠上帝。

现在清楚了，你想得到高产，就必须使用无机肥料，更不用说土壤处理和灌溉了。

简言之，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是对的，而威廉斯是错的。普里亚尼什尼科夫生前从未被接受的理论，比威廉斯的理论更完整和更现实。它将意味着我们农业中的一次真正的革命。回顾过去，我感到威廉斯的草田轮作理论给乌克兰农业带来了很大损害。尽管我一直赞扬威廉

斯并支持他的方案，但我应该否定我自己的话和承认错误。当我们为时已晚地承认了普里亚尼什尼科夫比威廉斯更接近真理以后，我们从档案堆里把普里亚尼什尼科夫院士的笔记本翻了出来，并采纳了他的理论。

我已经回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可怕的破坏。没有必要再向任何人重复这些事。我们的人民都还记得希特勒占领者在他们所到之处留下的废墟；从高加索到伏尔加格勒、萨拉托夫和莫斯科，一直到列宁格勒。白俄罗斯全部地区和俄罗斯联邦广大地区的工农业都荡然无存。战后最初几年里物价飞涨，再一次使用了配给卡。

在乌克兰——我是那里的共产党第一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我们处于灾难性的境地，特别是1946年和1947年。我们除了失去了优秀的青年人和大量设备外，又遭到旱灾和歉收。结果发生了饥荒和人吃人现象。

乌克兰的情景是可怕的，摩尔达维亚也是如此。我记得柯西金曾处理过食物配给问题，斯大林便派他到摩尔达维亚去。①柯西金回到莫斯科后，就向斯大林报告摩尔达维亚普遍发生饥荒，人民受到营养不良的折磨。斯大林大发雷霆，对着柯西金叫嚷起来。

过了很久以后，当斯大林看到柯西金时总要大笑起

① 现任总理A·N·柯西金当时是副总理和政治局候补委员。

来并说，“哦，哦！这不是‘营养不良兄弟’吗！”因为柯西金长得很瘦，斯大林才这样称呼他。斯大林给柯西金起了这么个绰号后，我们圈子里的其他人也就很自然地学他的样。不少人很快就开始称柯西金为“营养不良兄弟”了。

甚至在1947年中央委员会全会之后，我们继续遭到严重的挫折和匮乏。① 小麦的平均年收购量停留在约二十亿普特(三千六百一十万吨)的水平上。有一段时间我们甚至不能达到二十亿普特的指标，只好定为十八亿七千万普特。这个数量虽能满足我们当前的粮食需要，但却不能为我们留下必需的储备粮。

为什么我们的农业如此落后于工业呢？为什么我们竟会听任变幻无常的大自然和我上面所提到的产量波动的摆布呢？斯大林应该承担大部分责任。他教导我们把农业看成是我们经济中的三等部门。

在斯大林看来，农民只是渣滓。他毫不尊重农民和他们的工作。他认为要使农民干活的唯一办法就是向他们施加压力。在斯大林领导时期，国家所收购的粮食都是从农村强征来供养城市的。

农民出售自己产品所得的价钱，比这些产品的成本还低。有时，甚至从集体农庄运送产品到国家收购站的运

① 1947年2月中央委员会全会关于农业问题的讨论，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35—239页。

输费用也高于农民出售这些产品所得到的收入。例如，斯大林所规定的土豆收购价格简直是象征性的。一公斤土豆国家常常只付给三个戈比。

无怪乎农民不关心集体农庄的工作。集体农民陷于最悲惨的状况。有些人一个工作日只得一个戈比左右——有些人可能一无所得。这听起来好象有点奇怪，是吗？①

农庄的干劲和纪律下降到了最低点。如果土豆管理得好，可以成为高产作物，但是我们的农民丝毫鼓不起劲来。他们为了勉强维持生活，不得不在自留地里种点蔬菜来养活自己。

斯大林除了给农产品规定了荒谬绝伦的低价外，他还提出要对集体农民在私人果园所种的每一棵果树都征收一种特别税。我记得有一次我在同斯大林谈话时曾谈到过这种税。我告诉他，我去看过一个住在杜博维查的表姊妹。她对我说，她打算在秋天把自己的苹果树都砍掉。

"为什么？"我叫喊起来，"你的苹果树不是长得很好吗？"

---

① "工作日"是集体农庄的劳动计算单位。收获之后，收益按工作日总数来均分。每个农民按他所劳动的工作日数分得报酬。因此，集体农民不象工厂工人，他们没有固定的收入。遇到歉收，他们就可能一无所得。

“是的，我知道，但是有了这种新税，我就种不起苹果树了。你瞧，邻居的孩子们常常跑过来摘苹果，我自己根本收不到全部果实。”

当我把这个故事告诉斯大林后，他问我对这种税有什么想法。我便告诉他，我认为我们应当让集体农民继续在自留地里种植果树而不受处罚。斯大林根本听不进这些话。① 在斯大林生前对私人果园的征税从未停止过。为什么？因为斯大林认为集体农民象绵羊一样，羊毛长到一定长度，就必须剪去。斯大林对他们既加伤害，又加侮辱。他所定的低价已经剥夺了农民在集体农庄上生产粮食的任何物质刺激。现在他又在剥夺他们在宅旁园地上生产少量额外食物的积极性。

谈到刺激——我应该说是缺乏刺激——我记得战后我在莫斯科工作的第一年里，曾到叶戈廖夫斯克州去视察。我特别想去参观一个由城市来的党员所管理的穷得可怜的集体农庄。这个党员很聪明，受过良好教育，但他是学法律的，对农业一窍不通。他是被当地党委派到农村去的。

---

① 赫鲁晓夫在他任职期间的公开演讲中，曾更详细地讲过这个故事。他说这次同斯大林交谈是在 1946 年。由于赫鲁晓夫建议取消这项税收，斯大林怒气冲冲地称他为民粹党人。这个名称是指十九世纪民粹党改良主义者，布尔什维克蔑称他们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

“告诉我”，我问道，“你们这里最好的作物是什么？”

“燕麦”。

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耳朵。我知道这个集体农庄的土壤沙土很多，勉强可以耕种。“你是想告诉我你们这里的燕麦获得了高产吗？”

“不，我们的产量很低。”

“那么你为什么说燕麦是你们最好的作物呢？”

“因为它最容易收割。”

这个人的冷言冷语是由于缺乏物质刺激。他的工资同他的农庄的产量毫无关系。你们也许会说，“赫鲁晓夫抓住一个没有受到宣传鼓动感染的党员的个别例子来做文章”。

好吧，我可以向你们保证，这个集体农庄主席并不是一个例外。他虽不代表所有的农庄主席，但我遇到的象他这样的人相当之多。共产党员们从城市里被派来帮助农民，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工作一点也没有劲，因为没有任何措施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不幸的是，物质刺激没有被普遍用作鼓励农业生产的手段。给予集体农民的报酬只有一小部分是根据他们的生产率来决定的。

我知道，我公开提倡物质刺激，就会招致某些自命不凡的人们的指责。他们会说，我们不应当靠金钱来调动人民的积极性，而应当靠意识形态方面的因素。这是胡

扯。我这么大年纪了，我从切身经验中深深懂得，如果大多数集体农庄领导人都拿一样的工资，他们就不会为了改进生产而去冒风险。斯大林不承认这个事实，在我们领导层中有些人也是这样。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最主要应靠劳动生产率。要使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一个国家就必须从每个工人那里取得最大限度的产量。当我说“取得最大限度的产量”时，并不是意味着要采用强迫手段。

我们的农业在战后跟不上其他经济部门的另一个原因是官僚主义太多了。事实上，这个问题在战前就已存在。1938年我在乌克兰时，不得不同一个臃肿的、效率低的农业管理机构打交道，我记得我是多么气愤和恼火啊。庞大的农业人民委员部组织得很松散，浪费了大量的人力和资源。所有的事情都必须通过部一级来决定：种些什么，什么时候种，怎么种法，什么时候收割，等等。

我一点也不否认行政管理的必要性。我没有忘记列宁的话："社会主义就是管理"，但是列宁所想的是管理人员必须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倒过来。① 当我战前和战后在乌克兰的时候，我们接到部里的简报和指示，几乎总是同我们所认为应该做的事情唱反调。有时部里的通知完全是浪费我们的时间和精力。例如，当我们的甜菜种子已经播种到地里之后，部里却送来一件关于如何把

① “社会主义就是管理”：俄文这句话有时译作“社会主义就是核算”。

甜菜播种好的指示。这种事情不止一次发生过。

每个庞大的行政管理机关总是要设法表明自己的存在是有道理的。为此，它炮制出一封封的电报，到处派出视察员，来来回回地重复电报中提过的事情，检查本部经费的使用情况，以及发出诸如“只应喝煮沸过的水”等的陈腐无味的通告。

我记得当米高扬担任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时，有一位名叫斯塔罗茹克的出色的农艺师协助他工作。①斯塔罗茹克同志常到乌克兰来访问，指导我们如何种甜菜。他是这方面的专家。他来之前先发给我们一份由米高扬签署的长长的电文，详细指示我们应该作些什么。然后，他在基辅露面。而我必须对他说，“斯塔罗茹克同志，我们已经样样按照你的指示做了。事实上，我们已经做完了所必须做的一切。你来这里辅导些什么呢？”

我也问过我自己，既然我们自己完全有能力种植和收获这种作物，委员会里还设置一个甜菜专家有什么意思呢？答案很简单：委员会象一切官僚机构一样，不得不设立许多不必要的职位并大搞文牍主义，而不管在这方

---

① 米高扬于1937年开始任副总理，在1937—1955年和1957—1958年再度担任此职。在他的整个经历中，同食品生产有密切关系。他当副总理以前是供应人民委员和食品工业人民委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委员会和委员改称部和部长，虽然赫鲁晓夫习惯于交替使用这些名称。

面浪费了多少人力和财力。

我在乌克兰工作期间，以及后来被调到莫斯科并负责农业工作时，我从第一手材料得知，我们的研究机关工作很不得力。我记得1950年我曾到拉缅斯克区视察一个专门研究土豆的研究所。我同负责这个研究所的一位妇女谈话。关于这个研究所的"成就"，她给了我一个最可悲的报告。

"你们这里的土豆试验田的产量是多少？"

她回答说："每公顷六十公担〔每英亩二点七吨〕。"

"什么！？简直可怕！你难道不知道附近有些农庄每公顷已达到了一百至一百二十公担么？如果你们的产量只有他们的一半，怎么能指望你们去指导农民们呢？"

可怜虫，她没想到会得到这么一个反应。她含着眼泪，抽泣着说："我们那么高兴地巴望着你的来临，现在你来了，却对我说这样不愉快的话。"我想，过去从来没有任何人老实告诉过她，她这个研究所的工作做得多么糟糕。

在这里，有学问的农艺师们在一公顷地上生产六十公担土豆。可是，根据当时报纸的记载，在西伯利亚有一个名叫乌特金娜的普通农妇，在一公顷地上收获了一千公担土豆。（当然，无法知道这些事迹的真假。经常出现许多夸张、甚至欺骗现象。）不过我从亲身的经历中得知，1938年在乌克兰有一个集体农庄女庄员由于在每公顷地上生产出近七百公担土豆而获得列宁勋章。

问题是：我亲眼看到许多政府办的研究所都严重地不称职。国家不管这些机构的工作做得是好是坏，一律给以经费，对研究人员也一律付给工资。

在这些研究所内人浮于事，有一种不负责任的气氛。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的助手谢甫琴科告诉我他同不久前去世的、著名的哈尔科夫农艺师尤里耶夫的一次谈话。①谢甫琴科同志走进尤里耶夫的书房，看到他正在沉思。

"你一定是在思考什么重要的科学问题吧，"谢甫琴科说。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尤里耶夫回答道，"我正在考虑如何清除一位研究员。他得过农业科学的博士学位，但他是个毫无希望的懒汉。可是规章条例使我不好开除他。"

当然，我完全拥护那些保护人民免受行政上和官僚主义迫害的规章条例，但是有某些不负责任的人利用这些条例来损害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我是指那些懒汉、江湖骗子和拍马的人。他们塞满了我们的研究所，使人员编制大大膨胀，并吞噬着国家经费，而对国家却毫无贡献。他们是一大堆沉重的包袱。我在乌克兰和莫斯科工

---

① A·S·谢甫琴科长期以来是赫鲁晓夫的主要助手和代笔人。1964年他为苏联版的《五月里的七天》写了序言。V·Ya·尤里耶夫是一个选种家和植物生理学家。他是哈尔科夫选种站的主任。

作时期深深体会到，我们应该清除这些人，腾出位子来给那些有真才实学的人。他们将在解救长期泥足深陷的苏联农业的事业中作出真正的贡献。我认为，只要有正确的技术指导，我们就能提高农民的技能，从而提高他们的劳动生产率和生活水平。

当我看到我们的农民如此缺乏知识和经验，常常使我气得要发疯。我们所生产的肥料质量低得惊人，浓度往往只有百分之十，但是这总比没有好。我们把肥料运到集体农庄去。后来怎样呢？农民们常常把它丢在火车站旁边烂掉。两三年之久，这堆东西越堆越高，到了冬天给孩子们当作一片极好的滑雪坡。为什么农民不使用我们送去的无机肥料呢？因为他们对它一无所知。他们所懂得和相信的唯一肥料是大粪。为了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我们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

这就是战后年代我们农业的可悲状况。

对于我们所面临的一些问题，其中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搞专业化。在斯大林的晚年，领导核心在这方面采取过一些尝试性的步骤，但都是些错误的步骤。例如，为了管理机器拖拉机站曾设置了一个专门的部。①

第一批拖拉机站是很久以前按照敖德萨地区一个农

① 机器拖拉机站是国营的重型农机设备中心。它为附近的农庄播种和收割，并取得农庄的一份收成作为交换。

艺师的建议而设立的。①人们认为这是切实可行的进步措施，后来在全苏联加以推广。但是，正如许多其他措施只有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和特定的地区才具有实际的效用一样，机器拖拉机站也远远不是完美无缺的。这种制度剥夺了农民在自己农庄上工作所需的机器，由此割裂了农业各部分之间的联系。换句话说，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却丧失了他们的生产工具。

建立单独的机器拖拉机站是莫洛托夫的主意，并得到斯大林的批准。

斯大林死后，新的领导核心派我主管农业。我们很快发现，农业落后于其他经济部门的情况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最初我们规定二十亿普特〔三千六百一十万吨〕小麦作为国家收购的指标。这个数字大体上是根据我们在斯大林时代的收购量而制订出来的。当时的小麦收购指标是每年十二亿至十八亿普特。可是，我们很快就发现，甚至三十亿普特也不够满足我们的需要。

你可能会问："为什么在斯大林时期二十亿普特就够了，而斯大林死后没有几年，却连三十亿普特也不能满足需要了呢？"

道理很简单。斯大林一死，人民都张开了嘴。他们开始更加坦率和公开地提出自己的需要，而不必神经过

① 苏联的第一个机器拖拉机站是1928年在敖德萨附近的塔拉斯·谢甫琴科国营农场创立的。

敏地担心背后是否有人正在打算把他们投入监狱。因此，问题不是人们对粮食的需求大大增加，而是人民从此可以更加自由地说出自己的需要。

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随时随地大声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不幸的是，过去的斯大林主义幽灵仍然笼罩在人民头上；还有抓人和迫害的事例。不过气氛比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要好些了。

斯大林死后不久，我们就召集了一次特别会议。马林科夫企图迫使我作一个关于农业的报告，但我拒绝了。我不愿意作这样一次发言，为我们所应从事的工作提出具体的建议。我心里也想好了一些建议，但还缺乏具体论据来支持这些建议。我这里应该提一下，当时马林科夫在主席团里比我们这些人更有势力。①可是，其他同志并不认为他是农业方面的专家。我就知道他在处理农业政策时表现得知识多么贫乏。甚至马林科夫自己也承认他在这方面的局限性。

后来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体会议，集中讨论农业问题。

---

① 斯大林逝世后，马林科夫曾在短时期内担任党的第一书记兼总理，虽然他被解除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职务。当马林科夫引人注目地占有党和政府的首脑位置时，赫鲁晓夫却放弃了他的莫斯科州第一书记的职位。据当时官方宣布，他这样做是为了“集中精力于他的书记处工作”。赫鲁晓夫正是在书记处树立起他的权力基础来向马林科夫进攻的。

很多年以后，这些会议被认为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我被指定作主要发言。①我们终于对农民不仅需要政治鼓励而且还需要物质刺激的问题展开了讨论。我所说的“物质”刺激，是指以真正的经济利益来补偿他们的额外劳动和奖励他们增产。中央委员会的委员有机会对这个问题自由地发表意见。

我们调整〔提高〕了土豆和蔬菜的收购价格。虽然新价格从根本上改善了集体农庄的收入状况，但是它本身还不足以作为刺激生产的适当的物质手段。我们还通过一项决议：取消对私人果园和菜园征税。我记得中央全会后不久，马林科夫和我在克里木度假，我建议我们到附近的集体农庄去看看。我们遇到一位农民，他一味称赞我们取消对私人生产征税的决议。“你们取消这种税是明智的”，他说：“不幸的是，对我来说已经太迟了。就在中央全会开幕前夕，我砍掉了我所有的桃树。”

后来我们又废除了强制交售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农民必需向国家交售自留地产品中一定数量的肉、蛋和其

---

① 在这几节里，赫鲁晓夫谈到一系列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已故独裁者的自称的继承人们以欺骗手段争夺着权位。斯大林是1953年3月去世的。8月，最高苏维埃召开全会讨论预算问题，农业也是议程上的一个重要项目。9月，中央委员会召开全会特别会议，专门讨论农业问题。那时赫鲁晓夫成功地取代马林科夫成了党的第一书记。

它东西。但是，迄今为止中央委员会最重要的成就，是我们决定发动的垦荒运动。①我们在寻找增产的办法时想出了一个主意，把苏联东部一望无际的荒芜但可耕的土地开垦出来。我不知道为什么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这个计划。在斯大林时代，我们在目标方面已经很难取得意见一致，可是，斯大林出于某种从来没有说明过的原因，顽固地反对开垦新的土地。他也许认为，如果不准农民耕种新的土地，他们只好耕种现有的土地，结果，他们不得不改进技术和增加生产。

我听说，在哈萨克的边远地区种植谷物有很大的前途。因此在全会期间，我同哈萨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同志交谈了一下。我问他，在他的共和国里有多少土地宜于开垦，以及哈萨克人的农庄产量如何。从他的回答里，我听得出他对我是不诚恳的。他故意把扩大耕地的可能性估计得很小。换句话说，他显然想使我相信，在哈萨克只有很少一部分生荒地是可耕的。他说，我们只能再扩大三百万公顷〔七百四十万英亩〕多一点的耕地。

说实在话，我听了以后还是感到鼓舞的。如果平均

---

① 1954年2月和3月的另一次全体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采纳了赫鲁晓夫的建议，从1954年到1960年在苏联中亚细亚和西伯利亚开垦了一亿零一百二十万七千英亩土地。

每公顷收获十公担〔每英亩八百九十二磅〕，我估计我们可以收到三百万普特以上的小麦。这个数字在当时是不可小看的，就是在今天也还是不可小看的。

我同沙亚赫麦托夫谈过后，又同哈萨克各州的党委书记谈了话。他们比沙亚赫麦托夫更了解自己土地的潜力，看来他们同我的谈话比他诚恳。这些哈萨克人告诉我，如果给他们优质的种子，他们可以获得每公顷至少十五或十六甚至二十公担的产量。

我相信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把哈萨克的生荒地开垦出来。农业部和国家计划委员会的农艺师们，给我提供了关于其他地区生荒地的更多情况，特别是阿尔泰边区和奥伦堡州的情况。

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号召把开垦荒地的面积扩大八百万到一千万公顷〔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英亩〕。尽管第一书记沙亚赫麦托夫反对，我们还是提出了这个数字，他一直坚持要定一个比较保守的指标。

全会之后，我设法查明为什么沙亚赫麦托夫采取这样一种〔挡路派〕态度。我得出的结论是，他试图阻止垦荒运动是有政治动机的。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领导核心的其他同志也同我一样——沙亚赫麦托夫染上了民族主义病菌。由于哈萨克人口稀少，他唯恐扩大垦荒以后将会引起大量〔非哈萨克族农民〕涌入他的共和国。我们决定以波诺马连科同志取代沙亚赫麦托夫。他是一

个有经验的和可靠的领导工作人员。他是一个铁路工程师，受过这方面的正规教育，但他对农业管理和政治工作也十分称职。我们还撤销了他的同事、哈萨克中央委员会第二书记阿方诺夫的职务，并由勃列日涅夫取代他。勃列日涅夫曾担任摩尔达维亚党中央第一书记。①

我们虽然在1953年作出了扩大耕地面积的正确决议，但是在领导层里曾出现过犹豫和阻力。象莫洛托夫这类人就对这个主意百般挑剔，提出各式各样的问题，并要求作出专门说明。莫洛托夫是个改良派和保守派；他对农业一窍不通，但这没有妨碍他反对垦荒运动，说这个运动时机不成熟和花费太大。

莫洛托夫和其他人说，我们应当集中精力提高现有耕地的生产率。他们极力主张农业的“集约耕作”，而反对“粗放耕作”。但是他们的论据很空洞，因为提出这些论据的人并不知道他们自己在说些什么。他们不懂得集约耕作意味着为将来而发展我国的农业，但我们今天就需要面包，不是明天。

原则上，我赞成农业的集约发展，但是这需要非常先进的农业劳动力和巨大的物质资源。我们这两者都没有。

---

① P·K·波诺马连科和L·I·勃列日涅夫都是赫鲁晓夫的宠儿。他们在1954年2月取代R·O·沙亚赫麦托夫和I·I·阿方诺夫（这两人都是哈萨克人），成为哈萨克党的首脑。

那些提倡集约耕作而反对粗放耕作的人想错了，他们以为我们可以绕过或缩短积聚足够资源和合格人才的过程。

除了那些顽固坚持集约耕作的人以外，我们还要对付另一些人的反对意见。这些人代表哈萨克人口较密各州以及为开垦生荒地需要从他们那里拨出资源的地区。

但是，即使有这些不同意见，全会的决议还是付诸实行了。我们应当做出决定，是否要在1954年就立刻征集人们到生荒地去工作。有许多工作要做：建设居民点，破土开犁，但是我们应当派哪些人去呢？

我向同志们提出下面的建议："向我们的苏联青年发出呼吁，向我们的共青团发出呼吁。我确信成千上万的青年会响应，因为这是有关为我们国家提供粮食的大事。我们要使他们回忆起战时的艰苦岁月和牺牲。需要有这样的牺牲精神，虽然开垦生荒地不会象打仗那样艰苦。我们青年人的劳动将得到报酬，并且当他们知道是为我们国家的福利和为满足我国公民对面包、牛奶、肉类的需要而作出贡献时，他们将得到最大的精神上的满足。

我们可以从军用储备中拨出帐篷来给去哈萨克的青年们住。我们还要给他们提供拖拉机，虽然这意味着要动用那些原已决定分配给其他共和国的新拖拉机。已开垦地区的集体农庄应当尽量使用自己已有的机械。"

我的建议被接受了。我记得报名到生荒地去的青年

们在克里姆林宫最高苏维埃大厅里举行了一次群众大会。领导层提议我去作一次讲话。有些青年也讲了话。我记不得他们说了些什么，但我对他们脸上洋溢的热情和喜悦记忆犹新。这些青年人准备为祖国、为社会主义作出一切牺牲。他们的贡献是永远不会被遗忘的。

青年突击队在早春融雪前开始到达哈萨克。我看过一部电影，描写拖拉机拖着满载建筑材料和个人行李的雪橇在雪和泥泞中行进的情况。这些青年象行军中的士兵一样住在帐篷里。

我要求领导核心的同志们让我到哈萨克去作一次旅行。我想更深入地了解那里的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条件如何。同志们同意了，于是我就飞到了那里。

这次旅行使我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我国的这一部分是个什么样子。辽阔的土地使我深深感到惊异。有时候我要坐上几小时汽车，才能到达一块耕地旁由帐篷组成的居民点。有时我在汽车里看到拖拉机，就象在地平线上蠕动的一粒小点。哈萨克的人们常说，一个拖拉机手可以在耕地的一头吃早饭，在另一头吃午饭，然后再回到早晨出发的地方去吃晚饭。

对于这些来到哈萨克的青年们来说，要习惯草原上的寂寞生活是极不容易的。他们必须经常提醒自己，他们到这无边无际的旷野中来是为了祖国的利益。久而久之，他们以自豪和庄严的态度接受了这种寂寞和艰苦的

生活。

当然，有不少关于姑娘供不应求的有趣故事和笑话。我记得在我访问过的一个居民点里，只有一位女青年。一个小伙子——他显然是这群人中爱开玩笑的人——说："赫鲁晓夫同志，这里的生活太乏味了。我们这里都是些男子汉，可是只有一个姑娘。我们所有人都追求她，但她对我们一个也不睬。赫鲁晓夫同志，请你给我们多派些姑娘来吧！"

我们都笑了起来，那位姑娘也笑了。我回到莫斯科时，我向共青团领导转达了我所听到的怨言。"搞一次突击性的工作来招募更多的姑娘吧，"我说："告诉她们，在那里她们不论是找工作还是找丈夫，都不会遇到任何困难。"

正如我所预料到的，这个论据起了作用。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去了很多男人，因此现在仍然是女多于男。结果，年轻妇女很难找到丈夫；但是在生荒地却有的是未来的丈夫。

几年之后当我再到哈萨克去的时候，看到过去只有帐篷的地方现在到处都是带花园的住宅。农庄看起来也象永久性的居民点，而不象旷野里的哨所了。

生荒地的谷物产量平均每公顷十二至十四公担〔每英亩一千至一千三百磅〕。我们认为象这类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地区能有这样的产量已经很不错了。据我们的经济

学家估计，只要每公顷的产量达到五公担，就足以使那里的农庄赢利。这个事实证明，生荒地的的确确是我们的地下宝藏；我们的投资收到很大的回报。

我们在生荒地采取了一些组织上的措施，例如把它们另立为一个单独的州，以切利诺格勒为首府；①给予生荒地地区以行政自治权；并由中央政府直接拨给经费。我们不愿意把投资通过共和国〔即哈萨克〕政府或计划委员会拨下去，因为我们担心拨给生荒地的资金会被挪用到哈萨克其他经济部门中去。这种可能性是一直存在的，所以我们决定越过共和国政府。

正如举办任何大规模活动时所不可避免的那样，生荒地也不是一切顺利的。例如，有些准备进行耕作的土地后来发现非常贫瘠。不过这种困难常常可以排除。哈萨克有的是土地，因此如果发现一块地不肥沃，我们就干脆把它放弃，另找一块新地。我们还派了代表团到加拿大去，那里种植小麦的土质同哈萨克很相似。我们的代表团从加拿大人那里学到不少如何在需要冒很大风险的地区种植小麦的经验。

运输问题的解决需要时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收下来的谷物就堆在田边。我们连装麦子的口袋都不够，

---

① 1961年3月哈萨克的一个州首府阿克摩林斯克改名为切利诺格勒。这个字源出于俄文“切利纳”，意即生荒地。

卡车也不够用。公路十分颠簸，许多谷物从车子旁边掉下来丢失了。但过了一些时候，我们修建了公路、铁路和谷仓，于是麦子可以很好地贮存，并尽快运到国家收购站去。

有一次我到生荒地去视察时，同一位机器拖拉机站的农艺师进行了一次非常有意思的谈话。他是西伯利亚人，却有一个典型的乌克兰名字。①他建议我们把生荒地的集体农庄改成国营农场。他解释说，机器拖拉机站为集体农庄耕地、播种、施肥和收割，然后同集体农民分享收成，作为给他们所做的工作的报酬。

"如果你把集体农民并入国营农场，只要象国家职工那样发给他们现金工资，而不必去分享他们的收成。所有的麦子都交给国家分配。这样，国家将能按低价得到更多的麦子。"

最初我反对这个意见。但在我们的交谈中，这位农艺师使我懂得，如果机器拖拉机站来为仅仅收获一季谷物的集体农庄提供机械，那么它的作用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如果拖拉机和机器什么活都干，没有再剩下什么体力劳动给集体农民们去做，那又何必还要有集体农庄呢？不如把机器拖拉机站的人员和农机设备同集体农庄的人员合并成一个单一的农业企业——即国营农场。

① 这个农艺师是I·维尼琴科。

我回到莫斯科后，把这个农艺师的建议告诉我的同志们。我们也同哈萨克的领导谈了话。最后，我们认为这位农艺师的意见完全正确。对于只种单季作物的农庄来说，我们改变了把集体农庄和同它并行的机器拖拉机站作为基本组织单位的政策，并且开始依靠国营农场。

我建议把机器拖拉机站交给集体农庄〔种植多季作物的农庄〕直接管理。莫洛托夫对这个主意大为冒火。他叫嚷着，咆哮着，说我们在乞灵于“反马克思主义的措施”和“毁坏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真是胡说八道！难道我们在农业方面提出过的愚蠢口号还不够多吗？我想起季诺维也夫在二十年代提倡的口号：“给每个没有马的农民一匹马。”这是愚蠢的，因为好几百万农民都没有马，而我们根本没有多余的马。为了抵制季诺维也夫的口号，斯大林提出了一个改为七小时工作日的主意。斯大林象所有人一样知道，我们的经济承受不起七小时工作日，因此，当他一旦确立了小暴君和独裁者的地位而无需再考虑任何民主政治原则之后——以及一旦季诺维也夫反对派被清除之后——斯大林立即违背他自己的建议，重新推行八小时工作日。①

所以你可以看到，动听的口号常常有着政治上的动

① G·E·季诺维也夫是苏维埃国家创始人之一。他是斯大林早期的敌手和受害者。在第一次大审判之后，他于1936年被处决。

机，并且同现实生活格格不入。莫洛托夫反对我关于机器拖拉机站的建议并把它说成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当然也是属于这种情况。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从来没有讲到过设立一个独立的机器拖拉机站是发展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①

把农业机器的使用管理同集体农庄分割开来的做法，已经变得完全不能容忍了。这种分割给我们的经济带来很大损害，所以我们取消了这种做法。任何一个对农业和经济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认为我们的决定是错误的。

和我一起工作过的人都知道我主张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我觉得小型集体农庄——即只有少量土地和少量劳动力的农庄——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它不可能实行高度的机械化。因此，我们必须改组这些小型集体农庄，以便可以使用现代技术。

当然，在向这个目标前进时，我们既有成功，也有过

---

① 除了种植单季作物的农庄外，赫鲁晓夫坚定地认为集体农庄比国营农场优越。集体农庄实际上是苏联唯一可以实行自治的经济生产单位，而国营农场则直接对农业部负责。莫洛托夫和其他反对赫鲁晓夫的人争辩说，不能允许集体农庄拥有自己的重型机器，不然的话，他们就会逐渐不服从国家的管理。赫鲁晓夫压服了这个反对意见。1958年莫洛托夫因反党集团事件被撤职后，赫鲁晓夫便能够采取一项措施，决定解散机器拖拉机站，并将其重型农机设备出售给集体农庄。

失望。我们未能避免贪大的狂热，而这种狂热使我们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不是我的过错，虽然我也许应当更加密切注意防止某些人的头脑发热。这些人在划分小型、中型和大型集体农庄时所用的标准是很不现实的。如果你想了解贪大会导致什么后果，那就看看中国的情况好了。中国人在所有的省份里都建立了一个个规模巨大的公社。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农庄会变成根本无法管理和效率极低的农业企业。正如我说的，我们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犯了贪大的错误。

尽管如此，我们缓慢而稳步地解决了许多面临的问题。有一年我们遇到可怕的风沙，但我们的科学家设计了防范这个灾难的办法。①我考虑要在那里种植一片防风林，这需要付出大量的辛勤劳动，但最后将会取得效果。

虽然遇到种种困难和挫折，哈萨克从一个需要冒很大风险才能发展农业的地区迅速变成为我国的谷仓。我为有机会能扩大开垦过去从未耕种过的土地而感到自豪。无论如何，这个决定是不容易作出的。但是，如果你考虑几种可供选择的办法时，这肯定是正确的办法。

一旦生荒地开始生产出谷物，我们的面包和饲料便有了剩余，虽然储备还是有限的，没有达到所要求的水平，即接近于一整年的供应量。不管怎样，当我们受到

---

① 1960年6月，苏联受到三十多年来最厉害的一次风沙袭击。

1963 年歉收的打击时，多亏我们还有一点储备。如果没有一年前我们从生荒地取得的小麦，灾难还要严重得多。在 1963 年的坏年成里，单是生荒地就生产了四亿普特〔七百二十万吨〕谷物，这等于斯大林时代国家年收购量的一半。

1963 也许是个可怕的年份，但是我们到 1964 年便很快恢复了。预计丰收大有希望。我们在领导内部讨论了农业情况，我表示希望再去访问一次生荒地。没有人反对，于是我飞往哈萨克。一列专用火车把我带到那些飞机不能着陆的地区去视察各个农庄。我要亲眼看看农民们在做些什么。我们有充分理由期待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大丰收。

在一个地方人们通知我，有个名叫汤姆森的英国出版家想要见我。① 我高兴地同意了。他拥有一百五十家报纸。我想有一个客观的见证人亲眼看看哈萨克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可能是有益的。资产阶级报纸写了不少关于生荒地的报道，但并不都是真实的。资产阶级总是透过有色眼镜来看苏联，似乎样样事情都是阴暗的。在我的邀请下，汤姆森登上了我的专车。我们一个村一个村地走访。

---

① 1964年 8 月，(伦敦)《泰晤士报》发行人(肯尼思·罗伊)汤姆森勋爵同赫鲁晓夫一起，乘坐苏联领导人的专用火车对哈萨克的国营农场作了一次访问旅行。

我在哈萨克的这次旅行中，饱受了一生中最大的乐趣。也许是由于这次旅行非常适时，因为在1964年，我就要同我作为党的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的长期政治生涯告别了。

我所到之处都是一望无际的麦田。麦浪滚滚，好象波涛在风中翻滚一样。到处都是善良、忠厚人们身上的汗水香气。农民在田里干活时发出欢笑声。他们感到快乐，因为他们知道在为国家劳动——也因为他们知道丰收意味着能得到高额收入。我看到出现了不少新的村庄；房屋是简朴而舒适的；门前有小孩子在玩，并且种有花草。

我回想起我第一次听到这些地方的时候。那是在1908年我的少年时代，当时有些移民从我住的省里到东部去。他们不是从我的村子卡里诺夫卡去的，而是从我姨母住的希什金诺村去的。我常到那个村子去。我熟悉我的姨母和住在同一村子里的农民。当我十四岁时，我常在瓦西尔钦科夫庄园里跟在一排公牛后面犁地。对于象我这样年龄的孩子来说，这是很重的劳动。

有一天当我们出去采集野果时，突然发现希什金诺村失火了。我们跑到镇上去帮忙，看到我姨母的房子正在燃烧。后来人们说，火是迁移到哈萨克去的农民临走前放的。那时还不叫哈萨克，而叫西伯利亚。我的姨父知道东部有新的土地。我们听说那里一个农民想要多少

土地就有多少土地；但是需要花很大体力和物力去开发，而农民们却又非常穷苦。

当我在1964年访问生荒地时，这些往事又在我的头脑里浮现出来。在沙皇时代不可能的事，在苏维埃政权时代变得可能了。当我在哈萨克草原上旅行时，涅克拉索夫的诗句一再在我脑海里回荡。

> 萨沙，我见到一个奇迹！
> 有几个俄国人，被判为异端分子，
> 流放到上帝丢弃的荒凉的地方。
> 给他们的自由，就是去种地。
> 一年不知不觉地过去了——
> 官吏们跑来视察。
> 瞧——那儿已有一个村庄，
> 还有草堆、车棚和谷仓，
> 铁匠铺里锤子在铁砧上敲打。
> 这样，渐渐地，在半个世纪里，
> 形成了一个宏大的居住区。
> 人的意志和劳动，
> 创造了奇妙风光。①

---

① 引自N·A·涅克拉索夫所著《祖父》，1870年出版。赫鲁晓夫在描写他对斯维特兰娜·阿里露也娃的感情时，还引用过涅克拉索夫的另一首诗《萨沙》，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94页。

涅克拉索夫以为需要化半个世纪才能做到的事，在苏维埃时代只需要三、四年就办成了。我们不但把铁匠的榔头引进生荒地——我们还引进了拖拉机、联合收割机、卡车、学校和医院。当我在生荒地旅行时亲眼看到了所有这些东西。

只要一提起我在哈萨克经历过的事情，我就会又一次感到快乐和兴奋。我多么喜欢沉浸在这些回忆中啊！垦荒运动表明，只要我们党相信人民，它就会强大无比。生荒地实际上是我们的救星。以今年为例，今年没有降雨，连莫斯科州也是这样。我自己是个菜农，知道我的小菜园所受的损失。当然，我在回忆录里说过许多关于我作为一个菜农的笑话，不过对我们国家来说，不下雨可不是好玩的事。生荒地使我们能够度过最坏的时期，这并不是说笑话。

我回到莫斯科后，很自然地就密切注意开始报上来的收购数字。我对哈萨克的情况特别感兴趣。由于开展了垦荒运动，哈萨克已经取代乌克兰成为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粮食产区。

我们的统计局汇编了地方政府送来的统计数字并向我报告。看来，国家单从哈萨克一地就可以收购十亿普特，甚至更多；最低限度也可以达到九亿至九亿五千万普特。

1964年成了生荒地有史以来收成最好的年份。我们

特别有理由高兴，因为1964年是紧接着1963的“饥饿年”而来的。我把“饥饿年”打上引号，是因为1963年并没有出现过真正的饥荒，但情况不可否认是严重的。

1964 年全国粮食收购总数大约在四十亿普特左右。肯定不会少于三十五亿。按我们的标准来说，这是创纪录的数字。我们的需要大约是十八亿至二十亿普特的优质小麦，因此，1964年的收获使我们有了可以维持差不多六个月的余粮。

我不能绝对肯定1964年的产量到底有多少，因为最后数字从来没有公布过。最近出版了一本统计汇编，我托我的朋友们给我买了一本。我要核对一下，1964年是否如我所猜想的那样是创纪录的一年。你猜怎样？结果没有 1964 年的数字。每个五年计划期间的数字，以及1961、1962、1963、1965、1966等各个年份的资料都有——就是没有1964年。〔领导层〕显然是在隐瞒一些事情。我觉得，由于开展了垦荒运动，1964 年确实是创纪录的一年——以后的收获甚至没有能够接近这一年的水平。

我从报纸上看到关于我们的农业一直在取得进展的消息。好吧，但愿如此。须知我们国家正在不断增加新的物质手段和技术专业知识，因此，如果情况没有进展，那是不能原谅的。

虽然如此，你还是不能太相信报纸上或收音机里所报道的东西。举例来说，我就怀疑1970年官方报告中关

于每公顷年平均产量达到十五点四公担的说法，这只略低于美国农场主每公顷十六公担的产量了。

由于我曾经在斯大林统治下生活过，我倾向于认为这些日子你在报上看到的年平均产量数字与其说是反映了实际情况，不如说是反映了主观愿望。我记得斯大林平时是如何对待萨维利耶夫同志的，他是确定平均产量数字的委员会的负责人。如果斯大林对萨维利耶夫同志的报告感到不高兴，他就象一条想要吞食一只兔子的蟒蛇那样怒视着他。斯大林会拍拍自己的肚子说："乌克兰的肥沃黑土象这一样。你是不是想对我说，你无法弄到比这更好的产量了吗？你对集体农庄太宽大了！我确信，平均产量至少应该比你所讲的再多一半。"

换句话说，斯大林武断地确定平均产量。现在的情况不象那么糟了，但我还是不相信我们的统计局。我觉得我们的统计人员有一种迎合领导、报喜不报忧的倾向。我认识一些这样的统计专家。他们是那种能把大粪铸成枪弹的人。①他们很善于隐瞒真相。有时他们把真实情况隐藏在报告的深处，使你无法把它挖出来。

当我从报告上看到1970年的平均收成是每公顷十五点四公担时，我怀疑这是某些拍马者在取悦他的上司。不管他们在报告中说些什么，我仍然深信，我们在1964年

① 这是俄国谚语"用大粪制糖果"的另一种说法，意即说谎。

的收成，即小麦收购量超过四十亿普特和每公顷平均产量十点五公担至十一公担，远远超过以往任何一年的收成，也超过此后大多数年份的收成，如果不是超过此后所有年份收成的话。

在生荒地，我们的农民专门种植小麦。我个人对这种作物有很浓厚的兴趣。如果我是集体农庄的主席，毫无疑问，我宁愿种小麦而不种玉米，因为小麦作为粮食作物比玉米容易种，且更富有营养。但玉米作为牲口饲料是非常重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我们之前发现，玉米是最好的一种青贮饲料，它是自然界中用来喂牛的第一等饲料。我自己注意到了这个事实并把玉米作为我们奶品工业和肉类工业的支柱，我认为这是正确的。

不幸的是，我们的气候和土壤条件同美国大大不同。更主要的是，很难把资本主义的经验应用到我们社会主义的环境。不过，不久我们就发现，在那些不能充分使用玉米作为〔消费〕产品的地区，我们却可以种植玉米作为牛的绝好饲料。

我可以毫无愧色地直言，我正是这项计划的首创人。是我把玉米作为我国的青贮饲料。不管某些人会有什么议论，我仍然对我在这方面所起的作用感到自豪。

阅读我的回忆录的人也许会感兴趣，就是直到战后我调到莫斯科后，我才了解到玉米的全部重要性，虽然在乌克兰很长时期以来人们就对玉米有着高度评价了。我

在莫斯科郊外我的别墅里种了一种名叫"斯特尔林"的美国种玉米，我很高兴地看到它长得很好。我邀请科兹洛夫同志和别涅吉克托夫同志来参观。科兹洛夫当时是中央委员会的农业部长；别涅吉克托夫当时是政府农业部长，我同他之间常常有意见分歧，但我尊重他的专业知识。①

玉米秆高出别涅吉克托夫同志的头顶。他以极大的兴趣察看了几个穗子和秆子，并且赞叹说："这可以成为多好的青贮饲料呀！"他是畜牧业专家，能够算出每公顷可有多少产量，以及用它来喂牛时能增产多少牛肉和牛奶。

我建议，以我别墅隔壁奥哥辽沃村的集体农庄做试验，先开始种植玉米。这个农庄过去搞得很糟。它居然还能继续经营下去真是咄咄怪事。我们划出了约一公顷半或两公顷大的一块地，种上了玉米。结果出现了奇迹。我带了主席团的委员们去参观，看看我们的试验取得了多么好的成绩。集体农庄主席为了显示玉米长得多

---

① A·I·科兹洛夫从1948年到1953年在中央委员会负责农业，那时他担任国营农场部部长。I·A·别涅吉克托夫从1947年到1955年先后任农业人民委员和农业部部长，后来又出任苏联驻印度大使。赫鲁晓夫曾指责他在斯维特兰娜·阿里露也娃事件中处理不当，以致使她叛逃到西方。（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94—295页。）

高，骑着马穿过玉米地——你甚至看不见他的头，直到他跑到公路上来才看见他。

多亏我当初的建议和我把这项计划贯彻下去的决心，这个集体农庄才成为全国最先进和最赢利的农庄之一。农庄的管理机构还清了债，并提高了庄员的收入。过去由于条件太差而离开农庄出走的农业工人开始回来了，甚至有些产业工人也离开工厂到这个农庄来工作，因为这里可以获得较多的收入。

当我们第一次取得成功后，我就建议大规模推广玉米作为青贮作物。不幸的是，在我们苏联生活方式下，有时候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人们在执行一个有很高职位的人的建议时过于起劲，以致把一个新开展起来的改进措施搞过了头。在许多地区种植玉米的工作中正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我开始为种植玉米开展宣传运动时，我真诚地相信——并且我仍然相信——这是做得对的。但有些干部想迎合我。说得粗一点，他们好象一群马屁精。他们不首先为农民作好适当的准备，就坚持大面积种植玉米。结果，农民根本不懂得如何正确地种植和收割玉米。最后，人们对玉米可以作为青贮作物产生了怀疑，而我作为第一个推广种植玉米的倡议人的声誉也受到了损害。

我不止一次去看过科诺托普同志，他当时是莫斯科

州委书记。①我说："你最好停止玉米运动。当我驱车驰过公路时，看到农民们把这项工作搞得一塌糊涂。我宁愿看到我们的集体农庄种燕麦，而不愿他们把玉米种得这么糟。莫斯科州的农民比较熟悉燕麦。"

我记得有一次格列奇科告诉我，他有一个兄弟在哈尔科夫州的一个国营农场工作，抱怨上级强迫他们种植过多的玉米。我觉得格列奇科的兄弟很有见识。我找波德戈尔内同志谈了这件事，他当时在乌克兰。

"你把玉米运动搞过头了。"

"如果没有玉米，我们拿什么来喂牛呢？"他回嘴说。他还作了冗长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除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我认为他不过是拍马奉迎而已。②

就是有许多这类可耻的不负责任的事情，它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造成严重的经济和政治损害。

尽管有些官员过分热心，我还是相信把玉米推广为青贮饲料的决定是正确的。虽然在某些地区出现过挫折，但在另一些地区却取得了巨大胜利。以我现在住处附近的高尔基第三国营农场为例。我同已故的谢苗诺夫

---

① V·I·科诺托普是莫斯科州委的一名官员，于1964年被提升为第一书记。

② N·V·波德戈尔内是乌克兰党和政府的一名官员，当1964年赫鲁晓夫倒台后，他取代勃列日涅夫担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即挂名的国家元首。

同志密切合作过，他一直是那里的主席。我有一次到他的玉米地里拍照。象莫斯科州其他的国营农场一样，高尔基第三农场能够达到每公顷七百至八百公担的产量，比播种这种作物的必要产量还要超出二百公担。

可是，我退休之后，高尔基第三农场好象已经放弃玉米而改种土豆了。我也不再到那里去，因为这个农场在〔莫斯科〕河对岸，从我家到桥头要走很长一段路；但有时我用望远镜看看他们在做些什么。我看见成群结队的士兵、中学生和大学生到田里去收获土豆。我还看到许多士兵和学生围着站在那里，靠在锄头柄上聊天。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青年人不是农民。

坦率地说，我对那些到乡下来度假的人实在感到厌烦了。每当收获土豆的时候，他们就到我这里来对这种种懒惰和缺乏效率的情况表示不满。

“都在搞些什么呀？”这些度假的人问我。

“你们要我做什么呢？”我回答说：“我只是一个观察家，和你们一样。你们应该去向有权处理这些事的人去表示不满。我同情你们所说的话。我和你们一样感到愤慨。但我无能为力。”

有时，来看望我的人问我是否还种玉米。他们知道我是一个道道地地的玉米迷。当我回答说：“是的，我还种，并且还干得很好”时，他们有时有些怀疑地说：“有人说，在莫斯科州不是每个人都能种好玉米的。”我反唇相

讥说，"当然不是任何人都能种好。培植玉米需要有智慧和知识。玉米最讨厌愚蠢。蠢人是不能种好它的——不过，蠢人什么东西也种不好，不是吗？"

讲起愚蠢，近几年来我看到农庄开始种向日葵作为青贮饲料，真叫我感到烦恼。当我出去采集了一会儿蘑菇回来的时候，我注意到紧靠着玉米地旁边有向日葵地。任何稍有一点庄稼知识的人都知道，向日葵籽作为牛饲料，质量远低于玉米。你也许要问："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人要种它呢？"答案是：因为很不幸，我们的管理制度强调农民应该不误播种和收割的时期，而不是强调他们应当尽量争取高产。

我一贯赞成严格的管理，但这种管理应该是有益的——正如我一贯赞成要有行政措施一样，只要这些措施是合情合理和有效的。在我担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年代里，我曾主张建立州一级和区一级的领导机构来管理农业和工业。每个农业领导机构应该有一个由当地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代表组成的专门的顾问委员会。

这些机构应起调节和决策的作用。在调节工作方面，它们会比国家监察委员会做得更好。国家监察委员会与其说是一个保证有效组织工作和提高生产的机构，还不如说是一个惩罚的工具。

至于决策，我深信这些机构在决定种植和收割作物的种类、时间和方法等问题上，都比我们全联盟的农业部

工作得好。有地方一级的代表参加将保证这些机构可以真正由自己来作出决定，如何才能更好地满足我们城市人口对粮食的需要。

农业部本身的工作应当是向农庄供应肥料和设备；注意国内外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并且制订长远计划。但是，如果农业部直接插手管理各个农庄，则是有害无益的。地方上的农艺师和管理人员远比任何中央官僚机构更熟悉他们自己土地的局限性和可能性。他们应该不受到农业部的干扰。

当然，如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我们在农业中也需要有中央的统一规划，但这个职能应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而不是由某一个部来担负。

在我还留在高级职位上时，我建议的这种管理制度不幸被否决了。我们又回到老的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的道路上，去依靠农业部和它所属的地方机关。

从此以后，把党委分成工业组织和农业组织的做法被取消了，我们又回到老的管理体系，即工厂和农庄一把抓的、没有专门名义的领导机构。人们也许会说："但是我们不是还有厂长和集体农庄主席吗？"是的，我们还有，但是在我国，由党组织向农庄和工厂发号施令已成为常例。这些命令是从哪里来的呢？它们多半来自高高在上和不了解情况的中央权威人士，这些人发号施令的结果总是弊多利少。

有人也许要说，把地方领导机构分成工业和农业两个委员会是轻率的举动，而且效率也不高。我要说，它总比那些从〔中央集权〕机构来的小小暴政要好些。①

就在几天以前，我在收音机里听到关于一次农业会议的节目。在会上做主要报告的——我特别要指出这是主要报告——是科诺托普同志。他是个很聪明的人。他在调到莫斯科州委之前在科洛姆纳区党委工作时，我就认识他了。虽然他的政治经验不算太丰富，但他是一个很好的政治家，完全配得上他现在所担任的莫斯科州委第一书记职位。但他是工程师，不是农艺师。②尽管他学过工科，但如果由他来做一个关于火箭技术的报告，那将是愚蠢的，对吗？所以，我认为在一个专门讨论农业问题的会议上由他来作主要报告，那就更愚蠢了。挑选他来作这个报告，说明现在我们的农业组织工作方面出了一些毛病。

每一个州负责农业的人应该是个专家——他应当是

---

① 1962年3月中央全会时，中央委员会建立了地区性的农业领导机构。同年11月，另一次中央全会决定把州党委、州苏维埃和州执行委员会按照工业和农业分开。紧接着赫鲁晓夫的倒台，1964年11月的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把这两项措施——农业管理的地方分权和把地方政权分成工业及农业两部分——都废除了。

② 科诺托普从1942到1952年是科洛姆纳机车厂的设计师和党的工作者。

个农业管理方面的专家，并为此应当受到尊重。在我国每一个经济部门，都有一些杰出的人物象宝石一样闪闪发光。应当给予他们适当的组织上的支持。如果他们得不到这种支持，他们的光辉就要泯灭。而所有群众大会、报纸上的宣传和正式的会议都不能取代他们的作用。

我记得曾听说过，有一位从著名的齐米梁泽夫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去做地板打蜡工人，而不是到集体农庄去当农艺师或畜牧专家。①为什么？我听说他当地板打蜡工人挣的钱比当农艺师要多得多。这是可耻的事。这就是那种会导致缺乏工作效率和不负责任的愚蠢。

我们正在培养足够数量的农业专家，但是没有能够吸引他们到集体农庄去工作。如果我们更多地从农村人口而不是从城市人口中招收学生去上农学院，情况也许会好些。

在我当权的时候，我们培养了一大批农业专家，但是，我们需要比这更进一步。越来越多的专业人材，应当在我们的农业领导机关中得到反映。我写过一份关于使领导机关专业化的文件，并把它送给所有州和区的党委会讨论。我还提出一个建议，并且得到了中央全会的批准。现在，这个建议却被认为是一个错误。但我确信，将来总有一天它会被重新接受。为什么我如此确信呢？

---

① 齐米梁泽夫农学院在莫斯科。

因为让没有受过适当训练的党的领导工作人员去管理农业是不能容忍的。然而，今天的情况正是这样：通常被提升到区、州、和边疆区党委书记职位的人，都是受过工科教育的人。换句话说，他们是城市工作专家，而不是农村工作专家。因此，既然让他们去领导农业，再去培养许多农业专家岂不是白费力气吗。

当我在党和政府里处于领导地位时，我常到外省去视察我们的农庄。无论到了什么地方，通常第一个向我作汇报的总是当地党的领导人，这就使当地的执行委员会主席受到冷落，更不用说农业专家们了。在某种程度上说来，这也是应该的。

在我们的制度下，头号人物总是党的领导人。但是党应当纯粹起政治上的作用，技术问题应该留给专家们去解决。在这个工艺技术越来越复杂的时代，没有一个政治领导人能跟得上最新技术的发展。正如美国人给我们的启发那样，如果我们希望赶上去的话，我们的领导工作人员必需是内行和专家。

我们应当记住，党在我们的制度里起着政治上的领导作用，而我们各个社会主义机关的任务却是应该以最有效的方式组织生产。在私有企业制度下，利润是决定性因素。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没有私有财产，所以决定因素应该是合理的监督、合理的管理和合理的分配。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这三方面做得很不成功，主要是因为我

们没有给予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以更多的独立性。

也许有人会说，我所提倡的管理机构体系限制了集体农庄主席的主动性和权力；也有人会说我在培植官僚主义。可是，我认为这完全要看你用什么观点来谈这问题。当然，过分的官僚主义管理的危险总是存在的，但是我认为需要防止的主要危险是在集体农庄和〔中央各部〕之间设立太多的官僚主义监督机构。

如果我们自称为列宁主义者，我们就应该更努力地遵循列宁的原则，来决定采取哪些措施最能适合我们国家的情况。我确信，总有一天我的建议〔建立分散的、有自治权的地方农业领导机构〕会以某种形式重新被采纳。顺便说一说，我要强调指出，我提出的那些建议并不是我说了算的。我提出了倡议，但决议要经中央委员会批准。中央委员会可能会对我的计划作些修改和改进。但是，不管〔权力分散〕采取什么形式，现实生活本身将会迫使我们去打碎那些妨碍我们经济发展的官僚主义障碍。在这期间，我们的消费者还要受罪。

我想有人可能会说："赫鲁晓夫把自己纠缠到细节里去了；他为什么对这些小事情唠唠叨叨说个没完呢？"

我真不愿回答他们。我只想建议那些抱怨我关心"细节"的人住口，并请他们去尝一尝清水盐汤；汤里既没有肉，也没有土豆、芹菜之类的"小事情"。到我们的商店里去买买看；不是买来以后根本不能吃，便是乾脆缺货。

消费者的苦楚

当国家对农业处理失当时，普通苏联公民就受罪了。我们怎么知道国家对农业处理失当的呢？我对食品柜台比对统计数字更信任。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一般家庭主妇的情绪比统计局更能反映我国经济的状况。正如我已经说过的，我们的统计人员有时候故意歪曲真相；他们在报纸上发表的经过粉饰的数字在商店里却看不到，因此也无法买来烧汤吃。

家庭主妇的情绪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呢？商店食品柜台反映了当前我们国家的经济水平如何呢？它们告诉我们各方面都有毛病，国家在数量和质量上都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即使在常常可以享受特权的莫斯科，顾客们也不能保证买到他们所需要的肉，蛋和家禽也缺货。事实上，如果你想买一只鸡，也许你只好买从荷兰或其他国家进口的家禽。对我国人民的口味来说，这些家禽太油腻了。荷兰鸡更不好，有股鱼腥气。

乳品的情况好象比牛肉、猪肉和家禽好一些，虽然我知道黄油也缺货。

优质的鱼特别难弄到。前不久我住过医院——并且

还是一所非常贵族化的医院。①在这里可以点到梭子鱼和鲈鱼，这是我喜欢吃的菜，但结果简直难以下咽。这一定是冷冻过好多次了。不管他们怎么搞，这东西象软木塞一样梗在我的喉咙里。

一般说来，我国人民的要求并不过份。如果商店里有冷冻的梭子鱼和鲈鱼，他们是会尽量购买的。

蔬菜的情况也是这样。现在是春天了，但一如既往，蔬菜缺货。黄瓜和蕃茄贵得惊人。普通的莴苣也是如此，而且质量很差。现在有一种新品种的优质莴苣，看上去象卷心菜〔冰山莴苣〕，但只供应特殊人物。在农民的自由市场或食品店里是永远买不到的。

你也找不到象样的玉米。我们的消费者爱好玉米——特别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和摩尔达维亚人，更不用说格鲁吉亚人、亚美尼亚人和一向以玉米为主食品的南方人了。现在他们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有时我们从农民自由市场的投机商那里买到玉米，但通常是饲料玉米，只能用来喂猪和牛。

不让我们的消费者买到优质玉米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莫斯科周围这种作物可以长得很好。正如我提到过的，我在自己的菜园里也种了一些。我们常常给朋友和家里人吃，这对他们往往是一种特别的款待。

---

① 赫鲁晓夫在 1970 年得心脏病后，住进莫斯科一所专为克里姆林宫现任和前任高级官员及其家属设立的医院。

我记得我在医院里时，听说医生们有一次奔到小卖部去，因为有消息说有批保加利亚的瓢瓜罐头可以供应医务人员。医生们尽量抢购。我听到有人抱怨说："某医生买了五罐，我连一罐也没买到。"我告诉他们，在莫斯科周围一带瓢瓜能长得很好，而且在我的菜园里也种了一些，医生们听了后都感到很惊奇。

如果莫斯科的情况不妙，那么外省的情况就更糟了。我有时碰到从基辅、梁赞、加里宁、布良斯克和其他州来的人。我常常感到同他们谈话有点别扭，因为不可避免地总要接触到食品短缺的问题。他们大声地抱怨说，鸡蛋和肉根本买不到，以及他们要花几天功夫坐火车到莫斯科来采购食品——到了之后还要站上好几个钟头排队。

几天之前，我在自己的别墅附近遇到一对休假的夫妇，他们住在离我不远的一个休养所里。他们告诉我，他们就要回到梁赞的家里去。他们在说这话时很不高兴地叹着气。

"梁赞的生活很苦。"他们解释说："我们在城市里至少有时还可以弄到点肉，但在郊区农村里根本不可能有。"

这次谈话使我想起了一个吉卜赛人要求入党的故事：

"我可以成为一个党员吗？"他问。

“可以”，我告诉他说，“但是首先你必须达到某些要求。第一，努力工作。第二，停止偷窃、酗酒和追逐女人。”

那个吉卜赛人失望地把双手一甩，叫道“如果我不能干这些，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

当然，编造这个故事的人未免把吉卜赛人的性格过于简单化了，但这个笑话还是有可取之处。它说明人们想使生活过得有乐趣。只有最起码的必需品是不够的。正如人们所说，“人不能只靠面包过活。”

在我们国家里，我们已经到了人们不再挨饿的阶段。已经有足够的谷物做面包，但我要重复说，“不能只靠面包。”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面包应该涂上足够的黄油，汤里也应该有肉。

我记得同一个美国商人的一次谈话。他是某公司的总经理或董事长，我们曾为克里木的国营农场向这家公司购买了一座禽类加工厂。①这家工厂一旦投产，我们发现要使鸡多长一公斤肉需耗费五公斤饲料，而美国人只要耗费三公斤饲料。如果差距如此之大，我们怎能同美国竞争呢？我同这位美国公司总经理的谈话真叫我感到羞愧，正如我听到我们要从法国那样小的国家进口鸡时

① 这里提到的商人是伊利诺斯州奥罗拉城芬利·穆迪公司的总经理乔治·芬利。1961年这家公司出售给苏联一座禽类工厂，设在克里木；1964年4月又向苏联推销一座熏肉工厂。

感到羞愧一样，更不用说从荷兰进口鸡了。我问这个美国人，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

“这个，”他说，“问题之一是你们不让我们的专家到国营农场去安装设备。我们被告知，农场在保密地区，不准外国人进去。”

这是荒谬可笑的。除我们的潜艇基地外，在克里木没有禁区。实际上，禁止美国专家到我们的国营农场去是至今尚未肃清的斯大林时代官僚主义的残余。

这个美国商人建议我们造一座熏肉工厂。他提出要卖给我们一座机械化肉类加工厂的专利。这个厂可以生产二十五万公斤猪肉，而只要雇用一百二十五个人。他还保证说，一公斤肉只需耗费三公斤半饲料。同我们相比，我们每公斤肉至少要耗费五公斤甚至七公斤饲料。换句话说，美国人的效率是我们的两倍。为什么？因为他们有科学，有专业化。我们如要赶上他们，就需要设立专门的科学机构。这个美国商人还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建议：“我们可以提供你们所需要的一切——机械化生产饲料的设备，采用最新的工艺流程。”我们从这种高效率的牛和家禽饲料生产中所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支付购买专利的费用还绰绰有余。这样，我们就可以生产更多的肉和蛋。试想一下，如果成千上万的人都能买到这些产品该有多好啊！购买这些产品会帮助吸收过剩的纸币，否则这些纸币会对我们的经济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并导致

国家提高物价——常常是暗中地提高。

我向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作了一个报告，极力主张把熏肉工厂的专利买下来。我认为从经济上的观点来看，购买这个专利肯定比购买菲亚特汽车工厂的专利要好。首先，菲亚特汽车只是供少数人享用的东西。其次，我们自己已经有了相当不错的汽车——扎波罗热牌、莫斯科人牌、伏尔加牌，不用说那些更高级的汽车了。似乎在伏尔加河边造了那个菲亚特厂还不够似的，又向法国雷诺公司买了许多设备，在卡马河边造了一个卡车厂。我们苏联自己造的卡车怎么办呢？①

我不否认外国制造的汽车比我们自己制造的外观好看些，可能在别的方面也好一些。我刚才说过，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五十年之后，我们仍然在肉和蛋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方面遭受着短缺之苦。所以在我们到处去购买外国汽车工厂之前，应该集中力量在工业化的基础上组织家畜、猪和家禽饲料的生产。我们在食品生产上仍然严重地落后于资本主义世界。把成百万人想要吃得好些的愿望放在成千人想要购买菲亚特汽车享乐的愿望之上，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是可取的。这就是我的看法。不幸的

---

① 1967年，意大利菲亚特公司在伏尔加河的陶里亚蒂城附近造了一座价值四亿四千五百万美元的汽车厂；它的设计生产能力是年产六十万辆汽车。雷诺卡车厂的交易是在1970年宣布的。

是，我现在不在领导核心里，新的领导核心不是对形势有不同的理解，就是脱离了真实情况。

最近我遇到的一个人问我："喂，赫鲁晓夫同志，你认为一头骆驼能从莫斯科一直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么？"

我从他那笑迷迷的样子可以看出，他的话里一定有文章。我小心地回答说："这个，骆驼是有很大耐久力的强壮的动物，因此，我想它大概能一直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不对，赫鲁晓夫同志，你错了。这头骆驼能走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已经算走运了。"

"为什么？"

"因为假定它能走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那里的人就会把它吃掉。"

这个故事包含了一定的真理：它道出了我国城乡食品短缺的一些情况。我期待着有一天，一头骆驼能从莫斯科一直走到符拉迪沃斯托克，不致被沿途的饥饿农民或乡下人吃掉。

当然，食品是我国人民最基本的必需品，但我们也应当满足他们爱美的要求。人喜爱花，没有花，生活是非常枯燥无味的。现在是我们的领导人认识到给生活增添美丽的东西不是多余的——而是基本的——时候了。如果我们政府对资源的分配更加合理，我们就能够同时满足

人民的爱美的需求和营养上的需求。①

经济学是复杂的事情，它涉及到供应、价格和工资。当我在领导核心时，我们打算改善养老金领取者和丧失生活能力者的困苦处境。让他们领取那么一点可怜的养老金，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我们提高了他们的养老金。这些人非常感激。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罗斯托夫的街上散步时，老人们向我奔过来说："谢谢你，赫鲁晓夫 同志！谢谢你给我们的养老金！"

尽管我们作了改进，工资的情况仍然不妙。不久前我偶然遇到一对休假的夫妇。他们都还年轻，虽然已经有了两个孩子，一个十三岁，一个十一岁。我问他们做什么工作，收入多少。女的说，她是个助理医生，每月只挣八十个卢布。她说："这实在太少了，赫鲁晓夫同志。"

"是的，是很少的，"我回答说，"不过他们答应要加工资。"

"我知道他们答应要加，不过还是没有多少钱。"

"你怎样？"我转问她的丈夫。他说他是一个技术科学的副博士，每月挣一百三十卢布。想到这样低的工资，特别是想到现在有些工种的工人也挣的不比这多，就使我深深感到不安。总之，我应该说，我国的工资情况搞得

---

① 赫鲁晓夫在这里对格鲁吉亚的投机活动痛骂了一顿，关于这个问题他已经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305—306 页谈过了。

很糟，并且看不出有改进的迹象。公平分配我国人民创造的财富，是保持和巩固我们苏联社会磐石般的团结和稳定性所绝对必需的。我从来不赞成把每个人和每件事都降低到同一个水平上，但同时我也反对不平等待遇。简单地说，我主张合理分配财富，这样使各工种工人的收入之间的差距既不会过大，也不会过小。

关于工资就说这些。物价问题怎样呢？我们不但一定要为消费者供应更多更好的产品，我们还一定要使物价降低。

当我还在领导核心时，我碰到的人常向我问起政府的物价政策。我记得有人说："请你告诉我，赫鲁晓夫同志，你们为什么通过一项法令改变我们的币值呢？政府这样做不是为了提高物价吗？"

"政府没有这个意思。"我说。

"是谁建议改变的？"

"这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政府的倡议。碰巧是由财政部长兹维列夫提出来的。他向我作了报告，他是直接负责这些事情的。柯西金作为我的副手主管财政部和国家银行。①后来他又兼任其他工作。无论如何，兹维列夫、

① A·G·兹维列夫长时期来是财政部长（1946年—1960年）。柯西金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在他取代赫鲁晓夫任总理之前，从1960年到1964年是赫鲁晓夫在政府中的主要副手。1960年5月，宣布旧卢布按十比一兑换新卢布。币制改革从1961年1月起施行。

柯西金和我从成本和国家收入增加了许多倍这一事实出发，认为同这些天文数字打交道是很复杂的。它使会计簿记复杂化。我们决定把卢布价值提高十倍，这样以前值十戈比的东西现在是一戈比，以前值一个卢布的东西现在值十戈比。这种币制改革只是为了方便；它与提高物价毫无关系。”

同我谈话的这个人不相信：“我不管你说什么——物价是上涨了。”

我告诉他那是没有根据的，并同他一起算数字。

我碰到的人常问我，为什么现在有那么多的变相涨价。他们诉说某种商品换了商标名称以后价格就提高了，而商品质量依然一样。

举例来说，近来伏特加酒就变相涨价。①这一措施曾被辩解说是为了控制酗酒。我也一度以为提高伏特加酒价格可以减少消费量。但是没有取得效果，唯一的结果是家庭预算受到更大打击，使人们购买必需品的钱更少了。而且，政府任意涨价使人民感到愤怒。没有人愿意仅仅为了新的商标名称而付更多的钱。

当人们到我这里来埋怨目前的涨价时，我总是回答说：“你们对我说这些有什么意思呢？去向那些决策人提这些问题吧。我不过是一个养老金领取者。你们指望我

---

① 伏特加酒在1970年春天涨了价。

能做些什么呢?”

当我们的一个消费者到国营商店去买一种质量低劣的商品，发现要比上一次多付钱时，将会发生什么事呢?他会咒骂那些负责的人——这就是将会发生的事。或者他在国营商店里根本找不到他所想买的东西，只好到农民自由市场去买。结果，他要比在国营商店多付两三倍的钱，如果国营商店有这种东西的话。使情况更为复杂的是，我们的消费者偏爱买很难买到的进口货，这些进口货比国产商品能够更好地满足他们对外形美观方面的要求。

所有这些因素造成的结果是，在我们社会里，消费者是难当的——不难想象，我们的消费者从买东西的征途上回来时，他们的情绪是多么不好。

我相信，只要我们改变我国经济工作的优先次序和组织结构，为我们的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食品和消费品，我们就能成功地同资本主义竞赛。一个人从事劳动和活着，为的是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如果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更好地满足这些需要，那么要宣传我们的观点和巩固我们的生活方式就会变得更加困难。最后，我们将有丧失一切——以至于崩溃——的危险。

这种危险既是经济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只要看看最近在波兰的但泽和波罗的海沿岸其他城市所发生的事吧。我并不反对盖莱克同志。他是一个好的共产党员。

他的前任哥穆尔卡同志也是如此；哥穆尔卡致力于共产主义理想并不比盖莱克差。①但是由于哥穆尔卡不能解决自己国家面临的尖锐的经济问题，特别是消费者方面的问题，他脱离了群众。他的致命错误是决定提高物价和不给人民提供他们一直吵嚷着要求得到的消费品。结果，哥穆尔卡的领导倾覆了。

波兰所发生的事情对我们是一个教训。波罗的海沿岸的事件是食品短缺的直接后果，是一次消费者反对物价上涨的暴乱。这就是为什么我特别关心我国经济中所出现的短缺和变相涨价的原因之一。

现在我们应该懂得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不能单靠课堂、报纸和政治大会硬灌到人们的脑子里去；以苏维埃政权名义所进行的鼓动和宣传也应该在饭店和食堂里进行。如果我国人民最终接受我们的制度和拒绝资本主义，他们就必须能用自己的工资买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出来的优质商品。

当然，在这一点上中国人一定会和我有不同意见。他们用一大堆毛泽东的胡话来塞满我们的耳朵。在文化革命期间，毛批评我们正在努力满足苏联人民的需求。

① 波兰党的主要领导人瓦·哥穆尔卡因波罗的海沿岸的物价和工资闹事，于1970年12月被推翻，并由爱德华·盖莱克接替。

但泽是波兰海港格但斯克的德文名称。

中国人开始嘲骂和叫嚷，说我们犯了“经济主义”的罪过。[①]毛说我们应当反对物质刺激，并以革命思想来激励我们的人民。但是你不能用思想来烧汤。

我知道，我们自己有些官僚也会指责我是在进行污蔑，只不过因为我指出了所有这些问题——我们社会过于官僚主义化，对消费者的需要关心不够，等等。但我全然不以为我是在污蔑苏联。我相信凡是阅读我的回忆录的明眼人都会懂得，尽管我国还存在着所有这些缺点，对于那些为改进我国经济状况作出真正贡献的人，我只有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感谢。况且我的批评是建设性的。

在我的晚年，我发现我比以前更担心未来。我不愿意看到苏联在前进中受到官僚主义的阻碍。如果我们能避免陷入泥淖，我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将是无可限量的。我们最大的力量和希望是艰苦的工作。诚实的劳动是辛苦的，但也是值得的。

我自己没有工作了。我现在已经七十七岁——比我年轻时以为能活到的年龄还要大。七年来我过着退休生活，我常常因为丧失了为社会的利益而工作的能力而感

---

① “经济主义”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名词，意指这样一种态度，即脱离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去实现发展经济和物质繁荣的目标，或把这种目标放在政治和意识形态的考虑之上。西方的工会常被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专家们指责为“经济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右翼社会主义”。

到苦恼。有时感到我的闲散生活是一种不能忍受的精神痛苦。

但是我不应抱怨。我至少是幸运的，能有机会口述关于我国农业和经济发展情况的回忆录。我对这项工作全神贯注。我只希望这项工作正如对我自己说来很有趣一样，也会对别人有些用处。我很难停下来，但我现在疲倦了——我必须休息，至少休息一会儿。

第八章　波兰：一个盟国的形成

战前和波兰人的关系

我从幼年时期起，就和波兰人有过接触。在我的父亲和我劳动的矿场里，有许多波兰人在做工。这些矿场象一个国际劳动集中营。在那里，各个国家的人都受到资本枷锁的压迫，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着同样的遭遇。结果，在我们之间建立起了兄弟般的情谊。内战后，我在三十一号矿的许多朋友中有一个波兰工人。① 那时是艰苦的。铁路不通。因此，不久当波兰获得独立时，我的朋友买了一匹马，把他的家属和财物装在一辆轻便马车上搬回波兰去了。

我还认识军队里的一些波兰同志。1920年初，我隶属于第九步兵师的第一旅。我们的师向阿纳帕推进，在4

① 赫鲁晓夫的父亲在1909年把他的家搬到乌克兰顿巴斯地区的尤索夫卡（后来叫斯大林诺，现在叫顿涅茨克）。父子两人都在那里的矿场里做工，赫鲁晓夫在法国人办的鲁钦科夫和帕斯图霍夫矿的发电厂里充当一名金属装配工。他在国内战争后回到尤索夫卡。第三十一号矿是鲁钦科夫联合企业的一部分。

月初占领了这个市镇。① 我们正在把白军赶出北高加索。我被派为第七十四团第二营的政委。我们旅的政委是一个叫罗卡舍维茨的波兰人，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同志。② 并没有因为他是波兰人而引起过什么问题。没有一个士兵问起他的国籍。后来，当毕苏斯基进攻苏联时，罗卡舍维茨被从高加索召回，派去参加对波兰作战的红军部队。③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当我在乌克兰党组织工作时，我认识了许多波兰人。例如斯卡贝克同志，他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波兰局的负责人。④ 换句话说，他负责对波兰居民的宣传工作。后来，当我已经在基辅工作时，⑤ 斯卡贝克是一个报

---

① 阿纳帕是俄国南部黑海边上的一个市镇，国内战争时期白卫军曾在那里阻击过红军。

② 康拉德·罗卡舍维茨是一个在苏联的早期波兰革命者。1917 年，他是乌克兰中央代表会议的代表。

③ 约瑟夫·毕苏斯基，从革命中回头的波兰独裁者。他曾率领一支军队深入俄国，但在 1920 年红军的一次反攻中被赶回到华沙郊外。

④ 斯卡贝克是包莱斯瓦夫·萨茨基的化名。他在一九二〇年前后是哈尔科夫工人代表会议的代表，西线革命军事委员会波兰科的负责人，后来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波兰局的负责人。他是清洗的早期受害者，于1933 年被捕和遇害，1956 年被恢复名誉。

⑤ 在二十年代的早期和中期，赫鲁晓夫在尤索夫卡的州党委机关工作。1928 年，他被卡冈诺维奇提升到哈尔科夫，后又到基辅，在那里他担任基辅市委组织部长。

纸的编辑。他是个好同志，深得大家的喜爱。我还认识克里尼茨基，他是联共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后来担任党的萨拉托夫州委书记。

我记得我和波兰人在一起工作的情况。就我记忆所及，那是在1929年，当时毕苏斯基正在华沙筹备召开全波代表会议。由于世界各地的波兰人都应邀派出代表参加会议，苏联自然也准备从自己的波兰居民中选派代表。同时，由于苏联的波兰人大部分居住在乌克兰，因此在中央委员会的主持下成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我参加了这个波兰委员会的工作。它的成员有：克里尼茨基，他从莫斯科调到基辅来担任委员会的主席；斯卡贝克同志和州委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巴兰同志。为了从乌克兰的波兰居民中挑选最合适的代表，我们曾经考察了许多人。当然，我们希望那些能够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代表波兰居民利益的人当代表。但我们的工作是徒劳的，因为毕苏斯基根本不让我们的代表进入波兰。

克里尼茨基同志的结局很悲惨。由于斯大林强行对党实行专横统治，很多忠诚的共产党人被毁掉了生命，克里尼茨基同志也在这时作为“人民的敌人”被逮捕并遇害了。①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卡冈诺维奇是乌克兰共产党的

---

① 克里尼茨基是一个老资格的党的组织者和解决问题的能手，死于1938年。

第一书记。我从1917年起就认识他，我们是在革命爆发前几天，在尤索夫卡的一次群众大会上见面的。他是大会上的发言人之一。在那一年的晚些时候，我又两次在巴赫穆特的工人代表会议上碰到他。那时他使用科舍罗维奇这个化名。①此后我就没有再看到他的踪迹，直到二十年代时他又以乌克兰第一书记的身分到尤索夫卡来看望我们。那时我是当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因此我们同在主席台上就座。

我问他："你用过科舍罗维奇这个名字吗？"他说不错，并且证实了我们以前曾经见过面。我对他说，他可以在1917年巴赫穆特会议参加者的照片里找到我。这大致就是我们那次谈话的梗概。

后来，卡冈诺维奇的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职位为斯坦尼斯拉夫·维克恩特维奇·科西奥尔所接替。②我

---

① 1917年，卡冈诺维奇化名科舍罗维奇在尤索夫卡一个制鞋厂内做工，并领导这个地区的布尔什维克组织。二月革命后，他以尤索夫卡工人代表苏维埃副主席的身份出现。科舍罗维奇至少是他在从事地下党工作时用过的第三个化名。人们还知道他用过斯托马欣和戈登堡的化名。从那时以来，巴赫穆特也改了名字。这个靠近尤索夫卡的城市现在叫做阿尔乔莫夫斯克。

② 科西奥尔在他垮台之前是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第一书记。正是由于科西奥尔的支持，赫鲁晓夫才在1929年从乌克兰调到了莫斯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4—35页）。

几乎可以肯定，大多数党员甚至不知道科西奥尔是一个波兰人。从来没有人想到过这个问题。对我们来说，国籍并不是一个问题。它不能说明任何事情。科西奥尔并不隐讳他是波兰人。他不需要这样做，也没有人注意他是什么国籍。人们关心的是他是否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正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才是重要的。他受到同志们的完全信任。

我曾同科西奥尔的几个兄弟一起工作。我们都是顿巴斯时的伙伴。当我还在顿巴斯的时候，我参与了南方冶金工人组织（它的总办事处设在哈尔科夫）的合并工作。这时我正负责尤索夫卡（后来改名为斯大林诺）州的组织委员会的工作。我常常以这个身分同科西奥尔的一个兄弟见面，我记得他的名字叫做约西夫。他负责南方冶金工人组织的合并工作。他的波兰国籍没有丝毫关系。他的一生同样遭到了悲惨的结局。尽管他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但是他在斯大林的清洗运动中被清除掉了。这个清洗运动从第二十次党代表大会以来才为世人所知。①

至于斯坦尼斯拉夫·维克恩特维奇·科西奥尔本人，当我在1938年1月从莫斯科调到乌克兰时，我同他

① 事实上，约西夫·科西奥尔是在1937年病死的，应该说他在这时去世可能是一种幸运。他的两个兄弟都成了大恐怖的牺牲品。

有着最良好的关系。那年夏天，我得悉科西奥尔已被捕。我是怎样知道这件事的呢？基辅的广播电台原来是以科西奥尔命名的。它在每次播音开始时都宣布："这是斯坦尼斯拉夫·科西奥尔广播电台"。有一天，我打开收音机，却听到"这是基辅电台"。尽管我是政治局委员，但这是我得到的关于科西奥尔被捕和失踪的第一个信息。①在那些日子里事情就是这样进行的。一个人〔斯大林〕可以为所欲为。

我在乌克兰党组织工作的整个期间，经常同波兰人(我们的波兰特工人员)有接触。他们的任务是到波兰去传达指示。当波兰共产党被共产国际解散时，当然，局势变得更加复杂起来。那是发生在我去乌克兰之前，当时我还在莫斯科。我们从共产国际和中央委员会得到消息：共产国际的许多领导人已被逮捕。被捕的人数很多，包括兄弟党以及我们自己党的许多代表。②

尽管波兰的党被共产国际解散了，但是有些下级党组织并没有得到通知，也可能是对共产国际根本不予理会。不管怎样，他们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哥穆尔卡后

① 1938年，赫鲁晓夫继科西奥尔担任乌克兰的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05—108页)。

② 共产国际的一次全面清洗是在1937年开始的。许多外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莫斯科的柳克斯旅馆过着流亡生活。当他们在那里被捕时，有些人进行抵抗，当场被击毙。波兰代表团几乎全部被消灭。

来告诉我，当他在德罗戈贝奇工作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认为自己已不是一个党员。我相信有许多人也象他一样。已故的萨瓦茨基是另一个例子。他在德罗戈贝奇坐牢。他为什么会坐牢呢？就因为他是共产党员。战后，他成为波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主席。①

在西乌克兰苏维埃化期间，我们在乌克兰同波兰人的关系变得进一步复杂起来了。②我们把许多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弄到了自己身边。我们接到莫斯科一项指示：不准承认任何人为共产党员，不准接受任何人的组织关系。③我们只能在个别的基础上挑选一些最值得受信任的人。事实上，这项指示意味着〔来自归并领土的〕任何人都不得参加共产党。只是到后来我们才能开始把党籍给予那些曾经从事地下工作的优秀和忠实的波兰同志。我们十分需要他们的协助，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

---

① 在共产国际清洗中幸存的波兰共产党领导人，实际上就是哥穆尔卡和萨瓦茨基那些幸运地被关在波兰监狱里的人，而他们在莫斯科的同志则遭到兜捕。战后，亚历山大·萨瓦茨基担任副总理，后来担任国务委员会主席，即挂名的波兰总统。

② 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使苏联有可能吞并西乌克兰（或东波兰），并加以“苏维埃化”（《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35—149页）。

③ 这是指不准从合并前的波兰党籍转为合并后的苏联或乌克兰党籍。

比我们熟悉得多。我们开始建立党的组织。不幸的是，由于莫斯科的这些指示，我们耽搁了一些时间才着手进行这项工作。

这就是由于斯大林的错误政策使我们遭遇到的困难。他的所作所为正如列宁在他的著名遗嘱中所预见到的那样。①

战后的波兰

在战争临近结束时，斯大林指示我，要我把我的注意力转到乌克兰的重建工作。在这个工作岗位上，我逐渐摸熟了关于建立一支新的波兰军队和一个新的领导班子的问题。这两方面的事情都属于莫斯科的管辖范围。因此，我经常从莫斯科接受命令，有时也从斯大林本人那里接受命令。这些命令的内容是指示我应当怎样帮助那些取道基辅前往波兰的波兰共产党人。其中有些人我早在1944年就认识，那时第一批波兰同志沿着我们乌克兰第一方面军的防线开始越过边界。贝鲁特同志越过防线甚至还要早；而当我同其他波兰人开始建立正常联系的时

① 列宁的遗嘱是1923年写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警告说，斯大林把过多的权力集中在自己的手里，并表现出一种滥用职权的倾向（《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6页）。

候，他已经处于负责的地位了。①

在这些人中间，我最熟悉的是旺达·华西列夫斯卡。她是为了筹组战后波兰政府而设立的临时委员会的领导人之一。她是我的亲密朋友。②我在斯大林面前讲过她许多好话。后来当斯大林亲自见到她的时候，她给斯大林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当时据说这个临时委员会是根据波兰居民的倡议设立的。但是事实上，这个委员会的组成是由我们的领导也就是斯大林批准的，因为这个委员会是在我们的国土上建立、并由我们出钱资助的，而且如果没有我们的帮助，它将无能为力。这是为了我们的利益而建立、并由我们可靠的盟友所组成的一个波兰领导班子。他们同我们目标一致，并将永远忠实于我们。旺达·利沃芙娜·华西列夫斯卡是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她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

在我们国土上还组成了一支波兰军队。这支军队早就由一个旧的骑兵将军所指挥。但是，他那时踟蹰不前，拒绝从我们的土地上去同德国人作战。因此，只得把他的

① 鲍列斯瓦夫·贝鲁特是一个在苏联受过训练的波兰共产党领袖。他在1943年8月越过边境返回波兰。他是波兰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第一任主席。

② 旺达·华西列夫斯卡曾取得苏联国籍，并在苏军中获得上校军衔。战时她是在苏联的波兰爱国者联盟的领导人。她在赫鲁晓夫担任乌克兰党的领导人时成为赫鲁晓夫的朋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45、248页）。

部队通过伊朗运往北非，在那里他同英国人配合作战。①

我们同罗拉-日伊美尔斯基有着更为融洽的关系。他的年事较高，早在毕苏斯基时代就已经是一位将军。②由于毕苏斯基怀疑他，他曾经被投入监狱。我不知道他的确切罪名是什么，但是一句话，他被指控为苏联的代理人。究竟这是不是事实，我很难讲，但他肯定是我们的朋友。他是一个有才智的人，一个有经验的组织者和一个优秀的军人。他应当得到也确实得到了我们的完全信任。我是在他率领一部分人途经乌克兰前往波兰时见到他的。

我们也招募了几个波兰的师团，由贝林将军领导。他过去曾在西伯利亚流放过。③我见过他几次，第一次在斯大林那里，后来在基辅。他的司令部隶属于罗科索夫

---

① 瓦迪斯瓦夫·安德斯将军。赫鲁晓夫对于安德斯率领他的波兰部队撤出俄国的记述是歪曲事实的。事实上是斯大林改变了主意，拒绝让安德斯指挥的三个波兰师在俄国战线作战。安德斯的部队后来在意大利打得很激烈，尤其是在卡西诺。

② 米哈尔·罗拉-日伊美尔斯基元帅，波兰人民军的第一任统帅。

③ 齐格蒙特·贝林将军，以前是安德斯部下的一个师参谋长，被任命为一个新建的、由苏联控制的波兰师师长。这个师在1943年成为一个军，1944年成为波兰第一集团军。（赫鲁晓夫的原文称他为“贝林格”，可能是由于赫鲁晓夫把他同意大利共产党领袖恩里科·贝林格的名字混淆起来了。）

斯基指挥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让罗科索夫斯基同志负责这一防线不是偶然的。①他本人是波兰人，同时是优秀的共产党员和杰出的军事领袖。他受到波兰人和俄国人的尊敬。因此，对贝林的波兰军来说，他是一个理想的指挥官。这个军将是同我们的部队一起越过边界的第一支部队。

我记得当贝林将军在乌克兰为波兰部队招兵买马达到最后阶段时，他抱怨乌克兰人对待他的新兵态度很坏。作为乌克兰的代表，我曾问贝林，"你有什么证据说乌克兰居民对波兰军队抱不友好态度呢？"

"简单地说，他们表示不喜欢我们。"

我反驳说，"这可能是有道理的。我想你们的士兵也常象一般士兵那样抢农民的东西。可能你们在乌克兰农民的田地上放牧牛群。此外，你应记得西乌克兰过去是波兰的一部分，而华沙政府在这里采取了极不合理的民族政策：它压迫和歧视乌克兰人。而且问题还要追溯到更远。记住你们的历史：乌克兰人从波格丹·赫米尼茨基时代以来一直同波兰人作战。②因此，乌克兰人至今憎

---

① K·K·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是一个苏联籍波兰人，1937 年斯大林对军队进行清洗时几乎被杀。后来他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出了名。

② 波格丹·赫米尼茨基是十七世纪的乌克兰领袖。他同波兰人打仗，并使乌克兰与俄罗斯合并。

恨你们波兰人是毫不奇怪的。”

贝林发现自己陷入了窘境。他说，“我并不是那样看。我表示不满是我考虑不周。请你谅解。我并不要求特殊待遇。作为一个军人，我懂得在军队和老百姓之间发生这种矛盾是不可避免的。”

我很尊重贝林。我甚至经常把乌克兰的美味食品和我从莫斯科弄来的鱼子酱装在邮包里寄给他。如果贝林只是来同我商量这个问题，那我们很容易解决它，而不致小题大作。不幸，他已经向波兰临时委员会提出了抱怨，而且更严重的是，他已经向斯大林本人提出。那时斯大林特别卖力讨好贝林。因此，他制造了一次不愉快的事件，并派马林科夫从莫斯科赶到基辅，替他调查这件事情。这样还嫌不够。布尔加宁也为了同一目的飞到基辅。布尔加宁是斯大林的特别代表，是斯大林派驻波兰临时委员会的全权大使。布尔加宁还不止是一个全权大使。他赋有特殊权力，包括对军队的权力。

在这里，你们可能会问，当贝林抱怨乌克兰居民对他的军队的态度时，为什么要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这两个人出场呢？原因是相当复杂的。这要追溯到1942年底和1943年初，当时布尔加宁是西线军事委员会委员。那时，朱可夫指挥下的我军在追击莫斯科外围溃逃的希特勒军队时遭遇到了困难。马林科夫告诉我，斯大林对西线我军未能以一次反攻击退德军进攻极为震怒。他任命了一

个委员会进行调查，并以马林科夫为这个委员会的主席。由于马林科夫对军事问题一窍不通，斯大林不得不在委员会内安置一些军人。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份报告，指责这次失败是由于无能。结果，索科洛夫斯基被解除了指挥职务，而布尔加宁也被解除了军事委员会委员的职务，而且我记得，虽然不能肯定，还受到了正式谴责。①换句话说，马林科夫使用了卑鄙的手段陷害布尔加宁。本来斯大林对布尔加宁已经非常恼火，因此，马林科夫只需要提出一个能证实斯大林先前所做出的结论的报告就够了。从纯粹的人情观点出发，我当时很替布尔加宁感到难过。我不认为应该这样加罪于他。我知道马林科夫早已开始敌视布尔加宁了。对于马林科夫担任调查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既不相信他能客观地看问题，也不相信他足以胜任这个工作。

这就是当贝林的问题发生时马林科夫对待布尔加宁态度的背景。在这里，马林科夫试图表明自己是从大本营来的斯大林的特别代表，并对布尔加宁逞威。他在布

① V·D·索科洛夫斯基将军曾在西线担任过朱可夫的参谋长，而布尔加宁则是西线的政治督导员。后来索科洛夫斯基擢升到朱可夫所担任的军队统帅的职位，只是由于未能突破德军的包围和击退德军而被斯大林撤了职。在1953年至1960年间，索科洛夫斯基担任苏联的总参谋长。1960年，由于他反对赫鲁晓夫的裁军政策而被撤职。

尔加宁到达之前就来到基辅同贝林和我会晤。我立刻意识到马林科夫将竭尽全力利用他的职权。

我说，“在布尔加宁飞到这里时，我们应该去接他。他从来没有到过基辅，他不知道怎样找到我们这里来。”

马林科夫带着蔑视的神气说，“我们没有理由要去接他。他自己会找上门来的，或者你可以派个人去带他来。”

马林科夫的态度使我感到十分不安。我很尊敬布尔加宁，并把他当作自己的朋友。事实上，就我来说，我们三个人，布尔加宁，马林科夫和我，都是朋友。我不愿意布尔加宁在到达时发现没有人在那里接他。但是另一方面，我也不愿意使马林科夫难堪，如果他不去而我自己单独去机场的话。最后，我派了一个人去接布尔加宁，并带他来到我住的公寓。

我们举行了四人会谈。我代表乌克兰；马林科夫代表斯大林；布尔加宁作为同波兰临时委员会打交道的苏联政府的代表；而贝林代表波兰军方。我们在一个十分隆重的宴会上讨论了乌克兰居民与波兰士兵之间的关系问题。宴会上备有各种饮料，菜肴也同这一群重要人物相称。马林科夫在那时还不是一个很能喝酒的人；但是乌克兰是以殷勤好客出名的，而我相信我们保持了这个传统。会谈结束后，布尔加宁同贝林乘飞机离开，马林科夫则回莫斯科。至于我们讨论的问题，结果是不了了之。事态没有加剧。就乌克兰政府而论，肯定不存在反波的

政策。

1944年，当我们的军队向波兰国境推进的时候，我同贝林有过进一步的接触。我们解放了卢布林城，随后把它作为波兰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政府中的许多成员，包括贝林，以及贝鲁特和华西列夫斯卡，经常到基辅来。我认为新的波兰政府领导机构把大本营设在卢布林是非常正确的：第一，这是在波兰国土上而不是在苏联国土上；第二，因为它是从前的首都。①

以卢布林作为基地，波兰同志开始对周围地区进行调查，并在被苏军解放的土地上建立起为行使政权所必需的政府机构。

一些非党波兰人那时也很活跃，其中有维托斯兄弟俩。一个是著名的政治家。他曾经当过波兰议会的代表和波兰农民党的领袖。当然，那是指富农阶级。②另一个维托斯当时是设立在我们国土上的临时政府的一员。③他不是搞政治出身，而是搞农业的。他从他的土地和作坊中赚了很大一笔钱。不用说，他是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集体化，反对苏维埃的。但是当某些波兰党派提名他为

---

① 卢布林曾经是十六世纪宣布波兰和立陶宛合并的议会的所在地，同时也是1918年成立的波兰社会主义政府的所在地。

② 安德烈·维托斯，农民党的一个领袖。

③ 文岑特·维托斯，农民党的一个元老政治家。

临时政府中的代表时，苏联政府支持了他的提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他对我们的制度和我们国家的态度还是不坏的。

摆在卢布林新政府面前的首要问题之一是调整波兰的边界。斯大林看到了一个医治创伤的机会，因为1939年的里宾特罗甫—莫洛托夫条约使波兰受到了损害。①

要恢复波兰人的好感，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斯大林重新审查了根据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建立起来的边界，并决定沿着所谓寇松线重新划定波兰的东部边界。寇松线起源于凡尔赛条约，在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于1939年所确定的边界之东。在西部，波兰和德国的边界划在沿奥得河和尼斯河的一线，与波兰人恢复过去曾属于他们的领土的传统要求是一致的。奥得—尼斯线对波兰和苏联都是有利的。我们知道波兰迟早将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我们的盟国。我们许多人觉得，包括我自己在内，将来总有一天波兰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或社会主义大家庭的一部分。因此我们乐于让波德的边界尽可能向西推移。

但是，斯大林关于沿寇松线确立东部边界的决定引起了一个问题，因为他没有考虑到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

① 这个条约规定由纳粹德国和苏联瓜分波兰。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26—143页中曾对它的来龙去脉作了描述。

人的民族利益。乌克兰人特别感到不快。只是在几年之前，在 1939 年，乌克兰的东部和西部领土才通过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连成一片。乌克兰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看到自己联合成一个国家，一个苏维埃国家。在基辅和莫斯科曾经举行过庆祝胜利的活动。我们国家获得了最大限度的领土，同时也满足了乌克兰人的热切愿望。而现在，在战后，斯大林却决定把西乌克兰的一部分土地归还给波兰。

以赫尔姆城为例。根据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的规定，这个城已成为乌克兰的一部分。现在，赫尔姆却将和其他若干地区一道，重新变为波兰的一部分。而这些地区的居民绝大多数是乌克兰人，这样，几十万乌克兰人在瞬息之间又置于波兰的管辖之下。

斯大林是以他特有的蠢笨而秘密的方式作出这个决定的。他既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又不向任何人打招呼。他就是这种人。直到他已经通知波兰领导人之后，我才知道斯大林的这个决定。他使我这个乌克兰共产党书记和乌克兰人民委员会主席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那些拥护党的乌克兰知识分子对整个事态感到恼火和不安。我能对他们讲些什么呢？我既不能对他们表示同情，因为那会意味着对斯大林的违抗；我又无法向他们为斯大林的决定进行辩解。

斯大林对波兰人所作出的重大让步，对我们的共和

国和我个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困难。我特别是指他那种把新的波兰领导人当作宠儿以及用牺牲苏联的办法来援助波兰的做法。粮食从乌克兰运往波兰，而乌克兰人却由于挨饿而发生浮肿，甚至在某些地方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

我并不是说在乌克兰存在着任何强烈的反波情绪。归根到底，只有极小一部分人才知道把粮食运往波兰的事。旺达·华西列夫斯卡是其中的一个。她经常去华沙，而在她回到基辅时，她告诉了我许多难以置信的事。

她说，“我亲眼看到，在华沙，他们得到了大量黑面包，甚至还有一些白面包。但是他们埋怨苏联政府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白面包。他们说，波兰人不习惯吃黑面包。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们的情况就是这样：为了在经济上帮助波兰人，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同时把乌克兰的土地归还了他们。但是，不管你相信不相信，我后来碰到过一些波兰同志，他们对在希特勒撤走后斯大林给予他们的边界仍然不满意。他们认为他们和苏联之间的边界应当进一步向东推移。

我问，“你们怎么可能提出这样的事情？你们这样说是想吞并乌克兰人居住的土地！”

他们说，“不错，但这是列宁的意见，不是我们的意见。当1920年波兰和苏联之间的战争爆发的时候，列宁说过他愿意给予波兰所希望的边界，如果这样做能够结

束战争的话。”

可能列宁曾就这件事向波兰临时政府的捷尔任斯基发出过指示。①但是，即使列宁作出过这一建议，那也只是作为结束战争的一种方法。这并不意味着他认为乌克兰人应当从苏联移交给波兰统治。

斯大林在一经打定主意把波兰的东部边界调整到寇松线之后，他就决定让愿意回来的乌克兰人从波兰新的边境地区越过边界迁到苏维埃乌克兰。同样，在苏维埃乌克兰的波兰居民也给予选择迁往波兰的权利。对于居住在布列斯特附近边界两侧的波兰人和白俄罗斯人，也采取了同样的措施。斯大林命令我作为乌克兰的代表，和白俄罗斯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波诺马连科一道，同波兰临时政府接触，并拟订出一项交换居民的计划。对于决定的本身，并没有同我们商量；只是要我们制订具体办法，并把它付诸实施。我们指派了乌克兰食品工业部部长波德戈尔内同志作为驻波兰政府的代表，去解决我们和波兰交换居民条约中的所有问题。我用电话通知了波诺马连科，并安排了一次同他和波兰人以及我们的大使布尔加宁的会见。我从基辅飞往卢布林，波诺马连

---

① 1920年，布尔什维克在波兰的比亚威斯托克建立了一个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领导的政府，作为共产主义政权的萌芽。捷尔任斯基是一个波兰人，他在1918年到1926年间是苏联秘密警察的头子。

科则从明斯克前往。

总的来说，我们受到了波兰人的友好接待。当然，对于波兰战后的发展，他们并不是所有人的想法都是一样的。有些人并不是共产党员。事实上，相当数量的人愿意看到一个独立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波兰，而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波兰。〔文岑特〕维托斯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关于建立集体农庄的思想，使他变得象一只乌鸦看到了驱鸟的稻草人时那样惊慌。

我记得有一次为波兰政府和农民的代表们组织的盛大宴会。我问布尔加宁和贝鲁特，“我打个电话到基辅去，让他们给我们送些西瓜来款待波兰代表，好吗？”在我的记忆中，那是8月间。我们在乌克兰有很多西瓜，而在波兰却没有。我们计算了为招待所有波兰政府和农民的领导人所需要的数量。然后我们装了两架飞机从基辅运到卢布林。当我们在会上拿出西瓜时，维托斯表示异议。他说政府代表们一个也不能拿，应当全部由农民拿。

我说，“这是什么意思？维托斯先生。你想拒绝我们的盛情款待吗？你们自己也不打算试试我们乌克兰集体农民种出来的这些美妙的产品吗？尝一尝这些鲜美的西瓜吧！这种瓜的名字叫做‘科尔霍日尼察’”。①

他以为我在说笑话，但是我告诉他我说的是真话

① “科尔霍日尼察”这个字是俄语，意思是集体农庄女庄员。

他说，“好吧，既然这种瓜叫做‘集体农庄姑娘’，那么为什么不是红的呢？”

“维托斯先生，可能不是红的，但你会发现十分香甜可口。我想你会喜欢它的。”

很明显，我们不单是在谈论西瓜。我们是在谈论政治，以及谈论维托斯对苏联的态度。

在我访问卢布林期间，布尔加宁建议我们到郊外的一个地方去。在那里，德国人曾经建立了一个消灭波兰和许多西方国家俘虏的集中营。①当我们到达那里时，挖掘队正在挖掘这个集中营里的万人冢。我看到过不少德国人所犯下的兽行的罪证，但是我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把人化为灰烬的焚尸炉。那是盛夏的一天。挖掘队已经挖开了一些坟墓，并搬走了尸体，但是留下了一些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走近挖掘队正在工作的地方是难以忍受的。布尔加宁受不了腐烂的人肉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恶臭，他干脆跑开了。我有相当坚强的毅力，因此我能够到处跑跑看看，而不显露任何反感。我觉得我们不应当表现得象两个弱不禁风的男子，受不住死尸身上的臭气。

① 这是设在麦丹尼克的集中营。十年后，1955 年当康拉德·阿登纳前往莫斯科时，布尔加宁曾提到他和赫鲁晓夫在那里的参观。在一次争辩中，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质问西德总理道，“难道我们能够忘掉从受尽折磨的妇女头上扯下的、藏在麦丹尼克储藏室里的成吨头发吗？我们亲眼看到在麦丹尼克所能找到的一切。”

之后，布尔加宁和我观看了毒气室。这些房间很象临时搭起的浴室。进口处象监狱里的门一样，都有窥视的小孔。这样，看守可以看到被赶到里面去的人群是否全都死了。从毒气室里搬出的尸体再运到火葬场，放在特大的炉子里焚化。那里还有一大堆可怕的骨灰和没有完全焚化的遗骨。我们还参观了囚房和一座仓库，在那里我看到收藏了大量男人和妇女的鞋子。陪同我们参观的向导告诉我们说，德国人把所有受害者的衣服全部加以分类整理，然后运回德国。在另一间贮藏室里是大量的女人的头发。换句话说，德国人是真正的行家。就象屠宰场里的屠夫把牲口身上的每一部分（蹄、角、毛）各派各的用场那样，这些蛮横的德国人用同样的方法处理人的尸体。所有东西都整理得清清楚楚，诸如眼镜，梳子，只要你能够想象得到的每一件东西。这整个情景构成了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印象。绝对难以设想所有这一切都是人，而且是被认为是文明的人做出来的 。我们通常对德国的文化持有很高的评价。但是看看在希特勒统治下的这种文化带来了些什么！

从集中营出来，布尔加宁和我一起去参观了赫尔姆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个城是沙皇俄国的一个省会。后来，根据凡尔赛条约把它移交给波兰。正如我前面已经提到的，在 1939 年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签订后，赫尔姆重新并入了苏维埃乌克兰。但是现在它又一

次将归还给波兰了。当布尔加宁和我在城里观光时，我们注意到了一所东正教大教堂。我们决定进去仔细看看。前来开门的是一个白发斑斑的老人，一个典型的俄国东正教神甫。他告诉我们这个教堂怎样建成为一所东正教的大教堂，然而在这个城易手的年月里，波兰人一再把它改建成为一所天主教教堂，就这样变来变去。他已经听到公告说苏联政府将把赫尔姆还给波兰。他带着忧伤的神情说，那些天主教神甫又要回来再一次接管教堂了。他恳求我们设法帮助。我们都穿着军装，因此他以为我们对事态的发展和边界的调整有着一定的影响。我们告诉他我们不管教堂的事情，我们不管哪个宗教(天主教还是东正教)使用它的大教堂。在苏联，政教是分开的，我们不打算去干预宗教的内部事务。于是，我们上了汽车，驶回卢布林。

过了不久，我去卢布林同波兰人保持经常接触的必要性减少了。波兰方面派了官员到基辅我们这里来。他们负责登记那些愿意迁往波兰的波籍苏联公民，并处理同我们相互关系正常化有关的其他行政事务。尽管我没有再到卢布林去，我仍旧经常在莫斯科见到我们的波兰同志。斯大林常常把我找去听取波兰人的要求和意见，因为他不愿意劳自己的驾。如果一位波兰同志请求斯大林做什么事而斯大林不愿意自己出面拒绝，他就会把我从基辅找去替他担任这份苦差使。

他会说，“赫鲁晓夫在这里，让他决定吧！你们俩彼

此都熟悉，我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取得一致意见。”于是他坐在一旁仔细听，耐心看我怎样拒绝波兰同志提出的要求。当然，不管用什么方法，我必须拒绝。

举例来说，斯大林有一次邀我参加他同贝鲁特的谈话。贝鲁特大声问我们是否愿意把利沃夫城还给波兰。他说，“如果利沃夫再一次成为我们国家的一部分，我们波兰人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将感到满意。”

很明显，斯大林事先就知道贝鲁特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转向我说，“赫鲁晓夫在这里。你为什么不问问他对这个意见有什么想法？”

不用说，我是希望利沃夫留在苏联的。我不能想象乌克兰共和国会把它还给波兰。波兰人既没有民族上的也没有历史上的理由对这个城市提出要求。但是为什么一定要我来对贝鲁特讲这些话呢？斯大林迫使我站出来为苏联的利益讲话，只不过是因为他自己不愿意讲。后来他对我说，“你对付贝鲁特的方式完全正确。波兰人已经使自己的胃口失去了控制。”

后来贝鲁特又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其他一些波兰同志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商谈各种问题，其中包括有关利沃夫的另一个问题。①斯大林把我从基辅找去参加了这一会谈。

---

① 爱德华·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是社会党的领导人。他和共产党人密切合作，后来做过总理。

贝鲁特开始说，“斯大林同志，在利沃夫有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陈列品，很受当地波兰居民的欢迎。是否可以把这件陈列品送回波兰去？”

斯大林说，“同赫鲁晓夫去解决这个问题。不管你们怎样决定，我都同意。”

贝鲁特带着探询的神情望着我。我说，“如果你们要这幅壁画，你们随时可以拿走。它在我们仓库里放着。在整个占领期间，它一直搁在那里，没有人管。有人告诉我这幅画已经受潮，并且损坏得很厉害。要修复它需要进行大量工作。”

其实，事情要复杂得多。在利沃夫解放后，人们从仓库里取出了这幅壁画，并把它公开展出。这是一整套组画，展示了十九世纪波兰人民反抗俄国人统治的景象。其中有一个场面描绘一次战斗的结局，一支波兰起义军队打败了俄国军队，俘虏了俄国的将军，并正在把他带去监禁起来。此外，还有波兰人抗击沙皇俄国斗争史上的另一些事迹。顷刻之间，这幅壁画简直成了住在利沃夫周围波兰人朝圣的目标。很显然，这幅壁画触着了他们敏感的心弦。我们不喜欢这样一种朝圣后面的含意。因此，我们取下了这幅壁画，把它重新放进了仓库。

当然，我们可以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这件陈列品，也可以说它所重现的这些场面都是过去的事了。但是过去常常同当前有着联系。这幅壁画的内容可以解释为是反俄

国人的。描绘波兰人同俄国人打仗的图画，不可能为建立我们三个兄弟国家（波兰，俄国和乌克兰）之间更加亲密的关系这个目标服务。与此相反，这样的陈列品可能会诱使波兰人重演他们历史上的那段插曲。

由于有这样的想法，我感到必须提醒贝鲁特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把这件陈列品从利沃夫搬到华沙可能产生的后果。"如果你们一定要，那就拿走吧！但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把它公开展出，将会煽起我们两国人民之间的敌对情绪。这将会象一次战争动员那样，要你们的人民去'同俄国打仗吧！打败俄国佬'！"

斯大林却不同意我的说法。他支持波兰同志，并说，"但这一切都成了历史，已经过去和完结了。看看我们吧！我们上演了一出歌剧《伊凡·苏萨宁》。这是一部反波的作品。可是它对我们今天的目标并没有带来什么损害。"

我反对说，"那是不一样的。《伊凡·苏萨宁》是描写波兰人侵犯莫斯科时我们反抗他们的斗争。这一历史情况同今天不能相提并论。①利沃夫的壁画是描绘波兰人反对俄国人的华沙起义。难道你不知道，波兰人不会把这一幅壁画仅仅同古代历史联系起来。但是，我已经说过，如果波兰同志想要把它拿到华沙去，那么让他们拿走

---

① M·I·格林卡所著歌剧《伊凡·苏萨宁》是写十七世纪的一个俄国农民英雄，他诱骗了一支波兰侵略军队并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好了。”

他们就这样拿去了。我有时碰到其他一些至今和我保持良好关系的波兰同志和老友，他们使我想起很久以前发生的那件事。这些朋友有次告诉我，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后来声称我曾经反对他把这件陈列品携回华沙。

我说，“那不是事实。我并没有反对让他拿走。我只是想提请他注意一种非常现实的危险性。波兰的民族主义分子可能利用这件陈列品破坏当时正在发展的波苏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

1968年，我的担心被证实了。密茨凯维奇写的一部历史剧在华沙搬上了舞台，观众以一片反俄的喊叫声和口号声欢迎它。这个剧本的主题是讲波兰被俄国占领的情况〔在十九世纪〕；剧本中有很多号召人们赶走俄国占领者的台词。这个剧本产生了完全出于意料的效果。我并不是说这个剧本没有反映艺术和历史的真实，正如利沃夫的陈列品可能反映了艺术和历史的真实一样。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这个剧本的上演给波兰共产党领导造成了极大的困难。①

① 亚当·密茨凯维奇描写十九世纪爱国主义的古典历史剧《先人祭》曾在华沙上演。当苏联大使馆对这个剧本的民族主义情调提出抗议后，该剧于1968年3月停演。对《先人祭》的禁演标志着哥穆尔卡政权对知识界全面压制的开始。

当波兰同志在苏联军队解放的领土上为重建国家进行一些基础工作时，我们继续同他们密切合作。在波兰政府把办公地点从卢布林迁往华沙之前，必须将希特勒分子赶走得更远一些。我们军队一直推进到维斯杜拉河，离开被德国人占领的首都已经近在咫尺了。

突然，在这座城市里爆发了起义。它的领导人是鲍尔—科莫洛夫斯基将军。①他是按照米科拉伊奇克的指示行事的。米科拉伊奇克是一个狂热的反苏、反共分子，是在丘吉尔卵翼下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首脑。②

自从苏联军队开始向波兰进军起，鲍尔—科莫洛夫斯基就在伦敦的命令下，拒绝对希特勒占领者进行战斗，也不给苏联解放者任何帮助。看来，米科拉伊奇克的反

① 塔代乌士·鲍尔-科莫洛夫斯基伯爵，1944年8月到9月华沙起义时的波兰国家军司令。

② 斯坦尼斯拉夫·米科拉伊奇克在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将军于1943年飞机失事死亡后，接替后者为伦敦的流亡政府总理。米科拉伊奇克两次访问苏联，同斯大林和波兰共产党人谈判；第一次在1944年8月，第二次在两个月后丘吉尔在莫斯科的时候。1944年11月，米科拉伊奇克辞去了伦敦政府的首脑职务。次年，他出版了一本书，申述他对局势的看法。这本书在英国出版的书名是《苏联统治的格局》，在美国出版的书名是《波兰被强占》。

共流亡政府想保存它在波兰的武装部队，准备对苏联军队作战。

在伦敦的波兰人希望战后的波兰掌握在以米科拉伊奇克为首的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反动的、反社会主义的、反苏和亲西方的政府手里。米科拉伊奇克勾结丘吉尔定下了政治目标，要在苏联军队到达华沙以前〔由英美军队〕把它解放。这样，当苏联人到达时，米科拉伊奇克支持下的一个亲西方政府就可以控制这个城市。但是事情并没有朝那个方向发展。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的我军先到达那里。在伦敦的反共波兰人士认为，苏联军队一到维斯杜拉河岸就会立刻进城，所以他们下令鲍尔一科莫洛夫斯基对德国人发动一次最后的反抗。

但是，我们的部队没有照起义者所希望的那样做。我们没有进城。罗科索夫斯基的军队在维斯杜拉河的右岸等候着。你也许要问我们为什么不立刻渡河解放那座城市。有几个原因。第一，这条河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天然障碍，渡河需要很长时间，在人员和设备方面要化很大代价。第二，进攻部队总是要比防守部队遭到更大的伤亡。这两种考虑都说明，我们应当等候增援部队来接应先头部队。而且，我们的司令已作出估计，为了减少我们的损失，我们宁可不从正面进攻而从左岸进攻，把德国人赶出城外，然后从侧面进攻加以包围，这一点，我们早已在华沙南面作好准备，在那里建立了一个桥头堡。但是这些准

备工作都需要时间。这说明为什么波兰人在城里起义的时候，我们还得在河那边等待。

德国人把华沙的暴动镇压了，把起义者拘捕起来，包括鲍尔一科莫洛夫斯基将军在内。当希特勒分子在占领区抓住起义首领时，他们通常是不会怜悯的，他们会立刻把他枪毙。但是这个鲍尔一科莫洛夫斯基却被允许活下来，在战后进行反波兰和反社会主义的活动——这就使我奇怪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物。

德国人从城里一被赶走，波兰同志就从卢布林迁到华沙。我继续和他们保持联系。1945 年 1 月，当我还在乌克兰工作时，斯大林打电话问我，"你能立刻到莫斯科来吗？这里有急事等着你。"我从基辅飞到莫斯科。斯大林看见我时，精神非常兴奋。他象开了屏的孔雀那样神气活现地踱来踱去——和四年前象吓坏了的兔子四肢瘫痪不敢领导的模样完全不同了。照他现在这副神气，好象苏联军队所以能够取得胜利全靠他的英明领导，而不是靠我们士兵的勇敢和牺牲。

"波兰同志要求我们帮助他们恢复市政公用事业，尤其是供水和下水道系统。我们已经解放了华沙，我们的军队已占领了这个城市，但是波兰人仍处于毫无办法的境地。他们说，华沙已成了一片废墟，他们不知道从何处着手工作。你对迅速恢复主要的市政设施方面已有了不少的经验，因此，我们想派你去华沙照料一下那里的工

作。”

我回答说，“很好，我很乐意去。但是我要带几位市政管理人员和电气工程师一起去。首先得恢复波兰人的发电站，然后再着手供水和下水道的工作。”

我要求斯特拉缅托夫同志和我一起去。我了解，他是个出色的组织者并在管理电气设备方面也是内行。我还带了几位对发电站、供水和下水道有专门研究的工程师。我们一起飞往华沙。①

我到达波兰首都后参观了整个市区。这座城市已全部被炸毁，变成了一片大坟场，数以千计的居民葬身在废墟之下。炸得最厉害的部分是有名的犹太人居住区，德国人曾把犹太人通通赶到那里，然后用飞机大炮把它炸成平地。我记得看到一大堆瓦砾，那是一所住房的遗址，接着发现地下室里还有人住着。人们能够在这种没有任何设备和供应的情况下维持生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必须采取行动——而且要快。

我们的工程师和波兰的工程师一起组成三个小组。一个组的任务是尽快地恢复发电，第二组负责供水，第三组是修理下水道系统。波兰人自己负责把市内清扫干净，这不属于我们的工作范围，虽然我们应该表示我们同波兰人是团结一致的。我记得有一位波兰同志对我说，“来

① 这一段和前三段都已发表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57—361页。

吧，赫鲁晓夫同志，帮我们一起搞，拿起铁铲，象征性地参加华沙的重建工作吧！"我是乐意照办的。

我委派斯特拉缅托夫同志全面负责重建工作。他手下既有波兰专家，也有俄国专家。他负责处理一切特殊问题并把全面情况向我汇报。

华沙恢复了水电供应。在维斯杜拉河上桥梁被炸毁的地方，我们架起了浮桥，使卡车和其他机械化运输工具可以进入城市。我们还临时修复了铁路桥梁，使火车可以为我们正在向前推进的军队运送补给。

我希望从空中看一下整个华沙。我要我的飞行员尼古拉·伊凡诺维奇·齐宾驾驶飞机让我在城市上空兜几圈；在战争期间他一直为我驾驶飞机①。看到希特勒匪帮的所作所为真是令人毛骨悚然。维斯杜拉河左岸的主要部分已成一片废墟，只有郊区几片孤零零的土地上还有一些建筑物残存着。右岸的布拉加区损坏的程度稍小一些，波兰政府（当时称为波兰委员会）的临时办公地点就设在那里。

那时的苏联大使是列别杰夫同志，过去我不认识他。他似乎对政治情况非常熟悉，并告诉我许多关于波兰同

---

① 1956年匈牙利暴动时期，齐宾曾驾驶飞机把赫鲁晓夫送到亚得里亚海的布里俄尼岛，同南斯拉夫总统铁托进行秘密会商（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20—421页）。

志的工作情况。后来由于他的活动越出了大使的正常职责，斯大林把他调走了。他显然想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波兰同志，要他们听命于他。如果这些罪状是确实的话，斯大林把他免职是完全正确的。当我和列别杰夫在一起时，他给我的印象是消息灵通，但毫无疑问，性格也相当倔强，还有强迫命令作风。他坚持要我住在他的家里，因为我们的大使馆还是乱糟糟的。①

我还认识了华沙市长斯彼哈尔斯基将军。我一开始就喜欢他。他年轻，精力充沛，工作努力。②

当时，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任总理。当他领导的左翼社会党并入共产党（当时称为波兰工人党）时，他得到了这个职位。他邀请我访问纺织工业中心罗兹，并陪同我驱车前往。这时，我对他有更多的了解。驰名全俄国的纺织品就是在这个城市制造的。罗兹还作为波兰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运动中心而闻名。在我们对华沙的这次短暂访问中，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和我同罗拉—日伊美尔斯基共进了一次非常热闹的晚餐。罗拉—日伊美尔斯基兴高采烈，席间连续不断地讲笑话。我对罗拉—日伊

---

① V·Z·列别杰夫在1944年到1950年期间任驻波大使。他是一位老资格的外交家，战前曾在南斯拉夫任职，战时派驻在一些盟国设在伦敦的政府。

② 马里安·斯彼哈尔斯基将军是陆军情报工作负责人，1945年从华沙市长调任国防部副部长。

美尔斯基怀有最高的敬意，超过我对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的评价。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给我的印象是一个平庸的人，是一个平庸的政治家。他对合作问题特别专长。其他波兰同志告诉我，在党的领导中他并不算是个重要人物。他们对他很冷淡，因为觉得他不是真正站在社会主义立场献身于波兰的重建事业。我倒也有同感。

波兰工人党的领袖是贝鲁特同志，他既是国家总统又是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我见过贝鲁特好多次，我个人对他仍然有着最美好的回忆。他的女儿嫁给格鲁吉亚的一位建筑师。她每年一次往返于第比利斯与华沙时总是来看望我们。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总是非常高兴地招待她。她的来访使我们回忆起她的父亲、我们的朋友贝鲁特同志还在世时同我们一起度过的美好日子。

在华沙重建时期，贝鲁特是领导核心中的灵魂。我知道他是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为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奋斗终身。然而我必须说，即使在当时，我已感到他有一定的弱点。他在处理一些人的问题时太软弱，太温和。一方面，他善良的人情味吸引着人们，包括我在内。但心地善良和推心置腹有时会过分。这种品质后来被他的同事们所利用，一度使波兰的事情有点复杂化。

在恢复华沙的水电供应方面我们给予贝鲁特的帮助，使他极为高兴。他真是满面红光。他对我们千谢万

谢，要我们向斯大林同志转达他的谢意。他显然讲得十分诚恳。

我们离开华沙回莫斯科之前，贝鲁特向我们提了一个建议："这里有一个名叫哥穆尔卡的同志，在我们波兰共产党内是一位重要人物。希望你能到他的寓所去看看他。他病得很重，不能出门。"

我说："很好，我很乐意去。"

有人把我带到一个阴沉和布满烟垢的单间公寓。我们到达时，哥穆尔卡的妻子正在洗衣服。哥穆尔卡同志坐在椅子上，脖子上围着一条黑色的好象围巾一样的东西。他的俄语说得不太好，但通过译员的帮助，我们能彼此了解。他对我谈了对波兰总的形势的看法。我看得很清楚，他知道从哪里着手去组织党和政府的各种工作。总而言之，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能干的政治领导人和国务活动家。他说："我现在还有病，但不久就可以出去工作的。"

回到莫斯科以后，我写了一个报告给斯大林，汇报了我们做的工作和我们看到的人。这份报告至今还在中央委员会档案馆中。斯大林对我们能够帮助波兰人感到特别高兴；他知道这一帮助会在波兰人民中留下良好的印象。1939 年的条约严重地挫伤了波兰人的感情，而且他们对此记忆犹新。斯大林希望用一切可能的办法尽快治愈这个创伤。当然，他没有直接和我这样讲，但是我能意

识到他在想些什么。①

在给斯大林的报告里，我高度评价了哥穆尔卡。我不知道斯大林过去听到过他没有。我们其余的人都没有听到过，我怀疑斯大林也没有听到过。我写给斯大林的报告中说："哥穆尔卡在波兰具有权威的地位，将来肯定会成为领导人，很可能是波兰工人党未来的领袖。"部分由于我们推荐，斯大林才挑选哥穆尔卡作为制定战后波兰国家政治方针的人物之一。

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党人曾为了达到下面这个目标而联合起来：使波兰走上社会主义的道路。但是实现这个目标还有待于希特勒敌人的彻底消灭。

后来，战争终于结束了。共产党得以把注意力转向另一方面的斗争，即反对米科拉伊奇克领导的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的斗争。战争结束时他已从伦敦回到波兰。丘吉尔亲自向斯大林施加压力，要求让米科拉伊奇克回来，说他是苏联的朋友，在联合政府里应当担任波兰总理。丘吉尔给斯大林的一封信里有这样几句话："米科拉伊奇克先生对你和你们的国家怀有最高的敬意。作为波兰流亡政府的首脑，他做了出色的工作，你可以相信他作为新的波兰国家元首会干得同样出色。"

斯大林还得考虑盟国的愿望和意见，因此同意了米

---

① 赫鲁晓夫关于他同哥穆尔卡初次会见的记载，也见于《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57—361页。

科拉伊奇克回国。我是在斯大林为他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认识他的。我自己没有和他交谈，我看到斯大林和他说了几句话。米科拉伊奇克个子比一般人高，秃顶。他是一个外貌平常的人，并不给人很深刻的印象。当然，我对他的印象是由他的政治信仰决定的，这使我在见到他之前就对他没有好感。

斯大林写给丘吉尔的信上说，波兰将走什么政治道路的问题，只有通过选举来解决。大选的日期已确定了。①实际上，这是一次决定波兰人民信任谁、希望谁担任领导的公民投票。米科拉伊奇克在农村有相当多的支持者，在城市里也是一样，因为波兰还有毕苏斯基政权遗留下来的痕迹以及他的社会党的影响。②更重要的是，由

---

① 选举决定在1947年1月19日举行。1946年8月，斯大林召集鲍列斯瓦夫·贝鲁特以及其他波兰共产党和亲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他们说，"选举必须在选举进行前获得胜利。"他为每个党派在波兰议会里所应占的席位规定了确切的百分比，并说："我要看看你们实际上有多大力量。"大选之前，对非共产党人搞了一次恐怖运动。大部分投票是在军队监视下举行的。英国和美国抗议这次选举违反了雅尔塔和波茨坦协定。美国国务卿马歇尔说："事情很清楚，临时政府……采用了大量的武力和威胁的措施，去反对忠于波兰但不属于共产党集团的民主分子。"

② 波兰社会党在战前曾统治波兰，具有广泛的基础。它既包括保守的民族主义分子，也有同情共产国际的左翼分子；后者在战后政府中很快地同共产党人合并在一起。

于我们和希特勒签订过条约，许多波兰人对苏联态度很冷淡。由里宾特洛甫和莫洛托夫签订的条约，给很多人留下极坏的印象。有些波兰人认为苏联和希特勒就何时发动战争事先作了交易，然后战争就象雪崩一样降临到波兰人民头上。这种遗留下来的对我们苏维埃国家的忿懑情绪，在波兰选举中为共产党候选人又增加了一些复杂因素。

斯大林积极关心这次选举。当时，我是他和波兰同志举行多次会谈的见证人。我说是“见证人”，因为我很少说话。所有决定都是斯大林亲自作出的。有时他也问问情况，但从不征求意见。在每次和波兰同志会商时，斯大林最宠信的人是贝鲁特。我们一些领导人，包括我自己在内，也同样认为贝鲁特是值得信任和尊敬的。我觉得，即使那时哥穆尔卡的地位正在上升，他也承认贝鲁特是他的领导。

我想谈谈在选举期间表现很活跃的其他几位波兰同志。但首先要谈谈一位没有参加选举的同志。这就是旺达·华西列夫斯卡，当时她住在基辅。她拒绝提名为波兰议员。我想，她既有政治上的考虑，也有纯粹属于个人方面的原因，因为她和考涅楚克已经难解难分了。①作为一个女人，她最终希望找到一个精神上的依靠和慰藉，而考

① A·考涅楚克是知名的乌克兰共产党员作家和政治家。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48页和330页。

涅楚克正是她的意中人。她左右为难。她必须在考涅楚克和波兰之间作出选择。她选择了考涅楚克，拒绝回波兰去竞选议员。我记得有一次同她谈到她的这个决定。

“旺达·利沃芙娜，你知道，现在战争已经结束，无论如何你总得回国去了。”

她答复说，“只要波兰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我就永远也不回去。我要到波兰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才回去。”她变得激动起来，接着说，“你想干什么，想把我从基辅赶走吗？你不要我在这儿吗？”

当然，她不是顶真的。她知道我是多么喜欢她和尊重她。她只不过是故作娇嗔地表示不愿回波兰去当候选人而已。虽然如此，她还是愿意回国作几次短期旅行，主要看望她心爱的老母。当她返回基辅时，她常常告诉我们一些波兰正在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以及她的印象。我觉得她和贝鲁特很合得来，而和哥穆尔卡合不大来。

我从旺达·华西列夫斯卡那里第一次听到西伦凯维兹。她在战前就认识他，对他极为尊重。①西伦凯维兹和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一样是左翼社会党人。他在社会党内积极从事青年工作。旺达·利沃芙娜有一次对我说，“西伦凯维兹是一个精力充沛而又能干的人。记住我

① 约瑟夫·西伦凯维兹从社会党员转成共产党员，是战后波兰政界中任职最久的一个重要人物；从1947年选举后任总理，一直到1971年。

的话；将来他会成为一个知名的政治家。”

她和贝尔曼同志、明茨同志的关系也很好。①他们都是老共产党员、共产国际的老战士，献身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事业和学说。波兰解放初期，这些人就从莫斯科直接派到波兰。他们属于我们最优秀的久经考验的干部之列，并且在波兰给予我国人民以坚定的支持。他们两人在重建工作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贝尔曼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党的工作者，明茨是出色的经济学家。他们在波兰议会选举中也很活跃。

这次选举对我们来说是一次胜利，对丘吉尔则是一次失败。丘吉尔政策的要点，就是想把米科拉伊奇克提升到可以决定波兰国家对内和对外政策的地位。当选举结果揭晓时，米科拉伊奇克的党遭到了失败。波兰工人党以及同它联合的党派获得了绝大多数选票。旺达·利沃芙娜·华西列夫斯卡曾告诉我当时在波兰知识界流行的一个颇为尖刻的笑话。波兰人是很善于讲政治笑话的。他们编了一个关于选票箱的笑话：“这是只什么样子的箱子啊？你投进米科拉伊奇克的票，拿出来的却是哥穆尔卡的票！”②这个笑话的意思（我认为这反映了真实）是说选

① 雅库勃·贝尔曼与红军一起从苏联进入波兰；希拉雷·明茨也是由莫斯科训练并按莫斯科的方针行事的。战后初期，他们的权力仅次于贝鲁特。

② 赫鲁晓夫引用这支波兰民谣时，一半讲俄语，一半讲波兰语。

举不是客观的。有些人认为大多数人投了米科拉伊奇克的票，而计票时有舞弊。西方自然抱怨共产党人在作弊。

选举以后，贝鲁特在斯大林支持之下担任了新领导班子的第一把手。西伦凯维兹同志替代了奥苏布卡一莫拉夫斯基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哥穆尔卡、贝尔曼和明茨也参加了新政府。所有这些职位都是在与斯大林密切协商下决定的。①

政府的政策立即向左转。当米科拉伊奇克看到波兰已经坚定地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时，他知道自己已无事可做，便逃亡到国外去。这样，他等于承认了自己政策的失败。在西方帮助下，他逃往伦敦。

因此，虽然还有一些人动摇不定，绝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阶级，最后一致决定投入波兰的社会主义建设。尽管可能出现过投米科拉伊奇克的票后来变成了投哥穆尔卡的票这样的事情，但波兰人民对新选出的官员并没有进行任何抵制。如果他们投了米科拉伊奇克的票而选出来的却是哥穆尔卡，他们也觉得无所谓——至少在我看来，这说明他们还缺乏根深蒂固的独立的政治见解。选举之前，对于共产党掌权以后究竟会干些什么，他们可能受了一些欺骗宣传或恫吓，但是他们的恐惧和不信任情

① 新选出的波兰议会在 2 月开会，宣布贝鲁特任共和国总统；几天之后，以西伦凯维兹为总理的新政府组成，哥穆尔卡和明茨任副总理，贝尔曼任总理办公室副国务秘书。

绪只是暂时的，后来很快就消失了。反对共产党的人曾试图用集体化的前景来吓唬投票人，但党竭力向农民保证，他们的农田不会集体化。也许这种恐吓的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起了些作用；但是领导一上台，农民很快改变了主意，心甘情愿地跟着新政府走。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关波兰人民进行武装抵抗的报道，甚至没有听到过关于这方面的传闻。如果发生这类麻烦，我肯定会知道。贝鲁特同志和哥穆尔卡同志会当我面告诉斯大林的。即使他们不曾向他报告，即使他们企图对这类乱子加以保密，我们还是会发现的。

当然，当我说波兰没有发生麻烦时，我指的是一些大城市。沿乌克兰边境的波兰东部地区发生了好几次暴动。然而，这些骚乱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而不是波兰人煽动起来的，有时同一场战争差不多。美国人又在火上加油，他们给叛乱分子空投武器、各种设备、交通工具和其他物资。我们对波兰新政府在东部领土所遇到的麻烦深表同情，因为在边界的我们这边，在西乌克兰，我们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和斯捷潘·班杰拉的党羽进行了残酷的斗争。①我们还不得不对强烈反抗新制度的富

---

① 班杰拉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组织”的首领，最后被迫流亡（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140页）。1959年他在慕尼黑自己的公寓门口被克格勃（苏联秘密警察）用毒气手枪所暗杀。

农分子和立陶宛的武装叛乱进行斗争。①

乌克兰民族主义分子在波兰国内的活动发展得如此严重，使波兰武装部队不得不在喀尔巴阡山附近的边境地区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许多优秀的人物死于恐怖分子之手。其中有一位是将军，他曾用"沃尔特"这个名字参加了反对佛朗哥的西班牙内战。他是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亲密战友。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有一次曾把他介绍给我。据我记忆所及，这位波兰将军是苏联人。②

那个时候，有许多苏联籍的波兰人在波兰工作。最有名的当然要算罗科索夫斯基元帅了，他是波兰军队的总司令。他真心诚意地热爱苏联，虽然他曾被捕并在狱中度过了一段时间。他没有被处死，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才获释。在战时他立下了辉煌的战功，成为苏联英雄。当波兰的新领导要挑选一位军事领导人时，贝鲁特要求斯大林给他一位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还有谁

---

① 战后苏联统治立陶宛初期，立陶宛游击队同苏联军队和秘密警察部队发生过许多次武装冲突。莫斯科用有组织地集体驱逐出境和强迫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手段来压制这个波罗的海共和国。由于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协定中秘密条款的规定，立陶宛丧失了它的独立。

② 西班牙内战时期，卡罗尔·希维尔切夫斯基将军又名"沃尔特"；他和罗科索夫斯基一样都是波兰裔的苏联公民。斯大林把希维尔切夫斯基派到战后波兰的军队里去，以保证它接受莫斯科的指令。

比罗科索夫斯基更适合担任这个职位呢？这是斯大林的决定，贝鲁特完全拥护。①

斯大林召见罗科索夫斯基通知他新的任命时，我也在场。罗科索夫斯基差不多跪了下来，恳求斯大林不要派他去波兰。他说，他的一生和苏联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舍不得离开。斯大林对他进行说服工作，要他了解接受这次调动的必要性。罗科索夫斯基终于同意了，但他要求斯大林答应他一件事：给他保留苏联国籍和苏联元帅的称号，保持由于他的战功而获得的所有奖状和勋章。斯大林乐意地答应了。

我非常尊敬罗科索夫斯基同志，并为他感到高兴和骄傲。不言自明，已经露头的反动势力完全懂得，罗科索夫斯基永远不会攻打苏联，不会带领波兰军队去同苏联军队作战。总之，他可以是波兰的元帅，但又是苏联的元帅——人们最好不要忘记这一点。

哥穆尔卡遇到麻烦

我经常参加斯大林和波兰同志之间的会谈。在这些会谈中所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抽象的；举行这些会谈是为

---

① 在华沙起义时，罗科索夫斯基接受斯大林的命令，把苏联军队的先头部队留在维斯杜拉河岸。罗科索夫斯基在1949年担任波兰国防部长。

了考虑波兰所面临的具体问题。用“考虑”两字，我应当重复我前面说过的话来加以说明：斯大林从不认真征求别人的意见；他根据他自己的理智作出决定，而他采取行动所依据的理智却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兽性般的猜疑基础上。

以他对贝鲁特的态度为例。他显然非常喜欢这个人。但是我记得他在我们领导的核心圈子里说过，“至于贝鲁特这个家伙，为什么你们不怀疑他曾被德国人拘捕过呢？我们把他派到波兰去以后，他一直在干些什么呢？他的妻子又怎么样？她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在地下工作时就认识了她，这意味着什么呢？”

这很合乎斯大林的性格。他总是爱打听其他领导人的妻子。他并非因为她们是女人才对她们感兴趣。他决不会这样。他甚至从来连看都不对她们看一眼。但是，他认为外国情报机关经常通过女人在共产党员中发展特务。因此，他一直打听别人生活中有关女人的问题，以及他们是如何相识的。当斯大林开始打听某个人的这类问题时，这个人大概快要倒霉了。幸而贝鲁特避免了这种灾难，这部分是由于他知道如何对付斯大林。他对斯大林极为尊敬，并且当斯大林讲话时，他十分注意倾听；但同时，在斯大林面前，贝鲁特显得镇静而轻松。他从来不使斯大林感到神经紧张或侷促不安；斯大林在神经紧张时，就会变得多疑。

哥穆尔卡就不一样。当斯大林讲话时，他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直望着他的眼睛，盯着他的嘴唇动作，竭力抓住斯大林所发出的每一个声音。他还把斯大林讲的话记下来。一方面，哥穆尔卡注意倾听使斯大林感到得意。他是虚荣心很强的人，虽然他知道可以装得满不在乎。他喜欢装做并不关心别人对他有什么看法，因为他在领导我们走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任何人不按照这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走，那就等于完蛋。在 1937 年和 1938 年时，斯大林早已这样做过。所以，当哥穆尔卡全神贯注地倾听时，斯大林可能已得出结论：对哥穆尔卡来说，他已成了神圣的权威。这正投合斯大林的虚荣心。但是，另一方面，哥穆尔卡高度集中注意力又使斯大林感到神经紧张。他当然又用满不在乎的表情来掩盖这种紧张。后来，当波兰同志离开以后，斯大林又会把他的猜疑吐露给我们听："这个哥穆尔卡到底是个什么人呢？他一直坐在那里望着我的眼睛，好象在找寻什么东西似的。他为什么要带个小本本和铅笔呢？为什么要把我讲的每个字都记下来呢？"

因此，我们知道，斯大林也想从哥穆尔卡的举止来证明他可能是帝国主义的特务和危险的敌人；他把斯大林所说的每句话都记下来，以便去向他的头子汇报。

过了一些时候，关于波兰同志的一些奇怪的流言蜚语开始传到我的耳朵里来。我说是流言，因为我虽然是政

治局委员，对波兰正在发生的事情我没有得到任何直接的消息。政治局其他成员也和我一样。对于我国在内政和外交方面的一系列严重问题，我们都一无所闻。斯大林象“万军之主”那样，一切事情由他个人作主。①“调查和汇报”——这就是你所应该做的事；一旦你把他需要的材料交给了他，那就一切与你无关了。因此，使我能够了解波兰情况发展的唯一办法，就是当波兰同志向斯大林汇报时我也参加，竖起耳朵听，并且作出我自己的结论。我从这种方式得到的消息中了解到，在波兰领导内部正在形成一种紧张气氛——这是由于干部政策上的问题所引起的。这种政策随时都可能把领导层内部的冲突表面化。

你知道，犹太复国主义和排犹主义是一对亲兄弟。两者都是反动的，对工人阶级的利益都是有害的。有时会有这样的情况：非犹太血统的人在这个需加小心的问题上往往摔跤；不是滑到反动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方面，就是滑到同样反动的排犹主义方面。让我们看看在波兰领导内部造成麻烦的两个人：贝尔曼和明茨，他们正好都是犹太人。

贝尔曼对贝鲁特具有很大的影响。他要干什么，就可以通过贝鲁特去干，而自己不用抛头露面。我不相信贝鲁特曾经采取过任何一个政治行动而没有和贝尔曼商量

① “万军之主”是指《旧约》中所说的那个黩武的、复仇的、统领万军的上帝。

过。但是，贝尔曼对待本地波兰干部的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造成了一定的困难。①明茨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工作做得很出色，他也是贝鲁特的主要顾问和支持者。但是，他象贝尔曼一样，也表现了某种古怪的态度，后来因此受到党的谴责。我想，贝鲁特依靠这两个人可能超过了应有的限度。

西伦凯维兹同志的地位是不明确的，而且肯定是不值得羡慕的。波兰社会党同工人党合并之前，他是党员人数较多的社会党的代表。②所以，其他波兰同志对他还有一定程度的怀疑。

要知道，这两个党合并并不是因为抱有相同的政治信念，而是因为要在波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他们不得不达成一项政治交易。合并以后的一个很长时期，共产党人并不完全信任西伦凯维兹。他们经常说这样的话："只有上帝知道他到底是什么人，他到底在想些什么。他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人物。"

关于他有各种各样的流言蜚语，有些我是从哥穆尔卡那里听来的。例如，我听说，西伦凯维兹喜欢自己开车，不用驾驶员。而且他也会开快车。他喜欢自己驾车的习惯引起了各种谣言。有人说他和妻子感情不好，所

---

① "本地波兰干部"，是与犹太人相对而言的。

② 波兰社会党和工人党（共产党）于1948年12月合并；结果成立了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

以开了车去和其他女人约会。当我们听到这些事情时，斯大林已经死了。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如果被他听到，西伦凯维兹同志就可能会遭到不幸的结局。

不过，当我们听到流言说西伦凯维兹根本不是波兰人，而是一个犹太商人的儿子，以及西伦凯维兹这个姓是从犹太姓转化过来的时候，斯大林还活着。这个谣言企图表明西伦凯维兹并不真正属于波兰领导集团。西伦凯维兹是聪明人，他完全知道人们在他背后议论些什么和这些话的意义。这些猜疑和流言蜚语影响了他的个性。开会时，他默不作声，问到他的意见时才开口，而且只谈正在讨论中的事。有时很难知道他对颇有争论的问题究竟站在哪一边。

柴姆勃洛夫斯基就不同。①每个人都知道他的立场。他是中央委员会人事部部长。有人指责他同情犹太复国主义。由于他是共产党员，又是希特勒占领时期从事地下党活动的老干部，人们不可能把他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由于他是犹太人，而被提拔到重要的经济和政治岗位上的犹太人又比波兰人多，有人就指责柴姆勃洛夫斯基庇护犹太同志。

当然，即使他是一个隐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也不会单单提拔犹太人，否则这太愚蠢了，也会使他遭到各种

① 罗曼·柴姆勃洛夫斯基和贝尔曼一样，是在大战结束时和红军一起重新进入波兰的。

各样的攻击。柴姆勃洛夫斯基不是一个蠢人。我也不认为他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他在一个波兰人的国家里冷落波兰干部，毫无根据地优先提拔犹太干部，而不提拔波兰人。自然，这使波兰同志感到气愤。

我首先应当承认，在波兰人中间表现出一些非常强烈的排犹情绪。甚至在我国也还有这样的例子，即有些犹太人无缘无故地被指责为犹太复国主义者。但是，柴姆勃洛夫斯基也应该受到批评。这种提拔犹太人超过波兰人的不公正情况，表明了波兰领导层在政治上的近视，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而这种政治上的近视还不止这一个例子。

哥穆尔卡知道，如果让这个病毒在波兰领导层中蔓延，该是多么错误——甚至多么有害。①他不但是个波兰人，比起其他一些同志来，他还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政治家。并且他能比较坦率地表明自己的态度，我甚至可以说，他是一个大炮。他开始在贝鲁特面前大叫大嚷，表示反对贝尔曼、明茨、特别是柴姆勃洛夫斯基的干部政策。贝鲁特由于深受贝尔曼和明茨的影响，拒不接受哥穆尔卡的意见。

病毒在扩散着；不久，引起了斯大林的注意。你也许以为斯大林在哥穆尔卡同贝尔曼和明茨的争论中会站在

---

① “病毒”是指犹太人的接管。

哥穆尔卡一边，因为那两个人是犹太人。①但是，有两个因素使斯大林反对哥穆尔卡。第一，贝鲁特支持贝尔曼和明茨，而斯大林对贝鲁特的信任超过哥穆尔卡。第二，斯大林注意到，波兰领导内部的矛盾与犹太人问题并无关系。如果反对哥穆尔卡的人指控他排犹，斯大林可能会站在哥穆尔卡一边。但是，波兰同志指控哥穆尔卡亲南斯拉夫。他们没有公开提出这个指责，但是他们设法使这些指责传到斯大林的耳朵里。

当时，斯大林已和南斯拉夫断绝关系，并宣布铁托是人民的敌人，社会主义的敌人，马列主义的叛徒，一心要复辟资本主义。②我可以肯定，如果南斯拉夫和苏联有共同的边界，斯大林一定会进行武装干涉。但是，如果这样他就得通过保加利亚，而斯大林也知道我们还没有强大得足以进行武装干涉而不受任何惩罚。他害怕美帝国主义者会积极地支持南斯拉夫——不是出于同情南斯拉夫式的社会主义，而是为了分裂和破坏社会主义阵营。

现在，你也许要问，哥穆尔卡怎么会卷到南斯拉夫问题里去呢？为什么会有人指责他采取了亲南斯拉夫立场

---

① 斯大林本人是臭名昭著的排犹主义者。（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58—269页）

② 1948年6月，斯大林把南斯拉夫开除出共产党情报局。由于铁托执行了独立的外交政策，并且不大愿意接受莫斯科的命令，斯大林对他就越来越感到不耐烦了。

呢？原来，在斯大林和铁托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凶兆但还未最后决裂时，哥穆尔卡曾率领一个波兰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哥穆尔卡在南斯拉夫时，自然说了一些不得罪主人的话，而且还对铁托所做的工作进行了一番恭维。后来当波兰领导内部发生冲突时，哥穆尔卡的反对者就利用这些讲话攻击他，说他同情铁托派的立场。这对斯大林来说已足够了。他认为凡是和铁托接近的人都不会比铁托好多少。斯大林的性格就是这样：任何同他的敌人有联系的人就要当作敌人来对待。

据说哥穆尔卡不愿在波兰农村实行集体化。其他从德国占领下解放出来并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当时都在组织集体农庄——但是波兰没有这样做，这就归罪于哥穆尔卡。我个人认为哥穆尔卡反对集体化完全做得对。结果，今天波兰的农业就搞得很好。波兰人不但自给自足；他们还出口农产品。他们会做美味的熏肉，这对他们来说就是外汇。甚至当美国禁止我们的蟹肉和鱼子酱进口时，它还照样购买波兰的熏肉。我就是喜欢尝尝这种美味的食品。讲起它就使我垂涎三尺。

但是，在四十年代后期，哥穆尔卡的农业政策是他受到谴责的原因之一。斯大林一直主张集体化。当他听到哥穆尔卡在这一点上反对他的时候，这正是在政治上把哥穆尔卡打下去所需要的最后一点借口。

哥穆尔卡危在旦夕。斯大林虽然早已胸有成竹，他

还装做不介入波兰领导内部的矛盾。斯大林很知道如何耐心等待；他也懂得怎样假装做无动于衷。有一段时期，虽然我还看见斯大林和波兰同志在一起，但我却不了解哥穆尔卡的头上已经阴云密布了。

后来有一天，我在斯大林办公室里，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他若无其事地听着，然后把听筒挂起，走回到我坐的桌子前面。正如他习惯地那样，他并不坐下来，而是来回地踱来踱去。

他说："刚刚是贝鲁特的电话，他们把哥穆尔卡抓起来了。我拿不定这样做是否对头。我不知道他们是否已有充分的证据把他逮捕。"

斯大林心里完全明白根本没有理由逮捕哥穆尔卡，同样也没有理由逮捕斯彼哈尔斯基、克利斯柯、劳加一索文斯基或任何其他同时被捕的同志。①

他们都是地下时期著名的积极分子，都是在共产党内有卓越表现的人，又都是忠心耿耿、老老实实的人。当时我们也不太了解逮捕他们的事，但在斯大林死后，我们知道了很多情况，到贝鲁特同志死后，就知道得更多了。在逮捕他们时，也许我们对这件事关心不够。如果确是那样的话，也只是因为我们不愿干预波兰共和国的内

---

① 齐诺·克利斯柯和伊格纳齐·劳加一索文斯基，还有斯彼哈尔斯基同哥穆尔卡过从甚密。他们都在 1949 年底被撤去领导职务，1951 年 7 月被捕。

部事务。此外，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们再要补救也为时太晚。波兰同志已经采取了行动，谁也无法阻止他们朝着既定的方向干下去。

据说是为了使党得到巩固才进行这次逮捕的。事实上，逮捕的效果适得其反。波兰领导核心内的一些人从此不再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于采取什么途径才能更好地推进波兰的建设事业问题，他们也不再进行集体讨论。如果某人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告诉别人。每个人都默不作声。既然如此，那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宗派产生了。分裂分子跳出来了。团结涣散了。在人民眼里领导层削弱了，结果，人民开始丧失信心。

这就是在波兰开始发生的事情，而斯大林应负主要责任。当然，斯大林有他的帮手，但这只是一批阿谀奉承的人。正象列宁在遗嘱中告诫我们的，斯大林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根据对别人的猜疑而冷酷无情地行事。

第九章　东欧：一个联盟的形成

罗 马 尼 亚

我想谈谈关于我们同其他兄弟国家之间关系的发展情况。

在希特勒军队从苏联撤退期间，我们的部队在基什尼奥夫附近同德国人交战并消灭了他们，然后越过了边境进入罗马尼亚去追击敌军。战争初期，希特勒曾经答应安东尼斯库并吞克里木，作为罗马尼亚参加对苏作战的交换条件。当希特勒作出这一允诺时，他表现得十分慷慨大方，但是，如果他达到了目的和赢得战争胜利，罗马尼亚就会降到受德国奴役的地位。随着德国占领的垮台，安东尼斯库政府在一次政变中被推翻了。①

事后，乔治乌-德治告诉我，年青的国王参加了这次

① 安东尼斯库，战时罗马尼亚法西斯政府总理，于1944年8月被一次政变所推翻。罗马尼亚停止对苏联作战，并掉转头来参加了反对德国的战争。

政变。①按照国王的命令，乔治乌-德治从监狱里获释，他在狱中度过了整个战争时期。后来他被召至王宫参加建立新的政府。这样，国王就承认了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人民中享有广泛的支持。

罗马尼亚退出了同德国的联盟。由于这一点，德国人开始轰炸布加勒斯特，但这已经为时太晚了。我们的部队已开进罗马尼亚并且同罗马尼亚军队会师，把德国人赶了出去。这样，罗马尼亚就从德国的盟国变成苏联的盟国。当然，我们还没有涉及到罗马尼亚是否将成为我们意识形态上的盟国的问题——也就是说，是否将成为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罗马尼亚仍然有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并由国王作为国家的元首。苏联把胜利勋章授给罗马尼亚国王，作为对罗马尼亚停止同我们作战表示谢意。

我们通过热尔托夫将军同罗马尼亚当时的事态发展保持接触。热尔托夫将军是我们驻布加勒斯特的军事委员，即城防司令②。他是一个老练的军官，也是一个很有

---

① 格·乔治乌-德治，罗马尼亚党的负责人，后任总理(1952—1955年)，从1955年起直到他去世时的十年期间，担任工人党（共产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米哈伊国王在推翻安东尼斯库和罗马尼亚在战争中的倒戈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② 热尔托夫将军，是科涅夫元帅在战后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的副手。他曾在奥地利和匈牙利做政治工作。

才智的人。不久以前我还在电视中看到他。他同罗马尼亚国王交上了朋友，并经常同他一起旅行打猎。

彼·格罗查是王国政府的首脑。他是一个富有的地主，但他也是一个具有进步思想的人。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他有足够的理智，因而能认识到，大地主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把自己同"新秩序"——正如人们在国外所说的——结合在一起的时刻已经到来。他放弃了自己的财产，把它上交给国家，或在农民中分掉。当格罗查成为新政府的总理时，他执行了一项加强同苏联联系的政策。

过了一段时间，他成了我们的朋友。我在1951年遇见他，那时他正和斯大林一起在索契度假。斯大林硬要把我拉在一起，而我本来是不愿意的。他对彼·格罗查准备加入我们一伙高兴到了极点。我记得在整个晚宴上斯大林是多么不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说："彼·格罗查来了，彼·格罗查来了！"他大量喝酒，很快他就醉得甚至再也弄不清楚这个彼·格罗查是何许人了。斯大林死后，我在中国的一次招待会上碰到格罗查。我们的会晤十分短暂，但他给我留下了很好的印象。①

随着政局的继续发展，他们被置于共产党的控制之

① 格罗查曾经是分裂的左翼政党（被称为农民阵线）的领袖。苏联人直接插手罗马尼亚战后的政局，让他出任总理。他和赫鲁晓夫都曾在1954年访问过北京。

下。共产党在罗马尼亚人民中的影响越来越大。最后，国王离开了罗马尼亚。乔治乌-德治曾对我讲起这件事情的经过。罗马尼亚同志到国王那里去并对他说，"如果你要离开罗马尼亚的话，你可以带走你所需要的任何东西。"就这样，他装满了一列火车的东西离开了。①君主政体就此结束，在罗马尼亚上空升起了社会主义的红旗。

我记得乔治乌-德治在第一届政府中担任过交通部长。另一位领导人是安娜·波克②。我没有见过她，但从曼努伊斯基同志那儿听到很多关于她的事情③。她曾是共产国际的一位干部。曼努伊斯基对她评价很高，认为她是最优秀的政治工作人员之一。在罗马尼亚的新领导人中，人们认为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方面具有最深的造诣。

我还认识新政府中另一位成员卢卡同志。他的原籍可能是乌克兰，虽然他非常精通罗马尼亚语言。当我们的军队在1940年占领切尔诺夫策时，我曾好几次遇见卢卡。他一直在那里搞地下工作；当切尔诺夫策并入苏联

① 米哈伊国王被迫于1947年12月退位。

② 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大概是战后进入共产党领导上层的唯一的犹太人的女儿。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她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里工作了许多年。

③ D·Z·曼努伊斯基是斯大林派到共产国际的主要代表之一。

时，他成了该地区党的领导人。①

在罗马尼亚新的领导班子中，还有一位活跃的政治家，他是一位很杰出的同志，可是我已经忘记了他的名字。但我记得他是一位犹太族人。②然而，他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经受了很好的锻炼和考验。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知识和有经验的人，十分熟悉党内外的工作。据我回忆，他同安娜·波克特别接近。直到我去罗马尼亚同德治会谈时，我才见到他。这是在安娜·波克和其他同志已经被捕之后。这位犹太同志仍然在政治局里保持着自己的职位。然而，他也未能幸免于难。不久之后，他也被捕了。可怜的人，他们枪毙了他。这也就是他的政治生涯和一生的结局。这太不象话了。在共产党人掌权之前，他在监狱里度过了大部分时间。而且就我来说，决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忠诚和正直。③

---

① V·卢卡，一个匈牙利犹太人，在莫斯科度过了战争年代。（切尔诺夫策位于波兰瓜分前的波属乌克兰，卢卡曾在那里从事共产党的地下工作。）

② 在苏联，犹太人被正式认为是一个“民族”，如同俄罗斯人、拉脱维亚人或格鲁吉亚人一样。

③ 赫鲁晓夫在这里可能指的是约西夫·基辛涅夫斯基。他是一个比萨拉比亚犹太人和执行强硬路线的斯大林主义者。1952 年清洗波克时他得以幸免；但到 1957 年，他被剥夺了所有的职位。波克和基辛涅夫斯基都没有被处决，虽然赫鲁晓夫想象他们已被处决并不使人感到奇怪。

在狱中受过锻炼的许多著名的罗马尼亚同志中还有基伏·斯托伊卡和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后者现在是罗马尼亚主席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①乔治乌-德治告诉我，齐奥塞斯库同他一起坐过牢。他曾经是青年组织即罗马尼亚共青团的领导人，而且乔治乌-德治对他表示极大的尊敬和信任。

波德纳拉希同志也在狱中呆过很长一段时间。他是罗马尼亚最老的共产党员之一。当我在斯大林死后遇见他时，他不是内务部长就是国防部长，而且他的俄语讲得比其他任何同志都好。同他谈话可以不通过译员。我甚至可以说他讲得象俄国本地人一样，在音调上找不出一点差错。②

保加利亚

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都对苏联怀有强烈的兄弟

---

① 基伏·斯托伊卡于1955年接任总理职务，那时乔治乌-德治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现任主席和党的领导人尼古拉·齐奥塞斯库，战前是共产主义青年运动中的积极分子。

② 埃米尔·波德纳拉希有着乌克兰和德国血统，1933年之前是罗马尼亚皇家陆军的一名军官，之后逃往苏联。他在苏联呆到1944年，以后从后方被送回罗马尼亚去组织地下共产党。战后他是国防部长。

般的感情，然而我始终感到保加利亚对我们的友谊之情特别热诚。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保加利亚人民一直极为钦佩，尤其是对保加利亚农民。他们是出色的蔬菜种植者。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是在顿巴斯度过的，保加利亚的菜农在那里经营着许多最好的农场。他们是了不起的组织者。他们极其认真地以大量的优质低价的产品供应市场。

我还记得一个保加利亚农民，他经常很早起身，把两匹马装上了货物，运到城里的市场上去。他老是戴着一顶宽边的帽子。他叫得出所有顾客的名字。大多数的顾客是矿工的妻子。"太太们，我的可爱的太太们，"他用单调的声音叫唱着，"来买我的蔬菜呀！"人们可以经常向他赊账。

后来当我长大工作时，我已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下班后，当我脱下了工作服，我总是喜欢踏着自行车到田间看看保加利亚人的农场。我非常羡慕他们的劳动果实——肥硕的鲜红的蕃茄和紫色的茄子，那些卷心菜和黄瓜更是没话好说。阳光灿烂的茄子田永远使我感到富有诗意。

当然，今天我们仍然从保加利亚得到许多蔬菜。有时我对我的亲戚开玩笑说，"你们知道，保加利亚是我们的兄弟，他们送来的蕃茄并不象他们自己吃的那样好吃。"为什么？因为他们采摘得太早了，枝上的果实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它们的味道就不象刚从蔬菜地里摘来

的那样。有时我听到一些消费者表示对从保加利亚进口的蕃茄不满意，但那又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我在这里要强调指出，保加利亚人民确实是我们的兄弟。我要说我们同他们有着特殊的关系。他们对我们的感情是可以理解的。保加利亚的战场上曾堆满了俄罗斯勇士们的白骨，他们是为了使保加利亚从土耳其奴役下赢得独立而牺牲的。这一切离现在并不是太久远的事。①

保加利亚人民也正确地懂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为了把他们从希特勒的奴役下解放出来而流过鲜血。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也是这样。战后，我们同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和保加利亚人民保持着最好的关系。由于我们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特别好，资产阶级就想方设法来制造麻烦。

我记得战后有一次，战争的阴云笼罩着保加利亚的上空，斯大林对此极为关注。他得到报告说美国人已作好进攻的准备，怂恿土耳其反对保加利亚。政治局的其他成员一点也不知道斯大林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这一份报告，但是当我们在近郊别墅见到他时，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多么焦急。②

---

① 帝俄于1877年对土耳其宣战，这是在保加利亚爆发反对土耳其统治起义后的一年。

② 近郊别墅是斯大林在莫斯科郊区严加设防的隐居场所。他在那里度过了晚年的大部分时间，并于1953年死在那里。

他在当时就地下了一道命令，要保加利亚领导人立即到莫斯科来。代表团由部长会议主席率领。①卢卡诺夫也来了。他是一位老共产党员，顽强的军人，而且还是参加过西班牙〔国内〕战争的老战士。②

斯大林指示保加利亚同志要加强他们的反坦克和其他地面防御设施。换句话说，他给他们开了一张有关采取最起码措施的很长的单子。对于这些事，保加利亚同志即使没有斯大林的指示自己也完全能够胜任。然而，斯大林已经忧心如焚，而且象往常一样，他总是试图直接控制局势。

在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发生二月政变时，斯大林做了差不多相同的事情。那里的工人阶级夺取了政权，因而加剧了我们同过去盟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我想英国、法国和美国都为捷克斯洛伐克所发生的事件感到害怕。不管怎样，他们加紧推行侵略政策。几乎没有一天美国飞机不来侵犯捷克斯洛伐克的领空。美国可能派遣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并企图恢复已被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阶级所推翻了的资产阶级政府，对此苏联保持了高度的

① 如果真有其事，那么，保加利亚人在1950年2月美国同保加利亚断交后被召至莫斯科时，代表团的团长应该是乔治·季米特洛夫的姻兄弟、不久前去世的总理和党的领导人契尔文科夫。

② 卡·卢卡诺夫，外交部长。也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和驻莫斯科大使。

警惕。①

东　　德

我在回忆录中曾经表明，在我们看来，希特勒统治下的德国是个灾难而且是我们的死对头。然而，俄国同德国的关系并不是一直如此坏的。十月革命前——以及在希特勒上台之前——我们同德国保持着密切的经济联系。德国人在我国为他们的商品找到了一个现成的市场。他们在这儿甚至还有一定的特权。

当我在国内战争结束后回到顿巴斯时，我记得有一家名叫西门子的德国公司在第三十号矿井享有开采权。我们的工段长对于给德国人开采权感到不安。他跑去找矿场经理阿巴库莫夫并对他说，“让我到十七号矿井去工作；我向你保证，叶戈尔·特罗菲莫维奇，我们不会比三十号矿井的德国人干得差。”②

但这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这是一个设备问题。一场竞赛开始了，我们的工人同德国人比。我们显示了可

---

①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中，赫鲁晓夫叙述了战后同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关系。

② 叶·特·阿巴库莫夫当时是鲁钦科夫矿场的经理，后任煤炭工业部部长，是赫鲁晓夫在建设莫斯科地下铁道时的同事。

以在没有德国人的任何帮助下，我们能在升降井里工作并且开采出新的煤层。

过了一些时候，当我在尤索夫卡工人学校毕业并担任尤索夫卡区党委组织部部长以后，德国人完成了三十号矿井炼焦厂的修复工作。我应邀参加庆祝炼焦厂开工的群众集会。作为这个地区的一个老矿工和金属装配工，我认识每一个人而每一个人也认识我。

由于德国人修复了炼焦厂，我认为请一位德国共产党人到尤索夫卡来将是个好办法。那时正是春假期间，我便邀请了一位在莫斯科某学院读书的德国学生来到这里。

在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修复炼焦厂的德国公司的代表。他长得很胖而且不会讲俄语。那些穿着破破烂烂衣服的工人、农民站在周围，并且目不转睛地盯着这个甚至不会讲他们语言的肥胖的德国人。当他讲话结束时，没有一个人鼓掌。

于是我站起来宣布：从莫斯科共产国际来的一位德国同志准备讲话。他受到了群众的热情欢呼。他作了一个简短的发言，听众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我不知道在场的工人、农民听了这位德国学生讲话的内容是否比听了那位公司代表所讲的要懂得多一点；但当我介绍那位学生是从共产国际来的时候，这就足以使他们倾泻出兄弟般的热情来欢迎他。

我讲这个故事是因为它说明了第三国际所享有的威信。①即使在德国工业资本家从我们身上榨取利润的时候，一位来自共产国际的德国代表在尤索夫卡却成了受到热烈欢迎的客人。

没有必要再来谈论希特勒上台后和伟大的卫国战争期间我们同德国的关系。我们之间没有"关系"。我们处在战争之中，这是我国人民历史上最残酷的流血战争。然而，即使在那些可怕的岁月里，我们同一些德国共产党人还是有着友好的往来。我已经叙述过乌布利希同志在前线的活动情况，当时我是那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②

战后，我们从前的盟国开始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在法国、意大利和希腊，恢复资本主义的统治。我要补充一句，希腊是个特殊的例子，因为那里的共产党对恢复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抵抗；但这一运动被镇压下去了，反动势力获得了胜利。

德国也是个特殊的例子。德国是被我们打败的敌人，可是我们从前的盟国擅自决定建立一个西德。这对我们国家的安全构成了直接威胁，对我国边界的稳固性以及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最后胜利所必需的条件

---

① 第三共产主义国际成立于1919年，通常简称为共产国际。

② W·乌布利希曾经会见过赫鲁晓夫，当时他是战争期间流亡的德国共产党设在莫斯科的政治部主任。

是一种挑战。

用列宁的话来说，斯大林对这一行动的回答是用刺刀尖来刺戳资本主义世界。他强行封锁了柏林市。①鉴于美帝国主义企图恢复德国的〔独立地位和军事实力〕，我认为斯大林的行动是正当的。要知道，他害怕发生一次新的破坏，可能会比我们在希特勒德国统治下所遭受到的破坏更大。斯大林强行进行封锁是一种争取生存的行动。

不幸的是，虽然斯大林想要实行的计划可能是正确的，但他没有能注意到面对他的现实情况。他想出来的计划很不周详。我不知道那时是谁在给他出主意。我是政治局委员，而且我知道他没有同我们任何人商量过这件事——也许除莫洛托夫以外。不管怎么样，斯大林到后来总是觉得资本主义的力量相当强大。他被迫取消了封锁，而且——如果我可以使用这样一个政治性词汇的话——他是被迫投降的。他不得不去达成一项谅解，比起波茨坦协定来它对我们是不利的。直到那时，从外部世界看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牢固地掌握在苏联手中，并

---

① 为了回报西方盟国建立一个未来的西德国家的中心以及在西方占领区实行币制改革，苏联当局对柏林盟国卫戍部队和西柏林居民进行强行封锁。封锁自 1948 年夏天持续到 1949 年夏天，后由于对这个被包围城市进行空运而告终。

且在东德的土地上驻有我们强大的军队。那时我们被迫签订了一项协定。同在波茨坦一致商定的条款相比，这个协定削弱了我们的地位。在没有签订和约的情况下，这个协定直至今日还调节着我们同西方之间的关系。①

我们认为，我们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占领者——我不是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们因成为占领者而感到骄傲。总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曾经是德意志帝国的一部分，而且德国人曾企图消灭我们的国家并把我国人民变为奴隶。作为在争取我们的独立斗争中的胜利者，我们享有一定的权利。德国人对形势当然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由于斯大林做得太过分而使事情弄得更糟了。在强大的西方影响下，某些敌对势力开始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内滋长起来。战后德国的党还处在重建阶段。党还比较弱小，处于混乱的状态，并且有趋向分裂的危险。幸运的是，党的领导人——已故的我们的朋友威廉·皮克和他的战友乌布利希——做了需要做的事。他们让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并且重新制定了党纲，以便团结人民并引导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②但是这需要时间，而人

① 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和艾德礼于 1945 年 7 月至 8 月会晤于波茨坦，建立由四大国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它于 1947 年瓦解，导致了次年的柏林封锁。

② 在苏联占领当局的庇护下，共产党于1946年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统一社会党。威廉·皮克是统一社会党的两个主席之一，于1949年成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总统。

民却在犹疑不决，不知该走那条路。我们不能指望东德人民一定会愿意走我们所喜欢的道路。

就在斯大林去世后几个月，局势发展到了严重关头。发生了一场暴乱——不是武装叛乱，而是示威游行的浪潮。①多亏党及其领导的努力，暴乱才没有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战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事态发展使我们懂得，为了把东德建筑在牢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我们必须采用另外的途径。我们懂得了斯大林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背道而驰的，而且我们还懂得了应该撕去罩在我们政策上薄薄的一层斯大林主义外衣，并且使列宁的思想重新普及开来。

成立华沙条约组织

斯大林的去世对我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震动。多年来，宣传机构一直极力吹嘘斯大林是天才，是人民的朋友和父亲，是我们生命的保卫者："斯大林使我们取得了对敌人的胜利。"可是突然之间，斯大林不在了。正如我所说的，这是极大的震动。不仅对于人民来说是这样，而且对我们，对领导核心的其他人，即曾在斯大林身边工作过

① 在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东德工人群众拒绝增加生产定额，同时罢工浪潮席卷全国。一场全面的暴乱蔓延到所有的城市，迫使苏联军队在夏季进行干预。

多年的人也是一样。就我个人来说，我对他的死感到悲痛。我为他叹息。我真挚地流下了眼泪。

当斯大林死的时候，他留给我们的是忧虑和恐惧。贝利亚比其他任何人更使我们加重了这种忧虑和恐惧的心理。很长时间以来，我就不信任贝利亚。我曾不止一次地对马林科夫和布尔加宁吐露过我的看法：我认为贝利亚在执行对外政策方面是个投机分子。我知道他正在争取时间，抬高他自己的地位，把他的亲信安插到重要的岗位上，以便等待机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引入歧途。社会主义的敌人和我们苏维埃国家的敌人知道贝利亚想干什么，如果贝利亚没有被揭露和清除的话，他们就会尽情利用他来达到自己的目的。①

斯大林死后，西方在一切可能的地方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制造动乱和加剧紧张局势，特别是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上空采取了非法的侦察飞行的方式。除此之外我们还会盼到什么呢？西方的意图一目了然：资本家们想向我们显示，他们居然能够使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基础发生动摇。他们知道在斯大林死后，我们处在复杂和困难的境地，斯大林留下的领导班子并不好，因为它是由一些相互间有很多分歧意见的人组成的。资本家们还知道我们还在从事重建工作以恢复被战争

① 关于贝利亚在1953年垮台的详细情况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21—341页。

破坏的经济，而且承受不起沉重的国防费用这个额外负担。他们迫使我们要认真考虑加强战备，而别无选择余地。帝国主义仍然还有牙齿，而且它的牙齿比任何时候都要锋利。我们不能安于胜利的荣誉而忽略了防务。

〔五十年代初期〕曾作出决定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成立统一的指挥机构。在领导核心内部，我们就成立这种组织的形式和结构问题进行过讨论。在一部分领导成员之间存在着一些分歧的意见。

〔在这里叙述中断了，但从上下文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克里姆林宫内举行预备性讨论时，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曾反对阿尔巴尼亚和其他一些未指名的国家参加联盟——而且可能还对成立联盟这个主意本身提出了异议，其理由是保障苏联自身的国家安全都很吃力，哪里还顾得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安全呢。〕

事后我们向莫洛托夫解释，他的意见是完全不能接受的。例如，关于阿尔巴尼亚的问题，直到那个时候我们同这个国家的关系一直是良好的。如果我们的联盟不让阿尔巴尼亚加入，这在西方会被理解为是对帝国主义者大开绿灯，以便干涉和消灭阿尔巴尼亚人民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下所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①当

①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即共产党。

然，当时意大利还比较软弱，不敢单独侵犯阿尔巴尼亚，但是，意大利得到美国和其他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支持。

当然，莫洛托夫并不希望资本主义在阿尔巴尼亚或任何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内复辟。任何人都不应在这一点上指责他。他的错误在于低估了我们的力量和潜力。毫无疑问，苏联可以既没有欧洲社会主义国家又没有亚洲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北朝鲜和蒙古人民共和国而单独生存下去；但是，我们觉得最好能加强我们的地位并防止随时可能发生的入侵。①这样做，我们还能够巩固国内的局势。②最后，我们在领导核心内部对阿尔巴尼亚必须包括在条约之内取得了一致意见。

下一步就是召开有各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参加的会议来讨论整个事情。我们决定在华沙会晤。据我回忆，代表团是由各国外交部的代表组成的，我们这方面由莫洛托夫参加。会议通过并在稍后时间公布了一项文件，即人所共知的华沙条约。根据条约建立的联盟，在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个联盟联合并动员了各社会主义国家的武装力量，从而对加强我国的地位作出了贡献。华沙条约过去是——目前仍然是一支

① 采取联合社会主义国家并建立集体防御的政策。

② 他所说的“国内局势”是指各成员国内部共产党统治的稳定性。

不得不加以考虑的力量，而且我们的对手已经承认了这一点。①

① 1955年5月在华沙签订了一项为期二十年的互助防御条约。缔约国有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以及——不顾莫洛托夫的明显反对——阿尔巴尼亚。从条约签订的时间来看，它部分是作为西德在同月早些时候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种对策。指挥华沙条约组织六百万军队的第一任总司令是科涅夫将军。

第十章　联盟中的瑕疵

波 兰 的 十 月

斯大林去世后，兄弟国家中出现了一些问题。他死后不过几个月，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便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骚动，随后波兰的局势也很紧张。波兰的麻烦根源在于战前波兰共产党的解体。诚然，战时和战后党进行了重建，但是它在工人阶级和人民中从来没有具备深厚或广泛的基础。①因此，波兰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够稳定的。再者，波兰人对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记忆犹新，这项条约在 1939 年把他们的国家给瓜分了。

当我担任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时，我敏锐地觉察到在波兰发展着的局势。我不止一次地同波兰同志们讨论过这种局势。我同贝鲁特同志的关系特别好，我很尊

---

① 1937—1939 年期间，斯大林实际上消灭了波兰共产党，当时它的大部分领导人流亡在莫斯科。赫鲁晓夫说过，“贝鲁特和哥穆尔卡仍然活下来的唯一理由是，他们当时在党内比较地不出名。”(《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107 页。)重建的党称为波兰工人党。

重他。

我同西伦凯维兹同志和奥哈布同志的关系不断改善，虽然我同柴姆勃洛夫斯基的关系不能这样说。他和我彼此之间保持着距离。他和其他人不一样，不同我们一起去南方①度假。我确实对他不太了解。

我在领导层中的同事和我有时会向波兰同志问起，为什么哥穆尔卡还关在监狱里。“告诉我，贝鲁特同志，”我会问，“哥穆尔卡的罪状究竟是什么？他还呆在监狱里干什么？他给我的印象一向很好。我相信他是个好共产党员。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他关起来。”

贝鲁特会笑笑说道，“啊，赫鲁晓夫同志，老实对你讲，我自己也不知道他有哪些罪状以及为什么现在还关在监狱里。”

当然，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完全知道哥穆尔卡的罪状是什么，以及他是怎样被指责奉行了一条亲南斯拉夫的路线，等等——这个情节我已在回忆录里谈过了。贝鲁特也知道这些原因。他知道我是明白的。他懂得我问他有哪些罪状的用意，是表明我觉得这些罪状缺乏确实的根据——特别是当我们同南斯拉夫的关系突然好转之后，还把哥穆尔卡留在狱中就更无意义了。最后，我想没有必要同贝鲁特转弯抹角地谈了，于是我说，“要是你不

---

① 赫鲁晓夫所指的苏联南方，即黑海的疗养地。

知道有什么充分的理由把他关在监狱里的话，那么，我想你应当把他放出来。”随后我又说，“喂，贝鲁特同志，我们听说在波兰有些人士对于目前领导班子内的民族成份很不满意呀。①”

贝鲁特知道我指的是贝尔曼和明茨，这两个人曾经怂恿逮捕哥穆尔卡，并且把他关在狱中是符合这两个人的既得利益的。正如我已讲过的那样，贝鲁特的性格太软弱，这样他们得以利用这一点来对他施加影响。他们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至贝鲁特同志在世时从未能下令把哥穆尔卡释放出狱。

贝鲁特去世后，奥哈布继他担任党的首脑。②他率领一个代表团去中国，当然要经过苏联。我有机会和他面对面地谈话。我们甚至不需要译员，因为奥哈布同志的俄语讲得很流利，尽管带有波兰口音。奥哈布告诉我，哥穆尔卡终于被释放了。③我问道，差不多坐了五年牢以后他的身体如何。奥哈布说，他的身体很虚弱，极需要休

---

① 这里的“民族成份”意指犹太人占的比例很大。

② 1956年3月，正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了关于斯大林罪行的秘密报告之后，贝鲁特在莫斯科去世，爱德华·奥哈布继任为党的领导人。赫鲁晓夫曾说，这个报告的文本是在贝鲁特死后从波兰党方面泄露到西方国家去的。（《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51页）

③ 赫鲁晓夫在这里弄错了。哥穆尔卡于1954年经贝鲁特下令释放出狱，不过直到1956年4月才宣布。

息。这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

“当然啰，假使哥穆尔卡同志同意的话，他为何不到克里木来疗养呢？我们将竭诚欢迎他并使他感到舒适。”

我从奥哈布的反应立即可以看出，他并不喜欢这个主意。我甚至可以说这多少有点使他震动。不管怎么说吧，他回答说他不认为哥穆尔卡应当到苏联来休养。

奥哈布回华沙后不久，我们从苏联大使处得悉，原来日趋紧张的局势已经沸腾起来了。①在一些城市的工厂里，暴发了乱哄哄的示威游行和普遍的骚动。②这些骚乱具有明显的反苏调子。有些波兰人批评苏联的对波政策，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签订的条约是不平等的，还说苏联在经济上占了波兰的便宜。他们特别抱怨波兰被迫以低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供应苏联煤炭。

示威游行者还要求苏联军队撤出波兰领土。他们丝毫不提为了波兰的解放流了多少苏联人的血以及牺牲了多少苏联人的生命；也没有人提到苏联给过波兰多少面

---

① 早先赫鲁晓夫安插在哈萨克的亲信P.K.波诺马连科（见第七章“生荒地”节），于1955—1957年危机时期任驻波兰大使。

② 继总罢工之后，6月在工业城市波兹南开始了骚动。一名保安警官被群众处死。西伦凯维兹谴责暴动是帝国主义阴谋的一部分，罗科索夫斯基下令军队粉碎叛乱。有好几十人被杀，数以百计的人受伤和被捕。

包，而这些面包是从苏联人民嘴里省下来给波兰人吃的。所有这些应予肯定的事实都从历史中勾销了。有些对我们的批评是有道理的，但很多是捏造的。我们的敌人开动了宣传机器，污蔑我们并污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诚然，我们当时有武装部队驻在波兰，正如今天仍驻在那里一样。但这又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根据波茨坦协定的条款，我们完全有权利在某些社会主义国家保持驻军：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在保加利亚或捷克斯洛伐克没有驻军）。对我们特别重要的是有军队驻在波兰，因为波兰是我们同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庞大军队之间唯一的陆上交通和提供补给的通道。我们的海军规模尚小，因此更要依靠从波兰到德国的公路和铁路。要是波兰退出华沙条约，我们的处境就会十分困难。

当某些分子开始对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担任波兰军队总司令这件事提出抗议时，我们更有理由感到担心。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苏联英雄”、一个忠实的苏联公民，也知道是斯大林派他到波兰去的。大多数波兰人一向以罗科索夫斯基感到骄傲，将来也会如此，但是有些人却开始进行煽动，要免他的职。

由于反对派有所凭借，它开始对领导核心产生了影响。不久，奥哈布已变得完全无能为力。他无法再决定政策。人民已不听他的话了。大约就在这时，一个无缘

无故被关在监狱里的波兰将军获得释放，而且担任了公安部队的司令。这支部队原来从事政府机关的保卫工作，在必要时也用它来镇压反对政府的叛乱行动。①然而这位将军却受到苏联敌人的操纵，在他指挥下的公安部队被用来反对苏联和反对奥哈布路线。他们所支持的那一批人企图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领导班子取代亲苏的奥哈布的领导班子。自从贝鲁特去世以后，拥护哥穆尔卡的分子一直在抓权。同时，他们开始毁坏贝鲁特的声誉——这很自然，而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合理的，因为他们以往被关进监狱是经贝鲁特同意的。当然，哥穆尔卡也正是这样。他饱尝了多年的铁窗生活，一部分就是由于贝鲁特的缘故。

简单地说，在我们看来，波兰事态的发展好象是一场汹涌向前的反苏浪潮。全国各地都在举行集会，我们担心波兰随时都会脱离我们。

在华沙，〔波兰〕中央委员会正在举行一次重要会议。②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我们表示迫切希望同波兰领导人会晤，以听取他们方面对事态发展的意见，并使他们了解我们对形势的看法。我们同华沙通了电话，要求允

① 这个将军是前军事情报首脑瓦·科马尔，他于1952年被捕，1956年恢复名誉后出任波兰公安部队司令。

② 波兰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于10月开会，选举新的政治局。

许我们代表团立即前往。我们被告知暂时不要去。我想那是哥穆尔卡建议我们迟些去。这个拖延的办法只有使我们更加恼火，并且更加坚定了我们立即赶去的决心。你应该理解，那时我们的神经紧张已极。我们对苏联在波兰受到辱骂感到生气。所以我们决定不顾哥穆尔卡的劝告，无论如何都要前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太性急了。我们可能是鲁莽行事。事后看来，我们应当按照哥穆尔卡的意见办事。但是事已如此，也没有办法了。

我们决定代表团由我率领，成员有米高扬和华沙条约武装部队总司令科涅夫元帅。①当时的情况是，如果波兰武装斗争成为现实的威胁，如果我们同我们军队的联系有立即被切断的危险②，那么我们就必须准备诉诸武力。

我们飞往华沙，波兰同志在机场迎接。我们径往贝尔凡特列宫，这是一座宏伟的、色彩鲜艳的、很古老的建筑。历史告诉我们，它一度曾是俄国沙皇驻波兰总督、尼古拉一世之弟康斯坦丁的官邸。我们访问波兰通常是住在那里的。③我们到达后一放下手提包，就立即去同波兰政治局举行会谈。

---

① 莫洛托夫和卡岗诺维奇也在代表团之内。

② 指苏联驻在东德的部队。

③ 康斯坦丁大公爵在十九世纪所住的贝尔凡特列宫，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是总统的官邸。

那是一次怒气冲冲的会谈，是在充满怨恨和尖酸刻薄的气氛中进行的。几乎一开始就成为一场唇枪舌战。在我们这方面，我们讲了一些无助于和解的话，我们在火上加了油。我立即向奥哈布进攻，指责他没有听从我们的劝告早点把哥穆尔卡释放出来，因此他应对整个局势负责。

当然，在我力促奥哈布早点把哥穆尔卡从狱中释放出来时，我并没有对奥哈布说要他下台以便为哥穆尔卡让路。我们很难想象，奥哈布会把这样一个人释放出狱，如果事先就已安排好让这个人取代奥哈布担任领导的话。不过我们完全知道，哥穆尔卡的获释意味着他随后将担任最高职务。我们预计到这一点，我们也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唯一担心的是哥穆尔卡所以升为第一书记，部分是由于某些反苏势力进行政治策动的结果。

至于奥哈布，以往他站在亲苏的立场，但现在看来他对加强波苏关系有些动摇。他已经精疲力尽。他力图为自己辩护说，"你为什么要攻击我呢？我是完了。我不能再做什么事了。"他在想安然脱身。

在当时的领导层中，萨瓦茨基同志是我们最亲密和最忠实的朋友，他是国务委员会的主席，等于是共和国的总统。当其他同志或游移不定或背离我们时，萨瓦茨基同志以宏亮而清楚的声音说，当前首先需要的是同苏联保持友谊。我们可以看出，哥穆尔卡并不十分信任萨瓦茨基。哥穆尔卡知道，萨瓦茨基以前在贝鲁特的领导班子

中起过不小的作用，他也知道贝鲁特不是唯一要对他的被捕负责的人。哥穆尔卡认为贝鲁特政府中其他成员也有责任，包括萨瓦茨基。尽管如此，萨瓦茨基总是作为苏联的真正朋友留在我们记忆之中。

其他波兰领导人，特别是柴姆勃洛夫斯基，几乎毫不掩饰对我们的愤懑情绪。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不止一次的告诉过贝鲁特，要他以一个波兰族的人①来代替柴姆勃洛夫斯基担任中央委员会的人事部部长，贝鲁特显然把我们的话告诉了柴姆勃洛夫斯基。

西伦凯维兹同志的处境尤为复杂。大家都知道，西伦凯维兹虽然身居〔总理〕高位，他的影响却不大。在几个月里，他的处境很危险。在贝鲁特去世和奥哈布升任第一书记之后，波兰领导人提出了应否完全解除西伦凯维兹的领导职务的问题。我不得不插手并向他们劝说，把西伦凯维兹撤职将是错误的。我说："你们应当记住，你们〔战后〕掌权是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两党合并的结果。西伦凯维兹同志代表社会党人，如果你们把他推开，就会破坏这个联合，并使统一工人党中的大部分人离心离德。而且，我个人认为西伦凯维兹同志是不愧为部长会议主席的。"

波兰同志中有些人反对。他们争辩说，西伦凯维兹是

① 赫鲁晓夫所说"一个波兰族的人"意指一个非犹太族的波兰人。

个坏人，他有某些弱点，等等。但我知道怎样对付这种说法："同志们，你们应当理解，如果他看来有些优柔寡断，那只是由于他缺乏自信；他感到得不到你们大家的支持。"随后我又说："同志们，还有一点：如果你们撤换西伦凯维兹，那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将会带来很大损害。"

我想到的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那里的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结成了同样的联合。西方国家的社会党人一直在说，共产党人同社会民主党人合并是出于自己的私利，因为没有社会民主党的支持，他们就不能取得多数；而共产党人的地位一旦稳固之后，他们就把自己的社会民主党伙伴一脚踢开。我们不希望让西方的这种说法得到证实。我们要着眼于未来，在其他国家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也可能有一天通过建立联合而赢得选票。因此，这不仅是有关西伦凯维兹前途的问题；这是一项原则，不但关系到波兰，而且关系到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学说。

波兰同志们同意了，西伦凯维兹同志留任领导职务，但是他自己显然觉得没有多大把握。在我们同波兰政治局会谈期间，他明显地站在哥穆尔卡一边，但他不走极端。他说话不多，发言也很谨慎。可以看出，他已经转向哥穆尔卡，并准备参与否定前任领导（其中也有他的份）的活动，但是他同时表示赞成保持同苏联的友好

关系。

科涅夫元帅和我分别同罗科索夫斯基同志进行磋商，他对我们更为顺从，但他的权力比其他波兰领导人小。他对我们说，反苏的、民族主义的反动势力正在增强，如有必要使用武力逮捕这些反革命分子的话，他将听候我们的吩咐。我们可以相信他会尽一切努力来保护波兰的社会主义利益，并保证波兰继续对我们忠诚和友好。这一切都很好，但是，当我们对问题开始详加分析，并计算一下哪些波兰部队可以听从罗科索夫斯基指挥时，局势看来开始有点黯淡了。当然，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远远超过波兰，但只要能够避免，我们是不想使用自己的部队的。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希望波兰变成一个敌视苏联的资本主义国家。

我们的大使馆报告说，在华沙即将爆发一场真正的叛乱。这些示威游行大部分是表示支持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新领导的，我们也准备支持这个新领导，但示威游行又危险地具有反苏性质。简而言之，局势相当复杂。

我们别无选择，只得命令科涅夫元帅调动我们的部队向首都迫近①。局势进一步复杂化了，因为所有的道路都在负责指挥波兰公安部队的那位将军控制之下，他正

① 靠近德国边境驻在西里西亚的苏联部队曾向华沙推进，据称是在演习。

坐在哥穆尔卡身旁，向他报告我们部队的调动。①

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哥穆尔卡是一位很诚实和坦率的人。他要是有什么不高兴或不满意，总是冲口而出并表示自己的看法。他来找我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刚刚接到一项报告，说你们的一些部队正在向华沙移动。我请求——我要求——你命令他们停止前进，并返回他们的驻地。要是你不这样办，将会发生一些可怕的和不可逆转的事情。"

在这之前和之后，我从来没有看见他象这副样子。在他讲话时，他神情紧张地从坐椅上起立，走到我这边来，然后走回去再坐下来。他非常激动。他口沫飞溅。他的眼睛的表情与其说是敌意，不如说是异常的激动。

自然，我避免给他直接答复。"这里一定有些误会，"我说。"你得到的情报不正确。"

他离开几分钟后又回来了。"不，赫鲁晓夫同志，我现在已经得到确实的消息，你们的部队和坦克都在移动。"他再次要求我阻止他们，否则就会有麻烦。

会谈宣告暂时休会。据我回忆，波兰人要我们自己商量一下，对于新领导及其政策作出我们的决定——对我们的部队也要作出决定。我们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主张应当下令我们的坦克部队停止前进，不是返回他们的

① 人们知道科马尔将军和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关系是不好的。

驻地而是就地停下来，三三五五地聚集在一起，而不要展开列成行军队形。大家都同意这是最好的方案。我们把决定通知了科涅夫。他把这项命令传达给我们的部队，也传达给罗科索夫斯基。①

华沙人民已经在准备自卫和抵抗苏军的入城。我们后来才知道，华沙最大的汽车制造厂已发了枪枝，并成立了工人自卫队。如果发生一场冲突，除了我们的敌人外谁都不会得到好处。这将是一场致命的冲突，今后许多年都会感受到它的严重后果。所加于苏波友谊上的创伤，需要长时期才能治愈。在历史上这类的创伤已经够多了。苏联士兵和波兰工人之间的武装冲突将是一个新的创伤——而这是最为苏联的敌人、共产主义的敌人和波兰的敌人所欢迎的。但是我们的敌人失望了。

在命令我们的部队就地停止前进，并同意哥穆尔卡升任第一书记后，我们和波兰同志重聚一堂继续会谈。哥穆尔卡开始在会上发表讲话。我们从他的举止上可以看出，他的身体还很虚弱，但是他在波兰领导核心内具有左右一切的地位——一个对我们最有利的地位。这个人是在反苏高潮中上台的，然而现在他却强调波兰需要同苏联和苏联共产党保持友好的关系。也许当时我对这件事

---

① 马·斯彼哈尔斯基将军于11月取代罗科索夫斯基任国防部长，他是随着哥穆尔卡的受黜而失宠，又随着哥穆尔卡的上升而得到提拔。

还没有足够的评价，但是后来我认识到了。他正是在那个紧张的时刻出任波兰领导的。当然有些人批评他，攻击他，但绝大多数的人承认他的权威并认真听他的话。

波兰同志交给我们一份他们想要讨论的问题单子，包括各种各样的抱怨、牢骚、指责和要求。有些人抨击我们同希特勒签订了导致瓜分波兰的条约，但是由于我们苏联士兵在把波兰从希特勒德国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流了血，这种指责便显得站不住脚了。

波兰人还继续要求撤退我们的部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达成了一项协议，因为我们信任哥穆尔卡；我们相信他的新领导会在国家和党的路线上坚持与苏联加强友好关系的政策。当他说他认为我们面对的共同敌人是西方帝国主义时，我们相信他。我记得他激动得几乎尖声喊叫起来："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他歇斯底里地叫喊，声音几乎有点嘶哑了。我们可以看出，他讲的话是真诚的。我们把他的话当作是我们信得过的人开出的期票。

我们回到了苏联。动乱在波兰继续了一些时候，但那是可以预计到的。政治灰尘已经积了多少年了，不能只用一块揩布或一把扫帚把它一扫而光。可是，一旦我们承认了过去的不平等，正常化过程的到来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我们缓慢地但可靠地在两国人民心连心的

友好道路上清除过去的垃圾，并为分享我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而开辟道路，因为我们的任务是对西方帝国主义者、西德复仇主义分子和社会主义的所有敌人进行共同斗争。

当波兰局势开始正常化之时，我同波兰的新领导发展了极为良好的个人关系。我不止一次地被邀请作为哥穆尔卡同志的客人到波兰去访问。有一次访问期间，波兰同志们建议我们到西部地区去旅行。我知道住在这里的波兰人是被迫地、绝非出于自愿地离开战前所住的地方移居到这里来的。西部地区的土地很不错，波兰人不愿移居到这里来一定是由于他们担心这些地区总有一天会归还给德国。什切青有一半地方无人居住；几乎没有一个波兰人愿意住到那里去。①

我在西部地区的旅行从什切青开始，作为苏联的代表，我受到许多次盛大集会的欢迎。我讲了一两次话。后来我发现，波兰同志打算要使我成为什切青的荣誉市民。他们事前并未和我商量过这件事。最初我捉摸不透为什么他们不把这件事同我讲清楚。后来我才明白过来，

---

① 这些地区是战后从纳粹德国归并来的。战争初期被德国人占领的波罗的海港口格但斯克重新还给波兰，而东普鲁士的北部则归了苏联。波兰按1950年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的条约沿着奥得—尼斯线划定了西部边界。波罗的海的什切青港就在格但斯克的西面。

并对哥穆尔卡同志说："嗳呀！要我当什切青的荣誉市民，你是想把我当人质，以保证这个城市不脱离波兰！你知道，我作为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具有相当的影响，而把我同你们对这个城市的所有权正式联系起来，就好象把钱存在银行里一样。你想借此表示，波兰已经在这里站稳了脚跟。我讲的对吗？"

哥穆尔卡笑了一笑，只是说："赫鲁晓夫同志，你应该相信，我们建议要你当什切青的荣誉市民，是出于对你的深厚敬意呀。"

这样，他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我的怀疑。事实上，我并不反对这个主意。我愿意起人质的作用，做一个荣誉市民——并不是由于它满足了我的任何秘密的贪图功名之心（尽管它当然是一项荣誉），而是因为它会提高波兰同志的士气，并有助于保证这个新的西部边界。

在波兰的东部边界地区——即在战后成为波兰一部分的西乌克兰——波兰同志决定把所有那些表现不好的乌克兰人强制迁往西部。在这里也一样，有许多波兰人不愿移居到东部地区来，因为他们对新边界的持久性抱有怀疑。但领导核心却没有这种惴惴不安的情绪。我们的波兰同志确信，苏联决不会食言，以往的乌克兰土地将永归波兰所有。

经互会内部的争吵

在我们紧急的华沙之行和哥穆尔卡升任第一书记后不久，波兰局势已开始正常化；我和哥穆尔卡同志建立了极好的个人关系。同样地，在匈牙利的秩序恢复后，卡达尔同志和我在两国发生的许多问题上有了良好的相互谅解。发展同波兰和匈牙利的经济关系，对于正常化过程特别重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改正过去所犯的一些错误。自从斯大林时代以来，在我们同兄弟国家的经济关系中出现的某种不平等，是造成 1956 年复杂局势的原因之一。这些错误同别的事情一样，是战前战后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所造成的。①

我们访问华沙期间，波兰同志们向我们提出的一项主要指责，涉及到波兰向我们的工厂和发电厂出售大宗煤炭的价格问题。（我们自己不能生产煤，因为我们在顿巴斯的煤矿在战时已被破坏。）我们预料会提出这个问题，所以带了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前往华

---

① 赫鲁晓夫指的是波兰和匈牙利领导层的“错误”，即他们在 1956 年对抗莫斯科。关于赫鲁晓夫对匈牙利的暴乱及镇压这次暴乱的叙述，以及他和党的领导人亚诺什·卡达尔关系的叙述，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415—429页。

沙，因为他恰好是经管这类问题的。

“波兰人讲的是真话吗？”我问他，“我们付给他们的煤价真的是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吗？”

“是的，是这样的。”

“波兰方面有人同我们签过同意这个价格的合同吗？”

“是的，”米高扬说：“协议是由西伦凯维兹代表波兰政府签订的。”

“你们看？”我转身向波兰同志说：“你们自己的总理签订了这个协议！为什么你们要责怪我们呢？”

“西伦凯维兹有什么办法呢？”他们立即反驳我。

“他只是照斯大林的命令办事。”

“好吧，”我说，“我们回去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如果你们讲的对，是斯大林强迫西伦凯维兹签订的——你们可能是对的，因为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没有否认——我们将给予你们补偿。不管怎样，我们会把我们的决定通知你们。”

后来我问米高扬，“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能付给波兰同志这样不公平的煤炭价格呢？”

“这都是斯大林的事，”他说。

斯大林可能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我们为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过血。他觉得波兰应当以廉价的煤来报答我们。再者，波兰的煤大多数是在西里西亚开采的。

由于苏联的政策主张把波兰边界进一步西移，这个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波兰的一部分。当然波兰人有理由要求得到过去就是属于他们的西里西亚，但不打败希特勒德国，他们就别梦想收回这些土地，而打败希特勒德国主要是靠苏联方面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尽管如此，我们应当看到斯大林对波兰经济政策上的错误。这并不容易，但我们确实承认了错误，并对波兰由于按不公平价格出售给我们煤所受到的损失作了补偿。

我们还告诉波兰人，我们要偿还他们的铁路运费。对我们来说，这些补偿费是很容易支付的。波兰人欠了我们很多钱，我们只要减少一些他们欠我们的债款就行了。客观地来看，只要用一支铅笔和一张纸计算一下就可以知道，苏联给予波兰的远比波兰给予苏联的所有东西都多。我只是讲物质援助，还不包括我们为他们流血和献出生命这些无法以价值来计算的贡献在内。可是，这些简单的数学方面的情况都被撇在一边，被遗忘了，而波兰的民族自豪感却受到过分赞扬。我们应该记住，斯大林强加给西伦凯维兹的不平等商务条约，已经促使波兰变成一个心怀怨恨的邻国，而且几乎引起一场政治爆炸。

同样地，斯大林用设立国际机构来开发我们盟国自然资源的办法，已经在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匈牙利、中国以及奥地利和波兰引起了反

感。①斯大林死后，我们一直打算结束这些机构。但光把它们结束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改变同我们盟国之间经济关系的整个图景。我们应当消除同志们存在的正当的怀疑。这意味着要对过去的条约和合同加以审慎的分析，然后纠正已经产生的一切错误。

尽管如此，我们必须在有些地方划清界线。许多波兰人对于我们之间的经济关系提出了荒谬可笑的指责；实际上我们向他们提供了真诚的援助，而他们却指责我们剥削他们。例如，有些人说我们强迫波兰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新胡塔建设一座大钢厂。哥穆尔卡后来在这个问题上为我们极力辩护说："你们在讲些什么？苏联帮助我们建设这个工厂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

事实正是这样。这座钢厂不仅对于波兰的经济是个积极贡献，而且最初是波兰人提出的，不是我们提出的。我记得贝鲁特有一次对斯大林说："你可以用贷款来帮助我们在克拉科夫附近造一座钢厂。这个城市是我们的旧首都，然而它却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成分。在那里建立一座钢厂，我们就可以加强克拉科夫地区工人阶级对社会主义的支持。"②后来波兰人以我们伟大领袖列宁同志

① "国际机构"是有利于俄国人的商业性租让合同。

② 克拉科夫这个自豪的、繁荣的大学城市和宗教中心，传统上一直是波兰的文化和知识生活的堡垒，因而"缺乏成熟的无产阶级成分。"

的名字为新胡塔炼钢厂命名。不久前我从收音机里高兴地听到，为了纪念列宁诞生一百周年，一座新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纪念碑在克拉科夫地区揭幕了。

如果我们不给波兰必要的贷款来建设钢厂，我们就得向他们供应钢材。从经济上看，这也许对我们有利，但兄弟般的关系要求我们鼓励波兰自给自足和加强波兰国内的经济实力。因此，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观点来看，对我们援助建立新胡塔钢厂的抱怨是荒谬可笑的。我记得匈牙利对于我们在那里造的一座钢厂也有类似的抱怨。

但是，我们的同志即使搞这种无理取闹，我们也能够谅解。有时一个人情绪激动时，他会把朋友给他的一块面包扔回到他的脸上。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哥穆尔卡本人在华沙同我们会谈时，他也有着双重的心情。一方面，他知道哪些抱怨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另一方面，他对自己受到的虐待仍然耿耿于怀。他知道他被关进监狱是得到斯大林同意的，因而对苏联仍怀有一些冷淡的情绪。

此后，我同哥穆尔卡同志在各种重要的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经常打交道。随着岁月的推移，波苏关系不断有所改善。虽然他和我在某些具体问题上看法仍有分歧，我们的个人关系是再好也没有了。即使我们之间存在很少一些分歧意见也是正常的。说到底，如果完全没有分

歧，也许就意味着没有民主了。随着个人崇拜而发展起来的全体一致和阿谀奉承，我们已经够多的了。①

有一个问题哥穆尔卡和我有不同意见，就是发展国家农业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在我去波兰的多次访问中，我对这个问题特别有兴趣。那时〔五十年代末〕大部分集体农庄已经完全解体。战后初期有一次我在波兰访问时，我参观过罗兹地区的一个集体农庄，并结识了农庄的主席。我一度帮过他的忙，派了我们的一个农艺师去教他怎样把玉米种好。现在，我作为苏联代表团的团长又来到波兰，我很想知道这个集体农庄是否仍然存在，或者象其他许多集体农庄那样已经解散了。我到了罗兹，高兴地看到这个集体农庄不但仍然健在，而且那位主席也在；他以最友好的兄弟般热情来接待同志们和我。

当然，首先哥穆尔卡就没有赞成过集体农庄。正如我已讲过的，他反对实行集体化，使贝鲁特及其同事在战后对他提出指责有了依据。哥穆尔卡比较喜欢“小组”或农民合作社，让几个农民合力购置种籽、肥料和机器；他们进行集体耕作，但土地仍然分为几块，每块土地归各户农民私人所有。集体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可以通过小组出售。严格地说，这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按照社会主义的观点，它也不是一种合作社制度。波兰的“小

---

① 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

组”，比较接近于我们所谓的工人合作社或共耕社。它们象小的公司，其中土地仍属农民所有。因此，这种制度是向旧时代的倒退。可是，农业组织问题是波兰的内部事务，我们从没有因此而责备哥穆尔卡同志。即使我们曾提出过一些问题，那也只是为了使我们自己了解他们的农业体系是怎样运转的。

哥穆尔卡同志有时也来莫斯科同我们讨论经济问题。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邀请他主要是向外界表示，我们同波兰的关系已经正常化，敌人想要我们之间发生冲突的希望已经破灭了。

但波兰同志心里却有别的目的。有时我有理由认为，哥穆尔卡和他的同事想使两国的经济和政治关系为他们自己的利益服务，而不是为了我们相互的利益。波兰和其他国家的这种〔自私自利〕行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家庭内部引起了一定的紧张状况，即在经济互助委员会内部所产生的紧张状况。①

有一个时候，波兰同志想要我们帮助偿还他们所欠

---

① 经济互助委员会于1949年1月在莫斯科成立。原来的成员国是苏联、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波兰和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迟一个月参加，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1950年参加，蒙古人民共和国在1962年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古巴、北朝鲜、北越以及南斯拉夫具有联系国的地位。

的一些西方债务。看来，波兰人在困难时期①轻率地接受了西方的贷款，现在已经到期而他们没有能力偿还。现在他们来找我们帮忙了。这些谈话是非常敏感的。我们并不责怪他们过去的错误，我们表示了善意。我们的阶级利益和国家利益要求我们帮助波兰摆脱棘手的处境，而我们正是这样做的。

可是，要我们接受波兰同志的另一些要求就更困难了。有时在交谈中他们甚至逼得我们遗憾地使用了一些刺耳的词句。当经互会就一项经济计划作出决定并批准之后，我们有好多次都接到波兰人的电话，他们总是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们有几个问题想同你商量一下。我们到莫斯科来看你，好吗?"当然，我们要以礼相待，他们是我们的同志嘛；所以，我们总是同意接待他们。

我们驻经互会的代表事先会把波兰人的想法通知我们，这些想法通常都是老一套：尽管交货和分配数量的计划已经确定，波兰人却想使我们相信他们的处境困难，需要我们特殊照顾，通常是要我们增加铁矿砂的供应。由于我们还得向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及波兰运送铁矿砂——以及由于我们的铁矿砂产量没有可能超过我们国内消费的需要——我们不能经常满足波兰人增加供应量的要求。当然啰，要是我

① 这个"困难时期"是贝鲁特去世和1956年10月危机之间的一段时期。

们有多余的铁矿砂并能增加对兄弟国家的出口，我们只有感到高兴。但是，有时我们连自己也不够用，那么，波兰人提出这些特殊要求就会使双方感到不愉快。

又有的时候，波兰人要求我们改变提供给他们的铁矿砂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他们对我们说，他们的熔炉需要含铁量较高的矿砂。在石油方面也发生过类似的问题：波兰人要求分配给他们比经互会计划规定的数量更多的石油。尽管事实上有时我们自己的石油也不够用，我们还是打算满足波兰的要求。这种要求通常是哥穆尔卡同志提出来的，他有办法把这些事情说成是全国性的问题。

波兰人常常带着一些特别令人不愉快的要求来找我们。他们总是想得到比经互会计划规定的更多的饲料谷物。每年我们都提醒他们，我们给他们的额外谷物是最后一次了，而下一年他们又提出同样的要求。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波兰的农业产量按人口平均计算是最高的。波兰的饲料谷物可以自给自足，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需要我们支援。（当我们有大量剩余时，我们一度向罗马尼亚提供谷物。而我们只是借给他们，几年之后必须偿还。）

同西方国家相比，波兰农业的生产效率是较低的，但比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好。但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求我们增加对他们的谷物供应呢？我来告诉你们：他们这样做是

出于商业上的原因。他们要求我们提供额外的谷物，不是为了饲养国内市场所需要的牲畜，而是用来饲养做熏肉的猪，然后波兰人把熏肉出口到美国作为取得外汇的主要来源。

虽然波兰人可能是出于商业方面的考虑，但我认为美国人却是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尽管美国禁止社会主义国家的制成品进口，但却进口波兰的熏肉；这不仅是因为它的质量高，而且还因为他们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播下不和的种子。“分而治之”，这是他们的格言。但我们是不会上当的。波兰人进入了美国市场，而我们却受到排挤和歧视，但我们并不为此感到嫉妒。就我们来说，波兰利用极为有利的机会是完全正当的。

可是，我们是在牺牲自己的条件下来满足波兰的要求的。如果有的时候为了友谊，你必须和一位同志分吃你的最后一片面包，我确信我们的同胞不会反对。但是，我们并不是在援助波兰使它免受饥饿——远远不是这样。我们是在为他们同西方贸易提供方便，而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勒紧自己的裤带。我要承认，每当我们听说哥穆尔卡同志要来“讨论某些问题”时，我们自己就会私下唠叨说，波兰人又来占我们的便宜了。

在我的经历中，1963年发生的谷物歉收是最严重的一次，我们只得向我们的盟国和朋友的良知发出呼吁。然而，即使在那种时候，哥穆尔卡还是来找我们要求增加

装运量。为了使他尽快地认清形势，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你知道，苏联按人口平均的肉类消费量比你们国家还要低。你知道，我们需要用现有的全部饲料谷物来为我们的人民生产熏肉、牛肉和禽蛋。然而，你却在要求我们给你运交额外的谷物，又不是为了给你自己的人民吃——也不是因为你们吃不饱——而是为了能捞到一些额外的美元。"

"是的，"他承认说："的确是这样。"

我注意到，在波兰最近的事件以后，盖莱克同志来到了苏联。①我对盖莱克同志极为钦佩；我认为他是一个诚实的、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的人。可是，他特地到莫斯科来当然不是仅仅为了听取意见。他回国后不久，报纸公布说，苏联给了波兰两百万吨小麦。这是很大的数量。它相当于五十万公斤左右的猪肉。在我们对自己居民的肉类供应还不够充足的时候，波兰人却能从我们得到这种援助。我们商店里供应的肉类有限；至少可以说，肉的品种是很少的。而且这是在莫斯科。在首都以外就更糟。

由此可见，波兰领导人在同苏联的经济往来中，还存在一些旧的倾向。

一般说来，这些年来我们同波兰的关系一直不错，但

① 这里谈到的"最近的事件"，是指波罗的海城市在1970年12月的暴动，以及随后哥穆尔卡的垮台。

这类争论还是发生过。不管同谁进行贸易，总会有冲突——即使在经互会内部也是这样。我相信历史将会证明，经互会在调节我们的经济计划方面起了必不可少的作用，特别是它在双方互利的基础上，对原料同制成品的交换进行了协调。

在我当权的日子里，我们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恢复互利原则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斯大林的国际机构曾使苏联可以去开发例如罗马尼亚的铀矿而不给予公平的补偿，但那种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开始按照国际市场价格购买罗马尼亚的铀，然后由我们把铀加以提炼并用来制造核武器。因此，这样的贸易是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服务的——我甚至还可以说，是为所有相信和平共处并致力于避免战争的进步人士服务的。我们购买铀矿石也有助于促进罗马尼亚发展其极为落后的经济。

大家知道，经济互助问题是同一个国家的对外关系和对内政策交织在一起的。每个国家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想发展自己的经济。罗马尼亚在这方面比大多数国家来还得进一步努力。它的人口主要由贫苦农民构成。另一方面，这个国家有丰富的自然资源：除铀外，还有大量的石油、天然气和木材。罗马尼亚的地理位置也很好，土地肥沃。简言之，看来罗马尼亚具有优越的条件把它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得生气勃勃并发展成一个稳定

的社会主义国家。

我作为官方代表团的成员，曾多次访问罗马尼亚。我也曾到那里去休养，并同罗马尼亚同志进行非正式的会谈。罗马尼亚的气候、肥沃的农田、极好的收成、美丽的喀尔巴阡山脉，以及很多可供狩猎的野味，都使我永远不能忘怀。乡间有成群的野鹿。罗马尼亚人发展了奇妙的捕熊业，结果使猎熊成为罗马尼亚颇能赢利的行业。

我还赞赏罗马尼亚同志迅速而熟练地进行了农业集体化。应当承认，在农村中发生过几次叛乱，但是罗马尼亚同志解决了这些问题并继续建立工作效率很高的集体农庄。这些农庄办得很成功，所以罗马尼亚人经常有剩余的农产品，特别是谷物和玉米，可供出口作为外汇的一项来源。

在我们方面，我们用各种方式尽力帮助罗马尼亚人。我们提供给他们拖拉机，以使他们为集体农庄的机械化和提高生产效率具备技术基础。我们还帮助他们着手制造汽车和柴油机车，以及兴建炼油厂和炼钢厂。只要是他们的经济所需要而我们又有能力提供的——无论是机器、技术或顾问——总是有求必应。我们向他们提供的所有技术援助都是免费的，而借给他们用来购买我们产品的贷款只收取最低限度的利息，比国际上通常贷款的利率低得多。我记得，我们提供给罗马尼亚足够建造许多工厂的贷款，利息只有百分之二到二点五。如果我们不

把这笔钱贷给罗马尼亚人而投资于我国经济，然后再把生产出来的多余产品卖给罗马尼亚，则我们可以赚更多的钱。但这不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待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应采取的正当手段。我们深信，我们必须帮助罗马尼亚人民发展经济，特别是发展重工业——钢、机床、拖拉机和汽车等产品。我还应补充一句：在经济上援助罗马尼亚的过程中，我们要注意不要伤害他们的民族感情和民族自尊心。

尽管有了我们的帮助和照顾，罗马尼亚也象有些社会主义国家一样，有时通过经互会对我们施加压力，以签订不平等的合同，占我们的便宜。我们常常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情况：我们从经互会某一成员国购买商品的价格，比我们自己制造的还要高。例如，有一个时候，正当我们努力增加甜菜生产时，我国农民遭受到象鼻虫灾害，使乌克兰的甜菜收成受到损失。我们只得要求罗马尼亚人增加他们所制造的杀虫药剂的供应量。罗马尼亚人同意给我们补充供应，但要以我们用黄金、硬通货或在国际市场上能换取硬通货的商品付款作为条件。他们提出这种要求的理由，同有些盟国要求购买超过我们供应能力的某种商品时我们所使用的论据相同。罗马尼亚人说，由于他们的杀虫剂可以出口并换取硬通货，我们就应以硬通货付款，以补偿他们本来可以向西方出口所能得到的硬通货。我们同意了他们的要求，不过它伤害了我

们的自尊心。

后来，我在同罗马尼亚领导人的一次会谈中，提出了杀虫剂问题。我很坦率地告诉他们，我们对此一直感到不快。乔治乌-德治锐利地看了毛雷尔一眼，用罗马尼亚话问了他几句。① 毛雷尔点了点头。乔治乌-德治转身对我说："是的，赫鲁晓夫同志，我们确曾要求你们以硬通货或相应的货物付款，但你们对我们也提出过同样要求，对吗？"

我们的人——具体说是柯西金同志——承认说是的，当罗马尼亚人要求增加某种货物原先的订购数量时，我们有一次要求用硬通货付款。②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种事情，我对乔治乌-德治同志也是这么说的。我听到罗苏两国采取这种同共产主义不相容而完全属于资本主义经营作风的作法，感到很不高兴。

我提出一项建议，我想这也许在今后会避免发生这类冲突。"同志们"，我说，"如果大家同意，让我们从现在开始，把计划内可以换取硬通货的商品单独列出，只能在经互会范围内部同其他可以换取硬通货的商品进行贸易。换句话说，当经互会的两个或两个以上成员国所签

---

① 扬·格奥尔基·毛雷尔接替基伏·斯托伊卡后长时期担任总理。

② 柯西金从1959年到1960年是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60年时成为赫鲁晓夫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订的合同发生违反或修改情况时，实施下列办法：稀少商品只能同稀少商品交换；如果要求增加原合同规定的订货数量，则应以硬通货或可在国外出售的货物支付。你们看怎么样？”

“好主意！”乔治乌-德治同志叫道：“我们就这样办吧！”他对这个主意如此热情，说明他一定还不十分明了我的用意所在。可是，他的同事、罗马尼亚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却完全了解我的用意，因而表示反对。①

“不，赫鲁晓夫同志，”他说：“我不同意。”

“为什么？”我问。“我提出的方案是以对等原则为基础的。无论哪一方都不会在交易中吃亏。”

“也许是这样，赫鲁晓夫同志，但我们从苏联购买的可以换取硬通货的商品比你们从我们这里购买的多。按

① 关于杀虫剂的这场争吵，日期不详。但是，可以猜想，这个罗马尼亚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负责人是格奥尔基·盖斯顿·马林。1963年苏联旱灾时期，马林使罗马尼亚“借”给苏联四十万吨的谷物——赫鲁晓夫认为这一姿态是“社会主义合作”的范例。

赫鲁晓夫在这里所叙述的苏罗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谁对谁说了些什么话的情况，俄文原文有些混淆不清。赫鲁晓夫对此事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一种说法是，罗马尼亚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人提醒乔治乌-德治不要接受赫鲁晓夫的狡猾建议；另一种说法则与此相反。这里采用的是第一种说法，因为赫鲁晓夫本人似乎对这一种说法比较肯定，并坚信自己没有记错。

照你提出的办法，结果我们将要支付给你们相当多的硬通货。”

“不错，”我回答说。“我们向你们提供铜，对吗？我们的铜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是用黄金或硬通货从国外买来的。可是你们用什么来交换我们的铜呢？你们给我们的许多商品是我们所不需要的。例如，你们卖给我们供包装用的木箱。这没有任何经济上的意义。我们在喀尔巴阡山区中有森林，自己可以制造木箱。但是我们却让你们生产木箱，然后用来装运我们摩尔达维亚的水果和其他商品。我们也可以用机器和铜来交换你们的木柴。所以，你们卖给我们的杀虫剂如果要我们支付硬通货的话，那么你们也应以硬通货来支付我们出售给你们的铜。这才是公平的。由于我们之间在硬通货商品的贸易上似乎出现了一些分歧，唯一的办法是在相互对等的基础上进行这种贸易。”

“赫鲁晓夫同志，请你不要坚持这个办法吧。这将使罗马尼亚付出很高的代价。”

“好吧！”我说，“我们继续照老办法做。”

我谈到同波兰和罗马尼亚同志的这些争吵，是因为它说明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我们同兄弟国家的经济关系并不总是对苏联有利的。人们听到这句话脸上会有不高兴的表情，然而这是真实的。

当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处于债权人的地位时，冲

突当然是不可避免的。在资本主义的旧时代，人们常说借贷有碍于友谊，不论是个人还是国家之间的借贷。可是，即使社会主义世界也不能完全没有借贷，所以分歧会不时发生。

在我身居高位和担负重大责任的年代里，我面临的部分问题是，我们的科学和工业质量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处于先进的水平。因此，我们可以制造出比其他国家更好的高级技术产品 —— 不包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捷克斯洛伐克在内（它们在某些领域甚至比我们领先）。结果，其他国家不断提出——有时在我们看来是过分的——要求。①我不愿细说，但自从我成为领取养老金的人以后，有人在这方面对我提出一些指责。我不否认，有时我曾拒绝过一些国家提供额外货物的要求。但我只是在提出的要求超过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才这样做的——也就是说，只是在会以牺牲苏联消费者的利益来满足别国需要的时候才加以拒绝的。

然而一般地说，我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是好的。仅有的例外是阿尔巴尼亚、中国和朝鲜，它们或以观察员身分参加经互会，或者根本不参加。（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濒于破裂和我们同朝鲜的关系千钧一发之时，中国和朝鲜退出了；阿尔巴尼亚是当它在社会主义

① “其他国家”是指波兰、匈牙利、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

国家中开始扮演头号捣乱分子的角色时退出的。）瞻望将来，我相信只要经互会坚持互利的原则，这个组织将在我们的建设中发挥重要和有益的作用。我在这里所回忆的一些不平静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们同兄弟国家经济关系的光滑面上偶尔出现的瑕疵而已。

整顿华沙条约组织

我在担任政府和党的首脑时，我认为裁减苏联军队和开始从外国撤退我们的军队是一项紧要任务。我们几乎把常备军人数减到斯大林时期的一半，并且从芬兰、奥地利和罗马尼亚撤回了我们的军队。我们还建议从匈牙利和波兰撤回我们的驻军。我们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本来没有军队。我们认为只有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仍有保持军队的必要。大家都很明白，在我们以前的盟国——它们已经建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意签订和平条约之前，我们的军队有必要继续留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①西方毕竟在西德驻扎着一支相当庞大的军队，我们必须保持均势。

首先，我要说明我们一致决定裁减武装力量的背景，然后再叙述对个别国家实施这个决定的经过情况。

① 和平条约应澄清德国及柏林的地位，并且把德国和苏联之间的和平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我们准备裁减一些军队的决定，是经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才作出的。在斯大林逝世的时候，我们的地位非常脆弱。当时美国对我们采取一种傲慢的和进攻性的政策。它不放弃任何一个显示优势的机会。美国人在苏联周围建立军事基地，并且不断派侦察机深入我国内地，有时直到基辅。我们准备美国随时发动全面进攻。因此，我们只得把大量资金用在国防方面，以防止另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我们人民的脑海中记忆犹新。只有等到我们用现代化武器装备了武装部队之后，我们才能够转移一部分国防费用到其他方面去。

我国军队的现代化费了好几个年头和无数金钱。不过，一旦我们用国防所必需的导弹、飞机、潜水艇舰队和核弹头把自己装备起来之后，我们就能够重新考虑我们的军事预算。

自从我们创立华沙条约以后，我认为考虑裁减武装部队的时刻已经到来。我知道，即使对方拒绝签订裁军协议，我们也应当想出一定的办法来裁减我们的军队，当然，以不危害我们的国防为前提。为什么我们要单方面裁军呢？因为我们不愿意给敌人这样一种机会，即他们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迫使我们和他们进行无止境的军备竞赛，并消耗我们的经济实力。即使我们不能说服他们裁军和放弃以战争为施加政治压力的手段，至少我们可以表明我们的和平意图，同时还可以腾出一部分资金

来发展我们的工业，生产消费品和改善生活水平。

我们决定从减少人员入手，作为削减军事开支的第一步。现代军队的实力毕竟不是由人数而是由火力决定的，特别是导弹。我们已经储备了大量的核武器，所以我们的火力已经增加了许多倍，我们有条件裁减我们的地面部队。我们逐步地把常备军从五百万左右减少到二百五十万。

我们还决定削减苏联军队的工资。后来，在我从党的第一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卸任以后，我听到一些反映，有人抱怨说这是我决定的。我不否认军官的工资是在我当权时削减的，但实际上是朱可夫元帅的主意。我当然是支持他的，因为有很多显然是过分高的，非削减不可。这些事都是在朱可夫任国防部长以及后来马利诺夫斯基继任部长后做的。我必须在这里把功劳归于朱可夫，他认识到削减军队开支的必要性，他主动地从指挥人员中裁去了冗员，并且下令削减某几类军官的工资。①

我们驻国外和在国内的军队都必须精简。在国外维持一师军队的费用——即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上——两倍于在自己国内维持一师军队的费用。

除经济上的原因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迫使我们从兄弟国家撤出军队。我们不希望任何人以为我们不信任

---

① 这段并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15页。

我们的盟国。他们在本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不是因为有苏联军队驻扎在那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国际主义是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主要吸引力，是促使其团结一致的力量。你不能用威胁的办法把人民赶进天堂，然后在大门口设置岗哨。必须由人民自己来选择更好的生活，而且，只要有机会他们必然会这样做。

因此，我们要拿掉敌人宣传机器手中的王牌。我们要揭穿敌人的含沙射影的谰言，说什么匈牙利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和其他兄弟国家人民是在苏联士兵的刺刀尖下被迫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我不否认，这些国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十分心甘情愿做我们的盟国。他们对我们还怀着从战争时期和战后最初几年遗留下来的一些憎恨情绪，这是很自然的。如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等国家是被希特勒拉进来和我们作战的。因此，我们军队在追击向德国溃逃的希特勒侵略军时，也曾经攻击和打败了这些国家。我们对他们作战并非出于本意，而是因为他们被编入了希特勒的军队。

战争结束以后，斯大林对待这些国家十分粗暴。他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他们。在他的心目中，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朋友。他把他们作为苏联的臣民而不是作为盟友对待。我们（斯大林以后的苏联领导）只得把斯大林为我们准备好的这碗汤喝下去。由于在我们盟国方面长期存

在着怨恨甚至敌对情绪，我们觉得要使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一致达到理想的程度是很困难的。我们在领导成员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现在是通过削减驻扎国外的军队来表示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和赢得他们善意的时候了。

首先，我想讲一讲我们是怎样从芬兰撤退军队的。根据苏芬条约，我们有一个军事基地。①来往于赫尔辛基的火车经过基地周围的土地时，都要受到我们士兵的检查。车窗上的窗帘要拉下来，不准乘客们向窗外看。在他们看来，似乎火车是在通过被占领的土地。芬兰人非常愤慨，我们的大使向我们报告了他们的愤怒情绪。②他经常向其他政治局委员和我报告最新发生的紧张局势或不愉快事件。

根据我的看法，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放弃赫尔辛基城外的基地。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牺牲我们的安全。芬兰毕竟是一个小国，我们同它有一条很长的共同边界；这样，我们的炮兵和步兵能够很容易和很快地到达赫尔辛基，更不用说我们的炸弹和导弹了。因此，在军事上我们没

---

① 这是位于波卡拉半岛上的海空军基地，离赫尔辛基约十二英里。苏联在1947年取得这块一百五十二平方英里土地的租借权，期限五十年，并且一直付给每英亩大约五美分的“租金”。

② 当时大使是V·Z·列别杰夫，他以前是驻波兰大使。

有保持这个基地的充分理由，而从政治上考虑更不应保持它。保持这个基地只会损害我们和芬兰人的关系。他们担心，我们在他们领土上驻扎军队说明我们打算剥夺他们的独立，把他们的国家并入苏联。他们有这种恐惧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芬兰人很清楚，我们驻扎在他们首都城外的军队不是在那里做羊肉叉烧或钓鱼。

我们早就应该表明，我们对芬兰没有领土要求，并且无意用刺刀把社会主义强加于芬兰人。我们应该明白表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以列宁主义和平共处原则为指导的。这意味着其他国家应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决定自己国内的政治和社会问题。

我们另一个考虑是：当时我们正在要求其他国家从外国领土上撤走军队。只要我们在芬兰保持基地，其他国家就会指着我们说，“你们呢？”

总之，我们继续在芬兰驻扎军队有碍于人们相信我们的和平意图。我相信我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比领导成员中的其他人要深刻得多。我还得要说服其他的同志。

当时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同我一道在日内瓦。①我没有对莫洛托夫讲起放弃我们在芬兰的基地的主意，因为我晓得他不会同意。我长期以来一直听说他的思想太僵化了，他不能现实地估量形势和作出正确决

① 莫洛托夫、布尔加宁和朱可夫陪同赫鲁晓夫出席1955年夏天在日内瓦召开的四大国最高级会议。

定。不过我和布尔加宁讨论了这件事，他同意我的意见：这个基地应该关闭。我决定也和朱可夫讨论这个问题。他和我的关系非常好，我非常尊重他的判断力。在不同的场合，我有时称他“格奥尔基”，有时称他“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或者更一本正经地称呼他“朱可夫同志”。当时只有我们两人一起在一所乡村的小庄园里，我问他“你对我们从芬兰撤退军队怎么想法？我们在那里的基地好象是我们的肋中刺。它不仅损害我们同芬兰的关系，而且也损害我们同其他国家的关系。以瑞典及挪威为例，它们都是芬兰的紧邻，因而它们不安地注视着我们，看我们会把芬兰人怎么样。你的意见如何？”

“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朱可夫同志回答说。“从战略的角度看，我们完全没有理由在芬兰保持军队。此外，我们修筑防御工事和维持我们士兵的给养要花费很多钱”。

“那么就这样好了”，我说。“我们回到莫斯科后立刻就采取行动并把基地关闭。”

后来我同莫洛托夫谈起这件事情。正如我预料的那样，他不能理解撤回我们军队的必要性。他顽固地进行了一场争辩。

我们回到莫斯科时，我们在政府领导成员之间和党中央委员会进行了简要的讨论。在我们内部取得一致意见后，我们向芬兰人提出建议签订一个从他们领土上撤

走苏联军队的新条约。①这样，我们就取消了设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大门口的军事基地。结果怎样呢？我们和芬兰的关系受到损失吗？相反，我们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

当然，芬兰国内总会有些反动分子，这些人强烈憎恨社会主义制度，并且会用一切手段在我们两国之间制造隔阂。但是芬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并没有侵略他们国家的意图，也无意在任何方面干预他们的事务。芬兰工会和工商界的代表同样都看到我们对他们的国家没有恶意，并且欢迎我们在加强经济关系方面所作的努力。至于芬兰共产党，它在工人阶级和农民中的工作好做得多了；芬兰同志们从此免除了一项困难的任务：向他们的同胞解释苏联军队为什么必须驻扎在他们领土上。

我们决定放弃在芬兰的基地，也是我们在同其他国家打交道中的一个重大胜利，因为它表明当我们敦促其他国家从外国领土上撤走所有军队时，我们自己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根据波茨坦协定，直到我们和德国及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盟国签订和约以前，我们完全有权在奥地利、

---

① 布尔加宁宣布苏联将在1955年9月关闭波卡拉半岛上的设施，作为对苏—芬互助条约延长二十年的报答。布尔加宁宣布以后的第二天，朱可夫说苏联打算最终将关闭在外国领土上的全部军事基地。

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罗马尼亚驻扎军队。但是我们在领导成员中讨论了这个问题，我们决定进一步削减驻在国外的军队。首先提出这个主张的是我，并且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

我们撤出了驻扎在维也纳城外的全部军队，并且把驻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减少到五十万人左右。不过我们在德国仍留下一支相当大的军队。①在我们考虑从匈牙利和波兰撤退军队之前，我们必须确信不会切断自己和我们驻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之间的联络。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我们已经走过漫长的道路。我们集结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火力和部署在苏联的远程及中程弹道导弹，使我们有可能不仅毁灭西德一切有生命的东西，并且可以打击欧洲以及非洲任何地方的目标。所以，我们目前单单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苏联国内的威慑力量，就足以遏制美国的任何侵略势力。我们不再需要在波兰和匈牙利保持大量军队来支撑这支威慑力量。有了机械化的步兵、坦克和空降运输机，我们

① 苏联军队于1955年夏从维也纳城外撤走。至于东德，苏联仍在那里驻扎二十个师以上的军队。

从1955年华沙条约建立到1960年，苏联军队人数从五百七十六万三千人减少至三百六十二万三千人。此外，克里姆林宫在1960年1月复员了一百二十万人，相当于武装部队人数的整整三分之一。

的机动化程度已经远远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果需要的话，我们的军队完全可以在几小时内进驻匈牙利和波兰。

在匈牙利反革命叛乱平定了一段时间后，我问卡达尔同志，他对我们提出的在华沙条约国家，特别是在匈牙利减少我国驻军的计划有何意见。

我说，"卡达尔同志，你有没有考虑过我国在匈牙利的军队？我们曾在领导成员中交换过意见，决定可以从匈牙利撤走我们的军队了，如果你认为这是适当的话。我们尊重你的意见，并将按照你的意见行事"。

"赫鲁晓夫同志，我想最好由你们自己来决定。对你们的军队驻扎在我们领土上，我们国家没有丝毫不满情绪。我说的话是非常坦率的。"①

"不过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波兰人对你们从波兰撤退军队的意见如何？"

"我还没有和波兰人谈起。我们想先和你谈谈，然后再听取他们的意见。"

我已经提到过，在一个华沙条约国家维持一师军队的费用，两倍于在苏联本国维持同样一师军队的费用。在苏联境外保持我们的军队特别费钱，而对我们军队的驻在国则是有利的。我们必须为波兰人给我们修建的营

① 和这段及前两段类似的说法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27—428页。

房付款，还要给他们最新式的武器和技术水平很高的工业设备，作为给我们提供基地的报酬。所有这些费用是相当巨大的，对我们自己的经济是一个沉重的负担。

在我们〔苏联〕领导内部商量以后，我和哥穆尔卡同志讨论了从波兰撤回我们军队的问题。我坚持说，现在波兰自己有一支相当强大的军队，我们在波兰维持军队的费用无论在政治上或战略上似乎都不再有理由了。

“请记住，哥穆尔卡同志”，我说，“西方不仅威胁波兰，也威胁我们苏联。如果帝国主义者试图发动战争，他们在和你们交锋之前，首先要和我们交锋，因为我们有一支庞大的军队驻扎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西方不可能不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而入侵波兰，这就意味着帝国主义者要首先对付我们。西方懂得这一点，西方也知道我们有核导弹保护我们在德国的军队。因此，对于保持一支对付帝国主义侵略的威慑力量来说，我们在波兰的驻军数量已不再是重要的了。根据我们对形势的认识，从波兰撤退我们的军队既不会危害你们的安全，也不会危害我们自己的安全”。根据这个理由，没有人能够再以西方进攻的威胁作为政治上的论据。①

这样，关于匈牙利和波兰两国的问题，事实上是我们向它们建议减少或者从它们领土上全部撤退苏联军队。

① 即苏联须在波兰保持全部军队的论据。在波兰仍有两师苏联军队，在匈牙利有四个师。

罗马尼亚的问题恰好倒过来，因此更为复杂。罗马尼亚人向我们提出把军队从他们国家撤走。最初我们对他们是有误解，并且试图说服他们应当把军队留下来，但是，后来我们经过考虑以后改变了想法。情况是这样的：

斯大林逝世后不久，我在罗马尼亚和国防部长波德纳拉希同志有过一次谈话。我已经清楚地说过，他是苏联的好朋友，是一个老布尔什维克，曾经在罗马尼亚坐过牢。我们对他绝对信任和尊重。据我的回忆，我们有一个或两个坦克师和一个步兵师驻在罗马尼亚。

他事先不打招呼突然提出了问题："你看是不是可以从罗马尼亚撤出你们的军队？"

我必须承认我的初步反应不是很理智的。如果你记住这次谈话是在1956年以前——在我们揭露斯大林滥用权力以前——你会理解我们仍然受到斯大林政策的影响，并且崇拜斯大林所做的一切事情。当波德纳拉希同志非常突然地提出有关我们军队的问题时，我甚至可以说我已经沉不住气了。"你说什么？你怎么能提出这样的事情？"

"好"，他解释说，"和罗马尼亚接壤的都是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匈牙利和苏联〕，黑海对面除土耳其人外亦无别人。因此我们需要你们的军队在这里干什么呢？"

"那么对土耳其人怎么考虑？"我问道。

“你们就在我们的贴隔壁。如果土耳其人向我们进攻，你们可以来援助我们嘛。”

“你说起来很容易，但是我想到的不仅仅是土耳其人。他们控制着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因此他们随时可以让敌人的登陆部队开进黑海侵犯你们的领土。”

罗马尼亚同志交换了眼色。显然他们已经预先讨论过这件事情。“好吧”，他们说，“如果你认为是这样，我们愿意收回这个问题。我们只不过想让你知道，不是由于你们的军队驻扎在我们的领土上，我们才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的。我们只想要你明白，我们真诚地相信社会主义建设和遵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策，同时，我们的人民承认我们是他们的领导人，并且完全拥护我们。在我们国家发展社会主义不是取决于苏联的压力。”

他们这样阐明了要苏军从自己领土上撤走的理由，我是再满意也不过了。我相信罗马尼亚同志重申自己致力于社会主义建设是诚恳的。我甚至并不认为波德纳拉希同志的建议带有任何反苏色彩。我意识到，他和其他罗马尼亚同志只不过要求完全掌握他们自己的领导权。①

鉴于我的反对意见，即我认为他们低估了敌人的力

---

① 同波德纳拉希和其他罗马尼亚人谈话的记述也出现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13—514页。

量，罗马尼亚同志至少愿意暂时不谈有关我们军队的问题。

在以后的一年半左右时间里，我经常想起波德纳拉希同志的话，尤其是在我后来同乔治乌-德治同志谈话以后。“你对波德纳拉希同志所说的话使我们非常生气”，他说，“你侮辱了我们，因为你暗示我们没有取得人民的信任，以及我们所以能够掌权完全是你们的军队驻扎在我们领土上的结果”。乔治乌-德治的话使我非常忧虑，尤其是因为我们晓得他是一个正直的同志和好朋友。我把他的话记在心头。

在这期间，我经常把我和罗马尼亚同志的讨论情况告诉我们的领导成员。当我们开始考虑减少军费开支和军队人数的可能性，特别是减少我们驻扎在其他华沙条约国家的军队时，我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我们不再用斯大林式的眼镜来看资本主义构成的危险。当然，我们仍处在资本主义国家军事基地的包围之中，但是，既然我们有了导弹以及原子弹和氢弹，社会主义阵营就具有了世界上最强大的武装力量之一。

我越是考虑这个问题，越感觉到我们似乎应该从罗马尼亚撤退那几师军队，并把它们就近驻扎在摩尔达维亚和乌克兰。我认为，譬如说，如果把这几师军队置于敖德萨军区的指挥下，我们仍然会使敌人在侵犯罗马尼亚之前再三考虑。考虑到我们战术导弹和沿海防御的力

量，我深信帝国主义侵犯罗马尼亚不会象在树林中散步那样容易。

除了纯粹的战略和军事考虑以外，还有着象波德纳拉希同志和乔治乌-德治同志提出的那些迫切的政治上的理由，也要求我们撤回在罗马尼亚的驻军。我们了解，罗马尼亚人民确实已经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作为唯一正确的道路，不是因为他们的领导人是由外国刺刀支撑的，而是因为社会主义符合他们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如果我们撤退驻军，罗马尼亚同志会把它看作是一种政治上信任的表示。

简言之，我认为我们应该重新考虑波德纳拉希同志的提议。我在领导成员中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们征求了国防部长的意见，①他完全同意我的建议，我们决定着手进行。

我们告诉罗马尼亚同志情况已经有了变化，我们现在已能从他们的国家撤军而不致给我国带来危险。罗马尼亚人当然感到高兴，尽管我们在开头时有过误会，他们的提议终于取得了胜利。我们撤出了军队，而且在这以后我们之间的关系看来也在开始改善。②

在外国领土上保持军事基地只会加速军备竞赛和使

---

① 马利诺夫斯基在1957年秋天取代了朱可夫。

② 从罗马尼亚撤出苏联军队的决定，是1958年5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华沙条约政治协商委员会会议上宣布的。

冷战的气氛更加紧张。因此，我们希望在华沙条约国家减少驻军的决定会起感染作用，使其他国家起而仿效。即使我们的政策没有感染别人，其他国家也不仿效我们的好榜样，至少为了宣传的目的我们在自己手中增添了许多好牌。现在我们可以问心无愧地主张和平共处了。

有些阅读我的回忆录的人会误解我们的裁军政策。有些人会说，在帝国主义者梦想摧毁社会主义阵营的情况下，我们削减军队是错误的。我想大多数有这种想法的人是军人。他们甚至早在朱可夫和马利诺夫斯基时期就反对我们正在开始执行的这一政策。

不过我深信我们所做的事是正确的。我仍主张从其他国家撤出苏联军队；只要有可能，我要为实现这个政策而斗争。但是，当某一位演说家正在宣传完全相反的政策时，谁还能为削减军队而斗争呢？如果这位演说家指挥的军队驻扎在别国的领土上，还有谁能宣传我所提倡的政策呢？我们不能一面宣传〔和平共处和不干涉政策〕，然后马上回过头来把军队开进别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宣传势必引起人们的怀疑。它收不到任何效果，也得不到任何人的信任。①

---

① 这位未指名的“演说家”显然是指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似乎在严厉批评他在1968年入侵和占领捷克斯洛伐克。

同罗马尼亚的分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和罗马尼亚的关系开始恶化。我们听到传说罗马尼亚同志在他们党的秘密会议上诽谤苏联。我们在布加勒斯特的大使馆向我们报告，以革命前的俄国著名人物命名的街道正在改换名称。我们深为不安地发现，我们的经济政策本来是为了适应罗马尼亚人的需要和满足他们的愿望，现在却遭到他们忘恩负义的对待。①

我们决定和罗马尼亚同志们会谈，以便坦率讨论形势并使他们有机会说明不满的原因。我们希望消除他们不满的原因。就我们而论，没有任何东西阻碍我们两个国家保持兄弟般的关系。我们向罗马尼亚同志们写了一封正式信件，表明我们渴望消除导致他们采取不友好态度的原因，并且我们表示，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愿意作出让步以便恢复友好关系。我们在信中说，"即使你们不喜欢我们，但事实总归是，历史使我们成为邻国，你们同我们是分不开的。如果在罗马尼亚王国时代，你们国家对苏联采取不友好政策是不足为奇的；但是现在既然罗马尼亚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没有理由不保持

---

① 罗马尼亚人于1963年开始把街道的名称非俄罗斯化。

兄弟般的关系”。

我正在准备参加1960年的罗马尼亚党代表大会。我们建议，在代表大会开幕前举行一次应邀前来布加勒斯特的各国共产党的预备会议。当时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已经出现了由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惹起的分歧。这些争论并不局限于军事范围，而基本上是政治分歧。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大多数党，包括罗马尼亚党，赞同我们关于发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意见，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是例外。罗马尼亚同志拥护后来在莫斯科举行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所制定的原则。①

就我们所知，我们和罗马尼亚人在中国问题上并无分歧，我甚至可以说我们有共同的语言。因此，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罗马尼亚共产党在内部进行反对苏联共产党的宣传。我们同他们会见，并要求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提出解释。

我记得，我们的讨论是在离布加勒斯特不远的一所精致的乡村住宅里举行的，旁边是一个湖，周围有茂盛的树林。罗马尼亚的乡村十分美丽，但是我们围着长桌讨论时的气氛却不够愉快。

“你们究竟有哪些不满?”我们问道。“是什么事使我

---

① 1960年6月罗马尼亚第三次党代表大会以后五个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中苏分裂第一次公开化。

们两党分裂？”

他们似乎没有作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可是会议以后，我们的关系继续走下坡路。例如，我们有几个姑娘和罗马尼亚留苏青年学生结了婚，并且同他们一起回到罗马尼亚；现在这些姑娘感到在罗马尼亚受到无法忍受的待遇，使得她们不得不和丈夫离婚并返回苏联。这使我们感到很不愉快。而不愉快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罗马尼亚同志们在正式会议上表现得好比是我们的兄弟，但是他们国内的宣传却对我们采取越来越敌视的态度。

以后，问题从国内政策扩大到对外政策。我记得有一个罗马尼亚代表团去过中国。这是在我们已经停止去中国之后，因为中国人不再邀请我们。罗马尼亚代表团从北京返回布加勒斯特时路过莫斯科。当时阿·伊·米高扬和我在皮聪大休假，罗马尼亚同志们到那里来看我们。我们进行了一次十分友好和热烈的谈话。①

他们叙述了中国的情况，并且告诉我们中国人对我们不满。单从他们的言词来看，我们可以肯定说，罗马尼亚同志并不赞同中国的观点。看来他们好象只是告诉我们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但是不仅如此，还有一些使我们

① 1964年3月，以扬·格·毛雷尔总理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去北京调解中苏纠纷，因为党的首脑乔治乌-德治认为苏联和中国的全面决裂会损害罗马尼亚的利益。毛雷尔在返回布加勒斯特途中会见了苏联的领导人。

感到忧虑的事情。

“中国人说你们从我们手里拿走了比萨拉比亚”，罗马尼亚人说。“我们只得听着，当然，我们并不再需要比萨拉比亚了。”罗马尼亚人就是这样对我们反复说明他们从中国人那里听到的话。但是，他们对于中国人所说的关于比萨拉比亚的话并没有表示任何不同意见。这次谈话使我们非常反感。我们开始怀疑，罗马尼亚人可能对战后把比萨拉比亚归还苏联仍然心怀不满。①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摩尔达维亚从来不是罗马尼亚的一部分。十月革命后，罗马尼亚王国从我们手里把它拿去了，当时我们的军队太弱，还没有能力保卫我们自己免被肢解。因此，在我们看来，战后归还比萨拉比亚即摩尔达维亚，不过是恢复我们革命前就已存在的边界。

也许罗马尼亚人对于我们应该对比萨拉比亚拥有主权的历史根据有不正确的理解。这种误解可能是他们对我们不满的症结所在。我不知道问题是否果真就是那样，这很难说。不管什么理由，罗马尼亚人在表面上保持友好的和彬彬有礼的态度，但是，在我们相互关系中一度

① 这里提到的领土是在多瑙河、德涅斯特河和普鲁特河之间并沿黑海的一块肥沃草原。这些土地在1812至1918年间一直属于俄国；在1918至1940年间称为比萨拉比亚，属于罗马尼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德国及其盟国罗马尼亚占领，其后于1947年正式归还苏联，成为摩尔达维亚加盟共和国的一部分。

存在过的热烈的和兄弟般的感情现在已经消失了。根据我们同罗马尼亚各位领导人打交道时的观察，我们怀疑毛雷尔同志可能把乔治乌-德治推向了错误的方向。我们对毛雷尔同志个人并无任何意见。他是一个才具相当和很有分寸的人。同他谈话和一起打猎往往是一种乐趣。他是一个打猎能手，一个杰出的射手。不过他参加共产党相当晚，在胜利以后才参加；这一事实使我们怀疑他仍旧有些旧的民族主义偏见。我没有具体的证据来证明这个说法，这只是一个印象。

我们知道齐奥塞斯库正在赢得相当大的政治影响。他是一个十分聪明的年轻人，经历过最艰巨的阶级斗争锻炼。我知道他曾经在罗马尼亚监狱中度过一段时间，并且肯定不会有人谴责他是机会主义者。

我仍以极大的兴趣注视着罗马尼亚所发生的事情。就我所知——当然是在我掌权期间——我们从来没有对罗马尼亚的国内政策有过任何争吵。在我们看来，它的农业集体化搞得非常合理，而且我们也没有理由批评它的投资政策。实际上，我们无权批评它的国内政策中的任何方面。我们不应当在旁监视罗马尼亚同志。罗马尼亚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完全有自由实行它所希望实行的任何政策。

不过从苏联共产党的角度来看，罗马尼亚共产党——尤其是它的外交政策——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背离

了共产主义国家之间关系上已经形成的准则。但是，一定还有比这更严重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实在不知道。

我从报纸上看到，苏罗关系似乎继续处于相当冷淡的状态。我说“继续”是因为自从我退休以来，就是说在我被迫退休以来，已经过了好几个年头。最初，有人责备我应对我们同罗马尼亚关系上所出现的麻烦负责。但是自从我的政治生涯结束以来，我们的关系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我所能说的是，我并不知道最初产生争执的真正原因，而且我现在也没有比那时了解得更多些，我只是希望——实际上我深信——罗马尼亚人民的真正利益占上风以及目前局面好转的日子一定会到来。

第十一章　中　　国

分裂的由来

我遇到的一些人常常对我说，如果我把有关我国同中国的关系记载在回忆录里，那将特别有意思。

你也许可以这样说，中国靠我们很近，但又离我们很远。说它靠我们近，因为它是我们的近邻，同我国有漫长的共同边界。而同时，中国又离我们很远，因为中国人和我国人民很少有共同之处。

当我还未成年的时候，俄国和中国很少接触。在革命以前，象我这样的人，除了从照片上看到的以外，对中国一无所知。如果我们竟然遇到几个中国人，那只是一些偶然到俄国来漫游的丝绸商人。

日俄战争使两国接近一步。俄国士兵在满洲同日本人打仗——满洲是中国的一部分。接着，十月革命后，苏联的领导人同中国人民的领袖孙逸仙建立了联系，孙在当时的战争中实行联邦制政策。①

---

① 这里说的"战争"，是指1911年清朝垮台后遍及整个中国的混乱。

在内战期间，我和中国人有过一些间接的接触。在我服役的那个团里没有中国人，但是在我们前线有一些中国人。我记得，我们的红军士兵常常说起中国人打仗如何如何凶猛。俄国军队的士兵常常拿中国人说话的样子来开玩笑——“给面包，我吃面包，机器干活；不给面包，机器不干活”——不过，说真的，中国人在战斗中确是无所畏惧的。他们是好士兵，因而也是好战友。

内战后，我开始在顿巴斯作党的组织工作，后来又到尤索夫卡工人学校学习。记得那时我们的报纸经常登载有关中国的报道。总的说来，这些文章是同情中国人民争取摆脱外国统治、争取进步的政府制度的斗争的。

孙逸仙逝世后，蒋介石夺了权，转而反对共产党。自然，苏联人民的同情是在为反对蒋介石和中国人民的其他压迫者而战的共产党人一边的。

我想起了1927年发生的一件有趣的事。当时我还在担任尤索夫卡地区党委会的组织部长。我有个熟人到尤索夫卡来找我，他名叫阿赫图尔斯基。在顿巴斯，我这一代的人都还记得他是内战中的一位英雄。他早在1919年赶走德国人的斗争中就出了名，后来在反对白卫军的战争中又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装甲部队的指挥员。他是一位勇士，但是应该说，他在政治上从来没有达到很成熟的程度。他一半是共产主义者，一半是无政府主义者，很象马赫诺。一天，阿赫图尔斯基拿着一张党证出现在区党

委会总部，和往常一样，喝醉了。

他说："赫鲁晓夫同志，给我一个公函，我好立刻到中国去。我要去打蒋介石！我要去参加攻打上海！"

我对阿赫图尔斯基说，中国人没有他也会干得很好的。时机成熟的时候，他们不用他帮助就会拿下上海。我之所以提起这件事，是因为它说明了当时我们共产党的报纸所激发起的那种情绪。

反蒋武装斗争的组织者们在我国人民中间是很著名的。最著名的一位也许是中国红军的司令员朱德上校。他是最早举起反对中国反动势力的旗帜的人物之一。另一个著名的英雄是高岗。此外，我国人民也知道共产党的主要敌人的名字，如吴佩孚和张作霖。人们认为张作霖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

除了上面提到的这些人以外，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机构及其领导人，我知道得并不多。我当莫斯科党委会书记的时候，刘少奇来过莫斯科，但我没有跟他打交道。至于毛泽东，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

中国驻共产国际的代表是王明。他在莫斯科的工人中间享有盛名，因为他常常在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常常请他到工厂去发表演说，他从不拒绝。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同蒋介石有过一些接触。尽管他和中国共产党有冲突，但他正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打仗，因此，斯大林——因而也是苏联政府——认为蒋是

进步力量。日本是我们在东方的头号敌人，所以支持蒋符合苏联利益。当然，我们支持他只是因为我们不想看到他被日本人打败。这同丘吉尔的做法很相似。从苏联诞生之日起丘吉尔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在我们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中他明智地支持了我们。

美国开始威胁日本本土。中国人民的红军开始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苏联在打败希特勒德国及其盟国以后，参与了东方的战争，在战争结束阶段为击败日本作出了贡献。

我们开始比以前更加关心中国了，我们集中力量给予毛泽东以必要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因为他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红军的领袖。他需要我们的帮助，以便彻底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我们的红军挥师南下，胜利地占领了满洲。日本人被打败了，他们放下了武器，我们把这些武器移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关于移交缴获武器一事，我们同盟友原先已经签订了一些协议①，因此我们必须避免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好象我们把这些武器直接送给了红军。我听人说，我们当时的做法是把这些武器收拢起来放到某个地方，让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去寻找。我们就是这样用从日本人手里缴获来的武器装备了在满洲的中国红军的。这是

---

① 指苏联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

物质援助，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感谢我国政府。我讲“我国政府”，指的是斯大林。他以为他就是政府，他相信他的行动是符合中国人民利益的。我虽然是政治局委员，但是斯大林同中国人之间的事情并非全都让我知道，我只知道应该让我知道的事。斯大林做出的有关中国的决定多得不计其数。我认为，在这方面他通常是跟莫洛托夫商量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阶段（但在中国共产党人于1949年取得胜利之前），斯大林曾派米高扬同志①到南京去同蒋介石会谈，让他去了解蒋介石需要什么，以便向他提供援助。我记得斯大林常在吃晚饭的时候同他的心腹小圈子谈论中国局势。他总是翻来复去地问：“这个毛泽东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对他一无所知，他从未来过苏联。”斯大林已经怀疑毛所持的立场是狭隘的农民立场，怀疑他害怕工人，忽视工人阶级而孤立地建立红军。斯大林这样怀疑的主要根据是毛对攻打上海的做法。当时蒋介石已经守不住那个城市了，可是毛却不让红军前进，拒不拿下上海。

直到 1949 年底毛到莫斯科来的时候，斯大林才听到了毛对攻打上海的做法的解释——而他的解释完全证实了斯大林的怀疑。

---

① 当时米高扬是部长会议副主席，负责对外事务。

“你当时为什么不拿下上海?”斯大林问。

“我们为什么要拿下它呢?”毛答。“拿下上海，我们就得负责养活600万居民。”

很显然，在反对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战争中，毛更多依靠的是农民，而不是城市工人。由于某种原因，他认为农民比工人阶级更革命。他不是打进上海去争取那儿工人的支持，而是担心向上海提供粮食的工作会牵制他的反蒋斗争。

后来，斯大林在向我们叙述这次谈话内容的时候说：“毛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可是他连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也许他根本不想懂得这些道理。”在这一点上，我同意斯大林的看法。我认为他对毛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1949年12月21日毛在莫斯科参加了斯大林70寿辰的庆祝活动。当时我正好从基辅调上来当莫斯科地区党的书记。

“有什么新闻吗?”我问斯大林。

“有。”他说，“马察东现在在莫斯科。”

“什么‘马察东’?你说的是毛泽东吧?”

“你知道，就是那个中国人嘛”，他说。

从某些方面来说，斯大林对毛是非常热情的。他几次为毛设宴。斯大林喜欢对他的贵客表示热情，也知道怎样做才能很好地表现出自己的热情。

但是，在毛逗留期间，斯大林有时一连几天都不去看他一眼。由于斯大林自己不去看毛，也没叫别人去款待他，因此别人谁也不敢去看他。有些风言风语就开始传进我们的耳朵，说毛一点都不愉快，他被紧紧地关在屋子里，没有一个人理睬他，等等。毛传出话来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他就要离开了。斯大林听到毛的埋怨之后，我想他又给毛举行了一次宴会。斯大林很想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我们同毛相处得非常好，我们是坚决站在中国人民一边的。最后，中国代表团离开莫斯科回北京去了。

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新疆问题提出来了。我记不得，是毛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直接同他讨论了这个问题呢，还是通过米高扬同志处理这件事情的。米高扬是我们派到中国去同毛打交道的第一任代表。

战争期间，我们曾经占领新疆并在那里设防，把它封锁起来使蒋介石无法染指。我们占领这个省既对苏联有利，也对中国共产党人有利。到共产党人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政权的时候为止，新疆一直在我们管辖之下。那儿有我们自己的人，整个省当时都在为我们工作。然而，红军胜利之后，斯大林还是向毛承认新疆属于中国。

接着，斯大林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他向毛建议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中国人未提异议就接受了这个建议，但是他们对这个主意无疑是很不高兴的。他们一定会觉得苏联在打新疆的主意，一

定会认为这个机构是对中国领土和独立的侵犯。这样，斯大林就在中国撒下了敌意和反苏、反俄情绪的种子。

我对斯大林说，中国人很可能会反对我们象过去英国人、葡萄牙人和其他外国人那样向他们索取贸易特许权的。

听了我的话，斯大林厉声斥责我说："你为什么要插手这件事？它跟你有什么相干？"说完，斯大林口授了发给毛的电报，要毛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来给我们建立一个橡胶种植园。

过了一些时候，我们收到了毛的回电。我们读毛对斯大林的建议的答复时，有许多人在场。回电说："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对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斯大林读完毛的电报后，大家沉默了很长时间。我设法避开斯大林的眼光，因为我知道，他还没有忘记是我首先提醒他不要提出这种建议的。现在，毛的答复来了，但是却象一剂必须吞下去的苦药。

当然，毛作这样的答复是绝对正确的。他不是蓄意得罪人，他只是强调了中国的权利与尊严。

我们同意了中国人的反建议，向他们提供了建立橡

胶园所需要的帮助，但是我们自己却一无所获。我相信中国人对这个项目并不十分热心。他们偿付了我们提供的拖拉机和贷款，但是我们从这笔交易中却没有得到一点点橡胶。

这件事肯定在毛的心上留下了痕迹。象斯大林一样，毛不是一个能饶恕人的人，更不是一个健忘的人。他同斯大林打交道的经验，先是新疆问题，现在又有橡胶园问题，足以使他相信：斯大林的对华政策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政策有许多雷同之处。毛也象斯大林一样是个猜疑心很重的人。因此，他对斯大林不信任的具体根据，由于他的猜疑心而成倍成倍地放大了。

但是毛很精细，他没有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思想，相反，却故意向斯大林表示尊敬，乃至谦卑和顺从。例如，他请求斯大林推荐一位文笔好的马列主义理论家去帮助他编辑他在内战时期发表的许多演说和文章。毛当时正准备出版他的选集，需要一个人检查他的著作以免出错。

毋庸说，斯大林对此感到很高兴。他把毛的请求看作是毛无意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标新立异的一种迹象。斯大林以为毛这样做是表示他愿意用斯大林自己的观点来观察世界。当然，毛也正希望斯大林会这样想。我认为，毛实际上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毛确实是别有用心的。

根据毛的请求，斯大林把尤金派到了北京。斯大林挑

选尤金去帮助毛出版其著作不是偶然的。尤金是个哲学家，因此是毛可以与之谈论哲学的人。毛喜欢高谈阔论，不管跟谁接触，包括我本人在内，他总要大谈一通哲学问题。

尤金一到北京，就开始发回一连串电报，热情洋溢地讲了毛大量好话。尤金说，毛常去看他而不是他去看毛，说两人常常在一起坐到深夜一两点钟——谈得多的不是编辑毛著问题，而是一些重大话题。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当然很好。正如农民经常说的："为了让小宝宝高兴，什么都可以给他——只要他不哭就行。"

虽然尤金同毛建立了很好的关系，并且作为毛著编辑为苏中友谊作出了贡献，但是直到斯大林死后他才成为我们的驻华大使。斯大林当时任命了一位战时曾当过人民委员的铁路专家来担任此职。我记不起这位专家的名字了，只记得日本人在华北失败后，斯大林曾派他去指导满洲铁路的重建工作，兼任我们驻满洲的全权代表。我们是信任他的，斯大林把他视为亲信。

我们的这位代表开始向我们报告，说中国领导班子中有许多人对苏联和我们党不满。据他说，口头上积极反对我们的有刘少奇、周恩来等人。提到的人里面没有毛，但毛对在中国领导班子中散布反苏情绪的那些同事也未采取任何措施。斯大林把大使送回来的某些文件拿给我们传阅，因此我了解其中的内容。

关于中国党内这种情绪的情报，有许多显然是高岗捅给我们的。他是中国政治局在满洲的代表和首脑，跟我们自己在那里的代表关系很密切。有一次，沈阳(高的总部所在地)举行庆祝游行，有些中国军官对我们送给毛的军队的经过修理的苏联坦克发牢骚，嘟嘟囔囔地说："俄国人把大批陈旧破烂的坦克都塞给我们了。"只要有这种深深埋在人们心里的不满，每一点小事就都会被夸大，而且会成为严厉责难苏联的根据。

斯大林决心赢得毛的信任与友谊，所以他把我们那位代表报回来的与高岗谈话的记录拿给毛看，对毛说："看看吧，你可能会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

只有上帝才知道斯大林这样做是出于何种考虑。他把这种做法说成是友好表示。你如果想在历史上寻找类似事例，不妨把这件事同科楚别伊向彼得大帝报告马泽帕叛变的有名例子相比较。彼得为了把马泽帕争取到自己一边来，就把科楚别伊对他的告发告诉了他。结果马泽帕处决了科楚别伊，和查尔斯七世联军反对俄国。普希金在他写的《波尔塔瓦》① 一诗中讲了这个故事。

斯大林对高岗干的事正是彼得对科楚别伊干的，而

---

① 马泽帕是17世纪哥萨克的一位领导人，他为了控制乌克兰，同瑞典国王查尔斯七世密谋反对沙皇彼得一世。科楚别伊是个富有的官僚。

毛对高岗干的事则是马泽帕对科楚别伊干的。

毛先是在领导班子内把高岗孤立起来。我们驻北京的代表报告说，他们曾在一次聚会上遇到许多青年人，这些人喝醉酒后就开始怒气冲冲地对我们的外交官谈论起“你们的人高岗”这一类话来。那时高岗还在政治局里，但我们知道他实际上已经被打入了冷宫。后来，我们得知毛把他软禁起来了，再后来，听说他服毒自杀了。

由于斯大林出卖了高岗，我们失去了一位对我们真正友好并能就中国领导班子内对苏联的真实态度提供宝贵情报的人。

斯大林为什么要出卖高岗？我想他是受了自己猜疑心的驱使。正象他自己说过的那样，他信不过任何人，甚至也信不过他自己。他估计毛迟早会发现高岗一直在告自己的密，因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毛就可以指责斯大林煽动反对中国政府。于是，斯大林拿定了主意：最好还是牺牲高岗来取得毛的信任。

然而，我认为毛从来就没有真正信任过斯大林。他看出来斯大林总是企图证明自己高人一等。我相信毛是看穿了斯大林这种“外交手腕”的，对此他内心感到恼火，并且产生了警惕。

第一次访问北京

在斯大林死后的头几年里，毛泽东对我们是友好和尊重的。我说的“我们”，是指斯大林死后组成的领导班子。

1954年，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决定让我率领一个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除了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以外，代表团其他成员有米高扬、什维尔尼克、文化部长福尔采娃、谢列平、《真理报》主编和乌兹别克人民的代表纳斯利金诺娃。

我们被安排到中国参加10月1日庆祝中国人民胜利的活动。中国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我们因初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有机会同中国同志进行讨论而感到高兴。

我们很多人都遇到了一个适应新习惯的问题。比如，我记得，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中国人都要敬茶——茶、茶、茶。只要你坐下来谈话，他们就要在你面前放上一个带盖的茶杯。按照中国的习惯，如果你不立即把茶喝掉，他们就会把这一杯拿去，再换上一杯——换了又换。最后他们给你一块蒸过的毛巾擦手擦脸。我必须承认，用这种毛巾擦一擦的确会使人感到很清爽。

对于这套礼节我们都不习惯，但是出于对主人的尊

重，我们都应付着。然而，过了一段时间到底还是受不了了，我便拒绝再喝茶——一来我喝不惯绿茶，二来我喝不了那么多饮料。

布尔加宁倒是按照主人的意愿做了，结果闹了失眠症。医生给他检查的时候问他："您是不是一直在喝绿茶？"

"是的。"

"喝了多少？"

"很多。"

"如果您继续喝那么多的茶，失眠就会更严重了。您要么减少喝茶量，要么干脆别喝了。茶里面含有少量毒素，使你睡不好觉。"

布尔加宁听取了医生的意见，后来他对我说他睡眠又恢复了正常。

在我们同中国人的会谈中，我们主要关心的是保护苏联、保护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保护中国的问题。为了保持我们自己的防卫态势，我们必须为伟大的中国人民发展其工业作出贡献，因此我们作了一些安排，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我们同意给中国人派遣军事专家，给他们运去了大炮、机关枪和其他武器，以加强中国，从而也就是加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总之，只要我们的物质条件允许，我们就尽可能满足中国人的要求。我们必须一致努力去对付共同的敌人。我们的敌人日本虽然已被

打败，但仍是潜在的威胁。而现在，一个大得多的威胁则来自美国，它已经在紧靠中国的南朝鲜发动了战争。

我们还努力使我们的关系回到友好、平等的基础上来。我们就签定旅顺港协议举行了正式会谈。在这件事情上我和中国同志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说旅顺港是中国领土，我们只有在对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都有利的情况下才能在那里保持军队，这是绝对正确的。为了改建旅顺港的防御工事、用最新式武器装备这个军港并在那儿维持一支相当规模的驻军，我们已经花了很多钱。我们在大连也有驻军。①

我们说我们想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军队，除了刚刚安装的十分昂贵的海岸炮群以外，把我们在那儿的一切设施全都移交给中国。毛回答说，他认为我们在这个时候从旅顺港和大连撤走是不合适的。他怕美国可能会利用这一行动向中国进攻。

我说："毛同志，我们怀疑美国会做出那样的事情来。当然，我们不能向你们担保，因为美国刚刚结束它在朝鲜的侵略战争，而且现在还在推行侵略政策。不过，如果我

① 1945年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一项协定，规定苏联对大连享有自由港权益。斯大林曾同意最迟于1952年撤出驻旅顺港和大连的苏军，但后来这个撤军期限由于北京方面的"请求"而推迟了，这是因为在朝鲜战争期间，北京感到满洲面临着美国的威胁。

们的部队从旅顺港撤走的话，这些部队还会驻扎在离那里不远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所以，假如你们遭到进攻，我们可以前来救援。”

又经过一番协商，毛同意了，说：“如果你们认为现在撤走合适，我们就不阻拦了。”

双方就一项有关撤走苏军的新协定草案取得了一致意见。①

后来过了一些时候，周恩来问我们：“你们看把你们的大炮留在旅顺港怎么样？”

假如中国人愿意为这些大炮付钱，我们倒是愿意助人为乐的，可是周要求我们免费交给他们。

我说：“周同志，请体谅我们的难处。我们还没有从可怕的毁灭性战争中恢复过来。我们的经济一团糟，人民很穷。我们乐于以低价把这些大炮卖给你们，但我们确实无力无偿地送给你们。请设身处地为我们想想吧，不要再坚持你们的条件了。”这件事就谈到这个地步，中国人没有再提起过它。

我们取消了两国间的联合机构②以及有关的各项协定。我们放弃了对满洲中苏铁路的权益。我记不得这条铁路就是这样移交给他们的呢，还是廉价卖给他们的，反

---

① 旅顺港和大连于1955年赫鲁晓夫首次访问北京的7个月后重新归于中国人控制之下。

② 可能指新疆的联合公司。——译者注

正中国人接过了这条铁路的管理权。我相信我们这么决定是正确的。如果你不想制造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冲突，你就不应该在他们的领土上保留自己的设施。

中国人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他们说，通过乌兰巴托连结苏联和中国的那条铁路不能满足他们的需要。我不能理解，既然这条铁路对我们非常有用，为什么对他们就没有好处。从前，我们必须通过远东运输货物，有了乌兰巴托这条铁路后，路程大为缩短，莫斯科和北京直接连结起来了。然而，中国人说，他们想要的是另一条铁路，它在阿拉木图附近跨过两国边界，然后穿过中国矿藏丰富的地区。

我们说，如果中国人修建这条铁路位于他们境内的那一段的话，我们愿意承建我们境内的这一段。我们这一段路程较短，条件也好。此外，我们的工人在训练和设备方面比中国工人强，因此完成我们这一段根本不费什么事。然而，中国人很快就认识到，修建他们那一段是件很棘手的事——他们根本就干不了！于是，周恩来就来找我们了。中国人总是派周来向我们提出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一来因为他是总理，二来因为他是个外交老手。

周说："我们请你们承建我国境内的某些路段，你看怎么样？"——不用说，费用也要由我们出。

这就把整个事情都改变了。对于这样一个建议我们毫无思想准备。我们不知道这要花多少钱，但是我们肯

定这是一笔相当昂贵的人情。我们从地图上可以看出，要架很多桥，凿很多洞——这一切都是要花很多钱的。

拒绝朋友这个不愉快的任务落到了我的身上。我对周恩来说："非常遗憾，周同志，我们实在不能承建你们国内的那一段铁路。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太多了，实在承担不起这个任务。"

这件事就这样作罢了。但是，我们拒绝中国的要求这一决定，就象在双方关系的天平上又加上了一块石头，使天平进一步朝着不利于友好的一侧倾斜。我知道，金钱不应该妨碍友谊——但友谊是一回事，职责又是一回事。只要每个政府的首要职责是为自己的人民服务，这种令人扫兴的事情在一个国家同另一个国家的关系中就常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象我说的，这件事加剧了苏中两国之间正在形成的紧张关系。

我们也要向中国人提出一个建议。我们想帮助他们解决严重的失业问题。那时，我们的部长们认为我们的西伯利亚缺少劳动力（当时我们还没有认识到我们的劳动力并未得到有效利用，我们应该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吸引一部分工人去开发西伯利亚的宝藏）。我们建议中国派100多万名工人到西伯利亚来帮助我们开发这里巨大的森林资源。

毛对我们建议的答复很有他的特色——也预示着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可真是知道该怎么来羞辱我们。首

先，你得想象一下毛这个人的样子。他行动起来沉着缓慢，左摇右摆，他盯你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低下眼皮，开始用一种文静的、不受拘束的声音同你说话："赫鲁晓夫同志，你知道，多少年以来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发达国家，人口过剩，失业普遍，因而是一个很好的廉价劳动力来源。但是你知道，我们中国人认为这种看法是很侮辱人的。现在你也这么看，这就使我们很为难了。如果我们采纳你们的建议，别人就会对苏中两国关系得出错误的看法。他们会以为苏联对中国的看法同资本主义西方是一样的。"

显然，毛想使我们对于所提的问题感到遗憾。我们听他这样说话心里很不愉快，尤其是他竟把我们同资本家相提并论。我们毕竟没有绕着圈子说话。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了一个我们衷心认为符合中国人利益的建议，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人的吃饭问题。

根据我同我们同志商量的结果，由我代表苏联代表团进行这些谈话。所以，在下一次会谈中我说："毛同志，我们当然不想给你们制造困难，我们当然不坚持我们的建议。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建议会损害中国的民族自尊心，那就当作我们没有提过，务请不要放在心上。我们用自己的工人也行。"

会谈以后，我们到外地去转了一圈，访问了哈尔滨和沈阳，然后又回到北京。这时，中国的代表们又扯起在西

伯利亚使用中国劳动力的事情。我们的同志回答说，毛反对这个想法。后来，这些中国同志带回一个正式口信，大意是说，毛现在愿意接受我们原来的建议，愿意帮我们的忙。

我们为自己提出了这个主意而感到遗憾，可是因为是我们首先提出来的，现在既然中国方面同意了，我们就不大好声明取消了。要不然，我们还得向中国人解释为什么我们改变了想法，而这样一来又会产生“伤害之外又加侮辱”的后果。

所以，我们只好勉强同意签订一个协定，让第一批（约20万名）中国工人到西伯利亚来做工。在这批工人工作期满时，我们有意避而不提新协定的谈判问题。然而，中国人自己却开始逼我们吸收更多的工人到西伯利亚来，尽管毛说过他讨厌人们把中国当作廉价劳动力来源。

他们说：“你们为什么不让我们多派一些人去呢？不要不好意思嘛，我们是很乐意帮你们忙的。”

在后来同毛的一次会谈中，我向毛道了歉，说我们过去对进口劳动力的需要估计过头了。我这样做，是为了确保中国人在西伯利亚做工的合同期满后不再继续延长。这样，才把这些工人打发了回去。

中国人打的是什么主意呢？我跟你说，他们想兵不血刃就占有西伯利亚。他们想渗入并接管西伯利亚的经

济。他们想确保在西伯利亚定居的中国人多过住在那里的俄罗斯人和其他苏联人。简言之，他们要把西伯利亚变成中国人的而不是俄国人的。好个如意算盘，可惜并未奏效。

毛在莫斯科

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我们揭发了斯大林的暴行，揭发了他对数百万诚实人的独断专行的惩办，揭发了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的独裁统治。起初，毛泽东认为我们对斯大林滥用权力的指责是正确的。他说二十大作出的决定表现了伟大的“英明”。

从某一点来说，毛做得对，他没有低估苏共领导班子中某些人所起的作用，这些人毫不动摇地正视斯大林时代的罪行。而象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和卡冈诺维奇所主张的那样对斯大林的胡作非为保持沉默，则是错误的。不过，我们在二十大上表现的英明并不是我们自己的——那是列宁的英明，我们只是过晚地重新发现了这种英明。毛把这一切归功于我们，只不过是想用献媚取宠的办法赢得我们的好感。

毛也开始诉说他自己对斯大林的不满。例如，他谴责斯大林支持过蒋介石。他还举出具体例子证明斯大林损害了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具体内容我记不起来了，但

我记得毛指的是斯大林写给蒋的某些信件。

毛还指责斯大林弄错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毛具体地谈到斯大林小看了——因而妨碍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潜力。

毛特别批评了共产国际对待中国的态度。当然，斯大林要对共产国际负全面责任，但中国驻共产国际的特别代表是王明，共产国际给中国党的指示大多出自王明之手。我已经提到过，王明是一个很好的共产主义者，他懂得维护苏中团结与友谊的必要性。

中国革命胜利后，毛巧妙地抛弃了王明。毛并不想用王明的鲜血玷污自己的双手。他不仅不杀掉王明，反而让他选进中央委员会，但紧接着又禁止他在中国居住。共产党胜利后，他们不许王明回中国居住，因此他不得不呆在莫斯科。这倒好，因为后来如果毛能够抓到王明的话，王明很可能就会丢掉脑袋。

后来，我们听说他们曾多次企图搞死王明。他从中国收到过几包食品，在自己吃之前先用猫来试验，结果猫死了。谁想毒死王明呢？唯一的人是毛泽东。正象斯大林有个贝利亚一样，毛也有自己的刽子手，那就是康生。幸亏王明很谨慎。他一定知道给他送食品来的都是些什么样的"朋友"。我相信这些包裹都是康生寄来的。

王明同志现在还住在莫斯科，他同我们党和我国人民继续保持着友好关系。我总有这么个想法：毛批评斯

大林在共产国际推行的政策，完全是为了替自己对王明所采取的卑鄙做法做辩护。

在向我们祝贺了二十大上作出的决定，并且他自己也对斯大林进行了一大通批判之后，毛后来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竟开始颂扬起斯大林来了。他认识到对我们搞阿谀奉承那一套不管用。我想，他内心压根儿就不同意我们谴责斯大林的罪行。我为什么这么想？因为我相信毛一生也象斯大林那样，害着权迷心窍的自大狂。他对别人的看法也有着同斯大林一样的病态观点。

象斯大林一样，毛从来就不是平等对待他的同志的。他把周围的人看成是一件一件的家具，就是说，暂时有用，但总有用坏的时候。在他看来，家具（或同志）用坏以后就没有用了，他就要把它搞掉，另换新的。

我还记得在共产党会议期间①我同毛的几次谈话。他讲起话来那么象斯大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们的交谈完全是诚挚的，但是毛对中国政治局其他成员的那些说法引起了我的警惕。他把一切都说成漆黑一团，对谁都没有好评。

我记不得他对刘少奇和周恩来确切是怎么说的了，反正都没有好评。他在批评这两个人的时候，给我讲了人名、时间和具体事例，以证明他的那些说法是对的。接着他又谈到朱德（朱不是政治家，是个军人）。人人都知

① 指1957年莫斯科会议。——译者注

道朱德是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很好的共产主义者，但这一点并不能阻止毛对他进行诽谤。至于高岗（那时他已经死了）——你当着毛的面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能提起。

唯一一个毛似乎赞许的同志是邓小平。我记得毛曾经指着邓对我说："看见那边那个小个子了吗？他非常聪明，有远大的前程。"我对这个邓小平一无所知。中国人民胜利以后，我曾几次听到有人提起他的名字，但在此以前则从未听说过他。

我越是听毛讲话，越是不由自主地把他跟斯大林做比较。但即使我在这两个人身上发现了不少相似之处，我也远远没能得出最后的结论。我还不能预见到毛的品质将会以何种形式表露出来，也未能预见到他后来给中国共产党带来的灾难。

毛问到我们党的情况怎么样，我回答说一切都好，我们正在一种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工作。不过，我也说到有些同志对布尔加宁（作为部长会议主席）的工作不满意，不时有人提出给他调换工作岗位的问题。我决定把这个情况告诉毛，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在离开莫斯科之后才发现我们领导班子的变化。如果我不跟他讲点我们领导班子内的情况，他也许会因自己讲了中国党内的事情而感到后悔。

毛问我们打算派谁来接替布尔加宁。我回答说这个问题还没有定下来，不过我想我们的同志倾向于柯西金。

"柯西金?"毛说:"这个柯西金是谁?"

我告诉了他，他要求我把他介绍给柯西金。我对毛想认识可能领导苏联政府的人，感到高兴。我把这看成是毛希望加强我们两党和两国政府之间关系的一种迹象。毛把柯西金带到一个角落里，同他谈了一次话。

我想(但不能肯定)在莫斯科会议期间，我们曾提出过一个建议：如果我们进行某种分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任务可能比较容易完成一些。由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亚洲取得伟大的革命胜利，我们想中国人集中精力与亚洲其他国家以及非洲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可能是个好办法，我们主要关心的是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这三个经济情况与中国相类似的国家。至于我们党，我们负责同西欧、美洲的革命运动保持接触，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

当我们向中国同志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毛泽东说："不，这可不行。在非洲和亚洲还是应该由苏联起领导作用。苏联共产党是列宁的党，苏联党的干部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深刻。我们中国共产党要向苏联请教。所以，我认为苏共应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唯一的中心，我们其余的党都应该团结在这个中心周围。"

我们一边听毛赞扬苏联和苏共，一边不由得怀疑他口是心非。我们有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总觉得我们两

党两国迟早会发生摩擦。

在会议进行期间，已经出现了某些迹象，表明这种摩擦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80多个代表团谈到热核战争的可能性时，毛发表了一次演说，其要点如下："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我们不应该害怕原子弹和导弹，不管爆发什么样的战争——常规战争还是热核战争——我们都将取得胜利。至于中国，如果帝国主义对我们发动战争，我们也许会损失3亿多人。那又怎么样呢？打仗嘛！时间将会过去，我们会比从前生出更多的孩子。"

他讲的最后那句话比我这里复述的要粗鲁。他用了一个猥亵的说法，但我记不清究竟是怎么说的了。我坐在孙逸仙的遗孀旁边。她听了毛这种挑逗性的话，失声大笑起来。毛也笑了，所以我们大家都跟着笑了。但是毛讲的话根本没有什么可笑的地方。首先，毛应该考虑一下坐在他周围的人，说话应该检点一些。更严重的是，他说话的内容令人深感不安。除了由孙逸仙夫人带头的那阵大笑之外，整个会场一直是死沉沉地一片寂静。对于这样的一个演说，谁也没有精神准备。

有一次，在会议休息期间，哥穆尔卡同志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愤慨。诺沃提尼同志说："毛泽东说他的6亿人口准备损失掉3亿。我们怎么办呢？我们捷克斯洛伐克只有1200万人，打起仗来都得死光，谁还能留下来重新开张？"

那时，除了毛以外，大家都在想着如何避免战争。我们的主要口号是："继续为和平与和平共处而斗争！"可是突然来了个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害怕战争。

毛在莫斯科的时候，还有一个迹象表明他一心想摆出一副好战的架势。我记得当我告诉他我们希望解散北约和华约这两个军事同盟的时候，他表示怀疑说："我认为目前你们不应该提出这样的建议。假如西方接受这个建议，你们就得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撤军。结果，民主德国就不能维持其独立，就会崩溃。那时我们会落到什么境地呢？我们就会失去民主德国。"

那还是毛讲"我们"，也就是指社会主义阵营的时候。他关于民主德国的意见也许有点道理；但我向他解释说，我们公开建议解散这两个同盟是为了宣传的目的，我们肯定美国不会马上就接受的。等到就北约与华约问题达成协议的条件成熟时，民主德国就会发展成一个比较稳定的、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维持其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了。

我还记得我同毛在莫斯科举行的一次会谈，那次会谈说明了毛当时态度的发展。会谈前不久，国防部长朱可夫根据我国政府制定的方针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声明警告说，对于任何胆敢进攻社会主义国家（即苏联的盟国）的侵略势力，苏联都将给予反击。我也发表过类似的讲话，但毛要弄外交手腕，只评论朱可夫的话，不

评论我的。

“我认为朱可夫的那个声明是错误的”，毛说。

“你这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不采取朱可夫声明的立场，侵略势力就会一点一点地把我们消灭掉——先消灭一个国家，再消灭另一个国家，直到把我们全部搞掉为止。这正是帝国主义者一心想干的事。他们想分而克之。关于这一点杜勒斯已经讲了很多。再说，毛同志，朱可夫的讲话也不光是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反映了我国政府和我们中央委员会的看法。我们认为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采取朱可夫讲的那个方针。”

“不见得，”毛回答说，“如果敌人从西面进攻苏联，我看你们就不应该同他们交战，你们不应该反击——应该退却。”

“什么叫‘退却’？”

“我指的是撤退，并且坚持1年，2年，甚至3年。”

“根据你的建议，我们究竟应该撤退到哪里去？我们又为什么要撤退？要知道，这样做就等于是自我失败啊！”

“未必。”毛说，“请看第二次世界大战吧。你们不是一路撤到斯大林格勒，然后动员力量进行反攻，并且一直推进到了柏林吗？”

“那当然是的，可那时的撤退既不是出于战术上的考虑，也不是出于战略上的考虑。是敌人把我们赶跑的，敌人逼着我们后撤。有些人以为斯大林是把希特勒引入纵

深以后再消灭之——或者以为当年库图佐夫故意让拿破仑一直推进到莫斯科，然后把他打败。毛同志，看来你就有这种想法。其实这两种情况都不是事实。斯大林在德国人打到斯大林格勒之前根本扭转不了战局，正象库图佐夫在法国人推进到鲍罗季诺之前不能打败他们一样，如果你想深入研究这个问题，我建议你读一读托尔斯泰写的《战争与和平》这本书。事实上，我们根本就没有作好反希特勒战争的准备——而这种无准备状态几乎送了我们的命。所以，我们不能指望撤退3年以后再来顶住敌人的入侵。”

“我不同意，”毛说，“如果你们退到乌拉尔，到那时我们中国人就能参战了。”

我紧紧地盯着他看，但从他的脸上无法知道他是不是在开玩笑。

“毛同志，下一次战争可不会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样了。今天美国人的原子弹多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我们也有核武器，并且正在加紧用这些武器来装备我们的部队。下一次战争不会是以敌人跨过国界发动入侵开始的，而一开始就会是敌人用导弹或炸弹袭击我们主要的行政中心和工业中心。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用足够的武器武装自己，以便敌人给我们造成多大破坏，我们也能给他们造成同样大的破坏。”

毛没有被说服。他后来开始攻击我们的和平共处政

策，公然声称这个政策不是列宁主义的，执行下去势必酿成和平主义。不过，在当时，他还只是表示怀疑而已。

第二次访问北京

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活动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我们在领导班子内部讨论了这件事，决定向中国政府正式提出建议。我们认为这个想法对我们自己和对中国都是同样有利的。我们和中国人毕竟有着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目标。

此外，我们已经答应了毛的要求，愿意帮助他建造潜艇。我记得我们已经把设计图纸交给了中国人，还派出了专家帮助他们选择建造潜艇的地点。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

结果呢，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怒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叫嚷了起来，说："你们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

的反应。①

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②这是一次秘密访问，③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

在机场迎接我们的有毛、陈毅和另一个人。他们安排我们住在北京某地的一个寓所，但我们大部分时间是在一个游泳池旁度过的，游泳池边上有一个凉棚。当然，在游泳池里我不是毛的对手——谁都知道他游泳的速度和距离都创造了世界纪录。我是个蹩脚的游泳员，在游泳方面我甘拜毛的下风。然而，我们要谈的问题同游泳毫不相干。我们躺在浴巾上面晒太阳，就象海豹躺在温暖的沙滩上一样。我们就政治问题进行了一些非正式的讨论。

关于我们要求建立无线电台的事，我向毛道歉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

---

① 尤金于1959年初终于离开北京。

② 库兹涅佐夫于1953至1955年任苏联驻中国大使，后来任外交部副部长和第一副部长。

③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上卷中也提到了这次访问，但在上卷中赫鲁晓夫记错了日期，把这次访问说成是1959年最后访问中国的那一次。这次访问的实际日期应是1958年7月31日至8月3日。

作为回答，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给我们必要的贷款，我们自己来建这个电台。"

"很好，"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所需要的贷款。"

"行，"毛说，"我们同意。"

这个问题就谈了这么多。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的海军希望中国沿海港口能为我们的潜水艇加油并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当我向毛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斩钉截铁地当场拒绝了。

"毛同志"，我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你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好吧。那么也许你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的太平洋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的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你看怎么样？"

"不行，"毛说，"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自己本国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

"那好，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

洋潜艇舰队的基地。”

对于毛的回答我不能反对得太强烈了。我们当时提出要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他显然猜疑我们企图为将来的入侵活动取得立足点。

一般来说，我反对要求一个国家放弃任何领土主权，除非出现了具体的战争威胁——就是在那种情况下，我想各国也只有在互惠的基础上才能让出主权。

至于无线电台的事，最终也是毫无结果。中国人背弃了协议，没有建立无线电台。后来我们发射了卫星，找到了同潜水艇保持无线电联络的更好的途径。

尽管毛偶尔粗暴地发作一下，我们的那次谈话总的来说是平静而友好的。不过，关于另一次战争的可能性问题，他发表了一些令人费解的观点。我从他一年前在莫斯科的讲话中，已经熟悉了他的某些想法，但是在北京游泳池旁的谈话中，他比我过去所听到的走得更远了。

“让我们来想象一下未来的战争，”他开始说。他讲起话来跟斯大林一样，斯大林也喜欢提出这种假设性的问题。“美国有多少个师呢？我们知道美国的人口有多少，所以可以算出他们把壮丁招募起来能够动员多少个师。”然后他提到英国、法国等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然后又接着说：“那么，我们能够动员多少个师呢？想一想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人口，你就会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了。”

他笑眯眯地看着我，好象在说："你瞧，力量的对比对我们是多么有利？"

他的这种思想方法实在使我太吃惊、太迷惑不解了，我简直无法同他争辩。在我听来，他的这些话好象是娃娃讲的。象他这样一个人怎么会这样考虑问题呢？从这一点来看，他又怎么能爬上了这样重要的职位呢？

"毛同志，"我说，"你的算法有一个根本错误。自从苏沃洛夫①那个时代以来事情已经发生了变化。现代的士兵再也不是按'子弹是傻瓜，刺刀才是可靠的朋友'这一格言过日子了。同样道理，现在的战斗既不靠刺刀赢得，也不靠子弹赢得。就连苏沃洛夫也常常说，一支训练有素、装备齐全的部队能够打败数量上比它多的敌人。在他那个时代，武器就是剑和炮。随着机关枪的发明，战争性质就起了变化。几个机关枪手能象农夫用镰刀割草一样扫射倒大批步兵。现在则进一步发展到了导弹和核弹时代，一方或另一方拥有的师的数目对于战役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一枚氢弹可以把整师整师的人变成一堆熟肉。一枚氢弹的毁灭范围是非常大的。"

毛的唯一的回答是，他是打游击起家的，他只习惯于步枪与刺刀起关键作用的战斗（在那些战斗中步枪与刺刀比机关枪多，更不用说比炸弹多了）。他虽然是象中国这样一个伟大国家的领袖，可是他发表的那些见解和自

① 苏沃洛夫是18世纪俄国的一个陆军统帅。

鸣得意的判断却陈腐得不堪设想。

后来，当我向我们的领导班子介绍我同毛的谈话内容时，大家都对毛的讲话感到莫名其妙，没有一个人支持他的观点。我们都不理解我们的盟友——一个我们已经觉察到想当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人——在战争问题上怎么会持如此幼稚的观点。

毛这个人给我们提供了大量值得思考的材料。

台湾海峡危机

尽管中国人不愿意让我们的潜艇使用他们的港口，可是在1958年他们又向我们要求数量相当大的军事援助。他们说他们要对蒋介石采取军事行动，因而需要这些军援。他们要求得到飞机、远程大炮和空军顾问。

我们以为他们打算采取决定性行动来消灭蒋介石，因此他们提出要的那些东西，我们都给了他们。我们没有作出任何举动去约束中国同志，因为我们认为他们要统一全中国这是绝对正确的。

然而，当我们提出在他们的领土上驻扎我们的歼击机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却是极端奇怪的。他们明确表示我们的建议冒犯了他们。对此我无法理解。我们并没有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他们，我们也没有任何别的企图，而只是想在加强中国沿海、使台湾并入中华人民共

和国版图、消灭蒋介石统治、使全中国人民都统一在一个共和国里的事业中表现出兄弟般的团结。

中国对蒋介石发动的军事行动采取了炮击两个沿海小岛这样一种形式。我们完全赞成毛泽东解放这两个岛屿，消灭蒋介石部队向大陆进犯的潜在跳板。当时，蒋正梦想夺回大陆，我们得到情报说，美国人正在怂恿他这样做。我们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随时都有可能遭到进攻。

开始的时候，中国人似乎一口咬得太大了些。美国人开始积极支援蒋，毛的部队在旷日持久的炮战中陷入了困境。当力量对比变得有利于毛泽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你可以想见我们是多么惊奇。毛的部队摧毁了两个岛上的设施并且解放了其中的一个岛，迫使蒋介石把部队撤走。可是，正当中国人能够跨过海峡去占领那些岛屿的时候，他们突然停止了攻势。结果整个仗等于白打了。

我们感到十分迷惑不解。周恩来来看我们的时候，我们向他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我们又向毛本人提出这个问题："毛同志，你们为什么在即将胜利的时候停下来呢？"

"我们心中有数。"

"什么叫'心中有数'？你们发动这次战斗的本来目的是要拿下这些岛屿，可是你们在就要达到目的的时候停下来了。这能证明什么呢？你现在是不是想对我说，

你们从来就没有打算完成你们的作战计划?”

“我们只是想显示一下我们的潜力。我们不希望蒋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想让他呆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让他呆在金门、马祖，我们就能以空军和岸上大炮来打他。如果我们占领了这些岛屿，我们就会失去想叫他什么时候不舒服就什么时候让他不舒服的能力。”

这真是个奇怪的解释，因为毛在允许蒋把部队放在金门和马祖的同时，他自己也就随时可能受到敌人的侵犯。

第三次访问北京

后面讲到中国和印度的战争时，我将说明毛是如何企图用命令的方式迫使苏联接受一种与我们当时所持的马列主义正确立场相矛盾的对外政策的。他抱着某种病态的幻想挑起了这场战争，还想把我们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都拉进这场冲突，以便把他的意志强加给我们。

必须承认，1959年中印之间爆发了战争以后，对于飞往北京我是丝毫不抱热情的。我知道中国人会按照礼节来安排对我的正式欢迎，但我并不期望他们会象 1954 年我第一次访问北京时那样以兄弟般的好意来迎接我。由于我们同中国的关系，这种热情已不复存在，它已被冷遇所代替，而这种冷遇，我一到北京就感觉到了。

对于气氛的改变，我是有所准备的，因为我一直在注意中国的报刊在对我们说些什么。我也知道中国人是如何对待我们派去帮助他们建设新的工厂和企业的专家、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和顾问的；这些工厂和企业是用我们的贷款建设的。中国人想方设法使我们在那里的人丢脸。他们不仅不感谢我们的帮助，相反，却讨厌我们的专家呆在中国，还抱怨我们给他们的机器不好。换句话说，不管是什么，只要是苏联的，他们就要加以诽谤。

与此同时，在苏联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在我们的学校中散发反苏传单。后来，他们还在我们的大街上和广场上组织反苏游行。他们甚至在回国途中在我们的火车上向我们示威。

我特别记得一件事，这件事发生在靠近蒙古的一个火车站上。我简直找不到什么体面的话来形容中国学生的所作所为。他们脱掉裤子在站台上胡闹——就在火车站上。他们还是所谓"文明的"人，而实际上不过是一群下流坯。他们不能借口说不知道怎样才能使自己的行为端正一些。他们完全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虽然鬼才晓得他们想要说明些什么。

闭眼不看这种事情是不可能的。过了一段时间，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张，我们不得不把那些不守规矩的中国学生送回中国。

再说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我们在那里的顾问，他们

的生活条件变得简直令人无法容忍。一帮一帮喝醉酒的中国人开始辱骂起他们来了。他们骂我们是“太上皇”。我们对这个字眼非常熟悉，它曾经是我们自己某个发展阶段中出现的一个常常用来侮辱(外国)人的词。但是，中国人重复我们所犯过的这种愚蠢的错误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我们在中国的专家开始向我们报告一些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他们下班回到公寓或者旅馆以后，常常发现自己的皮箱底朝天地搁着，屋子已经被人彻底搜查过了。这些事件也并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经常不断在发生。天知道中国人想通过搜查我们工作人员的房间发现些什么。也许想找出反华的印刷品？我们从未想过要印制这类东西。在苏联，根本不存在“反华印刷品”一类的东西。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得到的报答。我们帮助中国人建立了整座整座的工厂，以2%至2.5%的低利(约为资本主义世界利率的1/3)贷款给他们，派遣了第一流的专家去帮助他们发展工业，而我们得到的报答竟是这样！

我们终于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怎么办？我们不能只是袖手旁观，让我们某些最好的专家(他们是在我们自己的农业和工业部门中培养出来的)在给了人家帮助之后什么也没有得到，反而在那里受折磨。最后，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好从中国召回我们的顾问。

我们一撤回这些专家，中国人就开始在我们背后、在

他们同其他国家的共产党人谈话时诬蔑我们，说我们毫无道理地撤销了对他们的援助。他们玩弄这套造谣中伤的把戏，其手段之高明真是非中国人莫及！

我希望阅读我这本回忆录的人会明白，我这里所说的“中国人”并不是指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的来说是友好而勤劳的。我也不是指中国共产党的基层党员。我指的是毛泽东及其同伙，他们掀起了一场诬蔑苏联领导、苏联国家和苏联整个制度的广泛的运动。

中国人除了给我们脸上抹黑以外，还开始虐待我们的（外国）同志。我这里特别想到的是中国与北越之间的冲突，这些冲突导致了中国从越南撤回其专家和工人。

从大的方面来说，毛在中印冲突期间的行动仅仅是一个例子，说明他是如何有组织地掀起一场运动以攻击和破坏我们为了促进和平共处事业而作出的努力的。在兄弟党会议上，中国人尽一切努力来破坏我们的立场；有些国家支持争取和平的斗争，中国人就给它们的代表制造麻烦。我们每提出一项建议，毛及其周围的人就要出来反对，提出反建议。他们说通过国际组织争取和平的做法违背了真正的列宁主义原则，这样做会导致和平主义，削弱并解除人们的革命本能。他们认为，为了用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世界各国人民必须进行更加积极的革命斗争。

令人欣慰的是，尽管中国企图转变世界舆论，使之不

利于争取和平共处的运动，但这个运动仍在继续向前发展。

阿尔巴尼亚人和莫斯科会议

有一回，有一个阿尔巴尼亚代表团到中国去访问。我们根本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因为我们觉得这种访问是件很自然的事情。那个时候我们自己还愿意到中国去走走呢，正如我们也乐意访问任何一个兄弟国家一样。其实，阿尔巴尼亚人心里已经有了其他打算了，但是我们当时并不知道。

那个代表团访问北京后是经苏联回国的。当时谢胡要求留下看病，就在莫斯科住进了医院。① 代表团其他成员决定留下来等他好了以后再走。

这些阿尔巴尼亚同志中间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妇女。②她经历过意大利占领阿尔巴尼亚期间的极为紧张的斗争。法西斯分子捉住过她，挖去了她的一只眼睛。她是个好人，一个完全值得信任的共产党员。象其他许多真正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人一样，她全心全意地赞成

---

① 这里，赫鲁晓夫可能把列希同谢胡搞混了，因为1960年夏天率领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访问包括中国在内的几个亚洲国家的是列希，而不是谢胡。

② 指贝利绍娃。——译者注

维护她的国家同苏联之间的友谊。她知道苏联无私地给了阿尔巴尼亚经济援助，其中有许多是无偿援助，苏联向阿尔巴尼亚军队提供了粮食、衣着和武器。对于我们后来遇到的她的某些同事所搞的两面派做法，她是没有责任的。

这个妇女向我们讲了谢胡同周恩来（或者是刘少奇）的谈话。她讲的内容使我们大吃一惊。多么忘恩负义啊！多么不要脸啊！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中国人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她说，中国人是所有这些恶毒的谈话的主谋，而阿尔巴尼亚人不过是跟着跑而已。

我们接着所做的事情说明我们当时是多么天真。我们以为谢胡和霍查是我们的朋友，以为他们听了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代表团讲的话以后也会象我们一样感到震惊。我们丝毫没有想到他们实际上可能已经同意中国人的观点了。不幸的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错得简直不能再错了。

（《赫鲁晓夫回忆录》的这一部分写得不全，从上下文来看，很明显，苏联人后来曾派人到医院去询问贝利绍娃所报告的有关阿尔巴尼亚人在北京同中国领导人谈话的事。——原编者注）

我们的代表刚走，谢胡就立刻从床上跳了起来，脱掉病人穿的衣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径直逃回阿尔巴尼亚去了。

不久，阿尔巴尼亚政府便实际上开始追捕同苏联友好的人。这些人突然间都被宣布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敌人。向我们报告发生在北京的事情的那位妇女被排挤出了领导班子，后来还被开除了党籍。她的被捕只是时间问题。我想她最后是被干掉了。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也并不感到惊奇，因为阿尔巴尼亚人比野兽还坏——他们是魔鬼。只是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阿共领导人是如何惩罚他们自己的党员的。霍查、谢胡和巴卢库三人总是紧密配合：先由霍查和谢胡把被告人判以死刑，然后由巴卢库亲手枪决。

接着，在1960年罗马尼亚党的代表大会上，阿尔巴尼亚人采取了亲华立场，发言反对我们。我记得我同阿党的一位代表谈了一次话。我现在不记得他的名字了，但他是一位诚实的好人，是苏联的朋友。

我对他说我怎么也理解不了他的同志为什么要选择接受中国的帮助而不接受苏联的帮助，我问他，他的代表团为什么要在大会上站出来反对我们。

他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只能告诉你一点：我既然接受了命令，就得服从。"

很显然，他已经是尽可能地坦率了，但是当时我对他的回答并不满足，而且现在也仍然感到不满足。我希望听到一种圆满的解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什么要追随中国。我想就是阿尔巴尼亚人自己恐怕也无法对我讲清

楚这一点。

后来，在1960年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阿尔巴尼亚人又同中国人一起反对70多个代表团共同通过的各项决议。霍查对苏联的立场进行了最粗暴、最恶毒的攻击，成了毛的想法的主要发言人和主要代理人之一。他甚至对我进行了人身攻击。

我还记得伊巴露丽那次感情冲动的发言，她把霍查比做一条咬自己主人的恶狗。伊巴露丽是经历过西班牙革命斗争的老共产党员，她忍受不了霍查之流对苏联的攻击，她知道苏联一直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加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帮助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其中阿尔巴尼亚所得到的帮助并不是最少的。

于是，以支持苏联的政策的党为一方，以亲华派为另一方的一场斗争爆发了。这场冲突第一次公开地暴露于世。

军 事 技 术

在关系破裂以前，中国人提出要的东西，我们几乎都给了他们。我们对他们不保守秘密。我们的核专家同他们的正忙于制造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设计人员进行了合作。我们自己的实验室为他们培养了科学家。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

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这时，我们负责核武器的部长向我作了汇报。他知道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

"我们曾得到指示向中国运送一枚原子弹样品"，他说，"现在已经准备好可以运走了。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等待您的指示。"

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了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象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①

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中国人开始利用我们的决定大做起文章来。我想他们很高兴又找到了一个理由来反对我们。他们在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党中间加紧了反苏宣传，说我们拒绝同他们分享军事技术成果，因为我们对帮助中国已经没有兴趣了。

真是弥天大谎！当时中国武器库中所有的现代化武器都是苏联制造的，要不就是根据我们的工程师和研究

① 1959年6月，莫斯科废除了于1957年开始生效的中苏关于原子合作的协议。

机构向他们提供的样品和设计图纸仿造的。我们给了他们坦克、大炮、火箭、飞机、海军武器和陆军武器。实际上，我们整个国防工业都是向他们敞开的。

但是，我们总得有个界限。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再继续信任中国人，我们简直就是傻瓜了。例如，当时我们有些火箭专家正在帮助中国人掌握导弹技术，尤其是地对空导弹的操作技术。有一天，我们的人在示范了如何组装一枚地对空导弹之后，又把它拆开了。第二天早晨他们回来一看，发现头天晚上中国人已经瞎弄过那枚导弹。那枚火箭是我们的，没有我们的顾问在场监督，中国人是无权摆弄它的。

接着，又发生了另一件事。一天，我接到我们火箭研究所的电话，邀我去看一看我们从中国人那里得到的一枚非常有趣的美国导弹。我决定前往，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我有相当多的时间是花在军事问题上的，特别是与我们的导弹和空军有关的问题。我们担心这两个领域落后于我们的敌人美国。

那个研究所就在莫斯科郊外。我们的设计师对我进行了表演，他们能很快把这枚导弹拆开，然后又很快重新组装上，所需要的东西只是一把钥匙。战士们在战斗进行过程中自己就可以装配。这枚导弹份量轻，操作简便。

我们自己的导弹威力并不比这枚导弹差，但份量重得多，也比较复杂。大家都同意这枚美国导弹设计得比

我们的好——至少这是我们的工程师所写的报告的大意。他们的态度都非常客观。我们的设计师花了大量时间研究这枚美国火箭。然后我们照着它进行仿造并且投入了生产。

有一个问题：那枚导弹从中国送来的时候，其中的某些部件不见了。我想那是些钮扣似的东西，好象与磁场有关。那些东西对准确地操纵导弹至关重要。我们问中国人为什么不把这些部件连同导弹的其他部分一起送给我们，他们回答说他们已经把所有的部件都送来了。于是我们的研究人员只好自己动手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件事化了他们很长时间。他们不得不采用一种新的合金并且使某些化学电池小型化。最后，问题总算解决了，但却化了我们相当大的代价。中国人要么丢失了这些部件，要么就是故意不肯拿出来。但不管事实真相如何，这件事进一步影响了我们对中国人的看法和感情。

用孩子般天真烂漫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是越来越行不通了。我们再也不能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而感到庆幸了。中国毕竟是中国，中国人的行动变得越来越令人难以理解了。

毛在同其他国家包括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打交道时，奉行的是背信弃义的政策，对此，我已经在前面口述了我的看法。下面我想谈一谈毛对他自己的人民所实行的那些专制独裁的政策。我想到的是所谓“百花”运动、

"大跃进"和"文化革命"。

百　花

中国的报刊开始鼓噪所谓"百花齐放"。

我们自己的宣传工作者向我们询问对此应该作何反应。他们说:"我们的人民正在阅读报纸上有关中国这场运动的报道。这种'百花'的说法已经逐渐传到苏联社会中来了。"我们指示报纸编辑和其他宣传工作者不要刊登有关中国这场运动的报道,不要在报上再提及这件事情。我们的立场是:"百花"只是中国人为解决他们国内问题而提出的口号,它不适用于苏联。我们避免直接批评这场运动,但也不表示支持。

我们不愿在苏联宣传"百花"运动的做法并未逃脱中国人的注意。我记不起何时何地了,只记得毛泽东是这样刺激我谈起这个问题的。他问我:"赫鲁晓夫同志,你是怎么看我们这个'百花齐放'的新口号的?"

"毛泽东同志,坦率地说,这个口号的确切含意我们还不十分清楚,因此我们觉得难以在我们自己国家的条件下加以贯彻。我们怕人们误解这个口号,怕这个口号不解决我们的问题。"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毛说,"在我国,这个谚语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了。"他给我举了一些早被人遗忘的历史上

的和中国古代文学上的例子。

毛非常明白我们不赞同他的这个新政策，我们反对让所有那些不同的花都开放。任何一个农民都知道，有些花应该栽培，有些花则应该铲除。有些植物结的果实味道是苦的或者有损人的健康，还有一些植物长起来不受人的控制而且会使它周围的作物的根因得不到养料而干死。另外，我认为，“百花齐放”这个口号是个激将法。毛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唆使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我感到高兴的是我能够有机会提醒毛：我们不会自动地采纳他所提出来的任何一条新的路线。然而，我的提醒毫无疑问地并未起到加强我们相互间关系的作用。毛自认为是上帝派来执行上帝命令的人。实际上，毛还可能认为上帝是在执行毛自己的命令。他永远不会有错。

他很机智，很圆滑，假装认为我作为苏联党的首脑完全有权不接受一个中国的口号，但是我知道，我们的关系已经又向下坡方向滑了一段了。

大 跃 进

中国人在发展经济方面虽然有着巨大障碍需要克服，但是在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进步。对此我是首先加以承认的。

列宁常说，农业合作化必须在机械化的基础上进行。他说，如果你给农民足够的拖拉机，农民就会心甘情愿地服从集体化。可是，中国人不仅没有足够的拖拉机，就连足够的木头犁耙也没有。结果，他们就把自己少得可怜的生产工具拿出来合在一起，以加强他们的劳动力。看到他们获得了成功，我们感到很高兴。

我记得在中国参观的时候，他们那些原始的组织形式常常引得我们大笑起来。例如，在土方工程中，常常会遇见一些体力劳动者站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传递一篮子一篮子的泥土。另外还有些人肩上挑着篮子。他们看上去就象是人做的传送带。我们代表团中有个爱开玩笑的人说，他一生中第一回看到中国人带着蒸汽挖掘机走路。中国同志喜欢听幽默的笑话，所以在饭桌上我们就对他们讲了这个笑话，他们听了之后都捧腹大笑。他们也许生气了，但并没有露出声色。中国人知道如何装出样子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

有一段时间，看起来毛在向世界显示中国的经济奇迹方面可能要成功了。例如，如果拿中国同印度作比较，你就会发现，虽然印度的工业基础比中国雄厚，但中国的生活水平提高得比印度快。对于中国同志正在取得的成就，我们充满了骄傲和惊奇。然而，正当中国看来就要使一个作为样板的社会主义制度臻于完善的时候，毛开始

滥用他的权力了。他毁坏了中国的经济，而这一切都是在所谓“大跃进”的名义下干的。

中国人善于发明吸引人的话语。继“百花”运动之后，他们又提出了“大跃进”的口号。作为“大跃进”这个口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是另一个口号，即“5年内赶上英国，再稍许长一点的时间内赶上美国！”我们读到这个口号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当然，领导人激励自己的人民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取得进步，这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赶超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这种想法却是荒谬可笑的。我们也想赶上美国，但是我们还没有达到可以订出一个确切期限的阶段——虽然我们有时候也有点跃跃欲试。

毛的目的很明显：他想如果他能够在5年内与英国并驾齐驱并且开始赶上美国，那他就能够把列宁的党远远抛在后面并且超过苏联人民自十月革命以来所取得的全部进展。

结果如何呢？哼，就在“大跃进”的同时，中国深深地陷入了困境。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在许多不同的方面立刻倒退了。

毛解散了中国的集体农庄，创造了公社来取而代之。他把农民连同他们的一切个人所有全都公社化了。这简直是荒唐。生产资料集体化是一码事，而把个人所有公有化则完全是另一码事——而且这种做法肯定会导致许

多令人不快的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把公社转变成了军事组织。结果，一直搞得很有生气的中国农业突然一下子遭到了严重挫折，农村爆发了饥荒。

工业也受到了破坏。中国人开始缺少原料，他们工厂的设备遭到了严重毁坏——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开始宣传“机器的定额生产能力是一种‘资产阶级概念’”。例如，他们吹牛说，他们用从苏联买来的机器可以生产出比苏联工厂印的说明书上所介绍的数量更多的产品。结果，机器的寿命大为缩短。有技术专长的工程技术人员被谴责为“资产阶级的马屁精”或“颠覆分子”并且被分配去干体力活。中国的经济陷入了混乱。实际上，他们的整个经济都陷入了无政府状态。

我们还开始获悉中国人是如何在建立“后院式的炼钢工业”的，他们在人们的屋后筑起了小型高炉。我们不由得怀疑用这种方式炼出来的生铁其质量和成本会是如何。这些土高炉的技术极端原始，中国人正倒退到人们已有几百年不用的老方法上去。这就象是一种流行病。集体，甚至个人家庭都要垒起自己的鼓风炉。甚至有这样的情况：有个刚从中国回来的人告诉我说，孙逸仙的遗孀也搞了一个这样的炉子。我不知道她是否从她的炉子里炼出过什么生铁，但她向参观者炫耀并吹嘘了她的炉子。

周恩来一直向我们提供有关中国工农业最新发展的情况。我们总是热切地等着他前来莫斯科，并且以喜悦

的心情接待他。“大跃进”开始后，我们的大使馆向我们转达了周恩来的口信，说他准备到莫斯科来，想看看我们。我们立即答复说我们很高兴能听听他讲些什么。

周同志乘飞机来了，来同我们进行会谈。他说中国的炼钢工业情况很糟，请我们派些专家去帮助他们整顿一下。

他解释说："我们需要更多的合格的专家，人数比目前在中国的苏联顾问要多。我们需要这样一个人，他能告诉我们哪些事我们做错了，应该如何做才对。"

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派扎夏季科同志到中国去一趟。扎夏季科当时是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委副主席。我对他很了解，还在他担任斯大林诺地区一个最大的煤矿的负责人时我就认识他了。扎夏季科同志只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也是后来毁灭他的原因——他控制不了喝酒。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把他派到中国去。毫无疑问，他把伏特加带到火车上去了。几个星期以后他回来向我作了汇报。

"扎夏季科同志，那边的情况如何？"我问，"你给我们的中国兄弟都提了一些什么意见？"

他说话从不吞吞吐吐，这回也是直截了当。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只能告诉您一点：对他们捅出的漏子，他们责怪不了任何人，只能责怪他们自己。我视察了他们的一个炼钢厂。他们把一切都毁了。他们的平炉、鼓风

炉、轧钢机——一切都是乱糟糟的。我提出要见见这个厂的厂长，出来的却是一个兽医。我问周恩来，'周同志，我们在苏联培养的、从我们的学校里毕业出来的那些炼钢工程师都到哪里去了？' 他告诉我他们都在农村劳动，'锤炼无产阶级思想意识'，而象这位兽医这样的人，他们连冶金的起码知识都没有，却在那里管理炼钢厂。我看得出来，周自己也认为整个事儿办得有点愚蠢，但是他作不了主——'大跃进'不是他提出来的。"

"大跃进"不是周提出来的，也不是任何别人提出来的，而是毛泽东本人的发明创造。他想表明可以用中国的特殊办法来建设社会主义。他想使世界——尤其是社会主义世界——对他的天才和领导水平留有印象。对于任何在读了我的回忆录之后有兴趣更多地了解"大跃进"的人，我建议你们读一读我在苏共二十一大上所作的报告。那个文件相当中肯地（而且我认为是非常准确地）分析了当时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虽然我当时并没有点中国的名。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我们不同意"大跃进"。

保加利亚人的跃进

前面我已经说过，中国人是善于创造吸引人的话语的。他们知道怎样在适当的时候提出适当的口号。他们开始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大肆宣传，说每个国家都应该

以中国为榜样，组织公社，照搬“大跃进”。这种宣传在中国的报刊上比比皆是，过了一段时间，在居住靠近中国边境地区的我们自己的人所出版的报纸上也出现了。说实在，我必须承认，我们当时很害怕中国人的这套做法，他们企图让我们采纳他们的口号和政策。由于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不能再继续保持沉默了。我们不得不站出来讲话——不是反对中国和“大跃进”本身（这是他们自己内部问题，和我们无关），而是反对把他们的座右铭照搬到我们苏联自己的条件中来。

我们获悉中国的宣传已经开始在保加利亚造成了影响，我们感到很担忧。保加利亚中央委员会的书记是个好同志，但他不太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个保加利亚党的代表团到中国去作了一次正式访问，它回国以后，保加利亚的报纸立刻开始滔滔不绝地赞扬起中国的公社和“大跃进”来。紧接着我们又听说，保加利亚人已开始把中国人的这些口号运用到他们自己国家的实践中去。他们开始扩大集体农庄的规模，而且扩大到了荒谬的程度；他们对重工业投入了过多的资金。这时，有些保加利亚同志提醒我们，指出了这种情况可能导致的后果。我们终于忍耐不住了。我们感到必须同保加利亚同志好好地谈一谈，使他们有机会听听我们的观点。于是我们邀请了保加利亚朋友到莫斯科来会谈。

这里我要说明一下，你很难想象还有比苏联和保加

利亚之间更好的关系了。据我所知，保加利亚共产党里没有一位代表人物心里不是想着祖国的最高利益的。因此，我们与他们的会谈是诚挚的、建设性的。

“同志们，”我们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如何评价我们之间兄弟般的关系的，你们也知道我们希望进一步发展这种关系。我们觉得，中国的经验不适合欧洲的条件，假如你们坚持要模仿中国的‘大跃进’，其结果有可能弄得一团糟。”

“就重工业而论，你们采取的政策有可能使你们的整个经济都遭到危险。我们得到消息说你们已经被迫向资本主义世界提出了大量定货。你们现在欠的债有可能偿还不起。我们怕你们提出向我们要钱而我们又不能帮助你们。请记住，我们两国的黄金储备都很有限，所以你们冒的风险可能太大了。”

这番话看来讲到点子上了。

我们还向保加利亚人提出了我们的看法，即中国人的组织方法对于他们以蔬菜和水果为主的农业情况是很不相宜的，由于仿效中国的公社，他们已经把集体农庄扩大到了不切实际的程度。我们对他们说，我们不想强迫他们同意我们的观点，而只是想把各种危险摆出来提请他们注意。

后来，我们听说保加利亚人采取了某些措施。就拿一件事情来说，他们多少还是缩小了集体农庄的规模。

至于对工业部门的投资，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保加利亚人开始试验了一年半以后，来找我们了，提出要更多的钱。他们已经把所有的贷款都花光了，甚至连短期贷款也都花得精光。短期贷款当然是最昂贵的。长期贷款的利率通常是5%至7%，而短期贷款却可高达10%至15%。银行简直可以用短期贷款来活活地剥去你的皮。

尽管我们自己的经济有困难(包括缺少黄金)，我们还是得拿出一部分黄金给我们的保加利亚朋友，以便他们能够偿还债务。否则的话，他们就会面临破产的境地了。这就是过份热情地模仿中国的下场。

你们可能会问:“中国人自己是如何避免保加利亚人所遇到的困境的呢?”答案很简单：中国的经济是根本没有控制的。在毛的领导下，中国人爱怎么解释马列主义就怎么解释马列主义。他们不是坚持科学的经济规律，而是根据口号办事——除了口号没有别的。

我们感到有必要向我们自己党内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应该指出“大跃进”的危险性和自相矛盾的地方。尤其当西伯利亚有些地区的党委会也接受了中国人这些口号的时候，我们更感到有这么做的必要。我们决定在二十一大上提出这个问题，目的是为了稳定我们七年计划的基础。在向大会作的主要报告中，我努力想加强我们党的领导人的抵制能力，不使他们受到盲目模仿中国人所采取的经济措施的诱惑。毕竟，政治主要是由经济决定的。

文 化 革 命

自从我退休以后，毛又想出了另一个口号——“文化革命”。

“文化革命”究竟是什么意思，我说不清楚。我不知道我们的领导人在党内是如何解释的。很显然，毛早就希望他的人民不仅把他看成是一位领导人，而且把他看成是上帝。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在把这种个人崇拜强加在他自己国家的头上，的确获得了成功。

当然，我们在自己的国家里也看到过同样的事情。当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每当他的名字在公共集会上或党的会议上被提及时，人们立刻就会猛一下地站起来，然后再坐下。这是我们大家都参加过的一种体育活动。

毛是怎么搞的呢？他把这一套简化了。他出版了自己的言论摘录并且把它们宣布为人人都必须牢牢记住的戒律。我在电视上看过中国人自己摄制的一部影片，里面的人象一群白痴一样以枯燥无味的调门一遍又一遍地念诵着毛泽东的语录。看到人类尊严被践踏到如此地步，我简直要呕吐。

有时候，我也听听他们的广播，但内容实在令人厌恶，只好把收音机关上。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样的内容，而且老是同一个播音员，一个俄语讲得很蹩脚的姑

娘。另外还有一个小伙子，也是播音员。我很熟悉他们的声音，我到中国去访问时他们可能当过翻译。

我在收音机里曾听到有个外科医生如何在做手术之前被迫念一些愚蠢的毛的语录。在20世纪的今天，人类的足迹已经踏上了月球表面，怎么可能一个国家还会相信巫医和不可思议的怪诞偶像呢？中国人真的相信毛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外科医生只要记住毛的话就能治好病人吗？依我看，毛的身上并没有什么超自然的东西。他把整个国家搞得天翻地覆。

前面我已经解释过，“百花”运动是最恶毒、最奸诈的激将法。瞧，“文化革命”也是如此。毛又一次假装把民主和自由发表意见的闸门开放得大大的，目的只是想毁灭那些他认为其思想和活动是有害的或无价值的人。那么谁是“有害的”或“无价值的”呢？自然是不同意毛的意见的任何一个人。

在中国，他们可以把这叫作“文化革命”，但在我国，我们曾称之为“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①这两者是差不多的，半斤八两。

斯大林和毛都要加强他们个人的专政——不是无产阶级的专政，而是一个个人对无产阶级、对党、对领袖自己的同事的专政。你要么在领袖的权威面前低头屈服，

① “反对人民的敌人的斗争”，是30年代大恐怖时期斯大林提的口号。

要么就会遭到和其他一切“敌人”同样的命运。当然，领袖惩罚自己的牺牲品有不同的方法。斯大林惯于用逮捕、枪决和谴责为“人民的敌人”等做法来达到目的。而在沙皇时期，法庭则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类的作家搞过所谓“文明的惩罚”。

毛的做法与沙皇的做法相似：他把他的对手放到广场上去示众，头上戴着傻瓜帽，脖子上挂着牌子，市民们在被俘者周围跳着粗野的舞蹈。我这并不是说中国人本来就是野人，但他们受毛泽东的驱使，变得野蛮了。

我想的主要是中国的一般学生和青年，即所谓“红卫兵”。这些人并不比“(沙皇)伊凡时期的恐怖御林军”好。

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毛除了“红卫兵”以外，还借助于武力。请想想看，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了工人阶级和农民利益而斗争这一借口下进行的！在人民的名义下，而且是所谓为了人民，中国人民有些最优秀的代表被流放、被监禁、甚至被枪杀了。

这里，我想谈谈某些中国领导人的情况，在“文化革命”期间，这些人中间有的成了牺牲品，有的则扮演了毛的亲信的角色。

我始终很喜欢刘少奇。我们见面交谈时，我发现我们立刻就互相理解了，而且我们的思想方法也是相似的——当然，我们必须通过翻译来沟通思想。我特别钦佩刘在中共八大上作的报告，他在那个报告中提出了中

国人民和中国党所面临的各项任务。他看来同意我们党的领导人所持的观点，这些观点反映在苏共第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的决议中。

当然，刘在与阿尔巴尼亚人会谈时的确攻击了我们，但我认为他是在压力下这么做的。我认为那不是他自己的思想。我们当时就有这种怀疑，随后发生的事件也证明我们的怀疑是对的。现在，刘少奇已经成了“文化革命”的第一号受害者。

刘倒下了，并且象其他许多优秀的中国同志那样被隔离起来，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在权力和影响方面他仅次于毛，而且他是中国共产党的最有理智的领导人。

在刘以后，我们最喜欢的中国领导人是周恩来。尽管他目前反对苏联，支持毛的血腥政策，但是他给我们的印象始终是一位有魅力的人，对于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工农业问题有着深刻的了解。朱德给我的印象也很好。我想他和加里宁有许多共同之处。

我对陈毅不太了解，但是我听说他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据我所知，他现在的处境很不妙，正在受到那些疯狂的红卫兵的攻击。

我一向非常喜欢前北京市委的那位领导人，不过他的名字我现在想不起来了。他过去当过工人，非常聪明。尽管我们两人在要不要召开一次共产党国际会议的问题上进行过激烈争论，但我始终很尊敬他。我能从他的脸上

看到一种忧虑和沉思的表情，即使当他在争论中站在毛的一边执行毛的命令时也是这样。我不能肯定他这种表情究竟意味着什么，但他身上总有某些东西使我为他感到难过。我看得出来，他的内心正处于混乱之中。我想他已经看出毛正在把党引向何处，但是他没有勇气采取决定性的反措施。我不知道他最后情况如何，甚至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活着，当然，从政治上说他早就湮没无闻了。

我也很喜欢彭德怀。他是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遭遇只能证明我对他的印象。

现在说一说邓小平。前面我已经说过，毛把他看作是领导班子中最有希望的人。他后来出席了在罗马尼亚党代会前夕召开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在那次会议上他采取了不正确的立场，但他没有选择的余地。那时，毛泽东已经开始篡夺中央委员会的大权，甚至连政治局也对中国共产党的事务失去了发言权。

康生也参加了布加勒斯特的那次会议。他始终是毛的打手。如果你想把康同“伊凡恐怖”时期以来的历史人物相比较，我可以说，他跟马留塔·斯库拉托夫①没有什么两样。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康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不留意把他叫成了蒋介石。这是个口误，我自然向他道了歉。不过，从根本上说，他并不比蒋介石好，假如不是更

① 马留塔·斯库拉托夫是沙皇伊凡四世的宠臣，是伊凡四世的主要侦查员、审讯员和刽子手。

坏的话。这两个人都是杀人凶手。

如果有人怀疑毛不是在扩大自己个人的权力，那么，请看林彪这个人吧！他是毛挑选出来作为他副手的人。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林彪可能是非常能干的；但是作为毛的左右手，他却跟我们的叶若夫①一模一样。

在“文化革命”期间，毛唯一的支柱是军队，但是林很老练，知道军队并不是百分之百地靠得住的。他很可能就是组织起那些恶棍组织的人，那些人接管了教育机构，消灭了党员，毁灭了知识分子，把中国的政治生活搅得一团糟。

毛已经堕落到了闻所未闻的地步。想想看，他竟会任命自己的妻子来负责“文化革命”！有些人说她曾经是个有天才的演员，不管她有没有作为演员的长处，她反正开展了一场最最恶毒的运动来反对作家、作曲家、科学家、教员、评论家以及其他一切知识分子——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为了中国文化这一名义下进行的。

依我看，所谓“文化革命”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是一场矛头指向中国人民和中国党的反革命。

边　界

多年来，毛泽东一直在摩拳擦掌。他一直在寻找机

① 叶若夫是大清洗高潮时斯大林的警察头子。

会控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他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向苏联挑战。至于他所挑战的对象是谁——赫鲁晓夫还是张三李四，对他是无关紧要的。

自从我退休以来，毛加剧了挑衅活动，致使紧张气氛恶化到随时可能爆发军事冲突的程度。我最近看到一些报道说，中国人正在采取某些防御措施，如挖战壕、修建避弹用的掩体等。中国领导人由于呼吁群众进行这种备战活动，从而硬是把中苏分裂的实际情况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时期以来，中国防务研究机构和防务设计部门进行的工作看来都是针对我们的。

我在政府和党内担任高级职务的那几年里，已经看到有些倾向在逐渐增长，而现在，这些倾向已经发展到了危急的关头。早在 1954 年我第一次去北京访问时，毛的沙文主义就已经引起了我的警惕。尽管他的态度格外热情，我仍然从他对中国民族的赞扬中察觉到了一种隐藏着的民族主义倾向。他的话反映了他的信仰，他相信中华民族比其他民族优越，但这种想法同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的观念是格格不入的。根据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一切民族都是平等的；看一个人，不应该看他是哪个民族的，而应该看他属于哪个阶级。

我们不得不勉强听完毛关于中国历史的演讲。他告诉我们说，历史上所有的征服者——成吉思汗以及其他人——都想把他们的统治强加在中国头上，但是到头来

都被中国人同化了。毛反复强调一句话:“中国人是不会被其他民族同化的。”他爱对我们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他们自从史前时期以来就有了灿烂的文化,他们在历史上曾经起过独一无二的作用,等等。

我们访问中国以后回到了莫斯科,在领导班子内部交换了意见和想法——自然是在秘密会议上进行的。我以代表团团长身分向我的同志们指出,毛这种要把自己同整个中国人民等同起来的癖好和他对其他民族的优越感是一种不祥之兆。正如我预料的那样,毛这种自高自大的性格后来在他身上明显地占了上风,他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集体领导中拒绝接受平等的伙伴关系。他要别人承认他的盟主权。

毛的沙文主义和骄傲自大尤其表现在中国人对苏联提出的领土要求上。斯大林死后,我们不仅取消了在新疆为开采天然资源而建立的联合公司,而且放弃了我们在那里的一切权益。我们废除了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且为把旅顺港归还中国和撤出我们的军队作了安排。那些谈判过程中所出现的任何延误都是由中国方面而不是由我们方面造成的。

后来我们获悉,中国的某些资产阶级报纸①在抱怨说,“中国人民”对中苏边界,尤其是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

① 指香港的共产党报纸。

的中苏边界不满意。按照这种说法，俄国沙皇把远东的边界线“强加给了”中国人民。

从我们方面来说，沙皇做的事情我们是没有责任的，但是，根据沙皇签订的那些条约所获得的土地，现在则已经成为苏联的领土。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管辖和保卫从革命前政权那里继承下来的领土，再说，我们也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国家。

我们担心，如果我们开了这个头——根据历史情况重新绘制边界线，形势就有可能变得不可收拾，从而导致冲突。再说，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和国际主义者是不会特别重视边界问题的，尤其不会特别重视社会主义伙伴国家之间的边界问题。根据马列主义哲学，国界问题应该是无足轻重的，因为马列主义哲学认为，国际革命运动是一股超国界的力量，它终将在全世界取胜。

我们把这些意见告诉了中国人，并且让他们知道，我们为（香港）报纸上所登载的那些不友好的文章感到担忧。他们回话说，我们不应该注意资产阶级报纸写的东西。他们说，那些报纸只是反映了敌对阶级的情绪，而并不反映他们领导人的情绪。对于这个解释我们感到满意，不过，我们要求中国同志发表一个声明，公开澄清他们对边界问题的看法。他们拒绝了，我们也没有再坚持。我们决定相信他们的话。

接着，蒙古问题提出来了。我想这是我们在中国举

行两党会谈时提出来的。①中国代表团由毛泽东率领，但是提出蒙中边界问题的是周恩来——当然，我们知道，周的话反映了毛的思想。

周对这个问题的处理很有外交手腕。“如果蒙古成为中国的一部分，你会怎么想？”他开始问。

“你提出的问题使我们很难评论，”我回答说，“这是蒙古和中国之间的事情，与我们无关。我们是第三方。你们自己直接同蒙古人谈谈不好吗？”

我相信，中国人事先就预料到我会这么回答的，因为周随即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说的是。但是我们想事先知道，如果蒙古真的成了中国的一部分，你们的反应会怎么样。”

“我们的态度将取决于蒙古同志的态度，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个人的意见：我非常怀疑蒙古人会欢迎你们的建议。另外，蒙古很快就要成为联合国的会员国了，最近又同一些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如果蒙古并入中国，它就会失去这些国家的承认。不过，我当然不想代表蒙古领导人说话。”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听到的和说的就是这么多，但是我知道，当时蒙古人急于想做的事情却是把他们同中国之间的边界划分得更清楚些。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蒙古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独立的蒙古人民共和

① 指的是1954年赫鲁晓夫第一次访问北京的事。

国，另一部分在中国境内，即所谓内蒙古。几乎不可能用人种或历史的标准把这两个部分分开。可以这么说，无论你怎么分割蒙古，你都无法避免不损害蒙古人民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

因此，蒙古人开始自己来处理这个问题。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正在同中国人交换地图和举行谈判。最后，他们达成了一项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建立了双方都满意的边界。

我们也很愿意同中国人干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关系恶化了，中国人在有关我们边界的宣传报道中已经开始采取两面夹攻的做法。首先，他们把老问题又重新端了出来，说什么苏联在夺取了波罗的海沿岸几个小国之后又并吞了罗马尼亚和波兰的某些领土——顺便说一句，这些领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就是属于俄国的。中国人通过他们那个惯于说谎的无线电台，指责我们奉行"沙皇的征服政策"。

对于这种指控我甚至不屑于给予回答。我想苏联政府通过塔斯社和报纸已经发表了足够多的声明。假如我们放弃我们从沙皇的资产阶级政府那里继承过来的土地的话，我们就会使自己纠缠到永远也搞不清楚的历史老帐和政治纠纷中去。比方说，对于那些不太久以前才从自己原先居住的国家迁移出来、现在已在苏联定居的少数民族集团，我们该怎么办呢？难道我们应该把他们赶

跑，让他们住到月球上去吗？

按我的想法，所谓“历史上的边界”这一类提法统统都是无稽之谈。边界问题已经解决了，我们的敌人之所以要把它重新提出来，是因为他们想兴风作浪，或者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实行侵略政策。中国竟也使用这种手段，我认为是很丢脸的。我在领导班子里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做，今天他们仍然在这么做。

除了指责我们兼并欧洲的某些土地以外，中国人又突然恶毒攻击我们在远东夺取了他们的领土。我们想彻底制止这种论调，为此，不得不同中国达成一项协议，重新规定（某些地段的）边界走向。这里有一个复杂情况，就是自从沙皇同中国签订边界条约以来，阿穆尔河①和乌苏里江的河床已经出现了某些变化，形成了一些新的岛屿。根据老的条约，边界线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因此，从法律上说，那些岛屿应该归属苏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愿意照顾住在边境地区的中国居民的利益，允许当地牧民在严格说来不属于中国的领土上放牧和砍柴。总之，我们对中国方面的需要采取了友好和体谅的态度。我们边防军的职责主要是象征性的，对于对方所犯的侵犯边界的事情他们是宽容的。在某些特定地区，我们没有对中国人提出任何要求，没有向他们提出抗议。但是不久，中国人开始向我们的巡逻艇开火了。我说的“中国

① 即黑龙江。——译者注

人”并不是指身穿军装的士兵；不过，据我们的边防军报告，他们的确看到过中国军人化装成农民模样。中国边防军人和苏联边防军人之间还发生了一些殴打事件，但是我们的人接到上级的严格命令，不要接受中国人的挑衅，同他们发生武装冲突。所以，这些殴打事件一般没有超过推推拉拉的程度，最多不过是互相拽掉几颗钮扣而已。

为了不使这些冲突演变成一场战斗（这对双方都不会有任何好处），我们建立了一个政府级的委员会，并向中国人呼吁举行谈判。经过长时间交换意见之后，中国人终于同意会谈。我们让他们挑选会谈地点，他们说想在他们国家谈，我们同意了。

谈判开始时，双方口头陈述自己的要求。中国人说他们有权获得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的相当一大片土地。我们根本不可能满足这种要求。居住在（苏联）远东地区和中亚地区的甚至都不是中国人。远东地区的居民主要是俄罗斯人，中亚的居民则主要是由哈萨克人、塔吉克人、维吾尔人和吉尔吉斯人组成的。最麻烦的是帕米尔山脉的归属问题，因为苏中两国政府间的任何条约都没有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们指示我们的代表团向中国人解释：由于居住在帕米尔地区的是塔吉克人，因此帕米尔山脉理应属于塔吉克共和国的一部分。

在会谈第二阶段，双方都拿出了表明各自要求的地图。中国人把他们的地图交给我们之后，我们发现他们

不再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中亚提出要求了，但是他们声称界河上的那些岛屿是属于他们的。那些岛屿靠中国比靠苏联近。他们建议重新划定边界线，让边界线从河中心通过，而不是贴着中国一侧的河岸。虽然这个建议意味着我们要放弃大部分岛屿，但它同国际惯例是相符合的，因此我们同意了。

这样，我们就解决了互相间的争执——至少在原则上是如此。然而，有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中国人要求拥有沿阿穆尔河的航行权。那等于是允许他们实际上可以直达哈巴罗夫斯克①。我们则坚决要求他们遵守俄中两国过去签订的一项旧条约，那项条约把中国的航行距离限制到所谓的哈扎克维奇运河。在这个问题上，谈判陷入了僵局。

后来，终于要签订一项有限的协议来确定新的边界线了。我们表示愿意平等交换，就是说，这里加上一块地方，那里减去一块地方，加加减减——这就是我们提出的建议。至于争议地区，就干脆把它们一分为二。换句话说，我们愿意拿一把尺子从中间划一条线。这是一个英明的决定，因此它意味着双方都要作出一些让步。我们只是想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既不损害中国的声誉和物质利益，也不损害苏联的声誉和物质利益。我们俄国人喜欢这样一个说法，叫做“不要逗弄鹅群”。为

① 即伯力。——译者注

什么要自找麻烦呢？怎样才能修正和重新划定边界线完全是个常识问题嘛！毕竟，边界线的存在并非为了飞鸟，鸟儿想飞到哪儿去就能飞到哪儿去，而边界线的位置则必须为边防军所掌握，他们要负责保卫国家的安全。

但是，在我们看来是明智的和有助于修好的做法，在中国人看来却并不值得称道。我们的代表返回中国，参加最后阶段的谈判时，发现中国人不肯接受我们的立场。他们虽然放弃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大半个中亚的要求，却要我们承认现存的边界线是以当年沙皇强加在软弱的中国政府头上的不合法和不平等的条约为基础的。他们希望新签订的条约中包含这样一个条款，说明新的边界使100年前强加给中国的不公正待遇永久化了。

任何一个主权国家怎么可能签署这样的文件呢？假如我们签署了，我们就等于默认不公正待遇必须加以纠正——换句话说，我们将不得不放弃我们对有关领土的权力。于是，我们又回到了谈判开始时讨论的问题。会谈就这样破裂了，我们的代表团回到了苏联。至今，我们仍然无法接受所谓的"不公正待遇"条款。

下一轮谈判轮到在苏联举行。我们政府讨论了这个问题并且向我们的代表团发出了适当指示。代表团由戈内拉洛夫率领，他是一位沉着、明智、能力很强的人，很适合于同中国人打交道。然而，在我担任领导职务期间，中国人从未对我们最后这个主动行动作出过答复，会谈也

从未再恢复过。

自从我的政治生涯结束至今，我一直关心着报纸上对中苏边界争执的报道，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政府的立场并未改变。事实上，我认为，苏联今天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同我任政府和党的首脑时所执行的政策并无二致。

有没有黄祸？

我在领导班子里的那些年中，无论我们还是中国人都不愿意让我们之间的“家丑”外扬出去。我们从不让自己的报纸刊登我们的丑闻和冲突情况。另外，即使在争论最激烈的时刻，双方也都小心翼翼地避免攻击领导人个人。然而，自从我退休以来，我在报纸上和电台广播中已经读到或听到中国人就我个人和我退休以后所组成的苏联新的领导班子所发表的一些言论。这种情况使我感到非常不安。

我退休以后，还听说尤金在一次会上讲了话，指责我不尊重毛，因而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搞坏了。尤金——他是所谓哲学和宣传鼓动方面的专家——怎么能够讲出这么无耻的话来呢？如果他想找出我们同中国冲突的真正起因，只要看一看自己就行了。他在我们同中国真正发生冲突之前拍给我们的那份电报就象一个晴天霹雳——他是把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即将恶化这一信息带给

我们的第一只燕子。我相信，等到这些档案可以公开的那一天，历史学家们将会亲眼看到尤金自己关于毛是怎么说的。

在结束对中国的回忆这一部分之前，我最后还想谈一件轶事。

我在访问法国期间，出席了法国政府为我举行的一次招待会，因而有机会遇见一位过去的影子——法国战前的总理达拉第先生。当年法国没有同苏联联合共同反对希特勒德国，他是要为此事负责的人中的一个。

后来，达拉第访问了中国。我相信他是作为旅游者去的。他在回国途中经过莫斯科，要求外交部安排同我约见一次。我和我的同志们讨论了他提出的要求（我在接待外国来访者之前总是先同领导班子商量的）。大家决定要我会见他，我就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他。

我有一种好奇的心理，想再看一看这个人，他和张伯伦一起把我们引向了这样一场可怕的血腥战争。然而，要是为了同他争论他当总理时所执行的那些政策，我是决不会同意跟他见面的。我只是想听一听他有什么可说的。结果他提起了中国这个话题。

"我现在刚从中国回来，"他开始说，"我周游了那个国家，看到了你们正在为中国人做的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情。你们有没有想过，在加强他们经济力量的同时，你们可能正在给自己带来危险？"

"没有，"我回答说，"我们看不到有这种危险。相反，我们相信我们现在做的事情是对的。中国人是我们的朋友和兄弟。"

"你们不担心'黄祸'吗？整个欧洲——实际上整个世界——都在谈论'黄祸'。你们难道没有同样感到威胁？"

坦率地说，他提出的问题使我吃了一惊，但我还是严厉地斥责他说："我告诉你，达拉第先生，我们是不这么看问题的。我们不按肤色看人。我们不管他们的皮肤是黄色的、白色的、黑色的还是棕色的。对我们来说，唯一的区别是阶级区别。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中国人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我们帮助他们对我们有直接的好处——因为这样做对我们有利，而且，为了阶级的团结，我们也必须保持兄弟般的友好关系。"

他没有同我争论。我们又谈了一会儿，然后他就离开了。

不太久以前，我听说达拉第死了。① 从那以后我多次回想了我们的那次谈话。当然，他当时谈"黄祸"，我把他顶回去了，这是很对的。但是我现在不禁在想：假若达拉第老先生活的时间长些，看到我们同中国的关系所发生的变化，听到自从我同他会见以后我自己说过的某些话，他一定会放声大笑的。他一定会说，他，一个资产阶级领导人，对于两个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和我本

① 达拉第死于1970年10月。

人——之间正在发生的事情所作的分析是对的。

但是，话要说回来，对苏联构成威胁的并不是“黄祸”，而是毛目前正在推行的政策。而且，达拉第也并不是最后笑的人，因为他已经死了，而我还活着，毛也还活着。然而，正象传道士们经常说的那样，普天之下，谁能永存？所以，总有一天毛泽东也会不得不离开政治舞台。因此，我相信，苏联播下的友谊的种子总有一天会有机会发芽、结果的。我们多年来给予中国的援助在中国人民的脑海中已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管有些人怎么说，我坚信我们的金钱、贷款和技术援助是不会白花或白白浪费的。

太阳的光辉必将冲破乌云，照亮中国人民的道路，使他们回到伟大的卡尔·马克思和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为我们指出的康庄大道上来。毛泽东太老了，他自己看不到这样的光辉了，但是没有谁是能够永久活下去的。毛泽东来去匆匆，中国人民将会永存。中国将会重新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采取正确的政策。虽然我不知道这还需要多久，但我相信，这样的时刻最终一定会到来！

作为一个曾经支持过中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的人，一个对他们的胜利感到欢欣鼓舞、对他们的未来怀着最良好的祝愿而无任何其他所求的人，我希望，中国共产党将会很快找到力量来克服自己身上的疾病。

第 二 部

对外政策和国外旅行



第十二章　邻　国

土　耳　其

正如我已多次说过的，自从我们的国家成立以来，列宁就定下了这样一个原则：同所有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关系，不管它们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如何。他发表了一个著名的声明，大意是说：如果我们不想承认在这个星球上的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只好飞到月球上去。特别重要的是那些与我们有着共同边界的国家。

列宁把俄国军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占领的一大片的土地让给了土耳其。事实上，我们在十月革命后当然不能再占有那些土地，但如果我们对那些土地提出要求也是正当的，因为在亚拉拉特山周围那些有疑义的土耳其土地上居住的是亚美尼亚人。直到今天在亚美尼亚的国徽上还画着亚拉拉特山。对于这种不合理现象，亚美尼亚人有一个笑话："要是土耳其人抱怨说亚拉拉特山不是属于亚美尼亚的，因此我们没有权利把亚拉拉特山画在我们的国徽上，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回答：土耳其人

没有权利把新月画在他们的国徽上，因为月亮不是属于土耳其的。”

正如我已讲到过的，斯大林把外交政策看作他个人掌管的一个特殊领域，非常小心地戒备着。能在外交政策上对斯大林提出意见的唯一的人是贝利亚。他拚命地运用着他的影响。在一次斯大林拖得很长的“晚餐”上，贝利亚开始反复地讲：现在属于土耳其的某块土地过去一直是属于格鲁吉亚的，苏联应当要求他们归还。① 贝利亚说的话也许是对的，但土耳其人从格鲁吉亚手里夺取那些土地的时间，得从历史上追溯到很远很远以前。贝利亚不断提出这个问题，以此蛊惑斯大林，唆使他采取行动。② 他使斯大林确信现在是取回那些土地的时机。他争辩说，土耳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削弱，它无力抵抗。

斯大林作了让步，向土耳其政府发出了一份正式备忘录，强硬地提出了我们的领土要求。可是，整个事件都引起了相反的结果。贝利亚没有预料到土耳其会以接受美国的支持来回答我们的要求。贝利亚和斯大林只是把土耳其人吓得立刻投入美国人的怀抱。由于斯大林的那份给土耳其政府的备忘录，美国人才得以渗入土耳其，并

---

① 对斯大林的“晚餐”的描述，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296—306 页。

② 贝利亚和斯大林都是格鲁吉亚人。

就在我们的国境边上建立了军事基地①。

在那时前后，西方报纸报道美国正在组织一个所谓“科学探险队”，据说是为了到亚拉拉特山去寻找诺亚方舟的遗迹。那是谁也骗不了的。我们完全知道这实际上是一种什么样的探险队。这是针对苏维埃亚美尼亚和我国在阿塞拜疆的油田的一次边境行动，该油田当时是苏联石油的唯一来源。②

这样，由于斯大林晚年时支配着他的顽固不化和心理上的紊乱，他破坏了我们同土耳其人的关系。从那时起，土耳其就允许美国在它的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

伊　朗

波斯——现称伊朗——对我们的畏惧一定不下于土耳其，也许更甚。自沙皇军队上个世纪驻在波斯以来，波斯人就知道我们是占领者。

---

① 莫洛托夫最初于1945年6月提出苏联对土耳其的安纳托利亚高原东部的卡尔斯、阿德利安和阿尔特温三省的要求，以后于8月在波茨坦会议上又反复提出。1953年6月，在斯大林死去和贝利亚被干掉后不久，苏联提出放弃它的上述要求。

② 由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的科学家率领的美国探险队，于1949年化了十二天去徒劳地探查诺亚方舟；这一冒险行动当时被莫斯科攻击为伪装的间谍活动。

由于波斯对我国有历史上的宿怨，波斯国王——即现在的波斯国王的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奉行了亲德国的政策。其结果是苏联同英国在战争接近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半个波斯将归苏联军队占领，另一半归英国军队。于是波斯人又一次看清我们是占领者①。

当然，我们只有一个目的：保证我国南部边境的安全。但是，当一个国家占领另一个国家时，总是以维持和平和安全为其占领行为辩护。同时，占领军常常——或至少是企图——永久留下来。

斯大林确实推迟撤出我们的军队。当他进行拖延时，伊朗突然爆发了内战。国王镇压了暴动，有些参加暴动者一边作战的人越过边境逃入苏联。②国王完全知道，我们不但同情叛乱，而且还武装叛乱分子。这使伊朗人越发不信任我们。

美国竭尽全力利用伊朗对苏联的不信任。我们接到情报说：美国人已建立了一处导弹发射场，一个空军基地和其他一些军事设施。我们认为这些基地是用来威胁就

---

① 英苏两国军队于1941年占领伊朗，迫使老国王礼萨·沙阿·巴列维让位给他的儿子，即现在的统治者穆罕默德·礼萨·沙阿·巴列维。

② 俄国占领军经过拖延从伊朗撤出后，留下了一些苏联间谍，由于他们的煽动，1945年末在邻接苏维埃阿塞拜疆的北方几个省中突然爆发了"民族解放战争"。伊朗政府于1946年镇压了这次分裂活动。

在边界对面的我国的巴库〔周围的油田〕的。国王再三否认在伊朗有任何美国基地，但我们不相信他。后来我们发现那里确实没有美国基地，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人如需要的话不能迅速建立起基地。进入并占领伊朗对美国来说毫不费力。或者美国人可以直接了当地要一个酋长同意利用他的机场来对苏联作战就行了。

在所有这些紧张关系之上，我们同伊朗还有一项拖延了许多年的边界争端。

所有这一切必须纠正。我们邀请国王来同我们谈判。我们在有争论的边界问题上对伊朗作了重大让步。对他们的要求，有一些我们作了妥协，另外一些我们完全满足了他们。我们签订了一项议定书，在地图上确定了一条双方都能接受的分界线。我们由于扫除了妨碍苏伊两国建立良好关系的一项主要障碍而感到高兴。我们还向国王提议在构成苏伊边界的阿拉斯河上建造一座水力发电站。国王最初没有接受我们的建议，但现在我从报上看到建造水坝的工程已在进行了。不久，坝中的水将灌溉庄稼和发出电力，造福于苏联和伊朗两国人民。

阿　富　汗

美国人也对我们南方的另一邻国施加压力。他们着手把物质和技术援助源源不断引进阿富汗，提供贷款，修

筑公路，自己花钱兴建多种工程。

美国为了要用军事基地包围我们，对阿富汗这样的国家使用了各种手段——一会儿讨好阿富汗人，一会儿设法威吓他们。我们知道，美国人企图通过散布我们对阿富汗在军事上有野心的谎言，恐吓国王不同苏联往来。①但历史已证明，我们对阿富汗除了抱着最良好的愿望之外，别无所求。列宁在十月革命后迅速承认阿富汗王国是一个独立国家。②其后，有许多年，我们之间的关系是冻结的。直到斯大林去世以后，我国新的领导当权，我们才设法同阿富汗重建了友谊。

阿富汗人甚至没有等待我们首先采取行动。他们主动来找我们要求帮助。国王邀请布尔加宁和我从印度回国途中在喀布尔逗留。我们在同国王和他的部长们会谈后，对阿富汗是怎样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有了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我们能感觉到阿富汗人是在寻找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我们也能看出，我们不是唯一能够提供帮助的国家——在我们访问喀布尔时这一点是清楚的：美国人正在渗入阿富汗，明显地企图在那里建立一个军事基地。

---

① 穆罕默德·查希尔·沙阿，自1933年起是阿富汗国王，至1973年被一次武装政变所推翻。

② 事实上，阿富汗的独立早已为1907年的英俄协定所保证。

阿富汗人要我们帮助他们在伊朗边界附近修筑几百公里的公路。这要我们付出一笔巨款，因为我们得在山中开凿隧道。可是，由于阿富汗没有铁路，这样一条公路就将成为国家的主要经济命脉。这条公路也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为万一同巴基斯坦或伊朗发生战争，我们就可以用来运送军队和给养。

我们的责任是使国王和他的政府相信：我们不会滥用这条公路——它将为和平的经济发展事业服务。我们花了一些时间使冰块全部融化，使阿富汗领导人懂得我们并不在他们的国家里追求经济利益或军事目的。①

我们长时间地设法使国王来苏联度假。我们好几次邀请他，但他总是有礼貌地谢绝，并到法国或另一个什么国家去了。最后，他同意到我们在克里木的一个猎场小屋来休假。②当时不是狩猎季节，所以我们什么也没有猎

① 这一段及其前面两段是《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07—508页的节略。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1955年去亚洲旅行一个月期间到喀布尔访问四天。他们签订了一项赠送一亿美元援助阿富汗的协定。赫鲁晓夫于1960年再次去喀布尔。联接阿富汗首都和阿胡斯盆地的公路以及通过兴都库什山脉的隧道建于1964年。

② 查希尔在1957年对苏联作了一次正式访问。他去了克里木和巴库，也去了莫斯科、列宁格勒和明斯克。旅行结束时，查希尔的外交部长萨达尔·穆罕默德·纳伊姆和葛罗米柯发表了一项联合公报，宣布苏联“决定给阿富汗提供无私的技术和物质援助，不附带任何政治或其他类似的条件。”查希尔在1964年夏再度访问了俄国。

获。我们只是款待了我们的客人，请他观赏了美丽的景致和野生的猎物——鹿和野羊。

在我们的谈话中，我告诉他：我们在苏阿边界附近勘探自然资源，并在那里发现了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矿藏。我建议我们就共同开发这些资源取得一致意见。他和他的部长们仔细地听我们讲，注意地看着我们，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显然，他们还不大放心。可是，我退休以后，从报上看到阿富汗人已同意与我们共享他们的矿藏；他们正在铺设一条管道，使他们能供应我们天然气，以换取我们的机器和工业品。①

有些目光短浅的人会说：没有必要从阿富汗取得天然气和石油，因为我们国家也有这些资源。我对此的回答是：如果我们不援助我们的邻国，他们就会仍然处于可怜的贫穷境地。并迟早会转而反对我们。而且，如果我们不援助阿富汗人，美国的资本家们就会再高兴不过地来代替我们。

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在阿富汗的投资并不是浪费的。我们已赢得了阿富汗人的信任和友谊，他们的国家没有落入美国人为其设置的圈套；阿富汗没有去上美国以金钱为诱饵的鱼钩。我心中毫不怀疑：如果阿富汗人没有成为我们的朋友，美国人必然会用所谓的"人道主义援助"来设法满足他们自己的贪欲。

① 苏联人于1969年开始在阿富汗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

我们用于无偿援助阿富汗的金钱，同我们为对付阿富汗领土上美国军事基地的威胁所要花的代价相比，那只是沧海一粟。可以设想：如果我们要把自己的军事力量部署在我国边界沿线，那么我们在这方面投放的资金丝毫也不会增加我国的生产资料，而只会是吮吸掉我国人民的血汗。

在同邻国打交道时，我们必须是政治家，而不能是吝啬鬼。我们必须乐意预付将来会用和平和友谊的形式给我们带来巨大报偿的款项。在我们同阿富汗的关系戏剧性地好转时，我是领导核心的成员之一。对此我感到骄傲。

尼赫鲁和比莱钢厂

战后从大不列颠统治下赢得独立的两个国家中，巴基斯坦参加了东南亚条约组织，而印度由于尼赫鲁的进步领导，拒绝参加这个组织。印度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坚定地站在一切军事集团之外。

尼赫鲁曾来苏联访问过一次，但到斯大林去世、布尔加宁和我去了印度之后，苏印关系才打下牢固的基础。①

---

①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总理在 1927 年到过俄国；1955 年 6 月他再度前去作两周的正式访问。那年 11 月，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和葛罗米柯（当时是莫洛托夫手下的第一副外长）曾飞往新德里。

我记得在尼赫鲁和我进行谈判时，我们面前摆着芒果。我以前从未见过这种奇妙的水果。尼赫鲁微笑着，仔细地看着我们怎样对付这芒果。剥芒果皮是一项复杂的动作，需要时间和技巧。而且，芒果汁很甜很粘。过了一会儿，他说，"瞧我怎么弄。我告诉你如何照我们的习惯吃芒果。"

同我们坐在一起的英迪拉·甘地开玩笑说，"你知道吗，赫鲁晓夫先生，我国人民说，吃芒果的最好的地方是在澡盆里，因为那样你可以同时又剥芒果的皮，又洗你的手。"①

我们为印度提供了经济和技术援助。有些人会问，"那么印度人能给我们什么做报酬呢？"当然，除了表示感谢外，他们不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不象美国人，他们虽然花了几十亿美元援助外国，但是——既然他们是资本家——总是在寻找一种方法以取得掠夺原料的特权或从事合办的投机事业，以便从他们给其他国家的"礼物"中榨取利润。我们只是希望为我们同印度的关系建立友谊和互相信任的基础。

给尼赫鲁的贷款，他善意地接受了。我已讲过，当我们要把硬通货借给阿富汗领导人以发展他们的穷得可怜的国家时，他们起初是犹豫和疑心的——他们企图猜出

---

① 英迪拉·甘地，尼赫鲁的女儿和现任总理，当时是她父亲在正式场合中的女主人。

我们是否有什么暗藏的动机。可是，在印度领导人方面，我们没有遇到这样的疑心。

他们问我们是否愿意在比莱为他们造一座钢厂。我们知道他们已向英国和西德提出类似的要求。我们说，我们乐意提供必要的贷款和我国技术人员的服务，于是印度人同我们签订了一项正式协定。

我们的工程师为工程准备了一份蓝图，提交给印度人。他们问，如果他们让一些英国工程师审查这份图纸，我们是否反对。这看来好象是一种相当古怪的交易方式，但我们不负担什么义务。我们深信印度人并不是觉得我们有什么可疑；问题很简单，他们自己缺乏有经验的工程师来审核我们的图纸中是否有错误。可是，作为交换，大家同意：我国工程师也对英国工程师为他们将建造的工厂设计的图纸进行复审。

我从幼年时起就知道英国人是生产钢铁的第一流能手。在我长大的那个尤索夫卡市镇，就是用当地钢铁厂的老板休斯的名字命名的。①一般说来，英国的技术总是令人惊叹不置的。他们发明了许多帮助我们俄国大老粗〔庄稼汉〕干活的机器。我记得我们的劳动者唱过一支根据古老的劳动歌曲“大棒子”改编的小调。歌词如下：

---

① 威尔士人约翰·休斯在赫鲁晓夫的父亲工作过的煤矿附近建造了尤索夫卡铁工厂（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03页）。

岁月流逝，感谢上帝，如今
变化来到了我国大地；
丢掉了木棒，放下了犁，
我们干活，用了铁机器。

我们把钢厂的蓝图交给英国工程师。印度政府后来告诉我们，英国人在他们的鉴定报告中对我们高度赞扬。他们根本提不出任何变动。可是在审阅英国人的蓝图时，我国的工程师却指出了一些根据现代科学和技术必须改进和修正之处。

至于德国人，我们同他们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在印度没有同他们直接接触。可是，他们比我们先走了一步，一时看来，好象他们能赶在我们前头建成他们的工厂。①

当我们的建筑工程落后于预定计划时，我召来了迪姆希茨同志，派他到印度去帮助建设这一工程。②我是在战后我国南方的恢复工作中认识迪姆希茨的。他在德聂伯罗彼特罗夫斯克和扎波罗热已表现出卓越的管理才能。他提出一个修复被炸掉的鼓风炉的新方法：把鼓风炉的各个断片先拼拢来，然后用起重机吊到原来的地基上，再用铆钉全部铆在一起。这一方法使我们节省了六

---

① 事实上，苏联工程是在德国工程之前决定下来并开始进行的。

② V·E·迪姆希茨，自1957年至1959年任比莱钢厂的总工程师，1962年继续担任苏联副总理。

个月的时间，在有些情况下甚至节省一年。迪姆希茨同志到印度去，在那里他直接向尼赫鲁汇报。

当时曾发生一件悲惨的事，使我们在印度的工作蒙受了痛苦。我国一位优秀的工程师带着自己年轻的儿子去比莱附近的沼泽地打猎。他打中了一只野鸭，就过去拾取它。结果他被沼泽吞没而淹死。我们难过极了。

我国的工人在印度单独居住。最初，印度人想在互助的基础上建造钢厂，但我们拒绝了。①我们没有公开解释我们的理由，其实是这样的：我们不愿使我国的管理和设计人员处于当地劳工之上的雇主的地位。如果我们同意担任这种角色，那必然会发生矛盾，而且——更坏的是——我们将在全世界工人面前玷污我们的政策。②

最后，我们感到非常满意的是，我们的工厂在德国人工厂之前建成。我们第一个在印度熔炼出生铁和钢。③德国人因建设拖延和设备有缺陷而遇到麻烦。印度人告诉我们，他们认为我们的工作比德国人强。自然，我们在同德国和英国的工程师们竞争，而且我认为，我们取胜是

---

① “互助的基础”意味着将使用印度劳工。

② 这里提到的政策，是同其他国家的无产阶级团结一致的政策。

③ 苏建钢厂的第一座鼓风炉于 1959 年 2 月开始送风，比西德在罗克拉的钢厂开始投产略早一些。

没有任何问题的。

让我在这里说，我不愿象我国有些人那样到处谈论，好象我们抓住了上帝的胡子。我不是说我们的技术人员是世界上最好的。我充分了解我们在若干领域里落后于其他国家，尽管革命以来已过去了五十多年，我们还是不能赶上，这使我感到非常痛心。

可是，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成就，并给以恰如其分的评价。我们的工程师由于他们在印度所做的出色的工作，完全应该受到赞扬。他们把遇到的各种冶金技术上的问题解决得可说是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

起初，我们钢厂的炼钢能力是每年将近一百万吨，但印度政府立即开始商谈是否可以把它提高到二百五十万吨左右。我们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开始干了起来。

我记得同尼赫鲁一起去比莱视察已建成的工厂。①自我第一次访问印度以来，变化是很大的。当时，我以一个旅行者、一个来自北方第一次看到南方奇妙大地的外国人的眼光看着这异国风光。但现在我们看着印度领导人，并象老朋友一样地进行工作，我们同他们刚刚完成了一项共同的计划。

---

① 这是1960年赫鲁晓夫第二次去印度旅行，当时他正在亚洲作第二次广泛的旅行。这一次陪同赫鲁晓夫的有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和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的G·A·（尤里）茹科夫，以及赫鲁晓夫家庭中的好几名成员。

我同尼赫鲁的关系是再友好不过的了。他领我参观了许多工厂和农场，使我能直接了解印度的问题和潜力。我记得他领我到一所工厂的餐室去。那完全象我在美国看到的餐室。我想它一定是按照美国的餐室仿造的。“赫鲁晓夫先生，”尼赫鲁解释说，“这里没有人来侍候我们。我们得自己拿着银餐具到那边柜台上去取食物。”于是我们吃了一顿上好的、丰盛的午餐。然而，从我亲眼看到的事实中可以知道，印度要摆脱殖民主义遗留下来的贫困和落后状况，还得走一段很长的路程。我记得：加尔各答的人民看上去贫穷得特别使我感到震惊。

我有一次去那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加尔各答的工人比印度任何其他的邦都多，他们大量地投左翼政党的票。所以我们的代表团受到了特别亲切和热情的接待。他们放出了大量的鸽子。鸽子是和平的象征——这部分得归功于毕加索，他画的鸽子现在可以在一切为坚持和平共处而战斗的国家的旗帜上找到。我现在回想起加尔各答的那次群众大会，仍象在眼前一样。夜幕正在降临。一只鸽子飞上了我的胳臂。人们笑起来了，并且说着笑话，摄影师当然忍不住摄下了这些镜头。我在我所访问过的所有国家里都为和平大声疾呼，所以人们说这里有一只鸽子，它知道该栖落在什么地方。

我们告诉尼赫鲁，我们愿意提供贷款建造更多的工厂。我们还无偿地给他拖拉机，联合收割机，播种和灌溉

设备；因为他需要用来建立一个类似我国国营农场的农业企业。我们给他派去了一些我国最好的农学家和农业工程师。在这个农场投入生产后，尼赫鲁领我去视察。我很高兴地看到那里正在用现代化设备收割谷物。

我知道有些人抱怨我们的政府把这种农场一类的礼物送得太多了。我不知道这些人是否受到了别人的煽动，以至把我们送的礼物看成是浪费。就我来说，宣传社会主义的最好方式就是作出具体的榜样。我们把农场送给印度人，这就使他们看到我国农业方面实行的社会主义方法是多么好，并可以加强我们同他们的友谊关系。

印度一直是那些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的领袖；而尼赫鲁奉行一种和平共处的政策。因此他是一位宝贵的朋友。我想，我们给予印度的援助，已得到尼赫鲁多次对我们表示的信任、感激和谅解作为报偿。

当然，从我们的立场看，印度的国内政治形势是复杂的。我刚才讲过我对加尔各答市的访问，那里的人民更贫困，因此更同情共产主义事业。左翼人士在加尔各答得到的选票和赢得的〔议会中的〕席位，比全国其他各地都多。但现时印度的共产党是分裂的。一个党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另一个党自称是共产党。好啦，这就是毛泽东一贯奉行的那些失去理性的政策的一个直接的结

果。他引起了印度党的分裂，而在中国武装进攻印度以后分裂扩大了。幸而，毛的政策的影响没有深入到群众之中。左翼力量再度联合起来，他们给予苏联的支持比给予中国的要多。

中印战争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同尼赫鲁的关系越来越牢固。他虽然不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但他并不只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家——他是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主义者。即使他不采纳马克思主义，他确已开始向社会主义方面作出暗示和姿态。①当然，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心里想的是哪一种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一词一直为各种不同的人们所使用，其中包括希特勒。

可是，我们极想给尼赫鲁一个机会。我们想，如果我们有耐心，尼赫鲁会自愿为印度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自然，我们竭尽所能地帮助他作出正确的选择。同时，我们谋求同印度共产党建立极为密切的联系。

由于我们在印度的特殊利益，我们对印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关系的恶化深为关切。我们对万隆会议是

① 尼赫鲁的1955年阿瓦迪决议宣布一项“社会主义类型社会”，作为印度制订国家计划的目标。

欢迎的，在那次会上周恩来和尼赫鲁为他们两国之间的和平共处奠定了基础。①但从那时起，在中印边界上就出现了令人不安的麻烦的征兆。

首先，西藏爆发了叛乱。西藏人几乎夺得了政权。②印度人采取亲西藏人的立场。他们没有直接介入，但他们同情叛乱分子。至于我们，在公开场合支持中国人，虽然我们理解尼赫鲁所处的地位。他认为在印度边界上有一个中国的西藏看起来很不舒服。

后来，在1959年中国突然对印度发动侵略性军事行动，一场武装冲突爆发了。③擅长恶骂的中国人开始骂尼赫鲁是社会主义的头号敌人。

---

① 1955年二十九个亚非国家在印度尼西亚召开的这一次会议，标志着第三世界在政治上的出现和以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共同基础的不结盟政策。

② 西藏自1950年中国军队占领这一地区时起就成为中国的一个省。1956年爆发了叛乱，起初是在东北部的部族人中间，到1959年扩展到整个地区。反华的西藏叛乱分子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企图脱离中国而独立。这一企图失败了，达赖喇嘛被迫流亡。

③ 赫鲁晓夫在这里提到的是1959年8月的朗久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印度人单方面对确定印度和西藏边界的有争议的麦克马洪线向北面进行了调整。在那里印度和中国的边防部队之间发生了一些小冲突。

就在这时我从美国访问归来。①我们只好发表一篇表示我们对中印边界冲突态度的公开声明。虽然我们觉得毛应该受到责备，我们不能谴责他发动战争。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毕竟比印度更接近我们。同时，我们知道尼赫鲁是一个明白事理和热爱和平的人。即使他是一个军国主义者，他也会相当现实地知道，印度要进攻中国，那是太弱了。这种进攻是注定要失败的。

简言之，我们不愿称任何一方为侵略者。在我们通过塔斯社发表的声明中，我们采取的立场是：一场误会导致了我们的印度朋友同我们的中国兄弟之间的意外的战争。我们表示遗憾，并呼吁双方进行停战谈判和恢复友好关系。我们事先知道我们的声明是不会受到北京欢迎的。

虽然我刚从华盛顿回国，我在领导核心内的同志们告诉我：我必须集中精力并立刻飞往北京，代表苏联共产党同中国领导进行谈判。大家都同意我是能领导我们代表团的唯一的人。为什么？因为那时中国人正好在庆祝他们的国庆节，②除非我作为党的首脑去参加，中国人就会认为我们故意贬低他们在国际革命运动中的作用。

---

① 赫鲁晓夫于1959年秋首次访美结束后立即对北京进行这最后的一次访问。

② 1949年10月1日共产党人在大陆取得胜利的十周年纪念日。

我飞到北京，在机场上迎接我的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和陈毅。表面上每人都极有礼貌，但我能感到他们对苏联和我个人充满着愤怒。

我相信是毛本人挑起同印度的纠纷的。他发动了同印度的战争，此刻他想把苏联拖进这一场冲突。在这里毛企图指挥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就象斯大林在他之前曾做过的一样。这里再次出现一个个人的独裁在冒充无产阶级专政。

毛没有正面出来谈我所怀疑的事。照例，他自己是决不同我讨论不愉快的问题的。当我们着手工作时，他总是选定另外一个人代替他说话。这一次，中国方面决定放出陈毅来攻击我。谈判一下子就激昂和紧张起来。陈毅是极其粗鲁的。我不知道他的粗鲁是有意的政治行动，还是一种性格特征。

中国人开始质问我，苏联为何发表这样一个关于中印边界冲突的声明。毛讲了一两件反对我们的政策的事，但除了陈毅外，别人多半是沉默。显然，他们事先安排好了自己的角色。陈毅只差没有直接批评我国的领导，但他对我们的好朋友尼赫鲁加以各种各样的恶骂。

"你们怎么能发表这样一个声明？"他开口就说。"你们不知道尼赫鲁不过是美帝国主义的代理人吗？你们不知道如果印度的进步力量要取胜，尼赫鲁必须被排除掉吗？"我确已忘记陈毅骂了尼赫鲁一些什么话，但这又有

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要重复中国字典里的骂人话呢？谁对此真正感到兴趣，只要看一下那个时期的中国报纸就行了。

我们告诉陈毅，“我们对尼赫鲁先生的评价有点不同。他即使是个资产阶级政治家，但除共产党外，他是印度最进步的领导人。他的政策一直是坚决主张中立和反帝的，他与巴基斯坦不一样，没有同美国人签订任何条约。如果尼赫鲁被推翻了，你可以相信：更反动的势力将要掌权。因此，为什么要同尼赫鲁疏远或削弱他在自己国内的地位呢？”

这时中国人指出，既然我们两国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同印度那样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的任何冲突中，苏联有义务站在中国一边。

我回答说，由于领土的争执而发动战争是不值得的。我给他们举了一些例子，说明我们是怎样和平地解决我们自己同土耳其和伊朗的边界争端的。

“解决问题的方法是外交，不是战争，”我说。“况且，你们为之战斗的土地是在西藏的人口稀少的高山上。为这样一些小块的荒凉高地真的值得流血吗？这么些年来你们不打仗也过去了。这边界是几十年前确定的。①为什么等到现在才拿它来小题大做？”

---

① 西藏—印度边界是英国在1914年用所谓麦克马洪线确定的。

“你说的完全不对，”陈毅说。“我们需要那块土地，于法于理它都是属于我们的。英国人把它从我们的手里夺去时，印度还是他们的殖民地。”

“也许是这样，”我回答，“但从那时以来，印度已从英国殖民压迫下获得解放，就象中国已从外国统治下获得解放一样。中国和印度都参加了同当今世界上的地主和资本家剥削者作斗争的那些国家的行列。那么，你们为什么要用战争去解决你们之间的争论？”

我告诉中国人，他们应当宽容些，应当理解尼赫鲁的处境。“你们看，”我说。“西藏正好在印度的边界上。你们难道不理解，印度人认为有一个独立的邻居是至为重要的吗？西藏是一个很弱的地区，本身不能对印度构成任何威胁。可是，一个属于中国的西藏就会对印度构成威胁。你们不能理解这一点吗？”

中国人顽固地坚持说要战斗到底——在印度被打败以前，他们决不会手软。我们离开北京时对今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深感不安。

印度人那时已能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们的态度是何等公正。他们看到，我们不怕把我们所认识到的真理告诉我们的中国兄弟——尽管在中印之间的冲突中，正义和真理在印度一边，而不在中国一边。

不久，印度政府开始同我们谈判，要购买一些米格21战斗机，并允许他们在自己国内制造这种飞机。我们知

道印度有一些反对势力，他们极力鼓吹购买美国飞机，而美国也已同意把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的蓝图交给印度。因此，我们应当作出选择：或者我们把我们的飞机卖给印度人，或者袖手旁观，看着他们被拴在美国的航空工业上。

米格—21的设计图样已不是什么军事秘密。我知道我们已把它卖给好几个国家，包括埃及和南斯拉夫。换句话说，我们的敌人已经知道有关米格—21的一切。这是件困难的事，但最后我们还是让印度人买了几架这种战斗机。①

自然，中国发疯似地扩大整个事态，并在其他兄弟共产党中进行各种各样狂热的反苏宣传。我们对其他党解释我们这一决定的理由，绝大多数接受了我们的立场——虽然你还是能找到一些人，他们断言我们做错了，说我们应当不顾同印度的关系，而只应考虑同我们的中国社会主义同志的关系。不管怎样，我们卖给印度的米格—21飞机在中印冲突中并没有起重大的作用。

不久，一场全面的战争在边界上激烈展开。②双方都投入相当大的力量，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印度人遭到的

---

① 关于米格机的谈判开始于1960年，但——主要由于英国和美国的抗议——至1962年夏才成交。

② 全面的战斗于1962年10月爆发，一直继续到11月中国人单方面宣布停战为止。

伤亡比中国人重得多。中国人曾经同蒋介石和日本人作战多年。印度作战经验较少，武器也较差。印度军队连连败北。中国人夺取了印度的领土。

战争给印度人民造成巨大的困难，并使印度共产党处于极其为难的境地。战争甚至引起党内的分裂。大多数印度共产党员支持尼赫鲁保卫祖国、反对中国侵略的政策，而另外一派——包括我亲自认识的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印共中央委员会委员——却偏袒中国。①

这时，中国人发动了一场猛烈的反对印度共产党、同时也反对苏联的宣传运动。我们的立场始终是赞成停战，双方都不争胜负。事实上战争就是那样结束的。中国和印度找到了停止战争的办法。据我回忆，中国未能达到它原定的目标。②

中印冲突以来，许多年过去了。我相信，时间已证明由塔斯社声明表达的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不那样采取行动或公开发表声明，我们只能把印度奉送给美帝国主义者。当然，我们确实也没有改善我们同中国

---

① 许多印度共产党员，包括亲莫斯科的和亲北京的，都被捕下狱。

② 中国也许从未打算侵占印度领土。赫鲁晓夫在这里指责中国人的“侵略”，不过是中国认为印度多次挑衅并入侵西藏因而给予报复的一次惩罚性的讨伐行动。有些学者认为中国还企图对印度在第三世界越来越强大和有威望的地位提出挑战。

的关系，但我们仍然并不认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会被损坏到绝望的地步。

我认为毛挑起中印冲突正是为了把苏联拖进去。他想把我们置于除了支持他以外别无选择的境地。他想成为决定我们该做什么的人。但毛以为我们会抛弃我们外交政策的独立性，那他是想错了。我们完全清楚地知道，外交政策是同国内政策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并且是以同样的意识形态原则为基础的。如果我们采取亲华反印的立场，那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也得支持中国人的百花齐放运动，支持他们的大跃进，和他们的文化革命——而那是绝不可能的。

可是，我现在不想谈这一切了。我太疲倦了。所有该说的已说了，该做的也做了。既然我对自己担任首脑时我们对中印冲突的双方所奉行的政策没有任何悔恨，还是让我们不要再谈了吧。现在我宣布，我要休息一下。①

---

① 赫鲁晓夫在叙述这些回忆的录音带上，不止一次地用类似这一段的有时正经有时开玩笑的口气来结束一个录音的章节。

第十三章　印度尼西亚和缅甸

苏　加　诺

印度尼西亚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在我担任领导时曾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它仍然值得我们注意。这个国家富饶而美丽。它有将近一亿人口。印度尼西亚人是了不起的人民，尽管他们在1965年遭到失败，他们终将赢得胜利。①

苏联经过几十年的时间才认识到印度尼西亚的重要性。在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年代里，我们集中注意于国内的政治及同我们近邻的关系，来不及考虑印度尼西亚。据我回忆，斯大林甚至从未注意过印度尼西亚。我想他对这个国家的情况，除了他在地理书里读过的内容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许知道有一些岛屿叫苏门答腊和婆罗洲，但只此而已。

斯大林死后，在万隆会议期间，我国领导人开始注意到印度尼西亚。包括尼赫鲁和周恩来在内的一些出席会

① 1965年一次左翼的武装政变没有打响，却触发了一场对共产党人及其他人士的疯狂屠杀。

议的领导人起草并签署了一份联合宣言。后来，毛和其他中国领导人骄傲地自称周是文件的起草人。当然，这是在中国发生大混乱之前。不管怎样，万隆宣言是一份好文件。苏加诺代表出席会议的印度尼西亚代表团在文件上签了字。①

因此，苏加诺作为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出现在我们眼前。不久，他的名字就开始在报纸上和广播中频繁出现。我们主席团的成员通过塔斯社根据全世界报纸的文章提供给我们的报告，注意着他的活动。塔斯社收集了大量材料，我们自己怎么也无法仔细阅读。我们每人都有一些助手帮助选择我们感兴趣的内容。

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得知苏加诺奉行着中立主义的政策，并因此而提高了他的声望。我们读到，他同南斯拉夫建立了良好的关系，那时南斯拉夫正用一种比较变通的方式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给我们留下的后果之一是，当时我国在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方面还存在着某些不必要的和不正确的东西，即后来在党的第二十次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受到揭露和谴责的斯大林主义错误的某些残余。因此，南斯拉夫作为比苏联更自由的国家，把苏加诺首先吸引过去了。

---

① 苏加诺总统在宣布1955年万隆会议开幕时斥责了殖民主义，并宣告亚非国家“不再是别人的工具和他们不能影响的势力的玩物了。”

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印度尼西亚也逐渐靠近苏联。我们建立了经济联系，并帮助印尼人开采他们的天然资源。我们终于相当熟悉了苏加诺。他给我们的印象是一个好人，受过充分的教育，很有才智。才智和教育并不总是伴随在一起的。我认识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没有头脑；我也认识一些没有受过正式教育的人，却很有头脑。苏加诺既受过学校教育，又有头脑。当然，他有他的一些弱点。我们并不总是同意他在取得他所要的东西时所采用的策略，而且他的有些行动简直是费解的。但这对于一个资产阶级领导人讲来也是可以预料的。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我同苏加诺和印度尼西亚接触的某些细节。

我们曾希望得到访问印度尼西亚的邀请，后来邀请来了。我被指定率领我国代表团。在我的所有的正式访问中，葛罗米柯同志通常都陪同我。我们乘了一架伊尔—18飞机向印度尼西亚飞去。途中我们在印度和缅甸作短暂停留，最后在苏门答腊岛上着陆。①

我们受到广大人群和盛大仪式的欢迎，这些安排同我们一行的身分相当。苏加诺总统欢迎我们到印度尼西亚来。他显然喜欢盛大的仪式和场面。他身上有一种做作的味道。这是我方才谈到的他身上的弱点之一。例如，当印尼政府开始要求我们提供经济援助时，苏加诺好

---

① 1960年，赫鲁晓夫在印度尼西亚度过了十二天。

象特别急于要我们帮他建造一座巨大的体育馆。我颇为惊奇。盖一座华丽的体育馆，对于象印度尼西亚这样落后的国家来说，似乎是浪费金钱。

“你为什么要一座体育馆呢？”我问苏加诺。

“用来召开群众大会，”他说。

我们把他所要的技术人员和贷款都给了他，当我到达印度尼西亚时，苏加诺领我去看工程进行的情况。他要公众知道他也参加了劳动，就从我们中拉了两人拿着一把风铆机装模作样地照像。苏加诺身上有一种做作的味道，坦白说，这降低了他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当然，尼赫鲁也发表演说和出席公众集会，但尼赫鲁决不会因为要多有一点听众而花费巨大的开支去建造一座体育馆。

我记起了苏加诺喜爱盛大仪式和豪华场面的另一个例子。在我们到达雅加达后，他提议说，“我们为什么不去游览一下，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将在村子里组织一个欢迎会，并请你观看印度尼西亚民间艺术的演出。”

我同意了。不久，该出发的时间到了，但苏加诺迟迟不来邀我。我等了又等。最后，苏加诺来找我了，我们乘车出城。这时我才领会引起耽搁的原因。苏加诺安排了一些农民排列在从雅加达到村子的路旁，在我们经过时欢呼和挥手。我完全不喜欢这种做法。我承认，在我担

任领导时，我们也经常这样欢迎我们的客人，有时参加的人们并不是自愿的。然而，我不赞成用这种方式欢迎正式的访问者。

在苏加诺和我乘车途中，直到我们到达一个小小的村子以前，他不给我走出汽车的机会。房屋和村民的悲惨景象使我震惊。人们住的是竹窝棚，睡在破布堆上，根本没有床。站在周围的妇女只穿着破烂的裙子。她们没有上衣，只在腰部以下遮着点儿东西。她们的乳房是完全裸露的。她们中有些人抱着婴儿。我记得一个妇女正在给她胸前的婴儿喂奶。她并不象诗人描写的女人那么年轻和美丽。我记得《战争与和平》中有这么一节，托尔斯泰讲到所有年轻人的眼睛都不能离开海伦娜·库拉金娜的可爱的身姿和肉感的乳房。我访问的这个印度尼西亚村子里没有这样的女人。相反，只是一派难看和不愉快的景象。我为这些可怜的人们感到难过。

我们乘车继续往前走了一段，到达一个镇，这里为我们举行了一次赛会。这是表现一个人的一生的群众行列。最初过来的一群人里有一个初生的婴儿，随后是婚礼的队伍，最后是葬礼。赛会使我想起我在童年时经常在农民屋里的墙上看到的瑟京的一幅版画，名为“人从出生至死的一生”。①参加赛会的人们穿着华丽的服装，他

① I·D·瑟京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出版家和石印画家。

们看上去都相当幸福。也许只有富裕的人们才能参加赛会。可是一般说来，印尼人给我的印象是极端的贫穷。幸而他们住在暖和的地带，在他们的头上只需要一张屋顶挡住阳光和雨水就够了。

我个人觉得这里的气候几乎热得难以忍受，潮湿，很不舒服。这里到处有风扇——卧室里，餐室里，开会的大厅里——但还是热得闷人。我感到自己好象一直都耽在蒸气浴室里一样。我的内衣粘在身上了，而且几乎不可能进行呼吸了。最糟糕的是，这里到处是蚊子，阻挡蚊子的唯一办法是在身上戴一层网。总而言之，我认为印度尼西亚是难于使一个欧洲人、特别是难于使一个从欧洲北部的俄罗斯来的人适应的。

在这一点上，我望着苏加诺呆住了。他一点也不出汗，而我却滴着汗水。一天，我们要乘飞机到一个地方去。飞机一起飞，上升到它正常飞行的高度时，空气就变冷了，我感到好象回到祖国的环境中。我又能自由自在地呼吸了。我瞧了一下苏加诺，看到他已把他能抓到的每一件衣服都裹在身上，而且还在发抖。

"您怎么啦？"我问。

"我冻坏了，"他说。"你怎么受得住这么冷？"

这只是表明：凡事在于习惯。

虽然我觉得暑气逼人和空气闷热，我认为印度尼西亚的风光和自然景色是美丽的。我特别记得茂物周围的

地方，苏加诺总统在茂物有一座宫殿。①这座建筑物原是印度尼西亚前总督、一个荷兰人的官邸。它宽敞而豪华，甚至大大超过克里木的莉瓦季娅宫；它的周围是按英国方式修整的广阔的草地。②草长得真绿，使我想起我童年时在复活节前后看到的农民庆祝会，那时自然界到处生意盎然，人们因冬天过去而充满欢乐。

我感到茂物周围的自然现象有着某种有节奏的变化。在下午三点钟经常下一场一小时左右的热带暴雨。过后，太阳就出来照着水珠在青草上闪耀。有时，好些鹿会从森林里出来，到草地上吃草。也有另外一些更稀有的动物。我看到一些黑的东西悬挂在树上。我问这是什么，人们告诉我，“等会儿就知道。五点钟左右它们就飞走了。”

这是飞狐——有点象我国的蝙蝠。它们是夜间出来的动物，当它们在夜空中飞动时，看上去象乌鸦一样黑，只是大些。我问：它们吃什么，人们告诉我：农民把它们

---

① 茂物是苏加诺经常去度周末的地方，在首都雅加达南面四十英里。

② 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而独立是在1945年宣布的，但荷兰人直到1949年12月才承认这一新生国家的主权。莉瓦季娅宫是沙皇在雅尔塔的一个海边避暑处，也是1945年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谈判的地方。赫鲁晓夫说，在1948年斯大林召他来克里木度假时他曾在莉瓦季娅宫住过一些时候。

看作灾害，因为它们袭击果树，把果子吃得一个不剩。

我穿过宫殿附近的树林时，看见两只大猿——我想是猩猩——用链子拴在一棵树上。我走近去看看。它们只是坐在那里，脸上露出忧郁的表情。它们好象安于自己所处的不幸境地。我为它们感到难过。后来，我对苏加诺说，"你们为什么把两只猿拴在那边？这造成很坏的影响。"我忘了他怎么回答，但他没有处理猿的事。

离宫殿不远有一座自然博物馆。他们给我一个机会去那里观光一番，我高兴地接受了。人们告诉我博物馆的创办人是一个德国人，他在印度尼西亚化了许多年搜集爬虫、昆虫和其他动物。那里有各种各样的蝴蝶——一切能想象到的颜色的蝴蝶。我的儿子谢辽沙在收集蝴蝶，他要求我从我访问的各个国家给他带一些蝴蝶回去。① 我经常要求我的警卫员给我捉几个，他们又去要求印度尼西亚的保卫人员。于是，这些警卫员晚上就拿着网到处跑，随后拿来一些有趣的标本。当苏加诺总统知道我的儿子在收集蝴蝶时，他也开始跑来跑去地捉蝴蝶。我亲眼看到他去捉。他的脾气很好，我们开玩笑说，

---

① 1960年赫鲁晓夫在亚洲旅行时，他的儿子谢尔盖同他在一起，当时在一起的还有他的女儿尤莉娅和拉达，以及拉达的丈夫、《消息报》主编阿·伊·阿朱别伊。在赫鲁晓夫当权的最后几年中，这个家族集团一直伴同他在国外旅行。

印度尼西亚总统去给赫鲁晓夫的儿子捕蝴蝶，他也不介意。

苏加诺安排我们乘飞机到一座岛上去，他要我们到那里去看地球上最大的蜥蜴。①它们看上去象神话中的飞龙或史前的恐龙。我们站在旁边，看它们在一块凹地里猖狂地爬来爬去，吞食一具动物的尸体。也许有些人喜欢这种东西，我可没有什么兴趣。以后，我曾看过一部优秀的法国纪录影片，其中介绍这些离奇的动物在它们原来生长地的情况。

我在印度尼西亚的旅行也包括许多会见、出席群众大会和演说。苏加诺是一个很好的演说家，他显然爱好当众演说。我也发表了一些讲话。我特别记得其中的一次。那是在一座由一个世袭的土王统治的岛上，那里的政府建立了一个什么教育机构，或者是一所工业学院，或者是一所大学。

我们安排了关于我们将要进行的政治性活动的日程，并事先确定了我的全部演说的题目。我利用对印度尼西亚大学生演说的机会，宣布在莫斯科新建一所大学，给从殖民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来接受教育。我们为这所大学化了大笔款项，但这是值得的。后来，它以卢蒙巴的名字命名；他是被殖民主义者野蛮地谋杀的，他由

---

① 科莫多岛是所谓科莫多飞龙的原产地。

于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在他的人民的心目中已成为一种象征。①

我们建立这所大学的主要考虑是：美国、英国和法国都在培养它们自己的殖民地的干部，这样它们就有了一批青年的后备力量，将来可以依靠他们推行殖民主义政策。我们认为，需要有一所学校培养反殖民主义的干部，熟悉苏联文化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干部。作为一个最近从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国家，印度尼西亚看来是宣布我们计划的合适的地方。

我在雅加达参加了许多宴会，人们向我介绍了一些我以前从未吃过的奇异的食品。我对一种叫榴莲的水果特别感兴趣。它象胡桃；有一层很厚象肉似的皮，外边包着一层多刺的壳，但它比胡桃大得多，大约有十公分长。果子的里面是淡黄色的。人们第一次把榴莲递给我时，我发现坐在我旁边的印尼人在微笑，彼此窃窃私语，好象有一件滑稽的事就要发生似的。苏加诺拿了一只榴莲咬了一口，然后把它递给我。我拿过来朝嘴里送去，突然一股恶臭、令人欲呕的气味直冲脑门——这气味象臭肉一样。可是，苏加诺已吃过它了，我要是连尝也不

---

① 帕特利斯·卢蒙巴，刚果民族运动的领袖和刚果的第一任总理，在1961年1月被杀害。

在访问日惹市时，赫鲁晓夫对卡渣马达大学的学生发表了演说。

尝，那是不礼貌的。我不能说那味道很好吃，但还可以容忍——你只要捏住鼻子不去闻就行了。人们告诉我，给我的那只榴莲的气味，同新剥了皮的榴莲散发出来的臭气相比起来算不了什么。印尼人常在厨房里把榴莲剥了皮放在旁边，直到最浓的恶臭散去。

我决定请我在莫斯科的朋友们吃吃这种外国美味。我们刚刚建立了莫斯科和雅加达之间的定期航线，于是我告诉我的警卫人员送几盒榴莲给所有的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由于我们的飞机飞回莫斯科时要经过新德里和喀布尔，我指示也送几盒给尼赫鲁和阿富汗国王。

后来，尼赫鲁和国王对我表示感谢，但说：他们不得不把我送去的果子扔掉，因为那是坏了的。我的主席团的同志们也是这样告诉我。我笑了，并回答说，果子根本没坏——它本来就是臭的。

我在印度尼西亚时，有一次苏加诺领我到万隆去了几天，那是召开万隆会议的地方。这地方是印度尼西亚统治阶级内政治家们经常去的。我不知道是否一般的人能去访问那里。万隆是在高山上。由于海拔高，气候相当凉爽。

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苏加诺说，“赫鲁晓夫先生，我知道您是个无神论者，我也不信上帝；但我们得忍耐些，因为根据印度尼西亚的传统，本地的祭司要在这里欢迎我们。岛上的居民分成两个教派，所以有两个祭司。他

们要念祷文，并举行仪式，但他们不会碰我们。如果你不介意，我将感激你经受这个过程，因为它能给人民一个良好的印象——这有助于树立你的形象，也有助于树立我的形象。”

我说我不介意。我有点好奇，想瞧瞧是怎么回事。首先，一个祭司开始用印尼语喃喃地念些什么。听起来他真象我们的正教会的牧师。然后，别人也跟着他念，整个仪式发出的声音象一群琴鸟求偶的叫声。我脚下的沥青烫得我象站在油锅上一样。我试着先用一只脚站，再换另一只脚站。两名祭司还是嗡嗡地不断哼着。我瞧了苏加诺一眼。他耐心地站着。正如我已说过的，他热惯了，也许他的鞋比我的更能防热。我悄悄地对苏加诺的译员说，“这仪式不能缩短吗?”他把我的请求转告苏加诺。苏加诺做了一个手势，在几分钟内两名祭司结束了仪式，向我们赐了福，就走了。

我们在万隆期间，举行过一些有管弦乐队演奏本地音乐的宴会。苏加诺是一个很爱交际的人。他爱跳舞。他太爱跳舞了，所以他一定要别人也都跳。我不是说我决不跳舞——只是我不知道怎么跳。当我是青年时，我因为太害羞了，所以不跳，但喜欢看别人跳，即使我站在一边，心里总是想参加的。我知道的唯一的舞是我年轻时在顿巴斯流行的那种舞。大家手拉着手围成一个圈子跳。我们也经常有男女成对地跳的舞，但我不喜欢那些

舞。我认为那些舞是无聊的。

在万隆的第一夜，苏加诺一直跳到快要倒下了才停住。第二夜我事先告诉他，“总统先生，今晚我不参加了；我累了，而且我实在不喜欢跳。”

“你一定得跳！你不参加别人要生气的。”但他脸上露着微笑，我可以说，他以为我一定是说着玩的。

后来，当人们搬动桌椅以便在房间里布置成一个舞池时，我说，“总统先生，我不希望这里有任何误解。早些时候我告诉你，我确实累得不能跳了，这话是真的。我现在要去休息了。”

他露出惊奇的表情看着我，向我道了晚安，就走开了。我去睡了，但我们代表团的其余成员都留着。我相信葛罗米柯是我们这边的第一号跳舞能手。

我们还带着两位医生。一位是马尔科夫同志，第四医务司——即负责克里姆林宫医务的司长。他是一位好同志和好医生。我记得他是耳鼻喉科专家。我们怕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在热带气候下可能会发生呼吸道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成员中包括了一位医生，事实证明我们太谨慎了。①我们的另一位医生是女的。当我们在万隆时，她陪着我们代表团的部分成员到海滨去了，离我们大约五十公里。

---

① A·M·马尔科夫教授，苏联卫生部的高级官员，赫鲁晓夫在国外旅行时的主要医生。

第二天早晨在吃早餐时，我注意到苏加诺大约到我醒来时才结束跳舞，因此看上去好象得了感冒一样。“总统先生，”我开玩笑地说，“你显然需要医生的帮助。你已看到过马尔科夫同志，但我们还有另一位医生——一位漂亮的女人。她现在不在这里。她同我们代表团的其余成员一起到海滨去了。”

“真的吗？”他凑过耳朵来。

大概到午餐时，我得知马尔科夫同志被派到海滨去了，虽然他是陪同我们代表团的高级医务人员，而那位女医生则被带到了万隆。苏加诺不会计较谁比谁的地位高，而马尔科夫表现了骑士精神，把自己的位置让给了女同事。那一晚，她在那里同苏加诺总统一起跳舞。后来，我跟她开玩笑，问她同印度尼西亚总统跳舞觉得怎样。她微笑着说，“他很有风趣。”从她的声音中，我能听到一种自鸣得意的口气。她显然感到好象自己正在青云直上似的。

可是，苏加诺决不只是同一个女人跳舞。他简直同看到的每一个女人跳舞。即使女孩子最初拒绝了，他也要逼着她到舞池中去——虽然他总是做得很斯文，很圆通。我不能不感到苏加诺有酷爱跳舞的弱点。一方面，他实在是个好主人。另一方面，在我看来他有点过分热衷于这种娱乐。他的弱点，并不只是酷爱同女人跳舞。他爱女人。对于女人他总是感到不满足。他的名声很

臭。他简直不能控制他对女人的热情。我在塔斯社为党和政府领导人整理的专门报告中读到过他的弱点。有些人对我解释说，苏加诺对女人的行为是穆斯林的典型。另一些人说这是他个人的特殊素质。不管哪种说法是可信的，他的敌人都为此挖苦他。

我们难于理解一个有着这种习气的人怎么能被允许担任这一崇高和责任重大的职位。他同女人的事的确使他在国际上丢丑，我想在他自己国内，别人也利用这些事来反对他，虽然人们告诉我，穆斯林对这种事是假装不见的。

不管怎样，我亲自看到苏加诺这一特性的大量证据。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观看演出，一群可爱的女孩子出场，开始跳舞。苏加诺转过身来问我，"您最喜欢哪一个？"

"我都喜欢。她们是非常美丽的青年妇女。"接着我又说，"我认为她们穿得也很漂亮。"

"唔，我喜欢那边的一个。"

"对，她很吸引人，但其他的也一样。"我企图用一种有礼貌的方式让他知道我不想继续这方面的交谈，但苏加诺对这种谈话是不会厌烦的。

另一次，他和我到一些池塘附近散步。他发现不远处有一个女人在给自己和孩子洗澡。我看出她没有穿游泳衣。苏加诺立即朝她走去。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阻止，但苏加诺说，"哦，别担心。这里，在印度尼西亚，这

完全没关系。”

我走开去，隔着一段距离看着，他走近女人，从她手里接过孩子，同她谈了一会儿。然后再走到我这边来。

“这算什么呀？”我问他。“在我们国家里，我们认为一个男人走近一个抱着婴儿的裸体女人是下流的。你不知道我们的代表团里也有妇女，这会使她们非常生气吗？”

“我只是想抱一抱那婴儿，”他说。他只说了这一句。我完全知道他实在想仔细地就近观察这个一丝不挂的女人。他还企图使我相信印度尼西亚的女人不在乎男人看见她们不穿衣服。但我想，这件事与其说反映了印度尼西亚的社会风俗，不如说反映了苏加诺的个人特性。

可是，我不希望造成错误的印象。我希望读我的回忆录的人们得出正确的结论。象我们大家一样，苏加诺也有某些人性上的弱点，但一般说来，我非常喜欢他，非常尊敬他在印度尼西亚的政治发展中所起的勇敢的、令人钦佩的作用。后来，在屠杀事件以后，苏加诺的境遇十分悲惨。他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他被剥夺了影响政治的能力。然而，他仍旧发表有利于(共产)党继续参加政府的公开声明。虽然现在他已被从政治舞台上完全除掉，并被隔离，我至今仍然赞赏他所作的有益贡献。①

① 1965年10月的未遂武装政变使力量对比大大地不利于苏加诺；1966年3月他被迫把政权移交给苏哈托将军。苏加诺一直被软禁到1970年死去。

艾　地

苏加诺发动一场把西伊里安并入印度尼西亚的运动。①我们〔在道义上〕支持他并不是秘密。我们发表公开声明，赞成印度尼西亚从殖民统治下解放自己领土的斗争。但随着局势日益紧张，我们看到苏加诺可能也需要物质援助。

苏加诺威胁说，如果荷兰拒绝谈判，他就要用武力夺取西伊里安。我了解了苏加诺所作的军事准备，于是决定表明我们的态度。我们是通过某些进步的、同苏加诺关系密切的印度尼西亚将军这么做的。他不知道这些将军中有一些甚至是共产党员。他们既向国家总统苏加诺报告，也向印度尼西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艾地同志报告。②

我应该在这里说一说共产党在印度尼西亚生活中的作用。我忘了苏加诺自己加入哪个党，不过这没关系，因为他站在一切政党之外和之上。可是，在苏加诺的一生中——事实上直至他生命的悲惨结束——他对共产党保持正确的态度。在他的领导下，党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

---

① 1962 年苏加诺开始坚持他对荷属西新几内亚即西伊里安的要求，自从 1949 年印度尼西亚脱离荷兰而独立并得到承认以来，该地区的地位一直未解决。

② 迪·努·艾地，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表，苏加诺甚至把艾地包括在他的政府中。我的印象是印度尼西亚政治局由忠实于马列主义理想的坚强的、勇敢的人们所组成。

帝国主义阵营和富裕的印尼人竭尽所能来毁谤共产党。可是，苏加诺——虽然他自己不接受党的社会主义纲领——认识到共产党在工人和农民中已赢得广泛的支持。因此，他不屈服于反动的、反民主势力的压力。

正如我已指出的，印度尼西亚武装部队中有大量的指挥官是党员或共产主义的同情者。这一事实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威信。

苏加诺同军队之间的关系有些紧张。我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期间亲自感觉到了这种紧张关系。我记得在一次宴会上有人告诉我：如果我为空军首长敬酒，那是很好的，于是我站起来敬了一杯。①大家鼓掌，但我一坐下，苏加诺立刻跳起来提议为纳苏蒂安将军干杯。②我感到苏加诺对我的〔为达尼将军〕敬酒不太高兴。当我讲到空军首长的名字时，我甚至看到他的脸色有些吃惊。可以说，他显然决定，用他自己对纳苏蒂安将军敬酒来平衡我的

① 空军参谋长、空军中将奥马尔·达尼是赫鲁晓夫认为属于"共产主义的同情者"的那些军官之一。1965年他密切地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合作，为流产的左翼暴动提供来自共产党中国的武器。

② 阿卜杜勒·哈里斯·纳苏蒂安将军，部长级陆军参谋长。

敬酒。

这件事使我想到纳苏蒂安将军所占有的特殊地位。他不只是参谋长。他还是有影响的政治人物，苏加诺对待他十分小心谨慎和尊敬。我记得纳苏蒂安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人——四十岁左右——整洁，漂亮，聪明。在我同他的交谈中，不论对我还是对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他表面上从未流露任何失礼之处。但他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同情共产主义事业。在他的假面具背后，他是党的敌人。

而且，我们有理由怀疑纳苏蒂安将军在秘密地帮助某种企图把印度尼西亚引向资本主义的亲美势力。例如，我们的情报机构知道美国正在把武器供应给阴谋推翻苏加诺的右翼反叛分子。政府军俘获了一名叛乱分子的领导人，他也是美国间谍。后来，我们从我们的情报机构中获悉，当苏加诺在国外时——我想是在日本——囚犯已按纳苏蒂安的命令获释了。①苏加诺好动；他在国外度过

---

① 赫鲁晓夫在这里显然是指美国飞行员艾伦·劳伦斯·波普事件，1958年他驾驶的 B—26 轰炸机在为反苏加诺总统的一次叛乱提供空中掩护时被击落。波普被俘，并被判死刑。他是受美国中央情报局雇佣的，但美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霍华德·琼斯说：波普是“为了追求名利受雇用而被牵连的美国平民。”仅在波普被击落前三天，艾森豪威尔总统否认美国支持叛乱。1962年，在罗伯特·肯尼迪访问印度尼西亚并请求苏加诺释放波普之后六个月，波普获释，但对他的死刑判决仍在上诉中。

的时间比在他自己国内的要多。他从东京飞到莫斯科来同我们进行私下会谈。那时，我们得到情报说，纳苏蒂安将军正在准备发起武装政变推翻苏加诺。

“总统先生，”我说，“你是否知道你们的军队俘获了一名反叛分子的领导人，但此人似乎由于美国情报机关方面的压力而已被释放？你是否知道纳苏蒂安将军在这次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苏加诺在回答前踌躇了片刻。“是的，”他最后说，“这一切我都知道。事实上，纳苏蒂安是按照我的指示做的。我们释放这个人有我们自己的理由。”

“好，我只是想把我们得到的情报告诉您。”

我还能说什么呢。我知道苏加诺没有对我说真话，我想我懂得为什么。他认为对我撒一个谎比承认他自己的一名军官擅自行动要好。换句话说，苏加诺是在维护他的威信和他作为总统的尊严。他感谢我的关心，并要求我继续把我认为对他有用的任何新情况告诉他。

当我感到对苏加诺争取从荷兰殖民主义统治下解放西伊里安的斗争提供物质援助的时机已来到时，纳苏蒂安结果成了有用的人。他多次来莫斯科，其中一次他同我们签订了一项取得军事援助的协定。①我们用贷款卖

---

① 1961年1月，当时的国防部长和参谋长纳苏蒂安将军率领一个谋求取得武器的代表团去莫斯科，同米高扬和马利诺夫斯基进行了谈判。

给印度尼西亚一艘巡洋舰，一些驱逐舰、潜水艇、巡逻艇、火箭炮、鱼雷、高射炮、战斗机和图—16轰炸机。我们也同意派一些我国最优秀的海军专家和军事顾问去印度尼西亚，因为苏加诺告诉我们，他自己缺乏足够的受过训练的人员。

在我们同纳苏蒂安的交往中，他始终巧妙地掩盖着他的亲美立场。我国的军事人员对他估价很高。但我们不断得到有关他的情报，只能证实我的怀疑。我知道艾地同志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人并不信任他。同时我认为苏加诺也不信任他。

纳苏蒂安并不是我们对其有疑虑的唯一的印度尼西亚政治人物。我们同样有理由怀疑苏加诺的外交部长，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也在玩弄两面手法——一面为政府工作，一面秘密地同苏加诺的敌人勾结。①

〔苏班德里约〕是苏加诺的得力助手之一。他曾多年担任驻莫斯科大使。我记得他接替了马利克。根据我们的情报，马利克是站在反对加强苏联和印度尼西亚关系的反动资本主义势力一边的。②

---

① 这是指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他曾参加赫鲁晓夫同苏加诺1960年在茂物的谈判。

② 苏班德里约在1954年担任印度尼西亚驻莫斯科首任大使。1956年他回到印度尼西亚，1957年担任外交部长。亚当·马利克自1959年至1962年担任驻苏大使。

至于〔苏班德里约〕，他是我们的朋友。他不是共产党员，但，据我们的情报，他是共产主义的同情者。他有一个漂亮的妻子，是个歌唱家或演员。她在莫斯科的夫人圈子里极受欢迎，因为她能唱俄罗斯歌曲。他回到雅加达领导外交部后，曾以苏加诺对外政策主要顾问的身分多次访问苏联。

正当印度尼西亚同荷兰关于西伊里安的争议尖锐化时，他来看我。他说他有苏加诺总统的一个口信。他能讲俄语，所以我同他谈话不用译员。我们一对一地面谈，自由地——我想是推心置腹地——交换意见。他告诉我，荷兰人正在把军事力量集中在西伊里安地区，荷兰也许要为控制该岛而作战。

我说，"好，如果你们不能取胜……"

〔赫鲁晓夫的叙述至此中断。根据下文推测，似乎是苏班德里约告诉赫鲁晓夫，如果苏联不帮助印度尼西亚，荷兰人就有相当把握赢得战争。苏班德里约也许随后得到赫鲁晓夫的保证：在反对荷兰海军的战争中苏联将派遣军事人员到印度尼西亚使用由苏联提供给苏加诺的舰只、飞机和其他武器。正如赫鲁晓夫在下面指出的那样，后来克里姆林宫得到情报：苏班德里约——大概是根据苏加诺的指示——把赫鲁晓夫的保证告诉了美国，从而出卖了苏班德里约同赫鲁晓夫谈判的机密。〕

我有这种强烈的印象：〔苏班德里约把苏联的诺言泄

露给美国人〕是根据苏加诺的命令。苏加诺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他是要美国知道，印度尼西亚有足够的手段对付荷兰的海军——因为有俄国飞行员驾驶印度尼西亚的飞机和俄国军官操纵印度尼西亚的潜水艇。我想，苏加诺使〔美国〕知道这一情报，是希望美国运用自己的影响促使荷兰通过谈判解决，从而避免作战。这就是苏加诺玩弄的花样。

美国为什么要对荷兰施加压力呢？首先，如果荷兰海军被苏联军官指挥的印度尼西亚飞机和潜水艇歼灭，美国作为荷兰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同盟国处境将非常尴尬。而且，美国不希望因出面支持荷兰殖民主义者压迫一个弱小的发展中民族而沾污自己的手。①

这样，苏加诺聪明地利用了苏美两国，达到他迫使荷兰退却的目的。换言之，他是使两强相争，坐收渔利。可是我要说，我们认为他事先不把自己的意图告诉我们是错误的。不管什么情况，美国人在继续公开支持荷兰人的同时，显然在幕后给他们以压力。结果，荷兰只好谈判，并同意在举行某种公民投票后把西伊里安交给印度尼西亚。苏加诺一枪未发就达到了他的目的。由于避免了武装冲突，一直在训练印度尼西亚人的我国顾问已不

① 即西伊里安人民。1962年8月，在联合国主持下，荷兰同印度尼西亚签订了一项允许印度尼西亚对西伊里安（新几内亚）实施行政管理权的条约。

再需要，所以他们回国了。

这样，由于我国外交和军事上的援助，西伊里安同印度尼西亚合并了。后来我们得到消息说，西伊里安的人民原来相当落后，那里的情况并不顺利。印度尼西亚政府开始遇到困难，也许这是由于荷兰和美国间谍的煽动。后来，苏加诺又发动把印尼人叫做加里曼丹的婆罗洲岛并入印度尼西亚的运动。他没有达到这个目的，因为印度尼西亚发生了军事政变，苏加诺垮台了。

那时我已退休，但我一直从报纸上注意着情况的发展。外交部长〔苏班德里约〕下台了。他被逮捕，并被判死刑。当我读到他在受审时的表现时，我感到厌恶。他哀求法官饶他的命。他自称在苏加诺迅速搞掉反动的穆斯林政党时，他〔苏班德里约〕曾是反对政府这项行动的告密者。所以，我们对他玩弄两面手法的估计是正确的。①

我听到关于艾地同志命运的详情时，感到更加难过。在1965年悲剧性的事变的最初日子里，艾地躲了起来，并设法长时间地转入地下。后来波兰报纸报道，印度尼西亚士兵在密林中抓到了他，并就地把他杀害了。②

---

① 苏班德里约在1967年因叛国罪被判死刑，可是后来改为无期徒刑。马利克接替他担任外交部长。

② 早先曾谣传艾地已逃入中国，实际上他在1965年11月被一队士兵俘获后被处决。赫鲁晓夫在这里说到的“事变”就是右翼分子的反政变和对数万左翼分子的屠杀。

政变的真正原因是什么？资产阶级报刊断言：发生政变是由于共产党图谋起事和夺取政权以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我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否定这个说法，因为那时我已退休，而我们苏联的报刊对这一事件没有明确加以报道。可是，根据我所知道的和我从广播中听到的情况，我个人认为印度尼西亚共产党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是因为它的领导人听从了毛泽东的意见。艾地是个好党员，但他缺乏意志和常识。他和他的同志们相信一切正确的共产主义口号，但他们的党还不成熟，准备不够。因此，他们很容易受到了中国的影响。

我记得1960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世界共产党会议上，①艾地似乎太灵活了，以至牺牲了他的原则。他发表了一个不痛不痒的演说，既不赞成也不反对中国当时奉行的政策。他没有在会议的决议上签名。

不久，中国开始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施加强大的影响。这几个国家都有为数众多的中国居民和中国商人经营的大公司。我听说有一、两名印度尼西亚政治局委员是中国血统，他们赞成中国的观点。

我清楚地记得我同艾地的最后一次会见。那是在1964年，我退休的那一年。我向他指出，中国人损害了国

---

① 这是1960年的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会上中苏分裂首次公开化。

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他们奉行的不是真正的阶级政策，他们的思想充满着托派原理。(在进行这些谈话时波诺马廖夫在场。)①当我把我们的观点告诉艾地，并试图使他理解1960年莫斯科会议决议中的论点时，他只是坐在那儿看着我，点头表示同意。他的同意带有显然被动的样子。他没有把他的看法告诉我们，但我能完全清楚地看出，他是严重地倾向于中国立场的。我们分手之后，他走了。他飞离莫斯科取道北京回国。我担心他抵挡不住毛的进攻——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同他谈话的原因——结果我想对了。中国人张着双臂欢迎他。他们实际上是宣判他死刑，只有中国人才会这样做；我们帮不了忙。我们只好站在一边，看着中国人得意地夸耀艾地如何坚定地支持中国的立场。

我必须公正地评价艾地，他是被引入歧途的，他同他的同志们一道受了中国人的蒙骗，结果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我相信当艾地选择了亲中国的立场时，他是真诚的。当他们抓住了他并判决枪毙他时，他是昂着头的。当他听任自己被中国人迷住时，他也许缺乏坚强的意志

① B·N·波诺马廖夫，中央委员会中负责同其他党联系的官员。艾地在1963年对包括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国家作了一次旅行。那年7月他离开莫斯科时说，他希望能举行一次世界共产党会议来帮助解决中苏意识形态上的裂缝。

和清醒的头脑，但他的死是值得的，象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一样，没有背叛他的理想和他的党，也没有背叛他的阶级。

就这样，由于中国的影响渗入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许多印度尼西亚政治局委员和数十万其他进步人士被杀害了。这是一个大悲剧和大耻辱。如果印度尼西亚党的领导做得聪明些，对毛泽东进行更多的反抗，印度尼西亚也许已选择正确的方针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它必定会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在反帝斗争中有着战略地位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一。

途经仰光

我们在访问印度尼西亚时，趁奈温将军邀请之便也访问了缅甸。我应该说一些有关奈温上台的情况。

先前，政府首脑〔总理〕是吴努，但他陷于各种无法解脱的困难之中。在缅甸的许多民族集团中存在着强烈的分离主义倾向。最后，吴努看到他已无法再统治，就要求奈温在举行新的选举之前组织政府。自然，吴努希望在选举后能重新掌权。

奈温是武装部队的首脑，而我们对缅甸的军队抱有恶感。为什么？因为这支军队在同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作战。可是，尽管我们不喜欢缅甸军队，我们还是决定接

受奈温的邀请，于是我们飞往仰光。①

他在自己家里设宴招待我们，随后我们讨论了各种各样的事情。奈温给我的印象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和优秀的政治家。他讲了一些缅甸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抵抗日本人的故事，使我们听了很高兴。他对战时指挥游击队的共产党人只讲了好话。当然，共产党人在战后成了反动势力进行恐怖袭击的对象。虽然共产党人在战后的选举中名列前茅并一度被邀参加政府，他们仍转入地下，并准备以后按他们自己的条件夺取政权。

奈温将军自称同情共产党，尊敬曾与他并肩抗日的共产党游击队领导人，但他批评他们拒绝参加〔联合〕政府。

"缅甸共产党人走的道路是错误的，"他告诉我们。"他们在丛林里同我们的军队作战，从而使他们自己脱离人民。他们没有机会在群众中扩大宣传。他们曾有这样的机会，即应当以合法和公开的身分参加我国的政治生活。"

奈温还给我们谈了他对吴努的评价。评价是否定的，然而是正确的。他振振有词地论证说，社会主义是缅甸最好的道路。他的说法大体上接近我自己的信念；

---

① 赫鲁晓夫途经仰光时停留了一天半。他的主人是奈温总理和温貌总统。以前在1955年12月，赫鲁晓夫访问过缅甸，那一次会见了吴努。

我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他继续掌权，缅甸会成为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我应该说，我认为他并不真正相信他说的话，他的真正目标同他告诉我的完全不同。

然而，同我从前见过面和谈过话的吴努比起来，奈温好比一阵清新的微风。他的妻子也给我很深的印象。她聪敏，很有教养，完全配做他的伴侣。她同吴努的妻子恰好形成一个对照，那一位不过是个小贩，一个商店的老板。奈温的妻子告诉我许多关于缅甸的情况。她说她极想访问苏联，因为她特别喜欢芭蕾舞。

“我一生中一直在读和听俄罗斯芭蕾舞，”她说，“我希望访问莫斯科，至少一次。”

“随时欢迎您来并访问我们的剧院，”我回答。

“什么时候去最好？”

我说，我国的戏剧季节是在秋季和冬季，但我预先提醒她，我国寒冷的俄罗斯冬季对来自热带的人们是难以忍受的：“如果您要欣赏我国剧院里的演出，我怕您得受点儿小罪。”我们互相打趣。简言之，我十分欣赏奈温和他的家庭。

我回到苏联后，把奈温将军的情况报告我的同志们。我建议我们暂时对他不作判断，尽管他在同共产党游击队作战。我说，我们应当更多地了解他的政治见解和目标，也许可能证明同他建立接触是值得的。但我们仍对他保持怀疑。我们想到，也许他的殷勤款待和奉承话语

只是为了要使我们放弃对共产党地下运动的支持，并掩饰他实际追求的反动政治目标。

在我们访问后不久举行的选举中，吴努的党赢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①以吴努为首的新政府继续奉行缅甸在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玩弄花样的旧政策。那些领导人在推行反动政策的同时，企图假装成左翼分子。他们允许外国势力开采缅甸的石油、黄金和稀有矿物等天然资源。缅甸的反政府和分离主义分子再一次集结力量，给吴努制造了空前重大的困难。武装暴动日益频繁和严重。最后，发生了武装政变。奈温夺得了控制权，逮捕了吴努和政府的其他成员，把中央和地方的权力都从文官当局手里移交给军队。②奈温又一次成为政府和武装部队的首脑。

我们对政变的态度是谨慎的。尽管奈温曾给我们良好的印象，尽管他表示过缅甸经济需要实行社会主义化，我们仍旧用不信任的态度对待他。我们拖延了一些时候才承认他的政府。我们需要确定我们对他的意图的判断是否正确。

可是，中国立即承认奈温的政府。周恩来在政变后

---

① 选举在1960年2月举行，正在赫鲁晓夫（在仰光）中途停留之后。

② 政变发生在1962年。赫鲁晓夫说的“中央”是指首都仰光。

不久就飞到那里去。①我们有点困惑。我们想不出中国人为什么如此急于承认一个通过政变夺得权力的军人政权。

可是后来，我们的大使馆告诉我们，根据奈温的表现，他对我们表达过的、关于他将选择什么方向的说法是真诚的。我们改变了对他的态度，承认了他的政府。我们同缅甸的关系从此不断改善，比起我们过去同吴努之间的关系好得多了。

我退休以后从报上看到，奈温把吴努从狱中释放了。②以后，吴努一直纠缠着要美帝国主义者动员起来反对缅甸的进步政府。吴努表明他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动派。他现在完全投靠了美国情报机构。

至于我们方面，我们一直在竭尽全力给予缅甸以外交和经济上的支持。如果奈温将军继续信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我确信他的影响和公众的支持必将增长，而吴努企图毁谤和损害奈温的开明政府的努力必将失败。

---

① 周在1960年4月途经仰光时曾同吴努谈判。吴努和奈温在秋季访问了北京。然后，周在1961年1月再到仰光会见吴努；1964年2月又去会见奈温。

② 吴努在1966年11月被奈温释放，在监禁中度过了四年半。

第十四章　非洲和中东

非洲的领导人

来看我的人常常问到我在党和政府里担任高级职务时期，我国和非洲各国关系的发展情况。我很高兴在这里记下我在这方面的回忆。

我们对待一切解放运动的态度，都是根据我们的伟大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教导，他的理论和策略为世界各国的工人开辟了道路。十月革命不但举起我国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大旗，而且举起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正在崩溃的殖民主义制度的大旗。

非洲第一个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的是加纳。我和克瓦米·恩克鲁玛总统见过几次面。他是一个很有趣、很聪明、文化程度很高的人，但是他在政治和社会问题上却眼光不够远大。首先，他过去接受的是英国文化，而且是在英国受高等教育的。即使在他的国家获得独立之后，加纳军队里的军官仍都是英国人。这算是什么样的独立？一个过去的殖民地，如果它的军队的指挥官全都是殖民主义者，怎么能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呢？

我们很含蓄地警告恩克鲁玛，要他对军官们采取些措施，否则目前的状况可能导致重大的困难。他好象接受我们的意见，但并不照我们的劝告行事。我也说不出他为什么不这样做。想来国内存在着某些牵制的力量，即后来毁掉他的那些力量。

根据我和他的一些个人谈话来判断，我敢说如果条件更有利些，他可能会公开宣布加纳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他从来没有这样宣布过，尽管随着时间的过去，他对苏联政府的信任越来越加强。

我记得他来苏联的那次访问。当时我和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正在克里木休假，恩克鲁玛来和我们一起度假，把他的妻子也带来了。她是一个阿拉伯的白种女人，她的原籍是开罗。我又一次警告恩克鲁玛，除非他撤掉他军队里的那些指挥官，他就会面临西方资本家和正在加强的国内反民主力量的威胁。他当时对我的话一定是听进去了，因为此后不久他就要我们派几名军官担任他的私人卫队的顾问。我们派去了他要的人，但几个人有什么用？恩克鲁玛的警卫员是保障不了国家的稳定的，特别是当军队掌握在英国人手里的时候。

不久我就获悉那些资产阶级分子发动了一次政变。他们推翻了恩克鲁玛政府，并且改变了国家的政治体制。新的军人政权废除了恩克鲁玛创立的一切民主制度。

政变发生时，我们的朋友恩克鲁玛正坐着我们的一架飞机从中国回去。他被禁止回到本国，只好移居国外，因此他就飞回苏联。

不幸的是，如果我收到的情报是可靠的话，加纳从此就执行了一项反社会主义的和亲西方的政策。①

另一个经历了政变的非洲国家是索马里；这个国家自从独立以后就和我们的关系很好。②我记得有过一个索马里的政府代表团来苏联访问，并向我们要军火；我们同意供给他们，条件很优越。

当时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正卷进一场边界争端。海尔·塞拉西皇帝和我们的关系极好，对我们卖给索马里军火表示担心。所以我们的处境相当微妙，不得不运用一定程度的外交灵活性。③

自从我退休之后，我从报上获悉索马里的进步力量接管了政权。新领导宣布它将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并

① 克瓦米·恩克鲁玛于1961年赴莫斯科进行两星期的访问；之后不久，他就起用加纳人代替英国人担任陆、海、空军的负责人。1966年2月他被推翻，于1972年在布加勒斯特因癌症医治无效逝世。

② 索马里于1956年赢得内部自治，1960年独立。

③ 克里姆林宫在1964年3月派代理外交部长马立克去亚的斯亚贝巴，消除埃塞俄比亚人对苏联给索马里三千万美元军事援助计划的疑虑。

在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制定各项政策。①

我不得不说，我对非洲的这些政变活动确实不大理解。有时候，象索马里那样，是一个进步政权代替另一个进步政权。但在其他情况下，如我所描述的加纳那样，则是反动政权推翻进步政权。马里也发生同样情况。我在报上看到，一个反社会主义的、因而也必然是反苏的军人政权赶走了我们的好朋友莫迪博·凯塔。

莫迪博·凯塔在担任马里总统时，曾经率领一个代表团来苏联。我在主席团接待过他。他是个大块头，人又高又大，是个真正的巨人。我后来见到一幅我们会见时他拥抱我的照片，看上去就象一只大熊把我抱着。②

非洲有许多黑人共和国从英国人和法国人手中争取到独立；和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比较起来，莫迪博·凯塔是一个很有意思和聪明的人物。我们不需要央求他或者逼迫他公开表示他的立场。他自发地声称马里将要走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我感到惋惜的是他没有能力把那些最后推翻他的反社会主义势力扫除掉。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深信进步性的主张尽管在加

---

① 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如纳赛尔等人最初提出的一种独立牌号的社会主义。（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43—444页）

② 马里总统莫迪博·凯塔于1962年5月访问莫斯科；他在1968年被废黜。

纳和马里受到挫折，真理最后必将战胜。象克瓦米·恩克鲁玛和莫迪博·凯塔那样的领导人将会重新出现，并选择通向未来的正确道路，即科学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将为广大的人民群众、无产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的利益服务。

在结束加纳这个题目之前，我还得赞扬一下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在恩克鲁玛被他本国的亲资本家势力推翻之后，塞古·杜尔同志兄弟般地欢迎他，并在几内亚给了他最高的地位。①

几内亚是唯一通过公民投票退出所谓法兰西共同体和不经过武装斗争就获得独立的法国殖民地。②不用说，几内亚人民决定他们命运的公民投票的结果，并不合戴高乐总统的心意。他对几内亚独立的反应，从报纸上已为人所熟知了。他召回了所有法国的官员、专家和公务员。戴高乐想要通过挖空几内亚的整个政府机构，以迫使这个新国家垮台。银行关闭了，经济瘫痪了。法国人以为几内亚人自己一定对付不了，除了回到法兰西共同体外别无他法。

在这个时候，苏联根据我们伟大列宁的思想的指导，向几内亚伸出援助之手。塞古·杜尔要求我们支援，我

---

① 恩克鲁玛在1966年被推翻之后，曾往几内亚避难，塞古·杜尔总统任命他为国家名誉元首。

② 时在1958年9月。

们无条件地给予他援助。我们还记得自己获得独立的最初的日子，并且觉得支援别人是我们的义务。①我们送去了专家和物质援助。

多列士同志曾经向我们作过关于塞古·杜尔的极其令人鼓舞的介绍。②显然，多列士以前在工会运动中曾经和塞古·杜尔有过接触。塞古·杜尔既是几内亚最大政党的领袖和人民的领袖，又是工会的领袖。多列士还告诉我们塞古·杜尔和共产主义运动有联系。因此，后来他第一次访问苏联和我们见面时，我们称呼他"同志"。他给了我们很好的印象，看得出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既了解民族独立斗争，也了解阶级斗争。可是他有些地方使我们感到不放心。是什么呢？首先，他对法国共产党，特别是对多列士同志，表现出某种不尊重。我对他的这种态度特别有反感，因为法国共产党正在尽一切力量来帮助几内亚人民维护独立。至于多列士同志，他不但多年来一直是法国党的领袖，也是法国工人的一个优秀和正直的榜样——而且不仅如此，他和我还是煤矿工业中的同行。他以前是一个矿工，这一点我很重视。一直到今天，

① 赫鲁晓夫这里所说的"独立"是指俄国从沙皇统治下解放出来。

② 莫里斯·多列士担任法国共产党的领袖有三十多年，直到他1964年赴雅尔塔时在一艘苏联船上逝世为止。赫鲁晓夫在第十七章"法国之行"中提供了更多的对多列士的回忆。

我对多列士同志都很尊重，所以我们和塞古·杜尔谈判时，他对多列士的态度使我不痛快。

后来又发生了别的不愉快事件。几内亚人要求我们给他们造一个可以经受得起最重量飞机的飞机场。我们很乐意地答应了，并派了我们的专家去建造这个机场。后来发生了所谓加勒比海危机，当时苏联和美国之间的军事冲突随时都有可能爆发。①我们和古巴的交通变得无比重要。我们的飞机在飞往哈瓦那途中，至少要有一次停留，但是通常我们中途停留的那些国家突然拒绝我们着陆的权利。

我们在几内亚造的飞机场将是一个极好的加油站，可是几内亚政府不肯让我们使用。他们企图用“技术条件”不够好的理由为他们的拒绝辩护。我们很可以问，谁更懂得机场的技术条件，是几内亚政府，还是造机场的苏联工程师？几内亚的行动很明显是有利于美国的，不但违反苏联的利益，而且违反所有争取独立的民族的利益。在这次事件以后，我们对几内亚的动机不再信任了。

在我和塞古·杜尔在苏联的第二次会谈中，他对法国共产党继续表现了一种很古怪的态度。这种态度后来就突出为对苏联的攻击。这使我想到代表真理的和代表谬误的力量之间以及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之间所进行的

---

① 时在1962年10月。

尖锐的斗争，即阶级斗争。①

另外还有些不愉快的事件。例如，我们从苏联大使馆得到情报，说有些几内亚的领导人正在购置财产而且积累了大量的个人财富。我讲的倒不是塞古·杜尔本人，而是他的兄弟。尽管这是一个内政问题，我们无权干预，但却使我们非常失望，因为我们曾经指望几内亚政权能够反映几内亚人民的意志来建立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制度。

还闹了一些无聊的问题，有些则是我们的过错。现在想起的是我们派往几内亚的一个苏联女教师拒绝返回苏联的事。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她要呆下去，但我想多少牵涉到男女关系。不幸的是我们处理这些事情的机构，表现了某种官僚主义的过分热心，并企图把这位教师送回苏联。这一着做得很糟。简直是极端的愚蠢。它触发了一场全面的外交纠纷。塞古·杜尔和其他几内亚的领导人都非常生气，我完全懂得他们恼火的原因。这个事件表明，我们之所以不愉快，是因为我们的教师，一个白种女人，竟在一个非洲国家和一个黑种男人同居。

在我看来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我们对这类事情始终是不抱偏见的。对我们来说，一个人是白种，还是黑种或黄种都没有关系。要紧的是他的阶级关系。当我获悉事情的经过时，我发火了。我说："这个女人要留在几

① 赫鲁晓夫在这里大概是指苏联对几内亚和美国在政治、经济上关系越来越密切的不满。

内亚又怎么样呢？她找到一个朋友。也许他是个很不错的男子。别去管她。让她呆在她要呆的地方好了。”①

尽管在我们和几内亚的关系上发生了这些事件——我甚至要说是裂痕——我们还是设法平息这些冲突。我们觉得塞古·杜尔迟早将会认识他的错误而明白过来。我们坚信在反对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斗争中，我们和他是可以找到共同立场的。

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

我们和阿拉伯世界的关系，自从1956年我们干预并结束了英、法、以色列对埃及的侵略后，有了引人注目的改进。②

接着我们反击了美国在黎巴嫩的登陆，不是通过军

---

① 在1963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和几内亚的关系非常紧张，以致几内亚的一些政治家要求驱逐苏联大使。出事的原因之一是斯维特拉娜·乌沙科娃事件。乌沙科娃是一个淡黄头发的苏联教师，她违反了大使馆禁止和当地居民结成亲密友谊的规定。苏联人两次把她化装成女服务员，企图把她偷送上水上飞机，两次她都被几内亚的警察从这些苏联绑架者手中救了出来。

② 赫鲁晓夫关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的回忆，以及他和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的关系的详细叙述。（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30—451页）

事手段，而是通过动员全世界的舆论。这次侵略在全世界各地都引起了公众的抗议。我们还着手进行示威性的军事准备并表示，如果需要的话，我们愿意随时增加对近东的军事援助。后来我们在联合国把这个问题提了出来，逼使美国人从黎巴嫩撤走它们的军队。①

同时，叙利亚政府执行独立的政策，这是我们一心一意支持的。叙利亚的代表常来苏联，我们也派我们的代表团到那里去。

伊拉克政府在所有阿拉伯国家中是最反动的。这个政府的首脑努里·赛义德是英帝国主义的傀儡和殖民主义者的忠实走狗。我们对卡塞姆领导下的伊拉克革命的支持，进一步提高了我们在阿拉伯世界的威望。②

我想讲几句关于也门的话。早在我们1955年访问英国之前，巴德尔王太子就向我们要求给他的国家军事援助，我们同意了。我在前面提到过，英国的国防大臣在伦敦告诉我，有人向他通风报信，说我们正在出售军火给也门。③这个人说得对。出售军火的结果是，巴德尔对我

① 1958年7月，艾森豪威尔总统派了五千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帮助黎巴嫩政府平息一次叛乱。

② 努里·赛义德总理领导的政权，因阿卜杜勒·卡里姆·卡塞姆领导的左派政变，于1958年倒台。（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38页）

③ 赫鲁晓夫和塞尔温·劳埃德的谈话。（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04页）

们很信任，而且多年来我们都继续援助他。

我亲自和这位王太子有过两三次会见。我还记得第一次和他会见时他给我的印象。当时走进我的书房里来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肩膀宽阔的美男子。他好象很懂道理也很聪明。我们大部分的谈话都用来讨论要多少军事援助才能使也门人把英国人赶走，并使他们的国家完全独立。

他要求我们给他经济援助，使也门能修建一个海港。英国人已经不让他们再使用亚丁的港口了。巴德尔说，"由于船舶要在离岸很远的地方抛锚，所有的货物和乘客都得由码头工人背到岸上来，你能想象得到吗？"我们同意给他们建造一个海港。

也门是一个封建社会。巴德尔告诉我，在他出国期间，一群亲王联合起来，发动了反对他的父亲即国王的叛乱。巴德尔回国后，把其他支持国王的亲王组织起来，将叛乱镇压下去并恢复了秩序。我对这件事情不知应当怎么说。正如我们俄国人通常说的：洋姜不比萝卜甜。①我对谁当也门国王一点不感兴趣。

就我们所知，巴德尔的父亲执行了最反动的政策。根据我和巴德尔谈话的情况来判断，我想他本人在统治自己国家时会开明些。

---

① 意即半斤八两。——中译者

巴德尔在他父亲死后继承了王位。事情往往如此，一个开明的王太子当了国王就反动起来。他成了一个极端暴虐的领袖，一个十足的奴隶主。不久以后，皇家警卫队的头子带头发动一次宫廷政变，把他推翻了。

很长一个时期，有谣传说巴德尔已被杀死，葬身于宫内的瓦砾堆下面，可是后来发现，出于某种奇迹他仍然活着。原来他是装扮成女人溜走的。我相信在阿拉伯世界里，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用这种方法逃走。就这种方法来说，不管它有多大价值，书上说克伦斯基就是使用这个花招，在十月起义时换上妇女服装逃走的。①总之，巴德尔组织了对新政权的抵抗。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援助了他。恐怕也门国内的斗争现在还继续着。②

---

① 1917年十月革命时，亚力山大·克伦斯基这个临时政府的领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水手（没有装扮成妇女），逃避了布尔什维克的逮捕。

② 文中指的也门起义发生于1955年，当时巴德尔王太子集合了效忠王室的部族，击败了一次陆军叛乱，恢复了他父亲塞弗·伊斯兰·艾哈迈德的王位。巴德尔在1956年访问了苏联。

也门是在1958年南也门从也门领土分裂出去时失去亚丁港的。苏联人为也门在艾哈迈迪建造了一个深水港，1961年完成。

也门国王，即伊马姆，于1962年去世，巴德尔继承王位；他只当了一个星期的国王，就被另一次陆军叛变推翻。他逃到山里去，并对新政权进行了长时期的斗争。

我们和由布尔吉巴担任元首的那个阿拉伯国家的关系很好，①和摩洛哥的关系也很好。往后我还将叙述我在联合国大会上和摩洛哥现任的国王哈桑二世是怎样见面的，那时他还是王储。我们在那里的简短谈话促使两国关系取得了良好的进展。②

我记得摩洛哥政府邀请苏联派一个代表团去进行访问，我们派勃列日涅夫为代表，当时他是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国王接见了他。那次访问在加强我们的关系方面作出了贡献。

哈桑二世现在是国王了。最近我在报上看到他打算来苏联访问。当我们邀请他这样的统治者并执行一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政策时，我们应当记着哈桑并不会永远在世的。历史将会表明那一种社会制度最后将在摩洛哥取得胜利。我们自然希望社会主义制度胜利，因为社会主义为劳动人民提供最好的条件。③

我们和摩洛哥曾经有过争执。我记得阿尔及利亚人民赢得独立之后，摩洛哥开始要求某些边界领土。有一个时候，看上去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之间就要爆发武装

① 哈比卜·布尔吉巴，突尼斯的总统。

② 参看第十九章，“联合国”。

③ 勃列日涅夫以国家元首的身分（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于1961年2月访问摩洛哥。由国王穆罕默德五世接见；国王在该月内不久就逝世，他的儿子哈桑二世继承王位。哈桑于1966年10月访问苏联。

冲突似的。我们的同情是在阿尔及利亚人民一边。

我对本·贝拉极为尊重。他是一个很明智的人，是阿尔及利亚人民的伟大的儿子。我在苏联和他会见过不止一次；最后的一次是我在埃及纳赛尔总统那儿作客的时候。

不幸的是，阿尔及利亚军队的总参谋长布迈丁后来取得政府中若干成员的支持，进行了一次政变。我不大清楚本·贝拉的遭遇如何，但在报上看到还准许他的母亲见他，他还活着而且健康。他现在落到只能过一种无所事事的日子，真可惜；他年纪还轻，本来可以大有作为的。①

我在报上看到，布迈丁继续执行本·贝拉的政策，包括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我相信布迈丁一定会尽到他的责任。他的地位这样高并不是偶然的。他一开头就参加反对法国殖民主义者占领他们国家的斗争。

我个人并不认识布迈丁，因为他每次到苏联来，我都没有必要同他会见。他关心的是军事，所以总是和我们

---

① 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获得独立。穆罕默德·本·贝拉曾任总理，后来又任阿尔及利亚总统，直到1965年被胡阿里·布迈丁推翻为止。赫鲁晓夫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43—445页中谈到和本·贝拉在埃及的会见。

的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打交道。可是尽管布迈丁执行正确的政策，我总觉得本·贝拉更象个政治家，他对阿尔及利亚将来应走什么道路看得比较清楚。

六 天 战 争

我已经讲过，在英国、①法国和以色列 1956 年侵略埃及时，我们是怎样出色地对付他们的。我们采取若干外交和政治措施，明确表明我们站在埃及一边。我们在报纸上公开宣布，我们征求志愿人员和顾问支援埃及军队。这对帝国主义的头子——即美国——立刻产生了影响，其结果是美国人向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施加压力，逼使他们撤兵。

可是十一年后，在 1967 年，尽管我们的军事力量增加了好多倍，我们却把近东局势处理得很糟，使得我们的埃及朋友陷入悲惨的境地。我愿意谈谈我对阿拉伯—以色列战争背景的想法，并说明我们错在哪里。

我当领导时，内政和外交方面的政策有不少都是由我决定的。就埃及而论，我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对于以色列、英国和法国在 1956 年向埃及发动的战争，我是无条件地反对的，而且我们利用了所有的影响和力量以

① 原文为“埃及”，当是“英国”之误，已改正。——中译者

及可以使用的一切手段，使战争能早日结束并对埃及有利。但是我也无条件反对纳赛尔同以色列打仗。1964年我参加阿斯旺水坝开工典礼在埃及作客时，就力劝纳赛尔不要去惹以色列人。①

"我劝你不要去碰战争，"我跟他说。"你并不真的想要打仗，是不是？你并不真想摧毁以色列？如果你真想，你就错了。它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以色列也许比埃及小，但是以色列比较先进。他们的军队受过较好的训练；他们拥有更现代化的武器。再者，你已经使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如果你真的发动战争，别的国家不会了解你，也不会同情你。你也会把苏联置于非常尴尬的地位，因为你知道，我们在联合国是投票赞成建立以色列的。我还应补充一点：我们是在压力之下才这样做的，而且附有严重的保留和许多条件。我用不着告诉你，我们党从来没有同情过犹太复国主义。无论是在革命之前或者革命之后，我们都和国内的犹太复国主义者斗争过。我们总认为犹太复国主义者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反动政党。可是这是另外一回事。以色列国家是存在的，我们两个人都得承认这个事实。"

纳赛尔同意我的看法。"我不想打仗，"他说。"我了

---

① 这个材料是赫鲁晓夫早先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50—451页关于1967年阿拉伯—以色列战争的论述的补充。

解我的责任。如果我有时候发表某些〔好战的〕讲演，那只是为了照顾和尊重人民的情绪。”

我觉得这话是合乎情理的。以色列对埃及执行了一项反动的、帝国主义政策，埃及人为了防止侵略，非得武装自己不可。可是在任何情况下，埃及都不应当发动战争。联合国派了军队到近东来，有这么一段时间总算维持和平共处，虽然双方都武装到了牙齿。接着，在我退休以后，到了 1967 年局势就改变了。

埃及人要求吴丹撤走联合国军队。我对吴丹非常尊重；他比任何人都适合担任他现在的职位。①可是他不得不屈从埃及人的要求。后来埃及人封锁了亚喀巴湾，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航。这事一发生，战争就无法避免了。

我对以色列先发动战争是没有任何怀疑的。是以色列先动手的。但这是一种预防性的进攻。以色列军队装备有美国武器和飞机，那些飞机比我们给埃及的在技术上更优越。以色列还有更优秀的军事干部。它的参谋部里许多人在二次大战中曾经和美国人、法国人、特别是英国人一起服过役。其中有些人以前甚至还是苏联军队里的军官。摩西·达扬证明是一个很好的组织者和一个出色的战略家。他发挥了自己的长处。

埃及人不知道天高地厚。这些可怜的家伙，他们要

---

① 赫鲁晓夫在下面第十九章末尾对吴丹还有一段更详细的评价。

吃很大苦头才学到乖。他们惯于骑着骆驼打仗，比步枪更复杂一点的武器他们都不会使用。结果，埃及军队被打垮了，埃及的大片土地被占领。幸好没有使用原子武器。以色列用常规手段就轻易地赢得了战争。

我觉得苏联对这次事件应当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以我们对纳赛尔的影响，以我们对埃及所能施加的压力，我们早就应当约束埃及人不要表现他们的好战性。一个才智平庸的人也不难看出，如果有人坚决要求撤退他和他的敌人之间的中立〔联合国〕缓冲部队，他对这个敌人就是有相当明确的企图的。我们不应当让纳赛尔加剧过去造成的紧张关系，也不应当让他挑动以色列人先动手。纳赛尔应当采用别的手段保护居住在以色列的阿拉伯人的权利，而不应当企图摧毁以色列——这是一个极不理智的目标。

我觉得这事主要怪我们的军事人员，而不是怪我们的外交人员。他们断然不应当让埃及人逼使以色列孤注一掷地发起一次预防性的进攻。我个人对扎哈罗夫并没有意见，但是他已经老了，开会总是打瞌睡。①他和我们的军事人员在六天战争前的决策上是有影响的。首先，他们容许战争爆发就是错误的；战后他们也没有利用我们的力量来清除战争的后果。

---

① 关于苏联总参谋长扎哈罗夫，还可参看本书第一章的最后一节。

第十五章　同西方接触

戴高乐战时访问莫斯科

战争接近结束时，戴高乐来到苏联。我在战前从报纸上记住了他的名字，那时他还是陆军上校。他是坦克兵团和机动装甲部队战术的首倡者之一①。他也许已是一位军事改革家，而我们的报纸却把他作为一个政治上的反动分子来对待。

可是在战争开始后，戴高乐成了一位英雄，受人尊敬的爱国者，纳粹主义的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拒绝在德国国防军被击溃前停止战斗。法国共产党是开展反对希特勒占领的斗争的主要组织者，而戴高乐从他在英国的流亡政府中全面负责抗战工作。

法国飞行员驾驶着苏联飞机，同我国的空军一起对共同的敌人并肩战斗，这是戴高乐的功劳。戴高乐肯定

---

① 三十年代初，戴高乐极力主张把防御战略的基础放在机动部队和空军上，而不要放在固定的防御工事上。1944年12月，应斯大林的邀请，戴高乐以新成立的法国临时政府首脑的身分访问莫斯科。

同安排一支法国飞行员特别分队于战时进入苏联一事有关。这些飞行员组成了所谓的诺曼底—内曼空军中队。

戴高乐来访问时，我在莫斯科。不用说，是斯大林召我到莫斯科来的，因为我从未自动〔从乌克兰〕到首都来过。

斯大林对戴高乐采取什么态度？一般地说，斯大林并不很推崇军人。他特别瞧不起军人理解政治的能力，更不用说参与政治了。他曾在我们中间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其他国家的将军都是一些浅陋的刻板人物和蠢才——随便你用什么形容词都行。对这一位戴高乐，斯大林没有特别尊敬他。

然而，当斯大林告诉我们说“戴高乐来了”时，我从他的声音中听到了得意的口气。他感到骄傲，因为这一位反共将军、这一位法国反动势力的代表决定访问莫斯科，表示他对苏联政府的尊敬。这证明，戴高乐对于在战争中发生的实际情况，比其他西方盟国更为了解。西方一直等到希特勒几乎站不住脚以后，在他的军队受到苏联军队的严重打击以后，他们才开始登陆并建立反击德国人的滩头阵地。西方一直在等待时机，以便坐到桌旁来接受德国的投降，即我国士兵以大量鲜血为代价赢得的果实。戴高乐对这一点比丘吉尔或美国人看得更清楚。

我同戴高乐见面是在斯大林招待他的宴会上。我想

宴会一定是在克里姆林宫斯大林的房间里举行的，因为我记得只有几个人出席。斯大林说，戴高乐曾提议同我们签订一项条约，以恢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存在过的那种法俄关系。条约的详细内容我已忘却。无疑这是斯大林同莫洛托夫一起拟订好了的。

宴会后，斯大林请戴高乐去看电影。他请他的客人们都去。为什么？因为他自己想看。戴高乐感谢斯大林，但没有去。他说他要在我们签订条约以前对某些问题仔细考虑一下。

可是，戴高乐的外交部长①同意与我们一起去看电影。我们进了剧场，照例送来了水果——并且，作为一种特殊待遇，还送来了香槟酒。是斯大林命令送香槟酒的。他也邀请了诺曼底一内曼空军中队的法国飞行员。

斯大林亲切地同飞行员们交谈，但我们大家都看出他有点醉了。其实他还不止有一点醉。当他给法国人的杯子里斟香槟酒时身子晃来晃去。贝利亚、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我都在场。我们不时紧张地彼此对望。

当我们大家在剧场里时，莫洛托夫和戴高乐的外交部长仍然在谈判条约的条款。他们解决了留下的分歧。

随后不久，戴高乐和斯大林签订了条约。在签订仪式上，戴高乐自始至终举止十分傲慢，神气十足。你可以

---

① 乔治·皮杜尔。他和莫洛托夫拟定了一项同盟互助条约。

看到，他对谁也不点头。他走路时身子挺得又高又直，象个吞下了一根棍子的人似的。我觉得他当时颇为高傲和严峻。

戴高乐作为一位有才智的军事领袖早已赢得了我们的尊敬。不久，他给了我们一个狡猾的政客的印象。最初，他让多列士同志和法国共产党参加他的政府。然后，当他聚集了足够的力量无需共产党人时，他就抛弃了他们。

在那段时期中，同法国接触最多的苏联代表是我们的大使鲍格莫洛夫。①斯大林死后，我们任命维诺格拉多夫为驻巴黎大使。②后来证明他是一位极其灵活的外交官，他在戴高乐担任总统之前就同他建立了良好的关系。总统经常邀请维诺格拉多夫同志到他的住处去讨论政治问题。戴高乐从未拒绝维诺格拉多夫约见的请求，他们甚至经常一起去打猎。

哈里曼和麦克达菲

我自己从未同罗斯福总统见过面，但我从一个名叫

---

① A·Ye·鲍格莫洛夫，苏联派往当时在阿尔及利亚的“自由法国人”的使节，后任驻巴黎大使。

② S·A·维诺格拉多夫在1953年至1965年任驻巴黎大使。赫鲁晓夫在下面记述他在1960年的法国之行（第十七章）时，对维诺格拉多夫作了更多的追忆。

约翰斯顿的美国实业家那里听到关于罗斯福的情况。他告诉我们说他同罗斯福很接近①。虽然美国政府成员经常变化，但此人一直同美国的统治集团保持着联系。我相信他有时还被委托以非正式的外交使命。他至少访问过苏联两次。按美国人的说法，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就是说他赞成和平共处。

约翰斯顿告诉我后来我在戴维营知道的一些事情的由来。"战争期间，我去看罗斯福，发觉他好象精疲力尽的样子，"约翰斯顿告诉我。"我对他说，'总统先生，你需要休息一下。'

"'我有什么办法？'总统回答。'一场战争正在进行着。我不能离开华盛顿。'

"我建议他在华盛顿附近盖一所住宅，在那里他可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完全避开华盛顿。"

在讲到总统需要一个地方休息的时候，这位实业家给我们讲了一个他从罗斯福那里听来的笑话。笑话的内容大体如下：

"主人给长工一把铲子，叫他去挖一条水沟。过了一会儿，长工回来说他挖好了。于是主人给他一把斧子，叫他去砍些木柴。长工去了，砍了一捆木柴回来。然后主人叫他去拣一堆土豆，把它分成两堆，小土豆一堆，大土

① 埃里克·艾伦·约翰斯顿，美国商会会长，1944年曾在莫斯科逗留八星期；他同斯大林进行过三小时谈话。

豆一堆。几个小时过去了，连长工的影子也没见。最后，主人去找他，发现他在仓库里早已晕过去了。主人朝他身上倒了一满桶水。长工醒过来，解释说，'我不怕挖水沟，也不怕砍木柴，但我不能做这个分大土豆和小土豆的工作。我不能忍受要我来作出那些决定，决定，决定！给我一个不需要动脑筋的工作吧。'

"罗斯福给我讲了这个笑话后，又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不能做任何不需要思考和作出决定的工作。这就是我看上去那样疲惫的原因。但我有什么办法呢？一场战争正在进行着。'"

这是美国人喜欢讲的那种笑话。我不知道罗斯福是否讲过这样一个故事，还是约翰斯顿自己编出来的。

罗斯福的另一个亲密伙伴是艾夫里尔·哈里曼。我们得到的消息说，哈里曼在战前就已是总统的一个心腹。战时，他是美国驻苏联大使。他执行的政策很合我们的胃口。他认为必须加强我们的军事联盟，以便给希特勒一个决定性的打击；他在大使的权力范围内尽一切能力支持苏联。

希特勒分子对我国的占领使我们失去了许多生产钢、铝和石油的地区。多亏哈里曼，美国给了我们大量的物质援助，使我们能维持为取得胜利所必需的军火生产。

革命前，哈里曼家族在格鲁吉亚拥有一些锰矿，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我记得我甚至在我们的报纸上读到过

这方面的报道。这件事，在战后我从斯大林亲口说的话中得到了证实。哈里曼也在一家加拿大公司持有股份，该公司在贝柴摩附近的北部地方拥有一些镍矿。十月革命后芬兰人从俄国手里夺去了那一带地方，但我们接着就把它收复了。战后，贝柴摩成为苏联的一部分，因为如斯大林所解释的，我们需要同挪威有一个共同的边界。这一地区由于邻近终年不冻的摩尔曼斯克港，在战略上很重要；由于有镍矿，在经济上很重要。而且，那里的土地在历史上是俄国的。①

斯大林曾顺便提到，给哈里曼放弃的矿场以补偿也许是一个好主意。我不知道这个建议以后是否有什么结果。我知道在领导中没有讨论过。在领导中是什么也不讨论的。斯大林不能忍受对他的想法提出异议或进行讨论。如果你赞同他，他可以让你对他讲话，有时他干脆叫你闭嘴，不管你正在说什么。

尽管我们同哈里曼的关系极好，我们在租借法案问题上却同美国人有过不愉快的经历。他们要我们对战时给予我们的援助偿付一部分费用。斯大林完全正确地拒绝偿付，除非我们得到三十亿美元的贷款。

我无法在这里谈得很详细，因为我只了解我从斯大

---

① 哈里曼和一些合伙人曾在格鲁吉亚拥有锰矿开采权，1920年年中卖给了政府，但他在北部地方没有财务关系。

林那里知道的情况。既没有正式的文件、报告或记录，也没有在政治局或部长会议里商量过。事实上，部长会议除了还剩下一张名单外，已经不存在了。如果一项计划在部长会议里提出来，那只是为了盖个批准的橡皮图章而已。

这种情况使我回想起我年轻时经常从矿工处听到的一个笑话。一个牧师在讲坛后面站起来，对着来做礼拜的听众拿出一本厚厚的书。“你们读过这本书吗?”他问。谁也不说话。“好,”他说。“那么我也不用读它了。”

斯大林领导下的部长会议在开会时就有点象那个样子。我们讨论政府文件的时间，同那座教堂里的听众谈论那本书的时间一样多。

现在回到租借法案的问题上来。我记得美国坚决要我们归还他们在战时给我们的货船。在我们归还了那些货船后，美国人是怎么处理的呢?他们甚至没有费力把这些货船开回美国去扔掉——他们只是把船开到海里当场凿沉了。这说明我们的前盟国对于我们在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的战斗中所流的鲜血是多么尊重!

美国人在租借法案问题上的顽固和无理，的确同金钱毫无关系。看一看美国从战争中赚了多少钱。当整个欧洲受到破坏和蹂躏时，美国的大垄断企业却利用俄国士兵的鲜血和我国妇女和老人的眼泪，使他们的资本增加两倍和三倍。

战争结束时，美国人看到：我们不仅活着，打败了最强大的军队，而且还在向前迈进，重建我们的工业。他们觉得受到了威胁，就决心竭尽全力来阻碍我们前进。可能的话，他们要把我们逼得破产，从而把社会主义从地面上消灭掉。①

联合国设立了一个机构来援助受过希特勒分子占领之害的国家。该机构的总负责人是纽约市长拉瓜迪亚。②他是罗斯福的朋友。他曾来苏联旅行，我在基辅为他安排了一次接待。他原籍意大利。

拉瓜迪亚好象喜欢我们的国家，并尽力帮助我们。可是，他的帮助往往不符合我们的需要。我指的是当时西方竭力要给我们的那些物资。美国人运给我们的是战争中剩余的消费品，特别是罐头牛肉。然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机器。

不久以后，我们使他们卖给我们能铺设和切割煤气管道的机器。我国自己的专家从未见过这种设备。我们拿这些从西方买来的机器，用作我国自己的工厂制造时的工艺样品。

战后不久，拉瓜迪亚死去，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也解

---

① 关于赫鲁晓夫对租借法案和斯大林与盟国关系的其余看法，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20—226页。

② 菲奥雷洛·拉瓜迪亚，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1946年8月在莫斯科同斯大林会见。

散了。①可是，我重新碰见一个曾经到乌克兰来过的美国人。他回到苏联来，我接待了他。他名叫麦克达菲。②我清楚地记得麦克达菲先生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对我说的话："赫鲁晓夫先生，你如果能到美国来，让美国人民看一看你就好了——让他们看看：你是一个人。他们以为苏联人实际上不大象人。我国人民已在开始忘记你们曾同我们一起为打败希特勒而并肩战斗过了。"

不幸，麦克达菲的话说对了。蜜月结束了。我们已深深进入冷战之中——丘吉尔通过他在富尔敦臭名昭著的演说打响了意识形态之战的第一枪。

冷战的由来

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在防御方面采取的措施，我已在回忆录里口授了一些看法和追忆，如加强我们的陆军，海军，空军，导弹系统和核武库。可是，为了保证我们防御体系的巩固，只是加强苏联自己的武装力量是不够的；它也需要我们在同兄弟国家的关系上采取一定

①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47年。

② 马歇尔·麦克达菲，1946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派驻乌克兰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因抗议美国制定法律禁止把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基金用于对美国记者进行新闻检查的国家而辞职。

的具体步骤。战后，我们可以当然地说，我们已打破了资本主义对我国的包围圈。苏联不再是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在欧洲和亚洲有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的经济产值合在一起占世界总数的三分之一。对于一直在专心致志地为社会主义和正义而战斗的所有共产党人来说，想到这一点就得到安慰和鼓舞。

当美国等待了十三年，到罗斯福总统终于决定承认我国的存在，并同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时，我们已从苏维埃政权的初期走过一段很长的路程了。我记得我经常给外国记者讲起当时美国是多么愚蠢——我也记得记者如何回答："赫鲁晓夫先生，"他们说，"你不该对美国等了十三年才承认苏联的事如此不高兴。别忘了沙皇俄国是在美国从英国统治下获得独立后等了二十六年才承认美国的。"①当然，他们有些道理，但这驳不倒我的看法。沙皇的反动政府把每个叫作共和国的国家看作是危险的和有煽动性的，这是很自然的。因此，沙皇确实不能承认美国。但美国对苏联为什么会采取同样的态度呢？

即使在罗斯福给予我们外交承认以后，美国仍继续封锁和孤立我们。这种政策不仅对我们不利，对美国也

---

① 沙皇俄国在1809年承认美国，是在马萨诸塞州人弗朗西斯·达纳和他的国务卿小约翰·昆西·亚当斯试图获得叶卡捷琳那二世女皇的承认但未能成功的二十六年之后。美国承认苏联是在1933年。

是有害的，因为美国人如果同苏联的关系更正常些，本来可以得到文化、经济和科学上的好处。但美国政治家对一切合理的意见置若罔闻。战后，反动势力继续与我们为敌，它们只是比以前更强些吧了。我国工业受到了德国人的毁坏，而美国却变得空前富有。大垄断资本的代理人从军火生产中大赚其钱，并且，直率地说，是用窃取来的财产去填满他们的贪欲。在美国，装配线高速地运转着，生产出各种各样的高质量产品——包括强大的军事装备。另一方面，我国受到饥荒的打击；食品仍然是限额配给。确实，我国的军队在数量上和指挥质量上获得了不容忽视的发展。但我国的工业能力被严重破坏，我国的物质资源严重枯竭，使我们无法经受另一次战争。

对于刚从反希特勒战争中挣脱出来的——并承认苏联在打败希特勒中的贡献的——英国人、法国人和其他欧洲人来说，决不会再想到另一次战争。但西方某些政治家是健忘的。我们力求同我们的前盟国保持友谊；而他们开始推行损害这一友谊的政策。有些政治家，特别是在英国和美国，已在为一次新的战争的可能性作准备了。

我国同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的关系被那个纵火犯、军国主义分子丘吉尔严重地破坏了。他的那篇极力鼓吹世界帝国主义势力动员起来反对苏联的著名演说就是冷战开始的一个信号。丘吉尔是在一个叫富尔敦的小城市里

发表这篇演说的。①这个城市在美国的何处无关紧要；他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发表这篇演说，却偏偏选择在访美期间发表，却是极其意味深长的。我们知道，假如再发生战争，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面对着一个由美国领导的西方国家联盟。而且，冷战肯定有利于美国大垄断资本。因此，丘吉尔选择美国作为讲台使他的演说对我们更形险恶。

斯大林过分地估计我们的敌人的力量和他们对我们发动战争的意图，主要是由于丘吉尔的演说。结果他就着迷于加强我国对西方的防备。斯大林记得，正是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把苏联称做“泥足巨人”，使希特勒相信能够轻易获胜，从而鼓励他把部队投向我国。当然，在丘吉尔以前有许多人用许多种语言使用过这同样的称呼。②现在是丘吉尔在富尔敦再次发出同样的叫嚣。对斯大林来说，丘吉尔的演说标志着回到战前的态度。

---

① 1946年3月，哈里·杜鲁门总统把温斯顿·丘吉尔介绍给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的听众时说，“我知道他有一些建设性的意见要说。”随后丘吉尔宣布：“铁幕”已“横贯大陆而降下”，并鼓吹英美两国建立反苏的“兄弟联合”，即军事同盟。

② 事实上，第一个用这个词嘲笑俄国的是奥地利皇帝约瑟夫二世（1741—1790），他称俄国为“泥脚架上的黄铜巨人”。

我国同曾在打倒希特勒德国时与我们合作过的英国、法国、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无论从哪点看，都已被破坏了。我们丢掉了一切友谊的伪装。我们停止同我们的盟国一起欢呼我们的共同胜利，开始怀着忧虑和猜疑的心情注视着他们。斯大林确信西方在有意制造紧张局势，他认为另一次战争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

那时罗斯福——他总是怀着充分理解的心情对待我们——已经去世，而美国的领导人是杜鲁门，一个侵略成性的人和笨蛋。他的政策反映了他的愚蠢和他的阶级仇恨。他对苏联是怀恨在心的。他既没有一点政治手腕，也没有丝毫常识。我无法想象究竟怎么会有人认为他配当副总统，更不用说当总统了。全世界都从报纸上看到，他曾因一位新闻记者批评了他女儿的歌唱而打了那位记者一个耳光。单单这件事就足以说明杜鲁门有多少政治家风度，更不要说他是否适宜担任美国总统这样一个重要的职位了。①

这一切也许听起来很粗鲁，但在杜鲁门以及与他同样顽固和富于侵略性的国务卿、那一位政治低能儿艾奇逊先生的领导下，美国对外政策的目的就是从实力地位

---

① 这一段同样出现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61—362页。

出发来刺激和威吓我们。①美国人有原子弹，他们知道我们没有。他们竭尽全力炫耀他们对我们的优势。他们的空军无论在飞机的质量或数量上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美国的飞行堡垒和超级飞行堡垒在赢得抗击德、日的战争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至今仍为世界上任何别的飞机所难以匹敌。我甚至可以说美国人在那时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派遣飞机到全欧洲侵扰，肆意侵犯国界，从大陆的这端飞至那端。他们不仅飞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土——他们甚至肆意侵犯苏联的上空，主要在波罗的海沿岸和摩尔曼斯克附近的北方。

由于战争结束时我们在波兰和匈牙利驻有军队，斯大林亲自积极关心欧洲那一地区的事务。当美国开始反复飞越社会主义国家上空时，他的关心变得入迷了。我们其余的领导成员都小心翼翼地不去多管这些事情，除非斯大林亲自叫我们管。他严密戒备地监督着我国的对外政策，特别是我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作为他自己专管的特殊领域。他从不虚心考虑别人的意见，在战后尤其如此。我们其余的人都只是跑腿的。斯大林对任何超越界限的人都会发出使人可怕的咆哮。

---

① 迪安·艾奇逊自 1949 年至 1953 年担任国务卿。

阿登纳访问莫斯科

斯大林死后，阿登纳和他的同事们认为，他们终于有可能实现他们的主要目标——把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建立一个单一的资本主义德国。阿登纳的这个计划受到他的盟国的鼓励。他希望运用经济手段来反对我们。〔西德〕德国已拥有可观的经济实力，并能为苏联提供贷款——钱；我们非常需要钱来购买我国自己或任何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的现代工业装备。

因此，我们知道在阿登纳来莫斯科时我们可以指望什么。我们知道德国实业界巨头将试图利用阿登纳的访问来打开通向俄国的窗户，因为同俄国做生意对德国资本主义来说是有利可图的。①

我们把欢迎阿登纳的访问作为改变我们两国之间的不正常局面的一个机会。②会见是根据双方共同的倡议

---

① 1955年9月，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应苏联的邀请访问莫斯科。赫鲁晓夫关于阿登纳"打开通向俄国的窗户"这一说法，是借用通常指沙皇彼得大帝的一句话，人们描述彼得大帝同西方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是"打开进入欧洲的窗户"。

② "不正常局面"是缺少一个和平条约。

安排的，我们希望它能证明对双方都有利。

陪同阿登纳的有最近一次联邦选举之前任总理的基辛格，以及阿诺德，施密特和哈尔斯坦。哈尔斯坦曾定下过一条众所周知的原则。①从下面这件事中可以了解这条原则是怎么一回事：南斯拉夫人在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很坏时同西德签订了一个条约；但是，在局面正常化后，②南斯拉夫人马上承认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于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自动中断了同南斯拉夫的关系。铁托同志由于抵制了西德的压力和打击了哈尔斯坦主义应该给予称赞。后来，西德同南斯拉夫重建了关系，哈尔斯坦主义只落得一场空。

使苏联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立的主要问题是和平条约问题。〔东德〕德国人和阿登纳都赞成结束仍存在于德苏之间的法律上的战争状态。缔结条约将使我们能同波恩建立外交关系，然后发展经济和文化联系。

不出我们所料，阿登纳告诉我们说，德国政府准备给

---

① 库尔特—乔治·基辛格，卡尔·阿诺德，卡洛·施密特（社会民主党领导人，本节下文中将提到），和西德外交部国务大臣沃尔特·哈尔斯坦。所谓的哈尔斯坦主义坚持主张联邦共和国有权同任何承认东德政府的国家断绝关系。

② 莫斯科和贝尔格莱德之间的"正常化"是在1955年由赫鲁晓夫创议而实现的。见"同铁托和解"，《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74—391页。

我们提供贷款，并准备把他们按波茨坦协定应该支付给我们的赔偿或补偿付清。他说的是大约五亿西德马克的款项。马克在当时是价值很高的通货。

阿登纳要什么作交换呢？他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我们不得不使他正确了解我们的立场：首先，我们不会去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其次，出于我们在意识形态上的考虑，不是要消灭而是要加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是我们的盟国。它的独立对于我们在战略上，经济上和政治上——以及意识形态上——都有利害关系。允许〔西德〕德国建立一个同西方结盟的单一的资本主义德国对我们来说将意味着后退到波兰的边界。这将是政治上和军事上的一个重大挫折，也会是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开始。它将鼓励西方反动势力对我们施加越来越多的压力。一旦开始后退，要停住就难了。总而言之，阿登纳最初的谈判条件是我们完全不能接受的。

我们仍然希望会谈能达成某种协议。双方都强烈追求自己的目标。据我回忆，不论在会议桌上还是在私下谈话时，属于阿登纳的党内的工联主义者阿诺德和社会民主党员施密特对我们的关系正常化表现了真诚的关心。但阿登纳全面控制着德国代表团，基辛格是他的得力助手。至于我们，则表现了巨大的坚定性，并告诉德国人他们不用指望从我们方面取得任何让步。

一次，我们拒绝了阿登纳提出的一个具体建议，他宣

称他的代表团将中断谈判，第二天就回国。①

我说，"好，我们不能达成协议，我深感遗憾。如果我们未能签订条约，这对双方都是有害的。毫无疑问，如果我们的谈判失败，这将使联邦共和国受到损失。可是，这是你们的事。你们可以在你们希望的任何时候回去。"

我们完全准备德国人第二天回去，不再举行通常的签订条约仪式。可是，在最后一分钟阿登纳和他的代表团传话过来说他们不回去了，他们要同我们再会谈一次。所以，他们要回去的威胁不过是虚张声势，其意图是考验我们，看看我们的立场是否坚定。他们以为我们也许会害怕在我们两国之间继续存在法律上的战争状态。但他们错了。

到头来，是阿登纳而不是我们感到不得不继续谈判。谈判重新开始，我们一致同意了一份双方都能接受的条约草案。

一次，德国代表团暗示，美国大使查尔斯·波伦企图使阿登纳不同意签订条约。②以前，当波伦作为罗斯福的

---

① 僵局是由于苏联继续扣留德国战俘而引起的。

② 查尔斯·波伦，1953年至1957年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他在自己的回忆录《历史的见证》里指责阿登纳在同他交往中表现"傲慢"，在苏联的压力下表现"顺从"："我在苏联提出建议之前和之后都曾把我的想法告诉阿登纳和他的助手们〔西德人不应接受苏联关于承认的条件〕，同时根据华盛顿的指示着重指出，如何决定是总理的

亲密伙伴时，我们认识了他，并且喜欢他；他是罗斯福在德黑兰和克里木〔雅尔塔〕时的私人译员。可是后来，当他担任驻苏大使时，他却变成了一个支持当时美国敌对势力推行的一切最可恶的政策的无耻反动分子。他施展了他以为能成功的每一项阴谋诡计。与其说波伦改善了美国同我们的关系，不如说他使关系冻结了。

现在又是波伦在企图对我们的事务横加阻挠。他竭尽所能使我们同阿登纳的谈判陷入僵局或拖延不决。我不能肯定说波伦是否在执行华盛顿的指示，但我觉得比较讲得通的是他可能是在按自己的意见行事，阻止我们同西德关系的任何改善。他知道这种改善将减少美国——因此也减少他自己——对波恩政府的影响。

可能阿登纳也怀疑波伦是在按自己的意见行事，所以他催我们赶快，以便在波伦有机会看到条约的修正草案之前，以及在波伦的上司从华盛顿直接施加压力之前就签订条约。阿登纳也许是西德资本主义的忠实仆人，但他抵制了波伦的干涉。

阿登纳对于能够排除波伦企图进行的干预和恢复谈判并达成协议一事，似乎感到很高兴。后来我听说波伦对

事。我还认为由国家领导人到莫斯科去就外交承认进行交易是一个错误，我也这么说了。阿登纳被诱接受了一项并不称心如意的协定。在他的严重分裂的班子中，有人把我向华盛顿叙述的保留意见告诉了他，于是阿登纳就在美国记者面前攻击我'毒化'了气氛。"

阿登纳十分恼火。但那时已太迟了——协定已签订好了。

当然，阿登纳的动机同和平或友谊之类的任何高尚感情是丝毫无关的。我们的条约全然是一桩交易。发展中的德国经济正在寻找新的市场。因此，德国资本家追求利润的欲望，压倒了美国企图使苏联处于孤立状态的相反的欲望。我们得以打破美国的封锁，是因为我国贸易合同的远景符合德国实业家的利益。后来，我接见了克虏伯公司和其他德国大公司派来的代表。

关于阿登纳，我能再说些什么呢？首先，他能极油滑地谄媚。我记得他有一次对我说——我忘了在谈什么事情的时候——“哦，赫鲁晓夫先生，只是由于您的仁慈之心和伟大的智慧，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他常常在别人面前说这种话。他还喜欢在宴会上俯身向我靠拢，凑着我的耳朵低声地讲些十分殷勤客气的话。我觉得这种举动出自象他这样身分的政治家是不相称和不庄重的。或者是他自己庸俗，或者是他想象别人庸俗。

然而，我必须认为我们这位已故的敌人是具有才智和常识的。每逢新闻记者攻击他和谴责西德是个一心想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的侵略者时，阿登纳总是装得象个完美的小救世主的样子。“我不知道你们在讲什么，”他会说，“如果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西德将是第一个遭到毁灭的国家。”阿登纳讲得完全正确，我很高兴听到他这样说。他公开发表这样的讲话是我们的一大成就。我们不

仅使头号敌人规规矩矩，而且阿登纳帮我们使其他敌人也规规矩矩。①

阿登纳也是德国资本的可靠的代理人。为了在那些年里能始终得到政治上的支持和不断赢得选举，他必须如此。我记得他曾问我："赫鲁晓夫先生，你以为德国工人会投社会民主党的票吗？不。他们中的大多数投我的票。"不幸，这是事实。为他说句公道话，他创立的基督教民主党在德国至今仍有巨大的影响。

有一次，阿登纳无意中听到施密特用德文的"同志"一词称呼我。阿登纳带讽刺地笑了。此后，他也开始用德文"赫鲁晓夫同志"叫我。于是我也用德文"阿登纳同志"回叫他。

阿登纳在访苏期间，送给我一件极好的礼物——一架蔡斯望远镜。这架望远镜又轻又好。我时常带着它去散步。我碰着人时，有时就把望远镜给他们看，并说这是阿登纳送的。这使人们总要反复拿起来瞧瞧。我不是说这架望远镜比我们苏联或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制造的望远镜好些，但我必须承认，我认为它比我所有的其他望远镜都轻巧。靠着它，我能更多地看到那些使莫斯科近郊的景色显得非常美丽的田野、森林和草地。这样，由于阿登纳的一点小小的帮助，我能够开阔我的眼界。你可以说

---

① 这一段也出现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17页。

我从同阿登纳的会见中得到两件纪念品——我的望远镜和我的回忆。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丘吉尔在我们实际上尚未准备好之前倡议举行最高级会议。他后来解释说，他想在斯大林死后立即——可说是在尸体未冷之前，同新的苏联领导进行会谈。他以为西方能在斯大林的后继人脚跟尚未站稳之前从我们手中勒索到一些让步。

我们到日内瓦去是希望达成一项不仅对参加会议的国家而且对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有利的协议。我们希望保卫国际和平。可是丘吉尔却另有打算。他想使最高级会议只有利于他自己——即只有利于西方：英国，美国和法国。虽然他已退休，他的非现实主义的思想仍然支配着会议。他对会议进程的影响确实比艾森豪威尔大。

艾森豪威尔受到〔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很大的影响。杜勒斯是个侵略成性的人物，他对苏联有一种天然的强烈反感，对每一件新的事物、每一件共产主义的事物、每一件社会主义的事物都有一种思想意识上的仇恨。这种仇恨一直伴随着他，直到他生命的末日。他因提出一套反对我们的系统理论而臭名昭著。他的外交政策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公式，就是搞战争边缘，但是不越过这个

边缘。当然，这种态度现在是过时了。

我应当说，我们对杜勒斯有两重看法。一方面，我们认为他是我们意识形态上的头号敌人。另一方面，他不止一次地证明他并不是真正要战争。例如，美国对外政策掌握在他手里时，我们进行干涉以结束英国、法国和以色列1956年对埃及的侵略。尽管杜勒斯醉心于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孤立苏联，但他表现得十分慎重，并帮助避免了近东的一场真正的大灾难。即使在美国派遣伞兵和海军陆战队进入黎巴嫩时，杜勒斯还是相当明智地不让冲突发展成战争。当我们同美国在叙利亚接近冲突的边缘时，他同样表现了克制。①

在这些和另一些事件中，杜勒斯是一个值得称道的和很有意思的敌手，他迫使我们或者放下武器，或者寻找一些适当的理由来继续斗争。这总是使我们谨慎地去同他斗智。

我想，我已提到过我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时同尼赫鲁谈到杜勒斯的情况。②

"你真的同杜勒斯握了手吗？"尼赫鲁问。

"是的，"我说。"想象一下吧！我们不仅互相问好，而且在艾森豪威尔招待我们的一次宴会上我还坐在他的旁

---

① 这是在1957年叙利亚和土耳其关系紧张和1958年叙利亚倡议组织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时候。

② 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97—398页。

边哩。”

尼赫鲁用他特有的那种温和、平静的神态对我微笑着说，“我不能想象赫鲁晓夫坐在杜勒斯的旁边。你们互相交谈了吗？”

“是的，但我们的交谈不很深。大半是简短的问答。我们只是想保持礼貌。我想，我们谈食物的时间比谈任何别的事情都多。‘您喜欢这只菜吗？’或，‘很好吃，不是吗？’——诸如此类。”

虽然我有时把杜勒斯叫做帝国主义牵着的野狗或资本主义的忠实走狗，我知道总有一天我们要给他说句好话。

他去世时，葛罗米柯正在日内瓦开会。会议的其他参加者都去参加杜勒斯的葬礼。我们建议葛罗米柯也去。让我们的代表参加我们意识形态上的头号敌人的葬礼究竟有什么不好呢？在我的建议里，我实际上提出了一个更重大和更严肃的具有历史意义的论点。但葛罗米柯不同意。我尽力使他相信他的想法是错的——他参加这样一个仪式不会是不愉快的。但他却想留在日内瓦。①

① 杜勒斯死于1959年5月，当时讨论柏林问题的四国外长会议正在日内瓦进行。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尽管表面上有些不愿意，但还是同克里斯琴·赫脱、塞尔温·劳埃德和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一起飞往华盛顿参加葬礼。他们四人会见了艾森豪威尔，葛罗米柯在随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代表他们发言。

杜勒斯死后，我常常对朋友们说，我们将因他不在而感到寂寞，总有一天我们要为他说句好话。我只是半开玩笑。他可能是个敌人，但是他却具有决不越过他经常谈论的那个“边缘”的理智。

尼克松和“厨房辩论”

艾森豪威尔总统邀请我访美前不久，美国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举办了一个展览会。美国副总统尼克松来莫斯科主持开幕式。①展览会没有多大成就。举办人显然并不认真去表现美国的生活和文化，他们感兴趣的倒是在宣传上大吹大擂。我们参加展览会开幕式的代表告诉我美国人展出了些什么，但是，我还是决定亲自去参观一下。首先我对在美国流行的新的艺术风格感到惊奇。早在展览会开幕前，当我去观看美国人修建他们的展览厅时，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他们用在美国制造的预制部件修建整个展览馆。这似乎是建筑房屋的一种新奇而又合理的方法。

我这次去参观展览会不需要任何正式决定，其他领导成员要去也是绝对自由的。因此我就去了。展览会里展出各种图表和照片。每样展品的陈列方式都很吸引

① 1959年7月，副总统尼克松到莫斯科主持全美展览会开幕式。他和他的夫人正式访问了波兰和苏联。

人。但总觉得所有这一切都太铺张和纯粹为了做广告。各种展品对我国人民，特别是对我们的技术人员、党员以及领导成员，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我们的态度是很明确的，对我们来说，主要考虑的是每项产品或物品的实用性。在这一方面，美国展览会是一个失败。展出的东西从美学上来说可能令人感到愉快，但实用价值不大。其中有些展品甚至从美学上来说也不是令人愉快的。例如，有许多油画和雕塑品是美国人称为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其中的大部分我感到毫无意义，甚至令人厌恶。其中有些作品纯粹是堕落的东西。一个女人的塑像特别令我感到不舒服。那可怕的丑态我简直无法用言语来形容。这是一个畸形而巨大的女人像，一切都不成比例，硕大的屁股，各方面都显得奇形怪状。

当我走过艺术馆的时候，许多美国记者提出了不少问题向我追问。事实上，他们完全知道我对这种艺术有怎样的感觉。他们是在引我发表我的意见。我说："假如这个雕塑家的母亲看到她的儿子把一个女人刻画成这种形状，她会有什么感觉？他一定在某方面有些变态，或是一个下流无耻、荒唐猥亵的人。一个热爱生活、热爱自然的人，一个爱护女性的男子，是不会把一个女人描绘成这样的！"

也许有些人喜欢这样的艺术。每一个社会在它的发展过程中都必然会经过这样的阶段：在那时各种奇怪的

思想都涌现出来，有的是进步的，有的是倒退的，有的则完全是邪恶的。

尼克松陪着我一起参观，我走到一个美国典型厨房的展览室。我开始观看一些用具，有些是有趣的，但许多东西看来纯粹是为了展览，没有什么用处。当我一开始对这些展品进行评论时，我就上了钩，卷入了同尼克松的一次长时间谈话。多年来新闻记者们把这件事看作是苏美关系的特征。

谈话是这样开始的：我拣起一个挤柠檬汁吃茶的自动器说："尼克松先生，你们怎么在苏联展出这种笨东西！你们吃茶需要的不过是几滴柠檬汁。我想你们的主妇使用这种小机器比我们的主妇切一块柠檬，丢在茶杯里，用调羹挤出汁来更费时间。当我还是小孩时，我们就常用这种方法去挤柠檬。你们的这个工具，我看无论如何不是一种改进。它并不能真正节省时间和省力。事实上，你可以用手更快地挤出柠檬。展出这种笨东西是对我们智力的侮辱！"

尼克松不同意，他试图用他的思想方法来说服我，用他那种能言善辩的方式来争论。我用同样的方法来进行回答。在政治辩论中，我有我的能言善辩的方法。到后来双方都很激动，但辩论仍在继续。新闻记者拥挤在四周进行录音，他们的扩音器甚至碰到了我们的脸上。

后来，我直爽地向他提出一个问题："尼克松先生，你

把这件美妙的器具带来向我们展览，但你们真的在广泛使用这种器具吗？美国主妇们的厨房里有这种东西吗？”应当对尼克松说句公平话，他的回答是老实的，他说这里展出的东西市场上还没有。一听到这话，人们都哄堂大笑起来。我说，“啊！原来你在向我们夸耀许多你们国内还未使用的东西！你以为我们看不出来吗，你想我们会对你们带来展出的这种骗人的东西称赞一番吗！”

当然，我们真正辩论的不是厨房用具问题，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制度问题。美国人想用一些可爱的新玩意儿来打动俄国人。他们相信即使展览会里混进一些多数美国主妇从未见过的东西，俄国人也区分不出来。关于这一点，展览会的组织者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能是对的。他们要俄国人去思考：“哦，他们资本主义国家里有这种设备！为什么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却没有呢？”无论如何，这就是他们的目的，虽然这种想法可能是如何不现实。

至于尼克松，他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代表出现的。我并不是说美国不富裕，没有高超的技术和创造性。它当然是有的。真的就是真的。我是说展览会，里面大多是照片，有些家庭用具是你在美国的任何家庭里也找不到的，有些雕塑品毫无用处，只能一笑置之并嗤之以鼻。

有一天，尼克松决定要参观我们的市场。他在那里

见到我国的一位工人，由于某种原因，他表示要送他一笔钱。这位工人严词拒绝，他简直是叫尼克松滚蛋。我们的报纸做了一件好事，向我们报道了尼克松会见工人的消息。我们的报刊从正确方向上教育了苏联人民，使他们懂得从美国在索科尔尼基公园举办的展览会和尼克松那里能得到些什么。至于国外的资产阶级报刊，在以后的许多年内，则把赫鲁晓夫同尼克松的厨房辩论传为笑谈。

我个人对尼克松第一次要说的话就谈这么多。当然，在很久以前，我从报刊上就对他有所了解，因为他在美国政治领袖中占有特殊地位。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反动的，是一个敌视苏联的家伙。一句话，他是麦卡锡式的人物。

无论如何，我愿对尼克松再说最后一句话。在我退休后他曾同他的夫人一起来到苏联。他以旅游者的身分在我国游览。他在回美国前经过莫斯科①。在他乘飞机离开后，我得知他曾同他的夫人找到我的公寓，并准备来看望我。他以为我住在城里，要来拜访我。有人告诉他

① 尼克松1965年4月同一批美国工业家去欧洲游览时，临时去莫斯科作短暂的旅行，并在苏联退休的领导成员的寓所里去寻找赫鲁晓夫。可是，正好赫鲁晓夫到彼得罗沃一达利涅耶的别墅去了。赫鲁晓夫有一点记错了：1965年尼克松夫人没有同他的丈夫一起去莫斯科作私人访问。

我不在那里。说实话，我很遗憾没能见到他。他不怕麻烦来找我，使我很受感动。特别使我感动的是他不计较过去我们的关系一直很紧张这个事实。我们见面时很少讲善意的话，大部分是吵嘴。可是在我退休后，他曾想来看我，表示出真正的人的礼节。我没有机会对他的关心表示谢意，也没有机会同他和他的夫人握手，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

第十六章 艾森豪威尔和美国之行

1959年我们出乎意料地接到了去美国访问的邀请。下面是事情发生的经过。

一个由美国有势力的工业家组成的代表团，其中有些人或许跟艾森豪威尔政府有密切关系，曾来苏联考察工业方面的一些部门，尤其是造船业。我们让他们参观了当时正在建造的原子能破冰船。在访问结束时，他们邀请我们也派出自己的代表团去参观美国的造船厂。我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个邀请。象这样的交往是有助于缓和美苏间的紧张局势，也是对双方有利的。我们的代表团成员中有科兹洛夫同志。①他按专业是个冶金学家，但是好些年来一直担任列宁格勒州的党委书记，因此对造船工业是精通的。

---

① 第一副总理瓦·伊·科兹洛夫于1959年6月访问美国。他被安排参观了新泽西州卡姆登船厂，那里当时正在建造第一艘核动力"大草原号"货轮。一个月之后，尼克松在访苏时，坚持要苏联同意让副总统的随行人员海军上将海曼·格·里科弗也象科兹洛夫考察"大草原号"一样，仔细地考察苏联核动力"列宁号"破冰船。

科兹洛夫后来告诉我，他和我们的工程师们被安排参观了美国正在建造的一艘核动力轮船。他在轮船里慢条斯理地仔细地进行观察。诚然，美国人只是让我们看他们给看的东西，然而，科兹洛夫告诉我，我们的工程师已经注意到一些有趣的东西。当我们的代表团访问快要结束时，总统的信使会见了科兹洛夫，交给他一封信并且说："把它转交给赫鲁晓夫。"我们的代表团就乘飞机回国了。当科兹洛夫抵达莫斯科时——我想那是个星期天——他就到市郊我住的别墅来看我，并说："我带来了艾森豪威尔总统给你的一封专函。"

信中内容简短。总统邀请我到美国作一次友好访问。我必须说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我们毫无理由期待这样的邀请，无论是在当时或者其他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一直极端紧张。然而，这是艾森豪威尔、美国的总统在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中央委员会书记赫鲁晓夫率领政府代表团去作友好访问。（艾森豪威尔只用部长会议主席的头衔称呼我，尽管他理所当然地知道我还是党的首脑。）

美国一直全面抵制我们，甚至达到发出特别禁令，禁止向苏联购买蟹肉的地步。他们说我们的货物是利用奴隶劳动生产的。这听起来好象是疯人痴语，但确实有过这样的法令。他们还拒绝购买我们的鱼子酱和伏特加酒，尽管美国的行家们认为我们的这些商品都是世界上

最好的。我们过去曾向美国出售过无烟煤，但后来也给下了禁令。

然而现在突然来了这份邀请，它意味着什么呢？是某种转变吗？令人难以置信。我们感到，部分的原因可能是由于美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于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艾森豪威尔正在被迫听从那些主张为缓和紧张局势采取具体措施的民主派人士和商界人士的呼声。

我承认，我有好奇心想去看看美国，虽然这不是我的第一次出国旅行。毕竟我也到过英国、瑞士、法国、印度、印度尼西亚、缅甸等国家。它们都是外国，但不是美国。美国在我们的思想里和对世界的看法中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为什么不应该是这样呢？它是我们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最强大的敌人，是为其他国家定反苏调子的首领。以对苏联的经济封锁为例，是谁的主意呢？当美国的某些伙伴已愿意签订经济协定购买我们的原料时，美国仍然坚持不变。难怪我们有兴趣要去亲自看一下我们的头号资本主义敌人。

如何答复艾森豪威尔的邀请，应该作出一个决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在克里姆林宫开会考虑这件事。我们原则上决定接受邀请并表示感谢。但是，这也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问题。我们在此以前已接到去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作正式访问的邀请。我们先到哪里呢？按照一般的礼节，我们应该首先访问先向我们发出邀请的国家，但是，

我们当然更想先访问美国。

我们推迟访问斯堪的纳维亚有一个现成的借口。那儿的资产阶级报纸正在对他们的政府邀请我访问掀起了抗议的浪潮。我记得他们当时是指名道姓地咒骂我。于是，我们就决定通知这些国家，我们将推迟访问，因为他们的报纸正在制造不利于我们前往的气氛。

我们通知驻华盛顿大使缅希科夫同志，要他为我们的访美旅行进行一切必要的安排。①当准备工作正在进行时，有一些问题开始使我们担心。首先是我们会受到何种待遇呢？我将受到作为国家元首还是作为政府首脑的正式欢迎呢？（我的职位是政府首脑——最高苏维埃主席才是国家元首。）美国人向我们的大使保证，他们将以最高的礼仪接待我。②但我们还是担心可能会遭到歧视，可能对我们的接待会与我们的地位所应该受到的礼遇不相称。我们的某些担忧后来被证明是有根据的。

对于他们为我抵达华盛顿所进行的安排，我们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在某些方面，我们可能过分了些；然

---

① M·A·缅希科夫，1958年—1961年驻华盛顿大使。

② 严格地说，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赫鲁晓夫是政府的首脑，而不是国家元首；苏联的国家元首是苏维埃最高主席团主席——当时是伏罗希洛夫。经过苏联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的讨价还价，最后达成一致的意见，对赫鲁晓夫的访问在外交礼仪上按“国家元首”接待。

而，我们要从一开始就强调我们知道有一种歧视我们的倾向，我们要谨防任何此类歧视行为的再次发生。

美国人同意了我们的条件。我到达华盛顿的日期定下来了，日程也作了安排。①接下来便要决定我们代表团的成员组成。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当然包括在内。我记得在我和布尔加宁访问英国时，我们带了库尔恰托夫同去。所以这次我建议，我们代表团中应该有一位作家，这样可以和美国文学界人士建立关系。很自然，肖洛霍夫的名字被提了上来，他是个很明显的候选人，尽管我们知道他有嗜酒的弱点。过去，我曾为此和他谈过话。一次，他来找我说："我已被邀请去挪威，但当局不让我去。"我向他解释说，这并不是因为他政治上不可靠；而是我们恐怕他会控制不住自己而失态，以致可能会伤害他自己的身体健康和我们国家的声誉。他保证克制自己，于是我们就同意他出国。他访问过英国、瑞典、挪威和芬兰等一些国家，我们也没有听到我们驻在这些国家的大使们告过一次他的状。如果他闹了笑话，他们是一定会报告的。既然肖洛霍夫在苏联和在国外都是极有名望的小说家，我们决定把他列为我们代表团的成员同去美国。

是否带夫人前往也作为一个问题提了出来。在我和布尔加宁到日内瓦和伦敦去的时候，我们都未带夫人。

① 赫鲁晓夫在1959年9月对美国进行了十三天的访问，共到过七个城市。

不带夫人是我们从斯大林时代留下来的一个传统。斯大林对带夫人同行很不赞成。我记得只有一次，他同意米高扬带夫人去某地。一般来说，我们总是认为带夫人出访不象是办公事，而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奢侈。我原打算单身去美国。首先是米高扬提出建议，他说如果我带尼娜·彼得罗夫娜以及我的孩子们同行，可能会给国外公众留下较好的印象。①我对此有些怀疑，但其他领导人都支持米高扬。最后我也让步了。我们提议让葛罗米柯也带夫人同行。

我们这些领导人平时一直专心致志于国内问题，因此我们对美国有许多情况需要了解。例如，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告诉我，日程表上预定将有几天要在戴维营和总统会谈，但我简直不知道这个戴维营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我向外交部询问，外交部也说不知道。后来，我们再向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询问。引起我疑心的一个原因是，我记得在革命成功后初期，当苏联刚刚开始和资本主义世界建立联系的时候，苏联有一个代表团被邀请到一个名叫太子群岛的地方会晤。后来报纸上报道，这个群岛就是人们放逐野狗让它们去等死的地方。换句话说，苏联代表团被邀请去那里是使它受到歧视。在当时，

① 他随行的家属有妻子、儿子谢尔盖、女儿尤莉娅·冈塔尔和拉达·阿朱别伊以及女婿A·I·阿朱别伊——《消息报》编辑。

资产阶级从不错过羞辱和激怒苏联的任何机会。我怕这个戴维营可能就是那种把不被信任的人送去隔离的地方。

连我们驻华盛顿的大使馆也不能确切地告诉我们戴维营究竟是个什么地方。我们只得叫人去作专门的调查研究。末了，我们获悉戴维营类似我们的别墅，是大战期间罗斯福为自己休息而建造的乡间别墅。我感到这决不是侮辱，也不是歧视。相反，邀我到戴维营和艾森豪威尔相处几天是对我极大的尊敬。

我在当时从未向任何人说过我不知道戴维营是什么地方。今天，我觉得可笑，但我仍然感到有些惭愧。这证明我们在某些方面是多么无知。

我们出发的日子快到了。我们得决定怎么走。坐船所花的时间太长。要是乘坐伊尔—18 飞机，我们沿途就要作几次停留。我们当然可以乘坐外国的飞机，但如果我们能够乘坐自己的飞机，那么就会给人以较好的印象。我们仅有的能直达华盛顿而无需中途停留的只有图—114 飞机。这种飞机在技术界已经引起密切的注意。同其他飞机相比，它的座舱大、航程远、推动力大以及飞行速度快。然而，图波列夫还一直在对它进行试验，并发现它还存在一些问题。出现裂痕以及其它一些毛病时有发生，因此，使人产生了某种担忧。我决定找图波列夫作一次谈话。

他说："我绝对肯定你们不会发生什么问题。飞机的飞行十分可靠，但我可以派几名我的技师和你们同行，以防万一。我愿意向你表示我对这种飞机的信心是如此之大，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让我的儿子阿廖沙和你们同去。"

我回答说："我不再追问了，我相信你的话。我不要你作什么担保。我当然不需要把你的儿子当作人质带着同行。要是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还有别的什么人与我一起死是无所谓的。我打算乘坐这架飞机是因为我信任你。"

但是后来我们确是将阿廖沙带着同行，因为他对这架飞机里里外外的性能都很熟悉。如果发生什么意外，有他在机上将是有好处的。况且，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愿意让孩子去看看美国，阿廖沙本人也有此要求。我们没有公布图波列夫的儿子与我们同行的消息；要是公布了，那等于是在作种种解释，那会有损于我们的形象。①

我们仔细地计算了从莫斯科到华盛顿的飞行时间。在我们到达时，预定要为我们举行专门的仪式。所以，我

---

① 事实上，设计师的儿子A·A·图波列夫此去未曾化名；他随同赫鲁晓夫前往得到了证实。赫鲁晓夫也并非第一个乘图—114飞去美国的苏联官员；三个月前，科兹洛夫已带着老图波列夫作过一次同样旅行。

们不能迟到，但也不愿意过早着陆。为了不在预定时间之前抵达，我们总可以在华盛顿上空盘旋几圈；但是，如果我们迟到的话，那对我们的威望将是个打击。

你可以看到，当我们从莫斯科起飞向西飞行的时候，我心里想的事情很多。我们越过斯堪的纳维亚，又飞到了大洋的上空。尽管飞机发动机的嗡嗡声使人难以入睡，但航行是平稳和相对地安静的。然而，我们不习惯这种闹声。过了一会儿，我已能勉强地使自己放松些，最后就睡着了。第二天要抵达华盛顿了，我们使自己的精神恢复一下是很要紧的。

当我醒来时太阳已经升起。我从机窗俯视下面的海洋，脑际涌现出种种想法。当我想到我们是乘坐自己制造的新客机去美国的时候，我感到自豪。并不是因为我们崇拜美国。相反，我们读过高尔基在《黄色魔鬼的城市》中以及伊尔夫和彼得罗夫在《一层楼的美国》中对资本主义美国的描述，知道有关美国的种种邪恶。①况且，我曾在国内战争后的头几年里遇到过一些美国人，那时候我从红军中复员回家，到鲁钦科夫煤矿当副经理。一

---

① I·A·伊尔夫和Ye·P·彼得罗夫合著过许多讽刺故事、小说和剧本，其中包括他们在1935年访问美国后所写的幽默的游记，它使许多苏联人看到了美国和美国人的形象。马克西姆·高尔基的《黄色魔鬼的城市》是在1906年访问纽约后写的。

些矿工从美国来帮助我们。那就是我初次和工人的美国发生接触。我听到了美国工人亲口所讲的美国，知道它并不是天堂。

我之所以感到自豪还由于我们最后迫使美国承认了与我们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必要性。当美国总统亲自邀请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时候，那么谁都知道，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我们已经从美国甚至不给予我们外交承认的时代经过了一段很长的路。我们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以及他们所取得的胜利而感到自豪。我们已把俄国改造成一个高度发展的国家。我们的经济力量、我们武装部队的力量以及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力量是迫使美国总统谋求改善关系的主要因素。

我不想隐瞒我们也有一些下意识的想法和感觉。我琢磨着我和艾森豪威尔未来的会晤。我以前曾见过他两次，一次在 1945 年 5 月 9 日战胜德国的庆祝会上由斯大林介绍和他相识，还有一次是在日内瓦。①可是，这次情况不同，我将与他面对面会谈较量。当然，我不是完全单枪匹马：葛罗米柯将和我一起参加。当时我尊重葛罗米柯，现在我仍然尊重他，他是一位出色的外交部长。但是，我在和艾森豪威尔会谈中间不能老是跟葛罗米柯交头接耳地商量。我很看不惯在日内瓦谈判的过程中，艾

---

① 赫鲁晓夫与艾森豪威尔前两次的会晤，详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395—399 页。

森豪威尔竟应允杜勒斯当着他的面不断地递条子，我不愿意自己也这样干。倒不是我害怕，但也得承认我有些担心。我感到好象是将要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似的。

我们已经过在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英国的考验。可是，这次不同——这是美国。我们倒不是认为美国人的教养会比英国人高明，而是美国的实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此，我们的任务是既要代表我们国家的尊严，又要对谈判的对方以礼相待。人们不该忘记，在斯大林的一生中，直至他去世的那一天为止，他总是告诉我们说，我们根本经受不住帝国主义的压力；在我们初次与外界打交道时，我们的敌人就会把我们打垮，我们将会由于心慌意乱而不能捍卫我们的国家。按照他的说法，我们将会变成某种“内奸”。

虽然心头思潮起伏，但我仍然不使自己愁眉丧气。事实正好相反，形势的挑战促使我竭尽全力去准备会谈。我将要与代表世界上最强大的军事威慑力量的国家的领袖会晤，并与他讨论和平共处、禁止核武器协议、裁减武装部队、撤军以及撤除在外国领土上的基地等一系列当代的重大问题。我还期待和美国贸易界人士建立联系。甚至斯大林也曾对获得美国贷款发生兴趣。我们要美国人①解除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禁运。有这

---

① 在原文中，赫鲁晓夫在这里用“Американы”这个词，而不用正确的俄文名词“Американцы”(美国人)。他解释

么多事情要商谈，必然会产生一些问题。我们当然也期待与美国共产党的代表会晤，虽然我们预料在这方面不会遇到些什么困难或争执。

当我正在考虑这些问题的时候，有人来告诉说，我们就要到达美国了。我们的飞机开始在上空盘旋，即将着陆。再过一会儿，我们就要面对美国，也就是我在伊尔夫、彼得罗夫和高尔基书中读到的美国——现在，我将能够亲眼看它，亲手接触它。这一切又使我警惕起来，我由于激动而感到神经紧张。

华盛顿以风和日暖的天气向我们表示热烈欢迎。当我们的飞机着陆时，我从机窗向外望去，已能看出一堆堆人群，他们都穿着华丽的夏装。从飞机上往下看，人群就象五色缤纷的花坛。我还看到了高台、仪仗队和红地毯。

飞机着陆了，并滑行到我们下机的停机坪。在这里，我们碰到了困难。原因是我们的飞机比美国的高得多，因此开来的机动舷梯够不到我们的机舱门。我们的驾驶员说，我们只得使用飞机上的备用梯。这样，我们就不能

说："我之所以用'Америкены'这个词，是因为它出自《第1469号铁甲列车》一剧。游击队在审讯一个美国人时，有一个队员说：我们抓到了一个'Америкен'。"V·V·伊凡诺夫在1922年著有描写国内战争的小说《第1469号铁甲列车》，并在1927年改编成剧本。

按照外交礼节那样，正式地和尊严地走下飞机，而只好实际上用双手双脚爬下来！

我们没有让这个问题使自己受窘。远远没有。尴尬的倒是美国人。他们竟不知道我们乘的是一架如此巨型的飞机。在他们看到这架飞机时，我们可以觉察出他们眼睛里的惊讶神情。他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飞机，他们自己当然也没有这样的飞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不会有。（后来，我们在谈判一项两国间飞机通航的协定时，美国要求我们推迟批准该协定，因为他们还没有可以从华盛顿直达莫斯科而无需中途停留的飞机。）

我们从图—114飞机上爬下来后，总统前来迎接我。他没有穿军服，而是穿的便服。他把我介绍给政府的其他成员。接着，我向我们的大使、大使馆的其他官员以及他们的夫人们致意问候。有一些孩子向我献花。官方的接待工作做得很周到，但是据我的回忆，公众在迎接时很明显地是有节制的。在我国，迎接的场面通常是热闹和热情的，但在美国则不然。我想这些人把我们看得好象是什么怪物一样。他们心中在想："原来这些人就是布尔什维克；我不知道能对他们指望什么。"我甚至还有这种印象：人群中有些人对我们的到来并不赞成。

艾森豪威尔把我们邀请到铺着红地毯的高台上。台上装有好几个话筒，这样我们的讲话不仅整个机场可以听到，而且还可能播送到国外去。这给我留下的印象极

为深刻。一切都是光彩夺目。我们国家的做法不是这样的；我们总是以无产阶级的方式办事，所以我怕有时候这会在安排上有点粗枝大叶。美国人确实讲究接待的排场。

艾森豪威尔以主人的身分致传统的欢迎词，我简短地致了答词。然后，乐队奏两国国歌，紧接着鸣起二十一响礼炮。那是个非常庄严隆重的时刻，使我感觉到莫大的自豪；也简直使我有点飘飘然。我们都脱帽，并注目立正。

到目前为止，美国严格地按照一国政府首脑到达时应给予的礼仪对待我们。这是美利坚合众国，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它现在以荣誉赋予来自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代表——过去，这个国家在资本主义美国的眼里总是微不足道的，或者还要更坏，象得了某种瘟疫一样。

检阅仪仗队之后，艾森豪威尔和我乘上同一辆轿车，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总统夫人乘上另一辆。我们的汽车行驶速度很慢，两旁有艾森豪威尔的警卫人员沿路跟着。在日内瓦我们已经见过这种场面。这是为了安全。这样来保护一位领袖的安全我们不习惯，但是在美国也许是合情合理的。现在，我联想起前总统肯尼迪，他的那位当过总统候选人的兄弟，还有那位为争取平等权利的黑人领袖，都是在那以后很短的期间内接连地被暗杀的。①

① 罗伯特·肯尼迪和马丁·路德·金都在1968年被暗杀。

当然，某些保护措施可能是为我着想。我的敌人很多。这不是我个人的敌人，而是苏联的敌人。然而，我在与艾森豪威尔同车的沿途中，没有想到有出现恐怖行动的可能，我也根本没有流露任何不安。我要考虑的其他问题太多了。

沿路我没有看到有拿着标语牌反对我们的抗议者。有人会说，嘿，那是因为有警察管这种事。但我不认为是如此。我认为这得由美国人对我们的访问所持的态度来解释。他们说："让我们看一看这个家伙，这个俄国政府的首脑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是说美国公众中间缺少反苏人物，那样想将是愚蠢和天真的。可是，我确实认为，美国人对自己的约束是出于对与我同乘一辆车的他们自己总统的尊敬。

我在华盛顿访问期间与艾森豪威尔就各项迫在眉睫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会谈。我方参加会谈的是葛罗米柯和我，对方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国务卿。那时候杜勒斯已经死了，国务卿是赫脱。他不比艾奇逊高明多少。大垄断资本的代表狄龙也在场。①总统在白宫自己的书房里接见我们。气氛很随便，不拘形式；没有摆设会议桌，只有几张椅子。

---

① 当时赫脱是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是副国务卿。狄龙在后来当了财政部长，但在原文中，赫鲁晓夫的回忆是前后倒置，他误认为狄龙当时是"财政部长"。

艾森豪威尔提出了我们根据租借法案所欠的债务问题，狄龙报了一下我们在战时以货物和贷款方式接受经济援助所欠美国的款项。狄龙的情绪很敌对。他和杜勒斯是一脉相承——等于一块硬币的两面。他的手里掌握着苏美贸易的钥匙，显然地，他将利用这一点来向我们强加条件。在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成员中有不少人支持他，他们与他一样是好战和敌对的。狄龙明显地不会对我们表示友好。你甚至无须去碰他——只要向他靠近一点，他就会发火冒烟、劈拍爆裂、唾沫飞溅，就象他体内有些东西发生了短路快要爆炸似的（我曾在实验室里见过这种爆炸）。

我听狄龙讲完并转向艾森豪威尔说："总统先生，就我们来说，我们并没有欠你们什么东西。然而，我们还是同意偿还债务，但是有个条件：你们得给我们三十亿美元的贷款。"要是艾森豪威尔的眼睛没有被他对苏联的阶级仇恨所蒙蔽的话，他会明白我们的立场是非常简单的加减法算术：我们在跟希特勒德国斗争期间已经以血的代价偿还了欠美国的债。当然，我们不是在谈论算术；我们是在谈政治，从政治上来说，那是无法取得一致的。

租借法案争端是和平共处中重大问题的一部分。在这个问题上，狄龙也流露了对我们的敌意。他设法约束自己，因为我们是总统的客人，但是我们仍然能感觉到他的态度。有一次，在我提到和平共处问题时，他闪着两只

眼睛，猛然向我提了一个怪问题："你谈的这个和平共处指的是什么？"

这一举动惹怒了我，但我相信我当时没有表现出来。我说："狄龙先生，如果你不理解两种制度之间的和平共处是什么意思的话，那很遗憾。你不得不去弄懂的时刻会到来的。现在要我给你解释是毫无意义的。"

艾森豪威尔并不特别积极参与这个讨论。他只是时而插上几句。我们主要的对手是狄龙和赫脱。当这些问题很清楚不可能在当场得以解决时，我们一致同意不必多加纠缠，而把进一步交换意见推迟到我访美的结束阶段。

在同艾森豪威尔工作会谈的休会期间，我就抽空坐车子游览华盛顿，以便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我甚至步行，但当然从不走到离大使馆很远的地方。华盛顿是个清洁而郁郁青葱的城市，给人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它也很安静，完全不象纽约。华盛顿虽说是个富裕的地方，但看上去却象个省城。我很喜欢它的规划和建筑式样。它的建筑物结构良好而牢固，没有摩天大楼。有一次，我边走边看，一如往常，后面跟随着一群记者。我走到林肯总统的纪念馆，走了进去，脱去帽子，对着这位发起过反对奴隶主战争的前总统鞠躬致意。我想，如果记者们报道说，一位过去曾经当过矿工的苏联总理对一位过去曾经当过伐木工的前美国总统表示敬意，那倒是一个好主意。

总统建议我游览一下美国，并好意地将他的一架波

音—707专机提供给我使用。这是一架令人满意的飞机，它的动力大，机内服务设备极好。机舱里装潢美观，除有两间座舱外，还设有总统专用的座舱，而现在就是我的专用座舱了。然而，我认为波音不比我们的图—104快，虽然它有四个发动机，而我们的图—104只有两个；我还认为它的内部也不比我们的图—114舒适，或许除了它的闹声不是那末大之外。因为波音是涡轮喷气机，而我们的图—114是用涡轮螺旋桨推进的飞机。

艾森豪威尔告诉我将由亨利·洛奇先生陪同我旅行。他给我们作了介绍。洛奇是一个中年人，身材魁梧。他对我说他在战时曾任过军官，他的军衔相当于我们军队中的少将。洛奇和我后来变得十分熟悉，因为我们两人单独一起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很聪明——我猜想他现在仍然如此，但我不能说他所维护的政策也是同样聪明的。我该说他是一个不那么明智的政府中的一位明智的官员。他曾两次担任驻越南大使，一次担任出席巴黎会谈的美国代表团团长。①至于我和他相处的印象，就政治上来说，无疑他是属于共和党的。他招待我很周到，

① 亨利·洛奇当时是驻联合国大使，后来在1969年作为美国代表出席越南问题的巴黎和谈。

在原文中，赫鲁晓夫说，洛奇跟他谈起过自己曾是海军军官，但赫鲁晓夫承认已经记不确切了。事实上，洛奇是在美国陆军中服役的。当赫鲁晓夫认识他时，洛奇是预备役少将。

并常常和我开玩笑。

有一回，我对他说："洛奇先生，你是一名前军人，因此，你应该懂得军阶的规则。你是少将，而我是中将。因此，你是我的下级，我希望你的举止要与你下级军官的身分相称。"

他笑了，并对我说："是，先生。我懂了，将军。"有时当我们见面时，他就咯噔一下立正向我敬礼，并说："洛奇少将向您报到，将军先生！"

总之，他很有幽默感；在飞机上和火车里我们相处的很多时刻中，他是一个愉快地一起消磨时间的旅伴。我们尽可能地回避谈论公事。除非不得已，我们没有必要一直纠缠在政治辩论中。毕竟，他并不处于决策的地位。同时，又何必使我们之间正在发展的友好关系受到损害呢？但要知道事情总是这样：政治家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谈到政治，尽管他们确实不愿意如此，洛奇和我也发现我们出于无聊偶尔也不得不谈论一番政治。

国务院也有一个人陪同我。有人对我讲他很有钱，说他在国务院工作不是为了谋生，而是为了取得在政府部门中工作的身分。他对我们的态度即使不是露骨地不友好，也是相当冷淡的，虽然他总是负责处理我的需要以及照管我的日程安排。①我们一行中美方其他成员还有

① 此人是威利·小布坎南，礼宾司长。

美国大使汤普森先生及其夫人；①我方有尼娜·彼得罗夫娜、葛罗米柯及其夫人，还有我们的驻美大使缅希科夫。缅希科夫对美国很熟悉。当然，他是应该如此的，因为他有一整套可以依靠的机构，而且这也不是他在美国的第一年了。他向我提供了有益的资料和建议。根据他的请求，我会见了我们使馆的同志们。会见很简单，只是向他们提供一个欢迎我的机会，也为我向他们表示从祖国带来的问候提供一个方便。总的说来，缅希科夫大使是个尽职的人。至于肖洛霍夫同志，根据我的记忆，他没有全程陪我同行；他和我一起访问了几个城市之后，就提出他要留在华盛顿以便和作家们会见。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纽约市。我们从华盛顿坐火车出发，受到了华格纳的欢迎。那时他是我们可以称之为纽约市苏维埃的主席——换句话说，他是市长。他是一位民主党人，但在最近接替另一个民主党人哈里曼担任纽约州州长的洛克菲勒则是共和党人，从政治上来讲，这是无关紧要的。②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没有多少差别。

---

①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及其夫人琪恩。

② 纽约市市长罗伯特·华格纳。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前纽约州州长W·艾夫里尔·哈里曼。赫鲁晓夫对哈里曼出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一节在第十五章中已有叙述（见《哈里曼和麦克达菲》一节）。

对我们的欢迎非常讲究，一切都是资产阶级的风格，十足的官场礼节、献花和其余的一整套。在我逗留期间，他们陪我游览了城市。象我这样身份的官员在外国一个大城市里所能看到的东西是很有限的。所以，纽约给我的唯一印象是一个庞大、喧闹的城市，到处都是霓虹广告和汽车，因而弥漫着大量的令人窒息的废气。基本上，纽约和任何其它资本主义城市一样，既有大量的财富和奢侈，又有赤贫和贫民窟。他们把我带到凡是参观者必去的一座最高的大楼。经理陪我在大楼里参观。①我已提到过，我在伊尔夫和彼得罗夫的《一层楼的美国》一书中已经读到过这样的大楼，在那本书里把它们描述得十分逼真。所以，我对此并没有产生强烈的印象。如果你见过一座摩天大楼，就等于所有这种大楼都见过了。有一件事我得提一下——就登上纽约最高的一座摩天大楼的顶层上来说，我得提一下，至少那里的空气是新鲜的。总之，纽约气候潮湿和令人不愉快，而空气也是污染了的。

华格纳为我们举行了午宴。我就和平共处、友谊和经济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发表了一个合乎规格的演说。我还接到了哈里曼先生的邀请，到他家里举行的招待会作客。他对我讲，如果我同意的话，他将再邀请一些朋友参加，他们都是些大资本家——或者照他们美国的说法，

① 赫鲁晓夫由公司经理亨利·克朗上校陪同参观了该公司所属的帝国大厦。

“最有才干的商人”——他们都很想和我见见面，一起喝酒并交换意见。我认为这个建议极好。这可能实际上成为一次工作会晤。我知道哈里曼是个十分现实的人，也是一位理解我们、主张和平共处并且希望扩大我们两国之间的科学和文化联系的有经验的专家。

我按时赴会。我走进一间相当大的房间，那里大约已有十五至二十个人，他们的年龄、身材和外表都各不相同。有些人看上去就是典型的资本家，简直和我国国内战争期间招贴画上画的一模一样——只不过缺乏我们的艺术家给他们画上的猪鼻子。有些人穿得并不华丽。从外表上你看不出他们是美国最大的资本家。哈里曼陪我绕了一周，把客人向我一一作了介绍，并说明他们的企业生产什么产品等。接着他叫来了酒——我记得还有香槟酒。招待会举行的形式很不一般，但也很有效果：哈里曼不是安排我们在桌子旁边指定的位子上坐下，而是让大家自由地走动，和我们感兴趣的人们进行交谈。

必须承认，我之所以急于接受哈里曼的邀请，是因为指望我们可能同那些有势力的拥有工厂而可能被说服同我们进行经济合作的人建立一些有效的接触。但经过一番交谈之后，我才感到建立经济联系的条件尚未成熟，我的指望是为时过早的。这有什么要紧呢！这种事是得花时间的。莫斯科不是一个晚上建成的。我不过是在开一个头。

我被介绍给一个五、六十岁的胖子，他俄语说得很好。我猜想他是犹太人。今天我还记得他曾对我讲过的话："我们为什么要和你们进行贸易？你们有什么东西可以卖给我们？"① 而他不是我们听到说这种话的唯一的资本家。我在以后和美国商人的会晤中一再听到同样的说法。

有一件事特别引起我注意，哈里曼的客人们抽烟很凶，把室内弄得烟雾腾腾。不断有人穿过烟雾走来和我攀谈几句，显然是试图摸我的底细，并打量我是怎样的一个人。过了一会儿才弄清楚，原来他们夸大了我们想和美国进行贸易的需要，因此他们设法组成一个统一阵线来压我们接受他们提出的条件。同样清楚的是，这些条件不仅有经济方面的还有政治方面的，这些条件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会接受的，即使战斗到最后一滴血也不会接受。

我不能说哈里曼的招待会是令人失望的，但我也不

---

① 在回忆录的俄文原稿中，赫鲁晓夫把曾与他用俄语争辩过的这个犹太商人记作是"某一个化工厂的老板"，但此人是美国广播公司的经理，名叫戴维·萨尔诺夫，早年从白俄罗斯移居来美国。参加招待会的有二十七个工业家和社会闻人，其中包括前参议员赫伯特·莱曼以及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等，萨尔诺夫是其中之一。还有一个著名人士即前总统杜鲁门也受到邀请，但他谢绝出席。

能说它有任何成果。我承认我曾抱着某种希望赴会，希望这些人可能会愿意鼓励他们的政府和公众舆论来支持发展我们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他们没有表示任何这样的意愿。在弄清楚这一点以后，我觉得应该是我结束讨论的时候了。我对哈里曼表示谢意，并向他以及其他的来宾告别。

我回到了我们住宿的旅馆，在那里将有一个商人团体要为我举行晚宴。①晚宴是在一间大厅里举行的，好几百人都围着长桌就座，就象资本主义国家举行宴会时安排的那样。在我国，总是按照来宾的职位分坐两桌或三桌，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安排很随便——就象在餐馆里一样。然而，我坐的那张桌子比其他桌子略高一些，如同我们党开会时的主席台。

我在席间作了一个演说，强调改善贸易关系对我们两国都是有益的，同时对美国商界也是有利可图的。我注意到在我左边的那一头有几个年青人在我演讲时说了一些不友好的话，否则他们也不致引起注意。我推测他们不是商人便是商人的儿子。他们的行为惹怒了我。他们象一伙在篱笆上的雄猫一样，明显地想对苏联以及对作为苏联代表的我个人发起一次示威。我决定立即给予还击。我中断了我的演讲，并把脸转向他们。我不准备以

① 宴会由纽约经济俱乐部组织，在华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举行。

"请"的字眼来说话。不，我拿定主意发动攻势："我知道你们反对苏联、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我们的制度。可我要你们知道我并不是来乞求的。我不是到这里来伸手请求施舍的。我是伟大苏联、一个革命国家的代表，我代表的是工人阶级。我们已经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今天，我们是来向你们提供一个跟我们进行贸易的机会，向你们表示和平愿望的。"我就这样继续往下说，他们顿时安静了下来。其他的来宾也对这些年青人发出嘘声，表示对他们的不满。在这以后，大家都全神贯注地一直听到我演讲结束。

当我在纽约期间，洛克菲勒州长遣人告诉我，他想见我。我回答说，我很高兴接见他。我在日内瓦开会时认识了他。①他是个身材高大、饶有风趣的人，精力充沛、外貌堂堂。当然他穿的不是廉价的服装，但也不能说他穿得很考究。他的穿着和一般美国人大体相似。我这样说是因为他是洛克菲勒，他不是一个普通的资本家，而是世界上最大的资本家！

他和我会见的时间很短。他向我问候，我们交谈了几句上次见面时的情况。我们没有进行认真的讨论。他

①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99页中，赫鲁晓夫叙述过他在日内瓦同洛克菲勒的会见。这里讲到的这次重新见面之后，洛克菲勒曾告诉记者说，赫鲁晓夫"转弯抹角地暗指"他有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洛克菲勒说："我也作了一个转弯抹角的回答。我们立即放弃谈论此事。"

只是说："我作为纽约州的州长荣幸地欢迎你到我们州来"——一切都是按礼节行事。接着他说了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我不排除这样的可能，这次会见将不是最后一次，我希望我们也许将来能同你建立某种工作上的联系。"我回答说我很高兴再次和他会见，特别是工作上的联系。我认为他的话是一种暗示，表示他希望在白宫担任某个职位，即总统的职位。那样的话，他当然会以不同的身分和我会见，我们将有可能在我们两国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在纽约期间，我去了联合国，他们以对待最显要贵宾的礼仪来接待我。我被领进大会会议厅，在靠近主要讲台、面对代表的一张专门安排的椅子上就座。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

次日，我们飞抵洛杉矶，由一位会说俄语的官员迎接我，可是他的俄语讲得很蹩脚——带有浓重的犹太口音。①

我问他："你俄语怎么讲得这么好？"

他回答说："我过去住在罗斯托夫。"

犹太人能住在罗斯托夫只有一种可能。该城是顿河骑兵部队的所在地，哥萨克人的故乡，在革命前法律上是

① 维克多·卡特尔是加利福尼亚一家名叫"希望之城"的医院院长。

禁止犹太人在那里居住的。他的解释是我已经猜到了的。他说："是的，我是个犹太人，可是我的父亲是罗斯托夫一家大工厂的厂主，也是最高一级商会的成员，所以根据沙皇的法律可以在俄国的任何地方居住。"当然，我觉得很奇怪，我竟由一个从俄国来的移民陪同游览洛杉矶。

他们原来安排我们参观洛杉矶附近一个叫做狄斯尼兰的地方，一个神话般的公园。据说那个地方很漂亮，但末了我们没有去成。洛奇和另一个官员竭力劝说我不要去，因为已经有人决定组织示威游行来反对我。甚至有采取暴力行动的危险。我必须作出决定，是否坚持要去。我想要是我真去的话，如果发生了反对我的骚乱，那个父亲曾在罗斯托夫失去了工厂的人会为我受到这样的待遇而幸灾乐祸。我想，一场敌意的示威丝毫不会使他感到不愉快，更不用说可能发生的其他更严重的问题了。因此，我决定不坚持。我们后来改为游览市区——我记得是乘坐敞篷汽车。我记得那时气候非常暖和湿润，到处百花盛开。

我们被邀请去参观一个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好莱坞是电影工业的大本营，它在美国好比是一个国中之国。那里，他们拍摄各种影片，虽则当我去那里的时候，他们已不再拍摄象卓别麟那样的进步导演所摄制的进步影片。

人们请我们观看正在拍摄康康舞影片的场面。我想他们倒不是特别为我要访问而安排的；而是他们正好在

拍摄，安排我们去看一看而已。我们到达时，正遇着那些穿短装的姑娘们开始舞蹈。这种康康舞，从某些方面来说，一般人都认为是不很雅观的。事实上，它简直是下流的。最后，当姑娘们跳完后，她们集合在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的周围，摄影记者们开始拍照。我听见一名新闻记者给一个姑娘说了什么，但我未予以注意。事后，我们的译员告诉我那个记者对姑娘说的话："拉起你的裙子，再高些！"她高兴地照着做了。叫一个姑娘做这种事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呢？他无非是要拍摄赫鲁晓夫站在一个那种打扮的姑娘旁边的荒唐照片。这些照片我仍然保留着。①

关于这种康康舞，我还能说些什么呢？以后，当我访问丹麦时，首相和他的夫人领我观看了康康舞的另一种场面，姑娘们朝着观众们跳过来，接着，她们以一种奇特的戏剧性动作，突然对着我们露出她们的屁股——当然，不是真正的露出，因为她们穿着三角裤。每个姑娘的屁股上都有一个字母。晚餐时，我问首相夫人（她是个演员，而且是一个优秀的演员和令人喜爱的女人）姑娘们拼出来的字母是什么意思。她看着我说了三个字："新年好！"②

---

① 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正在拍摄由雪莉·麦克琳和佛兰克·西纳特拉任主角的影片《康康舞》。

② 在下面的第二十一章中，赫鲁晓夫详述了1964年他的斯堪的纳维亚之行，以及他同丹麦首相奥托·克拉格和首相夫人海勒·弗克纳一起参观访问的情况。

关于康康舞就谈这些。看了这些情况就会明白为什么我们的观众，苏联人民对康康舞电影相当反感。我们看不惯这种东西。我们认为它是下流的，至少有点不正派。换言之，这种电影只能给成年人看。

好莱坞经理为我们举行了宴会。①好莱坞电影界的精华、男女名演员都在场。宴会进行得轻松活泼，不拘形式，一点也没有反苏气氛。这超出了我的估计，因为据我事前了解，出席宴请的有一位共和党人市长，过去他是极端反苏的。我们预计可能会发生某种挑衅行为。我们非常敏感，我们丝毫不能容忍任何反苏情绪的出现。

餐厅里挤满了四、五百人，围坐在装饰得非常华丽的桌子边，桌上灯光较柔和，好似蜡烛光一样。这一餐味美可口、菜肴丰盛。这些人是不吃酸菜汤的。坐在我右面的一个中年妇女告诉我这种宴会是如何组织的。她一定很富有；她一定拥有巨额的资产，否则她不可能在场。

她对我说："你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参加这次宴会。我是一个人来的，让我的丈夫留在家中。他十分羡慕我。单为我一个人得到邀请我们便付了一大笔款子。当然，我

---

① 电影制片厂董事长斯皮罗斯·斯库拉斯和美国电影协会主席埃里克·约翰斯顿为赫鲁晓夫在贝佛利山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举行了午宴。赫鲁晓夫对约翰斯顿所谈的关于前总统罗斯福的故事甚感兴趣（见前一章《哈里曼和麦克达菲》一节）。

们可以更多付一些钱，让我的丈夫也来。可是有很多人都吵着要来参加，所以每户只限一人，丈夫和妻子两人中来一个，但不能都参加。这样，我就成了幸运的一个，而我的丈夫只得坐在家中，羡慕和懊丧。”

她对待我彬彬有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她赞同我们的制度。她显然认为我们是从异邦来的。我推测她心中在想：“多么激动人心啊！一只真正的俄国熊就在这里！在俄国，满街都是熊在游逛。而这只熊却来到了我国，现在就坐在我的身旁。真有意思！这只熊甚至也不嗥叫！”

她出钱买入场券赴宴，就象上剧院一样。这使我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当我在工厂当童工时，每年9月14日是赶集的日子。农民们把农产品带来出售，以便购置工具和其它物品。吉卜赛人则把他们的马带到那儿去出售。那里经常有各种动物表演的马戏团。看一下大象就要花五十个戈比。我记得一个工人说：“猜猜看？我出五十个戈比去看大象，除了看它以外，我还拉了它的尾巴！”或许这是个粗鲁的比喻，但洛杉矶的宴会是大概差不多的。人们前来赴宴，与其说是表示友谊，还不如说是出自于好奇心。他们花了五十个戈比来看一下这只俄国熊。他是什么样子？他是否懂得如何参加上流社交的宴会和按照正确的姿势拿刀叉？或者他会干脆从盘子里舔东西吃？到那里的人有些也想要听听俄国熊会说些什么，特别是关于每个人都十分关心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在那位市长立起来讲话前，一切都很顺利。他的发言很简短，但是对我们含有强烈的侮辱。他把矛头针对苏联和我们的制度，大多是用同美国对比的方式。他没有赤裸裸地公开反苏；而是加了些伪装。在场的许多人可能忽视了他的话，但我却没有。当然，我本来可以不予理会，但我很恼火。我不能假装没有听懂他的话的真正意思，因此我决定当场公开地给他一个反击。

我对他说："市长先生，我是作为你们总统的客人到这里来的。我到你们的城市来不是为了受辱，也不是为了来听你对我们伟大国家和伟大人民的诽谤。倘若我到这里来不受欢迎的话，那么，我的飞机随时都准备着把我直接送回苏联。"我在盛怒之下可能过火了一些，但却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①坐在我身旁的那位妇女竭力劝慰我。她说我是绝对正确的，并责备那个市长。后来有人告诉我，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的夫人甚至还哭了，她对那个市长引起这一场风波极为生气。她害怕会出些什么乱子，或者会发生一场大战。

---

① 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为赫鲁晓夫举行的宴会期间，诺里斯·波尔森市长斥责赫鲁晓夫那篇"我们将埋葬你们"的著名讲话。赫鲁晓夫回答说，他曾解释过那篇讲话所含有的善意，接着又补充说："在俄国，省里的一名市长，要是消息不灵通，就不能重新当选。"赫鲁晓夫在口述回忆录时，或许还正确地记得波尔森的职位，但在俄文的原稿中，他一直把波尔森误认为"州长"。

至于市长本人，他决定不开战。他倒反而说了些和缓气氛的话。当时我并不后悔对他的反击，至今我仍不后悔。有时候这种反苏的家伙需要一顿迎头痛击，这也正是他得到的。宴会结束时，我自然向市长告别和道谢，并说明我们明天还得清晨起身乘火车去旧金山。

回到旅馆后，我们全都集合在一间套房里。我仍为刚才我们所受到的对待而感到不愉快，并且认真考虑取消我们下面的访问。我咆哮了起来："这个人竟敢这样攻击总统的贵宾！"葛罗米柯的夫人，一个令人喜爱的妇女，急忙去寻找能帮助我镇静下来的人。我用眼睛向她作了一个表示，使她知道我完全能控制自己，而不必再担心。我的忿怒是发泄给那些陪同我们的美国人听的。我深信他们在我们的房间内安装了窃听器，而和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的洛奇先生以及他的译员正一起坐在扩音器前面，收听我们的谈话。就是为了要让他听到，我才咆哮着说我不能容忍别人如此对待我。最后，我叫葛罗米柯同志以外交部长的身分，把我的抗议提交给总统的代表洛奇先生："告诉洛奇先生，我明天拒绝去旧金山！"

葛罗米柯同志照我说的去做了。他回来告诉我，洛奇对市长的行为向我表示道歉，并保证在旧金山不再发生类似事件。他恳求我不要取消我们访问的其余日程。于是，我接受了他的保证，同意去旧金山。但如果再发生什么问题，我们将立即结束访问，直接返回苏联。

第二天早晨，洛奇陪我同坐一辆汽车从旅馆出发去火车站 我们一路上进行了交谈。他提起了前一天傍晚的不愉快事情。他说："赫鲁晓夫先生，我在市长讲话前看过他的讲稿。我对他说过，他完全不应当作这样的讲话。你一定已经看到了我给他删去的那些话，我也告诉了他一定不能讲那些话。可是他不顾一切，还是一股劲地讲了。别在意，他是个傻瓜，是个笨蛋。"我不知道事情是否真是象洛奇所讲的那样，但我也愿意让这件事就此结束。

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火车旅行很愉快。各节车厢有着很高级的钢弹簧，行驶平稳，一路上我们感到很舒适。途中我们停靠了一个小站，那里聚集着一群人。农民们从附近村子里跑来想看一看苏联代表团。

我对洛奇先生说："我们到站台上去一下吧！"

他回答说："嗯，不行啊！周围人太多。我看你不去好。"

这些人都是来看我们的。我们怎么能呆在车厢里不出去和他们见见面呢？这样会引起误会。他们可能会认为我们看不起他们，或者不尊重他们。也可能他们认为我胆小害怕。

"不，洛奇先生，我要去。走吧！"我一面说着，一面向出口处走去，从车厢里跳到了站台上。人群把我围了起来。有些人提了些问题，但大多数人则是不停地往前挤，以便仔细地看看我们。气笛响了，我们回到火车上。但

我感到应该说上几句话，我就在车厢里对着洛奇手中提的话筒讲了起来。就在火车快要离站前，我发现洛奇跑到一群官员中去了。后来，当火车起动时，他走进车厢，把我的勋章递了给我。

他说："我想这是你的列宁勋章吧？"

我看了看我上衣的翻领，才注意到它一定是掉了；可能刚才大家围着我挤的时候将别针挤断了。我回答说："是的，这是我的勋章，没错。"事实上它是一枚列宁勋章，上面有列宁的像。我是在和平共处协会提名时得到的。我问："你怎么发现的？"

他说："有人拾到后交给我的，还说：'这东西可能是赫鲁晓夫先生掉的。请交还给他。'"

这件事使我十分高兴。遗失勋章会使我感到烦恼，而想要把它留下来当作纪念的人是不少的。有人把勋章归还给我，这使我对这些人肃然起敬。①

---

① 在去旧金山的路上，赫鲁晓夫乘坐的火车在圣巴巴拉以及沿路其它几个城镇停靠过。赫鲁晓夫坚持要下车到人群中去。他的女婿A·I·阿朱别伊在其主编的《消息报》上登载的一篇报道中说，赫鲁晓夫一直有与普通市民隔绝的感觉，并怀疑官方有意设法不让他与一般市民接触。阿朱别伊还说他的岳父对没有机会访问狄斯尼兰感到特别烦恼。在去旧金山路上的一次短暂停靠中，赫鲁晓夫投入了人群，据说他讲："经过了六天的软禁，我还是头一回呼吸到美国的新鲜空气。"

我们抵达旧金山后，受到了演说和鲜花的欢迎。市长①把我介绍给他的夫人。市长夫人又马上走向尼娜·彼得罗夫娜，开始和她交谈起来。显然，市长夫人是被指定接待我们代表团里的妇女的，市长本人则负责接待男宾。总之，对我们的招待是热情和友好的。

此时，洛奇对我说："对吧！我答应过你这里要比洛杉矶令人满意。"

"不错，我对此十分欣赏。"

可以这样说，我们的旧金山之行对该城的政治事务有直接的影响。市长对我说他已经连任了两届，还将竞选连任第三届。他为我们举行的欢迎和宴会使形势有利于他的再次当选。当然，如果他也象洛杉矶市长那样对待我们，他可能从反苏分子中多拉到几张选票，但旧金山是个不同的地方。在这里，市长候选人可以因热情款待来访的苏联代表团而赢得选票。

我邀请他到苏联来访问，以便答谢他对我们的殷勤接待。后来，在他再次当选之后，他和他的夫人作为莫斯科市苏维埃的客人来到莫斯科，我在部长会议或是中央委员会的办公地点接见了他们。

当克里斯多夫市长告诉我他和他的夫人都是希腊人时，我和他开玩笑说："那么，我们是兄弟了，不是吗？当俄国人过去改信基督教时，他们选择了希腊东正教。我

① 乔治·克里斯多夫。

本人是不信教的；如果我告诉你我是个无神论者，我希望你不至于见怪。但是，这不要紧。在历史上，我们和希腊人的关系总是友善的，我国人民始终是乐于帮助希腊人为反对土耳其人而进行的解放斗争。”①

我记得市长开有一家牧奶场。他给我们尝了该场生产的产品，我对产品的质量和包装印象都很好，并且把这一看法告诉了他。后来，我又在公开场合夸奖他的产品说：“我热忱推荐旧金山牧场的产品！”我是在开玩笑，但我的玩笑会帮助他扩大销路和增加利润。

市长还陪我到市郊参观建筑工地，那里工人们正在用预制板装配家庭住的平房。我拿过一块预制板看了一下，便问一位工人：“你们里面放些什么东西来绝缘？仅仅是刨花和木屑，对吧？”

“不错，这些材料很便宜。”

我问了这种房子的造价，他们告诉我一个数字，按照美国标准来说这是低的。宿舍看上去很象苏联在战后所

① 赫鲁晓夫在旧金山时同克里斯多夫市长以及几天前在洛杉矶时同斯库拉斯讲过类似的话。在洛杉矶二十世纪福克斯电影制片厂的宴会上，赫鲁晓夫在正式演讲开始时称斯库拉斯为“我亲爱的希腊兄弟”，并且接着说：“女士们，先生们，不错，俄国人是把希腊人称之为兄弟的，因为俄国人参加过解放希腊的战争。再则，在古代，俄国人还接受了希腊的宗教信仰，因此我们也是朋友。”

造的临时棚户。这种房子有它好的方面，也有它不好的方面。好处是人们因为能有个安身之处而高兴，可是另一方面，他们也为跳蚤而抱怨。他们说："这些跳蚤真要我们的命!"显然，跳蚤喜欢木屑，因此人们住在用木屑绝缘的房子里是很难熬的。当然，是否有跳蚤取决于人们的文化水平以及对宿舍保持清洁的程度。举例来说，芬兰人有时也用木屑作房子的绝缘体，但他们能够控制不让跳蚤孳生和咬人。我想我在旧金山看到建造的房子也是这样。

这些平房都油漆得很光亮，因此买主可以任意挑选自己喜爱的色彩——黄的、绿的或者其他你需要的颜色。我问工人们这种房子能使用多久。

"我们保用二十年。"

"以后怎么办?"

"我们为什么要建造能用一百年的住房呢?二十年以后，房主又可以向我们购买一幢。"

从做生意的观点出发，这是有利的做法。倘若人们每二十年能够买得起一幢新房子，那倒也不错。我知道在我过去生长的库尔斯克省，农民常常向当地地主购买白杨树来建造木屋。橡树虽然不如白杨树那样容易腐烂，但它太贵了，而我们的树林中又没有松树。用白杨圆木造的房子可以使用三十年。而在这里，这家美国厂商建造的房子只能使用二十年，还说："二十年以后再来吧，

我们给你造一幢新的！”

我在旧金山期间，一天早晨，我醒得很早，起身后就离开旅馆到外面散散步。我事前没有通知谁；然而，当我一踏上大街，我的美国保安人员已经跟在我后面了。他们虽不穿制服，但我完全清楚他们的身分。事实上，在后来，虽然我有时收到谩骂甚至侮蔑性的信件，但我未遇到过任何敌意的示威或事件，当然，这不包括我叙述过的在洛杉矶的那件事。对我们制度表现敌意的总是一些政界的代表人物，而不是美国人民。

再举一个例子——我在旧金山和汽车工人工会领袖沃尔特·鲁瑟先生的会晤。有人告诉我鲁瑟和其他一些工会的头头要到我住的旅馆来和我商谈。我很有兴趣和鲁瑟会晤，以往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很多有关他的文章。譬如，我知道他过去一度是个左翼分子，是一个苏联也参加在内的国际组织的成员，但后来，他脱离了那个组织，转向反苏的政治活动。因此我并不指望与他会晤会产生什么良好的效果，但我还是愿意同他作一次会谈。①

---

① 尽管赫鲁晓夫把鲁瑟视作一个有敌意和盲目反苏的人，但应该说，这位联合汽车工人工会主席与美国劳联—产联主席乔治·米尼相比，还算是调和派。米尼拒绝参加同赫鲁晓夫的会晤。在赫鲁晓夫到达前夕，美国劳联—产联执行委员会作出决议，反对美国工人同苏联领导人进行任何交往。美国劳联—产联有三个副主席不同意那个决议，鲁瑟是其中之一。

他是和他的兄弟以及另一个代表全美酿造业工会的年纪较大的人一起来的，另外还有些其他一些人。①因为我是主人，所以我就叫人替我们上些快餐和饮料——仅是一些茶点，没有烈性酒。我们围着一张长桌就座，鲁瑟和他的兄弟坐在一边，我们的人坐在另一边。鲁瑟的兄弟带着一架电影摄影机，后来我们得悉，他还带了一架磁带录音机，并且把我们全部的谈话都录了下来。我不表示任何反对："鲁瑟先生，来吧，把我们的谈话录下来吧！"我们这方参加的有葛罗米柯和我们的一些记者，其中有尤里·茹科夫，我认为他是我们苏联最优秀的记者之一。②

我仔细地观察鲁瑟。显然，他是个聪明人。他出身工人家庭，一生的大部分是在福特工厂做工。我们在高尔基城建造汽车厂时，他曾以技术指导身分被派到苏联来向我们的工人传授技术。他告诉我，他在高尔基城住过两三年，对我们工人的生活情况很熟悉。他说他还记得当年的许多事情。接着，他便回忆起他过去有过的交往。我说"交往"，是有意回避用"友谊"二字，尽管他可能

---

① 在为联合汽车工人工会的沃尔特·鲁瑟和维克多·鲁瑟安排的席间，赫鲁晓夫还会晤了酿造业联合工会的卡尔·费勒以及其他四名工会领袖。这七人都是美国劳联－产联的副主席。

② 当时G·A·（尤里）茹科夫是国家对外文化委员会主席，现在是《真理报》的政治评论员。

交过一些朋友。他还告诉我，他常和高尔基的姑娘们外出交际的情况，他还作了一些相当明显的开玩笑的暗示，来表明他确实是到过这些地方并参加过年轻人举办的晚会，等等。①

然而，眼前是个已经背叛了阶级斗争的人。作为一个大工会的领袖，他也组织罢工，但总是限制在一定的许可范围内，以不危及或削弱资本主义的统治为前提。他是为多拿到几个钱而斗争，而不是为工人阶级的胜利而斗争。这只是经济斗争，而不是政治斗争。在政治上，他和执政党是一丘之貉。他可以是个民主党人，而不是共和党人。但是，如我所说，它们是半斤八两。它们没有实质性的区别——都是资产阶级，都是镇压工人运动的。

如今，有时当我从收音机中听到或者从报上看到有关美国的罢工情况时，我总是回忆起我和鲁瑟的会晤。我们的谈话给我留下一个不愉快的回忆。我后来才知道他的薪水有多少，他赚的钱就象福特等美国最大公司的经理一般多。换言之，资本家已经收买了他；他们买通

---

① 赫鲁晓夫返回莫斯科后，苏联的工会报刊以《认识一下垄断资本家的走狗鲁瑟先生》为题发表了一篇报道。文章说，在三十年代时，鲁瑟在高尔基城同一个他刚认识一星期的十九岁的俄国姑娘结婚，后来他也未同她正式离婚。这个故事被认为是荒谬的诽谤。

了他，让他来代表他们的利益而不是工人们的利益，让他来支持美国政府的政策，而不是阶级斗争的政策。我一直赞成国家间的和平共处，可鲁瑟赞成阶级间的和平共处，他的主张和我们马列主义的教导是根本矛盾的。比这更坏的是，他是背叛自己工人伙伴的事业。这种背叛在美国工会的领袖中恐怕已是司空见惯的了。①

说起他带来的其他一些人，我想讲得越少越好。他的兄弟几乎从头至尾没有参与讨论，似乎是个旁观者，或者说得更确切些，似乎是鲁瑟的秘书，他把一切都用录音机录了下来。另一个工会领袖，年纪大约五十四、五岁，似乎是个十分明理的人；他的一些发言似乎表明能够理解我们的立场，但是他说得非常胆小谨慎。我不知道他是否真正反对鲁瑟对苏联所持的那种傲慢与偏见的态度，或者只是为了表演一下美国民主的把戏，以显示他能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同意他的头头，尽管在总的路线方面他是亦步亦趋。

那个领导酿造业工会的老头儿已经完全丧失了理智，同时我认为他的狂妄和他的年岁是毫不相干的。或许，他也象年青人一样是一颗被人摆弄的骰子。我没有听到他讲过一句神志清醒的话，因此，也就根本没有去理

① 两年后，在维也纳同约翰·肯尼迪举行最高级会谈期间，据说赫鲁晓夫曾说："在1917年，象鲁瑟这类人，在俄国都得处绞刑。"

会他。他在整个会晤过程中，只管坐着喝啤酒吃东西——凡是他够得着的都吃。当他伸手取啤酒或食物时，我注意到他的左右手腕上都戴着金手表。戴一只金手表，人们是可以理解的，可他为什么需要两只呢？他把它们当作什么？装饰品吗？还是当作手镯呢？象这样一个没有头脑的白痴，这样一个老笨蛋竟能当选为工会的头头，这说明了他所代表的那些工人的政治水平已经低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

我在旧金山和码头工人工会领袖的一次会晤是比较满意的。①不象鲁瑟之流，他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人士。虽然他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支持苏联的政策。他邀请我出席码头工人的一次会议，并要我在会上讲话，我欣然地接受了。我们感到有点失望的是，到了那儿发现出席的人数不多。或许我们已经有点被宠坏了，因为我们习惯于大的群众场面。但是，码头工人热情真诚地接待我却弥补了这一不足。有几个人在会上作了和苏联友好的发言。

当轮到我讲话时，我的译员一句一句地翻译，差不多每句话都博得了掌声。会议结束后，当我走下讲台时，一个年轻的码头工人，工会的积极分子，跑到我的面前，拿去我的帽子戴到他的头上，然后把他的帽子给了我。最

---

① 哈里·布里奇斯，国际码头与仓库工人工会主席。

后，我们在友谊和无产阶级团结的气氛中拥抱在一起。其他人都热烈鼓掌。不用说，新闻记者们又是摄影，又是写报道。就这一回，他们才无法按照他们的老习惯来歪曲事实真相。这就是我和美国工人阶级的真正代表们的友好会见。这样的时刻是令人高兴的。

旧金山访问结束后，我们访问的下一站是衣阿华州。我们在衣阿华州的日程中，最重要的项目是参观加斯特先生的农场。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那时候他是和他的夫人——一位令人喜爱的妇女，一起到苏联来的。有一次，我正在索契休假，他来看望我。我们一起在蔚蓝色的黑海之滨一座国家别墅的阳台上轻松地度过了好几个时辰。①

虽然他是个资本家而我们是共产党人，可是，这并不妨碍他向我们传授农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在陪他去参观苏联农庄时，要是给他看到有人干活不顺眼，他就简直会暴跳起来。据说，有一天，他正好在种植玉米期间访问一个国营农场。那里，他看到农民们正在下种玉米，但没有同时施用底肥。他抓住一个人就问："你想过没有，你在干什么？难道你不懂得这里需要施肥？"农场场长便向

---

① 赫鲁晓夫到得梅因时访问了一个很富有的玉米杂交种植家罗斯韦尔·加斯特。他几次到过苏联访问并同这位苏联领袖会晤。

他说明这块土地已施过矿肥。加斯特这才冷静下来，浓眉毛下的两眼仍炯炯发光。如果是他在负责的话，谁知道他会闹成什么样子？

我讲述这一故事是为了说明加斯特是一个不能容忍任何过错的人。他有把事情做好的决心，这种决心是没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界线的。我们在苏联一起交谈时，加斯特教给我不少知识。这个人讲的话听了令人受益并应当全部记住，以便把他的经验应用于苏联。说实在的，在我们交谈中一般都是他谈我听。他的农业知识非常渊博。他既不是讲师，也不是记者，我可以称他为农业上真正的"活动家"。他告诉我他在衣阿华经营的农场获利很多，所以，我渴望着亲眼目睹一番。

我的助手安德列·斯捷潘诺维奇·谢甫琴柯是一位受人尊敬的农艺师。他陪同我去衣阿华。在我们去之前，他特别向加斯特打听过，对我访问农场怎样安排最好。加斯特说："我是务农的。我每天日出起身。根据我和赫鲁晓夫先生以往的交谈，我知道他了解农村的生活；他懂得农民的生活就是起早和勤劳。谢甫琴柯先生，我建议赫鲁晓夫先生如果同意起早乘车前来的话，那倒是挺好的，就是我们三个人，你、赫鲁晓夫先生和我。至于赫鲁晓夫先生的其他随同人员，他们都是城里人。他们连日出是怎么一回事都不知道。我们就让他们多睡一会儿，晚些时候再来吧。"

当谢甫琴柯将加斯特的建议转告我时，我心中想："这个出色的农民懂得很多农业知识，但就是一点也不懂得他所邀请的这位客人有多重要。他似乎不懂得我不能连主人都不告诉便在大清早溜出宾馆。这一回他完全不现实。"我将由洛奇陪同去衣阿华，还将有各种警卫人员保护我，不让我离开他们的视线。倘使我试图在加斯特来接我时不声不响地和他一起离开，那可能会造成我被绑架的印象，如同高加索和中亚细亚的新娘被抢一样。

事实上，我们是大家一道去加斯特的农场的——洛奇、葛罗米柯、全部的警察和记者，所有的人。在其他的客人中还有史蒂文森先生。我喜欢他。他似乎对加强我们两国之间友好关系的必要性理解得很清楚。①

我们在农场里开始步行参观，后面跟着成群的人，还有一大堆记者——凡是眼睛看得见的地方到处都有记者。这使我想起乌克兰狩猎保护地看守人普罗柯普在我问到他打猎的情况时常说的话。

"喂，普罗柯普同志，今天有鸭子吗？"

他总是用乌克兰话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到处都是鸭子。凡是眼睛看得到的地方都有鸭子——鸭子比屎还多呢！"够了，在加斯特的农场里，跟在我们后面团团转的记者就有这么多。今天，我意识到普罗柯普的比喻可

① 艾德莱·史蒂文森当时正在争取被提名为1960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能会惹怒一些人；我可希望有朝一日那些读到我的回忆录的人们不要太计较这种表达的字眼。普罗柯普同志的说法很生动，他只是情不自禁地插入了一个欠雅的"屎"字而已。

不管怎样，加斯特还是陪着我们去参观了他的小公牛饲养场和粮仓。然后又带我们去参观了他的玉米田。要使玉米种植获得高产我也略知一二。我看到加斯特种植的玉米是一穴二至三株，我就向他指出："瞧，玉米最好的种植法是要保持一定的株距。你应该使它们的株距保持在二十至三十公分之间，行距至少是六十公分，八十公分更好。这样种，每一株的根系便有最大限度的发展余地，并充分利用土壤中的肥料。此外，玉米生长还需要足够的日照。如果你把它们种得挤在一起，长长的杆子就会挡住阳光，玉米的根部和土壤的温度就不能提高。要是你不介意我说的话，你这里的玉米种得太密了。"

他说："你是在吹毛求疵，但是，你说得对。问题是我们的播种机种植玉米的间距不能再宽了，我们又无力用手栽种。"

我们穿着玉米田走，而记者们也一直在我们的前后左右跑着用照相机摄影，又是大声提问题，又是发表评论。有一个时候，一位美国的著名记者索尔兹伯里先生和我们走到一起来了。他曾在不同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报道过苏联的生活。有时他似乎对我们两国建立牢固关系

的必要性能够正确理解。①总之，一些摄影记者想把加斯特、索尔兹伯里和我三人拍摄在一起。加斯特给缠得十分恼火，他对着一个摄影记者便是一脚，那个摄影记者的屁股上就留了个脚印。另一个人还把这整个镜头拍摄了下来。后来，我们也为此大笑不已。

当然，我们应该从加斯特的立场来看待这件事。他也许心中在想："这是我的农场，我的土地。我邀请赫鲁晓夫来参观这个地方，我可没有邀请这些人。他们老是挡道，使我不能随心所欲地陪同我的客人到处观看。"于此，他就行使起他的权利，对着那个摄影记者的屁股狠狠地飞起一脚。后来，他又抓住一颗玉米向另一个新闻记者劈头扔去，要他给我们让路。他确实是受了人家的触犯。他从来没有经历过象这样的侵犯。他一定感到犹如金帐汗国侵犯了他的农场，践踏了他所有的田地，给他的庄稼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到了午餐时间，我们回到他的住房。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在四周看了一下。这是一所小巧而精致的住房。我说它"小"，因为我不想使人们产生这是一座宫殿的印象。这种舒适而普通的住房，就是那种既懂得怎样住得好又懂得怎样花钱巧的商人的住房。加斯特有足够

①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1973年底退休前一直是《纽约时报》的助理总编辑，是几本有关苏联及共产党事务的书的作者和编辑者。

的资本，他满可以住得豪华些并借此炫耀一番，但是，他是认为如不把钱花在事业上而花在别处就等于把钱扔入阴沟的那种人。我在此并非说他是个守财奴，而是说他是个俭朴的人。

一个人应该把钱花在必要和值得的地方；超过这个界限就是毫无意义的开支，就不应该花。这是一条不错的资本主义原则，经管我们社会企业的人员学一学是有好处的。有时候，我在报上看到管理人员漫不经心地浪费人民金钱的一些非常难以置信的事例。在这里就有可以向加斯特先生学习的一课。

有人可能会说："赫鲁晓夫，一个共产党员，过去是个无产者，又是一个做了那么许多年党和我们国家的领导工作的人怎么能这样——他怎么能对一个资本家、工人阶级的剥削者作这种评价呢？"那不是关键所在。关键是资本家积累了许多经验，特别是在如何把钱花得有效的方面。当然，这个钱是工人们劳动的结果，资本家通过剥削使自己发财致富。然而，如果我们利用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切积极因素，并把它应用到社会主义的土壤中去，我们就会得到社会主义的成果。这就是列宁说我们应该向资本家们学习所包含的意思。遗憾的是，我们一直象鹦鹉学舌那样不停地重复列宁的这一教导，而没有真正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诚然，我们向资本家学不到如何按劳付酬，如何分配工作定额，以及如何为劳动人民服务；

但是有许多许多东西我们可以向我们的阶级敌人学习。通过和加斯特先生的交往，使我越发紧迫地感觉到这一点，尤其是在我有机会看到了他在当地的环境中，在他自己的农场里的所作所为之后。

我们在农场的参观结束后，他和他的夫人招待我们吃饭。其他人他都不招待。所有的警卫人员、警察、记者等等只得去镇上用膳。这一餐菜肴丰盛、味美可口、营养丰富。美国人真会讲究吃。他们有美味的罐头食品，更不用说还有各种各样新鲜的盆菜。我记得加斯特一家还给我们上了一道火鸡，火鸡在美国非常受重视，不但是作为一种禽类，而且是当作肉食。在美国华盛顿郊外有一个家禽研究所，美国人甚至有一个特定的“火鸡节”，到那天人人都一定得吃烤火鸡。

天气晴朗温暖。我们走进了花园，坐到果树的树荫下。加斯特和我走出屋子时，史蒂文森也来了。他的兴致很高。他和加斯特提议我们三人合影。于是，我们三个人就勾肩搭背给摄影记者制造了一个轻松的镜头。史蒂文森要和我合影，以示和苏联友善，我满足了他的愿望。至于加斯特，他则张大着嘴巴哈哈大笑——真是张得不能再大了。他笑起来真有一套。我知道加斯特是个何等样的人，一个资本家，因而也是我们的阶级敌人之一；但他也是一个人。我尊敬他，因为他有充沛的精力，他有学识，他愿意和别人分享他的经验，也可以说愿意把

他的本行秘诀告诉别人，甚而至于告诉我们，使我们在社会主义企业中得以采用。这种资本家是难得找到的。他们为数寥寥无几。可以说象他这样的资本家或许只有两三个，而不会再多了。

按照日程，我访问的下一站是匹兹堡。可是，发生了一个问题。以匹兹堡为中心的美国钢铁工业正在举行一场罢工。当报纸发出我将要访问匹兹堡的消息后，工会便在报上发表了一篇声明，警告我说别指望和他们的任何一位领袖会晤。总之，他们不想和我会晤。我又一次感到面临着来自美国工会领袖们的敌对态度，他们不希望因为和苏联的代表们接触而玷污他们的衣衫。他们对资本主义表现出狗一般的忠诚，对社会主义却表现出一派敌意。即使在今天，也还会发现这种态度，不仅在美国有，而且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有。

尽管匹兹堡工会领袖们公开地对抗，我们仍然决定不改变我们的计划，以完成对匹兹堡城的访问。钢铁工业毕竟不是那里的唯一工业。我们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可以看到沿路有全家人都出动的景象。①他们似乎在挥手致意，根本没有谩骂的叫声——至少我的译员没有告诉我。妇女们穿着的彩色印花衣衫和短裤使我看得出

① 赫鲁晓夫在晚间抵达匹兹堡，受到该市代理市长托马斯·加拉格尔的迎接。他住在卡尔登大厦。

神。我们的妇女在当时通常是穿深色的和几乎把全身都遮住的老式的服装。我喜爱美国人穿的服装式样；它们很好看，似乎也很实惠。

虽然我未和匹兹堡的工会领袖以及那里罢工的工人会晤，但我总算参观了一些工厂企业。我们访问了一家由某个妇女开办的机床厂，此人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朋友。①在那儿，我察觉他们有些习惯和我国的工厂存在着一些很有意思的差异。比如，我们的工厂要是有官方代表团来参观就得停工。可是，在美国，或者说至少是在匹兹堡，我访问过的工厂没有中断过生产，人人继续工作。工作时间就是干活，没有二话。工人们很守纪律。

我走到一台钻床旁边，向一个不知是工程师还是工头的人说："这台机器至少和我年纪一样老了，因为我记得我年轻时工作过的机床厂也是使用这种同样的钻床。"

那个人答道："是的，赫鲁晓夫先生，我们的工厂是一个有相当年代的老厂。我们的设备有最先进的，也有非常古老的。"

我笑了起来。"真的！这一台机器甚至老掉牙了。"我不能想象这种旧厂的厂主们怎样能和那些现代化工厂

---

① 这是一家在宾夕法尼亚州霍姆斯特德地方的梅斯特机械公司的工厂。这家工厂没有工会组织，它是不受罢工影响的几个大钢铁制造厂之一。该厂原由华盛顿的女老板珀尔·梅斯特太太的姻亲开办的。

进行竞争。不用说，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巧妙所在。一家工厂要是仍在开工，那就意味着它还有生产力，还有利可图。它不能不如此，否则它只好倒闭。对资本家来说，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在这方面可以向他们学到一点东西。在我们的国家里，倘使有人想出要收集陈旧老式的机器这么一个妙点子，那么，他就会得到国家的大笔资助办起一个博物馆。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不能再作实际生产使用的任何无用的东西就简直无法生存。无利可图的机器设备只得作为一堆废物扔掉。

当我们沿着一台台机器走的时候，我发现地上一块块新铺的柏油还是热的。我指着这一块块柏油对陪同我们的工厂经理说："你知道，在我们国家，如果有领导人到厂里去视察的话，工厂经理总得派人将地上的裂缝和窟窿补上。我看你们这里也是这样做的。"

他笑了笑说："是的，赫鲁晓夫先生，我们就在你到达前补起来的。"

我们走过一台机器时，正在操纵的一位工人把它关上并向我走来。他递给我一枝雪茄烟，友好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站在周围的其他的人都显然与他怀着同样的感情。也许他是被推派出来代表集体作此表示的。我也友好地在他的肩头拍了一下，然后我解下我的手表赠送给他。这是一只结实的钢表，是我们古比雪夫厂制造的。他微笑着，显然很高兴，接着便转身回去继续干活了。

之后，一个美国记者向我问道："赫鲁晓夫先生，我们应当怎样看待你把一只手表送给一位机床工人这件事情呢？尼克松先生在莫斯科时要给一个工人一笔钱，你们的报纸斥责他，指责他企图收买那个人。"

我回答说："我会见的那个工人给了我一枝雪茄烟，表示他对我的热情，而我仅是答谢他的好意。相互友好的表示和收买是两回事。我的行动同尼克松给我们工人钱所想要达到的目的是毫无共同之处的。"

我所以在此重述这一件事，因为它表明美国的新闻界人士是多么仔细地观察着我的一举一动。他们一直用眼睛盯着我，只要我稍有疏忽或鲁莽，他们就能以此来攻击苏联、攻击我——苏联的首脑。

除了机床厂外，我们还顺路访问了一家香肠加工厂。①我记得那里的工人也在罢工，工会事先也曾警告我们不要去那个工厂。这也是他们为反对苏维埃国家进行公开示威的一个组成部分。工会并未邀请我们去访问香肠加工厂——可是老板却邀请了；他要我们去参观一下他厂里的机器，而不是去访问工人，我们同意了。这个资

---

① 赫鲁晓夫抵达匹兹堡前在得梅因停留期间，他应邀去得梅因包装公司老板哈里·布基处作客。赫鲁晓夫戴了一顶屠夫帽，在公司的自动售货机上取了一条蘸有芥末的红肠样品，并说："上月球，我们胜过了你们，但在香肠加工方面，你们胜过了我们。"

本家非常懂得作广告宣传。那里到处都是电影电视摄影机，盛大的红肠品味场面业已安排妥当。我们吃了一些红肠，应该说味道很好。吃红肠时还加了质量很高的芥末——一点儿也没有苦味，倒是很香。我们在电视摄影机前的四周站着，一面开玩笑一面往自己的嘴里塞红肠。洛奇也边塞边笑。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后来当我们快要离开时，我对他说："洛奇先生，这是在为他们大做广告，对吗？"

他看了看我，笑着点点头。

"他是否会因此而赚钱呢？"

"那是毫无疑问的。你简直是让他赚了一大笔钱。"

洛奇是个很幽默的人，因此我笑着说："那么，你该得到一份佣金罗，因为带我到这里来的是你。"

显然，工厂老板早就打定主意利用我来为他的产品做广告，以增加他的销路，从而多赚些钱。眼下，他可能在说："赫鲁晓夫及其代表团，还有总统的代表洛奇先生来访问我厂，尝过我们的产品，并对我们的红肠大为赞赏！我们的红肠是上等货——大家都来买吧！"换句话说，他的邀请并不是一种友好的表示；而是纯粹的生意经。

对另一家工厂的访问，印象至今仍留在我的脑际。按照日程，我们应到一家叫约翰·迪尔的农业机械厂去参观。这家公司很有名，苏联过去曾向两家公司订购过农

业设备，这家公司就是其中之一，另一家叫麦克科米克公司。老板们邀请我去参观农机厂肯定是带有做生意的目的；他们希望我的参观访问将会导致我国向他们购买更多的机器设备。但这不要紧，反正我们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的工人和工程师对这两家公司举世闻名的产品有很高的评价。公司经理陪我们到一个普通食堂进午餐。他说他总是同厂长们和工人一起在那里吃午饭的。走进食堂后，每一个人都到一个专用桌上取好餐具，然后到服务柜台领取膳食。吃完一客后，你可以再去取一客。这一切都很民主。我承认，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在回国后作报告时提起过这一用膳制度，设法在我们的工厂里也推广这种供膳办法。我们可以在桌上铺上塑料台布，每餐后只消用毛巾把桌子揩干净就行了。那时，我们在餐厅里往往需要许多女服务员为工人们服务，行政人员则在另一个专门的房间里。如果我们采用美国的制度，我们也能在餐厅里消灭工人们过去常常埋怨的为等桌子而排长队的现象。

我们从匹兹堡飞回华盛顿。到达后，我们的大使馆告诉我，有一些美国资本家要为我举行一次宴会。①

我不十分热衷于和商人们再一次会晤。我在纽约时

① 华盛顿商人们举行的宴会是由《商业杂志》发行人艾立克·里德组织的。

已经作过两次这样的会晤，但都无多大成效。然而，有人建议我去赴宴，因为华盛顿宴会上的来宾都是美国商界的头面人物，我与他们进行交谈会有好处的。因此，我就答应了。

举行宴会的地方离我们的大使馆不太远。宴会的安排完全是英国式的，厅内灯光暗淡，桌上点着蜡烛。第一道是主菜前的冷盆和酒，当然供应的饮量并不过度。因此，没有人喝醉。一般说，国外的商人很懂得如何喝大量的酒而不至喝醉。他们也懂得如何在上流社会中举止适宜。

在谈论中，来宾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问题，虽然有些问题相当冗长，简直不象是问题，倒是象趣闻轶事。我记得有一个身体虚弱的老头儿，他想打听我们黄金的开采量，以及为什么我们和美国做买卖不用黄金支付。①资本主义世界一直是很喜欢黄金。当然，我们在开采，但是可以这么说，我们是把它储存起来以备万一。谁知道在哪一天我们国家可能会需要所有这些黄金呢？退一步说，即使我们想用黄金来购买外国货，我们开采的数量也不足以用来支付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不，我们需要的是互利的、能够增加而不是削减我国财富的对外贸易。我们过去常常向美国出口锰和其它原料，可是现在美国却向

① 柯蒂公司董事长菲利普·科特尼向赫鲁晓夫提出有关这方面的问题。

土耳其等国家购买了。

我给那个老头儿的回答是这样的："或许，你很熟悉我们的领袖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发表的那篇关于黄金的讲话。他说黄金应该贮藏起来，到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黄金将失去它的交换价值，那时社会将用它来装潢公共厕所。这就是我们要积蓄黄金的理由。我们正在等待共产主义时代的到来，到那时，我们就能遵循列宁的这一指示了。"

资本家们都哄堂大笑起来。他们认为我的回答非常巧妙。然而，那个老头儿仍不满足。他象连珠炮似地又向我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我国和我国政治制度方面的问题。对每一个问题，我都给予适当的回答。如果他讲的不合乎情理，我就反唇相讥。其他来宾似乎很赞同我对付他的这种办法。后来，有一个资本家走来在我耳边轻声地对我说，他和他的朋友们都为那个老头儿所提的那些愚蠢的问题而感到尴尬。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的反唇相讥赢得了邀请我赴宴的人们的正确理解。虽然期待达成商业上的具体接触还为时过早，但我感到已经和这些商人们建立了一些个人方面的有用的联系。自然，那天晚上我对那些问题的处理和解答都在我们的报纸上作了报道。

我访问美国的最后一个重要项目是要在戴维营和艾

森豪威尔总统举行一轮会谈。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当我们的大使馆最初通知说已安排我们前往戴维营时，我们竟全然不知它是个什么地方，我们以为总统不愿在白宫接见我们，而偏要在一个叫做戴维营的地方来和我们会晤，以示他对苏联的歧视。我们原来担心它会是一个患麻疯病人的集居地。可是，一当我们到达美国，我们就体会到被邀请到戴维营去是多大的荣誉。

如今，我有时候在报上看到或者在广播中听到尼克松总统在我和艾森豪威尔当时会晤的总统别墅内接见某些外国来宾。对尼克松来说，戴维营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是以艾森豪威尔孙子的名字命名的，艾森豪威尔的孙子现在已长大成人，娶了尼克松的女儿，成了他的女婿。①

因为路上交通堵塞，艾森豪威尔问我是否愿意乘直升飞机去戴维营。他说："我们将在白宫附近起飞，并将在十分钟内到达。同时，你还可以鸟瞰一下华盛顿的全景。"

我当然表示同意。我很想从空中看看华盛顿是个什

---

① 总统别墅1930年末建筑在马里兰州卡托克丁山区的一块有六千英亩的土地上。罗斯福把这个休养所叫做"香格里拉"。艾森豪威尔用他孙子的名字重新命名为戴维营。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在那里会谈后，"戴维营精神"成为表示苏美缓和的名词。

么样子。总统的直升飞机非常令人满意。我想这种飞机是一个名叫西科尔斯基的俄国人造的，此人死于美国，对美国航空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当我们在华盛顿上空飞行时，这个城市看起来就象是一只桌子般大小的模型。艾森豪威尔指点出周围的一些地方。在我们飞过一大块绿色的场地时，他告诉我这是他打高尔夫球的地方。他问我是否喜欢这种运动。我对什么是高尔夫球连一点概念也没有。他告诉我这种运动非常有助于身体健康。

我们飞越过城市后，开始在一个森林上空下降。当我们着陆时，汽车已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的汽车驶过一些象三夹板搭起来的长排房子样的建筑物，这种房子我们常常是造给建筑工地工人们住的；我们的工人们住在这种屋子里活受臭虫咬，所以，我们后来把它们都烧掉了，另给工人们造起了象样的宿舍。

艾森豪威尔将我领进主屋。这屋子的外表就象一座营房；可是它的内部不但装饰豪华，而且极有条理——典型美国式的。一切都很坚固、整洁和舒适。他们把我领到了我住的地方，代表团的其他成员——葛罗米柯同志和其他人①——也都安排了很合适的住处。

艾森豪威尔问我是否喜欢看电影。我说只要是好电影，我当然喜欢。

---

① 在俄国方面还有缅希科夫大使和苏联外交部美洲司司长A·A·索尔达托夫。

他笑着问我："你比较喜欢看什么电影呢？"艾森豪威尔笑起来总是和颜悦色。接着他又补充说："我个人喜欢看西部电影。我知道它们没有什么内容，也不需要动什么脑筋去欣赏，可是在这些电影里噱头总是不少。同时我喜欢马。"

我告诉他说："你可知道，斯大林在世时，我们经常看西部电影。①放映结束时，斯大林总要指责这部电影的思想内容。不过，到了第二天，我们又照样去看另一部西部片。我也有看这种电影的嗜好。"

"那好，我们就看些西部的和另外一些影片。我还邀请了我们的海军军乐队来演奏。你不至于反对吧？"

"啊，那将会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我喜欢听音乐，我还想瞧瞧这些年轻小伙子。"

"好，他们将在席间为我们演奏。"

我们在华盛顿正式赴宴时得穿着礼服，而在戴维营我们就穿着平常的服装去进餐。

在戴维营期间，艾森豪威尔总统向我提议说："乘飞机到我的农场去参观一下，你意下如何？它离此地不远。"②

我说："我十分高兴。"

---

① 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97—298页中，赫鲁晓夫描述过斯大林对电影的爱好。

②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格蒂斯堡。

我们到达那里后，由农场经理迎接我们。艾森豪威尔向我介绍说他是一位将军："他在大战期间跟我一起作战，大战后，我建议由他来经管我的农场。"①经理陪我到农场观光。然后我们回到屋子里，艾森豪威尔把我介绍给他家里的一些人。我记得他的儿子和儿媳是住在农场里的。他说："我所以决定不把全家同我一起搬进白宫，是因为总统在那里的任期是短暂的，我不想让白宫里舒适的生活宠惯他们。"②

我理解他的意思。艾森豪威尔是个通情达理和谦虚谨慎的人。不是说他自己在农场里的住宅同穷人的住房一样。当然不是如此。它还是富人的住宅，但不是百万富翁的住宅。

后来，经理又领我们参观了艾森豪威尔的畜牧场。它比我们的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要小。其规模并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是那儿深褐色的食用牛却毛色光泽、腿短体壮。显然饲养得很好。据介绍，这种牛的产肉量可达到百分之六十五之多——简直象猪一样！如果我记忆正确的话，我们的参考书中讲到，一头肥猪屠宰下来可

---

① 陆军准将阿瑟·内文斯曾同艾森豪威尔一起在海外服役。

② 介绍给赫鲁晓夫的有总统的儿媳约翰·艾森豪威尔夫人，以及总统的孙子们，其中包括当时仅十一岁的戴维·艾森豪威尔。

供百分之七十的食肉。我对这些牛深表赞赏。艾森豪威尔听得眉开颜笑，并且当场要求我接受一头牛作为他赠送给我的礼物。①我向他表示感谢，同时也回送他一些白桦树以便在他的农场里栽种——“以示谢意和我们会晤的纪念”。他似乎十分高兴。我履行了我的诺言。我请我们的专家们挑选了一些最好的白桦树，满载了一飞机送去给他。

看过牛之后，我们就到田野里去。艾森豪威尔指给我看他的地产范围，并陪我到一块种着类似小麦但是略小一些的作物的田里。他向我介绍说:“这种作物我们是不收割的。我只是叫人于冬季来临前把它割去。这块田地吸引许多鸟类。当别的田地里的庄稼收割后，松鸡、鹌鹑以及其它猎鸟都到这块田里来了。因此，我们在这里打猎可以得到极好收获。”

换句话说，他辟出这一整块土地就是作为猎场的。这太过分了。与我们革命前沙俄时代的地主相比，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国的地主至少还是骑着马追猎的。我曾多次阅读托尔斯泰描写这种捕猎的小说，可是每读一次都使我极度地兴奋。托尔斯泰有关捕猎的章节对任何有此类嗜好的人都会产生同样的效果。然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猎法不同。这对于象我这样真正热衷于

---

① 艾森豪威尔把他饲养的黑安格斯牛送了一头给俄国。

打猎的人来说，简直是枯燥乏味的。倘使你肯定有把握每隔几步就能踢倒一只鸟的话，那你还不如去打射程内的固定靶子。

我们在他的农场范围内走完一圈之后，艾森豪威尔便陪同我们回屋喝茶。过后，我们就飞回戴维营。整个旅程仅花了几个小时。

早晨，葛罗米柯和我起身很早，我们沿着一条僻静的小道散步，以便商量一些问题。只有我们两人在一起——当然，我们的警卫人员除外，然而他们都是经过良好训练的，他们总是在我们的视线之外。这样，人们可能会问："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干什么要到外面去散步交换意见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在室内讨论呢？"对任何政治家来说，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们知道美国情报人员拥有精密的窃听器，我们只是为了防止别人听见。艾森豪威尔和我那时正在讨论一系列非常敏感的相互间都非常关切的问题，我们知道美国人希望在工作会议前窃听到我和葛罗米柯两人的密谈，以便预先多少得知一些我方将采取的立场。

在还要讨论的问题中，有文化、科学和经济合作等。我说"经济合作"，不再是指租借法案问题。虽然那个问题尚未解决，但我们于访问开始时在白宫商谈期间已经对它作了详尽的阐述。美国要求更广泛地交换旅行者、科学家和大学生。他们甚至提议我们派工厂经理到美国

去进修。我们对这一提议很感兴趣，因为这样一来便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利用他们工业组织和管理上的技术和经验的机会。他们的许多建议显然是为了要我们开放我们的国境，增加人员之间的来往。他们还试图压我准许美国在苏联开设书店，让我们的公民能够在他们的书店里购买美国的出版物；作为交换，他们也允许我们在美国开辟出售我们书籍的市场。

然而，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次要的。我们在戴维营讨论的主要问题是裁军问题。我从艾森豪威尔的脸上觉察到，他极为急切地想达成一项能够为消除战争的可能性创造条件的协定。

他说："赫鲁晓夫先生，我是一个军人；而且我一生都是一个士兵。我曾打过不止一次的仗，但我不怕难为情地告诉你，现在我非常害怕战争。我愿竭尽一切力量使我们避免战争。首要的是，我希望和你达成一项协议。"

我回答他说："总统先生，如果我们能达成协议的话，那么没有一个人会比我更感到高兴的了。但问题是怎样达成呢？"

于是，我们一起花了会谈的大部分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方提出从其他各国撤走军队——也就是说，撤除我们在外国领土上的军事基地的问题。这即意味着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美国人没有准备走

得这么远。他们拒绝了我们的建议。其实，我们知道要达成这样一个协定的条件尚未成熟；我们的建议为时过早。我们的建议实际上是为了起到制造舆论的作用，而并非为了现实上的目的。

在美国方面，他们准备接受禁止制造和试验核武器，但以建立国际监督为先决条件。具体地说，他们坚持要在协定中规定，双方均可派侦察机到对方的领空进行侦察。在当时，这个条件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强调在当时。首先，美国在核武器数量和运载工具方面，都远远超过我们。其次，美国人利用空军基地和其它军事基地四面包围了我们，而我们的飞机甚至还不能飞到美国。第三，美国在外国领土上设置可以从远距离探测到核试验的仪器方面，处于优势地位，因为他们在我们的边界周围都有军事设施。总而言之，他们关于国际监督的建议不是公平合理的，因此我们不能接受。

应当记住，在我谈到裁军问题的时候，我国在核弹头和导弹方面都远不如美国，而美国又是处在我们轰炸机的航程之外。我们可以把美国在欧洲和亚洲的盟国炸为灰烬，但对拥有庞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的美国本身，我们却无能为力。只要他们对我们拥有这种优势，他们便可以比较容易选择最有利的时机来发动战争。还要记住，我们的敌人相信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他们急于抓紧时机干掉我们。因此我确信，只要美国还比我们占很大的优

势，我们就不能接受国际性的裁军监督。这就是我的观点，我认为在当时这种观点是正确的。我现在虽已退休，但还是认真地思考着这整个问题。我的结论是，国际监督在今天有可能了，因为它有了真正对等的条件。今天，建立禁止武器的国际监督不会象当时那样有损于我们的国防能力。自从我担任领导并和艾森豪威尔商谈这个问题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

艾森豪威尔和我在戴维营私下交谈中，有一个问题的意见是一致的——军费开支问题。我已经说过，对于他的谨慎、理智和多年的经验，我一直是表示钦佩的。葛罗米柯当时一定在场，无疑地，美方也有一个人在场。但是这一次只有我们两人发言，一个对一个。他引出了这个题目：

"赫鲁晓夫先生，告诉我，你们是怎样决定军事开支经费的?"还未等我来得及说话，他又继续说："或许，我应该把我们的情况先告诉你。"

我说："好啊，先讲一下你们的情况吧。"

他笑了笑，我也对他笑了笑。我已经感觉到他会要说些什么。"事情是这样的。我的军事将领们来见我时说：'总统先生，我们的某项计划需要多少多少钱。如果我们不能得到所需要的经费，我们就会要落在苏联的后面了。'我就只好照办。他们就是这样向我逼钱的。他们还不断地想多要一些。而我也总是如数拨给他们。现在

你告诉我，你们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我回答说：“情况完全一样。我们军事部门的一些人来说：‘赫鲁晓夫同志，瞧！美国人正在发展某某军事系统。我们也同样能发展，可是需要多少多少钱。’我告诉他们说现在没有钱；钱都已经分配完了。他们说：‘如果我们得不到所需要的钱，万一发生一场战争，那么敌人将会占上风。’于是我们就继续讨论下去；我琢磨着他们提出的要求，末了，我得出的结论是军队说需要多少经费我们都应该支持。于是，我将这个问题提交给政府，结果我们便采纳了军人们所提出的意见。”

他说：“对，我想就是这样。我们确实应该达成一项协议，以便结束这种毫无结果的和实实在在是浪费的竞争。”

我说：“这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为了同你们在限制军备竞赛方面达成一项协议，我们已经竭尽了一切力量。我到美国来的部分原因就是想要了解一下，我们的会晤和会谈是否有可能达成某种谅解？但问题是如何达成？在什么基础上达成？”

困难就在这里：我们当时不能达成协议，我们现在也还是不能达成协议。①

总而言之，我们的会谈不太有成果，事实上是失败

① 同艾森豪威尔有关军事问题的谈话也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19—520页中叙述过。

的。我们没有能消除我们之间的主要障碍；虽然我们检查了这些障碍，但消除不了。可以说，艾森豪威尔是泄气了。他看上去就象一个被人从冰河里救上来的人一样，浑身湿淋淋。或许，艾森豪威尔已经向他的政府中的统治集团许过愿，说他会和我们达成一项协议。可现在，他的希望破灭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显得那样十分失望的缘故。

至于我自己，自然也很失望，但没有他那么厉害。我来美国时并没有幻想，我一直认为签订协定的条件还没有成熟。当然，我们也愿意达成一项协议，但不愿意以单方面的让步为代价。

我们的谈判即将结束。我们已失去找出一个现实途径来打开会谈僵局的希望。除了同意艾森豪威尔回访苏联一项外，我们连公报上要写些什么都无从下手。这更使得艾森豪威尔心烦意乱。

午餐时间到了。这次午餐不象婚礼宴会而象是葬礼。哎，这可能说得过头了。它不太象葬礼而象是在一个重病人床边吃的一顿饭。末了，艾森豪威尔建议我们坐汽车回华盛顿。我觉得这很不错。因为我过去在书中读到过许多关于美国公路的情况，所以我真想亲眼看一下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子。本来，要是我们双方对于会谈的结果较为满意的话，这倒可能成为一次愉快的汽车旅行。但是我们并不满意，因而旅行也不愉快。为了礼貌

起见，我提了几个问题，他三言两语地回答。这完全不象是对话。每句话，他都要斟酌一下。我可以看出艾森豪威尔的神色是多么沮丧和苦恼；我知道他是如何忧心忡忡，但我也无法帮助他。

我们回到华盛顿后，艾森豪威尔将我送到我住的地方。①然后，他便返回白宫。我们离开美国的那一天到了。那天晚上在飞机场，我们又经历了一次与我们到达时多少相似的仪式：演说、仪仗队、装饰得金碧辉煌的高台、红地毯，总之，在所有国家里可能有的标准的高级礼仪样样齐全。仪式完毕后，我们还是象到达时那样不得不用备用梯爬进机舱，因为他们依然没有弄到和我们图—114高度相称的舷梯。

就在我们都登上飞机等候起飞的时候，我们的警卫长来向我们报告说，刚才接到一个匿名电话，警告说在赫鲁晓夫的飞机上有一枚炸弹。打电话的人只说了那句话便把电话挂了。我们的警卫长要我放心，说这仅是一种挑衅。我们的飞机昼夜都有警卫人员守着；所有的行李在装上飞机前都经过仔细的检查。我认为我们警卫长的话是对的；那电话一定是由某个美国人打的，他想试探一下我们的神经，看我们是否会惊惶失措。但是，不知道这个寻衅者是何许人？他是个人的单独行动，还是幕后由

---

① 赫鲁晓夫住在白宫附近的布莱尔大厦。

某个有来头的组织指使的。不管如何，他未能得逞；我们并没有让那些在最后一分钟对我们作这种挑衅的人感到满意。

我下令说："行，起飞吧！"我们就这样飞洋过海，平安无事地在莫斯科着陆。

我回国后，我们的一些记者集体出版了关于我的美国之行一书。我认为这本书写得颇为客观，读了使人受益。①甚至到今天，我有时遇到那些读过这本书的人告诉我，他们仍把它视作那个时期的珍贵纪念。

访美后不久，我便去北京参加十·一庆祝中国人民的胜利和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的活动。在回莫斯科的路上，我在远东停留了一下，视察了我们在金角湾②的海军军事设施。他们自发地组织了一次会议，要我给他们谈谈有关我访问美国的情况。我描述了我怎样走红地毯、检阅仪仗队，以及在为我们鸣起二十一响礼炮时我怎样注目立正等。

我在金角湾演讲时说："当我在高台上俯视下面迎接我的人们时，我充分地意识到他们不属于无产阶级。我也意识到，即使他们欢迎我访美，他们仍然是敌视苏联

① 以《面对面的美国》为名于1960年在莫斯科出版。

② 金角湾位于太平洋的港口城市海参崴，是一个主要的海军基地。

的。我知道与其说他们是尊重我不如说他们是尊重自己的总统。然而，我知道，这一场面不仅是我们代表团的伟大胜利，而且也是苏维埃政权、工人阶级、列宁、列宁的思想和教导以及苏联武装力量的伟大胜利。”

我的话引起了听讲的人们激烈的反响。会场上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和暴风雨般的掌声。他们不是为我个人欢呼。我们每一个人毕竟只能在一定的时间内，按照所受的委托在代表自己国家的这一或那一岗位上，尽自己个人的一份力量。听众欢呼的是我们政策的成就、我们马列主义教导的成就，以及我国人民流血流汗奋斗的成就。我国人民已经使我们的国家从一个贫困的国家上升到这样的高度，以致今天其他国家也不得不承认我们的伟大。即使象美国这样的国家——远在我们国内战争时期就推行着反苏的反动政策，在远东对我们进行武装干涉，并在我们革命成功后的十三年里蛮横地拒绝承认我们——最终也不得不邀请我们的代表去它的首都，并且隆重地迎接我们！

有人会说，我们对美国的访问毫无结果。我的回答是既有结果，也没有结果。它确实带来了某些东西，虽然不是一开始就看得到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开垦处女地；我们打碎了使我们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目前，剩下的工作就是要我们的外交家从我们的道路上搬除那些顽固的妨碍进一步改善关系的碎冰块。这一过程直到今天还

在继续着。

然而，还有人坚持着问："难道你不认为从一开始就接受艾森豪威尔的邀请是错误的吗?"我向他们说："不，如果不接受邀请，那将是不合情理的。"我们去访问，使美国人能更多地了解苏联的情况。对于那些愿意睁开眼睛的资产阶级新闻界中不抱偏见的代表们，我们也提供了一个机会使他们看到，不管我们是否签订任何具体的协定，我们两国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然而，仍有人争辩说这次旅行仅仅是一种表面装饰，我们在美国所经历的那种盛大的仪式尤其如此。可能是这样，但是在资本主义世界中，表面装饰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意味着美国人承认了他们过去想贬低我们、羞辱我们乃至消灭我们等等企图的失败。

即使我们没有当场取得具体的收获，但是我与艾森豪威尔的会谈是道义上的巨大胜利。我仍记得当我的译员第一次告诉我艾森豪威尔用英语称呼我为"我的朋友"时，我是多么高兴啊!

有人说："得了，那些话都是口头上讲讲的。"当然是口头上的事情! 你想要什么呢? 你是否认为持有完全相反观点的两国代表一聚会一握手，两种制度间存在着的矛盾一下子便会消失呢? 那是什么样的白日梦呓啊?!

最重要的是，经过长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人主动地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国家去。他们休想——他们当然

未曾得逞——迫使我们用基本原则和自己的尊严去作妥协。相反，我们通过访问和会谈加强了我们在世界上坚如磐石般的地位，并使我们将来为捍卫自己的地位打下了基础。

遗憾的是，在我访美后不久，由于美国政府尤其是杜勒斯所奉行的背信弃义政策的结果，①我们的关系受到了突如其来的挫折。这使我们感到非常失望，因为直到那以前美国似乎一直表示善意。我们曾对美国政界领袖们，特别是艾森豪威尔总统，在邀请我访美这一点上所表现的开明姿态给予很高的评价。我曾认为，总统是真诚地想要改变他的政策和谋求改善关系的。然而，出其不意地发生了肆无忌惮地破坏我们主权的事件。它带来了痛苦和可悲的失望。②

---

① 这里他提及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

② 在叙述周游法国的情景后，赫鲁晓夫提及U—2飞机事件，详见下面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法国之行

1960年初，我接到戴高乐总统的邀请，要我去法国访问。我必须承认当时我们是感到惊奇的。这时正值法国深深地卷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侵略性活动并积极推行反苏政策，以致我们不得不以废除战后两国签订的友好条约来威胁它。我们希望这种威胁会使法国政治家们清醒地看到，当德国经济再度强盛起来的时候，如果苏联撤销它的友谊，这对他们将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我们认为，苏法友好条约在法国人民的心目中造成一种我们有着良好关系的错觉，这事实上是与法国政府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行为和它的反苏政策相矛盾的。我们要法国人作出抉择。我们知道，他们没有忘记他们的国家曾有多少次被德国军队侵占过，他们害怕一个强盛的德国可能会再度侵犯他们。①

当我们说我们将不再受条约的约束时，这在某些法

① 1955年西德正式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后，苏联声称法国破坏了戴高乐在战时访苏期间签订的1944年法苏条约的精神（见第十五章）。赫鲁晓夫1960年3、4月期间对法国作为期十一天的访问时，这一争论仍在激烈地进行。

国人当中立即产生了影响。左翼政党象受到雷击似的。法国共产党也是这样，当然，他们对我们的立场是能够正确理解的。但是那些实际决定法国政策的人们反而淡然置之。他们早已有了抛弃条约的念头。因此，没有理由企望法国的这些统治集团会突然转变过来，对苏联的首脑殷勤相待。尽管如此，法国总统戴高乐仍然发来了邀请。

我们一决定接受邀请，就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同意进行十天的访问并参观法国的几个城市，但这显然还不能满足法国的领导人。他们坚决要我再到阿尔及利亚去旅行，看看撒哈拉沙漠的油田。直到我们离开莫斯科，甚至在我们到达巴黎之后，他们不断地催促我们并且许诺说，戴高乐总统将陪同我们一起去阿尔及利亚。我们坚决拒绝了。我们很清楚，要我们去阿尔及利亚旅行具有严重的政治意义。这等于是要我们作出姿态，表示承认法国的要求，即阿尔及利亚是属于它的。法国人十分清楚，我们完全同情阿拉伯运动。我已经清楚地向以摩勒总理为首的法国政府代表们说过，法国除给阿尔及利亚独立以外别无选择余地。摩勒可能一度是个左翼的社会党人，但他在内心中是一个殖民主义者。①

当然，戴高乐是不同的。他在处理那些企图在阿尔及利亚保持殖民统治的极端分子时，表现出理智和果断。我多次告诉记者们说，在法国除戴高乐外，只有一种政

① 摩勒曾于1956年5月访问苏联。

治力量即法国共产党能结束阿尔及利亚战争。尽管戴高乐的政治观点基本上是反动的，但他在这个问题上处事冷静、果断和正确，他承认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这场血腥和昂贵的战争注定是要失败的。尽管我对戴高乐高度尊敬，但我仍然没有改变这一看法：即把阿尔及利亚之行作为正式访问法国的一部分是不妥当的。虽然我们接受了去法国的邀请，我们不得不一再拒绝东道主要把阿尔及利亚包括在我们的旅行日程中的盛情。

我们召集了领导成员开会来决定将由我率领的代表团的组成。葛罗米柯作为外交部长参加了代表团。还有柯西金。为什么要柯西金参加呢？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将会见法国的工业家，而柯西金在这方面具有一定的经验。我记得他曾当过列宁格勒一家工厂的厂长。后来他调到莫斯科负责轻工业，大概是制鞋工业，这个行业比较狭窄一些。我知道他在制鞋方面搞过一些工作，因为我经常在皮革生产方面同他打交道。那时候我在乌克兰，我们把皮革供应给制鞋工业。关于我和柯西金打交道的情况，我不准备详细讲，只消说曾经有过许多摩擦就够了。①总之，由于他和轻工业的关系，我们决定他同我们

① 作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和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柯西金的权力比赫鲁晓夫这里说的大些。至于柯西金的早期政治生涯，他在1930年末被提升为列宁格勒州委领导之前是列宁格勒一家纺纱厂的厂长；1939年被调往莫斯科任纺织工业人民委员。

一起去巴黎。

离开莫斯科那天，法国驻苏大使德让先生乘我们的飞机和我们同往巴黎。① 我对他和他的夫人极为尊敬。

对我们来说，准时到达巴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场盛大的欢迎仪式已经作了周密布置，戴高乐总统将亲自来迎接我们。我们准时着陆。我记得水泥跑道的质量和机场的设备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②对于西方应该说句公道话：有些东西他们做得比我们好，这条飞机跑道就是一个例子。几乎找不到一点缺点。看来是在我们到达之前才完工的。虽然多年来我一直努力，一再批评我们的建筑工程师，可是我们的跑道才建了一年，看起来就象旧的一样，到处是坑坑洼洼。为什么西方对每一件事都干得这么漂亮，我不相信其中有什么秘密，只是因为有良好的生产纪律、严密的规格和设计得很完美的工序，尤其在制造和铺设混凝土方面。这恰恰说明西方的文化水平较高。我不是第一次谈这个问题。每当我出国旅行回来后，常常讲起这类事。遗憾的是，我所作的比较很少是有利于我们的。

我们的飞机滑行到预定地点时，我从窗外望去，看到有红地毯、仪仗队和来迎接我们的官员。很容易从人群

---

① 莫里斯·德让，1955—1964年任法国驻苏大使。

② 指奥利机场。

中看出戴高乐总统来。我记得他的夫人站在他旁边。她来迎接是因为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同来。①总统和我相互致意。他陪同我检阅仪仗队，他们穿着华丽的服饰步伐整齐地在我们面前走过。在作了简短交谈之后，总统和我在特别的护卫下登上汽车驶回巴黎。

巴黎给我很深的印象。当然，我曾读过关于这个城市的书籍，但耳闻总不如目睹。我们汽车驶过的时候，成群的人排列在街道上，望着我们并向我们热烈欢呼。显然，他们拥护总统邀请苏联代表团来法国以便改善两国关系的决定。我深信，当时法国共产党不会袖手旁观，我深信他们参加了接待我们的工作。他们有很大的势力。因此，这里有不少持有正确政治态度的人，他们同情社会主义运动，并且没有忘记苏联在打败我们共同的敌人希特勒德国时所起的作用。

我们到达爱丽舍宫，总统的侍卫来迎接我们。他们竟然骑在马上沿着我们的汽车两旁跑，这使我们感到惊奇。大概这是从拿破仑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习惯。他们穿着整齐，显得非常雅致、漂亮。我相信他们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我知道过去我国沙皇的宫廷侍卫要根据身材和头发颜色来遴选，这也都是从法国和奥地利的宫廷模仿来的。我想戴高乐的侍卫也是保留了那个时候的

① 还有赫鲁晓夫的女儿、儿子以及女婿。

样子。

我们到达爱丽舍宫时，大铁门敞开了，我们被引进一个装饰华丽的院子里。群众和侍卫都留在外面。总统招待我们到下榻的地方。

在巴黎期间，法国政府为我组织了一次盛大的招待会。戴高乐亲自出席，他比所有在场的人都高出一头，并且看起来精力充沛。他坚持要给我介绍那些属于所谓法兰西共同体——换言之，即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的代表。他不停地把一些黑人介绍给我，说："这是某某先生。他代表法国的某一省。"当然，这些先生们对总统都是笑脸相迎，举止谦恭有礼。他介绍完了一些，又跑去找另一些。我特别回忆起一个从阿尔及尔来的皮肤黝黑的女人。戴高乐让我们认识之后就走开了，让我们单独交谈。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话，对法国、戴高乐总统和现存的政治制度赞扬不止。她企图使我相信，阿尔及利亚的阿拉伯人在法兰西共同体内生活是幸福的。我一点也不愿听她的话，但在这样的场合，我不能同她争辩，否则可能会引起一场风波。我决定只向她提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夫人，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和你的看法一样吧。我未必会从所有你的同胞那里听到和你同样的意见，对吗？"

她说："不错，你可以随便去问谁。当然，你可能会碰到一些有不同看法的人，但是肯定大多数人的意见都

和我一样。”

“那么，那些为反对法国统治而战斗的都是些什么人呢？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已进行了好多年。夫人，事实似乎同你所讲的有矛盾。看来你喜欢目前的局面，但我怀疑你的话反映了阿尔及利亚人民的真实感情。”

我们的对话就此中断，因为这时戴高乐又带来两个非洲人介绍给我。两人中一个是塞内加尔人，身材魁梧，面貌俊秀，黑色皮肤中还透着紫色。他也赞成共同体，并且说他希望塞内加尔仍然作为法兰西共和国的一部分。

戴高乐想把这批经过挑选的丰衣食足、受过良好教育、或许还是富有的殖民地的代表人物介绍给我，这是十分自然的事。他们将会告诉我，法国对待殖民地多么好啊。这是一些喜欢殖民主义者的殖民地人。戴高乐把他们一一介绍给我，似乎他们每一个人都反映了殖民地人民的呼声。这使我再次想起乌克兰的伟大诗人和思想家塔拉斯·谢甫琴科说过的话：“从摩尔达维亚人的国土到芬兰人的国土，人们都默不作声，因为日子好过。”①谢甫琴科的这几句话是带有讽刺意味的。我现在可以把它赠给戴高乐。但我是他的客人，所以还是默不作声为妙。

有一次在招待会上，有人提起几内亚总统塞古·杜

① 塔拉斯·谢甫琴科，十九世纪的乌克兰诗人。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35页也引用了这句话。

尔。我说，我熟悉他，因为他不止一次到过苏联，而且我说我对他很尊敬。戴高乐说："是的，我对他也很熟悉。"但是他的语调显著地变得悲哀和遗憾。"法国让塞古·杜尔受到教育，而现在他却把几内亚从法兰西共同体中拉出去。"戴高乐没有说任何贬低和指摘塞古·杜尔的话，但从他的话中我能听出一种悲伤的调子。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我们不信任法国，怀疑法国人是否会真正履行自己的诺言，把军队从几内亚撤回去，但是，象处理阿尔及利亚问题一样，戴高乐这次又做了一件诚实和正确的事。

戴高乐主要忙于向我介绍非洲人，而我则结交了另一些来自法国本土的来宾，其中有我在日内瓦会议上认识的老朋友前总理富尔。我惯于叫他埃德加·费奥多罗维奇。我很喜欢他。他是一个非常善于交际和活泼的人。他把他的妻子介绍给我，她是某妇女杂志的编辑。①

许多法国人自动向我走来，其中有不少是大资本家。他们和我交谈几句之后就分开了，因为另外有人也要来同我会见。这正象在火车站上那样，你可以同你愿意的任何人谈话，愿谈多久就多久，然后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招待会为交谈提供的条件要比坐下来的宴会好得多。当

① 赫鲁晓夫在日内瓦认识埃德加·富尔。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99页。他的夫人露西·富尔是一个新闻记者，《船》的创办人和经理。

你不得不按照预先排好的座位入席时，这好象用抽签来为你确定宴会的同伴一样，整个晚上你就被他钉住，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就是我比较喜欢招待会的缘故。

我们的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和夫人在大使馆里为我们组织了一次招待会。这是一次特别难忘的招待会。我记得我同维诺格拉多夫站在一起接待客人。有许多非常显要的人物都来了。我们说他们是显要人物，因为他们的名字是以“德”字开始的。这说明他们是贵族。当然，法国大革命已经清算了许多名字前头有个“德”字的人，而且我们都知道更显要的还是“资本先生”！今天在法国，人们的名字前面有一个“德”字还是吃香的，但是真正起作用的还是要看你有多少钱。

在我接待客人时，来了一个相当漂亮、留着一撮黑胡子、披着奇怪发型的青年。他的样子很象理发店门口照片中的模特儿。我们的大使在我耳边轻轻地对我说，这个走过来的人就是法国最大的资本家洛希尔。①当然，这个名字是非常有名的。我在当工人时常在报纸上看到这个名字，因为当时洛希尔企业的工人常常罢工。

当人们把他介绍给我时，我对他说：“我很高兴能见到你，洛希尔先生。我多次听到人们谈到你。同你握手使我感到高兴和荣幸。欢迎你到我们大使馆来作客。”他

① 洛希尔男爵代表他的家族所经营的企业同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府保持着联系。

咕哝了几句作答。

我叙述这件事是因为我们对洛希尔出席招待会相当重视。当然，如果我们没有邀请他，他也不会来。我们的大使曾说："如果洛希尔肯来，这就说明他并不抵制我们的邀请，因此，就是他承认我们的一种表示。"这不是说洛希尔是在对我们表示尊敬。毕竟，一个洛希尔这样的人对苏联的代表，特别是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委员会书记会有什么样的尊敬呢？

法国另外一个最大的资本家也出席了我们的招待会，这就是布塞克先生。我不清楚他究竟拥有多少纺织厂和服装厂。他雇有成千上万的工人并拥有巨额的资金。①他同时也是《震旦报》的发行人。这家报纸被认为是法国最反动的报纸，对我们的态度十分恶劣。然而由于某种原因，布塞克这个人对我国和我个人似乎抱有好感。

不久之前，他到过苏联。他事先打电报给我要求接见。我们领导成员经过讨论后决定让外交部通知布塞克，由我接见他。于是他来了，我接见了他并且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后来他向我表示感谢并告别。我有些感到不解，因为他似乎没有什么具体的问题要谈。他要谈的只

① 布塞克是纺织企业家，也是克里斯琴·戴奥公司的创办人和所有人，下面将介绍他1959年9月去苏联旅行的情况。

是一般的和平问题，这些东西他只需阅读我们报纸上的演说和文章就行了。他为什么要来苏联呢？我长时间内始终不能理解。

也许这是由于他赞赏我们在世界各地争取保卫和平的努力，同时希望同我建立联系，因为我是一个政治领袖，他把我看作是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第一号人物。资本家毕竟是资本家，因此他显然不喜欢我们的国内政策。但他似乎赞同我们的外交政策，并且希望能亲自从我们这里听到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而不满足于从报纸上读到的东西。谁知道这是什么原因，但在资产阶级中间确有这样的人，他们认为，在阶级斗争中敌对双方的国家和个人应该为和平共处而共同努力。

布塞克就是一个例子。有人对我说他是捷克人，但长期住在法国。他的年纪已经很大，身体肥胖，显得有些衰老。在他所拥有的一家工厂里，他为我们举办了一次展览会。他给我们看的商品都很精采：纺织品、领带、妇女服装和各种服饰。一切都很精致。我想他心中另有打算。换句话说，他希望把他的一些商品推销到苏联去。

展览会里还陈列着一些有关他所雇佣的工人们生活的照片，特别强调他给工人提供的各种社会福利：休养所、医院、儿童保健站，等等。照片上的儿童看来不比我们的孩子差——可能还要好一些。无疑，他确实为自己的工人创造了这种条件。但重要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是

否真正对所有的工人都照顾得这么好？我把这个问题保留在自己心里而没有去同他争论。总之，这主要是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而不是两个人之间的争论。而我是一直坚信最终谁将赢得这场争论的。同布塞克争论不会解决任何问题，肯定不会使他改信社会主义。

此外，他是一位十分大方的主人。无可否认，我们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不少东西。他给我们看的许多东西可以有益地应用到我们的工厂里。我有这样的想法，如果要把布塞克的某些方法应用到我们的工厂里来，他是会愿意给予充分合作的。

布塞克说："欢迎你们来参观，看一看我的工厂生产过程中你们所感兴趣的东西。随便你们什么时候来都欢迎。我不但给你们看我们怎样生产目前流行的商品，而且给你们看当商品式样变化时我们的生产如何适应新的式样。"后来我们大使馆的官员告诉我，布塞克有一所专门的研究中心，除了他自己的工作人员外，其他人从不允许入内。他把我们作为例外。因此，我要柯西金同志去对布塞克的工作程序详细了解一番。我已经讲过，柯西金是陪同我一起去巴黎的。

附带地说一下，我与布塞克的关系此后保持了很长一段时间。每年当我生日的时候，他总要送礼品来。我记得，当我七十岁生日时，他送来了一箱几乎已有八十年的白兰地陈酒和好些瓶度数很高的法国苹果露酒。白兰地

是他私人的藏酒。每当喝一杯时，我就以感激的心情想起布塞克。当我现在怀念他的时候，我想起布塞克似乎有些象我们的莫罗佐夫。他与高尔基有接触，虽然他十分清楚高尔基是与布尔什维克有联系的人。①布塞克也是同样的一个怪人。他把我作为苏联政府首脑对待，但他和法国共产党却毫无关系。事实上，在他这样对我彬彬有礼的同时，他的《震旦报》却正忙着对共产党大肆恶毒攻击。或许他和苏联政府首脑保持良好的关系，其目的无非是想和我们做生意，赚更多的钱。其实，在一定意义上我们也用同样的态度对付他。因此，我相信我们是正确了解并根据正确的前提估价对方的。总之，我相信我们同布塞克的交往无疑是有益的。

到此我只讲到来我们大使馆参加招待会的一些大资本家。当然，来到这里的还有法国共产党人。多列士和杜克洛同志都来了。多列士的夫人维美徐也来了。她也是法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人之一。她以前是一位工人，以有着长期的政治活动经历而出众。②我们同法国同志们相互拥抱、握手、问候，但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进

---

① 萨瓦·莫罗佐夫是莫斯科的一个百万富翁，纺织工业家，曾对激进派给予大量的资助。

② 雅克·杜克洛1925年以来一直是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多列士夫人朱莉·玛丽在党内的名字是让娜特·维美徐。

行认真的谈话。这样我们就有更多的时间在招待会上会见其他非无产阶级的客人。我们知道法国同志以后还会到我们大使馆来，作为政治家、朋友和具有一致的世界观的兄弟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私下的讨论。

我记得有一次多列士同志来看我，并告诉我说他完全赞同我们毫不掩盖两种制度间分歧的大胆发言。他说，我们坦率地表达了自己的阶级同情，这大大促进了他正在进行的宣传社会主义的工作。多列士不仅以自己的言语，而且还以他的面部表情和整个动作向我们表达了他的这种感情。他和我们谈话时始终面带笑容，你可以看到他的牙齿，他的眼睛闪闪发光。我绝不怀疑他会掩饰自己的真实感情，我也绝不认为他是坐在我面前进行表演的演员。不，我知道他是不会伪装的。他是一个伟大的政治领袖，只要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他总是坚决去捍卫，去为它斗争，从不动摇。在所有法国同志中，我对他最了解。我们常常一起在高加索度假，并且也时常在莫斯科见面。

我们对杜克洛同志和瓦德克·罗歇同志也十分尊敬。他们两人无论在外交政策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的观点和我们都是一致的。我对罗歇同志仍怀着极大的尊敬。记得他庆祝六十五岁生日时，①由于众所周知的

① 罗歇，法共政治局委员，1970 年 4 月过六十五岁生日。

原因，我不能公开向他表示祝贺，但现在口述我访问法国回忆录的时候，我要向他道贺：对他和他的同志在完成法国共产党的目标方面致以良好的祝愿，并且祝愿他们在为自由和社会主义在法国胜利的斗争中一切顺利。

当多列士祝贺我发言直率时，他可能是指我在苏法友好协会的一次集会上的演说。当时大厅内到处都挤满了人。我事后知道外面广场上还有大批的听众从扩音器中听取我的演说。气氛特别热烈。在这里，它又一次表明了法国人民对苏联抱有特别的同情。为什么？因为在他们从希特勒的占领下解放出来的斗争中，我们作出了重大的牺牲。同时他们也知道，他们的国家之所以被德国人占领，首先是法国政府对苏联抱着势不两立敌视态度的直接结果。当法国政府拒绝同我们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时，它就为自己的灭亡准备了条件。我想，每个法国人都了解这个事实——不只是法国共产党人，而且也包括那些在争取美好生活方面和我们抱有不同观点的人。

我们也在记者招待会上坚定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告诉记者说，资本主义制度必须为更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让路，虽然我们也强调每个国家的问题应该由该国人民自己来解决。我们同情要求变革的力量，但不愿干涉任何国家的内政。革命和反革命都是不能输出的。

当然，某些人不同意我在会上所作的声明。这是可以预料到的；在资产阶级社会有一些专门反映政府意见

的机构。我们知道，戴高乐政府和我们的政治观点完全相反，并且正在同共产党进行激烈的斗争。因此，作为戴高乐的客人，我们应该注意避免卷入争论和对法国的社会制度公开发表评论。我们仅限于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发表一般的意见。

列宁曾一度住在巴黎，在我访问期间，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建议我们去看看列宁的旧居。①这里已经成为一座博物馆。我应该说，这次参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对于我们伟大的列宁有纪念意义的地方保护得多么好啊！我称他为"我们的"列宁，虽然现在他应当属于全世界的进步人类和工人阶级。但他仍然是我们的同胞，我们的领袖，同时也是第一个指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条件已经成熟的人。所以，我们仍然认为他是我们自己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参观了我们领袖住过的房间之后，多列士同志和我走到阳台上，对聚集在下面街道上的工人群众及他们的家属发表了演说。他们热情地欢迎我们代表团，因为我们代表伟大的苏联人民。

我们在巴黎附近的雷诺汽车厂会见了法国工人阶级的代表。我记得那里的工人中有许多共产党员。厂长对我们的代表团谦恭有礼。他甚至送给我一辆小汽车作为

---

① 列宁流亡国外时，从1909年到1912年居住在巴黎。列宁在左岸的旧居，是法国政府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同意他去参观的唯一的共产党圣地。

礼品。①他表示希望雷诺厂能与我们的汽车厂进行合作。我完全同意他的意见并且这样告诉了他。可是遗憾得很，这件事毫无结果。因为要在两个政治制度如此不同的国家之间建立经济合作是很困难的。

我的日程安排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会见法国人民以及亲自熟悉法国生活各方面的情况。我特别渴望要去参观一些有名的历史和文化古迹。

法国是一个历史和建筑艺术方面庞大而丰富的博物馆。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都有一些东西使你惊奇，使你感到乐趣和赞叹不止。科兹马·普鲁特科夫说得好：你不能一下子尽收眼底。因此我只能参观一部分有趣的地方，如建筑物、绘画、雕刻，等等。②

我在开始访问巴黎时，曾到罗浮宫去参观。这使我想起青年时代参观列宁格勒冬宫的情况。我尽快地从一个厅走到另一个厅，走了整整一天，弄得筋疲力尽再也走不动了。我只好瘫倒在公园的长凳上。那还是我年轻力壮的时候。可是现在，罗浮宫更大，它所收藏的精美的展

---

① 赫鲁晓夫在弗林的雷诺汽车厂参观时，厂方送给他一辆蓝色弗洛里德赛车。赫鲁晓夫有时把事情的先后次序和旅行的日程弄错了。例如，这里叙述的在雷诺厂的参观是在他结束了对各省的访问以后的事。

② 科兹马·普鲁特科夫是十九世纪四个诗人的笔名，即A·K·托尔斯泰和热姆丘日尼科夫三兄弟，他们共同创作了一个讽刺格言和幽默诗歌的集子。

品更丰富，一次参观不可能把全部的珍藏都看完。

我们的向导、文化部长〔马尔罗〕，一位有名的作家，他还陪我去参观了爱丽舍宫，并去了凡尔赛。①人家告诉我，他的经历是很有趣的。他开始是一个热心的共产党人，后来变成一个同样热心的戴高乐派。我觉得他很热情、诚恳。他想使我对法国和它的文物珍品留下良好的印象。

按照访问的日程，我们要到一些省去参观。有人对我说，沿途每一城市都将有一位总统代表来迎接我们。换句话说，他们是指派的而不是民选的官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对警察的管理。开始，我对为我们访问所作的这种礼仪的安排有些生气。我不喜欢在法国警察的保护下旅行。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代表团的某种歧视。可是，当我们向多列士征求意见时，他解释说戴高乐总统只是在接待最尊贵的客人时才叫他的代表出场。

在旅途中，有总统的一些亲信陪同我们。中途在几个城市停留时，有一位外交部的官员来迎接我们。他曾在德让之前任驻莫斯科大使，并懂得俄语。沿途每到一个城市，他总和我们一起参加宴会。当他喝着白兰地或

---

① 安德烈·马尔罗是戴高乐的文化部长，在俄文原稿中，赫鲁晓夫说："文化部长是一位有名的作家。我记得他的名字和法国另一位著名作家莫里哀相同。"

芳香的烈酒时，他在谈话中越来越兴奋，不禁要唱起俄国歌曲来。我们其他人尽力伴着他一起唱。我们并不是特别高估自己的唱歌本领，但是一个法国人如此欢乐地同我们在一起，这是令人感到愉快的。由于尼娜·彼得罗夫娜同我在一起，德让大使夫人也伴随着我们。她是我们在莫斯科认识的老朋友，一位极可爱的妇女。①

在我们所到之处，法国人的态度使我们感到非常高兴。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有敌意的迹象。有时到一个城市访问时，正碰着节日。例如，在一个市镇里，市民正在选举美女皇后，他们邀请我们去参加。每一个人都穿着民族服装。他们把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介绍给他们的美女皇后，她的确是一位十分漂亮的姑娘。我想，如果我把她的照片给人们看，他们一定同意她也能够当俄国的美女皇后。她看起来完全象一位俄国姑娘，体态丰满，面颊红润，身体健壮。盛会结束之后，市民们还把一个玩偶送给了尼娜·彼得罗夫娜。我在这里细述这件事，因为它表明我们到处受到热情的欢迎。

关于我在波尔多的访问，我最记得的是那位市长。他是一位年轻的——同我比较——精力充沛的人，名叫

---

① 赫鲁晓夫的主要向导是教育部长路易·若克斯，1952年到1955年期间他曾任驻莫斯科大使。陪同人员还包括国务部长路易·雅基诺、让—马赛尔·让内及德让夫妇。

沙邦一戴尔马。① 他同我乘车游览市区时，十分热情地向我介绍改建波尔多市的规划。他指指那些准备拆除的整幢公寓大楼。我只是仔细地听，没有向他提很多问题，因为他所讲的都是与我无关的他们当地的事情。然而必须承认，我不能真正理解，更不用说同情他这种要把所有这些大楼拆除的激情。也许这是由于我们在苏联对住房有更大的需要，因此，即使是那些十分破旧的老房子，只要仍能居住并满足城市居民最基本的需要，我们仍加以爱护。我特别了解莫斯科的住房问题，但其它城市的情况也并不好一些。在我们全国的城市里，人们都住得很拥挤，设备很差，挤在一起象墙缝里的臭虫那样。常有一间房间住上两户人家的事。真是难以置信！我不知道一家人家怎能在这样的条件下居住。因为我心中正在想着这样的事，所以听到沙邦一戴尔马如此强调拆掉旧房子的确使我惊奇。

我心里在想："应当记住这些人是资本家，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我们共产党人就不同了。对我们来说，拆毁一座公寓大楼并把住在里面的人搬出去是一个很难办的社会问题。"

虽然如此，沙邦一戴尔马给我的印象是良好的。有人告诉我，他是戴高乐派，他当然也没有对我隐瞒这一

---

① 沙邦一戴尔马是波尔多的市长和国民议会议长。

点。在我们整个的交谈中，他不断自豪地提到他同戴高乐总统的亲密关系。

我非常喜欢马赛。它周围的农村使我回想起我们土壤干燥、树木丛生的黑海之滨。这个城市也很象我们的敖得萨。事实上，马赛和敖得萨后来结成了姊妹城市。在很长时期里，这两个城市在经济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当我年纪还轻住在乌克兰的时候，当时有一种瓦叫马赛瓦。据说法国人到敖得萨来购买俄国小麦时，他们就在马赛装上一种特殊的瓦作为压舱物。到敖得萨之后，他们卖掉瓦，满载了小麦回去。作为一个多次看到敖得萨的俄国人，我现在终于亲眼看到了马赛。

在马赛时，我住在一所专为招待贵宾的王宫或是地主的房子里。接待我的总统代表开着玩笑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这所房子完全任你使用。你可能有兴趣知道你要睡的床是拿破仑三世过去睡过的。"

我懂得这句玩笑的意思。于是，我也开玩笑地回答说："呆在这里不会使我感到更舒服些。"

他是想向我指出，这是一所过去法国国王来马赛时居住过的历史上有名的地方，因此只招待那些最尊敬的客人。他只是漫不经心地提到这一点，因为他知道我对此不会太感兴趣——他估计的完全正确。在晚餐时我们继续开玩笑。

他的妻子原来是一位很可爱的英国女人。她对我们

说，她喜欢俄国的伏特加酒。我们随身带了一些礼品，包括一些伏特加酒。我们打开瓶喝起来。可是喝完之后，我发现大家显然还想喝。于是我问随从的警卫员他们身边是否还有。他们立即把酒拿来了。这时我们的英国女主人也笑逐颜开显得很高兴的样子。接着我们一口气把警卫的酒也全喝光了。这里，我希望大家正确理解我的意思。我不愿意任何人以为我是在说总统代表的妻子嗜酒。绝对不是。她的举止很庄重，她甚至没有丝毫醉意。她比她的丈夫年轻得多，显得非常健康。她的酒量很好，但也懂得自己的限度。我不愿对在马赛如此热情地接待我们的主人的妻子造成一个坏印象。她是一个很好的女人，一位贤妻良母。她很活泼愉快，可能这是英国人的民族特性。这一餐是在一种无拘束的气氛中进行的，她和她的丈夫热情而又殷勤地款待我们。①

也许有人要说："这个共产党人赫鲁晓夫怎能对马赛的法国当局、尤其对当地的警察头子抱着这样友好的态度呢？"我的回答是：如果甚至在警察的制服下有时也跳动着一颗人的心，我又怎能不这样呢？当然，也许他的心对此根本就是无动于衷的，他不过是执行总统交给他的任务。我不愿多加猜测。我只知道他们对我招待得非常好。

---

① 马赛市长是雷蒙·阿斯一皮卡尔。他的夫人（原名菲利斯·斯佩西）是英国人。

我记得在这同一次会餐中，曾任驻莫斯科大使的外交部官员〔路易·若克斯〕有点喝醉了，他开始唱起歌来。接着，我们大家都唱起《马赛曲》来了。毕竟我们是在马赛，怎能不唱《马赛曲》呢？我们回想起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气氛是非常愉快的。我很喜欢唱《马赛曲》，因为我是在它的鼓舞下成长起来的，我年轻时很喜爱这支歌。当然，我们每一个人对这首歌的感受各有不同。法国人把它作为法国的国歌来唱。我们唱它，则是把它看作工人阶级的革命战斗歌曲。

我对这位前大使说："你知道我们过去怎么样唱这首歌吗？我不知道我们的主人对我们所配的歌词怎么看法。"我于是把歌词告诉他。歌词如下：

特列波夫将军召来了他的宪兵：
"你们，穿蓝制服的家伙，去把宿舍统统给我搜查一下！"
"老爷，我们搜查了三百个房间，
连一个社会党人也不见。
但在三百零一号里，却找到了一个大学生，并在他的上衣内，找到了水一瓶。"

它一定是首民间歌曲，因为没有一个诗人会把歌词编写成这样。这首歌在我年轻时是很流行的，但只有在顿巴斯矿工中间，因为即使象伏罗希洛夫这样的老革命家，他比我年纪大，也从来没有听到过。

我把歌词告诉他后，这位前大使说：“啊，真的，让我们唱吧！”于是我们开始唱，他也和着。这使我回忆起久远以前我的青年时代，但同时也使我觉得有点窘。我不断地回过头来看看周围有没有警察。我们那位主人本身就是宪兵，他听不懂这首歌词的意思，但前大使听得懂每一个字，他不禁哈哈大笑起来。过了一会，我决定停止再唱，以免冒犯我们这位本身就是宪兵的主人。我说：“让我们唱点别的吧。如果我们唱这首歌引起误解，那就太不好了。”那位前大使笑得更厉害了。我非常喜欢他，他真能使人一点不感到拘束。

我们旅程中的下一个城市是第戎。前大使也到了那里，并和我们一起参加了当地的官员为我组织的盛大宴会。在宴会过程中，一个穿着牧羊人服装的法国人突然走出来并送给我一头小白羊。照相机喀嚓、喀嚓地响，摄影师们忙着把送羊的镜头拍了下来，每个人都开起玩笑来了。我们应当决定让这头羊活还是死——即我们赐它活呢还是把它判处死刑。最后，我们决定还是让它活。如果把它烤来吃倒是不错的，但是我们觉得一头活羊更能象征友好关系与和平共处。因为羊和鸽一样都是没有侵略野心的动物。这就是我们开玩笑的话题。气氛轻松而充满笑料。我们感到完全象在家里一样。

在第戎逗留期间，曾经有过严肃得多甚至可以说是不幸的时刻。在到达那里之前就有人向我们谈起该市市

长、在大战期间积极组织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尔教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记得有人对我说，他曾经被德国人两次判处死刑。他也因为我们在打败德国人方面所起的作用而对苏联特别友好。他憎恨法西斯主义，同情苏联。甚至有人认为他是亲苏的。总之，他是一位不平凡的人，我期望与他会见。

在第戎，人们象欢迎国王一样款待我们。各式各样的人来欢迎我们，但却没有基尔教士。我获悉法国天主教会不让他和我会见，因为我是个无神论者和共产党人。他们叫他到别的什么地方去了。大概是把他临时调到一所修道院去了。甚至有谣传说他已经被捕了。①

在我们到达住地后，在我们住所的周围聚集了一大群人，他们对着我们喊叫。我问我的翻译他们在喊些什么。他说他们在喊："赫鲁晓夫！解救基尔！"他们要求我干预这件事，迫使当局让基尔回家，但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即使我知道，我也无能为力，即使我很同情他的遭遇。事后，有几个官员给我解释说，他头脑发热，神经有些错乱。依我看来，他们害怕他过分热情地接待我们。很清楚，法国当局愿意热情接待我们，但不能过分。这件事

---

① 天主教会积极抵制赫鲁晓夫去各省旅行。第戎市长费力克斯·基尔教士是一位抵抗运动的英雄，上级教会禁止他参加欢迎赫鲁晓夫的活动。后来据说在赫鲁晓夫访问期间他被警察从第戎搞走。

使我感到很惋惜，因为我很想会见基尔。

到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一个法国省里的参观给我留下了比较愉快的回忆。戴高乐总统建议，我可能有兴趣去看看一座实验性的灌溉系统。①它不用水道或沟渠，而是采用一种独特的新方法，利用水泥铺成的浅水槽组成灌溉网，这就得以避免水渠漏水的损失。我是生平第一次看到这种方法，它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修建的技术水平十分高超。这样的系统不仅在工业上而且在农业上都需要有新的技术，而且还需要兴建制造水泥浅槽的工厂。虽然如此，我还是决定要把这样的方法介绍到苏联去。我回到莫斯科，就把全部东西介绍给我们的灌溉专家，并且派了几个人到法国去学习。后来我们在塔吉克、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以及土库曼广泛采用了这种方法。

法国人种植果树的方法使我感到兴趣，尤其是在搭了棚架的果园中的梨树。果树的枝四面展开，这样不仅便于采摘，而且采果人可以只摘成熟的果子，而毋须把它们从树上摇下来。同时，在同样的范围内还可以多种一些果树。当然，采用这样的种植方法时，果树的寿命要比

① 赫鲁晓夫参观了法国南部的一些灌溉工程。他对靠近西班牙边境的一个灌溉系统特别赞赏。后来他曾想使纳赛尔采用这种灌溉系统（《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49页）。

采用其他方法短些，但总的说来经济上还是合算的。我们自己的农学书籍也赞成这种栽培方法，但在我们国内，除了少数业余农艺家的小果园之外，我没有看到有人采用过。

我对戴高乐介绍我参观这些有实用意义的地方表示感谢。

在同戴高乐再次会见并举行较长一轮会谈之前，我到凡尔登去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阵亡战士的墓地。当时我们同法国是盟国。在反对德国皇帝的战斗中，我们军队曾在法国国土上作战，我们和法国的阵亡将士葬在一起。我到墓地的访问是一个庄严而难忘的时刻。在大片土地上竖着数不清的十字架。当奏起苏联和法国国歌时，我们都脱帽致敬。

一批工人从城里乘坐公共汽车来到墓地。他们展开了一面红旗，作为无产阶级的友好表示，向从前的无产者、现在苏联党政的首脑致敬。陪同我们的总统代表对我说："法国共产党派这些工人来欢迎你们，我很欣赏他们的这一策略。"他们避免做任何可能损害这一场面的事。他们没有叫喊口号或表示反对总统，也没有试图把这个欢迎的场面变成示威行动。他们显然记得，在战争中所有的法国人无论是否无产者，都是全国一致地共同战斗。带领工人到这里来的共产党领导人决定向我国国旗致敬，虽然他们也带来了他们自己的红

旗。①

我还记得戴高乐的内政部长陪同我乘车去参加一个纪念会，这位部长年纪很轻，却能同我讲俄语而不用翻译。②在汽车里，他开始唱起俄国歌来，我感到十分惊异。我问他怎么学来的。

他回答："啊！我会唱不少俄国歌，我喜欢这些歌，所以我现在唱一支给你听。从前我在德国集中营时，有许多俄国人，他们教给我他们的文字和歌。"他在讲到集中营里的俄国同伴时非常热情。

他是一个真诚希望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人。我想，当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俄国人一起在希特勒集中营内当战俘时，他可能已经深信必须避免将来再发生一次战争悲剧。他当时已经认识到，阻止德国向法国发动另一次进攻的唯一可靠办法，就是同苏联结成同盟。在戴高乐的内阁成员中有这样的人物，真使人感到意外的高兴。

在法国旅行过程中，我们没有很多在政治方面直接交换意见的机会。由于我们不愿意从事总统可能不满的任何活动，还由于我们很清楚他的政治见解，因此，我们

---

① 赫鲁晓夫由国务部长路易·雅基诺陪同到凡尔登参观第一次世界大战纪念地。

② 当时的内政部长是皮埃尔·夏特内，但是他和这里的叙述有出入。他从来没有当过战俘。看来赫鲁晓夫把他同另一个法国官员混淆了。

在各省同共产党或工人组织就没有进行什么接触。沿途虽然有不少和农民见面的机会，我也没有参加任何专门同他们安排的会见。我记得有一次汽车驶过一处葡萄园，看见有几个农民正在摘葡萄，其中一个人看见了我们的车子。他举起了手臂，手里拿着一瓶酒和一只杯子向我们跑来。我们觉得，这表明了法国农民希望自己的国家改善同苏联的关系，这样，他们的前途更有希望而且不会再害怕战争。

整个看来，法国人民了解苏联的外交政策是为了加强和平。所有的法国人，不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和政治信仰如何，都能了解列宁的友好政策的好处及合理性。正如我曾指出的，甚至有些资本家也理解进一步改善我们之间关系的必要性。然而不幸得很，正如他们不止一次地在投票选举时表示的那样，大多数法国人对于他们争取更美好生活的道路的观点，和我们并不一致。当然，共产主义的道路是通过革命转变使资本主义制度变成社会主义制度。

至于戴高乐本人，他的任务是要搞垮共产主义运动。当他的代表陪同我们在法国各地旅行时，我们应该记住这一点。有这么一句老话：如果你告诉我你的朋友是谁，我就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在法国各地接待我们的人都是戴高乐的朋友，因此我们十分懂得只应谈些抽象的话题，而避免涉及政治。在执行警察职务的人面前谈论政

治问题是极端愚蠢的。

当然，在我同戴高乐本人谈话时是无法避免谈政治的。相反，我到法国来的首要动因就是要同他就许多重要和麻烦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讨论。当我们结束在法国各地的旅行回到巴黎之后，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些讨论了。为了避免城市的喧闹，总统建议我们到他的乡村别墅去，那里不会受到打扰，可以在早餐、午餐和晚餐时完全不受干扰地进行交谈。①我对他的建议表示感谢，我体会这样的邀请是表示对我们国家特别尊敬。这同我与艾森豪威尔一起在戴维营逗留的情况相似。

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一同来到戴高乐的宫里，当然，他的夫人也在场。自称了解戴高乐夫人的政治观点的人告诫我们说，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因而是坚决反共的；要她在宫里当一位招待共产党人的殷勤的女主人，甚至只是同共产党人坐在同一桌上，都需要她作出极大的努力。我不知道这种说法是否真实。就算可能是这样，我们却完全不感到她有什么不友好的表示。她热情而有礼貌。当戴高乐与我交谈时，她总是注意招待好尼娜·彼得罗夫娜。我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有教养的女人。即使由于宗教感情她在思想深处不能容忍共产党人，她仍然知道怎样克制自己对我们无神论者和苏联代表的

① 朗布依埃在巴黎西南三十五英里处，过去是法国国王的别墅。

反感。

有一次，我与戴高乐、他的夫人、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们的翻译一起进餐，总统向我提出问题时用了“蒙纳米”的称呼。我问翻译这是什么意思。他说这在法文中的意思是“我的朋友”。我看看戴高乐，他一点也没有笑容。他很难得笑。我认为这表明他认真地把我看作是他和法国的朋友。这是一个良好的预兆，这表明戴高乐是要强调，尽管我们的政治信仰完全不同，我们还是在保卫和平的共同斗争中联合了起来。我也立即作了适当的回答，称他为“我的朋友”。

在叙述我们会谈的内容之前，我想先谈谈我们对戴高乐作为个人和政府首脑的一般看法。塔列朗曾经说过，一个外交家应该有一个掩盖他的真实思想的舌头。这句话对于一个政治家也同样适用。戴高乐就是一个例子。他是狡猾还是愚蠢呢？在一段时期内，人们把他看作是一个傻瓜和法西斯分子。其实，他是一个十分精明的家伙。

我初次与戴高乐会见是在战争结束末期斯大林邀请他来莫斯科的时候。我们担心他会把所有的法国共产党人都扔进监狱。战时留在莫斯科的多列士同志准备返回法国。斯大林问戴高乐，多列士到达巴黎是否就会被逮捕。结果，多列士不仅没有被逮捕，而且作为法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了政府，他甚至成为戴高乐领导集团中的副

手之一。

后来，当戴高乐第二次执政时，他加强了总统的权力（换句话说，也就是他自己的权力）。他提出了一个反动的选举法，给右翼势力大开方便之门。但他没有试图镇压法国共产党。他正确地懂得共产党在法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中有着牢固的基础，并且克制了他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偏执。也许他害怕如果公开镇压共产党，可能会引起骚乱甚至内战。总之，不管他的动机是什么，他表现了明智，容许共产党在议会里充任法国农民和无产阶级的代表。当然，他只开了一条狭窄的口子，一个小小的裂缝，然而这已足以让共产党及其报纸得以继续存在。

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总得有人带头对戴高乐的个人极权发起攻击。他自己说："我就是法国"。他把他组成的政府视为一种陪衬，一切由他说了算。政府只是被动地接受现状，也不要求得到参加某种集体领导的权利。这就只有由共产党及其报纸来向这种把一切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里的现象宣战，这个人让自己成为他的本阶级、即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忠实奴仆和代言人。即使今天戴高乐已经不在了，但法国的权力仍集中在几个执行同样反动的对内政策的戴高乐主义者手中。

可是，谈到对外政策方面，我们认为戴高乐是世界上、至少是资产阶级领导人中最明白事理的领导人之一。我已经指出，我们赞同他在处理法属殖民地阿尔及利亚

和几内亚问题时所表现出的明智。此外，他对苏联在世界上的重要性也曾作出正确而清醒的估价。象麦克米伦所说过的一样，他在我面前承认，法国已丧失了已往的势力和影响；他承认美国和苏联是目前两个最大的强国。虽然他不一定赞成我们的对外政策，但他自己的对外政策并不是针对我们的一种进攻性力量。

在我开始和戴高乐会谈之前，我们的大使维诺格拉多夫向我强调指出总统外交政策的积极方面。维诺格拉多夫已完全被戴高乐争取过去了。在我们之间，我们常常开玩笑地说他是一个戴高乐主义者。可是我应当承认，根据我自己和戴高乐接触的经验，我也同意维诺格拉多夫对他的高度评价。

我喜欢戴高乐的一个方面是他的自信心和权威的气派。他不需要任何人告诉他哪些事符合法国的最大利益或哪些事不符合法国最大利益。在我们会谈的过程中一直只是他一个人在讲话。在有些会议中我方还有葛罗米柯出席，戴高乐要法方也有相等的代表，但他的外交部长和总理出席会谈仅仅是表面形式。①他几乎从不和他的部长们商量。我不知道他们是否敢于在他的面前发表自己的意见，至少在会谈期间没有。如果他们说些什么的话，那也完全是按着戴高乐所定的调子。

① 莫里斯·顾夫·德姆维尔是外交部长，米歇尔·德勃雷是总理。苏联方面出席的有柯西金和葛罗米柯。

他和我商定只讨论有关外交政策问题。换句话说，绝对排除和从不涉及法国和苏联两国的国内制度问题。戴高乐懂得国内政策的问题只能由有关国家自己决定，他甚至没有对我们的政治制度作出任何不同意的暗示，虽然我十分清楚他是反对我们的制度的。当然，我也没有对法国政治的制度发表任何意见。

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问题是德国问题，这就是说要商定一项我们双方都能签署的和约。和约是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有了和约，紧张状态就会缓和，人们可以更自由地呼吸。没有和约，我们就休想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例如裁军、贸易、文化和科学交流，等等。德国问题是我们两国关系的关键。这是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解决它，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就难以正常化。

戴高乐在会谈中出乎预料地镇静和沉着。我甚至可以说，他缓慢的步伐使我们有些厌烦了。他说："赫鲁晓夫先生，急些什么。为什么你一定要马上签署和约呢？时机还没成熟。关于德国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我们两国的观点还相距很远。"

什么是他的观点呢？首先，我看得出他对德国人仍然十分疑惧。他甚至向我郑重声明，他决不站在西德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方面，把法国拖入一场反苏战争。他说，"赫鲁晓夫先生，我可以非常肯定地向你保证，法国永远不会与德国结成联盟来对苏作战。"也许，戴高乐在德

国问题上态度的最重要之点是，他和其他〔北约〕国家对于德国统一问题的看法有分歧。这些国家支持那些试图消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使德国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统一起来的势力。

戴高乐虽然也同样反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政治制度，但他的态度的独特之点在于他根本不愿意看到德国统一起来。相反，他提醒我们，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一直希望尽可能地肢解德国（我记得丘吉尔也表达过同样的观点）。我不愿再花费时间和精力详细地叙述戴高乐的立场，也无法准确地告诉你他想怎样在地图上重划边界，但他很坦率地说："两个德国还不够，我们一直希望有很多个独立的德国。"

在目前，戴高乐则满足于让德国分给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让一切保持现状吧。东德属于华沙联盟，换句话说，属于你们；西德属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让它就这样吧。"我认为这说明戴高乐切实了解德国的危险，但也说明——正象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们两国之间在和平条约问题上还不能达成协议，因为我们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真正独立，而不"属于"任何人。

看来他不想削弱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时他又说他也不想削弱我们的华沙联盟。他想保持战后形成的边界和军事同盟。换句话说，就是维持现状。虽然这还不能

排除发生意外的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但是他的立场是资产阶级领导人提出的一大堆坏的解决方案中的较好的一个，因此我们对它表示满意。

戴高乐也试图兜售他的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统一的欧洲的理论。当时我不能理解这个理论，现在我仍然不能理解。欧洲包括许多社会和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它们各自参加了不同的政治和军事联盟。这怎么能"从大西洋到乌拉尔"联合起来呢？同时，这一理论除了不现实以外，它还引起了我们对历史上一段不愉快的回忆。希特勒也曾想扩张到乌拉尔。我不禁心里这么想："多么令人惊讶！我们已打败了一个，而现在竟然又冒出一个玩弄这同一理论的人。"我确信，在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之中，不止戴高乐一个人想要统一欧洲。其实，我们也想要把它统一起来。但有一个区别：他们想要在整个欧洲大陆上建立资本主义，而我们则要消灭资本主义，建立社会主义。

戴高乐主张欧洲国家应以某种形式加强联合，他还告诉我们说，法国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越来越感到不舒服。他直率地对我们说，这种不愉快都是由于美国在欧洲充当保护人角色所造成的。他反复表明欧洲应当从美国的保护下解脱出来，甚至提议我们可以帮助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使他们摆脱美国过度的影响。我应对戴高乐说句公道话：他很清楚法国的利益所在，并且他不屈服

于任何外来的压力；不论何人——包括美国人——都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他，只要他认为这些意见不符合法国的最大利益。因此，他支持任何可能制止美国干涉欧洲内政的事物。他既不愿法国成为美国以孤立苏联为目的的世界政治棋盘中的一个小卒，也不愿法国成为美国手中盲目的武器。

当然，从我们的观点看来，戴高乐的立场是有利而且合理的，虽然它有些使我迷惑不解。按照戴高乐的阶级立场，我当时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如果一旦同苏联发生战事，法国将站在美国一边。所以，我很难猜透究竟他内心的想法如何。他作了一些暗示，但我不能确切地领会它们的含意。他只是清楚地表明，法国参加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不愉快的，但是当时很难设想他真会退出这个联盟。当后来戴高乐真正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撤回他的军队，从而无疑地削弱了指向社会主义国家的侵略势力时，人们可以想象我当时对此事多么感到兴趣。① 这表明他忠于自己提出的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统一的欧洲的理想；不是他所期望的政治和社会的统一，而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了一步，让欧洲人在没有美国人干涉的情况下自己决定欧洲大陆上的战争与和平问题。

---

① 1966年2月，戴高乐声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法国国土上的一切设施由法国管理。

后来，在我退休和成为一个养老金领取者以后，戴高乐到苏联回访。① 从此以后，我们同法国的合作和交往一直不断增进。

① 戴高乐1966年6月到苏联访问。

第十八章　U—2飞机事件

一架飞机被击落

在我的美国之行以后，四国——美、英、法和苏联——政府安排在巴黎会谈，讨论就裁军和和平共处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对于这次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会谈能否产生有意义的结果，我们没有寄予多大希望。但是尽管如此，对于预定在5月举行的这次会议，我们仍开始认真地进行准备。①

后来，突然发生了一桩事件，破坏了我们曾抱有过的一切希望。1960年5月1日早上五时，我的电话机响了。我拿起耳机，对方传来的声音说："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元帅报告。"他接下去告诉我说，一架美国U—2侦察机越过阿富汗国界，进入苏联领空，正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飞行。我回答说要他用一切可能的方法把它打下来。马利诺夫斯基说他已下达了命令，并说，"如果我们的防空部队能够睁大眼睛而不打瞌睡的话，我肯定能把它打下

① 艾森豪威尔、麦克米伦、戴高乐和赫鲁晓夫预定于五月中旬在巴黎举行会谈，讨论德国问题和裁军问题。

来。"他指的是在 4 月份我们有一次击落一架 U—2 飞机的机会，但我们的高射炮手正在打瞌睡，没有及时开火。

我们熟悉 U—2 飞机已经有一些时候了。有好几次我们抗议这种飞机侵犯我们的领空，但每次美国都拒绝了我们的抗议，说他们没有任何飞机飞越我们的领土。每次侵犯行为的发生使我们更加感到愤慨和厌恶。我们曾尽力用我们的战斗机去拦截和打下 U—2 飞机，但它们达不到 U—2 飞机飞行的高度。我记得我们的飞机只能达到一万八千或二万公尺，而 U—2 飞机的飞行高度为二万一千公尺。幸运的是，当时我们已能制造地对空导弹。看来它们能解决这个问题。

葛罗米柯同志有另外的想法。他是一个只知按规定办事的好的文职人员。当他获悉又一架 U—2 飞机飞越我国领空时，他起草了一份作为外交文书或由塔斯社发表的抗议。他把文件给了我，但我向其他领导成员建议不采用它。我说正式的抗议已经不够了。公开的抗议可以见诸于我们的报上，但我们不想再依靠公开抗议和外交途径。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美国人完全明白他们自己毫无道理。他们也清楚，每当这种飞机起飞执行任务时，它就会使我们感到非常不愉快。

最近这次向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飞行是对我国领土的最深的渗透，因而也是对我国主权特别狂妄的侵犯。我们已经不能再忍受这种不愉快的突然事件和这种侮辱

了。美国人继续进行这种飞行以证明我们的无能。好，我们不再是无能的了。

那一天，在马利诺夫斯基同志告诉我 U—2 飞机的入侵之后，在红场上举行了每年一次的五一节军事检阅。天空阳光灿烂，庆祝活动喜气洋洋，广场上劳动人民一片欢腾。当队伍正在前进的时候，我国防空部队总司令比留佐夫元帅走上陵墓上的检阅台，在我耳边轻轻说了几句。他告诉我那架 U—2 飞机已被击落，驾驶员已被捕，正在进行审讯。据比留佐夫元帅的报告，我们把一些高射炮排列成棋盘形，使 U—2 飞机无法逃避我们的火力网。当敌机飞到一组炮火的射程之内时，我们发射了两颗导弹，第二颗导弹是为了以防万一的。飞机当即被第一颗导弹击中。听到这样令人兴奋的消息，我向他祝贺并同他握了手，他就走了。比留佐夫在检阅时出现在陵墓上一事并不是没有引起注意。事后外交人员说他们当时立即猜到发生了某种重大的事件。因为比留佐夫元帅没有穿检阅的礼服而只是穿了平常的军装，而且轻声地同我耳语。

U—2 飞机的驾驶员鲍尔斯在飞机被击中时弹射出机外并跳伞降落，①当即被一个农庄的庄员们抓住并送

① 前中央情报局工作人员、空军中尉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驾驶的一架 U—2 高空喷气侦察机于5月1日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附近被击落。他是在执行从巴基斯坦的白沙瓦到挪威的博多的摄影任务。

交给部队。在搜查他的身上时，他们没收了他的一瓶速效毒药。如果飞机发生了什么问题，他应该用毒药刺手指自杀。不管鲍尔斯可能受过多么严格的训练，他没有按照指示去办。他无法克服想要活下去的欲望。他不能让自己自杀。因此，我们活捉了他，而小瓶毒药和穿刺手指的针成了我们的战利品。我们命令把飞机残骸送往莫斯科，在高尔基公园公开展览。人们从各地蜂拥而来，来看一看和摸一摸美国用来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的飞机残骸。

鲍尔斯没有拒绝对他的审讯。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已决定放弃预先为他准备的使他保持沉默的手段。他告诉我们，他从事间谍工作有多久、报酬多少和妻子是谁，换句话说，一切都说了。我们还缴获了一幅地图和他的飞行计划，从中得知他原来驻在土耳其的一个空军基地，后来飞到巴基斯坦，再从那里经阿富汗进入苏联。他的飞行计划是要飞越车里雅宾斯克和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到达挪威着陆。

我们都感到无比愤怒，因为这些间谍飞行已经进行了好多年。美国一直在使用和平时期中不能容许的方式搜集其他国家的情报。拿破仑曾经说过，即使炮声已经停止，外交战争仍在继续进行。对我们来说，这种间谍行为就是战争，用其他方法进行的战争。

次日，美国报纸刊载了一则消息说，一架从土耳其基

地起飞的美国飞机在高加索山脉上空、在土耳其领土一边飞行时失踪。想到这些捏造谎言的间谍们在我们已经掌握的证据面前将会面临的尴尬处境，我们内心感到非常高兴。

我们的情报部门对鲍尔斯继续审讯，仔细核对他的口供并把报告交给政府。在最高苏维埃开会期间，我们在领导成员中讨论了这件事。我提出了下列计划：我将在会上发表讲话，通知最高苏维埃，美国人侵犯了我国主权；我将声明飞机已被我们击落，但是——这一点很重要——我将不透露飞行员已被活捉而且是在我们手中。我们的意图是要给美国政府人士制造混乱。只要美国人认为飞行员已经死了，他们就会继续编造说飞机可能是偶然迷失方向并在苏联境内的山区被击落。

两三天后，当他们对这个不可置信的谎言大吹特吹并且正在自鸣得意的时候，我们决定把事情的真相公布于世。抓住美国人并且揭穿他们的谎言是时候了。我受权发表一个声明。我们公布了事实的经过：飞机的起飞地点，它的航线，目的地和任务。对美国人最重大的打击，就是我们宣布驾驶员已被捕并给我们提供了将向全世界公布的证据。最高苏维埃听了我的报告既很愤怒又很高兴。愤怒是对美国所采取的政策，而高兴是对我们的武装部队。我们特别感谢我们的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他们为我们军队制造了能够击落美国人认为是无敌的飞机的

武器。我们有句老话：不管你用同一个水壶从井中汲水多少次，迟早总有一天水壶会发生破裂。同样，不管美国间谍飞机大着胆子在我们上空飞行多少次，它的末日终于到来了。

美国一直采取两面派的策略。一方面，它向我们伸出手臂并作出种种表示他们的和平和友好意图的保证。另一方面，他们在我们的背上刺一刀。正如我常说的，U—2飞机事件是以另一种方法进行的战争。拿破仑常说，如果大炮不响了，战争就是在以外交手段进行。当美国人对我们采取敌对行为的时候，他们可能是进行外交战，但他们现在用的却是军事手段。他们不可能永远利用他们的科学技术来掩盖他们的行径。幸好我们当场抓住了他们并且充分地利用了这一点。

在我们公开揭穿他们的谎言以后，美国报刊就开始宣传说，艾森豪威尔不知道这类侦察飞行，这是已故国务卿杜勒斯的弟弟艾伦·杜勒斯的责任，如果当时他向艾森豪威尔报告的话，总统一定不会批准这种卑鄙的手段，等等。当然，这是对一件不正当行为的最合理的解释。鉴于即将在巴黎召开的会议，这样就可以给总统一个洗刷自己和保全面子的机会。

我在声明中故意不谴责总统。例如，当比留佐夫元帅和我一起去高尔基公园看U—2飞机残骸时（我也很想看看这架飞机是什么样子），我同聚集在展览厅里的外

国记者和其他一些人谈话。当然我很高兴有机会回答很多问题。我在谈话中尽量采用美国报刊上的提法，也就是说，杜勒斯和美国的军方人士应为U—2飞机事件负责。我完全不提总统。因为，把责任推给美国情报机构中不负责任的人而不是推到总统身上，这样做是符合我们利益的。只要艾森豪威尔总统不牵连在内，我们就能继续奉行加强美苏之间关系的政策，这种关系是我访问美国并和艾森豪威尔会谈后开始的。

但美国人不肯就此罢手。

5月某日，我们获悉艾森豪威尔总统发表声明，承认他事先知道而且批准了U—2飞机的飞行。他坚持说，他被迫采取这种方法，因为如他们所常说的，苏联是一个"封闭的社会"，不允许任何记者或其他美国人留在他们的领土上。他声称他有责任保卫美国的安全，为此他除了采取这类侦察飞行收集情报之外，别无他法。他以总司令的身分说，他认为美国有权保证它自己的安全，而不顾其他国家的利益，美国今后仍将继续进行这类飞行。

这是一个很不明智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愚蠢的声明。艾森豪威尔好象是在狂妄地吹嘘美国的能力和它所将要做的事。他的这种做法排除了我们帮助他摆脱困境的任何可能性。这就是美国总统，我们将要在巴黎会议上同他谈判；他竟然为如此粗暴和不能容忍的行动辩护！对总统为U—2飞机的侦察飞行辩解的行为，我们除了

公开予以强烈谴责以外，别无他法。我们不能再饶恕他。这好比是他把屁股朝着我们，我们只得使劲地踢它。我们的坚决反应立即产生了效果。

美国飞机甚至还有英国飞机经常从西德出发侵犯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境，我们也决定加以制止。我们迫降了几架这样的飞机，甚至击落了一架。我们的反措施产生了什么效果呢？后来美军司令发布一道命令，要美国飞机离开东德边境至少五十公里。当时有些美国侦察机在我们北部领海上空飞行，收集我们北极圈一带雷达设施的情报。我们击落了其中一架。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的做法是宣布他们的飞机是在公海上空飞行的。当然，他们无法证明自己的说法，而我们却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表明事实恰恰相反。有些驾驶员被打死了，但也活捉了一、两个。我们把尸体立即交给美国，但拘押了活的。①

此后，美国停止了侵犯我们的领空。当然，他们一方面经常侯机对别人进行间谍活动，另一方面却从不允许别人在他们自己的领空上飞行。至于苏联，虽然它有进行侦察和情报活动的合法权利，但由于我们离美国太远，很难把飞机派到美国去。美国并没有受到我们的威胁。事

① 一架美国的 RB—47 喷气式侦察轰炸机于 1960 年 7 月在巴伦支海上空被苏联歼击机击落。机上人员六名中两名幸存并被俘获。

情恰恰相反。毕竟是我国而不是美国受到部署在欧洲、亚洲和非洲的军事基地的包围。我们仅仅有少数几枚可以打到美国的导弹，而我们的飞机飞不到美国。所以，U—2 飞机事件是单方面的、无缘无故的猖狂背信弃义行径，其目的在于显示他们所谓的优势。美国人的行为表明他们丝毫不顾及别人，而只是追求自己自私的目的。他们企图从实力地位出发，强迫我们接受他们的条件。

我确信我们以最好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问题。首先，不管艾森豪威尔如何吹嘘美国有权利继续搞间谍飞行，在我们击落鲍尔斯的飞机以后，对我们领空的侵犯就停止了。美国人现在已经懂得，我们打算而且也有能力向飞越我们领空的任何飞机开火。我们没有采取圣经上的那种政策：如果有人打你的左颊，就把右颊也伸给他。我们已经表明，任何打我们耳光的人将被砍掉脑袋。美国人已经受到了一次教训，知道我们的容忍是有限度的。现在他们懂得，如果超越这个限度，美帝国主义不会不受到惩罚。我们向全世界表明，其他西方国家可能在美国强大的金融资本面前卑躬屈膝，而我们是绝不屈服的，一秒钟也不。我们的目的是和平和友好，但决不愿受凌辱和贬低。

U—2 飞机事件是我们同正在进行冷战的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一个转折点。一年前秋天我对美国的访问，

似乎预示了美国对我国的政策会有可能转变，但现在，由于U—2飞机事件的发生，蜜月结束了。

巴黎最高级会议

我们原来希望在即将召开的巴黎四大国会议上达成一项协议，现在U—2飞机事件使这个希望遭到了极大的挫折。可是，会议的日期已经决定。四大国的首脑都准备去参加。全世界的公众舆论强烈支持我们按计划举行会议。我们既不愿为会议的失败承担责任，也不愿人们因对会议的失败感到失望而指责我们。因此，我们一方面继续谴责美国对我们进行间谍活动，同时决定不采取主动去取消巴黎会议。

我们为这次旅行进行准备并挑选代表团的成员。已经商定，各国代表团由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率领。因此，领导核心立即批准我参加。另一代表是外交部长葛罗米柯同志。但是，我们获悉美方国防部长也将出席。①作为对应，我建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也参加代表团。如果美国人要在他们参加会议的成员中特别突出这一点的话，我们就应该也让自己的国防部长参加。

出发前，我们准备了必要的文件。这些文件都是有

① 美国国防部长小托马斯·盖茨以艾森豪威尔"首席军事顾问"的身分参加了代表团。

关促进和平共处和解决各种争端的办法，尤其是德国问题和裁军问题。我特别关心裁军。最近，出现了一大堆危险的易燃的问题。如果一个火星引起爆炸，就可能爆发一场可怕的战争。

起程去巴黎的日子到了。我们挑选了外形和技术性能都十分完美的伊尔—18飞机。在这次最高级会议之前，我们内心里觉得比参加上次日内瓦四大国会议更加得意，那时我们的飞机是双引擎的而其他首脑乘的都是四引擎飞机，因此我们在着陆时感到有些尴尬。①

在飞往巴黎的旅途中，我和葛罗米柯以及马利诺夫斯基研究了有关的情况。我们感到我们的责任和随之而来的紧张心情要比任何时候都更沉重。美国人胆敢在这次会议的前夕派遣侦察机侵入我国，这件事象幽灵一样经常在我们的脑海里盘旋。美国人好象有意给会议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以便让它在我们同他们坐到会议桌上时爆炸。对于这种国家我们还能期待些什么呢？难道我们真正能希望同它达成合理的协议吗？决不可能。这样，会议在开始前就已注定要失败。这些思潮在我的脑子里汹涌起伏。我越来越坚信，如果我们若无其事地去参加会议，我们的尊严将受到损害。我们的威信，尤其是在

① 赫鲁晓夫承认由于乘了“一架普通的双引擎”伊柳辛—14飞机到日内瓦参加1955年的最高级会议而感到有些尴尬（《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395页）。

第三世界，将受到损失。毕竟我们是受害者。如果说谁有权提出U—2事件，那就是我方。自然，有些国家会因这次会议的失败而遣责我们。随他们吧！我们就是不能装得若无其事地去巴黎。

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们应当对准备在会议开始时提出的声明作根本修改。我们要维护自已的声誉，就应当提出某种形式的抗议。我们对世界的公众舆论，特别是共产主义国家和正在为争取独立而斗争的国家的公众舆论负有义务。如果我们自己被打了一巴掌之后连个抗议表示都没有的话，那他们怎能指望我们会伸出手来帮助他们呢？因此，为了表明我们决心保卫我们的荣誉，必须修改我们在会议开始时的声明。我认为，唯一的办法是向美国提出一个最后通谍：他们必须为派遣间谍飞机进入苏联正式道歉，而且美国总统必须收回他所说的美国“有权”在我国领土上空进行侦察飞行的发言。

我在飞机上把这些想法告诉了葛罗米柯。他表示赞同。我也对马利诺夫斯基说了，他也认为我是完全正确的。我向速记员口述了新声明的内容，葛罗米柯即指示他的工作人员拟定了新的声明。这个文件有一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由于我们没有和集体领导讨论过新声明，因此立即把草稿用电报发回莫斯科供其他同志审查。由于机上备有速记员、通讯人员和有关设备，我们发出文稿后很快收到了回电：同志们表示完全赞成我们的新立场。

这样，我们离开莫斯科时所携的文件里是一种精神，而我们到达巴黎时文件里则是完全另一种精神了。

当我们到达巴黎时，我心里想："嗯，我们已经到了，准备要求总统道歉。但如果他拒绝道歉呢？或者如果他不取消对我们的侦察飞行又怎么办呢？"我记得我们在华盛顿作客时，曾邀请艾森豪威尔来苏联回访。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邀请。但是情况已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关系已经完蛋了，我们不可能再接待一个可以说是在主人的饭桌上捣乱的人。如果我们在艾森豪威尔道歉之前就接待他，这就是对我国领导人不能容忍的侮辱。因此，我想到要在声明中表示将收回我们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除非他向我们保证取消U—2飞机的飞行。代表团的其他成员都表示同意。我们迅速把这个新的立场通知莫斯科并立即得到了他们的赞成。

这样，我们为四大国会议的开场做好了准备。我们充满了爆炸性的想法。我们的代表团象强大的磁石一样，将排拒任何带有相反电荷的异体。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按照外交礼节惯例，我到达巴黎以后就立刻去拜会戴高乐。我还向麦克米伦表示了对美国这种行为的不快。我向戴高乐和麦克米伦两人表明，除非艾森豪威尔对自己干的事表示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情况，我是不会罢休的。戴高乐和麦克米伦试图平息我的怒气和软化我的决心，他们说如果我坚持要艾森豪威尔作出上

述声明，四大国会议将会失败。他们说，美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作出如我要求的那种声明。我回答说，我们不是一个二等国家，按人口和领土，苏联比美国还大。此外，我们也不接受这种意见，认为象美国这样的大国可以不受惩罚地凌辱小国家，更不用说这样对待最大的国家——苏联了。我当时内心的愤怒象电流一样随时可以放出强烈的火花。

会议开始的时候到了。我们要有自己的会议记录，因此我们通知部长会议的速记员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作好准备。她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女人。我一向对她很器重。我每次发言总是由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或她在中央委员会的同事尼娜·伊凡诺夫娜速记下来的。由于我大部分时间在部长会议工作，所以主要由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为我做记录。会议即将开始时，负责会议组织工作的法国人告诉我们说，已决定所有速记员都不得出席会议。我们听了大吃一惊。我对马利诺夫斯基说，应该把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提升为代表团成员，身分为秘书。这样做多少有些取巧，因为速记员大都是妇女而秘书通常都是男的，但是也并没有妇女不能担任秘书的规定。

当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娜杰日达·彼得罗夫娜时，我笑着说，“好啦，你被提升了，你已有了外交身分。”她报以一个短促的微笑，接着又恢复了她平常的严肃的样子。

她是一位沉默寡言和朴实的女人；不大喜欢开玩笑。但她是一个好看的有着浅黑头发的女人，深色皮肤，黑眼睛。对她比较熟悉的人告诉我说，她是一个吉卜赛混血儿。母亲是乌克兰人，父亲是吉卜赛人，她继承了父亲的漂亮的外表。她好象卡门一样穿一件黑色衣服，看起来象一个皇后。我们把她从一个速记员提升为代表团成员之后开玩笑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夸耀自己有这样一位代表。

我们的译员苏霍德列夫同志也是极出色的。人们常说："赫鲁晓夫的译员非常精通英语。"我对他非常尊重，对他的印象很好。他的名字是地地道道乌克兰的，但他没有丝毫乌克兰口音，讲起话来象一个典型的俄国人。我们的英语专家和外国记者常常对我说，苏霍德列夫同志是一位优秀的译员。我想，他现在仍在担任这项工作。①

我们走进会议厅去开会。其他的代表团也相继到来。首先进来的是英国人。我和麦克米伦握了手。正在这个时候，美国代表团走进来并直接走到他们的座位上去。我们同他们打了个招呼，但是很随便，好象只是表示一下知道他们在场了。我们似乎是在说："啊，我们见到你们了。"他们从桌子的另一边，作了回答，似乎是在说：

① 苏霍德列夫在勃列日涅夫1973年6月访问美国期间仍担任他的正式译员。

“我们也见到了你们，但我们不准备和你们握手，因为我们之间还存在着冲突——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心理战争。总之，我们相互并无尊重之感。”

会议正式开始前，我们要求东道国首脑戴高乐允许我们作一个声明。我们想看看美国总统有什么反应。戴高乐已经知道我们声明的内容。他让我发言，我就开始读发言稿。在这样的场合我知道我不能信口开河。每一个字都必须确切，每一句话的结构都应当十分严整无误，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代表团都有助手兼做速记员，会把发言用速记记录下来。因此我们的声明应当是用词恰当的，不致引起任何可能被我们的对手利用的误解。

我要求艾森豪威尔总统道歉并保证今后不再让美国侦察机飞越苏联领土。我的译员苏霍德列夫同志告诉我，当他把我的声明翻译成英语时，他注意到艾森豪威尔转向他的国务卿赫脱说：“是呀，为什么不呢？我们为什么不发表一个表示道歉的声明呢？”赫脱说不行。他说话时皱着眉头，表明他不容许有讨论的余地。结果，艾森豪威尔拒绝道歉。这样，艾森豪威尔又一次证明他是受到自己国务卿的强烈影响。在上一次的日内瓦四国首脑会议上，艾森豪威尔就是完全看已故的杜勒斯的脸色行事。现在他又是在遵从赫脱的指令。依我看，这件事表明，如果艾森豪威尔按照他自己善良的本性行事和运用自己巨大的智慧，他就会做正确的事并向我们的要求让步。他

知道向我们道歉并作出保证对他来说是可以做得到的。但是，不幸艾森豪威尔不是决定美国对外政策的人。他被自己的国务卿们，首先是杜勒斯，然后是赫脱牵着鼻子走。①

我念完声明并坐了下来。坦白地说，我感到很激动，斗志昂扬，心情振奋。正象和我一样单纯的人会说的那样，我卷起袖口想要打架。我的声明引起了很大的骚动，特别是警告如果不能得到美方满意的答复，我们就要收回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这一段。接着，出现了长时间的尴尬局面，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办。我记得是艾森豪威尔首先作出了表示：他站了起来，他的整个代表团也跟着站了起来。于是我们大家都离开了会场。我们放了一炮，把四个代表团都赶回各自的房间去了。原来是要使我们团

① 赫鲁晓夫去巴黎之前，曾在莫斯科对外国记者愤怒谴责国务卿赫脱为 U-2 飞机事件辩护。他说："早先我们以为总统对这些飞行是不知情的，现在赫脱先生的声明使我们对自己早先这种想法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同一天，艾森豪威尔在华盛顿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承认，他相信高空间谍飞行是"不愉快的，"然而是"极端必要的"。三天后，即 5 月 14 日，赫鲁晓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到达巴黎。赫鲁晓夫在四国首脑会议第一个发言。他要求艾森豪威尔放弃间谍飞行并处分与 U-2 事件有关的人员。他还建议最高级会议推迟六到八个月，等美国大选后再举行。艾森豪威尔回答说，"在最近的事件发生后这种飞行已经停止，以后也不再恢复。"

结在一起的会议就这样烟消云散了。

后来戴高乐通过他的外交部长告诉我们，会议要在美、英、法三国代表团讨论我们的声明和决定他们的态度之后再行复会。这是意料之中的。艾森豪威尔首先要同他自己的人商量，之后再同法、英盟国讨论，以便制定总的路线。我们并不希望或预料戴高乐会公开声明赞同我们，但我们觉得我们的立场一定会引起他的共鸣。由于他始终不渝地捍卫法国和法国人民的荣誉，因此我们估计他对我们保卫自己荣誉的行动是同情的，至少在暗地里是如此。至于美国人，我们知道他们不可能咽下我们硬要他们吞下的那一粒苦药。他们不可能公开承认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意味着四大国会议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告吹。虽然如此，我们仍要等待美、英、法三个代表团会议的结果。

在等待的时候，我们有一天原来没有预料到的空闲时间。我们干些什么呢？到哪里去呢？当然可以在巴黎市内观光，但马利诺夫斯基有一个更好的主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作为一名机枪手，跟随俄国远征军的一支部队到过法国。在巴黎保卫战时，他的部队驻扎在一个小村子里。所以他提议，“让我们去看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们部队所驻的地方。我们住在一个老农民的家里，他现在可能已经去世，但他的老婆当时年纪还轻，现在可能还活着。”

我说："好啊，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可是你熟悉路吗？可以不要向导就能找到那个地方吗？"

"可以。我熟悉，而且到那里还会碰到一些我认识的人。"

我非常想去。不仅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和我个人有兴趣，而且也可能有些政治上的好处。他是一个曾经住在法国并为保卫巴黎反抗德国人而流过血的俄国士兵。德国问题是我们现在来巴黎要讨论的问题之一。因此我感到我们的国防部长，苏联的一位元帅，回到四十年前他同德国人打过仗的法国村庄去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希望，这一姿态将会唤起法国人民对我们要求消灭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侵略后果的立场的同情。

只有我和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两人带着保卫人员一同到村上去。其他的人没有必要前往。葛罗米柯留在巴黎以便处理可能发生的问题。我们正在等待莫斯科的电报，同时我们要与其他国家代表团保持联系，以便他们要求我们澄清我们的立场时可以作答。

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和我乘车从巴黎出发，沿着两旁菩提树成荫的美丽的法国乡村道路前进。那是一个阳光灿烂、气候暖和的天气，但显然不久前有过一场暴风雨，因为路上有一处被吹倒的菩提树挡住了路。正好来了带有锯子和斧头清除倒在路上树木的修理队。我从一位工人的手中拿了一柄斧头，猛力砍树，弄得树片横飞。

聚集在四周的法国人一面指点，一面笑起来了：这位俄国总理挥舞斧头来真象一个伐木工人！事实上我从来没有当过伐木工人，但我从还是孩子的时候起就经常干重体力劳动，先是在矿里，后来在工厂。摄影师们把整个场面都拍成了电影。我知道，让人们看到我们的政府是由工人组成的，同时政府的首脑虽然年事已高仍然能用双手干重活，这不会给我国代表团的形象造成任何损害。我们把树砍成两段，把它们拖到路旁，然后坐进车子继续前进。

马利诺夫斯基的确是一位出色的向导。他把我们直接带到村子里。①我们走到他几十年前和另外一个士兵一起住过的屋子。我们从汽车里出来的时候，屋里的主人马上出来迎接我们。他的年龄大约四十到四十五岁。我们作了自我介绍，马利诺夫斯基说，“我们是来向你和你的母亲问候的，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一定记得我。我同另外一个朋友曾住在你们房子后面的木棚里。”

他热情地接待我们，请我们到他的屋子里去。他的母亲，马利诺夫斯基从前的房东太太，走出来同我握手。罗吉昂·雅科夫列维奇问她的丈夫是否还活着。她说，“不，我的老头子很早就去世了。你看，现在我的儿子已长大成人并且他也已经有了孩子。”

马利诺夫斯基对我说，她的丈夫比她大得多。她当

① 普勒絮马勒离巴黎七十英里。关于这次访问的简要记述亦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00、202页。

时年轻美丽。和马利诺夫斯基一起住在木棚里的那个同志曾经追求过她，她也爱他。马利诺夫斯基自己从这一恋爱事件中也得到一些好处，因为她经常送给他牛奶、酸奶油以及各种好吃的法国菜。很难想象这个女人就是当年那个活泼可爱的年轻姑娘。现在她满面皱纹，象个母夜叉一样。看来她好象饱受了人世间的辛酸。

房子的主人，她的儿子，急急忙忙地不知从哪儿赶回来并带了几瓶酒。他拿出一些奶酪，这是法国通常用来下酒的。但他们心地的善良和招待我们时的热情却是更为重要的。

我们一起坐下来喝酒。那个老太太也参加了。马利诺夫斯基开始讲从前他住在这里时的往事。后来我感到那位老太太不喜欢旧事重提，她脸上的表情很冷淡。

过了一会儿我们走到街上，那里围着不少的村里人。我不懂为什么他们大部分都是中年人和年纪大的人，没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村庄毕竟是村庄，总应该有些小孩子，但我们却一个也没看到。可能是青年人对我们不感兴趣，但是我怀疑是否真是这样。马利诺夫斯基看到一个从前认识的、年龄同我们相仿的人，就用法国话问他，“喂！这里附近的一家小酒馆还在吗？你还常到那里去吗？”

那个农民笑着说，“不错，那个小酒馆还在。你倒还记得么？”

“当然，我记得很清楚。”

“那么，你可能还记得在那里工作的漂亮姑娘，她常常给我们送酒。”

马利诺夫斯基笑着说，“不错，我当然记得。”

他们都大笑起来，“啊，他还记着！她是村上的美女！但她现在已经不在这里了。据我们所知，她可能已经去世了。”

马利诺夫斯基说，“啊，是这样，她当时的确太美妙了。”

显然，那个姑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她还活着的话，她已经不年青而且也不漂亮了。岁月是不饶人的。我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利诺夫斯基经常讲起这个非常漂亮的姑娘的轶事。这家小酒馆的主人雇用她当女招待，以便吸引士兵和小伙子们来买酒。但是在这个姑娘和士兵之间没有发生过什么胡闹的事。当然，在这种情况下，种种轻薄的事情都可能发生。但马利诺夫斯基没有告诉我这类事。我想村里的人只不过是喜欢看看她的美貌。她给马利诺夫斯基的印象在以后多年中都没有磨灭。你还想再要什么呢？如果这个女人曾容许她自己做过某些事情，那我肯定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前士兵和元帅不会不同我分享这种回忆的愉快。他是一个欢喜女人、特别是漂亮女人的人。他自己常常这样对我说，尤其是当他回想起在西班牙与佛朗哥作斗争的经历

时。他说："在我的一生中我爱过一些漂亮的姑娘"。

不久，其他法国人开始到来。消息在村民中间很快传开了：来访者是苏联国防部长，他曾经是四十多年前驻扎在这个村庄里的俄国部队的士兵。

"我们当然记得你！"他们全都说。"你在你们部队里养着一头俄国熊，是不是？"马利诺夫斯基笑了，并向我解释说，他和他的同志们在赴法国途中捉住一头小熊并一直带着它。

那天傍晚，当我们从那个村庄驱车回巴黎时，葛罗米柯同志正等着告诉我们一个消息：四大国会议取消了。我认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作出的决定，其它两个代表团——英国和法国代表团——并没有做任何事情迫使他对我们让步①。

取消会议的决定作出后，麦克米伦来看我。在交谈中他对引起我们和美国人冲突的 U—2 飞机事件抱中立态度。作为一个明理的人他显然并不想为美国的立场辩护，但是他也不能照实说他的盟国的坏话。他只是说我们的要求太过分了，我们应该更灵活一些，我们取消对艾森豪威尔的邀请是犯了一个错误。我从他面部的表情可

---

① 5月19日，流产的最高级会议后三天，赫鲁晓夫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大发脾气，明确表示他对艾森豪威尔的声明不满，并宣称戴高乐和麦克米伦的调解努力已失败。

以看出，麦克米伦基本上理解我们的立场，不过他出于礼仪而讲这些话是为了要表明他和美国间通常的团结。当他说下面这番话时他也承认这一点："赫鲁晓夫先生，英国在国际政治问题上不再可能采取一种独立的立场了。大不列颠向来是海洋的统治者，它能够决定有关欧洲和整个世界的政策。但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是美国和你们苏联。因此现在许多事情取决于你们。"我听了感到高兴和自豪。他完全正确。我们真挚地互相告别。这是我同他最后一次晤面。

后来我访问了戴高乐将军。尽管我发觉戴高乐对会议的垮台比麦克米伦要失望得多，可是他采取有点类似麦克米伦的立场。这可能是由于他原来抱有更大的希望和期待。我并不能肯定。我只是根据观察他们面部表情所得到的印象而下这个判断的。我向戴高乐总统道别后回到我们所住的大使馆。

此后，多列士同志及其夫人来看望我们。与麦克米伦和戴高乐不同，他微笑着并且表示完全赞成我们对局势的处理。我们兄弟般地交换了意见。他唯一担心的是法国人民不可能正确地理解所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预料西方会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到我们身上。某个政治上幼稚的人，一个外行，可能难以理解为什么会议开不成。我问多列士同志他认为会发生什么事情。

"帝国主义者当然会要利用你的声明，"他说，"但是

我们的党和公众会站在你们一边，因为你们的立场是以国与国之间相互尊重的原则为依据的。”

其后不久，我被告知从第戎市来的基尔教士想要同我会一面。在我以前正式访问法国时，我曾经路过第戎，但当时他没有能来看我。现在这位牧师到巴黎来看我了；在我们大使馆的院子里我们一面喝咖啡一面进行了一次很有意思和投机的谈话。他告诉我，当我作为戴高乐总统的客人在法国逗留时他因未能来看我而感到很抱歉，他表示完全赞同我们关于U—2飞机事件所采取的立场。当基尔教士离开时，我问他，“你乘什么车子来的？”他回答道，当然他没有自备汽车。我建议他乘我的汽车；我的司机会送他到他想要去的任何地方。他感激地接受了我的提议。这使我高兴，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处于紧张时刻。法国电台已经吵吵闹闹地在法国公众中间煽动对苏联及其政策的敌对情绪。资产阶级报纸正在对我个人进行种种辱骂，把会议的失败归罪于我。基尔教士的访问对我，对我们的大使馆以及对我们的政策都正好是时候。虽然他是一个具有左倾信念的人，但总不能算做一个共产党人。无论如何，他同意使用我的汽车表明他的头脑非常冷静。

形势已经达到这种地步，对我来说再停留下去就不适宜了。资产阶级宣传机器开足马力使每个人都反对苏联。我们驱车去机场。我记得我们乘一辆敞篷汽车。我

特地要求乘这样的车子。靠路边的一些人友好地向我挥手致意，而另一些人则对我挥舞拳头。这并没有什么奇怪，也没有什么不自然。对我挥舞拳头的不单单是资产阶级分子——也可能是一些普通的人们，或追随社会民主党和不理解我们政策的工人。①

从那时以来虽然过去了许多年，我仍然确信我们对这件事的处理是正确的。此外我感到骄傲的是，我们给予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以严厉而完全正当的反击，当美国人侵犯我们主权时我们就使他们安分下来。有一句俄国谚语说：你的一只脚一旦踩进泥沼，整个身体就会陷进去。换句话说，如果我们不是勇敢地抵抗美国人，他们就会继续派遣间谍到我们的国家来。艾森豪威尔说美国人有权飞越任何“封闭的”社会的领土。好吧，如果“封闭社会”是一种控制它的边界的社会，那末也许我们就是这样的社会。我们打算殷勤接待我们邀请的任何客人——但是任何不速之客将会得到他们应得的下场。苏联还是一个新兴国家，一个由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可是我们已经在世界上取得了应有的地位。尽管有美国的侵略行动，我们仍然决定继续执行我们的总路线，而这条总路线是以最初由列宁制订的和平共处政策为依据的。

---

① 在全部回忆录中，赫鲁晓夫都把西方社会主义者和其他“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的党员叫做社会民主党人。

第十九章　联合国

之后，在1960年，领导核心要决定派谁去参加这一年秋天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大会。①通常是由外交部长率领政府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但那一年，因为联合国要处理一些重要问题，我们决定作为一个例外而由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我率领这个代表团。我们希望引起全世界注意那些仍然生活在殖民压迫下人民的解放事业。我建议我们应当到联合国去提出一项议案，要所有殖民主义国家为它们殖民地的独立确定日期。我们认为这个计划会成为争取和平斗争的里程碑，因此我们要事先审慎地拟订我们的提案，同时又不给我们的对手准备他们的反提案的机会。我们要确保在外交部和其他政府机构在拟订计划的细节时，我们的意图不致泄露给报纸。

由于突然宣布苏联代表团要由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率领，我们就在U—2飞机事件所点燃的火上加了油。除了少数报纸主张按常理对待这件事外，从整体来看，控制美国报纸的反苏分子反应强烈，并开始用尽气力咒骂

---

① 指1960年9月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

苏联的政策。

当宣布我将率领我国代表团去纽约时，欧洲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决定派遣由部长会议主席或党中央委员会书记率领的代表团。接着，许多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决定派遣它们的政府首脑：印度的尼赫鲁，南斯拉夫的铁托，英国的麦克米伦。

到我们预定要启程去纽约时，我们的图—114飞机出了毛病，这是能够中途不停把我们从莫斯科载往纽约的唯一飞机。我们可以有两种选择：乘别的飞机途经伦敦去纽约或者乘船去纽约。（我记得莫洛托夫常常是乘飞机到伦敦再乘开往纽约的英国船到美国去。）最后我们决定乘我们苏联自己的轮船进行这次旅行。这是一条小的但却是舒适的客船。我记得这条客船是战前在荷兰制造的。①

我们邀请其他华沙条约政府代表参加我们的航行。航程要费时十天。我会有充裕的时间准备我将在联大发表的讲话，同时我们还有机会同我们的盟国举行会谈和讨论问题，这样我们就可以保证对列入联大议程的各种

---

① “波罗的海号”确是荷兰造的。它1940年建造于阿姆斯特丹并由德国人使用，后来被俄国人取得并交给苏联舰队。在1957年莫洛托夫这位顽固的克里姆林宫老手同赫鲁晓夫发生正面冲突而丧失权力之前，该船一直被命名为“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号”。

问题采取一致的立场。

我们海军部门的专家劝告我们说，最好的路线是从加里宁格勒横渡波罗的海。当所有的代表团都到了船上时，我们便向前来送行的朋友们告别。我们的船鸣笛出发时，虽然已近黄昏，但天色还亮，因此当我们驶向海洋时我们仍然能够看到我们祖国的海岸。

这时我们开始担心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是否会对我们的船采取某种牵制攻击行动。这里肯定有很多机会。大西洋是一个巨大的空间，有充足的余地击沉一条船而不让任何人知道。在所有的目击者都死去后，北约组织总是能够说这条船是被二次世界大战留下的水雷偶然击中的。过去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例，因此我们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对付的办法并不多。我们的海军建议由两艘扫雷艇护送，一前一后；可是扫雷艇只能陪同我们通过英吉利海峡。只要我们一离开法国和英国水域，扫雷艇就得返航。所以海运部长布置当时所有航行在北大西洋的苏联船只都注视着我们，并且在发生麻烦的时候前来援救。

第二天，波罗的海天气变得不好起来，浓雾弥漫，我们听见我们周围四处浮标和汽笛的声音。实际上什么也看不见，船长不得不从一个浮标驶到另一个浮标，好象进行接力赛跑一样。后来雾消散了，我们才看得见丹麦的海岸。载着新闻记者的飞机和直升飞机开始从海岸起

飞，朝我们的船俯冲下来并作危险的低空飞行，以便拍摄照片。飞机在我们头上盘旋，几乎碰到了桅杆。我们一定是在西方记者中引起了轰动。我估计他们是应读者的要求而来拍摄我们航行去纽约的照片。我们经常从船上的无线电收听有关我们自己的新闻报道，由我们的译员翻译给我们听。

当我们穿过海峡进入辽阔的海洋时，我就被一种新鲜而罕有的感觉所压倒。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处在一望无际的水上。一个人禁不住要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它令人非常愉快。

过了一会儿，船有些摇摆颠簸并开始影响我们。对我来说，它只是在我走路时引起轻微的不稳定。然而对别人却要严重很多了。我们衡量这种影响的标准是到不到餐桌边来。当吃饭时间来临时，我们常常得到通知说某某同志不能来和我们一道进餐了，因此不要等他。情况变得这样糟糕，以致我们当中只有少数人来吃饭。特别容易晕船的一位同志是弗拉基米尔·格里戈里耶维奇博士。我认识他多年并对他作为一个男子汉和医生极其尊敬，可是每当海水开始汹涌起来时他往往是头一个奔向自己的床铺。至于我们的保卫人员，他们自己反要别人保卫以免摔倒在地，他们晕船晕得几乎站不起来了。

我自己的体质证明是很强健的，我并没有向晕船屈服。我很快地适应了海船的颠簸并且睡眠很正常。事实

上，波浪汹涌时我睡得更香。其他大多数人——即那些还能走路的人——走动时神色异样而且脸上有一种阴郁的表情，而我却轻快地在空气新鲜的甲板上散步。我从来没有错过一顿饭。有时餐桌旁只有我同另外一个人，他是别的兄弟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成员。我们同那些晕船的同志开玩笑。（我并不认为晕船的乘客会很欣赏这些笑话。）那些按老的航海传统行事的人要求吃饭时有一杯伏特加，但由于就餐人数越来越少，伏特加的需要量也不多了。

每当天气好转太阳出来时，我们总是玩各种船上游戏以消磨时间。我记得一种游戏是用一根棒把一只大橡皮圆盘推过甲板使它落到一个分成若干方框框的格子里，每个框框写着不同号码，表示不同的分数。我们对这种游戏玩不厌。那些没有参加玩这种游戏的人聚集在周围喝采声援和做出象在其他比赛中球迷种种动作。我也参加了这项游戏，虽然我以前从没有听说过或看到过。

我们也还有一些比较正经的消遣。我们阅读大量材料并举行会议为参加联大作准备，我们定期获得有关世界各地区发展着的政治形势的消息。我记得我们特别密切注意当时正在刚果进行着的殖民主义者和争取独立的革命力量之间的斗争。那是一个局势非常紧张的时期，不仅在非洲是如此，而且对苏美关系来说也是如此。前

不久，巴黎最高级会议由于美国派遣一架U—2型侦察机入侵我国领土而失败。

在海上的一天，突然间我获悉在海面上发现一艘潜艇。它距离我们的船这样近，以致我凭望远镜就能清楚地看见。这艘潜艇很大，它的周围波浪滚滚。它没有挂旗，但无疑是美国潜艇。我们在这里干我们自己的事情，为什么这艘潜艇却要浮上水面来陪伴我们呢？这肯定是一种军事示威，一种不友好的炫耀武力的行为。我认为美国人要往我们脸上泼冷水。这艘潜艇跟踪了我们一会儿；然后，在我们看清它之后又沉了下去。事情就是这样，但目的已经达到了。

当我们接近纽约时，我们经常被告知美国报纸在讲些什么以及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样的欢迎。如我们的人所说的，美国人力图使一群嚎叫的雄猫给我们唱小夜曲。例如，我们得知，反动力量打算当我们的船一进入纽约港就向我们示威。果然，我们刚看见纽约的摩天楼和进入哈得逊河口就发现一条满载示威者的船向我们驶来。①他们全都穿着古怪的服装，朝我们挥动着标语牌，举起象稻草人一类的东西，并且通过扩音器对我们喊口号。我

① 这些示威者是国际码头工人工会的会员（赫鲁晓夫前一年在旧金山曾觉得该工会主席哈利·布里奇斯非常好客）。当“波罗的海号”进入纽约港并接近码头时，抗议者租了船来监视它。

们的人翻译了这些口号。示威者谩骂我们，贬低我们的国家及其代表。我们全都走到甲板上来，指着他们笑。就我们而言，示威是美国侵略势力上演的一场化装丑剧。在我们的船和他们的船之间是警察汽艇，以保证示威者能进入我们听得见的距离之内，而又不致挡住我们这条船的航路。

当我们到达泊位时，这个码头的状况使我极为愤怒。码头的状况令人不寒而栗，——简直是一塌糊涂，有碍观瞻。我深信某些美国人让我们停靠如此破烂的码头来作弄俄国人。但是我没有去寻找替罪羊。我只能责怪自己。在准备这次旅行时，我们的驻美大使缅希科夫同志曾告诫我们，如果要为我们的船租用一个好码头，那就得花许多钱。在美国一切事情都是用美元来计算的。因此我说，“为什么我们要把钱浪费在租码头上呢？我们的船停泊在哪里有什么关系呢？告诉我们的大使租最便宜的地方好了！”那么，好啦，我们就租到了最便宜的地方。

一上岸我们发现欢迎我们的人们只是我们自己的外交人员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同志，还有许多记者。没有示威者。警察不许任何人接近我们。我们被急急忙忙送往我们在纽约的驻地。那是我国驻联合国外交使团的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我在纽约停留期间，它将是苏联首脑的驻地。

我们抵达纽约后不久，我得知一桩我国海员称之为

“非常事件”：我们的一个海员离船逃跑了。他走到一个警察局去要求避难。告诉我这个消息的人非常激动。我试图让他们安静下来，我说，“不要把这件事看得那样重要。他既然离开了，就让他尝尝资本主义的面包吧。不要过多久他就会知道，在纽约面包的价钱是多少以及它的味道如何。”

记者老是跟着我，我知道，我应准备好对海员离船逃跑事件作出解释。不出所料，一开始就有一个记者问我，“赫鲁晓夫先生，关于那个要求在美国避难的海员你有什么想法？”

“我知道这件事，”我答道，“我很遗憾。我替这个年轻人难过。他缺乏经验，没有专门技能。我想他难以适应美国的情况。他的行为愚蠢而鲁莽。只要他事先告诉我他想呆在美国，我会乐于帮助他的。现在，他会尝到这是什么样的味道。”

紧张气氛立刻消失。记者们原来期待我会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他们认为我会谴责那个海员或者把他痛骂一顿。可是我愚弄了他们：我表示遗憾而不是愤慨。结果，记者没有能从这件事中捞到什么东西，欢喜制造耸人听闻新闻的资产阶级报纸无法对它大肆宣扬。

当时美国报纸充斥着应该怎样对待赫鲁晓夫，应该组织什么样的示威，以及应该对我们施加什么限制之类的东西。例如，有一道命令，大意是说苏联代表团不能离

开纽约联合国所在的地区。①我不知道这项命令是由美国联邦政府还是洛克菲勒州长发布的，但是我们并没有让它干扰我们。相反，我们认为所有这些限制都揭露了美国的真面目。我们到纽约来决心证明美帝国主义并不是全能的，尽管针对我们煽动起反苏的叫嚣，我们懂得自己应享有的权利。

我应该说，在我看来把纽约作为联合国的总部首先就是一个错误。坦率地说，这是我们自己的错误。在作出联合国设置在哪里的决定时，斯大林拥有关键性的表决权。选择是在美英之间——即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作出。而斯大林是能够使天平朝有利于这一方或那一方倾斜的第三者。其实我并不想指责斯大林作出了有利于罗斯福的决定。那时刚刚在战后，斯大林认为美国比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更高度的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我是同意他的看法的。此外，美国和英国不一样，它没有任何海外殖民地。还有，战后有一种看法，认为美国不大可能干涉欧洲大陆的事务。总起来看，在那时纽约似乎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历史却按着不同的方向前进。美国现在执行着国际宪兵的政策，因此它起的作用确是同联合国不相容的。我目前认为，如果联合国设在一个象英国那样古老

① 美国政府禁止赫鲁晓夫离开曼哈顿岛以“保证他的安全”。缅希科夫大使提出抗议说，这种限制是一个“不友好的行动”。

的资本主义国家会更好一些。在热烈辩论德国问题时，我们曾建议把联合国总部迁移到西柏林去。但我们的伙伴不肯承认我们建议的正确性，而且我不相信他们会让步。谁知道人们承认必须把联合国总部搬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国家去的时刻会不会到来。现在大多数非洲国家正从殖民压迫下解放出来，把联合国搬到另外一个更合适的地方去就特别重要。非洲国家的代表来到这个国家感到特别愤慨。在这里，黑人甚至不被当做人看待，存在着种族歧视，黑人不准进餐厅或旅馆，有许多写着“只限白人”的招牌，黑人受压的唯一原因是他们的黑皮肤——这确是不能使人接受的。有时驻联合国的非洲代表们就受到这种侮辱。

我们自己在纽约的外交人员生活得并不太坏。我记得安排给我住的地方也是完全令人满意的，虽然算不上奢侈。我们的住处是在纽约的中心，正好处于该城市人口稠密地区之内。无论你朝什么地方看，能见到的全都是建筑物的玻璃、混凝土、屋顶和巨大的石板，这些建筑物这样高以致只能看见小块小块的天空。这个巨大城市的庄严气派并没有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毕竟我在上次访问美国时已到过这里。

虽然我没有被城市的景色特别打动，可是嘈杂声却使我感到惊骇和不快。纽约有大量的汽车，发出极其吵闹的声音，汽油的气味令人感到窒息。除此之外，我还不

得不忍受摩托车刺激神经的不停的吼声。这些摩托车是保护我的警察使用的。他们通宵轮流值勤。你简直不能想象他们发出的声音多么喧嚣。几个小时后，停在外边的摩托车又要开动了，由于机器冷却必须重新发动起来。开头的声音象人拍手，然后象开枪，最后象炮弹爆炸——而这一切都恰好正在我的窗子下面。我简直不能入睡。不管我多么疲倦，我只好清醒地躺着，不是听见一班警察离去就是等待另一班警察到达。

对于这种事态，我又要归咎于U—2飞机事件。自从巴黎最高级会谈破裂以来，美国报纸一再煽动对我们国家和领导人的敌意。我们迫使艾森豪威尔总统在格雷·鲍尔斯问题上改口并收回了他自己所说过的话，这等于打了美国人的耳光，他们对此是不甘心的。尽管在世界其他地方有头脑的人都在谴责美国，但在纽约围绕我们代表团和我个人的气氛却是紧张的。你可以想象这种紧张局势给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废物创造了什么样的机会。这是他们能够尽可能傲慢地大声讲话的好时机。结果美国政府被迫采取保护措施以免我们受到袭击。这就是那些警察骑着咆哮的摩托车整天在我的窗外来回跑的原因。

骑摩托车的警察并不是我唯一的经常伴侣，还有那些在我住的大楼经常守夜的记者。几十个记者常常终夜呆在那里。有些人有普通的摄影机，另一些人有电影摄

影机，我每走一步他们都记录下来。但在我所描述的那种环境下，我很难出去多走动。事实上，我不可能出去散步。因此我呼吸新鲜空气——如果纽约的空气可以称之为新鲜的话——的唯一办法是走到我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去。我一天有好几次走出去看看下面街道上喧闹的情景。

有一天，我接到一位被指定报道我在纽约活动情况的记者写给我的便函。便函的大致内容如下："赫鲁晓夫先生，你经常走到阳台上去。作为一个记者，我欢迎你这样做，因为这给我一个可以看见你，甚至和你谈话的机会。但是为你着想，我要警告你这样做包含的危险。也许你不知道纽约的特点。在这个城市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谁知道有什么阴谋暗害你的计划。有人可以从路过的汽车上或者从街道对面房子窗口朝你开枪。作为一个希望你安全无恙的人来说，我要求你不要走到阳台上去，使你暴露在可能是非常现实的危险之下。"

读了这封便函后，我甚至比以前更多地走到阳台上去。没有发生不幸的事情。可是我必须说，我为这位记者的人道主义精神所感动。我已记不得他是一家无产阶级报纸还是一家资产阶级报纸的记者了。那是另一个问题。他对待我就象人对待人那样。

我们在纽约住定下来之后不久，联大开始举行会议。我上次旅美时曾访问过联合国，因此对将要发生的事情心中有点数。议程的第一项是选举会议主席。我们的候

选人是波兰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而西方的候选人则来自爱尔兰。①我们知道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候选人没有多大当选的希望，因为美国可能并且会否决他，不过我们有道义上的权利来提出我们自己的候选人。表决结果是爱尔兰人获得绝对多数票。后来知道他是一位能干而客观的行政官员。我们对他个人并无什么反感。事实上，爱尔兰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同英国人作斗争时我们总是同情他们的。安得烈·安得烈耶维奇〔葛罗米柯〕鼓励我结识这位联大的新主席并和他交换意见。我记得他是爱尔兰知识分子的代表，大学教授一类人物。他给我的印象很好。

议程和各委员会及小组委员会的组成是通过正式辩论和表决来决定的。在每个机构里，为社会主义国家、西方国家以及最近从殖民主义统治取得独立的新兴国家的席位都是排好了的。这一切对我都很新鲜。我是一个革命前出生的上了年纪的人。我还能记得我年轻时从报上看到有关罗坚科年代国家杜马的文章。②但是我实际上从来没有参加过政府或地方议会机构。所以，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访问联合国是我第一次出席代表不同阶级和

---

① 苏联集团提出的联大主席候选人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杰利·诺什克，他被爱尔兰的弗里德立克·H·布兰德击败。

② 罗坚科是革命前的杜马即沙皇国会的领袖。

不同政治制度的议会。

有时情绪达到了沸点。一个代表团会感到必须表示它对其他代表团发言者的不快。我们代表团维护民主原则并支持那些对社会主义国家和所谓不结盟国家有利的提案，特别是经济方面的提案。发言时大家都非常激动，而西方代表们又往往使用资产阶级政治的手法来表示他们对某些发言的不满。他们起哄，敲打桌子，大声叫嚷。我们开始以同样的方式回敬。毕竟这是我头一次参加这样的会议。我们也能够起哄，我们也会掀起一场吵闹，接连不停地蹬脚，等等。

作为代表团的团长，我经常要就某些问题对别的代表的发言作出答复。各种有趣的情况发生了。我记得有一次菲律宾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他年纪多大很难说。他是黄种人，对我们欧洲人来说难以估计出这样的人的年龄。（当我碰到中国人时也总是产生这个问题。）不管怎样，这位菲律宾人是在发言支持美国执行的政策。他扮演了一个向美国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拍马的角色。我对他激动地大声讲话，我用了在我国人民中间极为流行的一句话："你还是当心为妙，否则我们要你去见库兹金的母亲。"①当我说到"我们"时，我是从社会主义国家立场

① 这句俗语的意思是："给你一个厉害看看"。菲律宾代表弗兰西斯科·A·德尔加多在他的亲美讲话中提到苏联镇压匈牙利暴动和强迫并吞波罗的海沿岸各国。

出发讲话的。我并不是从军事意义上威胁他，而是从经济意义上警告他。我指的是我们社会和政治制度下的生活方式所享有的文化发展和其他优越性。可是这位菲律宾人显然对我的讲话感到吃惊。当他再次发言时，他说，"赫鲁晓夫先生说了一些关于'库兹金的母亲'的话，而我们的译员从任何辞典上都找不到它。"

我们代表团大声笑了起来。我们碰到有些人不理解一句简单的俄国话，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常常遇见一些美国人问我库兹金的母亲究竟是什么意思。后来当我在休息时间呆在休息室里时，这位菲律宾人走到我面前向我伸出了他的手。他对他的讲话表示有些歉意，并说他对苏联没有任何恶意。

在西班牙问题上一个更为严重的冲突发生了。当大会开幕指定席位时，我们运气不好，恰恰安排在西班牙代表团的后面。团长是上了年纪的人，在他的头顶上有很大一块是秃的。①他的脸瘦削而有皱纹，鼻子很长。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如果我们和西班牙的关系正常，我甚至要说他是一个可尊敬的人。可是我们的关系不正常。我们只能对西班牙代表团及其领导人表示厌恶。在离开莫斯科来纽约前，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请我帮一下忙。她要求我寻找一个机会让佛朗哥政权丢丢脸。自从到纽

---

① 西班牙外交部长费尔南多·玛丽亚·卡斯铁利亚。

约以来，我就在考虑如何做到这一点而同时又不失礼。当然，某种适度的粗野是不可避免的，但我希望按照议会程序行事。

而现在我发觉自己正好坐在这位西班牙代表的后面。在我的想象中，我正在用我的鼻子啄他的秃顶，而我似乎看到我的朋友多洛雷斯·伊巴露丽脸上笑逐颜开。在辩论进行的过程中，我突然遇到一个攻击西班牙的机会。当讨论到殖民主义问题时，我要求发言。我谴责佛朗哥的"反动的、残暴的政权"，并且使用了共产党人和别的反抗佛朗哥之流独裁政权的人们所熟悉的语言。这样一来我就完成了多洛雷斯·伊巴露丽同志交给我的任务。

可是，西班牙代表又要求答辩。这时，我们自己的代表团，包括我本人在内——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开始大声叫喊地吵起来。事实上，我甚至脱下皮鞋来敲桌子。不必说，这个行动在记者、摄影记者及其他人当中引起很大反应。每当我们同朋友们碰头时总是以此说笑话，尽管有人似乎并不理解这种不合议会规则的做法。例如，尼赫鲁就说我不应当使用这种方法。这是尼赫鲁的特点，我很了解他。尼赫鲁是一个中立主义者。他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处于一种调解人的地位。他想要起桥梁作用并维护世界的和平共处。

当这位西班牙人回到座位上时，我们互相讲了一些粗话。虽然彼此言语不通，但从我们讲话的姿势和脸部

表情中可以很清楚地知道彼此说了些什么。忽然间，一名警察向我们走来。他不是美国警察，而是属于联合国秘书长管辖的警察。一个彪形大汉，可能是美国人，他走到我们跟前，象一座塑像站到这位西班牙人和我中间。很清楚，一旦动拳头打起来的话他就会拉开。实际上曾发生过这样的情形，代表们相互攻击并开始用拳头打起来。

我们和美国代表团的关系至少说是疏远的。事实上，我们和美国代表们没有正式的接触。我只记得在他们中间有不少黑人。有一个人特别突出，她是身材高大、讨人欢喜的黑人妇女。把这些黑人包括在内是企图表明在美国所有肤色的人都享有同等权利。

我们没有直接接触的另一个代表团是中国人。当我说“中国人”时，我指的是来自台湾的代表。当然我们是全心全意地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忠诚的，因此用不着说，台湾人在联大发言时我们总是用一切方法表示我们对他们的轻蔑。我们起哄，蹬脚，等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参加我们这些抗议行动。我们尽一切所能以剥夺台湾的席位并把代表资格转交给北京政府，事实上是北京政府代表全中国。我真诚地希望，由于有这么多前殖民地参加了联合国，在表决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席位的提案时，力量对比会变得有利于我们。然而不幸的是，许多这种新成立的国家在理论上取得了独立，但事实上仍然处于

殖民主义者的蹂躏之下，它们同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投一样的票。

关于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就讲这些。我应当讲一些有关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的事情。总的说来，我们的关系是密切和睦的。我们在各种问题上的立场相一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有充分机会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而他们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很少发生分歧。

但就在这时，地平线上正在形成一点乌云，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上投下了阴影。问题是出在罗马尼亚代表团身上。①我对他们个人并没有什么反对意见。他们是具有才智而精明的人，很懂得国际政治。我肯定喜欢并尊重他们的外交部长。但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不一样，罗马尼亚人关于他们在联大会议期间将要做的事或讲的话，没有事先向兄弟盟国打招呼的习惯。罗马尼亚人一直想在这个国际论坛上提出它自己的倡议，以表明罗马尼亚是完全独立的。结果，他们有时使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感到意外。我并不特别为此而烦恼——我认为这只是罗马尼亚人的办事的方式问题；可是其他一些同志很生气并开始提出异议。他们觉得罗马尼亚人太性急，总想走在别人的前面。我很希望冷静地

① 罗马尼亚代表团由党的领导人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率领；外交部长是阿夫拉姆·布纳丘。

处理整个事情，只要在涉及社会主义国家团结这个基本问题上他们不越轨就行。就我所能说的而言，他们只不过是想要强凋罗马尼亚立场的独立性。后来变得明显的是，这种行为并不仅限于这些代表，而是由于罗马尼亚同志所执行的一项总政策所决定的。

在我们同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兄弟共和国之间，并没有这种问题影响我们的关系。我对于它们对大会作出的贡献特别感到兴趣；当轮到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代表在联大发言时，我非常重视。我要求这两个代表团的团长用他们的本民族语言，即乌克兰语和白俄罗斯语发言。①首先，作为一个原则问题，我以为重要的是，苏联多民族社会里每一个民族都应当用自己的语言讲话。但更重要的是，我期望这些发言在美国和加拿大产生政治影响，因为它们可以在居住于北美的几十万乌克兰人和几万白俄罗斯人中间引起共鸣。我肯定我们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代表的讲话会被广播，而许多乌克兰裔和白俄罗斯裔的美国人与加拿大人会听到。

结果，乌克兰代表用他自己的语言发了言，但白俄罗斯代表却没有。我很不安。“不行”，白俄罗斯代表说，“我们不能用自己的语言准备讲话稿；我们连白俄罗斯语

① 乌克兰部长会议主席N·V·波德戈尔内，他后来成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及白俄罗斯部长会议主席K·T·马祖罗夫。

的打字机也没有。我只能用俄语准备。”

“好吧”，我回答道，“我相信你别无他法，不过这对我们的民族政策极其不利。苏维埃制度的敌人会说：苏联的共和国完全不是真正的共和国，它们的民族语言受到禁止，乌克兰人被允许讲乌克兰话只是讲给外国人听的，即使在联大这样的国际讲坛白俄罗斯人也必须用俄语讲话。”

结果，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代表的两个发言都颇受欢迎。当然，在联合国这样一个组织里一篇讲话是否很受欢迎常常是难说的。不象我们国内开会，在那里政策讲话总是受到确确实实的欢迎，而在联合国你得到的是各种不同的反应。听众中有些人狂热地鼓掌喝采，另一些人耐心地听着，还有一些人的反应则带有敌意。这是所有资产阶级议会的特征。

在把我们的建议和主张提交大会以前，我们经常在内部举行会议。首先，我们召开限于苏联代表团和乌克兰及白俄罗斯代表团参加的会议。然后，我们再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会商。有一件伤脑筋的事情：我们永远无法肯定是否有人偷听我们讲话。我们不希望我们的战略为敌人所知——即为美国情报部门所知，它是我们的主要对手。因此，当我们需要交换意见时，不是在户外散步时进行就是要采取特别预防措施以使窃听器失效。

我们只能在星期天到户外去散步，因为星期天联大

不开会，我们可以休息。我们到乡间去，在那里我们驻联合国使团有一座很好的房子。① 在俄国，我们把它称做别墅。

这里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们使团周末使用的乡间别墅是在美国政府规定的我们行动自由的范围之外。我们的外交代表向我保证说，如果我们提出要求，就会得到离开纽约市的特别许可。起初我不情愿请求任何照顾。这是一个面子问题。但是的确没有别的什么选择：不是把自己一直关在市里我们住的大楼内，就是正式申请到乡间去。我了解我们不得不遵照我们主人的规定，不管这些规定可能如何不公平。于是，我们提出申请并获准到乡间去。

"到乡间去"可不象听起来那样简单。这比只是坐上汽车开出市区要复杂得多。我们必须由美国警察护送，他们发信号，揿喇叭，一路指挥交通。这种旅行当然引起不少注意。我怀疑，警察大概总是事先作了通知，因为沿途有小群美国人对我们代表团示意，大部分的态度是不友好的。他们对我们伸出舌头，挥动着反对苏联和反对作为苏联代表的我个人的标语牌。

甚至在我们抵达我们乡间的住宅以后，仍然难以得到和平与安宁。这所房子周围有长着可爱绿草的园地，

① 苏联的别墅是建造在纽约格伦湾的一所房子，位于长岛北岸。

我们可以到那里去散步。即使从美国标准来衡量，这所房子也极其豪华和奢侈。我们散步时，从市区护送我们来的警察就在附近等着，并且总是有人们叫喊、吹口哨，以及路过汽车揿喇叭的声音。缅希科夫同志告诉我，人们正在对我们来到美国表示愤慨。所有这一切都是我们击落美国U—2飞机引起冲突造成的结果。尽管事实是美国采取了侵略苏联的行动，但街道上美国人的反应好象事情倒是相反的。但这也没有什么奇怪，普通美国人早就习惯于按照别人告诉他的方式进行思考了。

我们并不是受到美国人不友好待遇的唯一代表团。还有古巴人。美国人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的古巴代表团采取了一次有敌意的行动。古巴人在某家旅馆租下了房间，可是他们被撵了出来。不用说，美国政府借口这是古巴人和旅馆老板之间的私事而拒绝干预。我得知菲德尔·卡斯特罗十分愤怒，作为一名前游击队员，他威胁说要在联合国大厦附近的广场上搭一座帐篷。后来，卡斯特罗出乎意料地接到哈莱姆区一家旅馆老板的邀请，于是他决定在那里住下来。

当我们获悉古巴代表团受到这种粗暴对待时，我们感到愤慨。我们决定，我应当到哈莱姆区这家旅馆去同卡斯特罗握手，以表示对他同情和尊敬。并不是因为卡斯特罗需要别人去替他难过。他是一个具有坚强意志的人。他完全懂得，他所以受到这种刁难是美国垄断集团

对他掌权后古巴政府执行的政策的一种反应。我叫我们的人立刻打电话给卡斯特罗，如果他不在旅馆就留言给他，说赫鲁晓夫想尽快访问他。回话说卡斯特罗感谢我的电话，并表示要先到我们这里来。我觉得这是由于他认为苏联是一个大国，而他的年轻的革命政府代表的是一个小国，因此他想先来访问然后我去回访较为合适。

我觉得由我先去访问更好一些，这样可以强调我们对古巴的声援，特别是鉴于他们受到了侮辱和歧视。我要到卡斯特罗的总部去看他还有另一个理由。古巴代表团是在哈莱姆区，那家旅馆的老板是一个黑人。到黑人区的黑人旅馆去，我们就可以在两方面表明态度：既反对美国对黑人的歧视政策，又反对它对古巴的歧视政策。

“打电话给卡斯特罗，告诉他我已经出发了，”我命令说。我告诉我的警卫，我们就要驱车去哈莱姆区。我的安全人员立刻把护送我的美国警察的头目叫来。（在我上次访美时就已经认识他了。）他说我在哈莱姆区会碰到不愉快的事情，并试图劝我不要去。这样一讲更加使我决心要去。我不想要美国报纸报道说，赫鲁晓夫害怕黑人，害怕在哈莱姆区受到人身侮辱。因此，我坐进一辆汽车直驶卡斯特罗住的旅馆。

不用说，记者们首先到达那里。他们知道了一切。我不晓得他们是从什么地方得到消息的。也许从警察那里，也许从我们自己人那里。我无法摆脱这些人。除

了记者、摄影记者及电影摄影师外，还聚集了许多黑人。

卡斯特罗在大门口等候我们。这是我第一次同他会晤。他给予我深刻的印象。他个子很高，留着胡子，他的脸部表情既愉快又坚强。当他看到朋友时，眼睛里闪耀着和善的光辉。我们以拥抱相互致意。当我说“拥抱”时，我是在相当特殊的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你应当考虑到我的身长同卡斯特罗的身长不相称。他弯下腰来用他的整个身体包住了我。虽然我相当胖，可他也并不瘦，特别是对他的年纪来说是这样。

我们朝他的房间走去。当我们在这家旅馆走时，我马上可以看出，除掉黑人，没有谁会住在这样的地方。它古老而破旧，空气混浊而沉闷。房间没有打扫干净。床上的被单显然不是新换的，而且有某种由于过分拥挤和空气不好而引起的气味。

卡斯特罗对我的访问表示高兴，我重复了我对他的声援并且赞同他的政策。会谈极其简短；我们只交谈了几句。我们相互告别后我就返回住所。

你可以想象这个插曲在美国报纸上和其他地方所引起的轰动。

第二天在开会前，我们就到达联合国大厦。几分钟后卡斯特罗的代表团也到了。我建议我们去欢迎古巴人，我的同志表示同意。我们从会场的这一头走到那一

头，卡斯特罗和我示威性地拥抱起来。我要所有的人都知道我国与古巴之间的兄弟关系正在形成。民主的报纸欢迎这件事，但反映资本主义国家侵略集团利益的资产阶级报纸却对菲德尔和我大肆攻击。但是事情本来就应当是如此。我常说，如果我们的朋友称赞我们，而我们的敌人痛骂我们，那就意味着我们正是按照正确的阶级路线在执行政策。

由于联大会议拖得很长，我觉得辩论越来越没有意思。我就独立和殖民主义问题的发言排在议程将近结束的时候，因此还隔开很长一段时间。但尽管白天有时令人厌烦，晚上却总是十分忙碌。驻联合国各代表团相互举行招待会以款待对方已成惯例，几乎每天晚上我们不是自己举行招待会就是出席其他代表团的招待会。这些招待会提供了进行接触的场所。对一个国家进行正式访问总是一件复杂的事情，而在1960年实际上所有领导人都集中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例如，当时正在纽约的摩洛哥王储哈桑要求把自己介绍给我。我们为改善两国间的关系打下了基础。（后来当他的父亲逝世哈桑继承王位时，他和我彼此关系已相当好，这是很有用处的。）在印度代表团为我们举行的一次宴会上，我记得我和尼赫鲁总统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有一次特别难忘的宴会是由尼日利亚总理巴勒瓦先生举行的。（后来在尼日利亚军队发动政变时，他

悲惨地死去。)①巴勒瓦很胖而且个子很高。不用说，他是黑人，不过他脸部的肤色和塞内加尔人及其他非洲人的肤色不同。我通常看到的黑人几乎都是青兰色，但巴勒瓦的皮肤却带有点白色。也许他不是纯粹的黑人。当然，他掌握了欧洲人的全部礼节和习惯。他举行的招待会同联大开会期间我应邀参加的任何其他招待会没有区别。巴勒瓦先生请我坐在他对面；据认为这是最尊敬的座位。在座的还有我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英国代表。②

那时我们对尼日利亚最感兴趣。我们希望同这个最强大、最富裕的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我们懂得，以前的那些资本家除非不得已是不会让尼日利亚脱离他们的控制的。他们想把尼日利亚当作经济附庸并且掠夺它丰富的自然资源。他们肯定不希望尼日利亚人开始建立社会主义。根据我们的情报，巴勒瓦总理恰恰是在为资本家效劳。他本人相当富裕，是资产阶级的一分子。即使他正在建立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但他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这样做的。尽管他的人民在英国人手里遭受痛苦和贫困，巴勒瓦反而去迁就大不列颠。坦率地说，他正在把尼日利亚变成英国资本的一个卫星国。

---

① 阿尔哈杰·阿布巴卡·塔法瓦·巴勒瓦直到1966年在一场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和杀死前是尼日利亚总理。

② 英国由外交大臣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代表，但麦克米伦首相也出席了并和赫鲁晓夫进行了私下谈话。

我们的态度是等着瞧将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把巴勒瓦一类人看做昙花一现的人物，是殖民主义者使他们掌权的。毕竟在有些这类国家的军队里甚至还有英国军官。然而，我们对巴勒瓦邀请葛罗米柯同志和我参加他的宴会感到高兴。我们认为，这意味着巴勒瓦受到他自己人民的压力，要求公开同苏联代表建立接触——而我们的政策在尼日利亚正在缓慢地但却是肯定地得到赞同。

我们到纽约来的最重要目的是要维护那些正在竭力摆脱殖民地状态的国家的事业。我预定要在联大发表讲话的主题，就是要让世界上一切民族得到独立。但会议在拖延下去，我开始丧失兴趣。可是我懂得我不能够不发表讲话就离开。这样做就好象我们不大重视殖民地问题。

我记得轮到我讲话时的情景。我讲了差不多两个小时。我相信这篇讲话造成相当深刻的印象，特别对前殖民地人民。在这里，我们苏联的代表阐述了列宁关于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政策，反对人压迫人，声明人有权享有尊严和免受奴役。我们以列宁的国家、苏维埃国家的名义讲话。我认为我们在前殖民地人民中间的威望极大地提高了。

我的讲话引起了认真和热烈的讨论。当然，有些人的反应是热情的，而另一些人的反应则是敌意的，就象在一个资产阶级议会讲坛上所会出现的情况那样。然后，

需要作出一项决议了。我们事先已经拟订了一项决议。①在这种事情上我们有一位真正的能手，即安得烈·安得烈耶维奇〔葛罗米柯〕。自从联合国创始以来，他就一直同联合国打交道。打个比方说，他确实熟悉厨房的细节和程序，当我们准备炮制一些东西时，他对我们极其有用。当我们在会外征求其他代表团对我们决议草案的意见时，美国并不接受。美国人不是公然拒绝我们的决议，而是试图使其中某些论点婉转一些，并把某些尖锐的措词缓和一些。这正是我们从美国那里预料到的东西。我们运用策略使美国陷入困境。一方面，美国的盟国——英国、法国、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全都是殖民主义者或前殖民主义者。因而如果美国支持我们就意味着违背其殖民主义盟国的利益。另一方面，美国人不想出来直接反对我们的决议，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仍然必须同前殖民地打交道，特别是同巨大的非洲大陆往来。这样我们就确实使美国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我们认为，联合国应当对美国和其他政府施加某种道义上的压力以加速解放殖民地人民的进程。

在进行了许多幕后的交换意见以后，安得烈·安得烈耶维奇告诉我们，葡萄牙和西班牙将反对我们的决议草案，而美国、英国和法国则会支持这个草案。当然，这

① 赫鲁晓夫在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攻击了联合国的组织结构和领导，也要求废除殖民主义。

是一个重大的胜利。英国虽是一个殖民强国，可是却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美国从表面上看不是一个殖民国家，但却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它使用它的资本、贷款和军事干涉紧紧扼住了小国的咽喉。然而我们迫使美国投票赞成我们的决议。

我们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苏联一向对居住于我们伟大祖国的各民族实行权利平等的政策，现在又在国际范围内为同一项政策而斗争。绝大多数代表团赞成我们的决议。结果我们获得了巨大的赞扬和政治上的满足。

在那些日子里，我们还力图维护另一个发展中国家即刚果的权力，卢蒙巴和冲伯正在那里进行着一场尖锐的政治斗争，前者是左派革命力量的领袖，后者是比利时垄断资本家、殖民主义者和其他反动势力的代理人。①在我们越过大西洋前往纽约的整个旅途中，我们都同外交部就刚果局势保持密切接触，我们在船上不断和莫斯科交换密码电报。

正是在刚果问题上，我们同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的关系搞得非常紧张。本来我们很尊重他，并且当他被提名担任秘书长职务时我们也曾给予支持。和他的前任赖伊一样，哈马舍尔德也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我访

---

① 刚果总理卢蒙巴和冲伯发生冲突，后者是加丹加省的分裂主义领袖，在1960年刚果从比利时那里获得独立后不久，他宣布加丹加省脱离利奥波德维尔而独立。

问斯堪的纳维亚时，我听到许多称赞这两个人的话；我想他们都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的党员。①

但当刚果问题出现时，我们同哈马舍尔德发生了正面冲突。我们觉得他对正在同比利时殖民主义政府进行战斗的刚果进步力量支持得不够。在我出席联大期间，哈马舍尔德和我之间爆发的主要争吵不只是涉及刚果问题，而且也涉及其他问题。例如，我们提出这样的想法，如果联合国机构由代表三个具有不同社会政治制度的国家集团的三名官员来领导，而不是只设一位秘书长，这样对联合国就会更好。这三个国家集团是资本主义国家集团、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以及已从殖民主义统治下获得解放但在决定自己的发展方向时仍然不结盟或保持中立的国家。

有些自认为聪明的人试图使我相信我的想法是不可能的，而且，甚至某些对我们友好的人也坚称联合国有三位领导人就会使这个组织陷于瘫痪。但是我确信我是对的并热心地促使这个想法为人们所接受。为什么有三位领导人就会使联合国“瘫痪”呢？看一看安全理事会吧：它有十五个理事国，包括五个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为什么秘书处就不应当照此办理，由考虑到所有三方面利益而不是仅仅是一个方面利益的三驾马车来领导呢？

---

① 达格·哈马舍尔德及其前任特里格夫·赖伊分别属于瑞典和挪威的工党。

当然，这样有时会使某些问题的处理多花一些时间，但在某些问题上处理得慢一些有时反而有好处。有时，即使它不去解决任何问题，也比让听任受资本主义国家影响的一个人来解决要好。从现实情况来看，我们不抱希望会有一个共产党人或者即使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推荐的一个非共产党人来担任秘书长。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容忍这点。既然如此，为什么在秘书处我们不应当在三位代表中至少有一位来维护我们的利益呢？

不幸的是，我们提出的这个建议没有取得进展，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反对并把不结盟国家拉到它们一边。这样一来，这个想法在联大的这个试验场就没有赢得支持。我们同哈马舍尔德进行了一场真正的斗争，我们和他的关系愈来愈坏。我们决定，当他准备要求安理会再度推荐他任秘书长时，我们将反对他作为候选人。可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哈马舍尔德出发到刚果进行一次视察旅行，以便取得有关刚果局势的第一手情报。他乘的飞机在着陆时坠毁了。当时我们的情报人员向我报告说，事实上这架飞机并非因事故坠毁，而是被卢蒙巴部队击落的。①不管事实真相如何，哈马舍尔德总是死了，秘书长的职位出现了空缺。

---

① 哈马舍尔德死于1961年9月，当时他包租的飞机在前往会晤冲伯的途中坠毁，他会晤冲伯是试图结束那场战斗。卢蒙巴本人当时已经死了。

吴丹被提名为候选人。他代表缅甸。我们同缅甸有着良好的关系。我们想他会比哈马舍尔德更灵活些；吴丹不会允许联合国做任何事情来损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以及那些没有参加军事集团的国家的利益。我记得起初当安得烈·安得烈耶维奇拟订我们的对策时，我们决定投票赞成吴丹临时担任秘书长。后来我改变了主意并建议说，“不要对他施加任何限制；让他成为象他的前任一样的正式秘书长吧！”安得烈·安得烈耶维奇不同意。我向他解释，我们找不到比吴丹更好的候选人了。于是，我们就无条件地投票支持吴丹。

当然，吴丹对我们投票赞成和认可他感到高兴。在他的第一届任期内，他表明自己是个有原则的人，不让自己被美国牵着鼻子走。不用说，从严格的无产阶级、共产主义观点来看，他没有满足我们的全部要求。但如果你考虑到这个国际组织的性质——不妨说这个国际组织是由七对干净的动物和七对不干净的动物再加上各种各类既不是干净又不是污秽的动物所组成①——那么，你就会明白联合国需要有这样一个人：他既能维护某些基本的原则立场，又能使这个集体中尽可能多的成员感到满

① 这是圣经上有关诺亚方舟一段话近似的意译：“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七公七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一公一母；空中飞鸟，也要带七公七母。”（《圣经旧约全书》第七章，第二——三节）

意。吴丹是一位有成就的秘书长，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认为联合国是一个有益的组织。

你会说联合国有一个前身——国际联盟，这个组织并没有完成它的任务就死亡了，因为它未能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美国拒绝参加国联，而德国则在它认为自己已经强大到足以发动一场打得赢的战争时退了出来。接着，我们也为事态所迫脱离了国际联盟。然而，尽管国联失败了，它在存在期间还是朝着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当它成立时，苏联还是被敌人包围的一个社会主义孤岛，而资本主义体系则是世界最强大的力量，控制着战争与和平的手段。而苏联不被人们当作一回事——正如丘吉尔和其他人常说的那样，我们只不过是"泥足巨人"而已。但现在，这些都已成为历史了。丘吉尔的继任者麦克米伦向我个人承认，英国不再支配海洋，苏联是两个大国之一。国际联盟的继承者联合国也走过了一段漫长的路程。

当然，在联合国里有的时候解决问题的方法完全不能使我们满意——有时还直接同我们的愿望和利益相矛盾。我想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问题，以及关于在何时可以派遣部队进入一个国家去维持现存状况的问题。但从整体来看，联合国帮助我们避免了一场大战。对我而言，这个组织就象是一场令人清爽的冷水淋浴。人们每淋一次，对国际事务现状的看法就会更加容忍和更

加现实。联合国对某些人的狂热有抑制作用，因而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可能性少一些。我并不是说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个世界一直在沿着极其光滑的轨道顺利前进。相反，曾经发生过许多摩擦和冲突，甚至军事对抗。自从战争结束以来，我们还不曾有过一段炮声沉寂、军刀入鞘、炸弹不落的较长的喘息时间，不过所爆发的这些战争都局限于地区性冲突。

世界成为单一的有机统一体的时刻将会到来。全世界人民将拥有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依据的社会制度，没有一个国家会存在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人们之间的资本主义关系将会破除，而社会主义关系将牢固地建立起来。我也指望这样一天的到来，即中国将会取得比它迄今所占有的更为合理的地位。在目前，在过渡时期中，最合理的事情就是废除军事联盟，从外国领土撤军，并最终废除一切军队，所有国家应该只拥有维持国内秩序的警察。当我说“过渡时期”时，我是指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然后过渡到共产主义。在此过渡时期，联合国具有极其积极的意义。我们的阶级敌人，未来新制度的敌人所以能够被迫接受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这一部分要归功于联合国。他们懂得，只有在和平共处和一场没有谁能打赢的绝望的流血战争之间作出选择。各国的国际政策就象流入巨大的联合国盆地的河流。

这样，我对联大的访问终于结束了。我们是乘船来

纽约的，而现在我们准备回国去。我们获悉，我们的图—114飞机为这次飞行做好了准备。因为我们急于回去，所以我们决定乘飞机。我们乘船渡过海洋费了十天，但飞回国只要十小时。

第二十章　约翰·肯尼迪

维也纳最高级会谈

如果我必须把跟我打过交道的两位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作一比较的话，结果恐怕是不利于艾森豪威尔的。我们那些以仔细研究艾森豪威尔作为其专业的人曾对我说过，他们认为这是位软弱的总统。我不得不表示同意。他是个好人，但他并不坚强，他的性格上有某些软弱之处。正象我在日内瓦和巴黎所看到的，他太依赖于他的顾问了。我常明显地感到，美国总统这个职务对他是个极大的负担。我记得，当大选的日子日益临近的时候，他告诉我，“我在白宫的工作就要结束了。”

“总统先生，”我说，“难道你不认为国会有可能允许你竞选第三个任期吗？”

“不，我当总统当到现在了，我不想再担任这个职务，而且我甚至连试也不想再试一下。”我相信，他讲的全是心里话。他在美国有着极高的威信和声望，要想连任第三个任期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当然，还有罗斯福作为先例。但是，对这一点艾森豪威尔进行了解释，“罗斯福

是因为战争的原因而担任了两期以上，而现在则没有这种特定的条件。我有一个愿望，而且只有一个愿望：结束我的政治生涯。”

艾森豪威尔选中副总统尼克松作他的继任人。民主党只得在肯尼迪和史蒂文森两人中作出选择。史蒂文森现在是第三次竞选总统，并获得了广泛的支持。对苏联来说，从阶级斗争的观点出发，这三个人之间没有多大的差别，他们每个人都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可以预料，每个人都会执行一项跟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多少相类似的政策。但是，各人的政治手法却有着很大的差异。

让我们拿尼克松做例子吧。虽然他跟艾森豪威尔属于同一个党派，但两个人却不一样。对我们来说，艾森豪威尔比尼克松容易被接受得多。我并没有忘记选举的前一年我以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客人身分访问美国时，几乎就从我踏上美国国土的那时起，尼克松就一再发表矛头指向苏联的声明。我还记得，我曾告诉过总统：“对于你们的副总统来说，这至少也应该说是对客人失礼。”①

我们跟史蒂文森早已认识了。他曾访问过苏联，后来在我自己访问美国期间我还同他在加斯特的别墅里进行过热情的会谈。我们知道他对苏联抱有一种宽容

---

① 1959年9月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在对美国牙科医生协会发表的演说中，曾批评尼克松副总统，说他发表了“不友好的声明”。

的——我甚至要说是友好的和值得信任的——态度。

关于约翰·肯尼迪，我们知道得不多。这是一位年轻的、极有希望和很富有的人，一个百万富翁。我们从报上看到，他以他的才智、受的教育以及政治技巧而著称。当我访问华盛顿时，在外交委员会为我举行的一次招待会上，我曾跟他见过一面。委员会主席富布赖特把我介绍给了委员会的全体成员，包括肯尼迪在内。我对他说："我曾多次听人谈到你，大家都说你前程远大。"①

但是，我们对史蒂文森比较熟悉。我们相信他愿意改善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所以他可能是最符合我们希望的总统候选人。但民主党并不指定他为候选人。他曾两次参加竞选，两次都失利了，民主党人不愿再冒第三次失败的危险，因此决定在肯尼迪身上下赌注。

两党之间的战斗开始了。美国人十分善于使人相信，一场事关重大问题的巨大战斗正在进行，这是一场关系到美国的生死存亡的战斗。其实，民主党人同共和党人的斗争只是象竞技场中的角力赛，角斗者们在进入比赛场地以前就已对谁赢谁输的问题事先作好了安排。当然，我不是说美国大选的结果实际上是由两名候选人预先安排好的，但是两人都是推举他们的资本家集团的代

① 在这次访问中，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参议员J·威廉·富布赖特邀赫鲁晓夫同二十五位参议员见了面，其中包括肯尼迪。

表，大家都知道，不论谁胜利，资本主义的基础是不会动摇的。总统是由劳动人民投票选出的，但是，正象我们所看到的，他执行的政策却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背道而驰。总统支持的是资产阶级和大垄断资本，这无论对史蒂文森、肯尼迪或尼克松来讲，都是一样的。

不管怎样，既然共和党人指定了尼克松，而民主党人指定了肯尼迪，我们就得在内心里对两人作一选择。我们认为，如果肯尼迪进入白宫，那末我们在改善苏美关系问题上的希望会更大些。我们知道在这方面不能对尼克松有所指望。尼克松对苏联所持的敌对态度，他的反共立场以及他同麦卡锡主义的关系（他是靠那个黑暗的魔鬼麦卡锡发迹的）——对这一切我们都是非常熟悉的。总之，我们没有理由希望尼克松担任总统。因此，当最后艾森豪威尔表示赞成尼克松并发表讲话支持提名他当候选人时，我们是十分认真看待这件事的。毕竟艾森豪威尔对美国社会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

尼克松的副总统候选人是卡伯特·洛奇。他曾陪同我周游美国，我们两人的关系一向很好。大选前，洛奇来到莫斯科——不是应苏联政府任何形式的正式邀请，而是象我们所说的以自由的哥萨克人的身分。①他要求同我会晤。我接见了他。我们象老朋友一样又见面了。在

---

① 1960年2月洛奇曾在莫斯科同赫鲁晓夫会谈。

谈话中他力图说服我，如果尼克松进入白宫，我们两国的关系不会遭到什么损失。他没有说两国的关系会得到改善，只是说不会变得比现在更糟。他说，尼克松实际上并不是象他在竞选集会上所故意装成的那种人。“赫鲁晓夫先生，”洛奇说，“不要介意那些竞选演说。记住，这些仅仅是政治声明，尼克松先生一旦进入白宫，我肯定——我能绝对肯定——他会采取维持甚至改善我们两国关系的立场。”

我当时觉得，卡伯特·洛奇对我讲的话是尼克松和艾森豪威尔预先想好的。他们派洛奇来见我，是要使我们的报纸对尼克松持一种既不攻击也不赞扬的中立态度。他说，“我们并不要你们赞同尼克松先生。”我们十分清楚，我们的任何表态对一位候选人来说将是一种不利的因素。洛奇要求我们保持完全中立的态度。这是正确的，也是合乎情理的。我们力图做到这一点。但我们的内心仍认为，肯尼迪当选比尼克松当选对我们更加有利。

竞选活动正激烈地进行着。就在投票的前一天，美国政府照会我们，正式要求释放鲍尔斯和在北极上空被我们击落的飞机的驾驶员。当时鲍尔斯早已受审并判了刑。（我记得，在他受审时，他的父亲和妻子曾来旁听）①

① 1960年8月，鲍尔斯的妻子、母亲和父亲旁听了鲍尔斯的审判会；鲍尔斯被宣判有罪并判处十年监禁。

美国人要求我们宽恕他，放他回国。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反对这样做，我们没有必要继续把鲍尔斯关在监狱里，但问题在于什么时候释放他。在释放鲍尔斯的时机问题上有着极大的政治意义。那时候，报纸上舆论纷纷，说无论哪一个候选人，只要他在改善苏美关系上表现出更有能力，就将在竞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实际上，他们谈的并不是美国同苏联的关系，而是同我个人的关系。这是资产阶级报纸典型的做法。它们总是大肆渲染领导人个人的作用。

我向领导核心提出了我的看法："美国政府已向我们提出要求，希望释放鲍尔斯。但现在还不是释放的时候，因为两个总统候选人都想在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上捞取资本，如果我们现在释放鲍尔斯，形势就会对尼克松有利。根据报纸判断，我认为双方是势均力敌，如果我们对尼克松作出哪怕是极微小的支持，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是在表示希望尼克松进入白宫。这将是一个错误。假如尼克松当了总统，我不信他会对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作出贡献。因此，让我们慢一些释放鲍尔斯，一俟选举结束，我们立即就释放他。"

同志们都同意我的看法，我们就没有释放鲍尔斯。以后的事实证明我们做得正确。肯尼迪仅以二十万票左右的多数获胜，考虑到美国众多的人口，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多数，只消用臂肘向这边或那边轻轻碰一下，就能

产生决定性的影响。①

于是，艾森豪威尔离开了白宫，肯尼迪当上了总统。当我再次同他见面时，我觉得他很友好，很讲道理。我觉得我可以在选举问题上跟他开个玩笑："你要知道，肯尼迪先生，我们投了你的票。"

他眼睛注视着我，笑了。"怎样投的呢？"

"我们等选举结束以后，才把驾驶员们交还给你们。"

他哈哈大笑说："有道理。我承认你在选举中起了作用并投了我的票。"

当然，这是开玩笑，但它反映了真实的情况。我应该说，我对于肯尼迪担任总统一事并不后悔。事情很快就清楚了，他比艾森豪威尔更加懂得改善我们两国的关系是唯一明智的行动。艾森豪威尔十分注意从冷战变成热战的危险，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讲过："赫鲁晓夫先生，我害怕战争。"

肯尼迪也害怕战争。他从未用很多的话来告诉我这一点，但他似乎决心要有所作为，准备采取一些具体的步骤。他知道，战争会给国家带来贫困，给人民带来灾难，而且，同苏联进行一场战争，不是在树林中散步——这将是一场可怕的、流血的战争。美国将第一次被迫在自己

① 肯尼迪仅以十一万五千票的微弱多数获胜。鲍尔斯一直关到 1962 年 2 月才被释放，以交换已被定罪的苏联间谍鲁道夫·I·阿贝尔。

的国土上作战，而不是派出军队远涉重洋到欧洲去打仗。在一场用核导弹进行的战争中，在过去历次战争中牟取了暴利的美国垄断资本家们，将会看到美国的经济力量被彻底摧毁。肯尼迪对所有这一切都十分清楚，他也并不害怕面对现实。因此，从一开始，他就试图同苏联建立更密切的联系，希望能就裁军问题达成一项协议，并避免造成任何可能引起一场军事冲突的事故。

在美国，报纸的影响是很大的，肯尼迪同样具有很大的影响。他是个灵活的总统，他跟艾森豪威尔不一样，在外交政策问题上，他是自己的主人。他聘有几位聪明、年轻和受过极好教育的顾问，这些人也同他一样灵活。因此，肯尼迪成功地把报界的舆论转到了支持召开一次最高级会议上来。他告诉我们，他想同苏联的代表会晤。正象我早已提到过的那样，资产阶级的报纸喜欢夸大个人的作用，因此，美国的报纸就常常说肯尼迪希望同我——我国政府的首脑，赫鲁晓夫先生本人——进行会晤。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也愿意同肯尼迪建立联系，因为我们也分担着他对战争的恐惧。我确实害怕战争。除了傻子以外有谁不怕战争呢？至于我直言不讳地说我们害怕战争，我并不为此感到不安。这并不是说，我认为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去避免战争，我们当然不会以我们的自尊心、威信和在世界上的声望为代价去作出让步。

在我担任我国政府首脑期间，我们的立场曾多次受到别人的怀疑和攻击，我们不得不对这些力量予以回击，我们通过反击赢得了一系列重大的道义上的胜利，但这些都是在冷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我们竭力避免一场热战。肯尼迪心中似乎也怀有同样的目标。

当我们看出进行一次肯尼迪—赫鲁晓夫会谈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就接受了一项建议，同意在一个中立国家的某一个双方一致同意的地方进行这次会晤，——不在苏联，不在美国，也不在最近四大国会议告吹的巴黎。就我记忆所及，我们曾考虑过赫尔辛基、日内瓦和维也纳。肯尼迪赞成维也纳，我们则希望把会晤地点摆在赫尔辛基。因为我们觉得芬兰人比奥地利人更了解我们的政策。但奥地利人那时恪守着自己的诺言，执行了中立的政策，所以我们同意把维也纳作为这次会晤的地点。

代表团的组织成员公布了。肯尼迪准备带上他的国务卿腊斯克先生，我们则带上我们的外交部长和几个别的部的领导工作人员，以帮助分析研究会谈中提出的有关我们两国之间的各种外交、经济和军事问题。①

---

① 美国方面包括：肯尼迪、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卢埃林·汤普森大使、查尔斯·波伦以及欧洲事务助理国务卿福伊·科勒。苏联方面有：赫鲁晓夫、葛罗米柯、缅希科夫以及苏联外交部美国司的官员和后来的驻华盛顿大使A·F·多勃雷宁。

我们私下获悉，肯尼迪的母亲和妻子将陪同肯尼迪前往维也纳。因此，同志们要我也带上我的妻子，这样，在招待会上以及白天当我们陷身于会议时，妇女们就可以相互聊聊。最初，我不准备采纳这个意见。自从斯大林时代以来，领导核心内部一直有一条类似于苦行主义的规定，妇女是不让参加招待会和会谈的。唯一的例外是斯大林允许莫洛托夫的妻子参加。①伏罗希洛夫的妻子非常非常难得地在剧院里露过面。政府的包厢里往往坐着清一色的男子。妇女们连个影子都看不见。所以我不大想带尼娜·彼得罗夫娜一起到维也纳去。可是，同志们——最主要的是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米高扬——坚持要我这样做。在我们所有人之中，阿纳斯塔斯·伊凡诺维奇是在礼仪方面知识最渊博的人。他说，要是我能带尼娜·彼得罗夫娜同去，那末，这件事本身就将给人一种良好的印象。最后，我作了让步。

我们到了维也纳，并受到良好的接待。②没有反对我

① 关于P·S·捷姆丘任娜的情况，参看《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259—261页。

② 1961年6月初，赫鲁晓夫同肯尼迪分别到达维也纳。肯尼迪乘飞机取道巴黎而来，在巴黎曾与戴高乐会晤；赫鲁晓夫乘火车从捷克斯洛伐克而来，到车站迎接的人中包括莫洛托夫，他当时是苏联驻国际原子能委员会的代表，据报道，这两位政治敌手从1957年的反党集团事件以来相互一直没见过面。

们的示威游行——有的只是跟我们的地位相适应的礼貌和尊敬的表示。维也纳人挥着手向我们致意，从人们的脸部表情可以看出，他们对自己的城市被选为这次会晤的地点而感到高兴。奥地利人对我们是有好感的，因为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我们同他们签订了和约，并撤走了我们的军队。这些军队在他们国土上驻扎了很长一段时间。奥地利人认为，在决定把苏军撤离奥地利的问题上，我是起了主要作用的。他们的看法是正确的，但他们不了解，在签订和约之前，我们内部曾经过了怎样的斗争。我并不否认，只是由于我个人的努力，才在最后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就我而言，我对奥地利政府是极为满意的。我向奥地利总理和总统表示了谢意，感谢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来保证我们的会谈顺利进行。奥地利政府履行了它跟苏联签订和约时所承担的义务，即执行了一项中立的政策。我们的思想曾作好充分准备，以为会在维也纳碰到各种不友好的事情，但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时候，担任奥地利总统的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他采取了一切必要的措施，保证在我们访问期间不致出现任何复杂的或不愉快的事情。他们的总理也作了同样的努力。

在奥地利的领导人中我认识谁呢？我跟外交部长克赖斯基先生有私交。我也认识拉布，我们实际上就是同

他签订和约的。他的继任者遵循同样的政策。①他是一个第二流的小资本家，他甚至自己也这样讲。“赫鲁晓夫先生，我只是个第二流的小资本家—— ein kleiner Kapitalist。”小资本家也好，大资本家也好，真正重要的是他是个资本家，而资本家都是一路货，不管他们拥有多少资本。在坚持资产阶级立场方面，他很象我们的社会民主党人。即使一个第二流的小资本家，敛财的胃口也是巨大的，而贪婪则决定了他对工人阶级的态度。但是，拉布懂得同我们建立友好关系的必要性，我们也因他同我们签订了和约并自那以后始终执行中立政策而尊重他。奥地利的反动分子把他看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由于他和他的政府尽力为我和肯尼迪的会谈创造了最好的条件，他们是应该受到我们信赖的。

同肯尼迪的会谈开始了。我们的议程中包括了艾森豪威尔总统和我一直未能达成协议的那几个问题：德国问题，柏林问题，裁军问题，互惠的经济联系问题，租借法案这个老问题以及我们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

我们面临的最急迫的和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德国问

① 人民党领袖朱利叶斯·拉布曾在1958年访问过苏联，他于1961年4月因病辞去了总理职务，当时离肯尼迪—赫鲁晓夫最高级会议还有两个月。拉布的继任者是阿方斯·戈尔巴赫，也是个人民党人。戈尔巴赫和谢尔夫总统是这次最高级会议的正式主人。现在的总理、社会党人布伦诺·克赖斯基那时候是外交部长。

题。在这个问题上，约翰·肯尼迪跟他的前任艾森豪威尔的立场是一致的。艾森豪威尔是个共和党人，肯尼迪则是个民主党人。但是，就柏林问题而言，两人是半斤八两，两党的政策是一致的。这个政策的目标是保卫垄断资本好战的利益及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而完全不考虑其他任何人的利益。在德国问题和柏林问题上，肯尼迪的立场同艾森豪威尔几乎没有区别。但是，肯尼迪对和平共处思想的理解似乎比艾森豪威尔更进了一步。我并未忘记，艾森豪威尔的财政顾问狄龙怎样无可奈何地问我，和平共处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听到肯尼迪提过这样愚蠢的问题。他早就在公开声明中表示拥护和平共处。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它能成为解决一大堆复杂问题的基础。

肯尼迪认识到避免军事冲突的必要性，他认为我们应签订一项正式协定，表示我们接受和平共处的原则。但是，他所说的和平共处是指冻结各国的现状，至少在社会和政治制度问题上是这样。这种说法是我根本无法接受的，我明确地告诉了他这一点。

“总统先生，我们也希望就和平共处的原则问题同你达成一项协议。但对我们来说，这意味着不通过武力来解决争端和不干涉他国内政，而并不意味着冻结各国现状。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问题应该由它自己去解决，有些国家还没有决定究竟哪一种制度最符合他们的

国情，我们无权把它们'冻结'在这种或那种形式上。”

“我不同意，”他回答说，“我们必须把它们的制度冻结起来，不然的话，各式各样秘密的代理人就会颠覆一个国家的政府。”①

肯尼迪希望维持世界的现状。我对世界目前的状况也是赞成的，而且我现在依然持这种态度，但我们对这个词的含义的理解是不同的。对我们来说，“维持现状”意味着大家都不破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存在的边界——尤其不得以战争的方式来破坏这些边界。但是，肯尼迪认为边界的不可侵犯性还得加上强制维持一国的内部社会和政治制度这一条。换言之，他要资本主义国家永远是资本主义国家，并要我们同意对此做出保证。

这是根本无法接受的。那时候，很多人仍然生活在殖民主义制度下，难道他真的想要我们去帮助殖民主义者继续压迫殖民地吗？我设法使他了解他的立场是反动的，我们不但不同意他，而且我们对世界某些地方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争取改变现状的力量一直给予同情。

“总统先生，你的建议是过时的。我们可以稍稍回顾一下历史。有一段时间美国是英国的殖民地。你们起来革命，你们胜利了，你们成了一个独立的国家。你们自己

---

① 有关“现状”问题的争论，是由于肯尼迪提到了赫鲁晓夫1月间所作的一次讲话；赫鲁晓夫在这个讲话中保证要支持民族解放战争。

选择了你们的政治制度。而我们呢？我们也进行过革命，我们选择了我们现在的制度。根据你的建议，其他国家就有权干涉，并在殖民地的美国维持英国的统治，在俄国维持沙皇制度。实际上，英国和法国——且不谈一些别的国家——确实曾对年轻的苏维埃国家进行过一场武装干涉，你对你们自己的历史是十分清楚的，你应该知道结局是什么样子。

"还有，总统先生，历史上曾有过'神圣同盟'，我们可以知道它后来变成了什么玩意儿。俄国的尼古拉一世是'神圣同盟'的主角，而这个同盟却帮助奥地利王国镇压了匈牙利的一次起义。这是对别国内政的无耻干涉。这只是一个例子，说明一个君王是如何帮助另一个君王在欧洲维持反动政权的。当同盟解体时，这种政策的弱点也就暴露出来了。各君主之间缔结条约共同镇压要求改变各国现状的力量并确保自己永坐江山的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现在，我们不应该再提出建立神圣同盟的问题，我们不能这样做，我们也不愿意这样做。我们不仅不会支持你的建议，我们还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同它斗争。

"总统先生，你现在该明白了，我们不能同意你把现状冻结起来，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剥夺人民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我们拥护社会主义，而你们则拥护资本主义。让世界上各国人民自己决定，他们愿意在什么样的社会

和政治制度下面生活。”

要是约翰·肯尼迪原先已认识到了他那个建议的含意，我想他就不会提出冻结各国的政治制度的要求。他是个十分聪明的总统。但在这里，他是在保卫自己的阶级以及资本主义的传统，而他居然希望我们能成为他的同谋者！坦白说，我真对他有点感到吃惊了，所以，我就不禁使用了一个小小的讽刺来取笑他的建议。我认为，即使现在美国人仍然没有放弃肯尼迪曾对我说过的观点。我的看法被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所发动的战争证实了。真的，那场战争只能说明美国希望在这些国家内维持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正在争取为劳动人民创造美好生活而斗争。当然，我们共产党人相信，只有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保证有最美好的生活。

从我同肯尼迪的谈话中能得出什么积极的结论呢？最重要的是，他懂得和平共处的第一步应当是防止战争，尤其是美苏之间的战争。但是，他不愿意比这一基点走得再远一些。

我们也讨论了租借法案问题。我向他重复了我对艾森豪威尔讲的话：“我们感谢你们在战争期间给我们的帮助，你们的帮助在我们反对共同敌人的斗争中是极为重要的。你们给了我们十分可贵的物质援助。但我们献出了自己的鲜血，而鲜血比你们给我们的物资宝贵得多。因

此，我们感到我们早就已经连本带利地偿还了你们。”可是，资本家全是一个样，他们说，“血是你们自己的，我们希望你们用现金偿还我们当时援助你们的物资。”

我想谈谈肯尼迪是怎样进行会谈的。会谈时，我们房间里陪同人员只有双方的译员、腊斯克和葛罗米柯。我不记得肯尼迪是否曾问过腊斯克什么事，也不记得腊斯克为肯尼迪是否出过什么主意。我认为，这说明肯尼迪对国际事务了解极为透彻并已事先作了充分准备。这同艾森豪威尔在日内瓦和华盛顿的情况完全两样，那时候，开始是杜勒斯，后来是赫脱，总在旁边不断提示他。约翰·肯尼迪和我作为各自国家的首席代表，坦率地进行了直接的对话。他在回答我的问题时显得十分自信，并明确谈出自己的观点。这是很了不起的，因而，他立刻赢得了我对他的尊重。可以说，他既是我的伙伴，又是我的对手。从我们各自都坚持不同的立场这一点来说，他是我的对手；但就我们都在进行会谈并相互交换意见来说，他又是我极为可敬的伙伴。据我观察，如果总统能够对和平共处政策有所理解，那末他就会执行和平共处政策，而且他不会仓促地作出任何可能导致军事冲突的决定。这样的人是值得我尊敬的。

我认为，他对我也是尊重的。我们的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正在日益增长。我们每一年都在空间探索以及导弹和核武器发展上取得新的成就，我们进行了许多次试

验，我们的核炸弹越来越完善了，我们的战术和战略武器的品种更加繁多了。我们武装力量的壮大和巩固，增加了我国领导人讲话的份量，虽然我们正在注意不使自己卷入到强权政治——艾伦·杜勒斯的政治——中去。

当肯尼迪进入白宫以及我们在维也纳举行会谈时，力量的对比早已发生了变化。对美国来说，现在想要对我们施加压力比杜勒斯和杜鲁门时代更加困难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肯尼迪才感到有必要寻找机会达成某种协议。尽管这样，到头来还是没有找到一个现实的基础来达成一项苏美双方都能接受的协议。

肯尼迪和我在白天举行会谈，晚间奥地利政府常为我们安排了豪华的招待会。他们请我们去看戏，而且我记得还去听过歌剧。有一次，我们观看了马戏团的马术表演。当然，表演用的马匹每个马戏团都有，但这里的情况却有所不同：其一，马的数目特别多，其二，骑手们让他们的马匹表演的全是极为复杂的舞台动作。①这是一次优美的表演，是我在维也纳看到的最有趣的场面之一。维也纳壮观的地方是很多的。

在一次招待会上，肯尼迪把我介绍给他的妻子和他的母亲。他的妻子杰奎琳是个年轻女人，记者们常常把她描绘成一个绝代佳人。在我的印象中，她并没有那种

---

① 这次表演是由西班牙骑术学校的利皮赞马匹进行的。

使男子神魂颠倒的、特别动人的姿色，但她年轻，精力充沛，轻松愉快。我很喜欢她。她很会开玩笑，而且正象我们的人所讲的，口才很好。换句话说，如果你一不提防，她马上会抓住你的辫子。我本人只同她作过一些简短的谈话，就是在招待会上或者在戏院幕间休息时所进行的那类谈话。但即使在这样简短的谈话中，她也显示了自己的聪明伶俐。

这就是肯尼迪的妻子所留给我的全部印象。作为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我不能不关心肯尼迪的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肯尼迪喜欢她，那是他的事——祝他俩幸福。对于肯尼迪的母亲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她有百万家产，我们时刻都应该牢记我们是在跟谁打交道。即使我们跟她握手，彼此笑颜相对，这绝不能改变我们是属于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事实。

在一次招待会还是在戏院举行的晚会上，我跟肯尼迪作了最后一次会晤。我记得他看上去不仅面带忧色，而且心神十分不定。他的面容至今还在我的记忆中栩栩如生。我看着他，不禁感到有点难过，甚至自己也有点不安了。我并没有存心要使他不安，我很希望我们能怀着另一种心情分手。可是我对他爱莫能助。我们阶级立场的不同阻碍了我们达成协议，尽管从我们方面来讲，我们尽了一切的可能的努力。政治这玩意儿是绝无怜悯可言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为肯尼迪感到难过。从人与人之间

的关系来讲，我为他的失望心情感到难受。

我知道，他的敌人，特别是好战的政治家们，将会利用他的这种不利地位来嘲弄他。“看到了吧？你想通过跟赫鲁晓夫会谈并哄他签订一项协议来炫耀自己的能力。我们早就再三讲过，布尔什维克根本不懂得谈判的语言，他们只懂得强权政治。他们欺骗了你；他们牵着你的鼻子走。你被他们打得落花流水，现在你双手空空地回来，脸都丢尽了。”这就是我想象中当总统回到美国时会听到的话。

我心里加倍感到难过，因为我们的会谈没有为改善两国间的关系创造有利条件，相反，却加剧了冷战。这使我感到担忧。如果重新回到冷战时代，我们将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美国人将会在武器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并迫使我们也这样做。这样，新的、更激烈的军备竞赛将会用光我们的预算，削弱我们的经济力量，降低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我们从以往的经验中对这点已经了解得够清楚的了。

我同肯尼迪的会谈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相互道了别，各自的立场未作丝毫改变，而我们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却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不过，尽管我们感到担心和失望，我们已经进行了会谈并交换了意见，这次会见还是值得的。

我认为肯尼迪比他以前的所有总统都聪明。当我如

此赞扬这位已故的美国总统时，我希望我在共产党内的兄弟们能正确理解我的意思。赞扬一个值得称赞的人，并不意味着给那个人所代表的社会和政治制度涂脂抹粉。肯尼迪是一个资本家，是资产阶级的一个代表人物。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始终忠于资产阶级。但他明白，社会主义阵营在经济和文化领域内的力量已经如此之大，拥有的科学和技术知识如此之多——其中也包括战争的手段在内——以致美国及其盟国再也不能真的想要发动一场反对我们的战争了。我将永远为此而尊敬他。

肯尼迪离开维也纳的时刻来到了。我没有去为他送行。人家也不会期望我这样做。肯尼迪由奥地利官员们陪同前往机场，其中包括现在的总理、当时任外交部长的克赖斯基。事后，克赖斯基要求同我进行一次会晤，我接见了他。他具有最灵活的社会民主党人的名声。我个人知道，他是个圆通的政治家，他一向拥护同社会主义国家改善关系。我也知道他同维利·勃兰特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当时正担任着西柏林的市长，现在是西德的总理。勃兰特和克赖斯基两人是朋友，两人在战时都移居到了瑞典，并且都是社会民主党人。①

---

① 西柏林市市长、西德社会民主党人维利·勃兰特在维也纳最高级会议前不久在华盛顿同肯尼迪举行了会谈。他在1969年当选为西德总理。

我同克赖斯基的会谈对我们双方都是有益的。他告诉我他在为肯尼迪送行时所产生的印象："总统在机场上脸色十分阴沉，看上去心烦意乱。他的面孔变了样，显然，对他来说会谈进行得很不顺利"。

"是的，"我回答说，"我看出了他的心情。但这是因为总统对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仍然缺乏了解，他还没有充分理解各种力量的变化，他仍然执行自己前任们所执行的政策——至少在柏林问题上是这样。他还不准备消除在柏林问题上打一场世界大战的危险。我们的会谈是有帮助的，因为它使我们有机会把各自的观点摆出来，由此取得相互了解。但仅仅就此而已，这是不够的。

说实话，我把自己对肯尼迪讲的每一件事都对克赖斯基谈了。我知道，我所讲的话会传到肯尼迪——而且也会传到维利·勃兰特的耳朵里。我希望，让他们知道我们决不会放弃自己的决心，这样我们或许能成功地促使这些领导人同意进行通情达理的会谈并最后达成一项合理的协议——一切都十分有希望，温度不至于升高到沸点。

肯尼迪走了之后，奥地利政府为我举行了一次招待会或晚宴。然后，我们也得走了。奥地利政府以一切必要的礼节和传统的仪式为我们送行。不多一会儿我就回到了莫斯科。

柏林危机

讲得粗一点，美国插在欧洲的那只脚有一个发痛的水泡。这就是西柏林。①随便什么时候我们想要踩一下美国人的脚，叫他们感到疼痛，我们只要切断西方通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领土同这个城市的交通就行了。斯大林曾经想利用过西柏林问题，但是他失败了。②

斯大林死后，我们继续坚持认为，西柏林不是如我们从前的盟国所说的那样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一部分。每当西方国家侵犯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时——他们每次都把西柏林当作好象是西德的一部分——他们就是给一个极易燃烧的和潜在的爆炸性局势加热。

作为一项解决办法，我们建议缔结一项和平条约，其中规定西柏林将成为一个自由城市。我们准备作出这个让步，但是有个条件，即两个德意志国家都应得到国际上的承认，并且都应成为联合国会员国。

正如我以前说过的，我访问法国时曾同戴高乐总统深入讨论了德国问题。他说他在战后一直主张分裂德国，并且曾力劝斯大林支持成立两个以上的德国的想法。

---

① 这一节补充和丰富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52—460页所载赫鲁晓夫关于1961年柏林危机的回忆。

② 这里指的是柏林封锁和空运。

“赫鲁晓夫先生，”他说，“你大概知道在波茨坦讨论德国问题时法国采取的立场。我们赞成用更激烈的办法，但是斯大林没有支持我们，所以我们的建议没有被接受。”

“是的，总统先生，”我说。“我记得你在波茨坦谈判时的立场，而且我觉得我了解斯大林为什么不支持你。当时我们对战后德国的地位和发展有些不同的看法。”

我相信戴高乐懂得德国复仇主义的危险，我并且欣赏他愿意接受下面这个事实，即根据波茨坦协议，西柏林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不应看作是西德的一部分。我也欣赏戴高乐保证法国决不同德国在军事上联合起来对苏联作战。

我同戴高乐的分歧是在西德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中的作用以及缔结一项和约的必要性这些问题上。戴高乐认为照现在这样就行了，不必再去改动，而且不要打乱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联盟之间在军事、社会和政治方面的均势。至于和约，他力图表明这样一个条约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应该满足于现在已经到手的东西。我们不能接受这样的论点。我们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使我们应当坚持认为，和约是各个国家之间关系正常化的唯一方式，包括两个德国在内；也是保证我们的盟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主权完整的唯一方法。

戴高乐不能理解这一点，至少他装做不理解它。他

的态度是："东德是你们的，你们拿去好了。你们是那里的统治者。不要打扰我们，不要硬搞这一大套的变动来削弱我们的地位。"但是我们很坚持。我们要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同志真正能够独立，使他们能根据自身的利益和需要，同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文化和经济关系。

接着是我同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谈。我们碰到的最尖锐的问题仍然是德国问题。所有其他问题，特别是裁军问题，都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在德国问题上找到解决办法——而德国问题又要靠西柏林问题的解决而定。自从一年前我同戴高乐会谈后，西柏林问题就象在一个原来很健康的身体上生长起来的毒瘤一样。现在切除这个毒瘤变得越发重要了。

我告诉肯尼迪，如果他不同意就德国问题签署一项协议以一劳永逸地解决柏林的地位问题，我们就将被迫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一项单方面协议。①一旦这样做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不再受波茨坦协议条款的约束，而改受新条约的约束；这个新条约除我们签署外，任何其他愿意签字的国家也可以签署。事实上，当然只有社会主义国家会签署这样一项单方面的条约。

具体说来，签署一项单方面的条约意味着德意志民

---

① 这样的协议将不包括西方盟国在内。

主共和国将从我们这里获得授权，可以在西方国家利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领土出入西柏林的问题上决定自己的政策。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将有权利在这些事情上比我们给予较少的通融。

我说的话听上去好象是对肯尼迪的威胁。他懂得我的意思，而且不高兴。他也不喜欢我们把西柏林变成一个自由城市的建议。他害怕一旦西柏林成为一个自由城市，我们会开进来和占领它——不过我们当然没有这样的意图。

针对我们的态度，肯尼迪争辩说，根据波茨坦协议，只有一个德国，因此在德国出现一个统一的政府以前，任何人都不能签署和约。这是美国人一贯对付我们的方针。我们同肯尼迪在维也纳的会谈是我们以前同艾森豪威尔会谈的重复。①

时钟的指针在转动。但是岁月的消逝对我们有利；对美国人来说则已走到了末运。我觉得肯尼迪很清楚，如果我们单方面解决柏林问题，他的处境会很不舒服，但是他对双边解决还没有思想上的准备。他受到很大的压力，一方面是军界的压力，另一方面是美国舆论的压力，因为美国公众还没有到接受我们建议的时候。

所以最后分析下来，虽然我同肯尼迪总统在维也纳

---

① 指 1959 年他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

的会谈使我们双方都不满意，对他说来却是一次失败。我们打算〔在德国问题上〕行使我们的权利，他根本无法阻止我们，除非采取军事行动。肯尼迪并不笨，他完全懂得搞一次军事冲突毫无意义。因此，当我们开始采取一些单方面措施时，美国和它的西方盟国除了吞下一剂苦药外，别无其他办法。

我们决定现在已经是挑破西柏林这个水泡的时刻了。要避免使用手术刀已经不可能了，但是我们想在麻醉下进行手术。尽管现在通过外交途径已经失败，使我们不得不求助于锋利的工具，但我们务必要使病人尽量少受痛苦。我们还想避免手术后遗症。

维也纳会议之后不久，我们宣布我们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①我们讲得很清楚，作为东德的盟国，我们将抵抗任何企图破坏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间边界的人。

接着我们获悉肯尼迪已经派了一位曾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指挥驻德美军的将军去柏林。②我们认为这

---

① 1961年6月，在赫鲁晓夫同肯尼迪举行最高级会议之后没有几天，他宣布12月31日为四国解决柏林问题的截止日期。“否则的话”就由苏联和东德缔结和约和对西柏林来一个新的封锁——但他从来没有把这个威胁付诸实施。

② 卢修斯·克莱将军，战后驻德国的美国军事管制委员。柏林空运主要是他想出来的。

是一个信号，说明美国人已经把我们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一事看作是一种威胁，并且对此采取了反措施。好吧，我们也有我们的对策。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我们方面和这位美国将军对口的是科涅夫元帅。经过商量之后，我就向领导核心建议派科涅夫任我们驻德部队的总司令。用下象棋的语言说，美国人把卒子推进一步，因此我们就走一步马来保卫我们的阵地。①实际上，美国人是对我们说，“如果你们打算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条约，你们就得和我们的一位将军打交道，这个人你们是熟悉的。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意味着我们为武装冲突已做好准备。”我们回答说，“如果你们坚持把战争的盾牌对着我们，并且阻挠我们的意图，那么我们准备以牙还牙。”

科涅夫到了柏林，接替了雅库鲍夫斯基将军总司令的职位，雅库鲍夫斯基改任科涅夫的副手。②但是我们一再向科涅夫元帅讲明，他的任命只是临时的和象征性的，一俟局势恢复正常，他就要调回莫斯科。不用说，当我们向报界宣布科涅夫将去柏林后，正在形成的紧张局势一

---

① 赫鲁晓夫在这里用的是双关语。国际象棋里的马在俄语中叫做конь，也是科涅夫这个姓的字根。科涅夫是在退休后于8月10日临时召用的，而克莱直到8月18日才在西德再度担任指挥职务。

② I·I·雅库鲍夫斯基元帅，后来是华沙条约的总司令。

点也没有缓和，反而有了加剧。尽管如此，我们建议科涅夫向他的美国对手作一次例行的礼节性拜访。在科涅夫前往柏林之前，我告诉他“设法同美国将军取得接触。”

在同一时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已在加强它的边境管制。我们早就认为自由出入柏林只能给资本主义国家的间谍活动开方便之门，便利他们收集我们军队驻地的情报。堵塞漏洞的唯一方法是封闭边界。在我们的敦促下，乌布利希同志制定了进出东德的签证制度。人们进出柏林也有一种特别通行证。换句话说，我们帮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建立了象其他主权国家都有的管理移民和边界安全的制度。

到了一个时候，我叫我们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大使别尔乌辛给我送来一幅西柏林的地图。①我们商量好策略并定下实行边界管制的日期和时间。②我们决定竖起反坦克的路障和街垒。我们还计划用我们的军队守卫边界，不过第一线将由德国士兵守卫。我们的人分布在他们之后几米，这样可以使西柏林人很容易看见苏联军队在支持德国军队。我们要给人一个印象，就是整个军

---

① 别尔乌辛，苏联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大使，以前是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之一，由于有支持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反党集团的嫌疑而被降职。

② 所谓“边界管制”，赫鲁晓夫指的就是树立柏林墙，这是他在叙述这次危机时一贯采用的含糊说法。

事行动是〔东〕德人在同他们的盟国苏联合作下进行的。

边界管制的日期定于1961年8月13日开始。我们大家开玩笑说，在西方"十三"被认为是一个不吉利的日子。我诙谐地说，对我们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说来，这确实是一个很吉利的日子。

我们把计划保密到最后一分钟。当预定的日期和时间到来时，我们的部队占据了边界阵地。群情立刻沸腾起来，但是我们成功地和单方面地帮助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执行一个主权国家的职能，而这是它原应享有的权利，如果缔结了和约的话。

我个人对这些事态发展也很关心。由于我们军队有出入西柏林的权利，我决定利用一下这个权利。我同柏林的卫戍司令——他正好是我们的一位军官——一同微服访问了这个城市；我没有走出汽车，但是我各处都跑到了，并且看到这个城市是什么状况。

边界管制的建立立刻解决了问题。在东德，纪律加强了。工厂的生产开始好转。集体农庄也是如此。乌布利希同志告诉我们，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经济立即有了改善。西柏林的居民过去一直在东柏林购买食品，利用那边低廉的物价。这样，西柏林人就一直在促使东德马克贬值，给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农民和工人增加很大负担，并从这种局势中汲取政治上的利益和经济上的利益。一旦我们建立了边界管制，我们就结束了这种生意经。

我还应指出，把柏林城分成两部分是一件困难的工作，因为所有东西都是交织在一起的。当边界沿着一条街走过时，弄得街的一边是东柏林，另一边是西柏林。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呢？历史造成这种不方便，我们只得适应它。

我们开始得到情报说，有一支军队正在准备摧毁这座“墙”——在西方就是这样称呼它的。他们打算强行恢复出入这个城市的自由通道。到了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开幕时，形势变得严重起来了。①科涅夫作为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他报告说，美国人正在准备开进来，用步兵和推土机摧毁边界工事。我们要科涅夫把我们的坦克隐藏在支路上，等美国人越过边界时就开出来同他们对抗。科涅夫照我们的指示做了。他报告说当美国的吉普车、卡车、兵员运输车和推土机越过边界时，他们就发觉自己处在我们坦克的炮筒下面。双方都在半路上停下来，相持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晨，党代会继续进行。科涅夫报告说，柏林边界的情况没有变化。谁都不走动，除了有些时候双方的坦克手爬出来走动走动取暖。

“科涅夫同志，”我说，“我看你还是命令我们的坦克掉头从边界开回来为好。不要叫它们走得太远。只是把

① 在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公开攻击阿尔巴尼亚和中国。

它们再开到支路上使人家看不见就行了。我肯定在二十分钟之内,或者在他们接到命令的任何时间内,美国坦克也会开回去。只要我们的炮筒还对着他们，他们是不能掉转坦克并且开回去的。他们自己已陷入了困境，并且不知道怎样才能摆脱出来。我相信，他们正在找出路。那我们就给他们一条出路吧。我们撤走我们的坦克之后，他们也会照做的。”

科涅夫完全按照我的话做了，并且报告说美国坦克掉了头，在二十分钟左右就不见了——恰如我预料的一样。事情就这样结束。西方不得不承认边界管制的建立，承认资本主义的西柏林和社会主义的东柏林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首都的分立。

我想，我们没有取得一项和约所能体现的那种道义上的胜利，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没有一项和约，我们或许得到了更多的物质上的好处。如果西方同意签订一项条约,这就说明我们方面也要作出让步,特别是在人民通过边界的问题上。在封锁以后，有时候出现越境事件。有一定数量的人——实际上有不少的人——企图逃出东柏林。我听到有一件事情:一群人用卡车撞倒路障,逃到西柏林去。我们告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当局〕要采取措施防止再发生这样的事件。我们不希望在东柏林活动的特务逃避逮捕并逃往西柏林。

我们对〔东〕德管制他们边界的能力是有怀疑的。守

卫的士兵虽有武器装备，但是要一个士兵向一个德国同胞开枪却并不那么容易。我们向德国同志表示了我们的关切，他们回答说，“你们在国内战争时期，俄国人同俄国人打了好几年，对吗？他们也使用了武器，对吗？那么，你们为什么认为一个德国人在执行他的阶级义务时手会发抖呢？在保卫他的社会主义共和国时，为什么他会害怕向另一个德国人射击呢？”这话讲得好。尽管不时有事件发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边防部队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很好地武装起来。他们懂得自己的阶级义务，也懂得自己的军人天职。为了保卫他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他们做了自己应做的事。

过了一段时间，西方开始通过秘密的和非官方的途径以及通过报纸进行试探。资本家意识到在柏林已建立起牢固的管制，而且俄国人是不会放手的。有人传话给我们说，西方承认我们的权利，但是希望我们不要再加剧局势。美国人召回他们的司令官，我们也立即把科涅夫元帅召回莫斯科。我们还撤回了在危机中动员的部队。就这样，我们在没有一项和约的情况下达到了管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边界的目的。我们为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争得了主权。这总算是我们努力的报答，而且使我们感到高兴和自豪。我比任何人都高兴，因为我们同肯尼迪在维也纳谈判的结果很不满意，才想出这个办法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

我还记得肯尼迪在维也纳告诉我，按照波茨坦协定，只有一个德国，因此如果要签订和约，那就先得成立一个代表统一德国的政府。尽管我拒绝干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内政，他还是喋喋不休地讲这一点。好，让时间来证明究竟谁正确？事情不是解决得和肯尼迪所说的不同吗？现在勃兰特自己已经觉得必须承认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了。作为德国的总理，他不得不同另一个德国的总理会晤。这可能不构成法律上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但它肯定是事实上的承认。当我们〔在 1961 年〕使用了我们的权利并且防患于未然时，我们为这件事的发展提供了舞台。这样做，我们就迫使肯尼迪和西方盟国吞下了一剂苦药。

古巴导弹危机

加勒比海危机对我们是一个重要的考验。①这是在我们可能要求助于核武器的时候，一次对我们力量的考验。我已经在公开场合和我的回忆录中对这个事件作了叙述，但是我打算在这里补充一些想法。

菲德尔·卡斯特罗是我们的朋友，革命的古巴正受到五角大楼好战的军国主义分子的威胁。美国的反动派

① 这一节增补了《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 488—505 页赫鲁晓夫关于 1962 年 10 月古巴导弹危机的回忆。

把古巴看成是他们国家身上的一个脓疮。美国军队的情报机关组织了一支由古巴反革命分子组成的入侵部队。美国人估计错了。他们没有计划好。他们过高地估计了反革命分子的力量。他们以为入侵会触发一场支持反革命的暴动。但是，这是痴心妄想。卡斯特罗很英明地对付了这个局面。他大约只花了三天或者稍微多一点的时间就把入侵者打垮了。

尽管如此，我们知道美国人不会就此罢休。我们知道他们对反革命的失败是不会甘心的。我们知道美国不会吞下这样一剂苦药。甚至在这次流产的入侵之后，美国人仍决心要推翻古巴独立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建立一个以新的巴蒂斯塔式人物为首的傀儡政权来代替它。①

我们得到消息——附带说一声，这个消息后来被证实了——美国政府决心组织一个训练更为有素和装备更为精良的登陆部队。②美国军队将支持这次入侵。我们知道美国对这种军事行动很有经验。美国将假借支持另一个共和国的名义，死劲地支持一些顽固的反动分子，这

---

① 弗尔亨西奥·巴蒂斯塔是被菲德尔·卡斯特罗推翻的独裁者，于1959年被迫流亡在外。

② 根据塔德·肖尔茨在1974年2月一期的《老爷》杂志上所写，“中央情报局大概在林登·约翰逊总统的授权下……于1964年末和1965年开始执行一项新的秘密计划，把暗杀卡斯特罗同古巴流亡者的第二次入侵结合起来；入侵者这次是从位于哥斯达黎加和尼加拉瓜

些人就会硬说是在自己的国土上登陆，这样就可以把整个事情说成是这个国家的“内部争端”。当然，实际上美国只要把雇佣军或正规军投入战斗就可以达到这一目的。

一方面，美国人的态度是很自然的。在美国沿海有一个社会主义的古巴，为拉丁美洲的其他国家作出革命的榜样，这是美国无法容忍的。同样，我们愿意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做邻居，因为这对我们有好处。可是，我们是以理智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的。我们的立场是：问题不能用战争来解决，而要由国内的力量，特别是由人民和工人阶级来解决。

另一方面，美国一心要直接干涉古巴的内政。美国人想迫使古巴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使它跟在美国政策后面走，正象古巴革命胜利之前一样，那时候傀儡总统们为美国剥削古巴大开了方便之门。

从我们方面来说，我们希望古巴仍然是一个革命的和社会主义的国家。我们知道要做到这点，需要给古巴帮助。古巴是一个人口和领土都有限的小岛。它自己没有多少工业，它的军队的武器装备是从别的国家买来的。

的基地出发的。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狂妄阴谋，因为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把美国和苏联引向核对抗的边缘，而危机的解决一部分是因为华盛顿保证不去触动卡斯特罗。……事实上，当1965年4月间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了一场出人意料的叛乱时，整个暗杀和入侵计划只得取消了。”

我说“武器”时，我的意思是指真正的武器——不仅是指步兵武器。他们可能自己能够制造步枪，但是他们自己不能生产重武器。这些要靠我们供应。

我们除了在岛上设置导弹外，没有其它办法可以帮助他们对付美国的威胁。这样一来使得美国的侵略力量面临着进退两难的局面：如果你侵犯古巴，就会使你自己的城市遭到核导弹的攻击。我们设置导弹的意图不是对美国作战，而是阻止美国侵犯古巴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战争。我们的意图只是给菲德尔·卡斯特罗所创立的新的进步制度一个继续推行下去的机会。

如果古巴没有我们的导弹，这个岛所处的地位就象一个弱者受到强者的威胁一样。我不是说我们已掌握了什么文字上的证据，说明美国人正在准备第二次入侵；我们不需要文字上的证据。我们了解美国的阶级立场和阶级盲目性，这就足以使我们向最坏的方面着想了。

当卡斯特罗同我谈到这个问题时，我们争论了又争论。我们争论得很激烈。但是最后菲德尔同意了我的意见。后来他开始拿些业已引起他注意的材料给我看。他说“很明显，你告诉我的话是对的”。这话本身就证明我们当时的所作所为是正确的。①

---

① 这里发生中断，但是从本文来看，很明显，卡斯特罗在开头拒绝赫鲁晓夫在古巴设置导弹以制止美国进一步干涉的建议。

我们在古巴土地上驻扎我们的部队只是为了一个目的：维护古巴人民的独立和防止美国人当时准备派出雇佣远征军入侵古巴。我们自己并不打算发动战争。我们一直认为战争是同我们利益背道而驰的。我们除自卫战争外，从来没有想到别的战争。任何有一点点常识的人都能看出我讲的是真话。要我们从古巴对美国发动一场战争，这将是荒谬至极。古巴离开苏联一万一千公里。我们同古巴的海上和空中交通都很靠不住，所以向美国发动攻击是不可思议的。

当局势紧张到可能爆发战争的地步时，我们两国就采取了秘密外交的方法。我们通过肯尼迪总统的兄弟罗伯特和他保持接触。罗伯特到我们的大使馆来，并且代表总统表示愿意达成一项协议。他也答应向总统转达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可以从古巴撤回我们的导弹，条件是美国必须公开声明，保证不侵犯古巴，并且答应要它的盟国也不侵犯古巴。

肯尼迪总统说，他愿意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美国的导弹，作为我们撤回导弹的交换。我们明明知道这个保证只是象征性质；土耳其和意大利的美国火箭早已过了时，美国人很快就会用更现代化的武器代替它。再者，美国已经用北极星导弹装备它的海军。尽管如此，即使是同意采取象征性的措施，肯尼迪也给了人们一种双方

都作了让步的印象。①

加勒比危机的解决是一个历史的里程碑。美国人有史以来第一次公开保证不侵略一个邻国，并且不干涉它的内政。这是美国人吞下的一剂苦药。比这更糟糕的是，美帝国主义者这个野兽被迫吞下了一个刺猬，连同硬刺整个吞下去了。这个刺猬仍然在胃里没有消化。只要苏联和美国关于古巴的协议有效，用外科手术取出这个刺猬是没有可能的。

我们做得很得体，并且迫使美国人遣散了雇佣军和承认古巴——不是在法律上，而是事实上的承认。古巴今天仍然存在，这是由于苏联在对付美国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我对我们的所作所为感到自豪。在回顾这个插曲时，我对我的人民、我们执行的政策和我们在外交战线上所赢得的胜利感到自豪。

加勒比海危机的经验也使我们深信，我们集中力量制造核导弹而不是扩大水面海军是正确的；库兹涅佐夫就是建议扩大水面海军；他自己也承认要花费几十亿资金和至少十年时间才能建成。②单有原子弹和远程轰炸

---

① 罗伯特·肯尼迪在关于这次危机的回忆录《十三天》中，叙述了他同多勃雷宁大使讨论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撤走美国“木星”导弹的情况。同时，根据罗伯特·肯尼迪所说，赫鲁晓夫在这里提到的会谈是在司法部举行，而不是在苏联大使馆。

机是不够的，因为在这些方面我们是落后于美国的。可是，美国和全世界都知道导弹能给予地球上任何地方以毁灭性的打击。我们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使用人民的资金来保卫我们祖国的安全，过去曾有过争论；所以，当我们制成了导弹时，这表现了我们在理智交锋上的胜利。

对于在这个事件中起了作用的其他领导人，我能说些什么呢？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只能说我祝他和他的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取得胜利。

在危机时期，我从来没有机会了解戴高乐总统的态度。美国报纸声称，戴高乐在最危急的时刻表达了法国对肯尼迪的支持。这是可能的，但是戴高乐也有可能做了相反的事。③

我愿意对约翰·肯尼迪说几句话。有人会说，肯尼迪应该对这次几乎导致战争的紧张局势负责。好吧，对那些喜欢提聪明问题的聪明人，我的回答是：你必须记住我们生活的时代。这是历史上的一个过渡时期。谁战胜谁的问题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解决。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

---

② 参看第二章关于赫鲁晓夫在水面舰队问题上同库兹涅佐夫争论的回顾。

③ 根据罗伯特·肯尼迪的说法，前国务卿迪安·艾奇逊使用了美国在高空侦察时拍摄的苏联在古巴的设施的照片，“以迅速使法国总统夏尔·戴高乐相信，我们的反应是正确的，以后还说服了阿登纳总理。麦克米伦明白表示美国将得到他的国家的支持。”

正在想尽各种办法来维持并加强（如果可能的话）自己的阵地。加勒比海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我们发现我们同美国总统处于严重的对抗中。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能害怕冲突，但同时又必须保持理智，不要让冲突变成战争。换句话说，一个人一定要有个聪明和头脑冷静的对手同他打交道。在我的政治经历的这段时间里，我的伙伴是肯尼迪，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我相信他是个对形势有正确了解的人，而且从心底里不希望战争。他认识到用武力来解决这种纠纷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很现实，看出现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力量已经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不相上下了。

肯尼迪也是一个我们可以信任的人。当他公开向我们保证美国不会组织它自己或者组织它的盟国对古巴入侵时，我们相信了他。我们接受了他所做出的让步，我们自己也作了让步，把我们的核武器从古巴撤回去。

肯尼迪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拿我们的出身来说，我同他是南辕北辙。我是一个矿工，一个金属装配工——由于党和人民的意愿，擢升为我们国家的总理。肯尼迪是个百万富翁和百万富翁的儿子。他追求的目标是加强资本主义，而我则谋求摧毁资本主义和在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教导基础上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正如我们在维也纳会谈时所表明的，我们在许多重要问题上都持有完全相反的看法。

但是，尽管我们的阶级对抗是不可调和的，肯尼迪和我在防止军事冲突的问题上，却找到了共同的立场和共同的语言。举例来说，我们同意在我们之间建立直接的通话线路，越过外交途径，在紧急的时候使用它。有些人会说，“谁会需要它呢？”我说，有一天它可能会有用的。①

我愿意向肯尼迪表示敬意。他是在我们两国发生严重冲突时我的对手。他表现了很大的灵活性，和我们一起避免了灾难。当他被暗杀时，我感到真诚的惋惜。我立即去〔美国〕大使馆表示了我的哀悼。

---

① 华盛顿—莫斯科“热线”协定于1963年6月签订。

第二十一章 访问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我们接到丹麦、挪威和瑞典的联名邀请，要我们前往这三个国家访问。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报界却在那里捣乱，它疯狂辱骂我们苏联代表团、辱骂我们的政策和我们的国家，以致我们不得不推迟访问。后来，当我们（在1959年和1960年）正式访问了美国和法国之后，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政府又重新提出了邀请。起先，我们对此感到很难办，因为我们已经一度拒绝过，但后来一切都通过外交途径顺利地得到解决。①

我们访问的第一站是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我们被安排在市内游览并参观海堤和举世闻名的美人鱼。我记得，就在我们到达前不久，一些歹徒把美人鱼的头锯走了。公众对此极为愤怒，报纸也对此作了大量报道。美人鱼对每一个丹麦人都具有特殊的意义。当我们看到她的时候，她的头已经被放回原来的位置上，技术之巧妙竟使你

① 赫鲁晓夫之所以推迟原定在1959年对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访问，真正的原因是他想去访问美国。1964年6月他终于去了斯堪的纳维亚。

看不出曾发生过什么事的痕迹。

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同去。丹麦人给她以传统的礼遇，请她在一艘即将下水的轮船的船头上敲碎一瓶香槟酒。

丹麦人是杰出的造船家。他们生产的船只既新颖又灵巧，驾驶设备都是第一流的。过去，我们曾和丹麦的船厂做过不少生意。接着，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我们同丹麦人之间曾经有过一段十分不愉快的经历。有一天，他们突然出人意料地拒绝接受我们早已提出的一艘一万二千吨油船的订货。他们说，好战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丹麦是成员国之一——已决定要限制我们的航运能力，它通过了一项规定，禁止任何北约成员国向苏联出售吨位超过三千至五千吨的船只。当然，美国是这项政策的唆使者。这件事引起了我们同丹麦人之间的激烈争论，其中有些情况在报纸上也有所报道。后来，这项歧视性的规定被废除，丹麦人又重新开始接受我们的订货。但对这件事我们并没有忘记。

我在哥本哈根逗留期间同丹麦领导人举行了多次会谈，我们就有关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我们知道丹麦在北约组织中是不起多大作用的，因此也就没有努力劝说他们改变其外交政策。

我们的主人为我们安排了一次观光旅行，使我们能

对丹麦的农业，尤其是奶品制造业的情况有所了解。据我回忆，这种安排是由政府和反对党共同作出的。反对党领袖，即前总理，带我们参观了他的农场。①

我简直无法用恰当的词句来表达自己在亲眼看到丹麦的农业生产情况时的高兴心情。当然，我曾从我国自己的农业工作者那里听到过有关丹麦奶品农场的情况，也看过这方面的材料，但现在我可以亲眼看看了。如果说我有什么失望的地方，那就是我无法向丹麦人说，我们的农业也同他们一样好。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居然能办得这样好，真使我们心中阵阵作痛。丹麦的农民真了不起。当然，我们感到了不起的在其他国家看来则是平常的。这完全是一个发展水平的问题，是一个掌握正确的农业技术和技巧以及如何充分利用最新的科学成就的问题。

我记得在参观一个奶品农场时，人们把我领到了一个奶牛棚。每一个栏圈上都挂着一块小牌，上面写明栏内每头牛的牛奶所含脂肪的百分比。数字高达百分之五、六，甚至百分之七。想想吧！百分之七的脂肪。真叫人无法相信。在我国，我们不敢用牛奶中脂肪的含量作为衡量生产效率的标准，我们是用公升来计算一头奶牛的产量的。在我国，牛奶中脂肪的平均含量为百分之二

---

① 埃里克·埃里克森，自由党人，1950至1953年任总理。

点五，而在丹麦，却是百分之五。换句话说，我们的两公升牛奶只顶他们的一公升。

奶品农场的场主——我想他是反对党领袖——在一个家畜展览会上送给我两头获奖的奶牛和一头公牛。回国后，我命令我们的农业部将这些牲畜转送给一个研究机构，以便对它们进行研究并设法改良我国自己的奶牛品种。

我同丹麦共产党领导人的会谈给我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我们就各种国际问题以及共产主义运动所面临的一般问题友好地交换了意见。同我进行会谈的是丹麦党的书记耶斯佩森。

据我回忆，丹麦党当时正遇到某些困难。事情是从许多年前的一次内部分裂开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丹麦党是由一位老资格的党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担任一定领导职务的拉森领导的。①他常常来苏联，并到中央委员会来跟我交谈。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

---

① 阿克塞尔·拉森 1958 年被逐出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其职务由努德·耶斯佩森取代。原因是拉森参加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在那年召开的大会，因而违背了苏联阵营对南斯拉夫党实行的抵制。拉森参加那次会议是为了表明他想走一条独立于莫斯科的道路。1959 年他被开除出共产党。同年，他组织了社会主义人民党。耶斯佩森所领导的亲莫斯科的丹麦共产党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唯一继续忠于苏联路线的党。

直爽、风趣和值得信任的人。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他提出了一个略微使我感到有些意外的问题。

他说，“赫鲁晓夫同志，我不懂你们的钞票为什么印得这样大。纸张是宝贵的，可你们却在浪费钱。再说，这么大的钞票放到皮夹子里很不方便。”他说着掏出了自己的皮夹子，给我看了几张〔丹麦〕钞票。

“拉森同志，我只能告诉你，这种大钞票是我们俄国的传统，此外我想就没有什么别的原因了。我十分欣赏你细心的、注重实效的建议。下次我们印新钞票时，将把你的意见考虑进去。”

我们的国家银行和财政部也建议过把钞票印小一些。不久之后，我们接受了拉森的意见，结果节约了许多钱。

总而言之，我和拉森两人以前一直是十分投合的。但后来我们变成了敌人。他参加了一些国际会议，在会上他采取了不同于其他党的总路线的立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是亲南斯拉夫的。结果他成了众矢之的，受到了批判，最后甚至被他的同志们开除了。后来，他同共产党断绝关系并组成了他自己的党——社会主义人民党。这个党在建立初期参加者不多，但后来在丹麦选民中具有相当的影响。

我们当然支持共产党和耶斯佩森同志，即使拉森仍把自己称为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且在国会选举中

他的社会党候选人有时得到的选票比共产党支持的候选人还要多。

在我访问丹麦期间，在我们代表团同国会领袖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我意外地遇到了拉森。我们甚至没有打招呼或握手，仅仅稍稍弯了弯腰。他提了一些带刺的问题，对此我们并未认真对待，而只是以嘲笑他的政治立场的做法来回敬他。丹麦反共的新闻界利用了拉森同我的这次交锋。这是我访问丹麦期间一件不愉快的事。

我同丹麦首相处得很好。他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他和他的夫人把尼娜·彼得罗夫娜和我领到他们在哥本哈根郊外的住处。①那是在一个看来象工人住宅区一样的不显眼的小镇上。房子大部分都是两层楼，房子的前面还有美丽的草地和小花园。你可以看到邻居院子里的情况，他们也可以看到你院子里的情况。总之，首相居住的地方舒适但不奢华。

他的妻子是个善于交际的女人——一个电影演员——比她丈夫要年轻些。她领尼娜·彼得罗夫娜到各

① 詹斯·奥托·克拉格首相是在1959年当他还是外交部长的时候同他的妻子海勒·弗克娜结婚的。在整个六十年代以及后来在七十年代，她仍继续担任电影演员。据报道，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曾说，他认为在所有的总理夫人中她是最漂亮的。

个房间去看了一下，首相和我则在花园里的一个小桌旁坐下，一边喝着茶和咖啡，一边谈话。

丹麦政府安排我们在王室的乡间别墅受王室的接见。人们事先告诉我们，国王是个打猎迷，所以当我们抵达王宫后听说国王打猎尚未回来时，并没有过分感到意外。王后欢迎了我们，她同我们一直交谈到国王回来。王后衣著简单。她看上去象位富有的女人，但她却没有穿王室的服装。①

国王来到时，给我的印象也出乎意外。他看上去同一般人没有什么两样。他并没有穿人们原来以为一位国王会穿的服装——没穿制服，没穿礼服，也没有象征王权的标志。他只穿了一身普通的服装。他的皮肤也不象画像上的国王和王后通常所显得的那样特别苍白和纤细。人们很容易把他当成从事一般职业的普通人。

我们知道他喜欢打猎，于是送给他一支有上下两个枪筒的“图拉”牌猎枪。国王一拿到枪，就想把它装配起来，但未能成功，于是显得有点焦急。我想帮他一下，可后来自己也乱了套，因为我没用惯这种上下两个枪筒的猎枪。我对通常的双筒平行的猎枪较为熟悉。最后，我们请我们的卫士长李托夫钦柯同志给国王作了装配这枝新枪的示范。尽管国王不懂如何装配这枝枪，但还是感

① 国王斐德烈九世和王后英格里德在弗雷登斯博格的夏宫中设午宴招待了赫鲁晓夫。

到十分高兴。

对我们来说，上下枪筒的猎枪还是个新鲜玩意儿，但欧洲人已生产了多年。我有一对这种猎枪，一枝是比利时的，另一枝是德国的。当然，在好猎手的手中，我们的“图拉”牌猎枪可以同西方的任何猎枪媲美。

随后，我被介绍和国王的女儿——公主们见面。①最小的女儿还只是个女孩子，长得很好看。我甚至要说，她很漂亮；虽然对一个女人的外貌，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这个女孩立即给我们的代表团留下了印象。她看上去象一朵鲜花。我们被告知她已和希腊的国王订婚。当我听到这一消息时，我几乎无法克制要对她表示同情。国王现在已经是过时的了，希腊的王位尤其摇摇欲坠。为此，我不能不对这个小女孩表示同情。她当了希腊王后以后，肯定会遇到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也许有人会说：“看看赫鲁晓夫吧，他从前当过工人，可他却为王室表示担忧！”是的，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我并不是把她看作王室成员，而是对她作为一个人而感到难过。如果她的新郎不是一个国王，我听到她订婚的消息后会很高兴的。我知道这位可爱的小公主将会遇到一些不愉快的意外事件。果然不错。几年后，希腊的校官们

---

① 即玛尔格蕾特公主、本妮迪克特公主以及当时十七岁的安妮·玛丽公主。

发动了一场政变，国王夫妇只得逃往意大利。①

接着，我们到了挪威。那也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当然，我向挪威国王表示了敬意。②

人们事先曾告诉过我，国王已故的父亲非常相信民主。他常常乘着电车到他喜欢钓鱼的地方去，乘客们有时把他当成一个普通的公民。他的行为是否真的民主到这种地步，我不敢肯定，但确实有这样一个传说。

我必须为同挪威国王的会晤作好准备，因为他有一个相当奇怪的生理缺陷。我的顾问人员告诫我说，国王有时会无缘无故地放声大笑。他并不是为有趣的事情发笑，只是他有这个缺陷或毛病。所以，假如他在我面前大笑，我得装着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并摆出我什么也没注意到的样子。

我们被领到王宫；这个地方看起来根本不象王宫，一点儿王宫的气派也没有。它无法同我在列宁格勒和彼得哥夫参观过的沙皇皇宫相比，尤其不能同叶卡捷琳娜或

① 1964年9月，安妮·玛丽公主同希腊国王康斯坦丁二世结婚。1967年，在反对执政的军人政府的政变失败之后，国王夫妇流亡到罗马。1973年，康斯坦丁正式被废黜，君主制被取消。关于赫鲁晓夫对皇室态度的另一个例子，即对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态度，见《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407页。

② 奥拉夫五世，哈康七世之子。

保罗在皇村的皇宫相比。挪威王宫看上去就象一般大资本家的住宅一样。一位身穿卡其制服的男子在大门口迎接我们。他把我引进一间书房，请我在一把椅子上坐下，然后我们就双双坐了下来。我突然意识到他就是国王。人们很容易把他错当成一个花匠。

我们的谈话都是客套并且简短，没有涉及任何实质性的问题。毕竟，和挪威国王有什么好谈的呢？象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一样，国王并不决定政府的政策。政策是由部长们决定的。

首相是基哈德森，社会民主党领袖。①他当过建筑工人，在德国占领挪威期间当过泥水匠。战争期间，希特勒分子逮捕了他。直到我们的军队把德国人赶出挪威北部后，他才从集中营里被释放出来。他和我一起向苏联和挪威烈士墓献了花圈，他们是在反对纳粹占领者和盖世太保的斗争中牺牲的。

基哈德森政府的政策总的来说是自由主义的，虽然我们感到挪威在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问题上所作的努力还不够。挪威是我们的近邻。它参加北约组织对我国的边境是一个威胁。即使现在，北约还在紧靠我国领土的海面和山地进行军事演习。不过，考虑到挪威的反动政客在议会中的表现，我们当然还是支持基哈德森。

---

① 艾因纳·基哈德森是工党党员。

基哈德森的妻子也是一个社会民主党人。①她曾作为一个青年团体的负责人访问过我国。她陪尼娜·彼得罗夫娜参观了一些学校和社会团体。

首相的妻子在挪威的政治生活中是很积极的。她属于社会民主党的左翼，因而比她丈夫更加接近共产党。挪威共产党人都直称她的名字。我记得曾经听说，当挪威工人阶级走上街头的时候，她同共产党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一起在街头修筑街垒。当然，并没有发生过战斗。这些工事仅仅是象征性的。但不管怎样说，首相的妻子能参加这种代表着无产阶级向其阶级敌人——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示威行动，却是件意义重大的事。

在奥斯陆我国大使所举行的露天招待会上，我们会见了挪威共产党的领导人。他们都是聪敏过人的好同志（虽然后来——在我退休之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同我们在中国问题上发生分歧）。尽管他们是反对政府的，但我们的挪威同志仍然给予基哈德森首相以高度评价。

据他们解释，执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在议会中比起影响很大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来只占极微弱的多数。在关键时刻，如果基哈德森有被赶下台的危险时，共产党人宁可

---

① 维娜·基哈德森是在劳工运动中认识她丈夫的；后来她在政治上一直很活跃，人们都说她比她的丈夫要左。她在 1955 年和 1965 年曾随基哈德森到苏联进行国事访问。

支持他，而不愿让资产阶级政党组织政府。

我在奥斯陆逗留期间，基哈德森要求同我单独谈一次话。我同意了，虽然，我记得后来葛罗米柯也出场了。基哈德森和我有时候互称先生，有时候互唤同志。我想他是第一个跟我相互使用无产阶级称呼的人。

“赫鲁晓夫同志，”他说，“看样子我们在下届议会选举中是不会获胜了。我担心资产阶级政党会上台，我们将变成反对党。我们的选票一直在减少。现在我们在议会中只有一个席位的微弱多数。而且，就连那个席位也不是属于我们的，它属于另一个党，这个党在我们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之间持中间立场。①目前看起来，在下次选举中我们将要失掉那个席位。”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问他。“你们的选民大都是工人。为什么他们要选资产阶级政党提名的候选人呢？为什么工人阶级要跟自己的利益唱对台戏呢？也许你们该重新考虑一下自己的政治纲领，并且提出一个新的、更加激进的计划，以吸引那些可能支持资产阶级候选人的劳动知识分子和农民。”

我可以看出基哈德森的双唇露出一丝微笑，他的眼中带有一点儿讽刺。他回答说：“赫鲁晓夫同志，你要知道我们不可能提出比现在更激进的纲领了。”

---

① 社会党人是工党联合政府的伙伴。

“为什么不能呢？假如你们不这样做，你们必然会同工人选民疏远，他们会投票反对你们。”

他盯住我看了一会儿，然后更加诚恳地对我说，“赫鲁晓夫先生，你知道我国还有另一个政党。它的政治纲领比我们更加激进，但在选举中所得的选票却比我们少得多。因此，我认为更激进的纲领并不是解决我们问题的答案。”

我不难猜出他所说的“另一个”政党指的是谁。我完全明白他是指共产党，它在议会中只有五、六个代表。

我决定把问题提得更具体、更直接了当一些：“那末，基哈德森先生，请告诉我，你认为工人们不投你的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

“我告诉你吧，”他很难过地说。“这是因为，我们的许多工人现在都有了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小船和自己的游艇——一句话，私有财产。我们提出了一个法案，规定对在一定价值以上的财产按比例收税。我们的工人必须交付这一税款，所以他们现在就投票赞成资产阶级政党，因为它答应给予他们各种各样的税收优惠。”

纵然基哈德森首相知道他的政府只能再执政短短的几个月了，他还是不敢断然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使我感到他的社会民主党仍然有点害怕苏联，而且它从根本上还是执行了资产阶级的政策。不过，我依然为他感到难过。后来他真的在工人中失去了许多选票，他的

政党也就此下了台。我想，至今社会民主党仍处在反对党的地位。

我记得，每次在议会选举前，挪威社会民主党都要向我们求援，要我们购买挪威过剩的鲱鱼。①我们总是非常乐意。因为他们的鲱鱼加工得不错，又便宜，我们国内大量需要。从纯商业的观点来看，这对我们是一桩有利的买卖。据我们的财政部长说，我国渔业和罐头业的成本比起挪威来要高得多。因此，我们可以向挪威购买鲱鱼，然后按通常的价格在我们的商店出售，这样一来可赚不少的钱。唯一的限制是我们用来支付的黄金储备和硬通货不够充足。

象丹麦人一样，挪威人也卖船给我们。这也是一种互惠的交易。挪威资本家赚了钱，从而为国内的工人阶级创造了更多的工作。挪威的造船业资本家和其他的实业家对我们十分客气。显然，我们的订货使他们很高兴，他们正期望着我们能跟他们再多订些合同。正象在丹麦时一样，尼娜·彼得罗夫娜参加了一条挪威船的下水典礼。

难怪挪威人是如此高明的造船和航海家，原来他们是北欧海盗威金人的后代。据现代的历史学家说，他们的祖先当时曾一直远航到北美，并在那里建立了殖民地。

① 从而造成选举前夕的经济繁荣。

在一个歌剧中，一个威金人甚至还有这么一段唱词："我们生在海洋，也将死在海洋。"①

我记得我们是乘船去斯德哥尔摩的。我们的船沿着漫长而弯曲的海湾行驶，路上化了不少时间。给人的感觉似乎是航行在一条宽阔的河流上，而不象是在大洋的入口处。在整个航程中，我始终呆在甲板上。我的眼睛无法离开这优美如画的风景。我想把所能看到的一切尽收眼底。我可以看到两边大陆的海岸、为数众多的游艇以及不计其数的岛屿。一路上，我们经过一些游艇港湾、度假胜地和小市镇。水手们、海水浴者们以及村民们都向我们挥手致意，我们也向他们挥手答礼。

瑞典确实是个美丽的国家，生活水平很高。瑞典人和蔼健康的面孔，风雅朴实的衣著和先进实用的技术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象在丹麦和挪威一样，我们参观了一家瑞典船厂。尼娜·彼得罗夫娜又一次参加了一艘船的下水典礼。现在可以说她已学到了一些技巧，我们跟她开玩笑说她的工作做得不错。

人们领我前往参观斯德哥尔摩郊外的一个农场。我们抵达时，农场主正在操纵一台联合收割机。它先把苜

① 指N·A·里姆斯基-科尔萨科夫的歌剧《萨特阔》。

蓿刈下，然后挤压苜蓿的茎。这样，植物的干燥程度就均匀一致。我以前从未看到过这样的设备。我得承认，我甚至不知道有这样的东西存在。农场主还给我看了一部很特别的水陆两用拖拉机。它既能用进来行田间割草，又可捞取水塘中的杂草去喂牲口。我要我们的专家购买一些这样的机器，并研究一下我国自行制造这些机器的可能性。

按照外交礼节，我们应拜会瑞典的国王。我记得他是一位身材魁伟、仪表出众、头发灰白、身姿挺直的老人，举止象个卫士。我相信，他年轻时一定当过士兵——虽然可以肯定，他当王太子时决不会是个普通的卫士。他是某方面的学者或科学家。我出国前，我们的科学家给了我一批书，他们认为国王对这些书可能会感兴趣。我将它们作为礼物送给了国王，以供他私人的图书馆或瑞典科学院之用。①

我们同国王的首相埃兰德进行了一系列有益的会谈。②会谈时，葛罗米柯同志往往都在场。

一天，埃兰德建议我们到乡下去走走。政府在那里有一幢别墅。他把我们带到了一个美丽的湖泊旁边，建议大家划船。起先，我们一起划。到近黄昏时，我一个人

---

① 古斯塔夫六世（古斯塔夫·阿道尔夫）是位很有名望的考古学家。

② 即社会民主党的塔格·埃兰德。

单独搞了一条小船，远远地划到了湖中心。晚上我们参加了一个半正式的宴会，并就国际问题交换意见。

埃兰德和他的丹麦及挪威同事一样，是个社会民主党人。在我们会谈中间，他有时偶而夹进几句左派的词句。有人认为他是个左派——当然，这只是西方的观点。不过，比起别的社会民主党人来，他在发表支持裁军的讲话时调子显得更激昂些。

更重要的是，瑞典——不象丹麦和挪威——始终执行一条中立的政策。它可随意批评北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虽然它同北约国家的关系比起同我们要好。这是很自然的，因为瑞典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尽管它有一个由社会民主党领导的所谓的"工人政府"。

我常就瑞典的中立跟索尔曼先生开玩笑。多年来，他一直是瑞典驻苏联的大使和各国大使中任期最长的一个。①

我常对他说："索尔曼先生，现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不错，但我们没有忘记历史。我们不得不对你们保持警惕，以防你们再次向波尔塔瓦进军。"

"赫鲁晓夫先生，你知道"索尔曼常这样回答，"自从你们的彼得一世在波尔塔瓦一役中教训了我们的查尔斯

---

① 罗尔夫·索尔曼自1947年至1964年任瑞典驻莫斯科大使，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任莫斯科的外交团团长，他的妻子捷娜达是俄国血统。

十二世之后，我们不仅再也没有同俄国打过仗，而且根本就没有打过任何仗。从那时起我们一直是中立的。"①

彼得一世和查尔斯十二世早已死了，所以拿他们来开玩笑丝毫没有关系——虽然我要说，我们提到的那次战役是流了不少血的。

索尔曼有个俄国妻子和一个会讲一口流利俄语的十几岁的儿子。有些俄国人在跟外国人结婚之后，会流露出对自己祖国的敌对情绪。但索尔曼夫人总是十分谦和。毫无疑问，她和她丈夫一样也是一个资产阶级分子，但她对苏联政府和苏维埃国家始终是尊重的。索尔曼本人是个忠诚的瑞典人，当然，肯定不是共产党员。但他一直如实地向其本国政府转达我国政府的政策，我们对他的工作无可厚非。

在我遇到的其他瑞典官员中，我要提一下一位妇女，她是文化部长。②我想，她的部也兼管宗教事务。在一次招待会上，她朝我走来，显得很高兴。我想她是有点喝醉了。

"赫鲁晓夫先生，"她说道，"有件事我想听听你的意见。不久，我们将颁发诺贝尔文学奖金。苏联有两名候

---

① 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之役中，沙皇彼得一世给了瑞典的查尔斯十二世国王以毁灭性的打击。

② 瑞典内阁中没有文化部长。当时内阁中唯一的女人是尤拉·林斯特龙，是不管部长，她确曾积极过问文化事务。

选人。”她讲了他们的名字。“你认为怎样？我倾向于支持这位”——她说出了她赞成的这个人的名字。

“你为什么要问我呢？我又不能影响你们的决定。”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呵，那样的话，”我答道，“两位作家当然都该得奖。但在我们国内，他们两人的名气都不是很大的。我们有不少更能令人中意的候选人。我想，如果把奖金授给另外一位作家，我国的公众将会更加感到满意。”

“那末他是谁呢？”

“米哈伊尔·亚历山得洛维奇·肖洛霍夫。如果你在我国进行一次民意测验，我相信大多数人会赞成他。我知道，假如他获奖，我国的知识界和文艺界肯定会感到高兴的。”

她没有再讲什么话。我自己也不准备在这件事上多发表什么意见了。毕竟，诺贝尔奖金是瑞典政府内部的事情，再说，去向人乞求奖金对我们也是有失尊严的事，它会降低我们的人格。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奖金。例如，诺贝尔奖金就无法同列宁奖金相比。

约莫一年以后，当时我早已退休了，我获悉瑞典人把奖金授给了肖洛霍夫。我想，瑞典政府一定是考虑了我对文化部长所讲的那些话。

除此之外，关于这次的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之行，我想仅仅再谈一件事了——一件我怀着特别愉快和感激的心

情铭记在心的事。哥德堡的社会民主党市长送了我一架出色的照相机，能拍极好的照片。既然我不得不过一种无聊的退休生活，我就充分地利用了它。我经历了暴风骤雨般的政治生活之后，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生活的空虚常常使我感到万分沮丧。有时候我真不知道该拿自己怎么办。我不知道该怎样来打发我的时间。这种无聊的生活已持续了相当一个时期，我不知它什么时候结束。我的照相机帮我填补了生活的真空。我特别感激这架照相机，感激我对哥德堡市和它的那位好心的市长的愉快回忆。

结 束 语

在今天这个科学文化发达的时代，人类在自己的智慧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同时，花在研制和改进毁灭自己的武器上的精力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世界分成了两个阵营，各自都想消灭对方。除了在每一个社会内部敌对阶级之间正在进行斗争外，世界又由于政治制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冲突而陷于四分五裂。

有人曾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会结束一切战争，因为人类决不会容许这样惨重的破坏再次发生。但是，现在已到了有人谈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时刻。你不能单靠说什么“现在有了核武器，战争已打不起来了”之类的话，就以为可以排除战争的可能性了。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可能爆发的。世界上有够多的想发动世界大战的疯子。

我知道我们的政府不要战争。在我担任首脑时，我曾竭尽全力来避免战争。但是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有些人说，核武器的发展已阻止了战争的爆发。我要对他们说，核武器的发展阻止了有限战争的爆发，即阻止了用常规武器所进行的战争。现在随时都存在着一个危险，即大国卷入小国间的一场军事冲突。一旦发生了

这种事情，不管可能有什么样的允诺、保证和协议，很难相信一个陷入绝境的人不会去抓救命稻草。

换言之，既然大国拥有热核武器，那末，当它们眼看自己要在一场常规战争中输掉时，肯定会使用这些核武器。在决定胜负的关键时刻，肯定有人赞成揿电钮，导弹就会腾空而起。一旦有一方在绝望之中首先使用原子弹和氢弹，一场全球性的大灾难也就会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我有一次在讲话中曾谈到这个看法。最近，我听到一个资产阶级记者在电台里提到了我的这个讲话。

美国一直是我们潜在的敌人。当然，它一直是我们最强大和最危险的对手。如果我们曾使西方有机可乘，那末，杜勒斯还在世时战争可能已经爆发了。

但是，我们是第一个把火箭送入空间的国家。我们也爆炸了威力最大的核装置。我们是最先创造这些奇迹的国家，跑在美国、英国和法国的前面。它们是国际政治大乐队中的主要演奏者，而美国则为其盟国定调子。我们的科学成就和出色的军事力量对美国、英国、法国，当然也包括波恩政府中的侵略势力在内，起了清醒剂的作用。他们很快就认识到自己已失掉了可以不受报复地打击我们的机会。

我们已看到了这一天，即苏联在经济和军事力量上已被认为是世界两个最强大的国家之一，这是件了不起的大事。正象我曾叙述过的那样，麦克米伦和戴高乐这

两个头脑清醒的人全都认识到我们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性，并承认我们已超过了英国和法国。戴高乐曾说过："赫鲁晓夫先生，法国的地位和影响不如以往了。今天美国和苏联是两大强国。"①

艾森豪威尔也并不是一个缺乏理智的人。他对我说，他对一场大规模的战争感到恐惧。我相信他讲的是真心话，也就是说，我并不认为他想要欺骗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他是我们盟国军队的总司令，他能够具体想象一场用导弹和核武器进行的战争会是个什么样子。虽然签订一项〔裁军和监督〕协议的时机尚未成熟，我认为艾森豪威尔是诚恳的——即使有人因我赞扬这位总统而讥笑我，我也不在乎。②

我记得肯尼迪总统有一次在讲话中或记者招待会上讲过，美国所拥有的核导弹能力可以把苏联毁灭两次有余，而苏联所拥有的原子武器则仅够把美国毁灭一次。他又说："然而，美国仍然愿意尊重苏联，并避免冲突。"当记者要我对肯尼迪的话作出评论时，我打趣地说："是的，我知道肯尼迪说了些什么。他讲得很对。但是我并不抱

---

① 这一段也出现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06—507页上。赫鲁晓夫指的是1960年最高级会议破裂以后，他在巴黎同这两位领导人的谈话。

② 赫鲁晓夫指的是他1959年在戴维营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

怨——只要这位总统知道，虽然他能够摧毁我们两次，而我们仍然还可以摧毁美国，那怕只是一次。我得感谢总统承认到这种程度。我们只要能在第一次把美国摧毁掉也就心满意足了。一次已经够了。把一个国家毁灭两次有什么意思呢？我们并不是一个嗜血的民族。”

我的这些话使一些记者笑了起来。

我无法对后来的几位美国总统——特别是尼克松——也表示同样的信心。据我看，这个人很难捉摸，我甚至要说他神经不太正常。我不知道他除了在思想上对共产主义和一切进步的事物怀着露骨的仇恨之外，还有些什么别的动机在支配着他。

目前首要的事情是要让世界各国首脑都认识到，战争必须予以防止。因为在今天这个时代如果爆发战争，它将会给整个星球带来灾难。毛泽东相信，新的大战会削弱资本主义国家，而无产阶级将能进一步取得新的革命成就。这是荒谬的。战争对社会主义国家所造成的危害同对其他任何人的危害是一样的。

不管毛是怎样说的，社会改革是个内部问题，应该由各国人民自已来决定。我现在谈的是阶级斗争，这是一个长期和困难的过程，是无法在会议桌上得到解决的。资本家和工人阶级是无法通过友好的会谈而取得和解的。

只有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取得胜利和阶级敌

人从地球上消灭之后，这个斗争才会停止。历史和未来都会证明，无产阶级将赢得最后的胜利。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情况会好转起来；在有些地方这可能是个渐进的过程，在另一些地方则可能发生突变。人民具有最后的发言权，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之间现存的关系将会消失。

我们共产主义者应该采用除战争以外的一切可行的手段来加速这一进程。我们要记住，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不一定会冒一场世界大战的风险，但它们决不会错过对我们在意识形态上进行颠覆的任何机会。我认为，这是正常的，也是合情合理的。资本主义利用它们的思想宣传武器，而我们则利用我们的思想宣传武器。我们永远不要忘记，敌人一直在不停地反对我们，一直在寻找机会利用我们的某些疏忽。

世界正进行着一场决定谁胜谁负的战斗：是工人阶级还是资产阶级将赢得最后胜利？工人阶级坚信，资产阶级已经筋疲力竭，寿命不长了；而资产阶级则相信自己将永远统治世界。

每一个头脑正常的人都能清楚看到，只有当一种学说战胜另一种学说时，意识形态这个根本的问题才能解决。只要资本主义拒绝放弃一寸土地，只要它们决心战斗到底，我们共产党人，我们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可以那怕只是在头脑中考虑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实行妥协呢？

这是行不通的。意识形态上的妥协将是对我党最高原则的背叛，——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事业的背叛。

正是由于我具有这种信念，所以有一次我才说出了“我们将埋葬革命的敌人”这句话。当然，我这是指美国。敌人的宣传机器马上捡起这个口号大肆歪曲：“赫鲁晓夫说，苏联人民想要埋葬美国人民！”我没有讲过这种话。我们的敌人把我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加以歪曲和利用。

后来，我在记者招待会上对我这句话的意思作了精确的表达和澄清。我们苏联不想去埋葬谁，美国的无产阶级将会埋葬它的敌人美国资产阶级的。我的口号述及的是应由每个国家自己决定的内部问题，即该国的工人阶级将走什么道路、用什么方法去打败资产阶级并夺取胜利。①

然而，这是一场每个国家内的无产阶级和本国的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正象在我掌权的年代里我多次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及在一些讲话中所讲过的那样，在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领域内不可能有和平共处这类东西。但在不同政治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中，是能够有而且必须有和平共处的。

和平共处是在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也

---

① 这一段也出现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12—513页。

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着的这个时期内最合理的战略。和平共处既符合社会主义国家的利益，也符合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也符合那些最近刚刚从殖民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所谓中间国家人民的利益。我不时进行演说宣传这种思想，即我们必须同资本主义世界共同合作，和睦相处。

首先，我们仍然有好多地方要向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有许多事情，我们仍然做得不如它们好。苏联工人阶级在伟大列宁的领导下取得革命胜利至今已有五十多年了，但我们还是没有赶上资本主义国家。这使我极为失望和恼怒。有时候我们开玩笑地说，资本主义已经烂透了。但这些"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仍在不断生产着使我们惊讶得下巴都要掉下来的奇妙东西。我十分想用我们自己的成就去让他们也惊讶惊讶。特别在技术和组织方面，"腐朽的"资本主义已取得了一些成果，我们应把这些果子好好地移植到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土壤中来。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亲自创建了国家间和平共处的学说。列宁不是曾讲过苏联应该和各个资本主义国家彼此接触，相互交换意见吗？列宁不是还讲过革命不能输出吗？所以，正象我们反对输出反革命一样，我们也反对输出革命。我们必须遵循列宁的方针，把推翻资本主义这件事情留给各个国家的人民去办。我们不应干涉他国内政。

如果大国干涉小国的内政，那末爆发一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从而全面毁灭的危险——将会增加许多倍。自1945年以来，我们一直和各资本主义大国和平共处。在世界各地发生了许多局部冲突，但是由于主要大国没有插手，所以没有扩大成全球性的战争。这里，我得赶快补充一句，在越南的那些美国军国主义者是个例外，他们的所作所为就象是披着宪兵外衣的匪徒一样。

现在，我们与其谈论战争，还不如谈谈裁军的问题。

我们的军事目标始终是防御性质的。即使在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听到斯大林讲过一句要对另一个国家进行侵略的话。他最关心的是在莫斯科周围建立起一系列防空设施，以防我国遭受西方的攻击。

我们早已用更为复杂的武器代替了那些高射炮。由于我们的科学家——例如我们杰出的设计师谢尔盖·巴甫洛维奇·科罗廖夫——的辛勤工作，我们已研制成功了洲际弹道导弹，它对于敌人任何可能的侵略行动都是一支有效的威慑力量。

假如敌人果真用导弹对我们发动一场攻击，怎么办？除了有力量回击以外，我们是否有办法在他们的导弹落到我们头上以前就将其击落呢？当然，从理论上说，科学为我们提供了这种手段。有时我常常在讲话中说，我们已研制成功了一种反导弹导弹，它的精确度甚至可以打中一只苍蝇。自然，那只是一种夸张的讲法，目的是为了

让敌人三思而行。事实上，要想极端精确和绝对可靠地拦截射来的洲际导弹是不可能的，即使你把大部分都打了下来，总还会有几个漏网的。

约翰逊总统克制了自己想发展一个反导弹系统的念头；但后来尼克松进入了白宫，他宣布美国将建立自己的反导弹系统。当然，这就刺激了苏联，使我们加紧进行自己的计划，以免使我国落在美国的后面。我们的做法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进一步加速了他们的计划。事情就这样发展下去。这是一种恶性循环。目前还看不到有什么尽头。

反导弹导弹的情况是一个绝妙的例子，它反映了军备竞赛是多么的愚蠢。这种螺旋形上升的竞赛，对人类的智慧和物质财富都是一种无止境的浪费，并且还增加了酿成一场军事灾难——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我不得不再一次把尼克松跟艾森豪威尔作一比较。我曾经同后者交换过自己的经验，谈到我们的军人怎样经常对政府施加压力，迫使政府掏钱给他们制造新式武器。国防现代化当然是必要的，但它会走到荒谬的极端上去。

要记住，军备竞赛对于西方的垄断资本集团来说是一项赚钱的买卖，但对社会主义世界则起了一种经济上的危害作用。我们要牢牢记住一切帝国主义者、垄断资本家和军国主义分子的本性，他们正热衷于利用各国之间政治上的紧张关系来从中渔利。除了最关键的领域以

外，假如我们想在军事准备工作的所有方面都和西方进行竞赛，那就只会使美国的富翁集团更加富有，他们可以借口我们增强了军事力量，从而进一步增加本国的军事预算。

西方的反动势力明白，迫使我们把经济力量消耗在巨额的军事预算上，从而把我们原来可以用于满足我国人民文化和物质需要的钱移作它用，这对他们是有利的。我们不要上敌人的圈套。要记住，国防工业是我国经济的一个非生产性部门，它不能用来满足我国人民生活的需要。军事开支是一个无底洞，帝国主义阵营很希望看到我们把自己的经济财富往洞里倒。敌人会来刺激我们，我们别让他们牵着鼻子跑。我们不要被人家一激就去生产不必要的武器。

虽然我无法一一列举我们的科学家和设计师的名字，但我想我已清楚地说过，我是如何赞赏他们为提高我国国防技术水平方面所做的工作。然而，我们要记住，科学和技术的进步会象鞭子一样，它在我们的头顶上噼啪作响，刺激我们在国家安全上化费越来越多的钱财。我们随时可以造出质量比现在更高的火箭或炸弹，但要想积累大量的、足以使自己百分之百地安全的最新式武器却是个幻想，是一种梦想。

我们应现实地看到，军备竞赛是西方各国在业已下台的丘吉尔煽动之下，在冷战时期强加给我们的。军备

竞赛是敌人蓄谋已久的计划的一部分，它的目标是阻碍我们的经济发展，阻碍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播下混乱和不满的种子——并且，如果可能的话，把我国的社会主义引向崩溃，让资本主义复辟。

战后，我们实行了配给制度。生产资料大多转到了军事生产上去。我国人民对我们刚刚赢得的反希特勒占领者的战争记忆犹新，使得他们愿意勒紧裤带，忍受艰苦。他们这样做是出于爱国心，也是因为他们害怕失去自己亲人的生命。只要能增强我国的军事力量，防止敌人向苏联发动进攻，几乎一切牺牲都是正当的。

在我担任党和政府首脑时，我也认为，为了增强我国的国防力量，我们应该在住房建筑、公共设施建设甚至农业发展上都要励行节约。我甚至还暂时停止了基辅、巴库和第比利斯地下铁道的建设工程，以便把这笔钱用来增强我们的防御和反击力量。我们还减少了体育馆、游泳池和文化设施的建造工程。

我认为，至少在当时，我不惜以牺牲其他方面的投资为代价（最重要的投资除外），集中力量把资金化在军事上，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我原先没有给予军事需要以如此优先的地位，我们就根本无法生存。我把我全部的力量都献给了为苏联配备新式武器的事业。这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挑战性的重要的阶段。

现在，我除了对往事的回忆外很少有别的生活内容

了。我常回想起那段使我们苏联军队的武器现代化的建设高潮时期。作为部长会议主席和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我以能主持把我们的国防改革成为最现代化的力量而自豪。在我当政期间，我们的人民和军队成为不可战胜的。①

但是，我们在军事上化费这么多的资源是冒险的。一俟达到了足以保卫自己并制止任何敌人的程度，我们就对经济作了调整。我们认识到，如果人们没有土豆，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一直喊"乌拉!"——即使他们喊了乌拉，声音也将是十分微弱的。我们开始节约军费开支。

现在我已退休。但从一个养老金领取者的立场出发，我不能不注意到我们开始的节约趋势似乎已被倒转。现在，资金正被浪费在许多不必要的项目和部门上。而且这种在军事上化钱过多的新趋势，正在日益排挤我国生活中某些重要得多然而依然经费不足的领域。但是，我是与世隔绝的，我只能讲一些自己知道的事。我知道，资本主义国家在战后最早结成了军事同盟，而我们则最早建议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这两个敌对的联盟。我们应为这一目标继续努力。

同时，我们也要记住，真正起作用的东西是我们核武库的规模，而不是我们军队的数量。步兵已不再是军队

---

① 这一段也出现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第一卷第516页上。

的肌肉，可以说它已成了军队的脂肪，所以军事人员应缩减到最低限度。我们在军队中的人数越少，就可以有更多的人从事其他的生产性工作。认识这一点，对正在为实现和平共处而斗争的全世界进步力量来说是一个良好的共同起点。

我们还应该强调军备控制。我们可以劝告帝国主义者，告诉他们限制军备竞赛对他们和我们都是有利的。在我的政治活动时期中，我们达成了部分禁止核试验的协定。我们同意禁止在三个领域内，空中、地面和水下进行核试验。这个条约是 1963 年 8 月 5 日在莫斯科签订的。这是个良好的开端，可是美国拒绝把禁止进行地下核试验列入条约。

然而我也要说，美国曾经建议过一些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控制军备的措施。我记得他们曾坚持说，条约中应包括在我国任何地方进行实地监察。总的来说，控制军备的想法对我们来说是可以接受的。朱可夫（当时是国防部长）和我在原则上同意对边境地区实行实地监察和在我国边界以内一定距离范围内进行空中侦察的办法。但我们不能允许美国及其盟国的监察人员在苏联境内到处乱跑。他们可能会发现我们处于比较软弱地位，而这将鼓励他们对我们进行袭击。

可是，这一切都已经变了。虽然在毁灭性武器的数量上美国仍然可能比我们占优势——北约组织可能比华

沙条约组织在数量上占优势——，但这个差距是微不足道的。在我担任政府首脑的最后几年里，据我国军事理论家们的估计，我们拥有把敌人碾为齑粉的核能力。我们积累的武器已足以摧毁美国的主要城市，更不用说我们在欧洲的潜在敌人。

因此，我认为我们已没有任何理由反对实行国际控制核武器的建议了。假如我还能对苏联的政策有所影响的话，我将要求我国签订一个比朱可夫和我曾考虑过的更加广泛的有关监察的双边协定。更明确地说，我将赞成在我国边境的指定地区实行实地监察。（当我谈到边境的时候，我指的是我国的西部边界。我撇开了我国东部边界的问题，因为在那里我们和中国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情况。中国人对苏联和对我们的思想路线有着病态的仇恨，要想跟他们取得谅解对我来说是无法想象的。）

在我国和西方的关系问题上，我还赞成对所有军事基地，尤其是飞机场，进行实地监察。对机场实行监察十分重要，以防止任何一方集中兵员运输机以实行突然袭击。我们担心敌人对我们进行突然袭击，而敌人也同样害怕我们对他们施以这种袭击。我们和他们双方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监察体系。

简言之，我希望看到我们签订一项互不侵犯并相互实行监察的条约。我强调“相互”两个字。这个条约应该

是真正互惠的，双方都不应欺骗对方。如果条约的一方把另一方看作傻瓜，那将是个极大的错误。只要这个条约的条款对双方真正是平等的，而且各方都诚实地加以执行，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们签订这个条约。

人们可能要问："那末，遇到间谍怎么办？我们这不是邀请北约组织派遣特务冒充执行任务的监察人员进入我们的国家吗？"对这一点我的回答是：我们可以象对方了解我们一样地了解他们的军事技术。换句话说，我们同我们的潜在敌人在搞军事情报方面的机会是相等的。军事情报工作的目的不过是要设法了解对方的活动。这同对军备控制实行监察其实不就是一回事吗？双方都在进行军事情报活动，也都在进行反情报活动。只要世界上存在着两种敌对的社会制度，那些以间谍工作为职业的人是不会失业的。

此外，我对于我们保守机密的能力，印象一直是不深的。我军的规模和编制在我们想象中是核心机密，但是美国人和英国人怎么会知道这些情报的呢。有一次，我曾问马利诺夫斯基同志，为什么有关我们军队和武器装备的最新材料老是出现在外国的报纸上。

"这是怎么回事？"我说。"难道我们的总参谋部里有特务？或者有什么别的原因？"

他耸了耸肩说，"我无法肯定地回答你。但我认为敌人一定是通过正常的收集情报的方法来掌握我们的活

动。”

当然，我们不想把一切都公开，使自己象亚当一样赤条条地站在北约监察人员的面前。也许在军备控制协议的最初阶段，我们可以把监察扩大到我们所有的国防工厂中去，但是只允许监察人员观看从流水线上出来的最后产品，而不准他们把我们的武器拿去作工艺分析。这样，我们就可以对某些武器的设计保守秘密。这种办法当然只是暂时的，但它能给我们时间去达成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其他更有效的协议。

直到现在，我还有些不愿意把军备控制扩大到火箭技术和弹头的部署上。你可以说，我是想把这个题目留下另作文章。当然罗，导弹是所有武器中破坏性最大的——至于你把它们说成是进攻性的还是防御性的，这倒没有多大关系。我相信，在我们同当前的敌人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之前，我们的洲际导弹必须继续作为我们的主要威慑力量而时刻戒备着。我们希望，有一天导弹也会包括在裁军协议之内。但在目前，为了保持恐惧平衡，我们的洲际弹道导弹仍然是必要的（附带说一下，我想“恐惧平衡”这个词是资本主义的那条忠实走狗杜勒斯发明的）。

如果资本主义国家在达成裁军协议的问题上采取拖延态度，那怎么办呢？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中，我当然知道要叫他们同意一桩事情是多么的困难。我认为，即使

不可能达成一项苏美双方共同削减军费开支的协议，我们仍然应该毫不犹豫地大量削减自己的军费开支——单方面地干。

如果敌人想继续增加他们的军事预算，把钱乱化在各种各样的愚蠢事情上，那末他们肯定会降低本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这样，就无意中加强了他们国内共产党人和进步力量的地位，使他们能够以更加响亮的声音去反对垄断资本的反动势力。

如果我们单方面地放慢武器生产的步子，我们就可以表明，在社会主义国家人民的利益和政府的利益是一致的，而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则仅仅代表那些生产破坏性武器的人的利益。我们的榜样将会引起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注意，并将使和平战士可以在他们国内展开群众性的宣传活动。

通过主动放慢军备竞赛，我们还会赢得西方以及全世界知识分子的同情。当然，我们不会使戈德华特满意。我还认为，美国并不都是由戈德华特之类的人组成的。即使在资本家中间，也还有诚实的知识分子，以及宗教信仰不同、社会地位不同和富裕程度不同的人，他们都团结起来为争取国家间的和平而斗争。

我曾提到一位卓越的法国人基尔教士。他把自己的一生都贡献给了促进各国间的和平共处事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赛勒斯·伊顿是另一位极为通情达理的、心地善良的人，尽管在事实上他是一个资本家。① 他和其他同他一样的人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抵制侵略势力，这股势力一直使世界在冷战的边缘上打转并随时都有陷入一场热战的危险。

和平的力量比战争的力量要大得多。如果双方实行军备控制，甚至——在必要时——单方面削减我们自己的武装力量能够鼓舞和平运动的话，我们就应该这样做。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同别的国家达成一项销毁一切武器、彻底裁军和解散所有军事同盟的协议。

任何一个执行军备控制和裁军政策的领导集团都必须果敢和明智。这个领导集团的成员应能独立思考而不受别人威吓。

在我们自己的国家里，这会威吓领导集团的"别人"是谁？是军界。我并不为此而遣责军界，他们不过是在从事他们的本分工作。军界是由军人组成的，他们随时都准备着为祖国贡献自己的生命。然而，领导成员必须注意不要戴着军界的眼镜来观察世界。不然的话，眼前

---

① 在这里，赫鲁晓夫把亚利桑那州保守的共和党参议员巴里·戈德华特跟一位具有左翼政治倾向的克利夫兰工业家和百万富翁赛勒斯·伊顿作了对比。当赫鲁晓夫访问美国时，伊顿曾款待他。关于赫鲁晓夫对第戎市的基尔教士的看法，参看第十七章。

就会出现一幅黯淡得可怕的景象，政府就会开始把所有的资金以及最好的人力资源都化到军备上去，结果这个国家很快就会在军备竞赛中喘不过气来了。

我已相当详细地谈了西方的国内势力、军国主义分子以及大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他们同毁灭性武器的生产利害攸关，并在增加军费开支问题上对政府施加压力。在我国，我们没有私人资本所有制和大工业家，所以当然就没有象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军国主义阶级。但是，我们军界对政府施加压力的情况却是类似的。我并不是把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人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将军们相提并论，但军人总是军人。他们总希望能有一支较大和较强的军队。他们总是坚持要拥有最新式的武器并在数量和质量上对敌人占有优势。

我要再次重申：我并不否认我们的军人具有巨大的责任感，也不怀疑他们高昂的士气。但问题仍然在于，由于在许多非生产性的部门上化费了大量资金，因而使预算过大，影响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而今天同过去一样，非生产性开支中的绝大部分都是化在军队方面。

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我才认为应该经常提醒军界，只有政府才能支配款项，只有政府才能决定军队可以化多少钱，也只有政府才能根据我国与别国关系的性质，其中包括我国在控制军备和裁军上所必须承担的义务，来制订政策。

我们必须注意不要过分崇拜军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军人中，你会发现有些人往往把军界集团看成是高人一等的阶层。约束一下这种人是很重要的，务必不要让他们施展太大的影响。

军人往往容易被诱惑，容易沉溺于一些不负责任的痴心梦想和自吹自擂。一遇机会，军界中的某些分子可能会设法把一项军国主义的政策强加给政府。所以政府对军界的行动要始终保持警惕。

我所讲的“政府”，是指集体领导。在此，我想强调“集体”这个词。当然，个人也应当有所作为，应该尽量发挥个人的主观能动性。但是，指导和影响我们苏维埃国家的那些决议必须由集体来制订。

在我担任政府首脑和中央委员会的最高职务时，我从来没有未经同领导核心的其他同志磋商并征得他们的同意而私自作出过决定。根据我国的状况，一个人要想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别人是办不到的。对于这种做法我是赞成的，我也尽力去加强它。

我还尽了最大的努力来抵制一些人的纠缠，这种人一直不停地高喊：“我们要毁灭敌人！我们要消灭他们！”对待国防政策，我们不应单单从狭隘的官僚主义的角度来理解，而应从更为广泛的角度来看，这需要具有高度成熟的思想以及对国际事务全面深刻的了解。

一个政府首脑应该清楚地了解，今天我们已有能力

造成何种程度的破坏。他还应该知道，即令他能幸运地消灭敌人的话，他自己的国家将会受到什么样的损失。世界上仍然有一些人，看来他们对下一次战争中几乎不会有胜负这一点依然缺乏认识。几乎可以肯定，苏联和美国之间的一场战争将会两败俱伤。

你能想象在莫斯科挨了几颗氢弹袭击后还会剩下什么吗？暂且不谈“几个”——就算它一个吧。或者以华盛顿为例？或者纽约？波恩？想到这一点就使人害怕。对于未来战争所造成的破坏，一切军事方面的数学统计数字以及我们所有的一切计算机都是无法算出的。

防止一场战争比设法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要好上无数倍。对防空掩蔽部、指挥所以及紧急通讯等等，我是十分熟悉的。但是要记住：热核炸弹爆炸的火光一闪，掩体就能变成国家领导人和军事指挥员的墓穴。

好罢，我知道人们会说：“赫鲁晓夫被战争的可能性吓坏了！”

我并不害怕战争。我一向反对战争，但同时我一直十分清楚地了解，如果一个国家的领导人害怕核战争，那就可能使那个国家的国防陷于瘫痪。一旦国家的防御瘫痪，那末战争也就真的不可避免了。敌人肯定会察觉到你的恐惧，并利用它。我一直遵循这样一条原则，即应该明确地反对战争，但又永远不要被战争所吓倒。有时候退却是必要的，但退却也可以是结束抵抗的开始。当

敌人虎视眈眈地紧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时，即使死亡就在眼前，也应勇敢地去正视它。

再说，象我这样年纪的人还怕什么呢？我快七十七岁了。正如俗话所说，我已不再是在赶集去的路上了——我很早以前就已踏上了回家的路。谁知道我的心脏还能跳动几年。我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一切，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为祝愿一个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说的——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而是为我将来的朋友们和人民。

敌人虎视眈眈地紧盯着你的一举一动时，即使死亡就在眼前，也应勇敢地去正视它。

再说，象我这样年纪的人还怕什么呢？我快七十七岁了。正如俗话所说，我已不再是在赶集去的路上了——我很早以前就已踏上了回家的路。谁知道我的心脏还能跳动几年。我在回忆录中所说的一切，是我以一个共产党员的名义为祝愿一个更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而说的——不是为我自己，因为我已是行将就木的人了，而是为我将来的朋友们和人民。